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士) 弗·迪伦马特著

本书根据 Diogenes Verlag der Arche Zürich 1988 年版译出

Justiz :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 :

First published in 1952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Der Verdacht :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Das Versprechen :

First published in 1958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198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序

冯亦代

侦探、惊险小说为通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品种，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读者，其中不少作品对社会产生过影响。自美国作者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开创侦探小说的先河以来，已经过了一百五十余年，侦探小说的流行畅销势头仍经久不衰。尤其近年来侦探小说逐步与政治小说结合，描写间谍活动、政治斗争及犯罪案件，更侧重于惊险和悬念，故事情节愈加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对社会的影响也愈加扩大。

侦探、惊险小说用合乎逻辑的分析，追寻头绪纷繁的破案线索，解开错综复杂的谜团，使正义得以申张，宣扬善恶有报、法网难逃的思想，迎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因此长期以来深受欢迎。但因凶杀、盗窃等犯罪行为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有些人便归罪于侦探小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本或一篇严肃的侦探小说是教唆读者去犯罪的，相反它们却告诉读者：无论作案的情节多么诡秘离奇，也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罪犯终将落入法网，得到应有的惩罚。正如《红楼梦》中的贾瑞，该看风月宝鉴的反面，他却偏要去看正面，于是一命呜呼，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家。而且犯罪的人鲜有因读了严肃的侦探小说而萌发犯罪之意的。一本态度严肃的侦探小说，不仅可供读者消遣之用，还可指引人生迷津，使人悬崖勒马、不致以身试法。

侦探小说中描述的侦探经验和破案方法，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奇巧的构思，常常被现实生活中的警探引为借鉴，激发其破案的灵感。欧美的一些警察学校，至今仍常选用某些侦探名著中的案例作为考题或案例分析的楷模。我国许多破过大案奇案的警探们，也常满怀感情地回忆起一些侦探名著对自己的启迪和影响。甚至连一些著名科学家也是侦探惊险小说的爱好者，他们认为小说中的逻辑推理对他们的科学思维颇有启发。

文学作品和读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强行使人读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作品；有了各个层次的作品，读者便可择善而读之。在文学作品的层次中，严肃文学是高档的，而通俗文学则比较普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两者不能偏废，应有一些档次较高的通俗文学。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迪伦马特、西姆农等也曾出过侦探惊险小说。一贯在冷战时以写间谍小说闻名于世的约翰·勒·卡雷也由通俗小说家升格为档次较高的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复仅为读者消闲之用，已成为对人民进行保密教育的有益读物了。最近我们政府号召人民加强保密措施，是有现实意义的。有意的泄密干犯了国法，无意的泄密则将成为个人永世的良心谴责，于国家民族或个人都不是一件可以忽视的事情。

群众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出版了大批中外侦探惊险小说，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现在他们决定出版一套《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准备从侦探小说之祖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始，陆续出版世界著名作家的侦探惊险小说名著，以飨读者。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为繁荣文学事业，活跃中国读书界的用心是真诚的。希望这套文库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爰为序。

1996.10.16.于七重天

##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

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方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蓝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蔼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玻璃窗的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像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尔里希·施密特，伯尔尼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遇见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回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顶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他这才觉得舒服些。

警察又走回到朝着特万镇的那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把死人推到前座另外那只位子上，小心地扶正，用一根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把没有生气的躯体固定住，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前。

马达缺油不转了，但是克莱宁毫不费力就沿着陡直的马路滑入特万镇，开到了“大熊”旅馆前面。他在那里加了汽油，没有让任何人认出那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身体是个死人。克莱宁最讨厌骚乱，只要他认为有理由，他总是保持沉默。

然而他沿着湖边驶向比尔的时候，雾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见太阳。早晨像世界末日一样阴暗。克莱宁汇入了一条汽车形成的长链，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汽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地爬行着，即使是雾天，也用不着这么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像一支送葬的车队。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偶尔路面略有不平，就像一个智慧的中国长者似的频频点头，因此克莱宁始终不敢尝试超车。他们到达比尔已经非常晚了。

关于此案主要情况的调查结果尚未从比尔方面宣布时，伯尔尼的贝尔拉赫探长已经获悉了不幸的消息，他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期在外国生活，先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以刑事学家闻名于世。最后担任了美因河上法兰克福警察局的局长，可是1933年他回到了祖国。他回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热爱他经常称之为自己黄金故乡的伯尔尼，而是因为他赏给了当时德国新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当时法兰

---

伯尔尼，瑞士首都。——译注

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组织了以他为首的新政府，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德国占统治地位。——译注

克福对这次暴行议论纷纷。在伯尔尼，人们的评价随着欧洲政治情况而变化，开始是极为愤怒，然后说应该谴责，但是可以理解，最后说法完全变了，认为这是一个瑞士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这已是 1945 年的事。

贝尔拉赫关于施密特案件所作的第一个指示是：调查工作在最初阶段务必严守秘密——这一指示是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作出的。他表示：“人们知道得太少，报纸却宣扬得太多，两千年来的情况都是如此。”

贝尔拉赫显然对保密期望过高，他的“头头”路西乌斯·路兹博士和他的意见相反。路兹在大学里念的也是刑事学。这位官员由于脾气好，在伯尔尼社交界被称为巴塞尔大叔。路兹刚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的警察局返回伯尔尼，表示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工作处于如此原始的状况”感到震惊，这是他和警察局长弗莱贝格尔坐同一辆电车回家的路上公开说的。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电话后，动身去班蒂格街舒勒家，施密特就住在他们家。贝尔拉赫往下走进老市区，越过纳迪克桥；他习惯于步行，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伯尔尼对于“电车和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城市。

贝尔拉赫吃力地攀登着螺旋形上升的石阶，因为他已年逾六十，在这种时刻，他特别感到这一点；但他总算很快来到舒勒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舒勒太太本人来开门，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模样雅致的妇女，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显然认识他。

“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走了，”贝尔拉赫说，“走得非常突然，他让我给他寄一些东西去。请您带我到他房间去一下，舒勒太太。”

她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一幅装在沉重金色画框里的画像。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画的是死岛。

“施密特先生现在到了哪儿？”胖太太问，边说边打开房门。

“在国外，”贝尔拉赫回答，抬头看看天花板。

房子坐落在一片平地上，透过花园门人们可以看见一座小园林，里面耸立着棕色的古老枞树，这些树大概有毛病，因为针叶厚厚地铺了一地。这个房间肯定是整座房子里最美丽的一间。

贝尔拉赫走向书桌，又重新环视四周，躺椅上撂着死者的一条领带。

“施密特先生不见得去热带了吧，贝尔拉赫先生？”舒勒太太好奇地问。贝尔拉赫略感不安，说道：“不，他没有去热带，是到纬度更高的地方去了。”

舒勒太太眼睛睁得滚圆，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说：“我的上帝，是去喜马拉雅山了吧？”“差不多，”贝尔拉赫回答，“你猜得差不多。”

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书夹，立即把它夹在腋下。

“您找到需要寄给施密特先生的东西了吗？”

“我已经拿了。”

他又一次环视四周，就是避免再看那条领带。

“他是我们有房客以来最好的一个，从来没有和女人闹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出别的事，”舒勒太太保证道。

贝尔拉赫走到门口时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派人或者我自己再来。施密特还在这里留下了重要文件，我们也许还有用处。”

“我会收到施密特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吗？”舒勒太太殷切地问，

“我的儿子在集邮。”

但是贝尔拉赫皱起眉头，沉思地凝视着舒勒太太，抱歉地回答：“恐怕不会，这类业务出差的人通常不寄明信片。这是不允许的。”

舒勒太太又一次把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绝望地说：“警察局连这个也禁止。”

贝尔拉赫走了，离开这座房子使他感到高兴。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反往常的习惯，没有在施密特的办公室，而是在“剧场”餐厅用午餐，一边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从施密特住所拿来的文书夹。将近两点钟时，他在短暂散步后迈上联邦大楼台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等待施密特遗体从比尔运到的消息。他放弃了再见一见他从前的下级的想法，因为他不喜欢看死人，认为还是让死人安宁为好。连路兹他也不想去见，但是他必须配合路兹的工作。他不再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小心地把它锁进办公桌抽屉，然后点上一支香烟，向路兹的办公室走去，心里明白自己抽烟的自由将如历来一样触怒对方。几年前，路兹曾有一次敢于提出意见，但是贝尔拉赫立即作了一个轻蔑的手势说，他在土耳其服务的那十年中，就经常在君士坦丁堡他上司的办公室抽烟；这事实当然很有分量，但是谁能加以证实呢。

路兹博士接待贝尔拉赫时神经质得厉害，因为他认为事情毫无眉目，他向贝尔拉赫指指办公桌旁那张舒适的安乐椅。

“比尔还没有消息来吗？”贝尔拉赫问。

“还没有。”路兹回答。

“真奇怪，”贝尔拉赫说，“他们工作起来一向像发疯一样。”

贝尔拉赫坐下来，向挂在墙上一幅特拉夫勒的画瞥了一眼，这是一幅彩色钢笔画，画上，在一面巨大的、飘扬着的旗帜下，一队队士兵不是自左方开向右方，就是从右方开向左方，有的队伍有军官，有的队伍没有军官。

路兹开口道：“我们又一次亲眼目睹越来越新、越来越高明的恐怖手段了，这个国家的刑事侦查学水平实在低。上帝知道，我在我们地区见识也不算少，但是这种经历，像在这里看到的如此公然杀害一个警察局少尉，把乡村警察局的能耐贬得这样一钱不值，使我至今仍然感到震惊。”

“请您平静一下，路兹博士，”贝尔拉赫回答，“我们的乡村警察局肯定能和芝加哥的警察局同样高明地完成任务，我们也会把谋杀施密特的凶手找出来的。”

“您已有了嫌疑对象了吗，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久久地凝视着路兹，终于说道，“是的，我是在怀疑某一个人，路兹博士。”

“是谁？”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

“好吧，这很有趣，”路兹说，“我知道，贝尔拉赫探长，您总是打算为美化现代刑事侦查学的重大成就而采取错误的措施。请您不要忘记，时代在前进，即使在那些第一流的刑事学家面前也不会停留。我在纽约和芝加哥所看到的犯罪行为，那是您在我们亲爱的伯尔尼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但是现在连警察局的少尉也居然遭到谋杀，这是一个确实的标志，说明连世人公认为安全的大厦也开始崩溃了，也说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

“确实如此，他正是这样做的，”贝尔拉赫回答。

“那很好，”路兹表示同意，一面咳嗽起来。

墙上一只钟嘀嗒地走着。

贝尔拉赫用左手小心地压住胃部，右手把香烟揷入路兹放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他说自己很久以来就不很健康，至少医生老对他拉长了脸。他常常

犯胃病，因此请路兹博士为施密特被杀案派一个助手，能够负担大部分事务工作。贝尔拉赫自己则尽可能不离开办公桌。路兹表示同意。“您想让谁担任助手呢？”他问。

“钱茨，”贝尔拉赫说，“他还在伯尔尼高地度假，不过可以把他叫回来。”

路兹回答：“我同意他当助手。钱茨总是努力把侦查工作推向高峰。”

然后他转身背对着贝尔拉赫，瞧着窗外挤满了孩子的孤儿院广场。

突然，一阵不可遏制的欲望向他袭来，他想同贝尔拉赫探讨一下现代刑事学。他转过身子，但是贝尔拉赫已经走了。

已经是下午将近五点钟，贝尔拉赫仍然决定，立即到特万的出事地点去一次。他带了布拉特尔一起去。布拉特尔是一个高大、肥胖的警察，沉默寡言，贝尔拉赫就喜欢他这一点，而且布拉特尔还会开汽车。克莱宁在特万接待他们，一脸倔强的神气，等待着一场责备。但是老人却很温和，握着克莱宁的手说，他很高兴认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克莱宁为这句评语感到自豪，虽然他并没有确切弄明白老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带领贝尔拉赫沿着街道走向特森贝格的出事地点。布拉特尔跟随在后面，一边喃喃抱怨他们为什么步行前去。

贝尔拉赫很惊讶这个地方居然叫拉姆波因。

克莱宁解释道：“德语名字叫拉姆林根。”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这个名字好听得多了。”

他们来到出事地点，马路的右边对着特万，旁边有一堵围墙。

“车子停在哪儿，克莱宁？”

“这里，”警察指着马路中央回答说，“几乎就在街心，”贝尔拉赫却不往那边看。“也许我还是让载着死人的车一直停在这里好一些。”

“为什么？”贝尔拉赫回答，抬头仰望着朱拉山岩。“应该尽快把死人运走，从死人那里反正问不出什么来的。您把施密特运到比尔去很对嘛。”

贝尔拉赫走到马路边，朝着特万方向往下眺望，从他跟前到古老的村庄之间满目是一片片的葡萄园。太阳已经下山了。弯弯曲曲的街道像一条长蛇蜿蜒在房屋之间，车站上停着一长列货车。

“下面的居民什么也没有听见吗，克莱宁？”他问，“离小镇这么近，人们应该听得见每一声枪响。”

“人们除了夜里汽车驶过的马达声外，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人们也从来没有往坏的方面去想呀。”

“当然，当然，这也是常理。”

他又眺望葡萄园，“今年的酒酿得怎么样，克莱宁？”

“很好。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尝尝。”

“说实话，我现在正乐意去喝一杯新酒呢。”

他的右脚这时踢着一样硬东西。他弯下身子，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把它捡了起来。克莱宁和布拉特尔好奇地看着这件一头已经压扁的长形的小金属品。

“一颗手枪子弹，”布拉特尔说。

“您拿它还有什么用呢，探长先生？”克莱宁惊讶地问。

“这只是碰巧捡的罢了，”贝尔拉赫说，他们往下走向特万镇。

贝尔拉赫显然喝不惯新特万酒，因为第二天清晨他宣称，他呕吐了整整一夜。

路兹在楼梯上碰见了探长，真诚地关心他的状况，建议他去看看医生。“行了，行了，”贝尔拉赫嘟哝说，认为要他去看医生还不如让他去研究现代刑事学。

回到办公室后他感觉好过一些。他坐到办公桌前，取出锁在抽屉里的死者的文书夹。

上午十点，当钱茨向他报到时，贝尔拉赫还在专心研究文书夹的内容。钱茨是前一天深夜从休假地赶回来的。

贝尔拉赫吃了一惊，因为乍一看他还以为这个正向他走来的人是死去的施密特。钱茨穿着和施密特那件一式一样的大衣，戴一顶类似的毡帽。就是面孔完全两样；这是一张善良的圆脸。

“您来了很好，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们必须谈一谈施密特案件。您以后要接替他的主要工作，我身体不大健康。”

“是的，”钱茨回答，“我已经知道了。”

钱茨把椅子拖近贝尔拉赫的办公桌，坐了下来，把右臂搁在桌子上。办公桌上摊放着施密特的文书夹。

贝尔拉赫倚靠在软椅背上。“现在和您谈谈吧，”他开始说，“我从君士坦丁堡到伯尔尼，见过上千个警察人员，好坏都有。他们许多人并不比那些充斥着各种监狱的可怜的浪荡子好多少，这些人只不过偶然越出了法律的轨道。但对施密特我不允许别人指摘，他是最有才能的。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高明。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需要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该说什么，不到必要说话的时候，他也懂得保持沉默。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钱茨，他是超过我们大家的。”

钱茨慢慢地把脸转向贝尔拉赫，原先他一直望着窗外。然后说：“这很有可能。”

贝尔拉赫观察到他并不确信这一点。

“对于他的死亡我们知道得很少，”探长接着说，“一颗子弹，这就是一切，”于是他把在特万找到的那颗子弹放在桌子上。钱茨拿起它，凝视着。

“这是一颗军用手枪的子弹，”他说，把子弹放回原处。

贝尔拉赫合起书桌上的文书夹，“首先我们不知道施密特为什么到特万或者拉姆林根去。他在比尔湖没有工作任务，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们对他的旅行去那里的动机缺乏任何了解。”

钱茨听着贝尔拉赫讲话，侧过身去，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他提醒说：“我们只知道施密特是怎样被杀的。”

“这件事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沉默了片刻后，老人不无惊讶地问道。

“施密特汽车的方向盘在左边，而您在左面的路边上找到了子弹，从车的方向看出子弹是从车中射出来的；特万的居民半夜听到过汽车马达的声音。施密特正从拉姆波因村往下向特万镇驶行，杀人犯截住了他，显然他认识杀人犯，否则不会停车的。施密特打开右边的车门，接纳凶手，然后重新坐回驾驶座。就在这一刹那，他被枪杀了。施密特肯定没有料到那个人想杀死他。”

贝尔拉赫对此考虑了片刻，然后说：“我现在还想抽一支烟，”点火的时候，他表示：“您分析得对，钱茨，在施密特和他的谋杀者之间肯定发生过类似情况，我愿意相信您。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施密特驶行在特万到拉姆林根的路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钱茨提出施密特在大衣里穿着一套夜礼服。

“我完全不知道，”贝尔拉赫说。

“噢，您没有看见死人？”

“没有，我不喜欢看死人。”

“但是这在调查报告里也有记载。”

“我也不大喜欢看调查报告。”

钱茨缄默了。可是贝尔拉赫却继续说下去。“这样案件就更复杂了。施密特去特万峡谷为什么要穿夜礼服呢？”

“这也许反而可以使案件更简单一些呢，”钱茨回答说。“拉姆波因一带的居民中肯定不会有几个人有条件举办人们得穿燕尾服参加的社交活动。”

他掏出一本小小的袖珍日历，说明这是施密特的日历本。

“我认识它，”贝尔拉赫点头表示同意，“里面没有记载任何重要的东西。”

钱茨反驳：“施密特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2日上面注了一个G字。根据法医鉴定，他就是在这天午夜前不久被杀害的。另外一个G字注在10月26日，也是星期三，而更前一个是在星期二，10月18日。”

“什么都可能用G来代表，”贝尔拉赫说，“一个妇女的名字或者其它任何东西。”

“不大可能是女人名字，”钱茨反驳说，“施密特的女朋友叫安娜，和施密特已经订过婚了。”

“对此我也一无所知，”贝尔拉赫承认；他看到钱茨对他的不明情况表示惊讶，便接着说：“我仅仅对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感兴趣，钱茨。”

钱茨有礼貌地回答：“当然，”同时摇摇头，笑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极其严肃地说：“我是一只巨大的老黑猫，它喜欢抓老鼠。”

钱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才好，最后解释道：“在作了G字记号的那一天，施密特每次都穿上燕尾服驾驶他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出门。”

“这些您又是从哪儿知道的？”

“舒勒太太说的。”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回答，又沉默了。但是随即肯定道：“是的，这是事实。”

钱茨仔细观察着探长的脸，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后，犹豫地说：“路兹博士先生告诉我，您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嫌疑犯。”

“是的，我有了，钱茨。”

“我现在已是您办理施密特谋杀案的助手，您若是告诉我，您的怀疑针对谁，也许更好一些，贝尔拉赫探长。”

“您瞧您，”贝尔拉赫缓缓答复着，像钱茨一样句斟字酌，“我的怀疑并非一种合乎侦查科学定义的怀疑。我没有根据判定一个人。您已经看到，我知道得多么少。我有一种考虑，对哪一个具体人要作为罪犯来进行观察；

但是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先提供他当时在场的证据。”

“您这是什么意思，探长？”钱茨问。

贝尔拉赫笑了：“眼下我必须等待，直到可以下令逮捕他的凭证出现。”

“既然我和您共同工作，我有必要知道，我必须侦查谁，”钱茨谦逊地解释说。

“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客观。它适用于我，因为我心目中已有一个嫌疑犯，也适用于您，因为您将把这个案件放在侦查工作的首位。我的怀疑能否证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期待您的侦查。您可以判定施密特的谋杀者，不必顾虑我的怀疑。若是我所怀疑的人就是杀人犯，您自己就会向他进攻，当然会用一种不同于我的完全无可指摘的、科学的方法；如果他不是杀人犯，您也会找出真正的犯人，那么也没有必要把我怀疑错了的人讲出来。”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探长问道，“您同意我们的工作方法吗？”

钱茨在答复前犹豫了一刹那：“好的，我同意。”

“您现在打算怎么干呢，钱茨？”

被问者踱向窗口：“施密特在今天这个日子上也作了记号。我想去拉姆波因看看能否发现什么。我打算七点钟动身，这正是施密特往常驾车去特森贝格的时间。”

他转过身躯，有礼貌地问，却有点像开玩笑：“您一起去吗，探长？”

“是的，我一起去。”答复是出人意料的。

“好的，”钱茨说，感到惶惑，因为这样的答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七点正。”

在门边他又回过头来问道：“您去过舒勒太太家，贝尔拉赫探长。您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吗？”老人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首先将文书夹锁进办公桌抽屉，然后把钥匙放回衣兜里。

“没有，钱茨，”他最后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您现在可以走了。”

## 四

七点钟钱茨动身去阿尔顿堡贝尔拉赫的寓所，这位探长从1933年起就一直住在阿尔河畔这幢房子里。天下着雨，警察汽车飞快驶上璠特克桥的拱顶向下滑行，但是钱茨立即又重新加速。到阿尔顿堡街后他减慢车速，因为他还从未去过贝尔拉赫家，透过湿淋淋的玻璃，他艰难地辨认着门牌号码。他再三鸣喇叭，但屋子里没有人出来。钱茨离开汽车淋着雨跑步到门前。黑暗中摸不着门铃，他迟疑片刻后推门而入。门没有锁，钱茨步入前厅。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扇半开的门，门内透出了灯光。他走向前去敲门，可是没有回答，于是他便把门完全推开。他环视这间客厅。靠墙全部是书，躺椅上睡着贝尔拉赫。探长正在沉睡，但是显然已作好去比尔湖滨的准备，因为他穿上了冬季大衣。老人的一只手上捏着一本书。钱茨听着他平静的呼吸声，感到狼狽了。沉睡的老人和大量书籍使他觉得有点怪。他小心地环视四周。这个房间没有窗，而每一堵墙都有一扇门，它必然可以通向另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是一张庞大的书桌。钱茨望过去时吓了一跳，因为书桌上躺着一条巨大的金属蛇。

“它是我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从躺椅上传来平静的声音，贝尔拉赫正欠身坐起。“您瞧，钱茨，我已经穿上了大衣。我们可以走了。”

“请您原谅，”被招呼的人说，心中尚有余悸，“您睡着了，没有听见我来。我在大门上没有找到门铃。”

“我没有装门铃。我不需要它，大门从来不上锁。”

“连您出门的时候？”

“连我出门的时候。每天回家就得看看有没有人来偷去什么东西，总是很紧张。”

钱茨笑了，拿起那条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蛇。

“有一次，我差点被它杀死，”探长略带嘲讽地叙述道，这时钱茨才发现，蛇头是柄，而蛇身则是一把锋利的刀。他惊愕地观察着这把可怕武器上闪烁着的奇异装潢。贝尔拉赫站在他身边。

“要像蛇一样聪明，”他说，沉思地久久凝视着钱茨，然后笑着说，“又要像鸽子一样温和，”他轻轻地拍拍钱茨的肩膀。“我方才睡着了。多少天来这是头一回。这该死的胃。”

“胃病很严重吗？”钱茨问。

“是的，很严重，”探长冷淡地回答。

“您应当待在家里，贝尔拉赫先生，天气很冷，又下着雨。”

贝尔拉赫又凝视着钱茨，笑笑说：“胡说，要紧的是把杀人犯找出来。我留在家对您才没有什么好处呢。”

当他们坐在汽车里驶过璠特克桥时，贝尔拉赫问，“您为什么不经阿尔高斯达顿去苏里考芬，这比穿越市区要近些？”

“因为我不想由苏里考芬—比尔这条路线去特万，而想走凯采尔—艾尔拉赫这条路线。”

“这是一条不平常的路线，钱茨。”

“完全没有什么不平常呀，探长。”

他们又沉默了。城市的灯光在他们旁边一闪而过。

当他们到达贝特来汉时，钱茨问，“您和施密特一起驾车出去过吗？”

“是的，常常一起去。他开车很谨慎。”贝尔拉赫若有所思地看看速度计，它几乎已指到一百一十了。

钱茨稍稍减慢速度。“我和施密特驾车出去过一次，慢得要死，我记得他给他的汽车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他要给汽车加油的时候，就这么叫它。您可记得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忘了。”

“他叫它蓝色的凯龙，”贝尔拉赫回答。

“凯龙是希腊神话中一个人名，是不是？”

“凯龙专门运送死人进地狱，钱茨。”

“施密特的父母很有钱，他有条件研究文学。而我们当中别的人却没有条件。他早就知道凯龙是什么人了，而我们不知道。”

贝尔拉赫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又重新看着速度计。“是的，钱茨，”他说，“施密特很有教养，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当学者是大有前途的，尽管如此，我希望车速不要超过一百。”

到古曼纳后不远有一个加油站，汽车猝然停住了。一个男人走过来，要替他们服务。

“警察局的，”钱茨说，“我们要打听一件事。”

他们模糊地看到一张好奇的、有点吃惊的脸，正俯向车子。

“两天前有没有人在您这里停留？那人把他的汽车唤作蓝色的凯龙。”

那个男人惊讶地摇摇头，钱茨又继续开动汽车。“我们再到下一个站去问问。”

凯采尔加油站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贝尔拉赫喃喃抱怨道：“您干这些毫无意义。”

在艾尔拉赫钱茨走了运。那个男人告诉他，星期一晚上是有这么一个人来过。

“您瞧，”当他们的车从兰德隆弯向诺思堡—比尔的公路时，钱茨提出他的看法，说道：“现在我们知道施密特星期一走的是凯采尔到英斯这条路了。”

“您有把握？”探长问。

“我已经向您提供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是的，证据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些对您有什么用处呢？”贝尔拉赫表示很想知道。

答复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后会对我们有用的。”

“这回又是您正确，”老人说，眼睛瞅着比尔湖。雨已经停止。在璠维莱，从浓雾的裂隙中露出了比尔湖。他们驶入了里格尔兹。钱茨放慢速度，找寻通往拉姆波因的支路。

现在汽车爬上了葡萄园山。贝尔拉赫打开车窗俯瞰下面的湖泊。在彼得岛上空有几颗星星。水面上倒映着灯光，湖边停泊着一只汽艇。贝尔拉赫想，又是一年深秋时节了。在他们前面深处躺着特万，后面则是里格茨。

他们绕了一个弯，在黑夜中模糊看到他们正朝一片森林驶去。钱茨觉得没有把握，也许这条路只通往谢纳尔茨呢。当他们看见一个男人迎面走来时，他停了车。

“去拉姆波因是走这条路吗？”

“一直往前走，到了森林边缘那排白房子就向右拐进森林里去，”那个

全身藏在一件皮大衣里的男人一边回答，一边吹口哨叫唤他的小狗，那条黑脑袋的白狗正在汽车灯的光柱里跳跃。

“过来呀，平平！”

他们离开葡萄园山，不久进入了森林。一排排枞树扑面而来，灯光里只见没有尽头的树干。路很狭窄，坎坷不平，时时有树枝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车窗。他们右边是陡峭的斜坡。钱茨越开越慢，因为他们听到了下面深处潺潺的流水声。

“这是特万河谷，”钱茨解释说，“另一边就是通往特万的公路。”

左边，悬崖矗入夜空，在灯光下反射出白光。除此之外，一切都在黑暗中，因为这天正好是新月之夜。道路不再上升，山泉在他们身边潺潺流动。他们向左边转弯，驶过一座桥梁。如今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条公路，正是从特万去拉姆波因的公路。钱茨停住车。

他熄了车前灯，他们置身在一片漆黑之中。

“现在要干什么？”贝尔拉赫提出疑问。

“现在我们要等待。差二十分八点钟。”

## 五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八点了，但是什么情况也没有，贝尔拉赫表示，现在可否请钱茨说明一下他的企图是什么。

“没有什么确切的打算，探长。我对施密特案件还不能看得那么远，您不是也仍然在黑暗中踏步吗？虽然您心目中有了一个嫌疑犯。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寄托在一种可能性上，今天晚上在那里，也就是施密特星期三到过的地方，有一次社交活动，也许还有别的人要去；因为一次要求参加者穿上燕尾服的社交活动，想必规模巨大。这当然仅仅是一种揣测，贝尔拉赫探长，但是为了寻找踪迹，揣测在我们这行职业中是常用的。”

关于施密特在特森贝格逗留的情况，比尔、璠恩斯塔特、特万和拉姆波因的警察局方面并没有提出任何线索，因此探长对自己下级的考虑投去近乎怀疑的一瞥。

施密特恰好成为一个杀人犯的牺牲品，这个杀人犯水平远远胜过比尔和璠恩斯塔特的警察局人员，钱茨这么答复探长的目光。

贝尔拉赫喃喃道：他怎么知道的呢？

“我没有怀疑任何人，”钱茨说，“但是我尊敬这个杀害了施密特的人，倘若在这儿可以用尊敬这两个字的话。”

贝尔拉赫不动声色地听着，稍稍耸了一下肩膀：“而您却要去抓这个您尊敬的人？”

“这正是我希望的，探长。”

他们重新陷于沉默，等待着；从特万方向的森林里射出了亮光。一道车前灯光把他们全身笼罩在耀眼的光芒之中。一辆大轿车擦过他们朝拉姆波因方向驶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钱茨发动马达，又开过来两辆汽车，巨大的、深色的大轿车里坐满了人。钱茨尾随着他们。

树林到了尽头。他们驶过一家饭馆，大门洞开，灯光照射着饭馆的招牌，最后一辆汽车的尾灯照亮了一排农民的住房。

他们来到了特森贝格的广阔平原上。天空洁净如洗，下沉的维加星座，上升的卡彼拉、阿德尔巴仑星座以及朱必特星座的光焰在天上熠熠闪亮。

道路向北拐，在他们面前，深黑的线条勾勒出斯皮茨贝格和夏塞勒山脉的轮廓，山脚下点缀着星星灯火，那就是拉姆波因村、迪塞村和璠特村。

他们前面的汽车往左拐弯驶入一条田间小路，钱茨煞住汽车。他摇下车窗，以便探出身子。他们模糊地辨认出田地外有一幢房子，周围都是白杨树，入口处灯火通明，汽车全都停在门口。人声从那边传来，然后人们全体进入了房子，四周一片寂静。入口处的灯光熄灭了。“他们不再等待什么人了。”钱茨说。

贝尔拉赫下车来呼吸一下夜间的冷空气。这使他觉得舒服。他看着钱茨驾车越出右面路边，车身几乎一半停在一片牧场上，通向拉姆波因的路实在太狭窄了。于是钱茨也下了汽车，朝老人走来。

他们穿过田间小路，向田野间一幢住宅走去，路很泥泞，坑坑洼洼全是积水，这里也下过雨。

他们走近一堵低矮的围墙，紧闭的大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锈迹斑斑的铁栏杆耸出墙头，他们的目光越过围墙向里面的房子张望。

花园里一片荒凉，那些大轿车像一些巨兽停在白杨树下；花园里没有一丝灯光，呈现出一派荒凉景象。

黑暗中他们好不容易才看出方格门的中央有一块牌子。牌子的一头显然松开了，它歪挂着。钱茨拿出从汽车里带来的手电筒一照：牌子上是一个大写的G字。

他们又重新站在黑暗中。

“您瞧，”钱茨说，“我的揣测是正确的。我不过是瞎猜，结果真碰对了。”然后他心满意足地要求道：“现在请给我一支烟，探长，我想抽一支。”

贝尔拉赫敬了他一支，说：“现在我们还应该知道，G说明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加斯特曼。”

“为什么？”

“我查过电话簿，在拉姆波因只有两个G字打头的电话。”

贝尔拉赫吃惊地笑了，接着问：“为什么不可能是另一个G呢？”

“不会的，那是宪兵队部。难道您相信，一个宪兵会卷进什么谋杀案中去吗？”

“一切都是可能的，钱茨，”老人回答。

钱茨划着了一根火柴，这时强烈的狂风正愤怒地摇撼着白杨树林，要点燃香烟确实费劲。

## 六

贝尔拉赫很惊奇，他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拉姆波因、迪塞和里格尼尔的警察局不来光顾这个加斯特曼，他的房子就坐落在开阔的田野上，从拉姆波因可以一览无余，在这里举行一次社交宴会而想保密绝对不可能的，应该说，由于是在一个这样小的朱拉山村举行，恰恰更加引人注意。

钱茨回答说，对此他还不能作出任何解释。

于是他们决定，绕房子环行一周。他们分开各自走一个方向。

钱茨已消失在黑暗之中，贝尔拉赫单独留下。他朝右边走。他翻起大衣领子，因为他冻僵了。他又重新感到胃部的重压，剧烈的刺痛使他的额头布满冷汗。他沿着矮墙走，墙和他走的方向一样往右拐弯。房子仍然处在绝顶昏暗之中。

他重新站住，把身子靠在墙上。他看到树林边缘拉姆波因村的灯光，又继续往前走。矮墙改变了方向，他也跟着往西走。住宅的后墙一片通明，二楼楼一排窗子里射出了明亮的灯光。他听到钢琴声，更走近些谛听时，他肯定有人在演奏巴赫的作品。

他继续往前走，根据他的估计，他即将遇见钱茨，他努力观察着被灯光铺满的田野，等他发现离他不多几步路站着一只巨兽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贝尔拉赫善于识别兽类，但是这么一只庞然大物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虽然他认不清它的全貌，只能看见一个侧影凸出在明亮的地面上，这只猛兽呈现出如此可怖的形象，以致贝尔拉赫都不能动弹了。他看到这只巨兽缓慢地、似乎是无意地转过脑袋瞪视着他。一对圆眼睛看上去像两块光亮而空白的平面。这一意外的遭遇，这只巨兽的威慑力，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使他变得疲软无力。他固然尚没有丧失冷静的理智，但是却忘了必须采取行动。他瞧着这只野兽虽然并不畏惧，但是却感到迷惑。犯罪行为始终诱惑着他，就像去破解一个新的大谜语似的始终吸引着他。

这条狗猛然跳起来，一片巨大的黑影向他扑来，这是一只强有力而杀气腾腾的凶猛怪物，他承受着那无意识的暴躁的野兽向他猛扑下来的压力，几乎来不及举起左臂保护自己的咽喉，老人不出一声，没有发出恐怖的叫喊，似乎一切在他看来是如此自然，完全合乎这一世界的自然规律。

在这只野兽还不曾撕碎他挡在喉咙前的左臂时，他听见一声枪响；扑向他的身体痉挛起来，温暖的血喷到他手上。狗死了。

这头巨兽沉重地躺在他身上，他伸出手去抚摸它那光滑而汗湿的毛皮，艰难地直起身子，哆嗦着抹去沾在身上的几茎湿草。钱茨走过来，离他很近时才把手枪重新装进大衣口袋。

“您受伤了吗，探长？”他问，怀疑地瞧着被撕破的左臂衣袖。

“完全没有。那野兽没能咬透。”

钱茨弯下身子，把野兽的脑袋转向灯光，死兽的眼睛反射出光芒。“是食肉兽的牙齿，”他战栗地说，“这野兽会把您撕碎的，探长。”

“您救了我的命，钱茨。”

钱茨却问道：“您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吗？”

贝尔拉赫用脚碰碰躺在他面前的一动不动的躯体。“很少带，钱茨，”他回答，他们又沉默了。

死狗躺在冰冷肮脏的土地上，他们俯视着它。他们脚下黝黑的一大片东

西正在蔓延开来：鲜血从这头猛兽的伤口汨汨流出，就像是黝黑的火山熔岩。

当他们重新抬头张望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幅完全改变了的景象。音乐中断了，灯光明亮的窗子已全部打开，穿夜礼服的人们向外探着身子。贝尔拉赫和钱茨互相瞪目而视，让他们好似站在戏台上当众表演，这使他们很不愉快，尤其因为这戏台设在上帝遗弃的汝拉山区，周围只有野兔和狐狸在互道晚安，探长恼火极了。

五扇窗户里最中间那扇窗前单独站着一个人，和其余人都分开着，那个人用一种特别而清晰的声音大声问道，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警察局的，”贝尔拉赫平静地回答，又补充说，他们必须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谈。

那个人回答道：他很惊讶，为了同加斯特曼先生说话，居然必须开枪打死一条狗；而且恰好是在他有兴趣、有机会欣赏巴赫的音乐的时候。说完他重新关上窗户，动作稳重，不慌不忙，仿佛他根本没有动怒，而毋宁认为这次谈话完全无足轻重。

从各扇窗口继续传出纷乱的人声。人们高声说着这一类的话，诸如：“真是闻所未闻！”“主任先生，您说什么！”“简直不像话！”“令人无法相信，警察局的人，议员先生！”然后人们都缩了回去，窗户一扇扇接着关上了，之后是一片安静。

这两个警察局的人除了退走别无他法。花园围墙正面入口处有人在等待他们。那是单独一个人，激动地在那儿来回走动。

“快照一照，”贝尔拉赫向钱茨耳语道，在手电筒闪光中的是一张肥胖而庞大的，虽然并非没有特点，却略为扁平的脸，这人穿着一套雅致的夜礼服。一只手上闪烁着一枚沉重的戒指。贝尔拉赫一声低语，灯光熄灭了。

“您是谁，真见鬼，先生？”胖子憎恶地问。

“贝尔拉赫探长，——您是加斯特曼先生吗？”

“国会议员冯·施文迪，先生，冯·施文迪上校，天杀的，你们在这里到处转悠开枪干什么？”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必须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谈，国会议员先生，”贝尔拉赫冷静地回答。

但是这位国会议员不愿平心静气地谈话。他雷鸣似地叫嚷：“嗨，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吧？”

贝尔拉赫决定用另一种称呼来称呼他，他小心地提醒说，上校先生搞错了，他绝不是为了汝拉山区问题来的。

贝尔拉赫还来不及继续往下讲，这位施文迪上校比国会议员施文迪火气更大。他一口咬定说，那么就是共产党啦，该死的，他作为上校不能允许人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在一旁开枪。他禁止任何一种反对西方文化的示威。瑞士军队就是要维持秩序！

---

汝拉山脉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山脉，施文迪叫嚷“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共产党”用以挖苦警察人员无事生非。——译注

汝拉山脉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山脉，施文迪叫嚷“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共产党”用以挖苦警察人员无事生非。——译注

汝拉山脉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山脉，施文迪叫嚷“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共产党”用以挖苦警察人员无事生非。——译注

由于这位议员显然丧失了理性，贝尔拉赫觉得有必要采取恰当的措施。

“钱茨，议员先生方才讲的话用不着写进调查报告里去，”他冷漠地命令说。

这一下打击使国会议员清醒了些。“写进什么调查报告里去，先生？”

贝尔拉赫解释道，他是伯尔尼警察局的探长，正在调查谋杀警察局施密特少尉这个案件。各种各样的人对于指定问题所作的答复，都必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这是他的责任，但是由于——他犹豫了片刻，现在该选择哪种称呼呢——上校先生显然错误估计了情况，他将不把国会议员的答复写进调查记录。

上校感到很狼狈。

“你们是警察局来的，”他说，“这就不一样了。”

人们应该原谅他，他接着往下说，今天中午他在土耳其大使馆参加午宴，下午他当选为上校联合会“瑞士英雄之家”的主席，接着又不得不在瑞士之家的保留餐桌上“干了一杯荣誉酒”，此外，他上午还参加了他所属的那个党派的特别会议，而现在又来到加斯特曼的宴会上，在欣赏一个也可算是举世闻名的钢琴家的演出，他简直快要累死了。

是否就不能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话了呢，贝尔拉赫又一次问道。

“你们究竟想从加斯特曼那里打听什么呢？”冯·施文迪问，“他同被害的警察局少尉有什么相干？”

“施密特上星期三在他家作客，归途中经过特万时被人谋杀了。”

“我们真是惹了一身骚，”国会议员说，“加斯特曼什么人都邀请，于是就出了这种倒霉事。”

接着他沉默了，似乎在考虑什么。

“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最后说，“为什么你们单单挑中这个晚上来？你们至少应该先通个电话。”

贝尔拉赫解释说，他们刚刚才发现事情和加斯特曼有关。

上校仍然感到不满足。

“那么这狗是怎么回事呢？”

“它来咬我，钱茨不得不开枪。”

“那就对头了，”冯·施文迪并非毫不友好地说，“加斯特曼现在真的不能见你们；即使是警察局有时也同样必须尊重社交界的习惯。我明天上午到您的办公室去，今天一定尽快同加斯特曼谈一谈。你们也许带着施密特的照片吧？”

贝尔拉赫从自己的皮夹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谢谢，”国会议员说。然后点点头，走进了屋子。

现在贝尔拉赫和钱茨又孤零零地站在花园门口的铁栏杆前；整座房子又和方才一样了。

“对一个国会议员，你有什么办法呢？”贝尔拉赫说，“倘若他兼为上校和律师，那更是集三个魔鬼于一身。我们连同我们美妙的谋杀案只能就此止步，没什么可干的啦。”

钱茨沉默着，似乎在沉思。最后他说：“现在是九点钟，探长。我认为现在最好到拉姆波因的警察那里去，同他谈谈这个加斯特曼的情况。”

“很好，”贝尔拉赫回答，“您可以去，请您设法弄清楚为什么拉姆波因村的人对于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自己到峡谷口的那家

小旅馆去。我要稍稍治一治我的胃。我在那边等您。”

他们走回那条田间小路，来到汽车旁。钱茨继续驾驶，几分钟就到了拉姆波因。

他在小饭店里找到了警察，这人正和特万来的克莱宁坐在一张桌前，旁边是一群农民，他们显然正在进行一场谈判。拉姆波因的警察是小个儿，胖胖的，一头红发。他叫让·彼尔·夏乃尔。

钱茨坐到他们中间，两个人对来自伯尔尼的同事心怀疑的猜疑很快就消失了。只有夏乃尔看上去有点不乐意，因为他现在不能讲法语而必须讲德语了，这种语言他不能运用自如。他们喝白酒，钱茨吃面包和干酪，他当然缄口不谈他刚从加斯特曼家来，却只追问，他们是否仍然没有线索。

“Non(法语：没有)，”夏乃尔说，“没有暗杀者的线索。On a rien trouvé(法语：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继续讲道，这一带只有一个人可加考虑，住在罗里尔斯别墅的加斯特曼先生，他买了那幢房子，经常高朋满座，星期三也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但是施密特没有到过那边，加斯特曼对他毫无所知，一次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施密特 n'était pas chez(法语：不在)加斯特曼家，impossible(法语：不可能)，完全和绝对的不可能。”

钱茨听着这些支离破碎的话，说自己还想查询一下其他也在那天参加加斯特曼家宴会的人的情况。

克莱宁插嘴道，有这么一个人的，从里格尔兹过去，在谢纳尔茨住着一位作家，他很熟识加斯特曼，经常同他在一起，星期三他也在场。作家也一点儿不知道施密特的事，也从未听说这个名字，并且不信，竟然曾有一个警察在加斯特曼家。

“怎么，一个作家？”钱茨说，皱起眉头。“我必须把这样的人物好好想一想。作家常常很可疑，但是我还是要接触这类高等文化人——这个加斯特曼究竟是什么人，夏乃尔？”他继续追问。

“Un monsieur très riche(法语：一位很富有的先生)，”拉姆波因的警察兴奋地回答，“广有钱财而且 très noble(法语：十分高贵)。他给我的 fiancée(法语：未婚妻)很多赏钱”——他自豪地点点那个女厨师——“comme un roi(法语：像一个国王)，但是并不怀有从她那里得点什么的目的。从来不。”

“他的职业是什么？”

“搞哲学的。”

“您对此有何看法，夏乃尔？”

“这是一种想得很多，却什么都不干的人。”

“他必须去挣钱吧？”

夏乃尔摇摇头。“他不必挣钱，他有钱。他替整个拉姆波因村纳税。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加斯特曼先生是全区最有同情心的人。”

“虽然如此，”钱茨果断地说，“我们仍有必要再去彻底调查这个加斯特曼。我明天上午去他那里。”

“但是请小心他的狗，”夏乃尔警告说。“Un chien très dangereux(法语：一只很危险的狗)。”

钱茨站起来，拍拍拉姆波因村警察的肩膀。“噢，我会对付它的。”

## 七

钱茨离开克莱宁和夏乃尔，驶往峡谷口的旅馆去见贝尔拉赫时，已经是十点钟。他在那条田间小路通向加斯特曼住宅的拐弯处停了一次车。他走下汽车，慢慢走向花园门，然后沿着围墙绕行一圈。整幢房子还像方才那样黑魆魆而孤单地处在被狂风吹弯了腰的巨大白杨树环抱之中。那些大轿车还停在花园里。钱茨现在不再绕着屋子走，而只站在一个角落里，从那里可以纵览明亮的后院。淡黄玻璃窗后人影时隐时现，钱茨为了不被人发现，把身子紧贴在墙上。他瞧着田野。那条狗不躺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了，已经有人把它搬走，只有血迹还在窗口射出的灯光下闪现一片黑迹。钱茨走向汽车。

峡谷中的旅馆里已经没有贝尔拉赫。他早在半小时之前就离开旅馆，他喝过一杯酒后，就去了特万。他在旅馆里逗留了不到五分钟。女店主这么报告钱茨说。

钱茨思索着老人究竟去了哪里，但是他不能思考太长时间；路太窄，要求他集中全部注意力。他驶过桥梁，他们曾在这里等候，然后驶向下面的森林。

一次特殊而又阴暗的经历袭向钱茨的脑海。他加快速度，突然看到湖泊深处有亮光，白色山岩间一种夜光。他一定是到了出事地点。从岩壁上走出一个黑色的人影，作出明确的手势要汽车停下。

钱茨不自觉地停了车，打开右边的车门，虽然他紧接着立即后悔了，因为一种想法掠过他的脑子：他现在所遭遇的，不正是施密特在被暗杀前几分钟所遭遇的吗？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握紧手枪，冰凉的枪身使他平静下来。人影走近了。他认出来人是贝尔拉赫，但仍然不能消除他的紧张，却由于隐秘的惊吓而脸色苍白，自己也不能对恐怖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贝尔拉赫弯下身子，他们互相对瞧着对方的脸，仅仅只是几秒钟的事，却似乎有一个钟点之久。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的眼睛像石头一般毫无表情。终于贝尔拉赫坐到他身旁，他的手才松开那隐藏着的武器。

“你继续开车吧，钱茨，”贝尔拉赫说，声音很平静。

另一个人震颤了一下，因为老人改用了你来称呼，此后探长就始终这么称呼他。

直至到达比尔之后，贝尔拉赫才打破沉默，询问钱茨在拉姆波因打听到什么，“我们最后不得不用法语来称呼这个小地方了。”

关于夏乃尔以及克莱宁为了施密特被杀案想去访问加斯特曼都没有成功这个消息，钱茨没有说；而关于克莱宁述及的那个住在谢纳尔茨的作家，钱茨想，他以后自己和这个人谈话。

由于他们恢复了谈话，钱茨如释重负，作了比任何时候都生动的汇报，因为他想把自己那种特殊的激动压下去，到达舒普芬前两人又沉默了。

刚过十一点钟他们来到阿尔顿堡贝尔拉赫家门前，探长走下汽车。

“我再一次谢谢你，钱茨，”他说，和钱茨握手告别。“这么说也许让你难堪，但是你真的救了我的命。”

他仍然站立了一忽儿，看着迅速开走的汽车尾灯逐渐消逝的光芒。“现在他能随心所欲地行驶了！”

他跨进他那不上锁的房子，在布满书籍的客厅里，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取出一件武器，小心地放在书桌上那把蛇刀旁边。这是一把巨大的、沉重的

手枪。

然后他慢慢脱掉自己的冬大衣。大衣脱下后，只见他的左臂上厚厚地缠绕着布条，似乎他是习惯于训练狗的扑抓的。

第二天早晨，老探长根据一定的经验期待着若干不愉快，他是这么称呼自己和路兹的摩擦的。“只知道过星期六，”当他步行过阿尔顿堡桥时心里思量着，“官僚们嘻嘻哈哈完全昧了良心，他们整星期不作一点聪明事。”贝尔拉赫穿着一身黑，因为十点钟将举行施密特的葬礼。他不能逃避它，就是这件事激怒了他。

冯·施文迪刚过八点钟就来访，不过没去见贝尔拉赫，而是到了路兹这里，钱茨刚刚向他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情况。

冯·施文迪和路兹属于一个党派，是独立的、保守的自由社会主义党，由于积极活动，由于共同进餐，再加上并肩参加理事会议，他们彼此已经以“你”相称，虽然路兹没有选进议会；因而冯·施文迪在伯尔尼警察局声称，一个名唤路西乌斯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作这类蠢事。

“真是无奇不有，”他那肥胖的身材还没有出现在门口，便能听见他的声音，“你的伯尔尼警察局的人，干的是啥啊，尊敬的路兹？开枪射杀我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的狗，一条罕见的南美种狗，还打断了文艺演出，阿纳托尔·克劳斯哈尔—拉法艾里是世界闻名的钢琴家。瑞士人毫无教养，没有世界观念，丝毫没有欧洲思想的痕迹。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去当三年新兵，受教育。”

路兹一看到他的党内同伴出现就脸色苍白，害怕他的无止境的长篇大论，他请冯·施文迪坐下。

“我们目前正陷在一件最最困难的侦查案件里，”他故作惊人地说道，“这些你全明白，这个案件是那个青年警察的主要任务，用瑞士尺度来衡量他是极有才能的。那个老探长，他也参与此案，则是一块锈铁，这是我的看法。我很可惜那条罕见的南美种狗的死，我也养狗，也爱狗，我也会对它们进行特殊的、严格的训练。恰恰是人类对于犯罪完全缺乏想象力。我方才想到芝加哥，我看我们的情况简直是可怜。”

他中断了片刻，吃了一惊，因为冯·施文迪目不转睛沉默地凝视着他。然后他接下去讲，但是口气完全犹豫不定了，他想知道，被杀的施密特是否星期三曾在冯·施文迪的当事人加斯特曼家作客，正如警察局根据一定的理由所断定的那样。

“亲爱的路兹，”上校回答说，“我们两人之间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警察局的人对此完全一清二楚；难道自己会不知道自己干的啥么？”

“您这是什么意思，国会议员先生？”路兹慌乱地问，不自觉地又用您字称呼；因为他从来没有习惯用你字称呼。

冯·施文迪往后一靠，两手对握放在胸前，露出了牙齿，摆出一副姿态，是一位上校兼国会议员这种地位的人所具的姿态。“博士先生，”他说，“现在我倒真正想弄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把施密特派遣到我们勇敢的加斯特曼身边来。在汝拉山区那边发生的事，和警察局毫不相干，我们早就没有盖世太保了。”

路兹好像从云端掉了下来。“我们怎么把施密特派遣到你们那位当事人身边啦？我们和他素不相识。”他窘迫地问，“我们总不能对一件谋杀案丝毫不加调查吧？”

“要是你们丝毫不曾想到施密特化名普郎特尔博士，以慕尼黑的美国文

化史讲师的身份参加了加斯特曼在他拉姆波因寓所举行的社交活动，你们警察局全体人员理应以缺乏侦查能力无条件地被解雇，”冯·施文迪断言道，激动地用右手的手指敲击着路兹的写字桌。

“对此我们确实一无所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说，大感轻松，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记起了他久久想不起来的这位国会议员的名字。“我也同样怀有极大的好奇心。”

“啊哈，”冯·施文迪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沉默了。这时路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处于下风，凡是这位上校希图从他这里得到的，他将不得不在一切方面步步退让。他无助地瞧着特拉夫勒的画，瞧着行进的士兵、飘动的瑞士旗帜和坐在马上的将军。国会议员满怀狂喜地注意着预审官的窘迫情状，最后随着“啊哈”一声，他又同时添加一句道：“警察局也怀有极大的好奇心；警察局也对此一无所知。”

何等不愉快，冯·施文迪无情的手段使他陷入不能忍受的境地，但是预审官仍然必须承认，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既非工作任务，也没有让警察局方面知道他在拉姆波因的访问。施密特所采取的纯粹是私人行动，路兹无力地结束了自己的解释。可是施密特为什么采用化名，至今对他仍是一个谜。

冯·施文迪弯下身子，用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瞧着路兹。“这就说明了一切，”他说，“施密特是在替一个大国当间谍。”

“你这是什么意思？”路兹问，比方才显得更为狼狈。

“我认为，”国会议员说，“现在警察局首先必须查清，是什么原因促使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的。”

“警察局首先必须要对加斯特曼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反驳说。

“加斯特曼对警察局毫无危险，”冯·施文迪回答，“我也不愿意你或者你们警察局中的任何人和他交涉。这是我的愿望，他是我的当事人，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使他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个肆无忌惮的答复几乎压倒了路兹，使他最初几乎无言以对。他点燃一支香烟，昏乱中没有向冯·施文迪敬烟。然后他在自己的椅子中坐正身子，对答道：“施密特曾去加斯特曼家，这是个事实，很遗憾，警察局不得不向你的当事人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

冯·施文迪没让自己受迷惑。“事实是你得迫使警察局首先和我打交道，因为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说，“路兹，你遇见我应当高兴才是；我不仅愿意帮助加斯特曼，也愿意帮助你。当然整个事件使我的当事人很不愉快，但是你应该比他更为苦恼，因为警察局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点成绩。而且我还很怀疑你们在这个案件里会有任何一点线索。”

路兹回答说：“警察局几乎把每一件谋杀案都破获了，这是有案可查的。我同意我们在施密特案件中遇到了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过去也遇到过这样情况的，”——他中断了片刻——“我们先记下值得注意的结果。因此我们自然而然要到加斯特曼那里去，这也就是加斯特曼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遇到麻烦的是加斯特曼，而不是我们，是他必须说明施密特事件，而不是我们。施密特曾经在他家，尽管用的是化名；恰恰就是这个事实使警察局有责任同加斯特曼进行联系，因为被害者的不平常行为首先就要加斯特曼负责。我们可以和加斯特曼达成协议，但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就是你能向我们作出完满的说明，为什么施密特用化名访问你的当事人，而且去了很多次，

这是我们的判断。”

“好的，”冯·施文迪说，“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吧。你将看到，不仅是我要对加斯特曼作出说明，而且你们也要向我们解释清楚，施密特去拉姆波因寻求什么。在这件事上你们是被告，不是我们，亲爱的路兹。”说话的同时，他取出一张整幅的白纸，把这张大纸摊开在预审官的办公桌上。

“这里是和我那位好心的加斯特曼交往人员名单，”他说，“这是全部名单。我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排除掉，没意思，是一些艺术家。对克劳斯哈尔—拉法艾里当然无话可说，他是外国人；我指的是国内的人，他们来自乌茨多夫和梅立根，他们不是写关于莫加顿战役以及尼古拉·马努埃尔的戏剧，就是尽画些山峰岩石。第二部分人是工业家。你将看到全是些响当当的人物，我认为这些人物是瑞士社会最优秀的精华。我公开这么讲，虽然我从外祖母方面继承了农民的血统。”

“加斯特曼的第三部分客人是些什么人呢？”路兹问，因为这位国会议员突然沉默了，用他的安静使预审官神经质起来，而这自然是冯·施文迪的目的。

“第三部分人，”冯·施文迪最后接下去说，“照我的看法，将使施密特事件越发令人不快，不论对你，还是对那些工业家；现在我必须讲到的一些事情，本来应当对警察局严格保密的。但是现在已不能避免伯尔尼的警察局追踪加斯特曼，因为它以令人痛苦的方式发现了施密特曾去拉姆波因，工业家们不得已委托我来警察局向你们汇报情况，如果审查施密特案件时必须如此的话。对于我们，不愉快在于，我们必须披露具有非常重要性的政治事件；对于你们，不愉快在于，你们的权力，这是你们对这个国家里的瑞士人或者非瑞士籍人都具有的，对于这第三部分人却无效。”

“你方才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路兹表白。

“你对政治也真是一窍不通，亲爱的路西乌斯，”冯·施文迪回答说，“第三部分人是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人员，问题在于，不论何种情况均不能把工业家中某一阶层的人物和他们联在一起。”

---

莫加顿 (Morgarten)，瑞士地名，地形险要，瑞士军队曾在此大败奥地利 (1315) 和法国 (1788) 军队。

——译注

尼古拉·马努埃尔 (Niklaus Manuel)，瑞士十六世纪诗人和画家。——译注

## 九

现在路兹明白了国会议员的话，预审官的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电话铃响了，路兹只是把它拿起来朝里面吼了一声“在开会”然后又是一阵缄默。最后他说：“就我所知，官方现在不正和这个大国协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么？”

“当然，是在协商，”上校回答，“官方在协商，外交家们却还想另外再干点什么。但是非官方的协商更多，在拉姆波因就是在进行私人协商。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毕竟可以进行私人协商，国家是无权干涉的，预审官先生。”

“当然，”路兹畏缩地说。

“当然，”冯·施文迪重复一遍，“而这种秘密协商是现在不幸被害的伯尔尼警察局少尉乌尔里希·施密特，用化名秘密参与了。”

正如冯·施文迪正确地预料的，他看出预审官又重新惊惶地沉默了。路兹完全手足无措，只能听任国会议员随便摆布。正如大多数思想片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乌尔里希·施密特被杀案的出于意外的经过使这位官员头脑混乱，他不得不承认，对这件谋杀案件的侦查工作看来难以继续进行。

他确实又一次试图来衡量他的处境。

“亲爱的奥斯卡，”他说，“我没有把一切看得多么严重。瑞士的工业家们当然有权利和他们进行私人谈判，只要这些人对于私人谈判有兴趣，即使是同那个大国的人。对此我没有异议，警察局也决不会干涉。我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是私人行动，但我还要代表官方表示道歉；因为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冒用假名字和假职务，即使以警察出面有时会遇到一定困难。但是他参加这些集会并非孤零零一个人，也有艺术家在场呀，亲爱的国会议员。”

“必要的装潢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国家里，路兹，需要有广告。谈判必须保守秘密，有艺术家在场是最好的办法。欢宴、烤肉、美酒、好烟、女人、泛泛的闲谈，艺术家们厌烦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狂饮滥喝，毫不觉察企业家们和那个大国的代表已经坐在一起。他们也不想注意这些，因为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艺术家只对艺术有兴趣。但是一个警察，他坐在近旁观察到了一切。不，路兹，施密特之死是非常可疑的。”

“我只能很遗憾地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事我们至今还不了解，”路兹回答。

“他倘若不是受警察局的委托去的，那就是受其他人委托去的，”冯·施文迪回答说，“有这么一些国家，亲爱的路西乌斯，他们对于在拉姆波因所进行的事有兴趣。这是世界政治。”

“施密特不是间谍。”

“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他是一个间谍。对于瑞士的荣誉来说，他是一个间谍而不是一个警察局的密探反倒好些。”

“但他已经死了，”预审官叹了一口气，如果现在能够亲自问问施密特，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上校果断地说，“我不愿意怀疑任何人，但是对拉姆波因举行的谈判严守秘密却攸关某个大国的利益。我们是为了金钱，他们则涉及政党的原则。我们当然应对他们公正。这么办恰恰使警察局进行

工作陷于困境。”

路兹站起来，走向窗口。“我始终摸不清，你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他慢慢地说。

冯·施文迪用那张白纸扇着风，回答说：“加斯特曼为工业家和外国使馆的代表提供自己的房子作为谈判场所。”

“为什么恰恰是加斯特曼呢？”

上校喃喃地说：他的可敬的当事人正好具备必须的人选条件。他曾任阿很廷驻中国大使多年，获得了某一大国的信任，他过去又曾担任某一工业家的铁皮托拉斯的执行主席。此外他又住在拉姆波因。

“这又有什么意思，奥斯卡？”

冯·施文迪嘲弄地笑了笑：“在施密特被害之前你听说过拉姆波因这个地名吗？”

“没有。”

“原因就在这里，”国会议员肯定地说，“因为没有人知道拉姆波因。我们需要替我们的集会找一个人所不知的地点。怎么样，你可以不去打扰加斯特曼了吧。他不喜欢和警察局发生接触，你必须了解，他不爱你们的审讯、你们的探询、你们的没完没了的查问，这样做，对我们的罗根保尔和冯·龚登是可以的，如果他们又做了坏事的话。但是不能这样对待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拒绝让自己选进法兰西科学院。而且你的伯尔尼警察局办事实蠢，没有人会在演奏巴赫音乐的时候射杀狗的。倒不是得罪了加斯特曼，这件事对于他可以说是无关紧要，你的警察局可以朝他的屋子开枪，他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是还去烦扰加斯特曼先生就没有更多意义了，显然谋杀案的背后有大国在操纵，这个国家不论和我们勇敢的瑞士工业家们，还是和加斯特曼先生，都毫不相干。”

预审官在窗前来回踱着。“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我们的调查、特别是施密特命案的调查上来，”他宣称，“涉及外国的事，我们将报告联邦检察长。这个案件他会承担多少，我还不能讲，但他一定会把主要工作委托给我们。你要求宽恕加斯特曼，我愿意允诺；我们看来不可避免要搜查一次屋子。但终究还有必要和他进行谈话，我请你带他一起来，我们谈话时也请在场。这样我就能自然地 and 加斯特曼了结仅关形式上的公事。对这个案件这么做，并非为了审讯，而是使整个审讯过程合乎手续，有可能审讯工作要求审问加斯特曼，即使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审讯工作必须完整无缺。我们可以谈一谈技术问题，为了使审讯工作尽可能地不触犯任何人，我将不会提任何问题。即使我不得不提问题的话——当形式上需要时，——我也会事先把问题告诉你。”

现在国会议员也站起身来，两个男人就这样面对面站着。国会议员拍拍预审官的肩膀。

“就这样说定了，”他说，“你将不去打搅加斯特曼，亲爱的路兹，我相信你会信守诺言。文件我留在这里；名单开列得很确切，并且完整无缺。我整夜到处打电话，引起极大的不安，人们尚不知道，外国使馆听说施密特案件之后是否还有意于协商。危及几百万元的事，亲爱的博士，几百万元呢！为你的调查工作，我祝你幸运。你是需要幸运的。”

说这些话的同时，冯·施文迪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路兹刚来得及把国会议员拿来的名单通读一遍，感叹单子上名字的显赫，不禁让单子掉落在地——他想，我卷进了一件何等不祥的事件之中——这时贝尔拉赫跨入室内，当然并没有敲门。老人是来索取公文的，以便去拉姆波因和加斯特曼谈话，路兹告诉他下午再办。现在已到参加葬礼的时候，他说，并且站起身来。

贝尔拉赫没有反对，随同路兹离开了房间，路兹的脑子里不时浮现让加斯特曼安宁的诺言，可是他又畏惧贝尔拉赫尖锐的抗议。

他们站在街上，都不说话，两人都穿着领子高高竖起的黑大衣。天下着雨，走向汽车这几步路，他们当然没有撑伞。布拉特尔替他们开车。大雨现在成了真正的瀑布从玻璃窗上倾斜地进射下去。两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我应该和他谈谈这件事，路兹想，瞧着贝尔拉赫平静的侧面，那一个则和往常一样把手按在胃部。

“您疼吗？”路兹问。

“总是疼的。”贝尔拉赫回答。

于是他们又沉默了，路兹想，这件事我下午再和他讲。布拉特尔驾驶得很慢。大雨倾盆，一切都沦陷在一堵白色围墙后面。电车、汽车在这一巨大的倒垂的海洋中这里那里浮动。路兹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流着雨水的玻璃窗完全看不透。车厢里越来越暗。路兹点着一支香烟，喷出烟气，心里想，他不必和老人讨论加斯特曼的事。接着他说道：“报纸将报道这件谋杀案，不可能再对他们保密了。”

“继续保密也已经没有意义了，”贝尔拉赫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点线索。”

路兹又掐灭了香烟：“这本来也就毫无意义。”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而路兹却情愿争论一番，便又重新透过窗玻璃往外看。雨稍稍小了一点。他们已经驶入林荫道上。朔斯哈登公墓在色泽暗淡的树枝间显现出来，可以见到一堵灰色的被雨淋湿的墙头。布拉特尔把车开进墓园，停住了。他们走下汽车，撑开雨伞，穿过两旁的坟墓向前走去。他们不用费时找寻。墓石和十字架落在后面，他们像是走进了一个建筑工地。地上布满新掘的坟坑，上面铺着木板。湿草地上的潮气侵入了沾满粘土的靴子。广场正中，在所有这些尚未竣工的、雨水在它们底部积起了肮脏的小水潭的坟墓之间，在临时性的十字架和坟头之间，厚厚堆着迅速腐烂的鲜花和花圈，人们围立在一座新坟旁边。棺材尚未放下去，牧师在念《圣经》，在他身边，掘墓人穿着一件可笑的燕尾服式的工作服为他和自己高高撑着一把伞，冻得两只脚不住地来回挪动。贝尔拉赫和路兹在坟坑附近停下，老人听见了哭泣声。这是舒勒太太在哭，在这无休止的大雨中，她显得丑陋而且肥胖，她身边站着钱茨，没有撑伞，穿一件竖起领子的雨衣，腰带垂在两边，头上戴着一顶笔挺的黑帽子。他身边站着一个姑娘，脸色苍白，没有戴帽子，一头金发一绺绺湿漉漉地耷拉下来，这就是安娜了，贝尔拉赫不由自主地想道。钱茨向他们鞠躬，路兹点头作答，老探长却毫无表情。他向围立在墓穴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全是警察，全都穿着便服，同样的雨衣，同样的笔挺的黑帽子，雨伞像佩剑一般握在手里，这些奇异的守灵人，不知风从哪儿把他们刮来的，他们的忠实显得不真实。在他们后边，排列成梯队的市政府乐队，穿

着黑红二色的制服，是匆匆召集来的，都拼命设法把自己的金色乐器在外套下保护起来。他们就这样围在棺材周围，它平放在那边，一只木制的匣子，没有花圈，没有鲜花，但却是唯一温暖而受保护的所在，正在这一无休止的雨滴之中安葬，雨水单调地拍溅着地面，始终如一，永无尽止。牧师早已读完了，却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只有雨水，人们只听到雨声。牧师咳嗽起来，先是一声，接着好几声。于是低音喇叭、长喇叭、号角、短号、低音笛一齐奏鸣，傲慢而雄壮，乐器在雨帘中闪着金光；但是它们也沉没了，消散了，停止了。一切全退缩在雨伞之下，雨衣之下了。雨始终不断地下着。鞋子陷在泥泞之中，雨水汇成小河流入空的墓穴。路兹鞠了一个躬，走前几步。他瞧瞧潮湿的棺材，又鞠了一个躬。

“先生们，”他的声音在雨中透过水幕几乎听不清楚：“先生们，我们的同事施密特不在了。”

一阵狂野、粗厉的歌声打断了他：

“魔鬼出没往来，  
魔鬼出没往来，  
把人类统统打败！”

两个穿燕尾服的男子穿过墓地蹒跚而来，既不打伞，也不穿雨衣，他们一无遮蔽听任雨水浇淋，衣服都粘贴在身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大礼帽，雨水从帽上流到他们脸上。他们两人合提着一只巨大的绿色月桂花圈，飘带垂到地上，拖曳过地面。这是两个粗野、巨人般的家伙，穿礼服的屠夫，已经喝得烂醉，几乎要醉倒了，但是两个人从没有同时颠蹶，那只月桂花圈总算牢牢抓在中间，花圈就像海上遇难的船只上下颠簸着。他们口齿不清地唱起了一支新的歌：

“磨房主的老婆死了男人，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她和雇工结了婚，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他们奔向悲伤的人群，挤了进去，站到舒勒太太和钱茨中间，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因为人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而他们却又穿过潮湿的草地蹒跚离去了，互相支持着，互相围抱着，爬越坟丘时摔倒了，以酩酊醉汉的巨力撞翻了十字架。他们的歌声在雨中逐渐消逝，一切又重新被淹没了。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消失！”

这是人们听到他们唱的最后一句歌词。只有花圈还躺在那里，抛掷在棺材上，肮脏的飘带上写着流畅的黑字：“献给我们亲爱的普郎特博士”。

---

这一段歌词和下一段歌词均为瑞士方言，暗示加斯特曼的两个仆人用的是法国护照，却都是瑞士本地人。  
——译注

当墓旁的人们从惊惶中恢复过来，为这场意外事变所激怒，而市政府乐队，为了挽救葬礼气氛，又重新绝望地吹奏起来的时候，雨又升级成为瓢泼大雨，鞭挞着杉树，一切都从墓地上冲走了，只有守灵的人们留了下来，这些黑色怪衣人在狂风呼啸中，在哗啦啦的暴雨下，奋斗着，好不容易才把棺材安放下去。

贝尔拉赫和路兹重新坐进汽车，布拉特尔穿过匆匆溃散的警察和乐队队员驶入林荫夹道，路兹博士终于爆发了怒气：

“岂有此理，这个加斯特曼，”他大声嚷道。

“我不明白，”老人说。

“施密特出入加斯特曼家用的就是普郎特尔这个名字。”

“那么这就是一种警告啰，”贝尔拉赫回答，而不再往下问。他们驶向路兹居住的莫里斯泰顿。现在倒是和老人谈谈加斯特曼的适当时刻，但是路兹想到有人要让加斯特曼得到安宁，因此重又保持沉默。他在布格恩切尔下了车，只剩下贝尔拉赫一个人。

“要我送您进城吗，探长先生？”驾驶座前的警察问。

“不，送我回家，布拉特尔。”

布拉特尔现在加快了速度。雨已渐渐变小，是的，在莫里斯泰顿，贝尔拉赫有一刹那曾被一道刺目的光芒所笼罩：阳光穿破了云层，随即又消失了，重新是烟雾和云峰追逐嬉戏，妖怪似地从西方聚集过来，堵塞在高山前，在城市上空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它躺在河面上，在森林和丘陵之间铺开它那没有意志的躯体。贝尔拉赫疲倦的手抚摸着潮湿的大衣，眯缝的眼睛闪闪发光，贪婪地汲取面前的景色：大地美极了。布拉特尔停住车。贝尔拉赫向他道谢后下了车。雨已住了，只有风还在刮，潮湿冰冷的风。老人站着，等待布拉特尔掉转笨重的车身，车子又驶走时，再一次向他致谢。然后步向阿尔河。河水涨得高高的，纯粹是肮脏的褐色。一辆破旧生锈的儿童车在水中漂浮，一根粗树干，一棵小松树漂来了，然后，舞动而来的是一只小小的纸船。贝尔拉赫久久凝视着河水，他爱阿尔河。然后他穿过花园回家。

贝尔拉赫换了一双鞋子，然后才走进客厅，但是站在门槛上呆住了。书桌后坐着一个男人，正在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他的右手玩弄着贝尔拉赫的土耳其蛇刀。

“原来是你，”老人说。

“是的，是我，”另一个人回答。

贝尔拉赫关上门，坐到书桌对面的靠背椅上。他沉默地瞧着对面的人，而那个人仍平静地继续翻阅着施密特的文书夹，那人长着一副近似农民的体格，消瘦的、反而是圆圆的脸上有一对平静、沉思、深深下陷的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

“你现在的名字叫加斯特曼，”最后老人说道。

那个人取出一只烟斗，填满烟丝，眼睛始终望着贝尔拉赫，点燃之后，一边用食指敲着施密特的文书夹，一边回答说：“一个时期以来，你早已完全知道了。你派那个年轻人来盯我的梢，这些材料是你授意写的吧。”

然后他合上文书夹。贝尔拉赫看看书桌，他的手枪还放在那里，他只要一伸手就可掉转枪柄；接着他说：“我从未停止追踪你。总有一天我会成功地证实你的犯罪行为。”

“你得加快速度才行，贝尔拉赫，”另一个人回答，“你没有很多时间了。医生说你能再活一年，要是你现在就动手术的话。”

“你说得对，”老人说，“还有一年。我现在不让人动手术，我必须作好安排。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是最后的，”另一个人证实说，于是他们又陷入沉默，无穷尽地对坐着，沉默着。

“四十多年过去了，”另一个人重新开始话头，“我们两人是在波斯普鲁士海峡边某一家歪歪斜斜的犹太小酒店第一次见面的。当时月亮像一块黄色丑陋的瑞士干酪从云层间露出来，透过腐烂的梁木照在我们头上，这次会见我还记忆犹新呢。你，贝尔拉赫当时是从瑞士到土耳其来服务的警察局青年专家，是特邀来进行某些改革的，而我呢——是的，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冒险家，现在还是，渴望认识我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和同样唯一的神秘的星球。我们第一眼就互相爱上了，当我们面对面坐在穿长袍的犹太人和肮脏的希腊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当时饮的烧酒是何等美妙，这白色冒泡的液体是椰枣和敖德萨附近一大片燃烧的海洋似的异邦谷田产物酿成的，我们把它们灌进喉咙，使我们强壮有力，使我们的眼睛在土耳其的夜空中像炽热的煤块似的闪光，我们的谈话也炽热起来。噢，我爱想念这一时刻，它决定了你的生活，也决定了我的生活！”

他哈哈大笑。

老人坐着，沉默地瞧着他。

“你还能再活一年，”另一个人接下去讲，“而你固执地追踪我已有四十年了。这就是计算的结果。贝尔拉赫，你可记得当年我们在托法尼郊外那家酒店潮湿有霉味的空气里，在土耳其烟草浓雾包围中讨论了什么吗？你的论点是，人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事先有把握地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考虑到隐藏在一切事物中的偶然因素，这就是大多数犯罪行为必然会被揭露出来的原故。你认为犯一桩罪是一件蠢事，因为人不是棋子可以随便摆布。我的论点相反——说是自信倒不如说是为了反对你——我认为正是由于人们的错综复杂关系使犯罪行为有可能进行，而不被识破，由于这个原故，极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也没有被人们料到，仅仅是在暗中发生的。我们继续争辩不休，由于那犹太老板斟给我们的烧酒燃起的地狱般的火气，更由于我们的年轻，勾引我们在狂热之中打了赌，正好是月亮在这小亚细亚后面落山的时候，这是一次违反上天意志的赌局，是我们自己无法遏制而开的一场玩笑，即使它是一次对上帝的可怕的诅咒，只因为我们受打赌本身的引诱，好似被凶恶的魔鬼勾引心灵去作坏事一样。”

“你说得对，”老人平静地说，“我们当时互相同意进行打赌。”

“你不曾想到，我是会遵守约定的，”另一个人笑着说，“当我们第二天早晨脑袋沉重地从荒凉的小酒店醒来时，你是在一条霉烂的长板凳上，而我则躺在酒迹未干的桌子下面。”

“我没有想到，”贝尔拉赫回答，“一个人有可能去遵守这样的打赌。”他们沉默了。

“我们不必试探了，”加斯特曼又重新开言道，“你的正直使你永远不会受到诱惑，但是你的正直却引诱了我。我挑起了一次大胆的竞赛，当你的面犯下一桩罪行，而你却不能提供我犯罪的证明。”

“三天之后，”老人轻声说，沉入回忆之中，“当我们和一个德国商人经过穆罕默德桥上时，你在我亲眼目睹下把他推进了水里。”

“那个可怜的家伙不会游泳，而你那时对此道也不很精通，人们把由于从事不成功的救人尝试而淹得半死的你从金角湾污浊的波浪中救了出来，”另一个人不可动摇地说，“谋杀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土耳其夏日发生的，海

上吹来阵阵令人舒适的微风，在一座生气盎然的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对对欧洲殖民者情侣，还有一堆堆回教徒和当地的乞丐，尽管如此，你提供不出我犯罪的任何证据。你逮捕了我，全然徒劳。审讯很久，全然无用。法庭相信我的辩白，他们宣判那个商人是自杀。”

“你能证明那个商人正面临破产，并想通过欺骗徒劳地挽救自己，”老人惨苦地说，比任何时候都苍白。

“我极其精确地挑选了我的牺牲品，我的朋友，”另一个人笑着说。

“于是你成了一个犯罪者，”老探长回答说。

另一个人无心地玩弄着那把土耳其刀。

“我是有点儿像一个犯罪者，我现在也不能够否认，”他最后懒洋洋地说，“我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犯罪者，而你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刑事学家。但步调是：我总比你先走一步，而你永远也追不上。我始终像一个灰色的幽灵出现在你的发展道路上，我始终有兴趣在你的鼻子底下干出可谓大胆的、粗野的、亵渎神明的犯罪行为，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对我的行为提供证据。你能够制胜那些笨蛋，但是我却战胜你。”

他不断说着，一面注意地、但是嘲弄地观察着老人：“我们就这样活着。你生活在你的上司之下，在你的警察局领域和发臭的官衙里，永远为达到你的有限度成就的顶峰而勇敢地攀登一级一级的阶梯，你和盗窃犯、伪造犯纠缠，和那些从未正当生活过的可怜虫纠缠，和那些暴露出来的可怜的杀人者纠缠。我和你相反，一会儿在黑暗中，在不受注意的大城市的深渊中，一会儿在辉煌事业的光芒中，佩满了勋章，豪放地大做慈善事业，当我对此有兴趣的时候，而在另一种情绪下又喜欢干些坏事。何等惊险的游戏呀！你渴望毁灭我的生命，而我则顽强地保护我的生命。真的，一个夜晚把我们永远用链子连在一起了！”

坐在贝尔拉赫书桌后面的人拍了一下手，这是一声孤零零的、冷酷的拍击：“现在我们都已经走到我们生活道路的尽头了，”他叫喊道，“你已经回到了你的伯尔尼，半失败地来到了这个睡意蒙眬的、正直的城市，虽然人们不很清楚这城市有什么事情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我呢，我回到了拉姆波因，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人们喜欢圆满地结束一生，因为这个为上帝所遗弃的村庄是一个早已埋葬的妇女生我的地方。我没有什么盘算，完全无意地回到了这里，也正是这样，十三岁那年，我是在一个雨夜潜行出走的。现在我们又碰头了。算了吧，朋友，有什么意思呢。死亡是不会等到结局的。”

这时他的手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一扬，那把刀颯的恰巧擦过贝尔拉赫的脸颊，深深扎进安乐椅中。老人一动也不动。另一个人笑了：

“那么你相信是我杀了这个施密特的啰？”

“我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探长回答。

另一个人站起来，拿起文书夹。

“这个我带走了。”

“我总有一天会成功地证明你的罪行的，”贝尔拉赫第二遍说，“而现在是在最后的机会了。”

“文书夹里是唯一的、虽则是微不足道的证据，这是施密特替你在拉姆波因收集的。丢了文书夹，你就丢了证据。抄本或照相副本你都没有，我知道你的。”

“没有，”老人承认，“我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不想用手枪来拦阻我吗？”另一个人讥讽地问。

“你已经取走了子弹，”贝尔拉赫一动不动地回答。

“丝毫不错，”另一个人说，同时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他走过老人身边，门打开了，又重新关上了，他又走出了外边的那扇门。贝尔拉赫始终坐在安乐椅上，脸颊挨着冰凉的钢刃。突然他拿起枪，瞧瞧后面。枪是实弹的。他跳起来，奔进前厅，又奔向门边拉开大门，手里攥紧了枪：街上暗无一人。

疼痛发作了，巨大的、剧烈的、针刺似的疼痛，一道阳光照到他身上，他痛得扑到床上，痉挛着，由于高烧而浑身颤抖。老人像野兽一样用手和脚爬着，跌倒在地上，在地毯上辗转翻滚，然后在他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在椅子之间躺下不动了，出了一身的冷汗。“什么样的恶人呀？”他轻轻地呻吟道，“什么样的恶人呀？”

他仍然站起身。病发作一阵后他感到好过多了，疼痛早已停止。他小心地啜饮一点暖酒，此外不再吃什么。但他并不放弃沿着熟悉的路穿过城市，走上联邦大楼的台阶，他确是睡意蒙眬，但是在迎面吹来的干净空气中每走一步都使他舒服。他很快来到路兹办公室在路兹的对面坐下，路兹什么都没有觉察，也许正在和自己的坏良心作剧烈斗争，为了能够陈述某些事。路兹最后决定，关于自己和施文迪的谈话还要在下午，倘若不是等到傍晚，看情况后再和贝尔拉赫商量。因此他就像挂在自己对面那幅特拉夫勒画中的将军那样，挺出胸膛，摆起一副冷冰冰的架势，用一种生硬的电报腔教训起老人来。可是探长对他的放肆姿态丝毫未加抗议。贝尔拉赫对一切都表示同意，认为，也许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耐心等待联邦议院的决定，同时汇集施密特生平的主要材料。路兹惊讶万分，因为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且态度极端和蔼，语调平静。

“关于加斯特曼我当然调查过，”路兹说，“对他已有足够了解，确信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杀人犯。”

“当然，”老人回答。

路兹在午间得到了从比尔方面来的若干情报，便装作胸有成竹地说：“出生在萨克森的普考，一个皮货巨商的儿子，最初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从青年时代就侨居南美洲——后来侨居法国，大都是作扩展业务的旅行。他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十字章，通过出版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传略十分熟悉。他的品格很优秀，这是事实，因为他曾拒绝进入法国科学院。这使我很钦佩。”

“很有意思的经历，”贝尔拉赫说。

“关于他的两个仆人，也进行过调查。他们有法国护照，然而在艾门塔尔出生的。他派他们到葬仪上作了一次恶作剧。”

“这像是加斯特曼的风格，恶作剧，”老人说。

“他对死狗事件很恼火，就像施密特案件使我们特别恼火一样。我们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总算运气，我和冯·施文迪是朋友。加斯特曼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人物，他受到我们瑞士企业家的绝对信任。”

“因此他必然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表示。

“他的人格使他免受嫌疑。”

“这一点有决定意义，”老人点头同意。

“可惜我们关于施密特没有更多情况可谈，”路兹结束道，让人把电话接到联邦议院。

当他在耳机旁等待时，已经打算转身离开的探长突然说道：“我向您请一个星期病假，博士先生。”

“好的，”路兹回答，用手掩住耳机，因为对面已经通话，“星期一您不用来！”

钱茨正等候在贝尔拉赫的房间里，老人进来时他站了起来。他自以为镇静，但是探长观察出这个警察神经很紧张。

“我们到加斯特曼家去吧，”钱茨说，“这是刻不容缓的。”

---

德国地名。加斯特曼是瑞士人，却伪造出生地点和历史。——译注

瑞士伯尔尼之地名。——译注

“去作家那里，”老人回答，穿上了大衣。

“走弯路，完全是走弯路，”钱茨打赌说，跟在贝尔拉赫后面走下楼梯。探长在门口站住了：“那边不是施密特那辆蓝色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吗？”

钱茨回答，他买下了它，是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总归要卖给什么人的。随即他们登上了汽车。

贝尔拉赫坐到他旁边，钱茨把车子从停车场驶向贝特莱汉。贝尔拉赫嘟哝说：“你又走英斯这条路。”

“我喜欢这条路线。”

贝尔拉赫浏览着洁净如洗的田野。一切都浸沉在明亮而宁静的光线之中。一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尚悬挂天空，却已将近黄昏了。两个人都沉默着。

只有一次，在凯采尔和蒙希米尔之间，钱茨问：“舒勒太太告诉我，您从施密特的房间拿走了一只文书夹。”

“没有公家的事，钱茨，全是私事。”

钱茨不说什么，也不再问话，只是贝尔拉赫必须敲敲记速计，它已指到一百二十五。

“别这么快，钱茨，别这么快。我倒并不害怕，但是我的胃有病。我是一个老人了。”

作家在自己的书房接待他们。这是一间古老的、低矮的房间，迫使他们两人在进门时不得不在轭下那样弯下腰。屋外那只黑脑袋的小白狗还在嚎叫，屋子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喊。作家坐在哥特式的窗户前，穿一件护身服，外罩一件棕色的皮茄克。他在自己的座位上转向进门的人，并不离开那只厚厚铺满纸张的书桌。然而他没有站起来，也几乎没有打招呼，只是问道，警察局找他有何贵干。他很不礼貌，贝尔拉赫想，他不喜欢警察；作家从来不喜欢警察。老人决定小心谨慎，钱茨也在全部过程中无所动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人研究观察，否则我们就会被写进一本书里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道。但是当他们按照作家的一个手势坐到柔软的靠背椅上时，他们吃惊地发觉自己正处在一扇小窗户投来的光线之中，几乎看不清在这间低矮的绿色房间里大量书籍中的作家的脸，这种逆光特别狡猾。

“我们是为施密特案件来的，”老人开言道，“他驾车经过特万镇时被人暗杀了。”

“我知道。为了普郎特尔博士案件，要调查加斯特曼，”在窗子和他们之间那个黑影回答说，“加斯特曼和我讲过这件事。”这张脸亮了一刹那，因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两个人还来得及看到这张脸皱缩成一副狰狞的模样：“你们要我不在场的证明吗？”

“不，”贝尔拉赫说。

“你们不相信是我谋杀的？”作家显然失望地问。

“不，”贝尔拉赫干巴巴地回答，“不是您。”

作家叹息道：“那么我们又得说，作家在瑞士是最最可怜地不受重视的。”

老人笑起来：“倘若您一定要知道，我们当然早就知道您当时不在场。谋杀那天夜晚十二点半时，您在拉姆林根和谢纳尔茨之间遇见了守林人，和他一起回家的。你们是同路。那个守林人说，您非常风趣。”

“我知道。特万镇的警察已经向守林人打听过我两回。还问过了这里所有其他人，甚至我的岳母。我当然也是谋杀嫌疑犯，”作家傲慢地确定说。“又是一种作家式的结论，”贝尔拉赫心里想，这正是作家的虚荣心，他要求人家认真地对待他。三个人全沉默了，钱茨竭力设法看清作家的脸。但是在这种逆光中一切努力全属徒劳。

“那么你们还想要什么呢？”作家最后气呼呼地说。

“您和加斯特曼交往很多吧？”

“是审讯么？”黑影从窗下更往前探出身体。“我现在没有时间。”

“请您不要这么冷淡，”探长说，“我们只是想随便聊聊。”

作家喃喃嗯了一声。

贝尔拉赫再一次问道：“您和加斯特曼交往很多吧？”

“有来有往。”

“为什么？”

老人原来期待着又一次愤怒的答复。但是作家只是笑了笑，朝他们脸上吹去阵阵烟雾，说道：“这个加斯特曼是一个有趣的人，探长，这样一个人吸引着一大群作家。他善于烹调，手艺极佳，您听见么？！”

于是作家开始谈论加斯特曼的烹饪艺术，从一道菜描写到另一道菜。两个人听完五分钟，然后又是五分钟；当作家已经整整讲了一刻钟加斯特曼的

烹调艺术，而且除了加斯特曼的烹饪艺术其它什么都没讲时，钱茨站了起来，表示说，可惜他们不是为了欣赏烹饪艺术而来的，但贝尔拉赫表示反对，变得极为活泼，他对此很感兴趣，连他自己也开始讲起来。老人生气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土耳其的、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的、南斯拉夫的、捷克的烹调术，两个人相互抛出一道道佳肴，好像在玩抛球似的。钱茨出汗了，心里在诅咒。两个人始终没有从烹饪术转移开，但是最后，在三刻钟之后，他们精疲力竭了，似乎在内心举行了一次冗长的宴会。作家点着了一支香烟。一切寂静无声。附近那个孩子又开始哭喊。狗在楼下吠叫。钱茨非常突然地冲着房间喊道：

“是加斯特曼杀了施密特吗？”

问题提得如此幼稚，老人摇摇头，他们面前的黑影说道：“这要您自己来下判断了。”

“我请求答复，”钱茨果断地说，向前探出身子，但是作家的脸仍然不可辨认。

贝尔拉赫很好奇，不知被问者反应如何。

作家保持平静。

“那么那个警察是什么时候被杀的？”作家问。

事情发生在午夜之后，钱茨回答。

他不知道，逻辑的法则对于警察局是否也同样适用，作家答复说，而他也对此也十分怀疑，因为他，正如警察局辛苦侦查确定的，十二点半时在去谢纳尔茨的路上遇见了守林人，依此类推他和加斯特曼告别一定不到十分钟，显然加斯特曼不是合适的谋杀者。

钱茨还想进一步了解，这次社交活动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当时和加斯特曼在一起。

作家作了否定的答复。

“施密特还向其他什么人告辞吗？”

“普郎特博士习惯于让自己成为最后第二名告别者，”作家不无诙谐地回答。

“最后一名是谁？”

“我。”

钱茨一步也不放松：“两个仆人在场吗？”

“我不知道。”

钱茨还继续问，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以为，答复是够明确的了，作家当面驳斥道。他从不注意像仆人这样的人。

那么加斯特曼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钱茨用一种绝望而冲动的方式问，使老探长感到如坐针毡。他想，我们若不被写进下一部小说中去，这才怪呢。

作家朝钱茨的脸吹去一大阵烟雾，使他大咳起来，房间里又是长时间沉默，也不再听到孩子的喊叫声。

“加斯特曼是一个坏人，”作家最后说。

“尽管如此您仍经常拜访他，仅仅因为他善于烹饪？”钱茨在一阵新的咳嗽发作之后愤愤地责问。

“仅仅如此。”

“我不明白。”

作家笑了。他也是一种警察，他说，但是没有权力，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监狱作后盾。他的职业也是专门监视人的。

钱茨迷乱地沉默了，而贝尔拉赫说道：“我明白。”然后，过了一忽儿，当阳光从窗口消失时，探长接着说：“我的下属钱茨由于过分焦急，把我们自己赶进了一条窄胡同，使我再也不能发现什么，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年轻人也做了一点好事。使我们获得了好处，一条公牛以它不可思议的力量给我们撞开了一条路。”（钱茨给探长这几句话气得满脸通红）“我们现在仍旧提问题和答复问题吧，这正符合上帝心意。我们务必不失时机。您对整个事件有何看法，我的先生？加斯特曼可能是谋杀犯吗？”

房间里很快就暗下来，但是作家没有想起开灯。

他坐到了窗台上，于是两个警察恰像关在洞穴里的俘虏。

“我认为加斯特曼可能犯下任何罪行，”窗下传来冷冷的声音，语气颇为狡诈。“但我深信，他并未参与谋杀施密特。”

“您很了解加斯特曼，”贝尔拉赫说。

“我是在想象他的形象，”作家回答。

“您是在按您的想法给他画像，”老人冷冷地纠正自己对面坐在窗台上的黑影。

“使他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烹调艺术，虽则没有其它东西更易令我欣喜，而是一个人确实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可能性。”作家说道，“在现实中碰见一个虚无主义者，总是令人兴奋的。”

“听一个作家说话总是首先令人兴奋的，”探长干巴巴地说。

“也许这个加斯特曼做的好事比我们坐在这间歪斜房间里的三个人做的加起来还要多，”作家接着讲下去。“我认为他坏，原因在于他做好事时的心情同他干坏事时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坏事从来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其他人干犯罪勾当总是为了占有金钱，征服女人，或者是攫取权力，而他干一切，却全无意义，也许对他来说永远存在两种可能，坏事和好事，由偶然性所决定。”

“您这么推断，似乎这是数学，”老人对答道。

“这也真的是数学，”作家回答说，“人们可能把恶设想为他的坏的一面，正如人们以一个几何图形作为镜子去推断另一个几何图形，我可以肯定，是存在这样一种人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你们也许已经遇见过这样的人了。人们能遇上一个，人们也能遇上另一个。”

“听起来像是政治纲领，”老人说。

“是啊，这是政治纲领，为什么不是呢？”作家说，“我就在想象一个可以作为加斯特曼镜子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犯罪者，因为恶就是他的道德，他的哲学表明，他也可以狂热行善，如同另一个出于善的目的去做时一模一样。”

探长认为，还是应该把话题拉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至少不要太远。

“随您的便，”作家说，“我们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探长，回到恶的极端上来。对于他来说，干坏事不是一种哲学或者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是他的自由：否定一切的自由。”

“为了这种自由我不会拿出一分钱来的，”老人回答说。

“您也不必为此拿出一分钱来，”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但是人们

为了研究这个人以及他的自由，可能付出生命。”

“他的生命，”老人说。

作家沉默了。看来他不愿再说更多的话了。

“我想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加斯特曼，”老人最后说，“这么一个人，住在特森贝格平原的拉姆林根，举办社交活动，使一个警察少尉为此付出了生命。我想知道，您给我描绘的画像，是加斯特曼的像呢，还是您的某一个梦幻？”

“我们的梦幻，”作家说。

探长沉默了。

“我实在不知道，”作家结束说，走向两人，但是只向贝尔拉赫，只向他伸出手去握别：“这类事和我实在没有关系。调查这个问题毕竟是警察局的任务。”

## 十四

两个警察又走向自己的汽车，小白狗愤怒地狂叫着跟在他们后面，钱茨坐到驾驶盘前。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作家。”小白狗爬上了一堵葡萄园墙，继续朝他们狂吠。

“现在去加斯特曼处，”钱茨说，发动了马达。

老人摇摇头。“回伯尔尼。”

他们驶下里格尔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片巨大的洼地。远远近近散落着各种基本物质：石块、土、水。他们在阴影中行驶，但是沉没在特森贝格后面的太阳，还照耀着湖泊、岛屿、山角、地平线上的冰川，以及飘浮在蓝天上的互相挤撞的云层。老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初冬这一不断变化着的天气。

总是这番景象，他想，不管它怎么变化，总是这番景象。当汽车沿着道路一个急转弯，在垂直的悬崖底下出现了一个犹如拱形盾牌的湖泊，钱茨停住汽车。

“我必须和您谈谈，探长，”他激动地说。

“你要什么？”贝尔拉赫问，仍注视着山岩。

“我们必须去访问加斯特曼，没有其它路可以走了，这是符合逻辑的。首先我们必须审问仆人们。”

贝尔拉赫向后一靠，坐着不动，这个灰白头发、谨慎的绅士用他冷冷的眼光平静地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我的上帝，我们不能永远做合乎逻辑的事，钱茨。路兹不愿意我们访问加斯特曼。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必须把案件交到联邦检察官那里去。我们得耐心等待他们的处理决定。我们恰好是同难于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贝尔拉赫懈怠的模样惹得钱茨火冒万丈。

“真是没有道理，”他叫起来，“路兹为了照顾政治关系对侦查工作消极怠工。冯·施文迪是他的朋友，又是加斯特曼的律师，这就可想而知了。”

贝尔拉赫的脸丝毫没有表情：“幸好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钱茨。路兹也许过分急躁，但是有充分理由。秘密在施密特方面，而在加斯特曼方面。”

钱茨不受迷惑：“我们除了探索事实，别无所求，”他绝望地朝迎面飘来的云层喊叫，“事实，只要事实：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你说得对，”贝尔拉赫重复道，可是毫无感情而且冷冰冰，“事实在于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年轻的警察把手放在老人的左肩上，凝视着他的高深莫测的脸面：“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采取行动，当然对准加斯特曼。一件侦查工作必须完满无缺。人们不能总是做合乎逻辑的事，这是您说的。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能放过加斯特曼。”

“加斯特曼不是谋杀者，”贝尔拉赫干巴巴地说。

“问题在于加斯特曼可能安排谋杀。我们必须审问他的仆人！”钱茨反对道。

“我没有看到什么最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能够说明加斯特曼有理由要谋杀施密特，”老人说，“我们必须到那种能够说明犯罪行动的意义的地方去寻找犯罪者，而这只有联邦检察官还有点儿办法，”他接下去讲。

“作家也认为加斯特曼是谋杀犯，”钱茨强调说。

“你也认为他是么？”贝尔拉赫伫待地问。

“我也认为，探长。”

“那么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贝尔拉赫肯定说，“作家只是认为他具有某种犯罪的可能性，这是截然不同的。作家丝毫也没有叙述到加斯特曼的犯罪行为，只是谈到了他的可能性。”

这时另一个人丧失了耐心。他抓住老人的肩膀说。

“多年来我一直处在别人的阴影下，探长，”他呼吸艰难地说，“人们总是忽略我，轻视我，当作最微末的小人物来使用，当成一个好使唤的小听差！”

“我承认，钱茨，”贝尔拉赫说，木然瞪视着年轻人的绝望的脸，“多年来你是在那个现在已被杀害的人的阴影之下。”

“仅仅因为他受过较好的教育！仅仅因为他懂得拉丁文！”

“你对他不公平，”贝尔拉赫回答，“施密特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刑事学者。”

“而现在，”钱茨喊叫道，“我刚有一次机会，一切又要化为乌有，我的唯一机会在一场愚蠢的外交游戏中彻底完蛋了！只有您还能加以改变，探长，请您同路兹讲讲，只有您能动摇他，让他批准我去找加斯特曼。”

“不，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不能做这件事。”

另一个人当他小学生似地摇晃着，两只手紧紧抓住老人，叫喊：“请您同路兹说，请您去说！”

然而老人并没有软化：“不行啊，钱茨，”他说，“我对这件事毫无办法。我老了，而且有病。因而需要安静。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好的，”钱茨说，突然放开贝尔拉赫，重新握住方向盘，虽然仍旧脸色苍白而且在颤抖。“不行。您不能够帮助我。”

他们重新往下朝里格尔茨驶去。

“你是在葛林特尔森林度假的吧？是住在供膳宿的公寓里吧？”老人问。

“是的，探长。”

“很安静，价钱也不贵吧？”

“您说得对。”

“好的，钱茨，我明天去那里，去休息休息。我必须到山上去。我获准病假一个星期。”

钱茨没有立刻回答。直至他们到达比尔—瑙恩堡的转弯之处，他才开口，声音已恢复了常态：“高山对人不一定总是好的，探长。”

## 十五

就在这同一天傍晚，贝尔拉赫去贝伦广场他的医生萨穆埃尔·洪格尔托贝尔博士家。灯光亮了，越来越昏暗的黑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渗入室内。贝尔拉赫从洪格尔托贝尔的窗子往下瞧着广场，望着流动的人潮。医生正在收拾仪器。贝尔拉赫和洪格尔托贝尔认识已久，他们中学时代就在一起。

“心脏很好，”洪格尔托贝尔说，“真要感谢上帝！”

“关于我的病情你有记录吗？”贝尔拉赫问。

“整整一套档案呢，”医生回答，指指写字桌上一堆纸说，“这里都是你的病历。”

“你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我的病吗，洪格尔托贝尔？”老人问。

“可是汉斯，”另一位老人说，“这纯属医生的秘密呀。”

下边广场上驶来一辆蓝色的梅尔西特斯，停在其它车辆停放的地方。贝尔拉赫仔细观察着。钱茨走下汽车，还有一个姑娘穿着白色的雨衣，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雨衣上。

“你被人撬过门吧，弗里茨？”探长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猜测而已。”

“我的写字桌有一次被人撬开了，”洪格尔托贝尔站起来说，“你的病历摊开在书桌上。钱没有少，虽然抽屉里的钱还相当多。”

“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医生摇摇头。“正如方才所说，钱没有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报案的。但是我忘记了。”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你把它忘记了。撬门者对你至少还不错。”这时他想，加斯特曼就是这样知道的。——他又重新瞧着广场下面。现在钱茨和那个姑娘走进意大利旅馆去了。就在施密特葬礼的同一天，贝尔拉赫心里想，终于从窗口转过身子，他看看洪格尔托贝尔，医生坐在书桌旁，正在写字。

“现在我的健康情况如何？”

“你疼吗？”

老人叙述了病情。

“情况很坏，汉斯，”洪格尔托贝尔说，“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你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我现在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

“四天之内会有新发作，汉斯，”医生说，“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

“我还有两天时间。两天。第三天早晨你可以给我开刀。星期二早晨。”

“星期二早晨，”洪格尔托贝尔说。

“于是我可以再活一年，是不是，弗里茨？”贝尔拉赫说，同往常一般莫测高深地望着他的老同学。那个人跳起来，在屋里兜着。

“你怎么会有这样无稽的想法的！”

“那个看过我病历的人告诉我的。”

“你就是撬门的人？”医生激动地叫起来。

贝尔拉赫摇摇头：“不，不是我。但是事实如此，弗里茨，只有一年可活。”

“只可再活一年，”洪格尔托贝尔回答，坐到门诊室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尔拉赫，老人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冷的孤独感，一动也不动地、谦逊地站在房间正中，在他茫然的目光前面，医生垂下了眼睛。

深夜近两点钟时贝尔拉赫突然醒了。他很早就上了床，听从洪格尔托贝尔的劝告吃了一片药，在他是第一次，因此他起先以为自己的突然觉醒是自己不习惯的预防措施所致。但是他立即又相信，是某一种声音把他吵醒的。如同人们被一下打击所惊醒的时候经常发生的那样，变得不可思议地目光明亮而清醒；然而他必须首先勘定情况，紧接着几秒钟内——常常使我们感到似乎是永恒无限的——他肯定自己是正常的。他没有睡在卧室里，像平常习惯的那样，而是睡在书房里；因为他打算度过一个难以入眠之夜，他记得自己还想再读一点书，但是一阵子深深的瞌睡突然征服了他。他的手滑过身上，他还穿着衣服呢；身上只盖了一条棉被。他倾听。什么东西落在地上，这是那本他方才读过的书。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黑得很，但还不是伸手不见五指；透过卧室开着的门射进微弱的光线，那是暴风雨之夜的闪光。他听见远处呼啸的风声。这时候他辨认出黑暗中的一个书架和一把椅子，也看见了桌子的棱角，在桌子上，他很费劲才看出那把手枪还在上面。他突然感到吹来一阵风，卧室里有一扇窗开合了一下，然后卧室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此后老人立即听到走廊里传来轻轻的喀嗒一声。他明白，有人打开大门，闯进了走廊里，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一阵风。贝尔拉赫站起来，打开了落地灯。

他拿起手枪，拉开保险栓。与此同时，另一个人走在走廊里也开了灯。贝尔拉赫通过半开的房门看见了开亮的灯，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看来，陌生人的这一举动毫无意义。等他明白过来，已经为时过晚。他看到一条胳膊和一只手的侧部，那手握住了灯泡，然后一朵蓝色火花一闪，全黑了：陌生人拔出灯泡，制造了一次短路。贝尔拉赫站在一片漆黑之中，另一个人已准备好战斗，并且提出了条件：贝尔拉赫必须在黑暗中进行斗争。老人紧握手枪，小心地打开通向卧室的门。他走进卧室。透过窗户射入的光线十分微弱，起初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当眼睛逐渐习惯时，光线增强了。贝尔拉赫靠立在床铺和窗户之间的墙前，窗户是临河的；另一扇窗在他的右边，开向邻居的房屋。他就这样站在很难透视的阴影之中，不可避免时，他能够加害于人，然而他希望，他的不可见性可以避免这样做。通向书房的门在窗户的微弱光线之中。他一定看见了穿越房间的陌生人的轮廓。书房里亮起了一支手电筒的细微的光线，探索地滑过书籍封脊，然后是地板，再是沙发，最后是书桌。蛇形刀躺在光线之下。贝尔拉赫透过开着的门又看见了这只手，手上戴着棕色皮手套，试探地在桌上摸索，最后握住了蛇形刀的把手。贝尔拉赫举起手枪，瞄准了。手电筒熄灭了。老人徒然地重新让手枪垂下来，等待着。他从自己的位置望着窗外，想象着永不止息地流动的河水如何一片深黑，那一边是高耸的城市，教堂像一支利箭刺向天空，上面是浮动的云彩。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来杀他的敌人。他的眼睛盯着房门的模糊剪影。他等待着。周围一片寂静，毫无生气。走廊里的钟打了三下。他倾听着。他听见远处传来时钟轻轻的嘀嗒声。不知道哪里一辆汽车的喇叭鸣响了，很快开过去了。是从酒吧间回家的人。一度他相信自己听见了呼吸声，然而马上知道搞错了。他就这么站在那里，在他寓所的不知何处站着另一个人，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是黑夜，有耐性的、残酷的黑夜，在它的漆黑的外套下藏匿着那条致人死命的蛇，那把搜索着他的心的刀子。老人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站着，手里紧握着武器，几乎没有感到冰凉的汗水流过他的脊背。他不再想其

它任何事，不再想加斯特曼，不再想路兹，也不再想疾病，那日复一日吞噬着他的躯体的疾病，他只有一个念头，有人要毁坏生命，现在他正在保卫的生命，他多么渴望活下去，只是活下去。他现在仅有一只眼睛去探测黑夜，只有一只耳朵去检验最细弱的声音，只有一只手正紧握着武器的冰冷的金属。他终于感到，有杀人者在身边，和自己过去想象的全然不同。他感到脸颊上一阵不明显的凉风，是一种轻微的空气流通。一段时间他不能解释，后来才推测出是从卧室通向餐厅的门打开了。陌生人再次打乱了他的考虑，这人绕道侵入了卧室，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一无阻挡，手里捏着那把蛇形刀。贝尔拉赫现在明白，战斗开始了，他必须首先采取行动，他，一个病危的老人，为了生命而战斗，这条生命只能再活一年，还得看一切是否顺利，还要看洪格尔托贝尔手术是否无懈可击。贝尔拉赫举起手枪对准临阿尔河水的窗口。于是他射击了，接着又是一枪，三次射击一连串迅速而准确地打穿了玻璃落进河水，于是他让自己瘫了下来。什么东西嗖地飞过他的头上，正是那把刀，有弹性地插入了墙中。但是老人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其它的窗子亮了起来，隔壁房子里的邻人们都打开窗子往外探出身子，吓得要死，昏乱地瞪视着黑夜。贝尔拉赫站起身子。邻居家的灯光照亮了卧室，他还模糊地看见一个人影在餐室门边，然后房门立即碰上了，随着通往书房的门吹来一阵风，而后是连接餐室的门，砰砰地一声接着一声关上了，震得窗子也咔咔作响，随即是一片静寂。邻家的人们还一直瞪视着黑夜。老人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手里仍旧捏着那把枪。他站着，纹丝不动，似乎他不再觉察到时间。人们都缩了回去，灯光熄灭了。贝尔拉赫站在墙边，重新在黑暗之中，同最初一样，孤独一人在屋子里。

## 十七

半小时后他跑到走廊里，寻找他的手电筒。他打电话给钱茨请他来一次，然后用一根新的保险丝换下断裂的那根，电灯又亮了。贝尔拉赫坐在自己的靠背椅上倾听着夜里的动静。外面开来一辆汽车，猝然煞住了。屋子的门重又打开，他又听见一阵脚步声。钱茨走进了房间。

“有人想杀死我，”探长说。钱茨的脸色灰白。他没有戴帽子，头发纷乱地披在额头，厚大衣下露出了宽大的睡裤。他们一起走进卧室。钱茨从墙上拔下刀子，非常费劲，因为刀子插进木头很深。

“就用这个？”他问。

“就用这个，钱茨。”

青年警察查看着破碎的玻璃窗。“您朝窗子开枪了吗？”他诧异地问。贝尔拉赫讲了全部经过。“您做了您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对方喃喃地说。

他们来到走廊里，钱茨从地上捡起了那只电灯泡。

“真狡猾，”他不无敬佩地说，又把它扔到一边。然后他们又回进书房。老人在长沙发上躺平身体，拉起被子盖在身上，他躺着，无依无靠的，突然衰老不堪而且好像完全垮了。钱茨手里始终握着那把蛇形刀。他问：“那么您没有认清那个撬门贼？”

“没有。他很谨慎，而且很快溜掉了。我只是有一眼看见他戴着棕色的皮手套。”

“这就太少了。”

“这等于零。但是我即使没有看见他，也听不见他的呼吸，我知道谁曾在这里。我知道，我知道。”

老人讲这一切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钱茨手里掂量着刀子，眼光却瞧着躺卧的灰色躯体，瞧着这个衰老、疲乏的人，瞧着老人的双手，它们放在脆弱的身体边上就像凋萎的花朵落在尸体旁边。然后他瞧见了躺着的人的目光。平静的、莫测高深而清澈的正是凝视着他的贝尔拉赫的眼睛。钱茨把蛇形刀放到书桌上。

“明天您一定得去葛林特尔森林，您病了。也许您不想去？也可能到高山上去对您不合适。那边已是严冬了。”

“不，我要去的。”

“那么您一定得再睡一忽儿。要我守在您身边吗？”

“不用了。你去吧，钱茨。”探长说。

“晚安，”钱茨说，慢慢向外走去。老人没有答话，好像已经睡着了。钱茨打开大门，走到外面，重新关好门。他缓慢地走过通向街道的少数几步路。也关上了原来开着的花园门。但是他又朝屋子回转身来。现在仍然是漆黑的夜。一切东西都消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包括附近的房屋。只有远远的高处亮着一盏路灯，是阴郁的昏暗中的一颗失落了的星星，充满了哀伤，充满了河水的潺潺声。钱茨站在那里，突然轻轻诅咒了一声。他的脚重又踢开花园门，坚决地穿过花园小径迈向屋子大门，他走着的正是他曾一度退出的路。他握住把手往下压。可是大门现在已经锁上了。

贝尔拉赫六点钟起身，丝毫没有入眠。这是一个星期天。老人盥洗过，换了衣服。于是他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打算在火车餐车里吃早饭。他

拿起暖和的冬大衣，离开寓所，走到外面灰色的清晨中，没有携带行李衣箱。天空很晴朗。一个偷懒的大学生游荡过他身边，发出啤酒臭味，向他问好。这是一个吹牛大王，贝尔拉赫想，已经第二次从毕业考试中给刷下来了，可怜的家伙。人们就是这样开始酗酒的。出租汽车开过来，煞住了。这是一辆大型的美国汽车。司机把大衣领子高高竖着，贝尔拉赫看不见他的眼睛。司机打开汽车门。

“火车站，”贝尔拉赫说着就上了车。汽车发动了。

“怎么样，”他身边一个声音说，“你好吗？你睡得好吗？”

贝尔拉赫转过头去。车厢另一角里坐着加斯特曼。他穿一件发亮的雨衣，交叉着双臂。双手戴着一副棕色的皮手套。他坐在那里像一个诙谐的老农民。前座的司机朝后面转过脸来，狞笑着。衣领现在不再高高翻起了，这正是加斯特曼的仆人之一。

贝尔拉赫明白自己落进了一个圈套。

“你又要我怎么样？”老人问。

“你永远追踪着我。你去过作家那里，”角落里的人说，声音里带着威胁。

“这是我的职务。”

另一个人的眼睛盯着他：“凡是和我打过交道的，每一个人都丧了命，贝尔拉赫。”

前座的人像魔鬼似的把车驶上阿哥尔斯塔顿。

“我还活着。而我一直和你打着交道，”探长心平气和地回答。两个人都沉默了。

司机以极快的速度驶向维多利亚广场。一个老人一跛一跛地穿过马路，差一点儿被撞倒。

“小心一点，”贝尔拉赫气愤地说。

“再快些，”加斯特曼尖声叫嚷，嘲讽地审视着老人。“我喜欢机器的高速度。”

老探长冻得发抖。他不爱空荡荡的空间。他们的汽车发疯似的驶上一座桥梁，超过一辆电车，越过离桥面很深银带般的河流火箭似的直奔城市，城市向他们敞开着欢迎的大门。街道上尚荒凉无人，城市上空透明得像玻璃。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场游戏的好。现在承认败局还为时不晚，”加斯特曼说，一边装满自己的烟斗。

老人瞧着他们正在穿越由绿叶形成的幽暗的拱顶，看见站在朗格书店门前的两个警察的朦胧形象。

是盖斯布勒和楚姆斯特格，他想，然后又想道：我还是得买一套冯塔纳的集子。

“我们的游戏，”他最后答复说，“我们不能够放弃。你在土耳其的那个晚上欠下了债，因为是你挑起了竞赛，加斯特曼，而我，我是接受了挑战。”

他们驶过联邦大厦。

“你还一直相信是我杀了施密特？”另一个人问。

“我连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过，”老人回答，冷冷地看着对方点燃他的烟斗，接下去讲道：“过去你作恶犯罪，我未能提出犯罪的证据，现在你没有

犯这个罪，我却要提出证据。”

加斯特曼审视地瞧着探长。

“这种可能性我倒是一直没有考虑过，”他说，“我必须加以提防。”

探长沉默无语。

“也许你是比我所想象的更为危险的人物，老家伙，”加斯特曼在他的角落里沉思地说。

汽车停住了。他们已经到达车站。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讲话，贝尔拉赫，”加斯特曼说，“下一次我将杀死你，真的，倘若你能从手术中复原的话。”

“你错了，”贝尔拉赫说，站在晨曦中的广场上，衰老而且冻得发僵。

“你不可能杀死我。我是唯一认识你的人，我也是唯一能够审判你的人。我现在审判你，加斯特曼，我现在判你死刑。你将不会活过今天。我选中的刽子手今天就要来找你。他将杀死你，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加斯特曼吓了一跳，吃惊地瞪视着老人，而他已经走进车站，双手插在大衣里，没有回转身，一直走进了幽暗的建筑物，车站里已渐渐充满了人。

“你这笨蛋！”加斯特曼突然朝探长身后大声叫喊，如此高声，以致一些过路人转过了身子。“你这笨蛋！”然而贝尔拉赫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逐渐明亮的白天十分晴朗，太阳像一只毫无瑕疵的圆球，给万物投射下严酷而长长的影子，太阳越升越高，影子便稍稍缩短了。城市就在这里，像一只白色的贝壳，吮吸光线，咽入自己的各条街道，为了夜晚又重新喷吐出万千灯光。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物，永远不断地生育新人，又让他们腐败，把他们埋葬。早晨永远是光辉灿烂的，好似消逝的钟声中一面闪光的盾牌。钱茨在等待一个人，从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他脸色苍白，他已经等待了一个钟点。他不安地在教堂前的林荫道上来回走动，又抬头望望喷水池上的野兽的怪脸，它们都凝视着铺在阳光下的石板路面。最后大门打开了。人群潮水般涌出来，是路德教士在传道。但是他立刻看见了白色的雨衣。安娜朝他走来。她说，她很高兴看见他，向他伸出了手。他们往上走向凯斯勒街，走进了喧嚷的教堂人群之中，被年老和年轻的人们所包围，这儿是一个教授，那儿是一个节日打扮的厨娘，那边是两个大学生带着一个姑娘，有几十个公务人员和教员，每个人都干干净净，每个人都修饰整齐，每个人都饿了，每个人都想美美地大吃一顿。他们来到卡齐诺广场，穿过广场后，往下走进了马齐利街。他们在桥上站住了。“安娜小姐，”钱茨说，“今天我将捕获谋杀乌尔里希的人。”

“那么您已经知道谁是杀人犯啦？”她惊讶地问。

他注视她。她站在他面前，苍白而娇小。“我相信自己是知道的，”他说，“要是我捕获了他，您能接受我，”他略带迟疑地问，“就像从前接受您已故的爱人那样吗？”

安娜没有立刻回答。她把自己的大衣拉得更紧些，好像是冻僵了。一阵微风把她的金黄头发吹得纷乱，但是她终于说道：“我们就这样约定吧。”他们握了握手，安娜走向对岸。他凝视她的背影。她的白外衣在白桦树干中间闪光，在散步的游人间时隐时现，最后消失了。随后他走向停放着他的汽车的火车站。他驶向里格尔兹。当他抵达时已近正午；因为他开得很慢，有时候还停车休息，到田野里去抽支烟，又重新回转汽车，继续开车。他在里格尔兹车站前停住汽车，走上登赴教堂的台阶。他开始平静下来。湖水一片深蓝，葡萄藤已经落叶，露出松软的棕色土地。但是钱茨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关心。他不中断地以同等速度向上走，没有转过身子，也没有休息一回。道路陡峭地往上升，镶着白色围墙的葡萄园一座接一座落在后面。钱茨笔直地越走越高，平静地、缓慢地、毫不受迷惑，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偶尔一只蜥蜴挡住了他的去路，鹰隼高高飞翔，大地在太阳的烈焰下颤抖，真像是夏天一般；他不停顿地往上走。片刻后他把葡萄园抛在后面，走进了树林里，凉快多了。白色的汝拉山岩在树干间闪烁。他始终往上走，始终迈着同样的步伐，始终在同样连续不断的道路上向前走，他走进了田野里。这是耕地和牧场；道路上升得较平缓了。他走过一座长方形的墓园，灰色的围墙环绕四周，墓园门完全敞开着。穿黑色丧服的妇女们在路上走动，一个驼背老头站在那里，瞧着这位过路人的背影，他始终继续朝前走，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他到达普莱勒，经过了“大熊”旅馆，转向拉姆波因走去。高原上风平树静，天空中澄清无雾。周围景色，就是最远处的，也显得特别清晰。只有夏塞勒山的山脊为白雪所覆盖，此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明亮的褐色，点缀着白色的围墙和红屋顶，镶上耕地的黑边。钱茨以同等速度继续向前走；太阳

照着他的后背，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前面。道路开始下降，他朝一座锯木场走去，现在太阳在他旁边了。他不断向前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只有一个愿望驱使着他，只有一种欲望控制了他。远处有一只狗在狂吠，接着跑了过来嗅嗅这个恒久不变地向前移动的人，又重新跑开了。钱茨继续向前走，始终沿着街道右边，一步接着另一步，既不慢些，也不快些，朝着那所房子走去，它现在已显现在田野的一片棕色之中，周围环绕着光秃秃的白杨树。钱茨离开道路，穿越田地。他的靴子踏进了一片尚未开垦的耕地的松软泥土里，他继续向前走。于是他到达了大门口。大门敞开着，钱茨走了进去。庭院里停着一辆美国汽车，钱茨不去管它。他走向房子的门口。这扇门也开着。钱茨走进前室，打开第二道门，便走进了一间专门招待客人的大厅。钱茨站住不动，耀眼的光芒透过窗子向他射来。在他面前，不到五步距离，站着加斯特曼，在他两边是他的巨人般的仆人，一动也不动，充满了威胁，这是两个屠夫。

三个人全穿着大衣，身边堆着箱子，三个人都已作好出门的准备。钱茨站着不动。“那么这个人就是你啦，”加斯特曼说，略带惊异地看着警察的平静而苍白的脸和他身后敞开的房门。然后他开始大笑：“老头子的妙计原来如此！不愚蠢，完全和绝对不愚蠢！”加斯特曼的眼睛睁得老大，闪烁着一种魔鬼般的笑意。

两个屠夫中的一个平静地，没有一句话，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拔出手枪射击了。钱茨感到左肩上受了一下打击，他把右手从衣袋里拔出来，身子闪到一边。然后朝那消逝着加斯特曼笑声的、空荡荡无穷尽的空间连放了三枪。

接到钱茨电话通知后，夏乃尔急急忙忙从拉姆波因赶到这里，从特万来了克莱宁，从比尔出动了紧急警察队。他们看见血淋淋的钱茨在三个死人中间，又有一枪打中了他的左下臂。战斗必定极为短促，但是三个已死者每一个人都是开过枪的。每个人都有一把手枪，仆人之一还把枪紧紧攥在手里。在夏乃尔到达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事，钱茨已不能再知道了。当诺伊维勒的医生给他包扎时，他曾昏厥两次；但是伤口验明并无危险。

片刻之后，村民、农民、工人和妇女们都来了。庭院里挤满了人，警察不得不实行封锁；一个姑娘硬是冲进客厅，高声哭喊着扑到加斯特曼身上。她就是女厨师，夏乃尔的未婚妻。他站在一边气得满脸通红。接着人们穿过往后退让的农民把钱茨抬到汽车里。

“三个人全躺在那里，”路兹第二天早晨指指已死的人说，但他的声音听来毫无胜利的喜悦，却是悲哀而疲倦的。

冯·施文迪愕然地点着头。上校是以当事人的委托律师身份和路兹同车到达比尔的。他们走进了躺着死人的房间。透过一扇小小的有栏杆的窗户射入一道倾斜的光线。两个人穿着大衣站在那里都冻僵了。路兹双眼布满红丝。他整整一个晚上都忙于查阅加斯特曼的笔记本，全是难以辨认的速记文件。

路兹把双手深深插进衣袋里。“我们人类由于互相的恐惧建立了国家，冯·施文迪，”他又低声继续说，“我们周围安插了各种形式的护卫者，警察、军队、公开的布告，但是这一切又有有什么用呢？”路兹的脸扭歪了，眼睛鼓出来，朝包围着他的冰冷而悲惨的房间发出沉重而颤动的笑声。“一个大国以蠢人为头子，国会议员，一个加斯特曼把我们搞垮了，我们的链条折断了，前哨被绕过了。”

冯·施文迪考虑到，最好还是请法官到出事地点来一次，为什么必须这样，他也说不明白。“我们周围一切可能利用的人都被无耻地利用了，”他最后说，“痛苦啊，真令人痛苦啊。”

“没有人想象到这种结果，”路兹安慰他说。

“那么施密特呢？”国会议员问，高兴起来，因为想到了一个题目。

“我们在加斯特曼家找到一只属于施密特的文书夹。其中包括关于加斯特曼生平的证据和关于他犯罪的怀疑。施密特试图捕获加斯特曼。他做这一切完全是个人行动。一个大错误。他已经自食恶果了；因为事实证明施密特正是加斯特曼派人杀害的：杀害施密特的凶器正是仆人之一向钱茨射击时所用的那把手枪。查验武器立即证实了这一点。连谋杀的原因也很清楚：加斯特曼害怕施密特揭发自己。施密特本该信赖我们，但是他还年轻，功名心又切。”

贝尔拉赫走进死人的房间。路兹看见老人立即忧郁起来，双手重又深深地插进了口袋里。“怎么样，探长？”他说，一条腿交叉到另一条腿前面，“我们在这里碰头了很好。您及时从休假地回来，而我同我的国会议员赶来也不晚。死人都拾掇完毕。我们也争论得够了，贝尔拉赫，我赞成用各种特种装备，最好用原子弹，来武装一批挑选出来的警察，而您，探长，您为人心肠太软，是一种老好人类型的宪兵。埋葬我们的争吵吧。我们两个人都错了，钱茨干脆用他的手枪完全违背常规地反驳了我们。我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事实上他是正当自卫，我们必须相信他，我们也能够相信他。他

获得了战利品，被击毙者正如俗语所说是罪有应得，若说还有什么事应该做，那就是对付正在多管闲事到处嗅我们踪迹的外国外交家们。我们必须奖励钱茨；但是我们为什么像驴子一样站在这里，我们两个人？施密特案件已经结束了。”

路兹垂下头，对老人谜样的沉默迷惑不解，几乎要垮台，接着突然重又成为一个准确、精明的官员，咳嗽了几声，当他注意到始终在一旁踌躇的冯·施文迪时，脸红了；于是他走了，由上校陪着，缓慢地步入某一条走廊的黑暗之中，让贝尔拉赫一个人留在后面。尸体躺在担架上用黑布罩着。阴冷、灰暗的墙头上石灰剥落着。贝尔拉赫走向中间的担架，揭起遮尸布。正是加斯特曼。贝尔拉赫微微弯下身子，左手还提着黑布。他沉默地向下凝视着死人的死灰面孔，瞧着嘴唇仍然嬉笑的线条，只是眼窝更深了，在这两个深渊里再也不会潜藏任何恐怖了。猎人和野兽——它已经完结了躺在他脚下——就这样最后一次见了面。贝尔拉赫意识到两个人的生活都到了尽头，就再一次回顾过去的年代，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些穿越迷宫的无数秘密通道的道路上，这就是两个人的生平。现在他们之间除去无可测度的死亡外别无他物，一个法官，他的判决就是沉默。贝尔拉赫一直弯腰站着，小屋子里灰暗的光线停留在他的脸和他的双手上，也环绕着死人，这对两人都合适，对两人都有用，它调解了两个人的分歧。死亡的沉默深深地潜入他的内心，但是没有像带给另一个人那样给他带来平静。死人总是有理的。贝尔拉赫又慢慢地遮住加斯特曼的脸。这是最后一面；他的敌人从此属于坟墓了。多年来只有一种思想控制了他：去消灭这个人，现在这个人已经躺在这间阴冷、灰暗房间里他的脚下了，剥落的石灰像轻飘飘、稀朗朗的雪花纷纷覆盖了他；老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只剩下慢慢地盖上尸体，只剩下祈求遗忘，这是能够安慰一颗被焚毁的心的唯一恩典。

就在这同一天，八点钟时，钱茨走进了老人在阿尔顿堡的家里，正是老人迫切要求他到达的时刻。一个穿白围裙的年轻女仆出乎他意外地替他开了门，当他走进走廊时，他听见厨房里传出流水和烹饪食物的沸腾声音、食具的丁当声。女仆帮他脱下大衣。他的左臂吊在绷带里；尽管如此他还是驾驶汽车来的。姑娘替他打开了通向餐室的门，钱茨站在那里呆住了：餐桌是按两个人的晚宴布置起来的，在点燃的蜡烛光中，贝尔拉赫坐在桌子尽头一张安乐椅中，为安静的火焰所映红，一幅不可动摇的平静景象。

“请坐，钱茨，”老人朝他的客人喊道，指指另一张安乐椅，它也移到了桌子旁边。钱茨木然坐下来。

“我不知道我是来吃饭的，”他最后说。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你的胜利，”老人平静地回答，把烛台略略推往旁边，这样他们就能完全看见对方的脸了。然后他拍了一下双手。门打开了，一个庄重的、胖胖的妇女端来一只盘子，沙丁鱼、虾以及用黄瓜、番茄、豌豆拌的色拉一直堆到了盘子边缘，上面点缀着浓肉冻和鸡蛋，中间是冷肉片、鸡肉和斑鱒鱼。老人每种都拨了一些。钱茨在一旁看着，这对于有病的胃该是多沉重的负担啊，他在惊异之中只给自己拨了一点点土豆色拉。

“我们喝些什么呢？”贝尔拉赫问，“里格尔兹酒吗？”

“好的，里格尔兹酒，”钱茨做梦似地回答。女仆走来，斟了酒。贝尔拉赫开始吃起来，伴着面包吞下了斑鱒鱼、沙丁鱼、红色的虾肉、冷肉片、色拉、浓肉冻和冷烤肉，他拍拍手，还要装一盘。钱茨看得目瞪口呆，他还没有吃完他的土豆色拉。贝尔拉赫的酒杯已斟满了三次。

“现在来面饼和红璠恩堡酒，”他叫喊道。盘子换过了，贝尔拉赫在盘子里放了三个面饼，里面满填着鹅肝、猎肉和松露。

“您是有病的啊，”钱茨最后迟疑地说。

“今天不管了，钱茨，今天不管了。我要庆祝我终于抓到了施密特的谋杀犯！”

他喝完第二杯红酒，开始吃第三只面饼，无休止地吃着，贪馋地咽下这个世界上的食物，在颞骨中间把它们碾磨碎，像是一个永远填不饱的妖怪。墙上映出有他本人二倍大的他躯体的凶猛黑影的轮廓，胳臂的有力动作，垂下的脑袋，恰似一个狂欢的黑人酋长在跳舞。钱茨惊愕万分地瞧着病入膏肓者这幕令人恐怖的表演。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吃，一小口也不送进嘴里，嘴唇也不曾碰过玻璃杯。贝尔拉赫不断地要肉排、米饭、炸土豆和蔬菜色拉，还要了香槟酒。钱茨发抖了。

“您骗人，”他喘息着说，“您没有生病！”

另一个人没有立即回答。他先是笑笑，然后就忙于咀嚼色拉，每一块都细细品味。钱茨不敢再第二次问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是的，钱茨，”贝尔拉赫最后说，他的眼睛粗野的闪烁着，“我是装假了。我没有生病。”于是他把一块嫩牛肉塞进嘴巴，继续吃着，不间断地、无餍足地吃着。

这时钱茨明白自己陷入了一个狡猾的圈套，大门已经在他身后喀嗒锁上了。冷汗从他毛孔里沁出来。恐怖以越来越强有力的魔爪攫住了他。对自己的境况认识得太晚了，已经无可挽救了。

“您已经知道了，探长，”他轻轻地说。

“是的，钱茨，我知道了，”贝尔拉赫坚决而平静地回答，却丝毫没有提高声音，似乎他在说什么无关重要的事情。“你就是谋杀施密特的人。”随后他拿起那杯香槟酒，一饮而尽。

“我一直在揣测您知道这件事，”另一个人几乎听不见声音地叹息着说。

老人的脸容纹丝不动。好似他除了吃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毫不留情地又第二回满满堆了一盘子米饭，浇上了鲜汁，尖顶上是一块嫩牛排。钱茨再度努力对付这个饕餮者以挽救自己。

“人们查出子弹是属于仆人手里那把手枪的，”他执拗地肯定说。但是他的声音却沮丧而绝望。

在贝尔拉赫眯起的眼睛里闪出轻视的眼光。“胡说，钱茨。你知道得最清楚，那是你的手枪，当人们找到它的时候，它捏在仆人的手里。是你本人把它塞进死人的手里去的。仅仅由于发现加斯特曼是一个罪犯，才阻碍了人们看穿你的把戏。”

“您绝不可能拿到我的证据，”钱茨绝望地反抗道。

老人在椅子上坐直身体，不再是病态而即将崩溃的模样，而是强壮而冷静，一个超凡而卓越的人物，一只正在戏弄自己牺牲品的猛虎，他喝完了杯里剩下的香槟酒。接着吩咐不停顿地穿梭来去的女仆端来干酪；他搭配着吃萝卜、盐渍小黄瓜和青葱。他一直不断地给自己拿新的食物，似乎他只有这一回，最后一回消费大地供养人类的物品了。

“难道你始终没有明白，钱茨，”他最后说，“你自己的行为早就给我提供了证据？凶器是你的手枪；你为了救我而开枪射击加斯特曼那条狗，那一颗子弹证实，它和杀害施密特的子弹出自同一武器：你的手枪。你自己提供了我所需要的线索。你救我的命时，你自己背叛了自己。”

“当我救您性命的时候！怪不得我找不到那头猛兽，”钱茨机械地回答说，“您知道加斯特曼养了一条嗜血的狗？”

“是的。我把我的左胳膊用布缠了起来。”

“因此您连那一次也是设了圈套，”谋杀者有气无力地说道。

“正是如此。但是你给我提供的第一次证据是你星期五驾车带我经过英斯驶往里格尔兹，给我演了那出‘蓝色的凯龙’喜剧的时候。施密特星期三经过楚里柯芬，这我知道，因为那天夜里他把车停在罗斯的停车场上。”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钱茨问。

“很简单，我只是打了电话而已。那天晚上有谁驾车经过英斯和艾尔拉赫，就是凶手：是你，钱茨。你从葛林特尔森林出来。公寓主人也有一辆同样的蓝色梅尔西特斯汽车。你盯着施密特已有几星期了，你监视他走的每一步路，你妒忌他的才能，他的成就，他的教养，以及他的姑娘。你知道他正和加斯特曼打交道，你甚至知道，他什么时候访问加斯特曼，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由于偶然的机会有，放在施密特书桌上装着材料的文书夹落到了你的手里。你决定接管这个案件，而且杀死施密特，以便有朝一日占有他的全部成果。你考虑得很正确，对你来说，把谋杀罪名加到加斯特曼头上是轻而易举的。当你在葛林特尔森林看见那辆蓝色梅尔西特斯汽车时，你知道了你该怎么做。你租借这辆汽车从那天晚上直到星期四。我去葛林特尔森林就为了证实这件事。以后的事就很简单：你驾车经过里格尔兹去谢纳尔茨，让汽车停在特万峡谷森林，你越过森林，从近道穿过山谷到达特万和拉姆波因连结的

道路。你在岩壁下静候施密特，他认出了你，吃惊地刹住车。他打开车门，那时你就杀害了他。这是你自己向我描述的。如今你已如你所愿地占有了他的成果、他的位置、他的汽车以及他的姑娘。”

钱茨倾听着这位毫不留情的弈棋者，他已向自己“将军”，现在这场令人战栗的宴会结束了。蜡烛燃烧得很不安静，闪烁地照着两个男人的脸，影子凝缩了。

死一般的沉默支配着这个漆黑的洞穴，女仆已不再进来。

老人现在不动弹地坐着，似乎不再呼吸，闪烁的烛光不断地以新的波纹环绕着他，红色的火焰似乎碎裂了他的额头和灵魂中的冰块。“您戏弄了我，”钱茨慢慢地说。

“我是戏弄了你，”贝尔拉赫用一种令人畏惧的严肃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你杀了我的施密特，我不得不抓住你。”

“为了去杀加斯特曼，”钱茨补充说，这会儿他理解了全部事实真相。

“你说的正是。我半辈子都在追踪加斯特曼。而施密特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让他去追猎这个披了人皮的魔鬼，一只高贵动物去追猎一只凶恶的野兽。但是接着你就来了，钱茨，带着你的可笑的、犯罪的野心，破坏了我的唯一的机会。这当儿我抓住了你，你，这个杀人犯，我把你转变成为我的最可怕的武器，因为绝望逼着你，一个杀人犯必须找到另一个杀人犯做替身。我把我的目的变成了你的目的。”

“这对我说来是地狱，”钱茨说。

“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地狱，”老人用一种可怕的平静接下去说，“冯·施文迪的插一手把你逼到了顶点，你必须想尽办法揭露加斯特曼是杀人者，任何对于加斯特曼线索的偏离，都能引到你的身上。只有施密特的文书夹还能挽救你。你知道它在我手中，却不知道加斯特曼已把它从我这里拿走了。因而你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早晨来袭击我。我要去葛林特尔森林，总算安慰了你。”

“您知道我就是袭击你的人？”钱茨几乎没有声音地问。

“从第一秒钟就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只存在一个目的，就是把你逼到绝望的顶点，而当你绝望之极的时候，你必然去拉姆波因，为了无论如何要了结这案件。”

“加斯特曼的仆人之一最早开的枪，”钱茨说。

“星期天早晨我已告诉加斯特曼，我给他派去一个杀他的人。”

钱茨晕眩了。他浑身冰冷。“您让我和加斯特曼像野兽一样搏斗！”

“野兽对野兽，”从安乐椅那边传来另一个人无情的声音。

“于是你成为法官，而我是刽子手，”另一个人喘息着说。

“正是如此，”老人回答说。

“而我，我仅仅是执行了你的意志，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我现在已是一个罪犯，一个受追捕的人！”

钱茨站起身，用不受妨碍的右手猛敲着桌面。只有一支蜡烛还亮着。钱茨用燃烧的眼睛在黑暗中辨认老人的轮廓，但是只能看见一个不实在的黑影。他作了一个无把握的、试探性的动作把手伸进外衣口袋。

“算了吧，”他听见老人说，“毫无意思，路兹知道你在我这里，而且妇女们现在还都在屋子里呢。”

“是的，这毫无意思，”钱茨轻声回答。

“施密特案件已经了结，”老人的声音穿透黑暗的房间传来。“我不会告发你。但是走开吧！不管去哪儿都行！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我判决了一个已经够了。走吧！走吧！”

钱茨垂下头，慢慢走到外面，消失在黑夜中，大门关上了，稍过片刻一辆汽车从门口驶过，蜡烛熄灭了，熄灭之前还最后一次以刺目的火光照亮了双目紧闭的老人。

## 二十一

贝尔拉赫整夜坐在安乐椅中，没有站起身子，没有动弹一回。那巨大的、如饥似渴的生命力，曾经一度在他身上有力地迸发的，现在崩溃了，行将熄灭了。老人曾大胆地演了一场戏，但是有一点他欺骗了钱茨。当第二天一早上天刚破晓时，路兹冲进屋里来，昏乱地说，钱茨驾车在里格尔兹和特万之间和火车相撞死了，他发现老探长已经病危。老人困难地让他通知洪格尔托贝尓，现在是星期二，可以给他动手术了。

“还有一年，”路兹听见目光瞪视着窗外玻璃似的晨光的老人说，“还有一年。”

## 嫌疑

### 第一部

## 嫌疑

1948年11月初贝尔拉赫住进了沙来姆医院。从医院里可以眺望位于伯尔尼老市区的议会大楼。他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以致急待进行的手术又延缓两周。手术很艰巨，却也很顺利，然而验血的结果却是无可挽救的重症，正是人们所预料的。老探长的情况很糟糕。他的上司预审法官路兹已经两度认为他难逃一死，可是又两度产生了新的希望，最后，临近圣诞节时病情开始大大好转。节日时病人确实还躺在床上，可是二十七号那天，正好是星期一，老人已经很有精神，自己拿起1945年的美国旧《生活》杂志来看了。

“真是禽兽，萨穆埃尔，”他对刚刚走进暮色中的病房里的洪格尔托贝尔博士说，医生正来进行例行探视。“真是禽兽，”老人边说边把杂志递给大夫。“你是大夫，你能够想象出当时情况。请看看这幅斯图霍夫集中营的照片！集中营的内莱大夫不注射麻醉剂就给一个俘虏作腹部手术，同时还让别人在旁边摄影。”

纳粹分子常常会这么干的，医生回答说，眼睛看着杂志上的图片，突然脸色发白，下意识地想把杂志撂在一边。

“你怎么啦？”病人惊讶地询问。

洪格尔托贝尔没有立即答复。他把打开的杂志放在贝尔拉赫的床上，伸手从白罩衫上面的口袋里掏出角质眼镜——探长观察到他戴眼镜时双手微微颤抖——然后再度细细看着这幅照片。

“他为什么如此神经质？”贝尔拉赫暗暗思忖。

“胡闹，”洪格尔托贝尔终于气愤地作了结论，把杂志放回桌上，和另几本放在一起。“来吧，把手伸出来。让我们看看脉搏如何。”

房间里静默了片刻。医生很快放开自己朋友的手，看着挂在床上的表格。

“你的情况不错，汉斯。”

“还可以活一年吧？”贝尔拉赫问。

洪格尔托贝尔迟疑了片刻。“目前还不能肯定，”他说。“你必需小心谨慎，要按时来检查身体。”

他一直很小心谨慎的，老人喃喃嘟囔说。

那样就好，洪格尔托贝尔说着，打算告辞。

“再把那本《生活》杂志递给我，”病人好似无所谓地说。洪格尔托贝尔从床头柜上那叠杂志中顺手拿起一本递给他。

“不是这本，”探长说，目光却微带嘲讽地望着大夫：“我要你刚才从我手里拿去的那本。我不会轻易放过一个集中营的。”

洪格尔托贝尔迟疑了一刹那，当他看到贝尔拉赫向他投来审视的目光时，不禁满脸通红。他拿起杂志递给老人，立即快步走出病房，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护士进来了。探长吩咐她把其余的杂志拿走。

“不拿走这本吗？”护士问，用手指指放在贝尔拉赫被子上的杂志。

“不，这本别拿走。”老人回答说。

护士走后，他又重新打量着这幅图片。这个进行残忍实验的医生那张恶

魔般泰然自若的脸的大部分，从鼻子到嘴，都被一只大口罩遮没而看不见。

探长把杂志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交叉双手枕在脑后。他睁大眼睛凝视着黑夜，夜色已渐渐布满整个房间。他没有开灯。

后来护士送来了晚餐。仍然是数量很少的规定饮食：麦片粥，菩提花茶，都是他不喜欢的食品，他吩咐护士搁在一边。老人喝完粥后又灭了灯，重新凝视着黑夜，望着房间里越来越看不清的黑影。

他喜欢凝视透过窗户射入的城市灯火。

当护士进来替老探长收拾房间、安排休息时，他已经睡熟了。

洪格尔托贝尔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来到病房。

贝尔拉赫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被子上是一本打开的杂志。他的眼睛关切地看着大夫。洪格尔托贝尔一眼便望见老人面前放着的是那幅集中营照片。

病人问道：“难道你不肯告诉我，为什么我给你看《生活》上这幅照片时，你突然脸色苍白像一个死人？”

洪格尔托贝尔走到床边，取下表格，同往常一样细细审查一番后又挂回原处。“这是一个可笑的错误，汉斯，”他说，“完全不值一提。”

“你认识这个内莱医生？”贝尔拉赫问话时声音激动得奇怪。

“不，”洪格尔托贝尔回答，“我不认识他。只是他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那么他们的外表肯定十分相像，贝尔拉赫说。

像极了。医生表示同意，又朝照片看了一眼，贝尔拉赫清楚观察到医生又重新显得内心忐忑不安。但是照片上的脸只露出一半。所有的医生在动手术时模样都相似，洪格尔托贝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老人毫不留情地追问：“这只禽兽让你想起了哪一个人？”

“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洪格尔托贝尔回答，“我已经告诉你，肯定是一个误会。”

“然而同时你却可以发誓说，正是他，我猜得对吗，萨穆埃尔？”

嗯，好吧，医生回答。倘若他能够断定照片上正是他所怀疑的人，他当然可以发誓。目前他不愿意去想这类不愉快的事。刚刚动过一次生死攸关的手术，就在翻阅《生活》杂志，恐怕不大合适。片刻后，他却又接着往下说，眼光像中了催眠术似地又重新望着这幅照片，这个医生不可能是他所认识的那一个人，因为那个人战争期间一直呆在智利。因此一切肯定全属误会，这是另外一个人。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喃喃说着。“他什么时候回国的，你认识的那一个不可能是内莱的人？”

“1945年回国的。”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又重新喃喃自语，“难道你不肯告诉我这幅照片让你想起了谁？”

洪格尔托贝尔迟疑不答，这件事使老医生觉得为难。

“倘若我说出他的名字，汉斯，”他终于还是开了口，“你会对这个人产生怀疑的。”

“我已经觉得他有嫌疑啦，”探长回答。

洪格尔托贝尔叹了一口气。“瞧你，汉斯，”他说，“我就怕这样。我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你懂不懂？我是一个老医生，不愿加害于任何无辜的人。”

你的怀疑纯属瞎想。人们不能够仅仅根据一张照片就轻易对某一个人加以怀疑，尤其是这幅照片中的脸露出很少。此外，他当时住在智利，这可是事实。”

他在那里做什么事？探长又插嘴问道。他在圣地亚哥开办一家医院，洪格尔托贝尔回答。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重又喃喃自语。这是一个可怕的重叠韵脚，使人很难对他进行审核。萨穆埃尔说得对，嫌疑往往有点可怕，简直像魔鬼。

“没有什么事比怀疑更能伤害一个人，”他接着往下说，“这一点我很懂，因而也常常诅咒我的职业。人们最好别干这一行。但是目前我们已对某一个人有怀疑，而且是你提供给我的。我很乐意把它奉还给你，我的老朋友，只要你能去掉怀疑。而正是你自己对这一怀疑不能释然于怀。”

洪格尔托贝尔坐到老人床边。他困惑地看着探长。阳光透过窗帘倾斜地射入房内。外面天色晴朗，温暖的冬日常常有这种天气。

“我做不到，”医生最后打破病房的沉寂说，“我做不到。上帝会保佑我的，我不能摆脱自己的怀疑。我非常了解他。我和他同过学，他曾两度担任我的助手。他就是这幅照片上的人。左边太阳穴上的伤疤还在。我认识这个伤疤，是我本人给艾门贝格做的手术。”

洪格尔托贝尔取下鼻梁上的眼镜，放进上衣的右边口袋里，接着又拭去自己额上的汗水。

“艾门贝格？”探长稍待片刻后冷静地追问道，“他叫艾门贝格？”

“我说的就是他，”洪格尔托贝尔不安地回答，“他叫弗里茨·艾门贝格。”

“一个医生？”

“对，是一个医生。”

“如今住在瑞士？”

“他在苏黎世山上开了一家医院，宋纳斯泰医院。”医生答道。“1932年他旅居德国，后来又去了智利。1945年他返回本国，接管了这所医院，这是瑞士最贵族气的医院之一，”他轻声补充说。

“只接待有钱人？”

“只接待大富翁。”

“他是个正派的科学家吗，萨穆埃尔？”探长问。

洪格尔托贝尔犹豫不决。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他说，“他曾经是一个很正派的科学家，但是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始终如一。过去，我们一直对他的工作方法抱有怀疑。我们对他所擅长的内分泌专业所知甚少，如同科学正在征服的一切领域中一样，这一行中也有形形色色的学派，互相竞争。科学家和江湖骗子往往合而为一。人们对此有何办法呢，汉斯？艾门贝格深受病人爱戴，他们信任他就像信任上帝。而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些有钱的病人把疾病也看成一种奢侈品；而没有信任便行不通，至少在内分泌领域里情况如此。他正是靠此起家的，受到尊敬还发了财。我们因而叫他财主……”

洪格尔托贝尔突然停住话头，似乎很后悔自己说出了艾门贝格的译名。

“财主。他怎么得到这么一个绰号的？”贝尔拉赫问。

这所医院继承了许多病人的遗产，说话时洪格尔托贝尔显然有些内疚。如今似乎流行这一套。

“于是他便招致了你们医生们的注意！”探长断定说。

两人都沉默无语。寂静中隐含着一种说不出的让洪格尔托贝尔感觉恐怖的东西。

“请你现在别再去想那些你正想着的东西，”他突然激动地叫嚷说。

“我想的只是你在想的事情。”探长平静地回答。“我们只是愿意弄得确切些。也许我们所想的全盘错误，我们也不必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害怕。只有我们自己的良心也承认我们的思想，我们才能够对事情加以检验，而且当我们不正确时，能够加以克服。我们目前想的是什么东西呢，萨穆埃尔？我们想的是：艾门贝格用他在斯图霍夫集中营里学会的方法强迫自己的病人，让他们馈赠遗产，随即又将他们杀死。”

“不！”洪格尔托贝尔大叫起来，两眼冒火，“不行！”他绝望地瞪着贝尔拉赫。“我们不能这么想，我们不是野兽！”他重新大声叫嚷，并且站起身来，激动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停，从墙壁走到窗户，又从窗户走到床边。

“我的上帝啊！”医生呻吟着说，“没有比今天这一时刻更为可怕的时候了。”

“嫌疑，”老人躺在床上说，立即又毫不容情地重复一遍：“嫌疑！”

洪格尔托贝尔在贝尔拉赫的床边站住，“让我们忘掉这场谈话吧，汉斯，”他说。“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当然，人们往往喜欢玩弄可能性这个游戏。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不要再关心艾门贝格吧。我越看这张照片，就越觉得不像他，这绝不是托辞。他当时在智利而不在斯图霍夫，因此我们的怀疑纯属胡猜。”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喃喃不已，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渴望着一场新的冒险。他伸展了一下身子，又立即一动不动地躺平，并且放松自己，让双手枕在脑后。

“你该去探视病人了，萨穆埃尔，”片刻后他提醒医生说。“他们在等你呢。我希望你不要为此耽搁太久。忘掉我们的谈话，这是上策，我同意你的看法。”

洪格尔托贝尔走到房门边还犹疑地转过脸来朝病人看看，探长却已睡着了。

##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第二天上午七点半洪格尔托贝尔来到病房，发现老人用过早餐后正在悉心阅读一份本地报纸，心里略略有些吃惊。因为医生到得比平日早些，贝尔拉赫按老习惯总在这个时候又重新睡觉，或者至少把双手放在脑后打盹儿。医生还发现探长比往日精神得多，双目中又闪烁着往日那种活泼的生命力。

感觉好不好啊？洪格尔托贝尔询问病人。

他正在闻着早晨的新鲜空气呢，病人的回答让人不可捉摸。

“我今天来得比平日早些，而且此来不单纯为了公事，”洪格尔托贝尔说着走到床边。“我想尽快带些医学方面的报刊给你看。这是《瑞士医学周报》，是法文的，我知道你也懂英文，所以还拿来几期《刺血针》杂志，这是英国有名的医学刊物。”

“我接受你要我对诸如此类东西产生兴趣的一片好意，”贝尔拉赫答复说，眼光却没有从他正在阅读的报纸上移开，“不过我不清楚，这些读物是否适宜于我。你知道我向来和医学无缘。”

洪格尔托贝尔笑着说：“我们给予帮助的人竟说出这等话来！”

“可不是，”贝尔拉赫说，“难道它们能减轻疾病么？”

“报上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看？”洪格尔托贝尔好奇地询问。

“邮票样品。”老人回答。

医生摇摇头：“无论如何你得看看这些杂志，即使你对我们医生一贯采取敷衍态度。我只是想向你证明，我们昨天的谈话全盘错了。汉斯，你是个刑事专家，我相信你会对我们所怀疑的医生连同他的内分泌学说突如其来予以逮捕的。我不懂自己怎么竟会忘记这一情况。要证明艾门贝格当时在圣地亚哥是轻而易举的。他曾在那里的好几份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有英国和美国的医学刊物，文章主要论述内分泌问题，他还因而声名大噪。他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文学才能，文笔幽默而有文采。你瞧，他曾是一个勤奋而扎实的科学家。因而他现在转而追求时髦，真是可惜，倘若允许我发表意见的话。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实在太低级了，来来回回就是学校里那些医学常识。他最后一篇文章还是发表在1945年1月号《刺血针》杂志上的呢，在他返回瑞士的几个月以前。这是一个切实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怀疑全无根据。我向你发誓，我决不再想当什么刑事学家了。照片上的人不可能是艾门贝格，要么这张照片是伪造的。”

“这可能是一份不在现场的证明，”贝尔拉赫说，折叠起手上的报纸。

“你就把杂志留下吧。”

当洪格尔托贝尔十点钟进来作常规探病时，看到老人正躺在床上热心地阅读这些杂志。

看来病人一下子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医生吃惊地说，一面给贝尔拉赫诊脉。

探长表示洪格尔托贝尔方才说得有理，这些文章都寄自智利。

洪格尔托贝尔得意洋洋，感到轻松。“你瞧！我们几乎肯定艾门贝格是一个杀人累累的凶手啦！”

贝尔拉赫却干巴巴地回答说：“人们在这方面的技巧进步得真是神速。时间，我的朋友，仅仅由于时间问题。我不要英国杂志，你就留下这几期瑞士刊物吧。”

“艾门贝格发表在《刺血针》上的文章还是很重要的，汉斯！”洪格尔托贝尔又叮嘱说，他已经深信自己的朋友开始对医学产生兴趣。“这篇文章你一定得读一读。”

艾门贝格发表在瑞士医学周报上的文章是用德语写的，贝尔拉赫带点挖苦的语气答复着。

“那又怎么样呢？”医生问，丝毫不明白答话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在研究他的写作风格，萨穆埃尔，一个医生的风格，他曾经写得文笔流畅生动，如今却生硬笨拙，”老人谨慎地回答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洪格尔托贝尔问，仍然什么也没有觉察，正忙于研究挂在床上的病历表。

“现在就提供他不在现场的证明恐怕还不那么容易。”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医生吃惊地叫嚷说。“你还没有放弃怀疑？”

贝尔拉赫沉思地凝视着自己朋友那张惊惶失措的脸，望着医生那副老迈、高尚、皱纹密布的面容，医生一生中对待自己的病人从未掉以轻心，却并不懂得人类。于是他说：“你还在抽心爱的‘苏门答腊小玫瑰’烟吗，萨穆埃尔？倘若你现在能款待我一支，真是感谢不尽。我喝了这么久乏味的麦片粥，让我抽一支烟该多么舒服啊。”

## 免 职

整个上午都在反复阅读艾门贝格那篇关于胰腺论文的病人，于午饭前接待了自己动手术以来的第一位客人。那是他的“头头”。客人十一点钟踏进病房，有点不自然地在病人床边就座后，大衣也不脱，帽子也拿在手里。贝尔拉赫很清楚他此来用意，而“头头”也很清楚病人的现状。

“怎么样，探长，”路兹先开口说，“还好吧？有一段时期我们可真是担心害怕呢。”

“恢复得很慢，”贝尔拉赫回答，重新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

“你在读什么书？”路兹问，他不愿一下子暴露来意，便尽量转移话题：“噢，贝尔拉赫，那么多医学杂志！”

老人丝毫不显狼狈，只是说，“读起来和侦探小说差不多，”接着又说，“一个人生了病倒可以稍稍开阔自己的眼界，可以观察观察新的领域。”

路兹打听贝尔拉赫根据医生的建议还要卧床多久。

“两个月，”探长答复说，“我还得卧床休息两个月。”

事到如今，不管路兹情愿与否，他都得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年龄不饶人哪，”他好不容易说出一句话来。“年龄决不饶人，探长，你也明白，我们是无计可施的，这是规律。”

“我明白，”病人回答说，脸上不动声色。

“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路兹说。“你必须保养自己，探长，这是最根本的。”

“而且现代刑事研究科学十分发达，人们探寻一个罪犯就像寻找一只贴了标签的果酱瓶那么轻而易举，”老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稍稍纠正路兹方才的话。他很想知道谁接替他的工作。

“雷特立斯贝格，”头头回答说。“他早已是你的副手了。”

贝尔拉赫点头表示赞同。“雷特立斯贝格有五个孩子，对这个工资较高的位置一定很满意，”他说。“从新年开始接任吗？”

“新年后上任，”路兹证实说。

那么从星期五开始，他就任探长啦，贝尔拉赫说。他很高兴自己终于结束公职，不论是土耳其的或者是伯尔尼的公职。他倒不单是由于如今会有充裕时间去阅读莫里哀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这样做当然很美，可是主要原因在于他早已感到这个资产阶级世界不存在真正的秩序了。他对一切案件都已看透。人们统统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在星期天时走进的是哈吉·苏菲亚大教堂，还是伯尔尼大教堂。人们听任大窃贼逍遥法外，却把小偷关进监狱。此外，还存在一大堆不引人注意的案件，仅仅由于它们略略带点美学味道，和那种让人触目惊心的、登上了报纸的谋杀案不同，而人们只要有点想象力，并能精确地加以观察，那么两者的结果完全是一样的。想象力，需要的正是想象力！纯粹由于缺乏想象力，一个泼辣的商人在喝开胃酒和用正餐之间常常为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而犯下罪行，这件事没有人预料得到，那个商人本人更是预料不到，因为这些人全都不具备看透一切的想象力。整个世界就由于松懈马虎而变坏了，也因此而终于完结。像他这么一条老猎狗已不再适宜担任公职了。小人太多，密探太多；对于那些值得追捕、必须追捕的野兽，那些真正的大野兽，他认为国家却像对待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悉心保护着。

这番话使路西乌斯·路兹博士沉下脸来。这种言论使他很难堪，倘若贝

尔拉赫不是既老又病，而且感谢上帝，总算已经退休，自己对如此错误的观点不予以反驳，就未免太不妥当。他硬压下火气，对病人说，十一点半他还要到贫民院管理处开会，不得不告辞了。

贫民院管理处和警察局打交道比和经济部门打交道还要多，这可是有些不正常，探长提醒头头说。路兹十分害怕又听他说出一些令人难堪的话来，幸而贝尔拉赫立即把话题转向别处，路兹才松了口气。探长说，“我现在老了，没用了，你能给我帮个忙吗？”

“当然可以，”路兹答应说。

“你瞧，博士，我想了解一些情况。我有一个私人嗜好，很乐意躺在床上进行刑事犯罪方面的逻辑推理。一只老猫总是不肯放过任何老鼠的。我在一份《生活》画报上看见斯图霍夫集中营一个纳粹党卫军分子内莱医生的照片。你能否打听一下，他是不是还关在集中营里，或者有什么别的情况。自从纳粹党卫军被宣布为犯罪组织以来，侦破这类案件已变成一项国际义务，绝不需要费很多钱的。”

路兹记录下老人所讲的一切情况。

他会派人去打听的，他答应说，老人的古怪脾气使他吃惊。随即便告辞了。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他边说，边握一握探长的手表示告别。“今天晚上我就派人把情况告诉你，你可以尽心尽意按照自己的心愿加以逻辑推理。今天布拉特尔也来了，他想看看你。我在外面汽车里等他。”

接着，高大肥胖的布拉特尔便走进病房，路兹走开了。

“你好，布拉特尔，”贝尔拉赫向警官问好，他经常为他驾驶汽车的，“看见你真高兴。”

布拉特尔说，他也很高兴。“我们少不了你，探长先生，哪儿也少不了你。”

“嗯，布拉特尔，如今是雷特立斯贝格接替我的职务，大家都得换一个调子唱歌，我想象得出的，”老人回答说。

“很遗憾，”警官说，“我本不该说这些话的，但愿你早早恢复健康，连雷特立斯贝格也肯定会很高兴！”

贝尔拉赫问布拉特尔，是否知道马特街上有一家古玩店，店铺里总坐着一个白胡子的犹太人，那个叫法特巴哈的老头子？

布拉特尔点点头：“橱窗里总是陈列着同样几张邮票的那家铺子吧？”

“请你今天下午就到那里去一次，告诉法特巴哈，让他把《格列佛游记》送到沙来姆医院来给我。这是我委托你办的最后一项任务。”

“那本关于小人国和大人国的书么？”警官惊讶地问。

贝尔拉赫笑笑回答说，“你瞧，布拉特尔，我喜欢童话！”

警官感觉笑声里有某种可怕的东西，但是他不敢打听。

## 茅 屋

就在这个星期三傍晚，路兹打来了电话。洪格尔托贝尔恰好坐在他朋友床边，因为过一忽儿要去动手术，便让人送一杯咖啡到病房来。他要稍稍利用这个机会和贝尔拉赫“呆在一起”。电话铃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贝尔拉赫和对方通话后，紧张地倾听着。片刻后他说：“很好，法夫雷，还请你把材料给我送来，”挂断电话后，他告诉医生，“内莱已经死了。”

“感谢上帝，”洪格尔托贝尔高兴得大叫一声。“我们得庆祝一番，”他立即点燃了一支“苏门答腊小玫瑰”香烟，“护士小姐不会恰巧进来撞见吧？”

“中午她就因为我抽烟而生气，”贝尔拉赫肯定地说。“我推托是你批准的，她说，很像是你的行为。”

内莱什么时候死的？医生问。

1945年8月10日，是在汉堡一家旅馆里自杀的，人们断定他服了毒药，探长回答说。

“你瞧，”洪格尔托贝尔点着头说，“现在你的怀疑连一点点残余也都泡汤啦！”

贝尔拉赫眼睁睁望着洪格尔托贝尔洋洋得意地喷吐出一圈圈烟雾，最后终于说道：没有比试图忘却一种怀疑更困难的事，因为它总是不断浮现在脑海之中。

探长真是无可救药，洪格尔托贝尔一笑置之，他把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看成是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

“这是刑事学家必备的首要品德，”探长针锋相对地说，接着又问：“萨穆埃尔，你曾和艾门贝格有过友谊吗？”

“没有，”洪格尔托贝尔回答，“据我所知，我们这一批和他一起学习的人中并没有人和他要好。我一直在反复思考《生活》画报上这幅照片的事件，汉斯，我想和你谈谈，为什么纳粹集中营里这个怪物医生竟然让我联想到艾门贝格身上；你肯定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从照片中看到的东​​西实在很少，因而把两个人相混淆的肯定不是两人的面目相象，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想那一段历史，不仅由于它已是遥远的往事，却更为严重些，还由于它极其令人憎恶，人们都愿意忘却那些讨人嫌的历史。汉斯，我有一次曾亲眼目睹艾门贝格不用麻醉药就开刀。我觉得这一幕就像发生在地狱里，如果真有一个地狱的话。”

“是有一个地狱的，”贝尔拉赫平静地回答。“如此说来，艾门贝格果真干过这等勾当？”

“说真的，”医生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被做手术的那个可怜人至今还活着。倘若你遇见他，他会以老天爷的名义起誓说，艾门贝格是一个魔鬼，这么说并不公平，因为没有艾门贝格他早就死了。然而，坦率地说吧，我可以理解他。事实太骇人听闻了。”

“怎么一回事？”贝尔拉赫好奇地问。

洪格尔托贝尔喝完杯里的咖啡，又重新点燃“小玫瑰”香烟。“老实讲，这里不存在魔术。就像任何行业中不存在魔术一样。这里只需要一把小刀和勇气，当然，也需要解剖学知识。但是我们这一批大学生谁能够如此沉着镇定呢？”

“我们一批人，大概是五个医科学生，从肯塔尔出发攀登勃洛姆丽沙普马西山。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要去哪里。我从来不是一个登山健儿，在地理学方面更是外行。我估计事情约摸发生在1908年7月间，那年夏天气候炎热，这一点我倒记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个高山牧场的一所茅屋里住了一夜。真是奇怪，这所茅屋极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是的，我还时常梦见它，并且立即一身冷汗惊醒过来。其实我连这所茅屋里发生的事还没来得及梦到。它和阿尔卑斯山上任何牧场小屋毫无不同之处，也和其它牧场小屋一样，整个冬天都空闲无用。恐怖仅仅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而已。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相信是由于我脑子里始终看见这所茅屋四壁长满了潮湿的苔藓，而在任何其它高山牧场的茅屋墙上却从没见过苔藓植物。人们常常在小说里谈到关于屠宰场的描写，却不能确切地想象出它们的模样。如今我脑子中出现的屠宰场正是阿尔卑斯高山牧场小屋的模样。茅屋周围有许多松树，离大门不远有一口水井。茅屋的木头不是黑色的，而呈现淡白色，业已腐朽，一条条缝隙里长满了真菌类植物，然而这一切也都仅只是事后的想象罢了。从那次事件到今天已经过去许许多多，以致幻想和现实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仍然能够真切地回想起那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怖。我们越过一个到处布满岩石碎块的高山牧场走近一所当年夏天空闲着无人动用的茅屋，茅屋就建在一片洼地上，当时我就觉得有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我深信，这种恐惧袭击了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不应把艾门贝格计算在内。我们中断了谈话，人人都缄默无语。在我们抵达茅屋之前，黄昏便已降临，那情况简直恐怖之至，怎么说呢，在这段难以忍受的漫长时刻中，好像有一盏奇怪的深红色灯高悬在这片只有冰雪和石块的渺无人烟的世界上。这是一种非人间的死亡之光，照得我们的脸和手都变了颜色，它好似由一个距离地球比太阳更为遥远的行星支配。因此，后来我们便像有人驱赶似的拥进茅屋里。我们轻而易举便闯进了茅屋，因为屋门没有锁。早在肯塔尔时，人们就告诉我们可以在这种小茅屋里过夜。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块铺板。从屋顶漏下的微弱光线中，我们看见天花板上铺着稻草，人们可以沿着一条黑黝黝的歪歪扭扭的梯子爬上屋顶，梯子上还粘着前几年的粪便和秽物。艾门贝格从外边水井里打回水来，态度慌张得奇怪，似乎他知道即将出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随即我们在一个简陋的炉灶上生起了火，锅子也是现成的。就在这一片笼罩着我们的忧郁而疲乏的奇特气氛中，我们中有一人遭到了不幸，生命垂危。他是一个胖胖的路西安人，一个酒店老板的儿子，他和我们一样学医——谁也弄不懂他为什么学医——一年后他即将放弃学习而去接管他父亲的业务。这位手脚稍稍有些笨拙的小伙子正在攀登梯子，想把屋顶上的稻草取下来铺床，不料梯子断裂，他便摔了下来，更不幸的是他的咽喉恰巧撞在突出墙外的一根梁木上。他躺在地上呻吟不已。摔得很不轻。我们最初以为他可能摔断了什么，可是片刻后他便呼吸困难起来。我们把他抬到屋外一条长凳上，于是他便处在夕阳的可怕光线之下，阳光透过重重叠叠的云层投射下鲜红的光芒。遭难者的模样让人看了害怕。破裂流血的喉咙肿胀得很大，喉头剧烈地颤动不已，脑袋向后倒仰着。我们恐怖地看到他的脸色越来越灰暗，在天边射来的地狱般红光映照下几乎变成了黑色，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像两块潮湿泛白的卵石在脸庞上闪光。我们绝望地使劲用湿布包扎他的咽喉，却无济于事。咽喉内部越肿越大，他必定窒息而死。这个遭难者起初疯狂地乱动不停，如今已明显地冷淡麻木。他的呼吸困难，已不能讲话。我们懂得这些征兆，知道他正面临生死

关头，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们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又缺乏知识。我们确实都知道有一种急救手术，可能挽救受伤者，可是谁也不敢想到去实践。只有艾门贝格想到了，而且毫不犹豫地干起来。他细细检查了这个路西安小伙子，在灶上沸腾的开水锅里把自己的小刀消毒了，立即就给病人切开一刀，这一刀我们在医学上称之为咽喉切开术，经常用于临床急救。手术时，人们在喉头上部，在喉结和环状软骨之间横着扎下一刀，促使空气流通。汉斯，令人恐怖的不是用普通小刀做手术，而是别的东西，是那种同样反映在动手术和被动手术者脸上的可怕表情。那个遭难者虽然由于呼吸困难几乎失去知觉，而他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显然看得清周围发生的一切，尽管也许像在梦中一般。当艾门贝格切下这一刀时，我的天哪，汉斯，他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面容却歪曲得变了形。突然间，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种魔鬼般的光芒，一种极其满足的快乐表情，是从折磨别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中获得快乐的表情，即使仅只有一瞬间，我也感觉到了人生的恐怖，随即一切便都过去了。然而我深信，除我之外并无别人有此感觉，因为其余几个人根本连看都不敢看。我也让自己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大部分是一种幻觉，由这座阴暗的茅屋和当天黄昏的不祥晚霞所引起的错觉。事情的奇怪之处在于那个路西安人——艾门贝格用咽喉切开术救了他的命——后来却不再理睬艾门贝格，是的，甚至没有怎么道谢，以致许多人对他产生反感。相反，艾门贝格从此格外受人赞赏，让他笼罩在伟大的光圈之中。他的人生道路很特别。我们曾经相信他会很快飞黄腾达，而他对此却冷漠得很。他学得很多，又极其五花八门，物理学、数学，还去听哲学和神学课，没有一样能够满足他。他的考试成绩优秀，后来却始终没有自己开业，总是给人当助手，也在我手下干过，我不得不承认，病人们都非常佩服他，只有少数人不喜欢他。他就这么度过了一段不平静而孤独的生活，直至有一天他终于出门游历为止。他发表过一些稀奇古怪的论文，例如有一篇论述占星学依据的文章，是我读过的论文中最为强词夺理之作。据我所知，没有人和他有交情，他就是这么一个玩世不恭的、不可信赖的家伙，尤其由于没有人受得了他的挖苦嘲讽，他就更为讨人嫌了。他到智利后忽然完全变了，使我们惊讶不止，他在那里从事一种非常客观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肯定这完全是气候或者环境的影响。然而他回到瑞士后便又依然故我，恢复了老样子。”

洪格尔托贝尔讲完后，贝尔拉赫说：但愿他还保存着这篇占星学论文。

医生回答道，他明天就可以把文章拿来。

事情经过就是如此，探长沉思着说。

“你瞧，”洪格尔托贝尔说，“也许我这一生中做梦太多了。”

“梦不会骗人，”贝尔拉赫回答。

“梦本身就是欺骗，”洪格尔托贝尔说，“不过我得请你原谅，我要去做手术了，”说着便从椅子上站起身子。

贝尔拉赫把手伸给他。“我希望不是喉咙切开术，或者其它诸如此类东西。”

洪格尔托贝尔笑笑。“一次疝气手术，汉斯。我很乐意做这类手术，尽管，坦率地说，手术难度比较大。现在你必须静心休息。绝对静下来。除了十二小时睡眠以外，你什么也不要管。”

## 格列佛

然而午夜时分窗外传来轻轻的树叶簌簌声，又有一阵凉风猛然吹进病房里，贝尔拉赫便惊醒了。

探长没有立即开灯，而是在考虑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他终于察觉窗户上的百页窗被人慢慢推了上去。他身边的一片黑暗渐渐露出亮光，窗帘在一片捉摸不定的黯淡光线中幽灵似地膨胀起来。接着，他听见百页窗又被人小心翼翼地拉了下来。他又重新落入午夜时分的不可透视的黑暗之中，随后他觉得有一个人形从窗口朝房间里走来。

“你总算来了，”贝尔拉赫说。“你来啦，格列佛，”随手拧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

房间里站着—个高大的犹太人，穿—袭破破烂烂的长袍，灯光下看去像是红颜色的。

老人又重新靠在枕头上，双手枕在脑袋下。“我没有完全料到你今天晚上就来看我。你会飞檐走壁，我倒是料到的。”他说。

“你是我的朋友，”闯入者回答说，“于是我立刻就来了。”他的脑袋光秃秃，但很威武，一双手很高贵，他身上的一切全都布满了可怕的疤痕，证明他曾经受到非人的虐待，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这张脸以及整个人的庄严气概。这个巨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略略弯着腰，双手按在大腿上，他的影子鬼怪般地映在墙上和窗帘上，一双没有睫毛的、目光炯炯的眼睛带着毫无畏惧的坚定表情直视着老人。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出于需要而逗留在伯尔尼呢？”从那张受损坏的、几乎没有嘴唇的嘴里吐出一句问话，表达得既噜苏又拘谨，好像是一个人懂得的语言太多，以致一下子想不起恰当的德语句子。然而他的发音是无可指责的。“格列佛从来不留下痕迹，”他沉默片刻后说，“我干的是别人看不见的工作。”

“每个人都会留下痕迹的，”探长针锋相对地说。“而你的痕迹就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一到伯尔尼，那个窝藏你的法特巴哈就会再次在报纸上登—则广告，出售旧书和邮票。我想法特巴哈是会弄到—些钱的。”

犹太人笑了：“贝尔拉赫长官的伟大艺术就在于能够从细微处发现痕迹。”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痕迹，”老人说。对于—个刑事专家来说，没有比泄漏自己的秘密更为糟糕的事。

“对贝尔拉赫长官我愿意留下痕迹。法特巴哈是—个穷苦犹太人。他永远也不会懂得怎么做生意。”

那个巨大的鬼魂边说边坐到老人床上。他伸手到长袍里取出—只布满尘土的大酒瓶和两只小酒杯。“伏特加酒，”巨人说。“让我们—起来喝—杯吧，长官，我们过去总—起喝酒的。”

贝尔拉赫嗅了嗅杯子里的酒，他很喜欢偶尔喝—点烧酒，此刻心里却很不安。他想，倘若洪格尔托贝尔看见目前光景，不知会如何生气呢，又是烧酒，又是犹太人，还在人人都已入眠的半夜时分起床。—个多么出色的大病号，洪格尔托贝尔会大发雷霆，兴起—场轩然大波，他很了解老医生的为人。

“这瓶伏特加酒从哪—里弄来的？”他问，已品了—口，“味道真不错。”

“从俄国，”格列佛笑笑说。“从苏联人手里弄来的。”

“你又到俄国去了一次？”

“为了做买卖，长官。”

“是探长，不是长官，”贝尔拉赫纠正他说。“在伯尔尼只可以叫探长。你在苏维埃天堂里也没有脱掉这件可怕的长袍吗？”

“我是一个犹太人，就得穿我们的长袍，我为此立下誓言的。我爱我们可怜民族的民族服装，”格列佛回答说。

“再给我一杯伏特加，”贝尔拉赫说。

犹太人重新斟满两只酒杯。

“但愿飞檐走壁不是太困难，”贝尔拉赫皱着眉头说。“你今天晚上干的又是一件触犯法律的事。”

“格列佛不能让别人看见的，”犹太人简短地回答。

“八点钟天就已经很黑了，沙来姆医院肯定会放你进来的。这里没有警察。”

“我同样也会飞檐走壁进来的，”巨人笑着回答说。“这像儿童游戏一样容易，长官。顺着水槽往上爬，又沿着墙壁突出处向前走。”

“幸而我已经退休了。”贝尔拉赫摇着头说。“我才可以对你干的这些事情昧着良心不予过问。我似乎早就应该把你关起来。只要抓住你，全欧洲都会给我很高评价的。”

“你不会这么干的，因为你知道我在为什么事业而奋斗。”犹太人毫不动摇地回答说。

“你倒真该去弄一张证明之类的东西，”老人向他建议说，“我不很看重这些，但是不论在什么制度里都要以上帝的名义作保证的。”

“我早已死了，”犹太人说。“纳粹分子把我枪杀了。”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他懂得这个巨人在影射什么。灯光在这两个男人周围打下一个宁静的圆光圈。远远传来午夜的钟声。犹太人又斟满两杯伏特加酒。一双眼睛里闪烁着特别愉快的表情。

“我们的党卫军朋友们在1945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清香扑鼻的日子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天上那一片小小的白云——把我连同我们可怜的同胞共约五十人一起枪杀了，他们一时疏忽让我活着留在那个肮脏不堪的石灰坑里，数小时后我便浑身血污爬到一棵离我不远的盛开的丁香树下躲藏起来，因而党卫军支队来埋葬尸体时没有发现我。从那时起我就立下誓言，倘若这是上帝的意愿，我便永远过这种可怜的受损害遭鞭打的兽类生活，正如我的同胞们在本世纪里不得不经常作人牛马一样。从此以后，我就只生活在墓穴的黑洞里，逗留在地窖或者其它诸如此类的黑暗地方，唯有黑夜才能看见我的面容，唯有星星和月亮才能照见我这件破破烂烂的长袍。我应该这样做。德国人已经把我处死。我是从我亚利安人的妻子——她如今死了，这样对她反而更好——手里看到我自己的死亡证书的。她从帝国邮局收到这份填写得极其详尽的证书，这份证书是良好教育的荣誉，给予那些用文明教育人民的人增添了光彩。死亡就是死亡，对犹太人、对基督徒来说都一样，请原谅我用词的次序，长官。你必须承认，一个死人不需要任何证件，也不存在任何国界。只要哪里还在迫害、折磨犹太人，我就到那个国家去。干杯吧，长官，为我们的健康干杯！”

两个男人喝干了酒杯；穿袍子的男人又斟满两杯伏特加，便开口道，说话时一双眼睛眯成两道闪闪发亮的细缝，“你找我有什么事，贝尔拉赫长

官？”

“探长，”老人纠正说。

“长官，”犹太人坚持不改。

“我想向你打听一点消息，”贝尔拉赫说。

“打听一点消息，很好，”巨人微微一笑，“一条可靠的消息比金子还宝贵。格列佛比警察局知道得多得多。”

“我们走着瞧吧。你在所有的集中营里都呆过，这是你自己有一次亲口对我说的。不过具体情况却谈得很少，”贝尔拉赫表示道。

犹太人倒满了两只杯子。“有一度他们对我这个人实在过分重视，把我从一个地狱又拖到另一个地狱，以致比诗人但丁所唱的九个地狱还要多，而但丁本人连一个地狱也没有蹲过。我在每一个地狱里都得到一批货真价实的伤疤，要把它们带进我死后的生活中去。”他伸出自己的左手，整只手是畸形的。

“你也许认识一个名叫内莱的党卫军医生吧？”老人急切地问。

犹太人沉思着朝探长看了片刻。“你指的是斯图霍夫集中营里的那个人吗？”

“正是他，”贝尔拉赫回答。

巨人嘲讽地望了老人一眼。“那个人已于1945年8月10日在汉堡一家破烂旅馆里自杀身亡，”过了一忽儿后他回答说。

贝尔拉赫有点失望地想，格列佛比警察局多知道个屁，不过嘴里还是说道：“当时在你的坎坷生涯中——或者换一个说法也行——你曾经遇见内莱吗？”

穿破长袍的犹太人重新审视地望望探长，那张伤痕密布的脸皱缩成一个鬼脸，然后回答说：“你要打听这只古怪野兽的什么情况呢？”

贝尔拉赫考虑了一番：他应该向这个犹太人坦率到什么程度呢，最后决定保密，把自己对艾门贝格的怀疑保留在心里。

因此他说，“我看见他的一张照片，引起我的兴趣：这么一个人物后来会怎么样呢？我是一个病人，格列佛，而且还要躺很长时间，人总不能永远只读莫里哀的作品啊，便会常常沉思冥想。因而这个人引起我的注意：一个杀人累累的凶手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内莱也是人。因此内莱也和其他人一样。这是一种诡诈的三段论法，但是谁也无法与之抗衡，”巨人回答说，一面目不转睛盯着贝尔拉赫。他那坚实有力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我肯定你看见的是刊载在《生活》杂志上的内莱照片，长官，”犹太人又接着往下说。“这是他留存于世的唯一照片。人们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找了又找，也没有发现第二张照片。尤其糟糕的是，从这张著名的照片上并不能辨认清楚这位传奇式的杀人魔王。”

“那么说，只留下独一无二的一幅照片了，”贝尔拉赫沉吟着说，“这怎么可能呢？”

“魔鬼对于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所选中的人，照顾得比老天爷还要周到，不论什么情况都不会露出破绽。”那个犹太人挖苦地说。“当前为研究纳粹罪行而保存在纽伦堡的党卫军档案里没有内莱的名字，其它名单表册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他好似不属于党卫军。斯图霍夫集中营呈送党卫军总部的官方文件里从不曾提到内莱此人，就连关于人员情况的附加表格里也跳过了

他。在这个杀人如麻而脸不改色的凶手身上具有某种传奇式的非法的东西，连纳粹分子都为他感到羞愧。然而事实上存在这么一个内莱，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存在，即使是最挑剔的无神论者。凡是有一个神道，能够策划最恶毒的酷刑，人们总是立即就最信奉他。当时我们在那些较之斯图霍夫毫不逊色的集中营里就常常议论他，尽管很大程度上像议论一件传闻，而不是把他作为在这个法官和刽子手的乐园里一个最恶毒残忍的天使来议论。后来云消雾散后，情况也没有改善。集中营里能够提供事实真相的人都没有活下来。斯图霍夫离但泽不远。少数经受住了纳粹酷刑的囚犯，在俄国人到来之前都统统惨遭杀害，而俄国人来后，为伸张正义又把集中营的看守们全吊死了。但是内莱并不在这批吊死鬼之中，长官。他一定是早已离开集中营了。”

“人们肯定清查过他，”贝尔拉赫说。

犹太人笑笑说：“当时谁不曾受到清查呢，贝尔拉赫？！全部德国人都是罪人。所以不会有人想到内莱，因为也没有人要回忆他。倘若不是战争结束后《生活》杂志上登载出这幅照片，他的罪行大概就永远不会被人知晓。你所熟悉的这帧照片拍摄的是一次技艺高超的外科手术，小小的美中不足之处是没有给病人注射麻药。人们激于义愤，开始清查此事。否则的话，内莱早就可以隐退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当一个与世无争的乡村医生或者到某家收费昂贵的疗养院担任一名浴疗大夫啦。”

“《生活》杂志怎么拿到这张照片的呢？”老人不理解地问。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巨人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是我给他们的。”

贝尔拉赫猛然挺直上身，吃惊地盯着犹太人的脸。格列佛确实比警察局了解的情况更多，他十分震惊地想着。这位衣衫褴褛的巨人过的是一种冒险生活，曾经拯救无数犹太人的性命，他的生涯是在那些罪恶和骇人听闻的邪恶凝聚汇集在一起的地方度过的。坐在贝尔拉赫对面的是一个执行自己法律的法官，他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处决、开脱和处罚，他完全不受这个地球上任何声势显赫国家的平民法典和刑罚条款的约束。

“我们再喝一杯伏特加吧，”犹太人说。“烧酒对我们有好处。我们需要烧酒，否则我们活在这个被上帝所遗弃的星球上就会丧失甜蜜的幻想。”

他斟满两只酒杯，喊叫道：“人类万岁！”然后一口喝下自己那杯酒，说道：“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事情总是很难的。”

他不应该大声叫嚷，探长劝告说，夜班护士听见会来查看的。他们是在一所正规医院里。

“基督教，基督教，”犹太人叹息说，“她培养出优秀的护士，也同样培养出能干的杀人凶手。”

老人沉吟了片刻，伏特加喝得已经够多啦，但是最后也仍然干了这一杯。

刹那间房间似乎旋转起来，格列佛的身影使他想起一只巨大的蝙蝠，后来房间重又安定下来，虽然稍稍有点倾斜。看样子他只能将就忍受着了。

“你是认识内莱的，”贝尔拉赫说。

巨人回答道，他曾有机会同内莱打过交道，然后又忙着喝他的伏特加。随即他又自动开始叙述，不再是方才说话时采用的冷淡清晰的声音，而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歌唱似的语调，讲到讽刺挖苦之处，声音逐渐高亢，有时候却又变得低微、沉重，于是贝尔拉赫逐渐领会到他所叙述的一切，包括愤慨和讥讽在内，都是对于一个上帝创造的、曾经非常美丽的世界的堕落而表述

出自己的无限悲哀。如今在这个半夜时分，在病入膏肓的老探长的病床边坐着这个巨人般的亚哈随鲁，老人正在倾听他娓娓细述，我们时代的历史把这个历尽苦难的男人造就成为一个阴郁的、令人恐怖的死神。

“那是在 1944 年 12 月，”格列佛用平淡的语气开言道，多半心思还沉浸在伏特加酒里，他的痛苦好似一片暗黑色的油面散布在酒的海洋上，“随后又在第二年的一月份，那时希望的太阳刚刚从斯大林格勒和非洲的地平线上遥遥升起。探长，就在这几个月中，我曾一度以我们所有可敬的犹太法学家和他们的灰白胡子起誓说我肯定活不过这些日子，然而我却熬过来了。我居然活了下来，完全是内莱的功劳，就是你急切想了解他生平的这个人。关于这位医学界的新人，我可以向你报告的情况是：他救了我的性命。他先让我沉入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然后揪着我的头发又把我拉了上来，他所采用的方法，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顶住了，这人就是我，我被人咒骂，说我受得住一切。我出于感恩戴德之情毫不犹豫决心揭露他，就给他照了这张相片。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上，人们往往只能以怨报德。”

“我听不懂你这番话的意思，”探长对他说，心里拿不准是不是伏特加酒在起作用。

巨人笑了，从长袍里掏出第二瓶酒。“请原谅，”他说，“我讲了许多长句子，而我的痛苦却更为长得多。我要说的话其实很简单：内莱曾给我动手术。没有用麻药。我也分享了这一闻所未闻的荣誉。我还得请你再原谅一回，探长，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必须立即喝伏特加，像喝水一样往里灌，因为事情太可怕了。”

“魔鬼！”贝尔拉赫大叫一声，接着朝医院病房寂静的空间又喊一声：“魔鬼！”他从床上半直起身子，机械地把自己手里的空酒杯递给坐在他床边的庞然大物。

“听这段历史只要神经健全就可以，而经历这段历史需要的却多得多，”穿破破烂烂长袍的犹太人又歌唱似地接着往下讲。“如今有人说，人们最终应该忘掉这一切，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德国；目前在俄国也出现了暴行，世界上不论何处都有虐待狂。但是我什么都不愿意忘记，不仅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德国人杀死了六百万我们的同胞，六百万哪！——不是的，因为我始终是一个尊严的人，即使我住在地窖里和老鼠生活在一起！我拒绝对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区别对待，也反对讨论什么好的和坏的民族；但是我认为必须对各种不同的人加以区别，它已像烙印般铭刻在我身上，自从有人在我肉体上抽下第一鞭后，我就把折磨的人和被折磨的人区别开了。对于其它国家里别的看守者们的新的暴行，我也没有忘记加以计算，我把它们和纳粹们必须偿还我的欠账统计算在一起。我认为自己有权利不对那些折磨别人的人们加以区别。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眼睛。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长官，我这颗备受伤害的心便什么都不祈求，只求在他面前没有民族之分，而只存在人和人的区别，他将按照每人罪行的程度予以判决，同时根据每人承认公道的程度进行开释。基督徒们，基督徒们，听一听一个犹太人的叙述吧。他们中有一个人把你们的救世主钉上了十字架，如今基督徒们却把他连同整个民族钉上了十字架：我本人就在斯图霍夫集中营，在一所人们称之为灭绝营的集中营里承受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非人苦难。这所集中营离开古老而受人尊敬的

城市但泽不远，这场罪恶的战争正是由但泽引起的，如今那里已毁坏得不成样子了。耶和华离我们十分遥远，正忙于处理另一个星球上的事务，或者转悠在各个星球间研究着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总而言之，正因为远离人世，他的人民便被肆无忌惮地驱向死亡，用毒气杀死，用枪击毙，完全看党卫军的兴致而定，有时候又决定于气候状况：刮东风就处绞刑，刮南风就放狗咬人。这样的场合，那位内莱博士——就是你急切想了解他命运的那个人——也是在场的，他正是卫护当今有道德的世界秩序的一位君子。他是那一大批集中营医生之一，这样的医生在每个集中营里都密密麻麻的青蝇似的有一大群，他们把自己的科学热情奉献给杀人事业，他们给成千上万的俘虏注射空气、碳酸、苯酚和天上人间任何一种可供他们恶魔似的欲望得到满足的东西，或者甚至在人体上作试验，不用麻药进行手术，他们竟然声称，这是出于必须，因为肥胖的帝国元帅禁止在动物身上作活体解剖。内莱倒并非独一无二的。——现在我要开始谈他了。在我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的漫长旅程中，我非常精确地观察和了解了这些折磨人的恶魔，正如人们所说，我认识了我的兄弟们。内莱在他的本行上比其他许多人突出得多。他并不参与别人干的那些暴行。我必须承认，他还帮助那些俘虏们，只要有可能这么做，只要在这个以灭绝一切为最终目的的集中营里还行得通，或者还多少有一点意义。他的可怕之处和另外一些医生们完全不同，长官。他的试验比别人高明并不在于让人更为痛苦；那些被巧妙地捆绑着的犹太人在其他医生的刀下也是嚎叫着死去，但他们的死是痛苦所导致的休克，而并非由于医术。内莱的恶毒之处在于他所干的一切都是事先征得他的牺牲品的同意。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内莱只给那些自愿报名的犹太人作手术，他们也都清楚自己将会遭遇什么。内莱甚至还给他的牺牲品提供条件，为了使他们熟悉手术情况，竟让他们先亲眼目睹受折磨的全部惨状，然后再最后作出决定，自己也来承受这同样的折磨。”

“这怎么可能呢？”贝尔拉赫问，吃惊得透不过气来。

“是希望，”巨人笑笑说，胸脯剧烈起伏着。“是希望，基督徒。”他的一双眼睛闪烁着一种无法猜度的、动物般的野性，脸上的伤疤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两只手像动物爪子一般摊在贝尔拉赫的被褥上，那张破裂的嘴里连续不断地贪婪地汲饮着大量伏特加酒，灌进他那伤痕密布的躯体里去，他发出一声好似来自遥远世界的悲叹：“在《科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把信仰、希望、爱情这三者描写得多么美妙啊。而希望是这三者中最为坚韧的，它在我身上，在犹太人格列佛身上，已用血的疤痕刻印在我的肉上了。爱情和信仰在斯图霍夫早已完蛋，唯有希望留存下来，人们要和它一起完蛋。希望，啊，希望！内莱的口袋里有的是希望，谁愿意要，他就给谁，竟有许多人愿意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长官，但是数以百计的人听任内莱不用麻药给他们作手术，就在他们浑身颤抖、脸色苍白、眼睁睁看着他们前头的人活生生被杀在手术台上，而且永远给他们说一个‘不’字的可能性，这一切仅仅由于希望，由于他们要得到内莱许诺给他们以自由的希望。自由啊！人们何等热爱自由，甘愿为它而忍受一切，为了获得它，当时在斯图霍夫的人甚至自愿跳进烈焰腾腾的地狱，仅仅为了拥有一下别人许诺给他们的这个自由的可怜的私生子。自由时而是个娼妓，时而又是一个圣贤，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样子，对一个工人是一副样子，对一个传教士是另一副样子，对一个银行家又是一副样子，而对于一个关在灭绝营里的可怜的犹太人，例如关在奥斯

威辛、卢布林、马伊达内克、纳兹瓦勒和斯图霍夫集中营里的人又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在那里，灭绝营外的一切，除去上帝的极乐世界之外，便都意味着自由。噢，陷于无边痛苦中的人们唯一的小小奢望就是能够重新关到一个让人舒服的地方，例如布痕瓦尔德或者达豪集中营里去，如今人们却在那里看见了金光灿烂的自由，关在那里的人不必担心被煤气毒死，至多被打死而已，而且至少还存在着一种千分之一的希望，可以通过一种未必会有的偶然机会而获得拯救，而在灭绝营里绝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的上帝啊，长官，让我们为争取人人都能获得同样的自由而奋斗吧，决不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在其他人面前感到羞愧！这件事听来可笑，为了获得迁到另一个集中营去的希望，驱使成群结队的人，或者至少可以说相当数量的人自愿躺在内莱的屠宰板上；听来真是可笑（说到这里，那犹太人发出一阵充满绝望和愤怒的讥讽笑声），这批人中也有我，基督徒啊，我也躺倒在那一块鲜血淋漓的斜面板上，我先是看着聚光灯下内莱手里刀子、钳子在我面前晃动的模糊影子，随即便沉没入无边无涯的、一层深于一层的痛苦深渊之中，在这间周围陈列着闪光镜子、让我们永远陷于痛苦的房间里。我到他那里去也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有朝一日终于得以脱离这个该诅咒的灭绝营。还因为这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内莱一直表现得很热心肠、很可信任，人们便根据这些而相信他，如同人们始终相信有奇迹存在一样，因为灾难实在太深重了。说真的，事实如此，他没有食言！我在一次毫无意义的胃切除手术后，成为独一无二活下来的人，他让人照料我恢复了健康，然后在二月初某一天把我们打发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无穷无尽的运送路程中，我走了又走，却没有到达目的地，因为在五月某个丁香盛开的美丽日子里，在艾斯雷本市附近，我爬到那些丁香花下躲了起来。——这就是目前坐在你床边望着你的这个到处流浪的男人所做的事，长官，这就是他的苦痛以及他在这个荒诞时代的血海里的全部漫游历程，而我们时代的漩涡还将继续把我肉体的残骸和我的灵魂卷走，正如它已经吞噬了千百万人，不论是无罪的人，还是有罪的人，统统都是一样。行啦，如今第二瓶酒也已喝光，是亚哈随鲁沿着墙头和水槽的康庄大道回去的时候啦，亚哈随鲁应该回到法特巴哈家阴湿的地窖里去了。”

格列佛已经站起来，身躯的阴影遮没了半个房间，可是老人仍不让他走。

那么内莱究竟是何等样人呢？他询问，声音轻得几乎像耳语。

“基督徒啊，”犹太人回答，一面把酒瓶和玻璃杯重新藏进肮脏的长袍里，“谁能回答你的问题呢？内莱已经死了，他自己消灭了自己的肉体，他的秘密已经掌握在统治天堂和地狱的上帝手里，上帝不会泄漏他的秘密的，尤其不会泄漏给神学家们。在死人堆里进行调查研究岂非死路一条。我那时常常努力想钻到这个医生的假面具底下去观察观察，没有成功，不可能和他进行交谈，他甚至和党卫军任何成员及其他医生都全不往来，更何况和我们囚犯呢！我曾多次试图探究他闪光的眼镜片后所掩藏的东西！可是当我只能看见穿着手术时的白罩衫，大口罩上仅露出半张脸的折磨人者的形象时，像我这么一个可怜的犹太人又能够做什么呢？于是后来我冒着生命危险给内莱拍了一张照片——在集中营里没有比拍照片更为危险的事情了——，照片上的内莱正是他当时经常出现的模样：白罩衫裹着瘦削的身子，稍稍驼着背，走路无声无息，生怕传染上什么疾病似的，当时他就是这样在这些充满了悲惨的灾难和不幸的简陋棚屋里转来转去的。我想，他的举止定然出于小心谨慎。他一定早已预计到，迟早会有美妙的一天，集中营里所有牛鬼蛇神统统

都要销声匿迹，以便在别的地方像麻风病似的从人类本能的深处滋长出新的折磨人者和另一种政治制度来。因而他必须从那时开始就为自己将来退居普通的私人生活作好准备，所以他在那个地狱里表现得像一个临时工。于是我便算计着如何发起攻击，长官，我恰恰打中了目标：《生活》杂志一登出这幅照片，内莱便开枪自杀了。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他的名字，长官，这便足够了，因为那个人如此处心积虑就为了掩藏他自己的名字（下面便是老探长听到格列佛讲的最后一句话。听着就像撞击一口铜钟时发出的沉闷响声，在病人的耳朵里可怕地嗡嗡作响），掩藏他自己的名字！”

现在伏特加酒起作用了。病人起初确实还能感到那边窗户上的窗帘像一艘逐渐消逝船只上的风帆般鼓胀起来，还能觉得远处一扇百页窗被人往上推起的格格声。接着，感觉便越来越模糊，他好似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形跳入楼下的黑夜里。但是后来透过被打开的窗户的缝隙露出一望无际布满星斗的天空时，在老人心中升起一种不可遏制的执拗愿望，要在这个世界上屹立不动，要为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奋斗，即使是拖着这个正被癌症吞噬的可怜身躯也要热烈地、不停顿地奋斗下去，即使只能再活一年，一天也不可能增加，也要奋斗下去。他粗声粗气地大声唱起了歌，伏特加像火焰般在他的内脏燃烧，伯尔尼进行曲打破医院的寂静，吵醒了别的病人。他再也不想出比唱歌更有力量的事情啦。然而，当惊惶失措的夜班护士冲进病房时，他已经睡着了。

## 推 理

第二天是星期四，正如贝尔拉赫自己所预料，他一直睡到将近十二点，中午饭快要送来时才醒。他觉得脑袋稍稍有点沉重，此外便都很好，他已好久没有这么舒服了。他暗想，偶尔喝上一口烧酒可真美，尤其当一个人卧病在床、禁止喝酒的时候。床头柜上放着一封信，正是路兹派人送来的关于内莱的材料。对当前警察局的组织工作效率真是没话可说。对于一个退休者尤其如此，而他，感谢上帝，后天便要退休了。很久以前他在君士坦丁堡工作时，获得一个消息常常要等待好几个月呢。老人正想瞧瞧材料内容，护士端来了午餐。进来的是他最喜欢的丽娜护士，可是她今天的神情特别冷淡谨慎，和往日全然不同。探长心里暗暗生气。他揣测人们一定议论过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真是不可理解。他觉得自己在格列佛离开后仿佛唱了伯尔尼进行曲，不过必然仍旧是一种错觉，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爱国者。真要命，他想，假如能够记得清楚就好了！老人怀疑地环顾着房间四周，一面用汤勺喝着麦片粥。（老是麦片粥！）盥洗台上放着几只瓶子和一些药片，从前可没有看见过。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所有的一切都很可疑。特别是每隔十分钟就换一批护士进房间来，或者拿走什么，或者寻找什么，又或者带来什么。同时他又清清楚楚听见走廊里有嗤嗤笑声。按照洪格尔托贝尔的嘱咐他不敢打听，他这么做很正确，因为洪格尔托贝尔中午在城里自己诊所看门诊，要等到傍晚才回来。

贝尔拉赫心情沮丧地咽着麦片粥和苹果酱（果酱也总是苹果酱），因而吃到最后竟送来一杯加糖的浓咖啡时，简直惊讶不已。——这是洪格尔托贝尔博士特别关照的，护士带着责备的口气告诉他。这样的事从前可没有先例。咖啡很中他的意，它振奋他的精神。接着他便专心致志开始研究内莱的材料，这才是最值得做的事。然而一点钟刚过，洪格尔托贝尔就出其不意进房来了，老人装出还在潜心研究材料的样子，偷偷朝医生瞟去一眼，见他脸上心事重重，不由吃了一惊。

“汉斯，”洪格尔托贝尔一边说一边笔直朝床边走来，“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敢起誓，所有的护士们可以和我一起发誓，你是喝醉酒啦！”

“噢，”老人回答，把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看了一眼，接着又说一声，“喂！”

肯定没有弄错，洪格尔托贝尔针锋相对不放松，一切迹象都已证实这一点。今天上午大家千方百计想叫醒他，结果白费力气。

他觉得非常抱歉，探长表示遗憾说。

“要说你喝了酒，干脆说吧，简直不可能，难道你连酒瓶也一起喝下去了！”医生带着绝望的语气大声叫嚷。

他想情况恐怕就是如此，老人怡然自得地说。

洪格尔托贝尔说，他正面临一个难解的谜，双手使劲擦拭着他的眼镜。洪格尔托贝尔只要情绪一激动，总是做这个动作。

亲爱的萨穆埃尔，探长说，收容一个刑事专家往往会惹麻烦，这一点他承认，怀疑他偷偷喝酒，他也完全承认。他只请求医生办一件事，给苏黎世的宋纳斯泰医院打一个电话，用勃拉齐·克拉默尔的假名替贝尔拉赫挂号住院，说病人刚开过刀，需卧床治疗，是一个有钱人。

“你想去艾门贝格那里？”洪格尔托贝尔吃惊地问，在床边坐下。

“当然，”贝尔拉赫回答。

“汉斯，”洪格尔托贝尔说，“我不明白你的用意。内莱已经死了。”

“有一个内莱死了，”老人纠正他说，“我们现在需要证实，死的是哪一个。”

“我的老天爷，”医生吓得喘不过气来，“难道有两个内莱？”

贝尔拉赫拿起手里的档案。“让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案情，”他平静地往下说着，“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有哪些令人奇怪之处。你现在看到干我们这一行要懂点数学才行，而且还得有丰富的想象力。”

他什么也不懂，洪格尔托贝尔大声叹息说，整整一个上午他都稀里糊涂。

探长往下读着关于内莱的报告：“瘦高身材，灰白头发，年轻时为棕色，灰绿色眼睛，招风耳朵，面容狭长，脸色苍白，眼睛下部有泪囊，牙齿齐全。他有一个特殊标记：右眉上部有一道伤疤。”

确实是他，洪格尔托贝尔说。

是谁？贝尔拉赫问。

是艾门贝格，医生回答。他从外形描绘上可以断定是艾门贝格。

而这却是对死在汉堡的内莱的外形描绘，贝尔拉赫针锋相对地说，是记载在警察局的档案里的。

洪格尔托贝尔很高兴地表示，那么他过去把两人混淆是理所当然啦。“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和某一个杀人犯十分相象。这一点极其简单地解释清我为什么把两人搞混。你应该看清这一事实。”

“这是一种结论，”探长说，“然而还可能存在另一种结论，一下子难于判断清楚，但是既然‘可能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另一种结论可能是：艾门贝格并未去智利，而是内莱顶着他的名字在那边工作，与此同时，艾门贝格却用另一个人的名字在斯图霍夫集中营。”

这是一种不大可信的结论，洪格尔托贝尔惊讶地说。是的，贝尔拉赫回答，然而却是允许作出这一结论的。人们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性。

“我的天哪，我们想到哪里去了！”医生大声抗议道，“照此说法，艾门贝格在汉堡自杀身亡，而那个叫内莱的医生却成了宋纳斯泰医院的主管。”

“艾门贝格从智利回国后，你见过没有？”老探长插嘴问。

“只是匆匆见了一面。”洪格尔托贝尔惊惧地回答，脑子完全弄糊涂了。那副眼镜终于又戴了上去。

“你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探长继续往下讲。“下列答案也是完全可能的：死在汉堡的是从智利回国的内莱，而艾门贝格却从斯图霍夫，他在那里顶着内莱的名字，回到了瑞士。”

洪格尔托贝尔摇着头说，要替这么特殊的论点进行辩护，首先非得假定他们犯有罪行。

“完全正确，萨穆埃尔！”探长点头称许，“我们必须假定内莱是被艾门贝格所杀。”

“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作出恰恰相反的假设：是内莱杀害了艾门贝格。你的想象力显然太无边无际了。”

“你的论点也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说，“我们也可以假设这种情况，至少在目前推理阶段可以如此推论。”

统统都是胡说八道，老医生火了。

“可能的，”贝尔拉赫不动声色地回答。

洪格尔托贝尔竭力为自己辩护。采用这种原始方法，如同探长目前对付实际情况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人们愿意证明的一切。总而言之，采用这种方法，一切都会成为问题的，医生说。

“一个刑事专家有责任对现实提出疑问，”老人答复说，“事情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像哲学家那样做研究工作，也即是说，要学习他们在从事某件本行工作之前，先对一切进行怀疑，不论是对于如何去死的技巧，还是对于死亡后的生活问题作出最美妙的结论，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的能力也许不如他们。我们两人提出了不同的论点。一切情况都是可能的。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得由我们来判断不同论点的现实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可能性远远不是现实性。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先研究我们论点的现实可能性程度。我们面前有两个人，两个医生：一个是内莱，一个罪犯，另一个是你年轻时就认识的艾门贝格，苏黎世宋纳斯泰医院的院长。我们基本上提出了两种论点，两种都是可能的。一眼看去，它们的现实可能性程度全然不同。一种论点认为艾门贝格和内莱之间毫无关系，看来现实性大些；第二种论点是他们两人有关系，现实可能性小些。”

事实如此，洪格尔托贝尔打断了老人的话，他一直就是这个意见。

“亲爱的萨穆埃尔，”贝尔拉赫回答说，“很遗憾，我是一个刑事专家，有责任从人们的关系中发现罪行。对第一种论点，认为内莱和艾门贝格间毫无关联，我不感兴趣。内莱业已去世，而对艾门贝格，并不存在任何可疑情况。而第二种论点恰恰是我的责任所在，驱使我进一步探索这种较小的现实可能性。这个论点里有哪些东西具有现实可能性呢？这个论点提出，内莱和艾门贝格互相交换了角色，艾门贝格顶着内莱的名字呆在斯图霍夫集中营，不注射麻药给犯人动手术；而另一面则是内莱在智利扮演艾门贝格，从那里给医学杂志投寄学术论文。至于以后继续发展为内莱死于汉堡，而艾门贝格返回瑞士定居一事，暂且撇开不谈。这个论点的幻想成份很多，我们首先得老实承认。眼下的可能性是两个人，艾门贝格和内莱，不仅都是医生，而且外形完全一样。这是我们迄今探讨到的第一点。这是从我们的推论中，从我们许许多多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迷宫中出现的第一个事实。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实。两者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们常常碰到相像的人，很像的就比较少见，至于完全相同，例如并非天生，而是一次不幸事故，完全由于偶然原因而留下的标记也互相符合，这样的情况就绝对罕见了。而我们眼前的事实恰好如此。两个人不仅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更有甚者，两人的右眉上部都有一道同样的独特伤疤。”

嗯，真是巧合，医生说。

“也可能是人工制造的，”老人补充一句说。洪格尔托贝尔从前曾经在艾门贝格的眉毛上动手术。那么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洪格尔托贝尔回答说，这个伤疤是一次手术后留下的，他的鼻窦炎浸润很深，不得不开刀。

“在眉毛上开刀的目的是使脸上的伤疤不太显眼。但我当时给艾门贝格做的手术不成功。肯定是某种艺术家的倒霉事，我动手术一向很顺利。这次手术的伤疤却十分扎眼，比正常手术留下的要深得多，后来甚至连眉毛都缺了一部分，”医生说。

常常要动这种手术吗？探长打听。

嗯，洪格尔托贝尔回答，这倒并不经常。一般性鼻窦炎并非立即动手术

不可的。

“你瞧，”贝尔拉赫说，“这就值得注意了：内莱居然也动过这种并不多见的手术，而且按这份档案的记载，在他的眉毛上部同一地位也有一个缺口。汉堡的这具尸体检验得很细致。艾门贝格左下臂有一块手掌大小的烧伤痕迹吗？”

他干吗提这个问题？洪格尔托贝尔吃惊地问。艾门贝格有一次做化学实验时出过一次事故。

贝尔拉赫满意地回答：人们在汉堡的尸体上也发现了这个伤疤。今天的艾门贝格身上是否还存在这个伤疤呢？了解这一点颇为重要。——洪格尔托贝尔飞快瞟了他一眼。

医生说，去年夏天在阿斯柯那休假地，他见艾门贝格身上还有着这两处疤痕，而且同样刺眼。艾门贝格完全依然故我，说了一些伤人的挖苦话，而且几乎没有认出他来。

“原来如此，”探长说，“他几乎不认识你了。你瞧，两个人何等相似，简直闹不清谁是谁啦。我们不得不认为，要么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古怪巧合，要么有人施了诡计。也许两个人事实上并不像我们目前想的那么相似。仅仅是档案文件和护照上所记载的类似之处还不足以把两个人互相混淆。倘若相似处扩展到某些极偶然的因素上，那么一个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的机会就大得多了。一次伪造的手术和一次人工制造的事故也许为了起到下述作用：使相似性转变成同一性。当然在我们目前状况下，种种分析仅只是推测而已。可你必须承认，这类方式的相似性使我们第二个论点的可能性增大了。”

除了《生活》杂志上这幅照片外，难道已没有内莱的其它照片，洪格尔托贝尔问。

“还有汉堡警察局拍摄的三张照片，”探长回答，从档案里拿出照片递给自己的朋友，“照的是一个死人。”

“这也看不出多少名堂来。”洪格尔托贝尔注视片刻后失望地说。接着他声音颤抖地说道：“完全一模一样，是的，我简直可以想象出艾门贝格死后也必然是这副模样。内莱究竟是怎么自杀的？”

老人沉思地、几乎窥测似地凝望着医生，后者穿着白外套正一筹莫展地傻坐在床边，完全忘却了外界的一切，不论是贝尔拉赫的酗酒，还是等待他去探视的其他病人。“服了氢氰酸，”探长终于告诉他说，“和大多数纳粹分子自杀时一样。”

“用什么方式？”

“他咬碎一颗胶囊，吞了下去。”

“空腹吗？”

“已经验明是空腹。”

那是立即就死的，洪格尔托贝尔说，从这些照片上看来，内莱死前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随即两个人便都沉默无语。

最后还是探长打破了沉默：“即使内莱之死其中存在秘密，我们也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有许多其它疑点需要我们加以调查呢。”

“我不明白你还有什么可疑之处要和我谈的，”洪格尔托贝尔惊讶而又不愉快地说，“你也未免太过分了。”

“噢，一点也不过分，”贝尔拉赫说。“这里还要谈到你那一段学习经历呢。我只想和你稍稍谈上几句。如果在斯图霍夫集中营的果真是艾门贝格，

这段经历将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心理学上的根据，说明艾门贝格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干出我们肯定他会干的事情来。如今我又要谈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一个人的简历，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内莱。他出身很低下。内莱生于 1890 年，也即是说，他比艾门贝格小三岁。他是柏林人。他父亲是谁，没人知道。母亲是一个女仆，她把私生子放在外祖父身边收养，自己过着一种飘忽不定的生活，后来进了一家反省院，随即又失踪了。外祖父在博尔西希工厂干活，也是一个私生子。年轻时从巴伐利亚来到柏林的。外祖母是一个波兰人。内莱受完义务小学教育后，十四岁那年参加了军，到十五岁前一直当步兵，后来根据一个卫生院官员的推荐进入卫生院学习。他在那里显示出对于医学具有不可抗拒的才能。由于他处理急症手术很有办法，曾经获得铁十字奖章。第一次大战后，他在好几家疯人院和普通医院里当助理医生，业余时间则为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作准备，以便日后入大学当医生，却两度没能通过考试，他的古代德语和数学都不行。看来这个人只在医学上有天才。接着他便成了一个不用药物的自然疗法医生和一个创造奇迹的博士，各阶层的人都跑到他那里去看病，因而触犯了法律，他被罚一笔数目不很大的罚款，正如法庭所声称，因为‘他的医学知识过分惊人’。当时有人为他请愿，报纸也替他说话，可是统统不起作用。后来事过境迁，舆论也平静下来。因为他始终一再违法行医，也只好对他睁一眼闭一眼了。三十年代这许多年中，内莱一直在西里西亚、威斯特法伦、巴伐利亚和黑森一带行医。接着，他在当了二十多年医生后，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1938 年他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1937 年艾门贝格从德国去了智利！）内莱在古德语和数学上考试成绩优异。他获准进入大学学习。他通过了国家考试，成绩也和中学毕业考试同样优异惊人，然而他却消失在斯图霍夫当了集中营医生，引起人们的普遍惊讶。”

“我的老天爷，”洪格尔托贝尔说，“你又想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很简单，”贝尔拉赫不无嘲讽意味地说，“我们手头有几篇论文，是艾门贝格从智利寄到瑞士，在《瑞士医学周刊》上发表的。这些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并且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这些文章显然有学术价值。这我完全相信。使我不信的是：这些文章出自一个颇具文采的人之手，据你介绍，艾门贝格文字能力很强。而这些文章在文字表达方面简直拙劣之至。”

“一篇科学论文可不是一首诗歌，”医生表示了不同观点，“就连康德也写得复杂难懂的。”

“请别和康德相提并论，”老人不满地嘟囔说，“康德写得艰深，却不是写得拙劣。而这篇寄自智利的论文作者写得不仅文笔拙劣，而且还有语法错误呢。这个人似乎分不清第三格和第四格，听人们说，柏林本地人说话就是从来不分三格四格的。还有奇怪的事呢，这个人常常把希腊语当成拉丁语，好像他完全不懂这两种语言，就拿 1942 年第十五期为例，他在文章里用了 *Gastrolyse* 这个词。”

房间里变得死一般沉默。

沉默持续了几分钟之久。

后来洪格尔托贝尔点燃了一支“苏门答腊小玫瑰”。

他终于问道：那么贝尔拉赫怀疑这篇论文是内莱写的？

贝尔拉赫坦然自若地回答说：现实的可能性很大。

“我已无法反驳你，”医生阴沉地说，“你给我证明的都是事实。”

“我们目前还不能过分夸大，”老探长说，一面合上放在被子上的档案夹。“我只是给你证明了我的论点的现实可能性。而现实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倘若我说，明天很可能下雨，但第二天并不一定就下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思想和事实往往不相一致。否则我们的日子就会轻松得多，萨穆埃尔。在思想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着这种现实生活的冒险性，如今我们就要以上帝的名义去经历一番。”

“然而这种冒险并无意义，”洪格尔托贝尔叹息说，一筹莫展地望着自己的朋友，老人始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

“如果你的推理属实，那么艾门贝格便是一个魔鬼，你一去便会陷于可怕的危险之中！”他说。

“我知道，”探长点头同意。

“这样做毫无意义，”医生再一次表示，声音轻得几乎像耳语。

“正义永远具有意义，”贝尔拉赫坚持自己的看法。“请在艾门贝格的医院给我挂号，我明天上午就去。”

“大年夜就去？”洪格尔托贝尔跳了起来。

“是的，”老人答复说，“大年夜就去。”接着他眼里闪着幽默的表情问道：“你把艾门贝格写的那篇关于占星学的论文带来没有？”

“当然带来了，”医生结结巴巴地说。

贝尔拉赫笑笑说：“请拿过来，我正好奇地想看看其中是不是也多少谈到了我这颗星星，也许我恰好有点儿运气呢。”

## 又一个来访者

这位可怕的老人整个下午都吃力地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把整张纸都写满了，接着又和州银行以及一个公证人通了电话。对于这么一位神奇、莫测高深的病人，女护士们越来越怕进他的房间去，而他则像一只巨大的蜘蛛怀着坚定的信心静静地织着自己的罗网，毫不动摇地接上一头又接另一头，一直忙到黄昏时分。就在洪格尔托贝尔通知他说，大年夜可以住进宋纳斯泰医院后不久，老人又接待了一位来访者。大家都不知道这位客人是自己来的，还是老探长打电话喊来的。客人是个枯瘦的小矮子，脖颈很长，瘦瘠的身躯裹在一件敞开的雨衣里，雨衣的几个口袋都塞满了报纸。雨衣下面是一件破破烂烂的棕色条纹灰上装，也都塞满了报纸。肮脏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柠檬黄的、污迹斑斑的丝围巾，一顶巴斯克小帽覆盖在秃头上。蓬松的浓眉下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高大的鹰钩鼻长在瘦小的身躯上显得过分巨大，嘴巴则可怜地瘪进去，因为牙齿都已掉光。他高声自言自语着，听起来像在朗诵诗句，不时好似大海里浮起小岛一样冒出一些单词来，例如：无轨电车、交通警察之类；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如此生气。他这一身破烂衣着和他手中那根虽已不时髦、却很雅致的黑手杖极不相称，那根有着银把手的手杖肯定是上一世纪的产品，他就这么拿在手里毫无理由地在空中挥舞不停。一进大门，他就朝一个女护士冲去，深深鞠过一躬后，发表了一通夸大其词的客气话，随即晕头转向走进妇产科，差一点撞进正在紧张接生的产房，被一个医生赶了出来，又在每个房门口都有的插着石竹花的花瓶上绊了一跤。最后总算有人把他带进新楼（人们把他看成了一只受惊的动物），就在他即将走进老探长的房间时，那根手杖却绊在他的腿上，脱手甩了出去，一直滑过半条走廊，砰的一声重重撞在一扇门上，房间里正躺着个重病人。

当这位来访者终于到达贝尔拉赫床边时，嘴里还在喊叫：“这些交通警察啊！”（陪同他进来的实习女护士心里想，谢天谢地，总算把他带到了目的地。）“到处都碰见他们，满城都是交通警察！”

“喂，”探长小心翼翼地说，设法缓和客人的激动情绪。“目前正需要这样的交通警呢，福西奇。一定要维持交通秩序，否则我们的死人会比现在更为多得多。”

“维持交通秩序！”福西奇用他那尖嗓子喊叫着。“好听得，说来好听而已。但是人们需要的不是什么专门的交通警，大家首先需要的是对于人们的遵纪守法有更多的信任。整个伯尔尼已经变成一所独一无二的交通警大本营，因而每一个使用马路的人变得粗暴野蛮也就不足为怪了。毫无办法，伯尔尼一贯就是一个索然无味的警察窝，一种无可救药的专政自古至今始终盘踞着整个城市。很久以前，当莱辛听说可怜的汉齐被悲惨处死的消息后，早就想写一部关于伯尔尼的悲剧啦。遗憾得很，他竟没有写成！如今我生活在这个窝里，在这个首都，已经整整五十年，我不愿意描写自己作为一个词句工匠（我只是堆砌词句，而不是撰写文章！）在这个昏昏沉沉、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如何忍饥受寒艰难度日（除去每周得到一份文学杂志《联邦》以外，便一无所有了），我堆砌这些词句有什么意义呢。可怕得很，简直可怕透顶！五十年来，只要我走过伯尔尼街道，我就紧紧闭上眼睛，从我躺在儿童车里

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我不愿意看见这个不幸的城市，我父亲曾在这个城市里担任某一种副职而了结一生。如今又怎么样，一睁开眼睛，我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交通警察，到处都是交通警察。”

“福西奇，”老探长坚决地说，“我们现在不谈交通警察，”同时严厉地朝这个肮脏发霉的身躯瞧了一眼，那身躯正坐在椅子上，痛苦地来回摇晃着，一双猫头鹰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倒霉相。

“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弄成这副模样，”老人接着向下说，“真是活见鬼，福西奇，你很有工作能力，完全是一个男子汉，你主编出版的《射苹果报》虽说是小报，却是一份好报纸；可是如今登载的尽是些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什么无轨电车、交通警察、狗、集邮爱好者、圆珠笔、广播节目、戏剧花絮、电影票、电影广告、联邦议会以及纸牌游戏等等等等。你的能力和激情全都发挥在抨击这些东西上了——你搞的永远只是席勒在《威廉·退尔》里写的那一套——天晓得，你的能力和激情应该发挥在其它事情上，才算有价值呢。”

“探长，”客人叹息说，“探长啊，请你别再奚落一个诗人，一个写书为生的人吧，他因为必须在瑞士生活，遭受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但是更为糟糕十倍的是：他不得不依靠瑞士生活。”

“行了，行了，”贝尔拉赫试图平息他的怒气，可是福西奇越来越恼火。

“行了，行了，”他尖叫着，从椅子上跳而起，跑到窗口，接着跑到门口，如此往返不停，活像一只钟摆。“行了，行了，说说当然容易。难道说说‘行了，行了’就可以获得谅解？不可能，就是上帝也不可能！我承认，我已经成为一个可笑的形象，类似我们自己所杜撰的人物，如：哈巴柯克、推奥巴尔德、奥斯泰顿、摩斯泰歇等等，或者正如你们大家所说，我用一大堆什么领扣、女人、剃须刀等等构成的惊险故事填补了我们这些可爱而乏味的报纸的缝隙，当然，无疑都登在报屁股上；可是如今全世界都是一片崩溃景象，而人们还在吟唱灵魂的窃窃私语，谁不沉湎在这些报屁股花絮里呢！探长，啊，探长，我想用我的打字机为自己创造一个像样的生活，什么事情没有尝试过呢，但是我甚至连一个普通农民的中等收入也没有达到。我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计划，一个又一个希望，什么最优秀的戏剧，最炽烈的诗句，最动人的小说，等等等等。赌场，除了赌场便一无所有！瑞士把我造就成为一个傻子，一个讨厌的人，一个同风车和羊群作斗争的堂吉诃德。倘若人们献身于精神事业，而并非为了金钱，那么人们就应该从事自由和正义的事业，应该为在祖国的市场上出售其他人的文章提供保证，并且对一个迫使人们过一种乞丐和懒汉生活的社会作出评价。人们要享受生活，却不肯从中拿出哪怕只是千分之一来，简直一毛不拔，只要人们一听见文化这个字眼，千年帝国的手枪栓就被拉开，而这里的人们就把钱包赶紧收藏好。”

“福西奇，”贝尔拉赫严厉地说，“你谈到了堂吉诃德，这很好，堂吉诃德正是我所喜欢的题目。如果我们大家心里有点儿正义感，头脑里理智多一些，我们大家都应该是堂吉诃德。但是我们并不像那个可怜古老骑士那样身披盔甲去同风车斗争，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得上战场和危险的巨人斗争，时而是反对狡黠残酷的怪物，时而是货真价实的巨型爬虫，它们其实只有一只小麻雀的头脑：它们全都是畜生，并非活在童话故事或者我们的幻

想里，而是现实的存在。如今我们的任务是：不论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情况下出现的非人性东西，我们都要与之进行斗争。至于如何斗争，而且在斗争中尽量做得聪明些，也是很重要的。和罪恶斗争可不能玩火。然而你，福西奇，恰恰是在玩火，你用错误的方法进行一场正确的斗争，正如同一个救火队员不用水而用油去灭火。人们打开你这份可怜的小报一读，立即会得出一个印象，整个瑞士必须从地球上消灭掉。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无数东西——多得简直不可胜数！——都不对头，关于这些我也可以给你讲一大套，而且我本人终于也因此而白了头发，但是我们不能立即把一切统统扔进火海，就像住在苏都姆和戈麦拉城的人一样，那么做完全错误，而且也不大近情理。你的所作所为显示你似乎羞于表现自己爱这个国家，我不喜欢这样，福西奇。人们不应由于爱而感到羞愧，而爱自己的国家永远是一种高尚的爱情，只是他的爱必须严肃而有批判精神，否则便只是一种溺爱。因而倘若人们看到祖国的污点和肮脏之处，便得努力清扫洗涤，就像海格立斯清扫奥吉亚斯马厩一样，——这件事我认为是海格立斯十大功绩中最为感人的一件事——但是把整幢房子都予以拆毁，则既无意义又不明智，因为要在这个贫困而伤痕累累的世界上建造一所崭新的大楼是非常困难的，得付出不止一代人的时间，而且当这幢大楼终于落成之后，人们发现它并不比那所旧房子更好。重要的是，要允许人们讲真理，允许人们为此而斗争，而不是立即把人送进精神病院。这在瑞士是可能的，我们得平心静气承认事实，并因而表示感谢，因为我们不必害怕任何政府，或者任何议会，或者任何什么委员会。当然，肯定有一些人衣衫褴褛，生活在贫困中有点儿不愉快。我承认生活简直乱七八糟很不像样。然而一个真正的堂吉诃德却为自己那副破烂盔甲感到自豪。自古以来，同人们的愚昧和自私作斗争是极其艰巨而又代价昂贵的，往往同贫穷和屈辱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场神圣的斗争，不应该带着呻吟，而应当尊严地将斗争进行到底。你却向我们善良的伯尔尼市民的耳朵边暴风雨般刮起一阵阵诅咒和谩骂，诉说自己在他们中间忍受着多么不公正的命运虐待，甚至希望有一个扫帚星降临人间，把我们的古老城市夷为废墟。福西奇，福西奇，你进行斗争的动机很渺小。谁想使自己的行为谈得上主持公道和正义，他就必须使自己的行动避免为面包而斗争的嫌疑。请你摆脱这种不幸，摆脱你现在仍然必须穿的破裤子，摆脱为这些琐细小事而进行的不值一提的战争吧；天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比交警重要得多的事情呢。”

福西奇瘦瘠可怜的躯体又蜷缩坐回靠椅上，伸长了细细的黄脖颈，一双瘦腿跷得高高的。巴斯克小帽跌落到椅子底下，柠檬黄的围巾软瘪地吊在这个干枯小男人凹陷的胸前。

“探长，”他带着哭音说，“你对我实在太严厉了，就像摩西或者以赛亚对待以色列人一样。我也知道你说得有理。然而我四天来没有吃过一丁点热东西，连抽一支烟的钱也没有。”

老人突然有些犹豫地皱起眉头问道，他是否已不再到莱勃恩戈斯家吃饭了。

“我和莱勃恩戈斯太太为歌德的《浮士德》吵了一架。她说第二部分好，

---

《圣经》中巴勒斯坦两城市名，因罪孽深重而遭受火焚。——译注

希腊神话故事之一，希腊英雄海格立斯把三十年未扫之马厩于一天内清扫干净。——译注

摩西、以赛亚均为《圣经》中的贤人。——译注

我持不同意见。后来她就不再邀请我去吃饭。莱勃恩戈斯先生写信给我说，《浮士德》第二部是他太太最崇拜的作品，因此他很抱歉自己没法帮我挽回局面。”作家抽泣着诉说。

这个可怜虫使贝尔拉赫感到难受。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对他过分严厉，最后狼狈地嘟囔说：一个巧克力工厂老板的太太和歌德能有什么关系呢。“莱勃恩戈斯夫妇如今邀请谁去吃饭呢？”他打听，“又是那个网球教员吧？”

“布金格。”福西奇细声回答。

“如此说来，布金格至少近几个月中每隔三天就能吃到一顿好饭菜了，”老人带点调和的语气说。“是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作品我确实听不进去，虽则我早在君士坦丁堡就已经听惯一切可怕的嘈音了。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据我推测，布金格和老板太太不久就会由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而意见不合。到时候她就会又重新邀请那位网球教员的。她们这种人总要在精神上占据支配地位。福西奇，我要把你介绍给格罗尔巴赫一柯内服装店的格罗尔巴赫家，他们家的饭菜虽则稍嫌油腻，味道却是很好的。我相信，这一家要比莱勃恩戈斯家容易相处些。格罗尔巴赫完全不懂文学，对《浮士德》也好，对歌德也好，全都没有兴趣。”

“那么太太为人怎样？”福西奇担心地打听道。

“耳朵有点聋，”探长安抚他说，“福西奇，你真是好运气。请你把桌上那支小小的棕色雪茄烟拿去。是一支‘小玫瑰’，洪格尔托贝尔特意为我留的，你心安理得地在病房里抽吧。”

福西奇动作笨拙地点燃了“小玫瑰”。

“你想到巴黎去逗留十天吗？”老人好像顺便提起似的问道。

“到巴黎去？”干瘦的小男人尖叫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只要给我一张车票，那就太美了，是去巴黎吧？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热爱法国文学？是坐下一班火车吗？”

福西奇由于激动和喜欢而变得气喘吁吁。

“已替你准备好五百法郎和一张火车票，你可以到本特斯胡同布茨公证人那里去取，”贝尔拉赫平静地说，“旅行对你身体有好处。巴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至于法国人，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福西奇，法国人是最优秀、最有文化的人。甚至连道地的土耳其人也难以相抗衡。”

“去巴黎，去巴黎，”那可怜虫结结巴巴地说。

“不过事先你得帮我办成一件棘手的事，因为我胃开刀不能起床，”贝尔拉赫边说，边用眼睛锋利地盯着瘦小的男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一桩罪案？”另一个人打着颤问。

要揭发一个人，探长答复说。

福西奇动作迟缓地把“小玫瑰”搁到身边的烟灰碟里。“要我干的事情很危险吗？”他低声问，眼睛睁得大大的。

“不，”老人说，“没有危险。正是为了避免任何一种危险的可能性，我才把你送到巴黎去。不过你必须按我说的话去做。下一期《射苹果报》什么时候出版？”

“我不知道。只要我有钱就可以出。”

“发一期稿子需要多少时间？”探长问。

“很快。”福西奇回答。

《射苹果报》是否由他独力编印出版，贝尔拉赫希望知道这一点。

“完全独力出版的。靠一架打字机和一架旧的小型印刷机，”主编回答说。

“总共出版多少份？”

“四十五份。是一份道地的印数很少的小报，”从椅子那里传出极细微的声音，“长期订户从来没有超出十五份。”

探长考虑了片刻。

“下一期《射苹果报》要扩大印数。要印 300 份。由我支付全部费用。我对你毫无其他要求，只要你在这期里写一篇我指定的文章，至于同期还刊登什么别的东西，则全盘由你决定。在这篇文章里（他递给人那张写满字的纸）要把我所写的内容都写清楚。当然得用你的语言，福西奇，我希望你把黄金时代的全部文采都发挥出来。除了我所写的内容之外，你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也不必知道这篇文章攻击的医生究竟是谁。我的观点不会让你犯方向性错误，请你相信我所说的全是正确的，我敢担保。在这篇将由你送往某些指定医院去的文章里，只有一处不真实，也即是，你本人，福西奇，掌握着文章中所论述的观点的证据，而且也知道那个医生的名字。这一点正是危险所在。因而《射苹果报》一旦送付邮局，你就立即动身去巴黎。当夜就动身。”

“我会写的，我也会动身的，”作家保证说，把老探长递给他的那张纸捏在手中。

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高兴得擗动两只脚跳着舞。

“这次旅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探长叮嘱说。

“不告诉别人。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的！”福西奇保证说。

那么出一期报纸需要多少钱，老人问。

“四百法郎，”小矮个儿回答，眼睛闪着光，他的情况总算可以略有改善，他感到得意非凡。

探长点点头。“你可以到我的公证人布茨那里去取这笔钱。倘若你急着取，他今天就可以给你，我已和他通过电话。——报纸一出版，你就立即动身吗？”老人再一次问他，心里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怀疑感。

“立即就走，”矮小的男人宣誓说，还朝天伸出了三只手指。“当夜就动身。立即去巴黎。”

可是，福西奇走后，老人仍不放心。他觉得这个作家比从前更不可信赖了。他考虑着是否请路兹派人监视福西奇。

“胡思乱想，”他自己否定了自己。“他们已经辞退了我。艾门贝格案件得由我个人来解决。福西奇会写成这篇抨击艾门贝格的文章，并且立即动身离去，我不必瞎担心徒添白发了。连洪格尔托贝尔也不需要知道这件事。现在就请他来，我多么想抽一支‘小玫瑰’啊！”

## 第二部

### 深 渊

于是，星期五下午夜幕降临时分——是当年最后一天的黄昏——老探长两腿垫得高高地坐在汽车里，来到了苏黎世城。洪格尔托贝尔亲自驾驶汽车，而且为了照顾自己的朋友，比往常更为小心谨慎。城市在万千灯火照耀下一片通明。洪格尔托贝尔行进在密集的车辆群中，车辆从四面八方驶入灯光海洋的中心，又分散至各个僻静的小马路，像开肠破肚般从里面流淌出男男女女，人人都渴望着这一个夜晚，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天，人人为了有一个新的开端，为了继续生活下去而准备着一切。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汽车后座上，觉得自己已失落在这个小小的穹形空间的黑暗之中。他请洪格尔托贝尔不要直接去医院。他要观看观看这永不停息的车流。其实他从来也不很喜欢苏黎世，四十万瑞士人挤在一个角落里未免拥挤不堪。至于这条火车站大街，他们现在正行进在这条街上，他一直对它很讨厌，然而在这场为一个捉摸不透、充满危险的目标而进行的十分神秘的探险旅行中，这个城市却强烈地吸引着他。黑魆魆、一丝亮光也没有的天空开始掉落雨点，接着转为雪花，最后又重新变成雨点，在灯光中好似丝丝银线。人群，啊，人群！在雨和雪的幕帷之下，街道两旁川流不息地翻滚着新的人群。电车里挤得满满的，透过车窗玻璃显现出幽魂似的人脸以及一只只捏着报纸的手，在银色光线下，一切都像在幻境中，消逝了，沉没了。自从生病以来，贝尔拉赫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场同死亡的战斗中，这场不可改变的战斗中，他丧失了一切。不可抗拒地促使他来到苏黎世的原因，这一建立在坚强毅力基础上，同时却又是在病魔缠绕中偶然联想出来的嫌疑，如今对于他已经不值分文，毫无意义了。他为什么还要努力奋斗呢，有什么目的呢？他渴望自己进入那永恒的、无边无涯的、没有梦境的睡眠之中。洪格尔托贝尔暗暗诅咒自己，他感觉身后的老人业已奄奄一息，因为自己未能拦阻这场冒险而责备自己。镜面似的湖水在夜色中模糊不清，向他们迎面而来，汽车正缓缓滑过桥面。出现了一个交通警察，像机器人，机械地活动着手臂和双腿。贝尔拉赫的思绪飘到了福西奇身上（这个多灾多难的福西奇，如今正在伯尔尼，在一间肮脏的阁楼里，正狂热地写着那篇文章呢），然而他连这些也想不下去了。他把身子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疲乏以无可匹敌的力量压倒了他。

“人总是要死的，”他想着，“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正如城市、民族以及大陆有朝一日总要消灭，完蛋。”他又想，“完蛋，是的，就是这个词：完蛋——然而地球仍旧永远环绕太阳运转，永远在同一条毫无变动的轨道上运转，固执而不留情面，永远、永远如此迅速，同时又如此宁静地飞驰不停。这座城市能否在这里生存下去，或者这片一平如镜的灰蒙蒙、毫无生气的湖水能否把所有的房屋、塔楼、灯光和人们都统统淹没，取决于什么呢——难道就取决于我们方才在黑暗中驶过桥梁时透过雨雪帘幕所看到的死海的铅灰色波涛吗？”

他觉得冷。这是宇宙间的寒冷，老远老远他就已有预感，巨大的、坚硬的寒冷降临在他身上。这种感觉持续了数秒钟，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永恒地消失了。

他睁开眼睛，重新凝视窗外。剧场在眼前一闪而过。老人看看前座上的

朋友。医生很平静，这种善良的平静使他觉得高兴（他完全没有觉察医生心里很不高兴）。他像被吹了仙气似的苏醒了，勇气倍增。汽车经过一所大学后向右拐弯，街道缓缓向上伸展，黑暗越来越浓，一个转弯接着又是一个转弯，老探长听任别人摆布，心里却很开朗、谨慎而且坚定不移。

## 侏 儒

洪格尔托贝尔把汽车停在一个公园里。贝尔拉赫暗暗估计，园内的这片松树一定延伸入森林。因为他只能大致看到和地平线相联接的森林边缘。山上正下着大雪，这里的雪花一片片又大又干净。老人透过飘舞的雪花模模糊糊看见了医院向前突出的正面。华丽的大门前灯火通明，汽车都停在大门两边，大门往里凹入，两侧各有一扇窗户，装饰着漂亮的铁栏杆，探长暗想，人们正好可以从两侧监视大门。洪格尔托贝尔默默点着一支“小玫瑰”，离开汽车，消失在入口处。老人孤零零留在车里。他躬下身子，尽可能在黑暗中遥视着大楼的轮廓。“宋纳斯泰医院，”他想，“果真是现实。”雪花越飘越密。这么多窗户竟没有一扇窗户是明亮的，偶尔才透过密密的雪花闪现一丝暗淡的光线。他眼前这幢白色的、玻璃结构的现代化建筑物竟像是一具尸体。老人心里开始不安，洪格尔托贝尔怎么不回来呢？他看看手表，过了不到一分钟。“我太神经质了，”他暗想，把身子往后一靠，想闭上眼睛休息片刻。

贝尔拉赫的目光本来透过车窗玻璃凝望着融雪从宽阔的屋檐往下滴落，此时突然落在一个怪躯体上，那躯体正吊在医院入口处左面窗户的铁栏杆上。他起初以为是一只猴子，然后吃惊地认出是一个侏儒，正是那种人们偶尔可以在马戏团里见到的用以娱乐观众的小矮人。那侏儒赤裸着小手和小脚，像猴子一般抓着铁栏杆，巨大的脑袋却朝探长的方向伸过来。这张脸皱缩而苍老，其丑无比，布满深深的裂痕和皱纹，显然饱经风霜折磨，它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骨碌碌望着老人，身子却一动也不动，活脱像一块风化了、长满苔藓的化石。探长躬身朝前，把脸庞紧贴在潮湿的窗玻璃上，想看得更清楚、更确切些，然而那小矮子像猫似的轻轻一跳，跳进房间里，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黑黝黝的窗上一片空白。这时洪格尔托贝尔进来了，身后跟着两名女护士，在永无休止的飞舞雪花下，她们的衣服白得出奇。医生打开车门，看见贝尔拉赫脸色苍白，吓了一跳。

他轻声问：出了什么事啦？

没什么，老人回答说。他必须让自己习惯这座现代化建筑。现实总是和人们想的有些不同。

洪格尔托贝尔感觉老探长隐瞒了什么事，便怀疑地望着他。“好吧，”他说，声音仍和方才一样轻，“反正我们已经走到目前这一步了。”

探长轻声问道：是否见到了艾门贝格？

他刚刚同他谈过话，洪格尔托贝尔告诉老人。“毫无疑问，汉斯，他就是艾门贝格。我在阿斯科纳休假地并没有认错人。”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等在车外的两位女护士已经有点不耐烦。

“我们追踪的是一个幽灵，”洪格尔托贝尔心里暗想，“艾门贝格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医生，而这所医院和其它医院并无不同，只是收费较贵而已。”

探长坐在汽车后座那片几近漆黑的阴影里，心里清清楚楚，他知道洪格尔托贝尔脑子里想的什么。

“他什么时候给我检查身体？”他问。

“立刻就检查，”洪格尔托贝尔回答。

医生察觉老探长当即变得精神抖擞。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萨穆埃尔，”贝尔拉赫说，“你这人不会

装假，而目前不应该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朋友。这第一次审讯关系重大。”

“审讯？”洪格尔托贝尔大吃一惊。

“不是审讯又是什么？”探长带嘲弄意味地回答，“艾门贝格要检查我，我就得审讯他。”

他们互相握手告别。

女护士们来了，已经增加到四个。老人被抬上一辆金属支架闪闪发亮的手推车。他躺平后回头看了一眼，洪格尔托贝尔正把箱子递给别人。随后，为了让自己的脸凉快凉快，润湿一下，老人仰头望望天上，那一大片乌黑空虚的平面，鹅毛大雪正飘飘扬扬地盘旋而下，映着灯光好似在旋转跳舞，又好似在沉没坠落。“雪不会下很久的。”他想。病床已被推进大门，他听见洪格尔托贝尔汽车驶走的声音。“他走了，他走了，”老人轻轻自言自语。老人看见自己头上是一片雪白闪光的拱形天花板，由一块块巨大的镜子嵌镶而成，他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直挺挺躺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手推车无声无息、不摇不晃地推过充满神秘气息的走廊，也听不见女护士的脚步声。白得发亮的墙壁两边粘贴着黑色阿拉伯字母，因为每一扇墙壁都和白色墙壁衔接得看不出缝隙；还可以朦胧看见一座壁龛里有一具坚实的裸体神像。如今贝尔拉赫又重新进入了医院特有的既温柔又残忍的境界之中。

他身后是一个女护士红红的胖脸，她正推着车往前走。

老人又重新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

“这里有一个侏儒吧？”他用标准德语问，因为他挂号住院时说自己是外籍瑞士人。

女护士笑了。“克拉默尔先生，”她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的？”

她说的标准德语带浓重的瑞士口音，他便断定她是一个伯尔尼人。虽然她的回答使他疑惑不安，但是总算也有可喜之处。至少他在这里是生活在瑞士人中间。

于是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我叫克莱丽。”

“是伯尔尼人吧？”

“是比格仑人，克拉默尔先生。”

探长想，他应该做这个女护士的工作。

## 审 讯

女护士把贝尔拉赫推进一间一眼看去像是全部由玻璃镶嵌的房间里，光线亮得耀眼。贝尔拉赫看到房间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女人，瘦瘦的，有点驼背，另一个就是大名人弗里茨·艾门贝格博士，也穿着白工作外衣，戴一副宽边角质眼镜，即使如此，也不能遮没右眉上那条伤疤。老人只在开头时朝医生瞟了一眼，随即忙于观察那位站在他怀疑对象身边的女人。妇女们总是让他好奇。他不信任她们。他作为伯尔尼人对于“有学问的”妇女特别感到害怕。这个女人很美，他不得不承认，因而使他这个老光棍加倍伤脑筋。他一眼就看出她是一位有教养的女士，她穿着白外套极其高雅、极其矜持地站在艾门贝格身边（而他很可能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凶手），显得有点儿过分高贵。人们简直可以直接把她供奉在神座上，贝尔拉赫挖苦地想。

“你们好，”他说，没有用他方才同克莱丽护士讲话时说的标准德语；他很高兴结识一位鼎鼎大名的医生。

他说的是伯尔尼德语。医生也同样用伯尔尼方言回答。

他作为外籍伯尔尼人确实也会说“Miuchm uchterli”这样的地方土语，老人喃喃地自言自语。

嗯，他肯定得对，艾门贝格笑笑说。能否正确地读出“Miuch-m uchterli”这个词的发音永远是伯尔尼人的标记。

“洪格尔托贝尔没有弄错，”贝尔拉赫想，“内莱不是他。一个柏林人绝对发不出Miuchm uchterli这个音的。”

他又重新望望那位女士。

“我的助手，玛尔洛克博士，”艾门贝格介绍说。

“噢，”老人干巴巴地嗯了一声，他也很高兴结识玛尔洛克大夫。但是他突然把脑袋略略侧向艾门贝格问道：“你曾在德国呆过吧，艾门贝格大夫？”

“好多年以前，”医生回答说，“我呆过一阵子，不过大部分时间是呆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他脸上不动声色，既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也看不出问话使他有什么不安。

“在智利，在智利。”老人说，接着又重复一句：“在智利，在智利。”

艾门贝格点燃一支香烟，走到电灯开关边，房间立即处于半明半暗状况，只有老人头上一盏蓝色的灯发出微弱的光线。探长只看得清手术台和站在他面前两个白衣人影的脸庞。老人也看到，这间有一扇窗户的房门已经关上，透过窗户射入远处的几丝灯光。艾门贝格那支香烟的红点正在上上下下移动着。

“在这样的房间里，人们一般不抽烟的，”探长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我大概已经多少使他失去自制了。”

洪格尔托贝尔现在在哪里呢？医生问。

他让他回去了，贝尔拉赫回答。“我希望你替我检查时，他不要在场。”

医生把眼镜往上推了一推。“我想，我们是可以信任洪格尔托贝尔大夫的。”

“当然，”贝尔拉赫回答。

“你有病，”艾门贝格往下说着，“手术总存在危险性，而且不一定总是成功的。洪格尔托贝尔对我说，你对这一点也很清楚。这很好。我们医生

需要勇敢的病人，我们得以向他说出真情。我很乐意洪格尔托贝尔大夫当你检查时在场，我很遗憾洪格尔托贝尔按照你的意愿离开了。我们医生应该合作，这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

探长回答说，他作为同行能够理解这一点。

艾门贝格非常惊讶。他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据他所知，克拉默尔先生并非医生。

“简单得很，”老人笑笑说，“你探索疾病，而我则探索战犯。”

艾门贝格又点燃上第二支香烟，冷静地说道：“对于一个私人来说，这是一项颇有危险性的工作。”

“事实如此，”贝尔拉赫回答，“正在我探查过程中，我却病了，只能来到你这里。如今我躺在宋纳斯泰医院，不知道是倒霉呢，还是走运？”

对于病情他还不能够作出最后判断，艾门贝格答复说。好像洪格尔托贝尔大夫也没有很大把握。

“你还没有给我检查呢，”老人说，“这正是我不让勇敢的洪格尔托贝尔参与检查的原因。如果我们想弄清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不存任何先入之见。而把事情弄清，我想，目前是我和你两人之间的事。当人们对于所怀疑的对象（不论是一个罪犯，还是一种疾病）的环境尚未进行研究，对于他们的习性也不曾加以调查的时候，就对其作出结论，是最糟糕不过的了。”

医生说他的意见很正确。尽管本人是一个医生，对于犯罪学一窍不通，这些话却颇有启发性。目前他希望克拉默尔先生在住院期间把他的职业爱好稍稍放一放。

接着艾门贝格又点燃了第三支香烟，表示意见说：“我想，战犯会让你在这里静心休养的。”

艾门贝格的答话引起老人一阵子怀疑。“究竟是谁在审讯谁？”他暗暗想，望着艾门贝格的脸，这张在独一无二的灯光下好似戴了假面具的脸，脸上的眼镜片闪闪发光，镜片后的眼睛显得特别大，露出讥讽的神情。

“亲爱的博士先生，”他说，“你不要认为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就不存在癌症。”

“这也不能因此就可以说，在瑞士也有战犯！”艾门贝格嘲弄地大笑着说。

老人审察地望着医生。“在德国发生这种事情，如今也可以发生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行。当然条件可能全然不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例外。艾门贝格大夫，有一个犹太人对我说，有人在一个集中营里不用麻药给他开刀，因而他认为人类只有一种区别：折磨者和被折磨者之间的区别。然而我认为还存在着探索者和被宽恕者之间的区别。我们瑞士人，包括你和我，也就属于被宽恕者之列，正如大家所说，这是一种上帝的恩赐，而不是一种错误。因而我们常常祈祷：‘主啊，请指引我们免受诱惑。’我就是这么来到了瑞士，并不是泛泛地找寻战犯，而是只搜寻某一个战犯，虽则我对他所知甚少，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可是我现在却病了，艾门贝格大夫，搜捕工作一夜之间便告终结，以至于那位被追捕者全然不知道我正极其迫切地搜寻着他的踪迹呢。真是一出悲惨的戏剧！”

那么他找到被搜索者的机会显然不多了，医生冷漠地回答，朝空中喷出一口烟雾，飘到老人脑袋上方形成一个乳白色的精致的闪光大圆圈。贝尔拉赫看见他对女医生使了一个眼色，她便递给他一支针管。艾门贝格在黑暗中

消失了一瞬间，然后又立即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枚药剂管。

“你的机会极其微小，”他又说一遍，一面把一种无色的药水汲入针管中。

但是探长却反驳了他。

“我还有一件武器，”他说，“也即是采用了你的方法，博士先生。你接受了我，让我在一年的最后一天这个阴暗的日子里穿过风雪和雨水从伯尔尼来到你的医院，在这间手术室里进行第一次检查。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一到就立即把我推进一间让病人感到恐怖房间里，这样做显然不寻常。你的目的就是要我感到恐惧，因为只有你控制了我，才有资格当我的医生。我是一个执拗的病人，这一点洪格尔托贝尔早就告诉你了。于是你决定采取这一行动。你为治愈我的疾病而需要控制我，而恐惧感正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你不得不付诸实践。而我那个讨厌的职业恰好和你的一样。我们采用了同一方法。我只能用恐惧来对付我所追索的人。”

艾门贝格手里的针管已对准了老人。“你是一个老练透顶的心理学家，”医生笑着说，“说真话，我是想用这间手术室稍稍触动你一下。恐惧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不过，我在实施我的技巧之前，想听完你的技巧。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倒很想听听。被追捕者并不知道你在追捕他，至少你自己是这么说的。”

“他猜想到了，却并不确切知道，这对他是很危险的，”贝尔拉赫回答，“他知道我已到瑞士，正在搜捕一个战犯。他对于自己的怀疑尽力自我安慰，并且不断自己作出保证说，我找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他。因为他通过极其高超的手段把自己保护得稳稳妥妥，并且让自己从罪恶比比皆是的世界躲进了瑞士，他的人一个也没有带进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秘密。而在他内心的最阴暗之处，他已猜测到我找的正是他，不找别的人，只找他，永远在找他。他感到恐惧，越来越恐惧，他的理智越是认为我找的不可能是他，他便越是恐惧，同时我呢，大夫，却身患重病躺在这所医院的病床上，对一切完全无能为力。”他沉默了。

艾门贝格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几乎带着点儿同情的神色，手里稳稳地握着针管。

“我怀疑你能否成功，”他镇定地说，“但是我祝你幸运。”

“他将死于恐惧，”老人毫不动摇地回答。

艾门贝格把针管慢慢放回小桌上，这张用玻璃和金属构造的小桌紧靠着老人的病床。于是那丑恶的尖尖玩意儿就此一直搁在小桌上。艾门贝格略略向前俯下身子。“你这么认为吗？”他终于说，“你深信不疑吗？”他那双小眼睛在眼镜片后几乎眯成了一条细缝。“今天居然还能见到如此深信自己事业的乐观主义者简直令人吃惊。你的思路很大胆，我希望现实不会太愚弄你。让你空忙一场，毫无结果，那简直就太悲惨了。”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还带着点惊讶的口气。说完他随即又慢慢退入黑暗处，房间里重新明亮起来。整个手术室笼罩在刺目的光线之中。艾门贝格正站在开关边。

“我以后再给你作检查，克拉默尔先生，”他微笑着说，“你的病很严重，你自己也清楚。不能排除危及你生命的嫌疑。根据我们方才的交谈，很遗憾，我只能产生这个印象。你很直率，我也开门见山。还不能轻易就给你检查，因为还待给你做一项手术。我想，这个手术我们还是过了新年以后再做为好，不知你意下如何？我们不要破坏这个美好的节日。目前最主要的任

务是：我得把你保护好。”

贝尔拉赫不作声。

艾门贝格掐灭手上的香烟。“真见鬼，玛尔洛克大夫，”他说，“我竟在手术室里抽烟。克拉默尔先生是一个好激动的客人。你应当警告他，当然更要警告我才是。”

“这是什么东西？”当女医生递给他两粒红色药丸的时候，老人问。

“一种镇静剂而已，”她说。贝尔拉赫比刚才更不愉快地喝下了女医生递给他的水。

“请你打铃叫女护士来，”开关边传来艾门贝格的命令声。

克莱丽护士出现在门口。探长觉得她好像是一个温柔的刽子手出现在自己面前。“刽子手总是很温顺的，”他想。

“你把克拉默尔先生安排在哪间病房里？”医生问。

“七十二号病房，博士先生，”克莱丽护士回答。

“请他住五十五号病房，”艾门贝格说，“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他。”

疲乏感又重新降临贝尔拉赫全身，他刚才在洪格尔托贝尔的汽车里已经感受过一次。

当女护士把老人推进走廊时，车子猛然转了一个大弯。贝尔拉赫从疲乏中惊醒过来，正好看见艾门贝格的脸。

他看见医生正在注意地观察他，满面笑容，神情开朗。

他浑身打颤，又倒在床上。

## 病房

当他醒来时（总是在夜里，将近十点半钟，他想，他可能已经睡了三个小时），他察觉自己在一间病房里。他有点惊奇，有点担心，也有一点高兴，因为他一向讨厌病房，而这个房间却更像一间工作室、一间技术室，这很中他的意。房间很冷，也没有特色，他凭借装在他左侧一盏床头灯的亮光尽量辨认着房间里的情况。这张床——他自己穿着睡衣盖得严严实实地躲着的床——依旧是人们把他从外面推进来的那辆手推车。尽管在某些小部件上稍有变动，他还是立即就认了出来。“这里的人都很讲究实际，”老人朝寂静的空间小声说着。他把那盏可以四向转动的床头灯朝房间各处照了一圈。他看见一幅窗帘严密地遮住了窗户，窗帘上满绣着奇花异草和珍贵禽兽，在灯光下闪着亮光。“看起来，我像是在狩猎，”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又躺到枕头上，思考着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他做得实在太少了。他的计划已在实施。也即是，他如今得把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进行下去，以便把罗网的绳索编织得更紧密些。他必须采取行动，然而他应该如何行动，应该从哪里着手，他完全不知道。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克莱丽护士应声进来。

“欢迎，来自布格多夫—图恩铁路线上比格仑城的护士小姐，”老人向克莱丽问好说，“你瞧，一个外籍瑞士老头子对瑞士何等熟悉。”

“噢，是的，克拉默尔先生，现在感觉怎么样？你终于睡醒啦？”她说，一双滚圆的胳膊又在腰间。

老人又看一看自己腕上的手表：“现在才十点半。”

“你饿不饿？”她问。

“不饿，”探长回答。他觉得自己十分疲乏无力。

“你瞧，先生竟然还不饿。我要去请女大夫来，你认识的那一位。她会再给你打一针的，”护士回答说。

“胡说，”老人嘟哝着反对说，“我什么针也没有打过。最好请你打开天花板上的大灯。我要看看整个房间。人总应该知道自己躺在什么环境中吧。”

他可真生气了。

房间里亮起一种白色而并不刺眼的灯光，人们一下子弄不清它们来自何处。整个房间在新的光线中清晰得多了。老人这时不高兴地观察到自己头上的天花板竟是一大片镜子，没完没了地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可真是一件不痛快的事。“到处都是镜面天花板，”他想，“简直像发了疯。”心里却暗暗害怕抬头看见那副低头凝视着他的骷髅，因为那就是他自己。“这镜子有毛病，”他想，“有一种专门歪曲形象的镜子，我怎么可能瘦成这样呢？”他忘记了一动不动等候在一边的护士，只顾环视房间四周。他左边是一堵用某种灰色材料制成的玻璃墙，墙上凿刻着许多赤身裸体的人像，一群正在跳舞的男男女女，本来仅只是线条，却给人以立体形象感。他的右边是一堵灰绿色的墙，在门和窗帘之间有一幅伦勃朗的解剖图，好像房间里装了一扇翼门，初看并无用意，然而却是算计好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给整个房间增添淫秽气氛，更有甚者，在房门上方，目前站着女护士的地方，钉着一副乌黑粗糙的木十字架。

“啊，护士小姐，”他说，灯亮后房间内的变化还在使他惴惴不安。因为他起初只看见窗帘，安全看不见那些舞蹈着的裸体男女，看不见解剖图，

也完全没看见十字架。因而当前这一完全陌生的世界使他心里充满疑虑。“啊，小姐，医院是让人恢复健康，而不是让人发疯的，这间病房对于医院来说未免太古怪了。”

“我们是在宋纳斯泰医院，”克莱丽护士回答说，双手交叉放在腹部。“我们要照顾到各色人等的不同愿望，”她唠叨起来，由于可以畅所欲言而兴高采烈，“我们既要照顾那些最虔诚的病人，也要照顾到其他的人。说实话，倘若你不喜欢这幅解剖图，可以换成波堤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或者换一幅毕加索的作品。”

“那还不如换一幅《骑士、死亡和魔鬼》呢，”探长说。

克莱丽小姐取出一本笔记簿，记下《骑士、死亡和魔鬼》。“明天就派人来安装。一间候死的房间要安装一幅美丽的图画。我祝贺你。先生的兴致真好。”

“我谢谢你，”老人回答说，对于这位克莱丽小姐的出言不逊感到吃惊，“我估计自己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克莱丽小姐沉思地摇摇自己红红胖胖的大脑袋。“事实却已到这个地步了，”她肯定地说，“住在这里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例外。我还没有看见有谁活着离开三号病房。而你目前正在三号病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人人都难免一死。请你读读我对此所写的书。是瓦克林根的李希梯印刷所出版的。”

护士从胸前掏出一本宗教小册子，把它放在老人的床上：《克莱丽·格劳贝尔：死亡、目标和我们生活道德的目的。一本实践入门》。

她喜气洋洋地询问老人，要不要去请女医生来一次。

“不要，”探长回答，手里一直拿着那本《目标和我们生活道德的目的》。“我不需要请女医生。倒是需要拉一下窗帘，并且打开窗户。”

窗帘拉到一边，电灯也熄灭了。老人自己又关了床头灯。

克莱丽小姐肥胖的身躯消失在灯光明亮的房门方框处，就在她关上房门之际，他又问道：

“小姐，请等一等！你对一切问题都作了直率而令人满意的答复，请再告诉我一个事实：这幢房子里有一个侏儒吧？”

“当然有一个，”从门框边传来一声粗暴的答复。“你不是已经看见过他啦！”

接着房门便关上了。

“岂有此理，”他想。“我得离开这三号病房。这也不需要耍什么花招。我给洪格尔托贝尔打一个电话就行。我病得太重，想不出什么对付艾门贝格的好办法。明天我就回沙来姆医院去。”

他甘愿承认自己目前的处境，既不恐惧，也不害羞。

外面是黑夜，房间里一片黑暗包围着他。老人躺在床上，几乎屏住了呼吸。

“稍停片刻总可以听到钟声吧，”他心中暗想，“苏黎世的钟声，庆祝新年的教堂钟声就要敲响了。”

不知何处传来时钟敲十二点的响声。

老人期待着。

不知何处又传来钟声，始终是令人沮丧的敲击十二点的钟声，一下接着一下，好像铁锤敲击在金属门上。

听不见教堂钟声，什么声音也没有，就连远处欢乐人群聚在一起时的喧哗声也听不见。

新的一年就这么沉默地光临了。

“世界上的人都死光了，”探长想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世界上的人都死了，世界上的人都死了。”

他感觉额头直冒冷汗，一滴一滴慢慢沿着太阳穴往下流淌。他圆睁双眼，一动不动地躺卧着，忍受着。

远处再度传来钟敲十二点的响声，随即又消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城市上空。于是他觉得自己好似掉进了一个无边无涯的大海，掉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天蒙蒙亮时，他睡醒过来，正是一天的晨曦时刻。

“这个新年人们没有敲钟，”他一再想着这个问题。

他觉得房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可怕。

他呆呆瞪视着越来越亮的晨曦，看着灰绿色的阴影逐渐稀薄，直至他发觉：

窗户上都钉着铁栏杆。

## 玛尔洛克博士

“现在他像是睡醒了，”门边传来一个人的声音，传到正凝视着窗户铁栏杆的探长耳中。雾蒙蒙的、幻影似的晨光逐渐笼罩了整个房间，一个穿白褂子的老妇人走进屋来，看上去面容憔悴，面目浮肿，贝尔拉赫好不容易才吃惊地认出正是他在艾门贝格手术室里见过的女医生。他呆呆瞪着她，一阵阵疲乏和恶心向他袭来。她根本不理睬探长，撩起裙子，隔着长统袜朝自己大腿上注射了一针。打完针，她挺直身子，拿起一面小镜子开始修饰打扮。老人紧张地注视着她的全部动作过程。他注意到她的面容重又变得新鲜而明朗，不再憔悴苍老，她一动不动倚着门框站在房间里，正是他刚抵达此地时见到的美女。

“我懂，”老人从麻木状况中清醒过来慢慢地说，其实他依旧疲乏不堪而且神志不清。“是吗啡针。”

“是的，”她回答，“人们在这个世界里需要这种药剂——贝尔拉赫探长。”

老人瞪视着窗外越来越暗的晨色。现在外面下起了大雨，雨水滴进昨晚铺满各处的雪地里，然后他好似漫不经心地轻声说道：

“你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

接着便又继续凝视窗外。

“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于是女医生也同样肯定地说，身子依然斜倚门框边，双手插在白外衣的口袋里。

怎么打听到的呢？他问，语气里却并无丝毫好奇感。

她把一份报纸扔到他床上。

是一份《联邦报》。

老人一眼就看清报纸第一版登着他的照片，还是他春天时照的相片，那时他还在抽巴西的奥尔蒙牌香烟呢。下面写着：伯尔尼市警察局探长汉斯·贝尔拉赫最近退休。

“原来如此。”探长喃喃地说。

接着他又十分气恼地朝报纸瞟了第二眼，看见了出版日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失去了控制。

“日期，”他哑声叫嚷，“日期，大夫！请看报纸的出版日期！”

“怎么样？”她问，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

“出版日期是1月5日，”他绝望地喘息着说，此刻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听见新年钟声，为什么昨天整夜寂静得可怕了。

难道他期待的是另一个日期么？她嘲讽地问，同时也显然感到好奇，因而略略扬起了眉毛。

他尖叫：“你们在我身上搞了什么花样？”他挣扎着企图坐起身子，却无力地摔倒在床上。

他又让自己的手臂在空中挥舞了几圈，然后重新一动不动地躺下了。

女医生取出一只烟盒，从中抽出一支香烟。

她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我不希望有人在我的病房里抽烟，”贝尔拉赫轻声说，语气却很坚决。

“窗户上都有铁栏杆，”女医生对他说，还用头朝他作着姿势，铁栏杆外仍旧在下雨。

“我不信你还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接着她转身走向老人，站在他床边，双手仍然插在衣袋里。

“因苏林，”她说，目光向下俯视着他。“头头给你实施了因苏林疗法。这是他的特长。”她笑笑说，“你不是想逮捕这个人吗？”

“艾门贝格谋杀了一个名叫内莱的德国医生，而且他不用麻醉药替人开刀，”贝尔拉赫冷静地说。他觉得自己必须争取这个女医生。

他已决定不惜一切铤而走险。

“他干的坏事比这些要多得多，我们的那位博士，”女医生答复说。

“你全知道！”

“当然。”

“你能承认艾门贝格顶着内莱的名字在斯图霍夫集中营当医生？”他急切地问。

“当然。”

“你也能承认他杀了内莱？”

“为什么不承认！”

一下子，贝尔拉赫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那由于洪格尔托贝尔突然苍白的脸色和一张旧照片所引起的极其巨大而又深奥难解的怀疑，在这一长串无穷无尽的日子里，好像一只沉重包袱让他背着到处走来走去转悠不停，贝尔拉赫精疲力竭地望望窗外。一丝丝闪着银光的雨水顺着铁栏杆往下滴落不停。他曾经如此热切地期待着真相大白的时刻，就像他期待安息的时刻一般。

“倘若你知道一切真情，”他说，“那么你是同谋犯。”

他的声音又疲乏又悲哀。

女医生只是目光向下朝他奇怪地瞥了一眼，她的沉默令他不安。她高高撸起右衣袖，小胳膊上烫着一个数目字，深深嵌进了肉里，就和烫在牲口上的号码一样。“还要我把背部露给你看么？”她问。

“你在集中营呆过？”探长吃惊地大喊，傻瞪着她，用右胳膊支撑着自己，吃力地半抬起身子。

“艾迪特·玛尔洛克，但泽市斯图霍夫死亡集中营，4466号囚犯。”

她的声音冷酷而淡漠。

老人倒在枕头上。他诅咒自己的重病，自己的虚弱无力，自己的无计可施。

“我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她说，把撸起的袖子拉下。

“你怎么能活着出集中营呢？”

“事情很简单，”她回答说，始终漠然对视着他的目光，好似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震撼她，不论是人类的感情，还是什么可怕命运。

“我当了艾门贝格的情妇。”

“这简直不可能，”探长脱口而出。

她惊讶地望着他。

“一个拷问者怜悯一条垂死的母狗，”她终于说道，“在斯图霍夫集中营的女犯人要找到一个纳粹医生当情夫，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每一条拯救自己的道路都是可贵的。为了离开宋纳斯泰医院，你不是也不择手段吗？”

他浑身颤抖急切地第三次试图坐直身子。

“你一直是他的情妇？”

“当然。为什么不是？”

她不可能如此这般的。艾门贝格是一头可怕的野兽，贝尔拉赫尖叫着说。“你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你应该是有信仰的！”

“是的，我曾经有过信仰，”她平静地说，“我深信，人们应该热爱这个环绕太阳运转的、由石块和泥土构成的可怜东西，热爱我们的地球。以理性的名义去帮助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我们的责任，让他们摆脱贫困和剥削。我的信仰并不是空话。当那个留着可笑的胡子和一撮额发的蹩脚画家接管了政权，也即是说，对于他从此以后的罪行作出了特定的表现之后，我就流浪到了这个我和所有共产党员全都信任的国家里，投入了贤惠的母亲怀抱，逃到了可敬的苏联。噢，我有过自己的信念，并且在世界上付诸实践。我曾像你一样作出决定，探长，要和罪恶作斗争，直至我生命的最后神圣时刻。”

“我们不可以放弃这场斗争，”贝尔拉赫轻轻地说。他又冷得浑身打颤，只好重新躺下。

“那么我请你照照头上的镜子，”她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已经照过了，”他回答，目光却恐惧地不敢往上看。

她笑笑。“一架美丽的骷髅，是不是，它正对着你，伯尔尼市的大探长狞笑呢！同罪恶进行斗争的学说永远不可以放弃，不论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都不可放弃，这适用于真空地带，或者其它类似的地方，例如写字桌上；却不适用于我们这颗行星，我们正像女巫骑着扫帚在宇宙间飞转呢。我信仰得很深，很深，因而当我看到俄国老百姓的贫困，看到这块辽阔广大土地上的种种悲惨景象时，并没有失望，这块土地上本来不应该崇尚暴力，而只能宣扬自由精神的。当俄国人把我关进他们的监狱，不经审讯和判决，把我从一个集中营驱赶到另一个集中营，我自己完全不明白其中原因，我也没有失望，还认为这么做对伟大的历史计划是具有意义的。当那个举世闻名的条约签订以后，我只从必要性去加以理解，甚至认为从此就可以留在伟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了。然而，1940年严冬的某个早晨，当我在一列从西伯利亚开出的牲口车厢里走了几星期，由俄国兵士押着和一大群破衣烂衫的人一起被驱赶进了一座难看的木桥，污秽的河水夹带着冰块和木板缓缓流过桥下。当我们抵达对岸时，晨雾中出现了穿黑制服的党卫军身形，他们接收了我们，我立即明白这是背叛行为，他们所背叛的不仅是这批为上帝所遗弃的、正蹒跚向斯图霍夫集中营走去的可怜穷鬼，不是的，他们也背叛了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只有和人性、博爱思想相一致才有意义。随后我走过了这座桥，探长，永恒地越过了这座污黑肮脏、摇摇晃晃的小桥，桥下流淌着布克河水（和地狱里那条布克河同名）。从此我明白了人类的本性，也即是说，凡是一个掌权者或者任何一个艾门贝格，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和理论想出来的事情，都可以随便让人去干。因为人们通过拷打可以从人的嘴里压榨出任何供词，因为人的意志有局限，而酷刑却是无穷尽的。抛弃你期待于我的任何希望吧！我已抛弃了任何希望！为了保卫自己，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完全毫无意义。人类自己向往走向地狱，在思想上作着准备，在行动中予以实践。到处都一模一样，不论在斯图霍夫，还是在宋纳斯泰，都是同一种可怕的旋律，它发自人类灵魂的深渊，伴和着阴郁的和声逐渐升高。倘若但泽市的集中营是犹太人、基督徒和共产党员的地狱，那么在这里，处于英勇的苏黎世市中心的医院便是富人们的地狱。”

“你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用的都是些奇怪的语句，”贝尔拉赫问，目光紧紧追随着女医生，她又吸引他，又令他感到恐怖。

“你很好奇，”她说，“而且看来还很为此自豪。你敢于闯进狐狸窝，这里却并无任何出口。你不必打我的主意。我对一切都冷得很，连艾门贝格在内，他仍是我的情夫，我对他也很冷淡。”

## 富人的地狱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女医生又开始说话，“你想从这个沉沦的世界里取得什么呢，探长，每日每时无数的盗窃案件待你侦破还不能令你满足吗？难道你必须闯进宋纳斯泰医院，闯进这个同你毫不相干的地方来吗？我猜想，大概是一条业已退役的警犬还企图往上爬。”

女医生说完微微一笑。

“哪里有罪恶，就得上哪里去搜寻，”老人回答，“法律就是法律。”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数学，”女医生回答，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她始终站在他的床边，毫无犹豫不决和小翼翼的态度，不像人们通常对待一个病人的模样，倒像是站在一个犯人身边，这个犯人业已捆绑在尸架上，人们已公认他该死，欢迎他去死，认为消灭一个无益的生存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例行公事。“你这句话使我立刻想到你正是那种宣誓效忠数学的蠢人。法律就是法律。 $x=x$ 。这句最尖端的空话曾被人高高捧到天上，捧到那永远鲜红或永远漆黑的天上，”她笑笑说，“好似人类真正掌握着什么法规，可以不必顾虑权势的力量！法律也不仅仅是法律，而是一种权势；这句格言铭刻在我们去地狱时奉献的银币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独立存在的东西，一切都是欺骗。我们嘴里说的是法律，心里想的却是权势。我们说权势这个词时，脑子里想的却是财富，而我们嘴里吐出财富这个词时，心里希望的却是分享世界上的种种罪恶，法律就是财富，法律就是大炮、垄断托拉斯和各党各派；不论我们说什么话，句句都可以合乎逻辑，唯独这一句话——法律就是法律，纯粹是欺骗。数学是欺骗，什么理性、认识、艺术，统统都是欺骗。不知你意下如何，探长？我们就这样被安放在这片脆薄易碎的大地上，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了什么。然后我们便呆呆傻视着宇宙，见它时而空空荡荡，时而又拥挤不堪，完全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挥霍。于是我们便向远方的瀑布奔去，总有一天它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于是我们便为了死亡而生活着，我们呼吸，我们谈话，我们恋爱，我们有了子子孙孙，为了最后又把把他们——我们所爱的、从我们自己血肉中诞生的子子孙孙——重新转变成灰烬，重新化为曾经组合装配成我们的毫无价值的、死的元素。纸牌已经洗过、玩过，又重新合拢在一起。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紧紧攀着的这片由泥土和冰块构成的漂浮着的大地之外便一无所有，因而我们便希望自己的个人生活——好似架在烟雾弥漫的深渊上的一道彩虹一闪即逝的短暂时刻——是一种比较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地赐给我们富裕，在它负载着我们的短暂时刻中赐与我们虽则少得可怜，却是独一无二的恩惠。可是事实不是如此，而且永远不会如此，因为犯罪行为，探长，并不产生于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存在不幸和贫困，而是由于同时存在穷人和富人，在于这条载着大家一起下沉的船只里，在穷人们坐的统舱旁边还有有钱有势人住的高级客舱。人人都难免一死，大家就说，这是无可更改的事。死就死吧。噢，这简直是滑稽的数学！一种是穷苦人的死，另一种是有钱有势人的死，两者之间隔着一个世界。贫穷的弱者和有权有势者就在这里演出着血淋淋的悲喜剧。穷人们活着的时候怎么样，死的时候也怎么样，死在地下室的麻布袋上，稍稍高级一点的死在破破烂烂的床垫上，更高级的便是光荣地流血牺牲在战场上。而富人们却完全是另一种死法。他活着过的是奢侈生活，于是死也要死得奢侈，他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连死亡时还要双手鼓掌呢。欢呼

吧，我的朋友们，戏剧演出到此结束！生活是装腔作势，死亡是胡言乱语，丧葬是大吹大擂，而全部过程是一场买卖而已。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倘若我能引导你在这座医院里周游一番才好呢，探长，这座宋纳斯泰医院把我变成目前这副模样，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而仅仅是一堆需要注射越来越大量吗啡的肉，以便更猛烈地讥讽这个理该讥讽的世界，那么我就能有机会让一位退休的探长大开眼界，看到有钱人是怎么死的。我要向你敞开那些惊人的病房，它们时而乏味，时而有趣，那些有钱人便都腐烂在里面，在这一间间既有趣又痛苦，既专制又犯罪的晶亮闪光小屋里。”

贝尔拉赫没有答话。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一动不动，别转了脸。

女医生朝他弯下身子。

“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人的名字，”她冷酷无情地继续往下说，“这些人有的早已在这里灭亡，有的正在走向灭亡，他们有政治家、银行家、工业家、高等妓女和富孀，都是大名鼎鼎的，还有一些不大出名的投机商，他们只要略施手段，不费吹灰之力，不费一文本钱，便可挣得千万百万的，使我们这些人倾家荡产。而他们都死在这座医院里。他们时而用褻渎的笑话来议论自己肉体的灭亡，时而勃然大怒，疯狂诅咒可恶的命运，让他们占有了一切之后，却又让他们死亡，或者又向着富丽堂皇的房间大哭大喊地作着令人作恶的祈祷，祈求自己在尘世间的极乐世界不要被天堂的极乐世界所替代。艾门贝格供给他们一切，他们也永无餍足地接受他所提供的任何一切。但他们需要的更多，他们需要希望：艾门贝格连希望也供给他们。然而他们赠与他的信任，是对魔鬼的信任，而他赠与他们的希望却是一个地狱。他们离弃上帝，找到了一个新的上帝。这些病人心甘情愿地忍受种种酷刑，如痴如醉地崇拜这位医生，只是为了让自己多活几天，甚至几分钟（像他们所愿望的那样），只是为了使自己不脱离权力以及赋与他们权力的地球，这是他们比天堂和地狱，比极乐世界和永劫不复都更为喜爱的东西。我们的头头在这里也不用麻药给人开刀。艾门贝格在斯图霍夫，在但泽平原上那个灰色的、一望无际的平房城市里所干过的一切，原封不动地照样搬到这里采用了，就在瑞士的中心，在苏黎世的中心，丝毫不受警察局和这个国家法律的干扰，是的，甚至还用着科学和人道的旗号。他坚定不移地给与人们向他期求的东西：痛苦，无穷尽的痛苦。”

“不行，”贝尔拉赫尖叫起来，“不行！一定要除掉这个恶人！”

“那么你先得把人类都消灭光，”她回答说。

他再度嘶哑着嗓子绝望地喊着“不行”，还使劲坐直身子。

“不行，不行！”他嘴里还在喊，声音却低得近乎耳语了。

女医生漫不经心地触一触他的右肩，他便无力地倒在枕上。

“不行，不行，”他躺在床上嘟囔着。

“你真蠢！”女医生嘲笑着说。“你喊叫‘不行，不行’有什么用呢！我来自黑煤矿区，我也曾朝着充满灾难和剥削的世界大喊‘不行，不行’，而且开始努力工作：在党内、在夜校，后来在大学里，始终坚定而顽强地为党工作着。我就因为‘不行，不行’而学习着、工作着；可是现在，探长，现在呢，在这个风雪交加、烟雾弥漫的清晨，当我穿着医生的白外套站在你床前的时候，我明白，这个‘不行，不行’毫无意义，因为地球实在过于衰老，连‘是的，是的’也已说不出来了，因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天堂和地狱相结合的新婚之夜里（人类正是这个新婚夜的产儿），善与恶已经紧紧纠

缠在一起，再也不能把它们互相分开，也不能解释清楚：这是康乐，而那是病灾；或者这是行善，那是作恶。太迟了！我们已不可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驯顺或者抗拒的态度会导致什么后果，在我们吃的水果上，在我们拿给孩子们吃的面包和牛奶上会粘着什么样的剥削和罪行。我们杀人，却没有看见受害者，对受害者也一无所知，我们被杀，凶手本人却毫不知情。太迟了！这种生存下去的诱惑力太大，而人类想让自己活着有所作为的祈求则太小。如今，我们已被我们自己行为的癌症所吞食，我们已病入膏肓，只有死路一条。这个世界已经腐烂，探长，它就像一只存放过久的水果一样腐烂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地球已不可能再变为天堂，来自地狱的熔岩浆，是我们在取得胜利、荣誉和财富的那些邪恶的日子里所决堤冲开的，如今正照亮着我们的黑夜，再也不能把它们重新纳入它们冲决出来的矿坑渠道里去。我们仅能在梦中重新获得我们失去的东西，仅能通过吗啡针得到自己渴望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于是我，艾迪特·玛尔洛克，一个三十四岁的妇女，便这样做了：我给自己注射这种无色的液体，让它们白天时给予我玩世不恭的勇气，黑夜里给予我色彩斑斓的梦境，并且按照别人的命令去犯罪，以便让自己在一种一闪而逝的幻觉中占有那些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生活就是这么回事（C'est ça），艾门贝格，你的同乡，这个伯尔尼人，他了解人类，知道如何利用他们。他无情地朝我们最软弱处下手：人人都恐惧永恒的失落。”

“请你走吧，”老人低声说，“请你立即走吧！”

女医生微微一笑。她当即站起身来，美丽、傲慢、不可接近。

“你想制服邪恶，却害怕我所说的‘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她边说，边重新化妆打扮，往脸上扑着香粉，她又斜倚在门框边，房门上方仍然孤零零毫无意义地挂着那架古老的木质十字架。“你在一个渺不足道、受尽人间折磨、凌辱的女奴隶面前尚且感到害怕，你怎么能够对付艾门贝格本人，这个地狱的魔王呢？”

接着，她把一份报纸和一只棕色信封扔到老人的床上。

“我的先生，读读这封信吧。我想，你看到自己的一片好心所惹起的结果，会大吃一惊的。”

## 骑士、死亡和魔鬼

女医生离开之后，老人还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他的怀疑已经得到证实，然而本来应该让他感到满意的事，只引起他一阵阵恐惧。他算计得很正确，行动却很错误，正如他自己所预感的。首先他觉得自己身体十分衰弱。他丧失了整整六天。可怕的、失去知觉的六天，而艾门贝格却已搞清楚是谁在追捕他，于是下了毒手。

当克莱丽小姐端来咖啡和小面包时，他终于让她帮助坐直身子，倔强地吃喝着她送来的食物，他已下定决心战胜虚弱，发起进攻，虽然心里还很疑惧。

“克莱丽小姐，”他说，“我是警察局的人，让我们开诚布公谈谈，也许更好些。”

“我明白，贝尔拉赫探长，”女护士回答，威风凛凛地站在他床边，模样很吓人。

“你知道我的名字，如此说来你也是艾门贝格的同伙，”贝尔拉赫接着说，心里有点迷惘，“那么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你想逮捕我们的首领，”她说，低下头看看老人。

“逮捕首领，”探长点点头说，“你可知道你们的首领在德国斯图霍夫集中营杀了许多人吗？”

“我们的首领早已皈依宗教，”来自比格仑城的克莱丽·格劳贝尔小姐骄傲地答复说，“他的罪孽业已得到宽恕。”

“怎么可能呢？”贝尔拉赫惊愕地说，呆呆瞪视着站在自己床前的这位虔诚老实的胖女人，她双手交叠放在肚子前，容光焕发，充满了信念。

“他刚刚读过我写的小册子，”护士小姐说。

“就是那本我们生活道德的意义和目的吗？”

“是的。”

病人生气地喊道，这简直是胡来，艾门贝格还在继续杀人呢。

“从前他杀人出于憎恨，如今则是出于爱，”女护士高兴地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医生而杀人，因为人们都偷偷向他要求死亡。请你读一读我的小册子。人类唯有通过死亡才能到达自己更高的境界。”

“艾门贝格是一个罪犯，”探长呼吸急促地说，由于一再为自己申辩而精疲力竭。“这些艾门塔勒人永远是一帮最该死的宗派主义者，”他满怀绝望地想着。

“我们生活道德的意义和目的不可能是罪行，”克莱丽小姐否定地摇摇头，把吃剩的东西收拾干净。

“我要把你当作同伙向警察局告发，”探长威胁她说，心里清楚自己所使用的是最蹩脚的武器。

“而你现在住的是三号病房，”克莱丽·格劳贝尔小姐说，为这个倔强不听话的病人感到难过，随即走出了病房。

老人怒气冲冲拿起邮件。他熟识这个信封，正是福西奇邮寄《射苹果报》时惯用的信封。他打开封套，报纸掉了出来。这份报纸和二十五年来情况一样，是用一架生锈而破烂的旧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L和r已经缺损，字

迹模糊不清。“《射苹果报》。瑞士出版，供应国内国外，瑞士反对派报纸。乌里希·弗里德利希·福西奇编印出版。”这是刊头，铅印的，下面便是打字机打下的正文：

一个党卫军打手成了首席医生

倘若我没有确凿证据（福西奇写道），这些可怕的、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它们绝非一个刑事专家或者一个作家所提供，而完全是千真万确的现实情况，那么我就必须把真实迫使我写下的这些东西，当成是一种病态想象力的产儿。要让真实说话，即使真实会吓得我们脸色苍白，即使真实会永恒动摇我们的信念——也即是对于我们人类始终存在的、并且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存在的信念。有一个人，一个伯尔尼人，顶着别人的名字在但泽市一个纳粹集中营里干了无数血淋淋的勾当——对于他的种种兽行，我没有勇气细加描述——令我们震惊的是：竟然允许他领导瑞士一家医院，这是一种耻辱，是一种我们找不出任何词句加以形容的耻辱，这也是一种标志，说明我们目前确实已经非完蛋不可。但愿我这番言语能导致一场诉讼，尽管这么做很可怕，对于我们的国家会很惨，却仍然必须去做，我们的威望正处于困境之中，当前流传着一种无伤大雅的流言，我们脱胎换骨地经历了这个时代阴暗的热带丛林，却依然近乎诚恳老实（虽然常常比从前依靠钟表、奶酪和一些无足轻重的武器所赚的钱要多些）。因而我仍然得采取行动。倘若我们玩弄不允许人们玩弄的正义，倘若我们最后终于让佩斯塔罗切也不得不替我们感到羞惭，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一切。我们不能饶恕那个罪犯，那个苏黎世医生，因为他也从来不曾饶恕过任何人，我们要逼迫恫吓他，因为他一直逼迫恫吓别人；我们最后要杀死他，因为他曾经杀害过无数人——我们明白，我们写下的是一份死刑判决（这句话贝尔拉赫一连读了两遍）；对于那个私人医院的主任医生——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要求他自己到苏黎世的警察局去自首。原本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人类，现在却只知道越来越多地杀戮，好似已不懂得任何第二种技能，这么一种人类，最终也包罗进了我们这些瑞士人，因为

在我们内心里也包含着这类同样的不幸胚芽。把道德看成是无利可图，而把有利可图当作合乎道德来对待。人们最后总能通过对这个杀人累累的凶手所下的赤裸裸的判词学习到，人类所蔑视的精神力量也能撬开沉默的嘴，并且逼迫他们走向灭亡。

这篇极其虚浮夸张的文章完全符合贝尔拉赫原来的计划，他的目的很单纯，没有花样，只是吓一吓艾门贝格而已——至于其它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他凭着一个老刑事专家的自信过于麻痹疏忽——目前他毫不怀疑地认清自己已经错了。艾门贝格远不是那种吓一吓就倒退的人。探长感到，福西奇如今正处于危险境地，他只能盼望作家业已抵达巴黎，因而可保生命无恙。

意外地出现了贝尔拉赫认为可以使自己和外界取得联系的机会。

一个工人走进了病房，胳膊下夹着度勒那幅《骑士、死亡和魔鬼》的放大复制品。老探长细细打量着来人，他估计那个人不到五十岁，是一个心地善良、却不太能干的人，穿着一件蓝色工作服，一进门就立即动手卸下那幅《解剖图》。

“喂，”探长招呼他，“请你过来一下。”

那个工人继续卸墙上的画。他不时把手上的老虎钳、螺丝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跌落地上，当他弯腰捡拾时动作很迟缓笨拙。

“喂，”贝尔拉赫见那工人不理睬他，便高声喊叫起来，“我是警察局的贝尔拉赫探长。你懂不懂：我目前有生命危险。你干完活以后，立即离开这座大楼，赶紧去找施图茨检察官，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认识他的，或者去找任何一个岗警，让他们同施图茨联系。你听懂了没有？我需要这个人帮忙。要让施图茨到我这里来。”

那个工人依然不理睬老人，探长躺在病床上吃力地向他阐述着——他感觉自己说话很困难，并且越来越困难了。《解剖图》已经从墙上卸下，现在那个工人正检查着度勒的画，他细细端详着画幅，一会儿凑得很近，一会儿又拿在手里像捧十字架似的远远举到前面。柔和的乳白色光线从窗户射入室内，一瞬间老人觉得白茫茫的雾气后有一个黯淡无光的大球正在翻腾上升。那个工人的头发和胡子都被光线照得亮晶晶的。屋外已经不下雨了。那个工人连连摇着头，似乎这幅画让他感到极其可怕。他侧转身子朝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用一种咬字发音特别的声调慢吞吞说起话来，脑袋随着话音不断来回晃动。

“没有鬼的啊。”

“有的，”贝尔拉赫气得哑声喊道，“有鬼的，嗨！这所医院里就有。喂，请你听着！他们大概已经对你说过，我是一个疯子，专门胡言乱语，事实上我正遭遇生命威胁，你听懂了吧，我的生命正受到威胁。这便是事实，喂，是事实，道道地地的事实！”

此时工人已把度勒的画安装在墙上，随即转身退到贝尔拉赫身边，他朝画上那位直挺挺骑在马上的骑士狞笑着，嘴里发出一种叽叽咕咕含混不清的语音，贝尔拉赫一下子没有听懂，最后才拼凑出他的意思。

“骑士丢失了，”从这个穿蓝工作服工人那张歪斜扭曲的嘴里慢吞吞地、清晰地吐出这么一句话来，“骑士丢失了，骑士丢失了。”

直至工人离开病房，动作笨拙地关上房门后，老人才理会到刚才和自己说话的是一个白痴。

贝尔拉赫拿起报纸，打开一看，是《伯尔尼联邦报》。

他首先看到的是福西奇的脸，照片下面写着：乌里希·弗里德利希·福西奇，名字旁边是一个黑十字。

## 福西奇之死

“本星期二至星期三晚上，伯尔尼市一位著名的作家，也许说他是一位声名狼藉的作家更为恰当，这位福西奇不明不白地结束了自己可怜的生命，”——贝尔拉赫读着这个消息，感到好似有人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这位先生，”《伯尔尼联邦报》的采访记者过分庄重地继续叙述道，“大自然赋予他美丽的才情，但是他却不懂得好好利用这些天赋。他开始（文章接着描写道）写作表现主义戏剧，受到一批街头文学家吹捧，而他的文学创作才能却每况愈下（老人苦恼地想道，福西奇至少还是有文学才能的嘛），直至他有一天突然想到自己独力创办一份《射苹果报》，这份用打字机打出的报纸每期印五十份左右，不定期出版。不论谁读一读这份荒唐透顶的报纸立即便知道：统统都是攻击性文章，不仅攻击我们大家所尊重并且奉为神圣的一切东西，而且还攻击那些声誉卓著、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他越来越堕落，人们常常看见他喝得酩酊大醉，脖子上围着那条远近闻名的柠檬黄围巾——下层社会的人干脆叫他柠檬——，他醉醺醺地从一家酒馆游荡到另一家酒馆，一批大学生伴随着他，他们奉他为天才，祝他长寿。关于这位作家之死还可补充下列情况：福西奇自新年以来始终或多或少带着醉意。他受到某一位好心肠的私人资助，最近又出了一期《射苹果报》，这期报纸当然特别可怕。他攻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也许是他胡诌出来的医生，医学界都认为文章荒诞无稽，他显然为了出名而不惜犯罪，目的是蓄意制造混乱。后来的种种事实说明全部攻击正如上面所述，纯属无稽之谈，因为那位作家一面在文章里慷慨激昂地敦促那位没有点名的医生自己去伯尔尼警察局自首，一面又到处宣扬本人将赴巴黎休假十天，然而他却并没有走。他把行期推迟了一天，而于星期三夜里在他凯斯勒街的寒伦寓所里举办了一个告别晚餐会，出席者有作家布金格、大学生费里德林和斯托勒。第二天清晨将近四点钟时，福西奇——这时已酩酊大醉——到房间正对面隔着一条走廊的厕所去。他打开了自己工作室的房门，想稍稍散一散呛人的烟雾，三位客人依然坐在餐桌旁喝酒，三个人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厕所的门，他们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福西奇仍未从厕所出来，他们有点担心，便喊叫他，他们敲打厕所的门，可是没有回答，他们使劲摇晃锁着的厕所门，却怎么也推不开。布金格跑到街上喊来警察格贝尔和看门人布伦艾森，才撬开了厕所门。大家发现这个倒霉蛋蜷缩着躺在地上，已经死了。这场不幸死亡的原因还不清楚，然而决不可能像预审法官路兹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断言的是一场谋杀。确实，调查后证明福西奇是被某种硬物自上方击中而致死的，但分析出事现场后发现不可能是凶杀。厕所在四层楼上，有一扇小小的窗户恰好对着楼顶的采光井，采光井的通风道非常狭窄，不可能有人从那里爬上爬下。警察局的人作过有关试验后明确了这一事实。厕所门也肯定是从里面门上的，因而关于是否采用任何人们熟知的伪造手法进行欺骗这一点也被排除了。厕所门没有钥匙孔，是用一根很粗重的门栓门上的。再也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这位作家是自己不幸摔死的，尤其由于他，正像德特林教授所分析，当时业已醉得糊里糊涂……”

老人看到这里不禁一松手，报纸跌落地上。贝尔拉赫双手痉挛地抓着床单。

“侏儒，那个侏儒！”他朝房间喊道，一下子就明白福西奇是如何死的。

“是的，是那个侏儒，”从不知不觉打开的门边传来了一个平静而傲慢的声音。

“你得承认，探长先生，我派去的是一位人们不容易觅到的刽子手。”

门框下站着艾门贝格。

## 钟

医生关上房门。

探长首先发现他没有穿工作服，而穿着一件深色格子上装，银灰色衬衫上系着白领带，显得经过一番细心修饰，那模样简直时髦得过了头，更有甚者，手上还戴着一副厚厚的黄皮手套，好似生怕弄脏了自己。

“我们伯尔尼人总算可以聚聚了，”艾门贝格说，朝自己面前瘦得骷髅般的一筹莫展的病人微微鞠了一躬，讥讽甚于礼貌。随后他拖出一把椅子，那椅子原来放在拉开的帘子后，所以贝尔拉赫一直没有看见。医生在老人床边坐定，把椅子背转向老探长，于是他的胸脯便紧贴着椅子靠背，交叉的胳膊搁在椅子背上。老探长再度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拾起报纸细心地折叠好放到床头柜上，随即按照老习惯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

“你派人杀了福西奇，”贝尔拉赫说。

“倘若一个人以如此激烈的笔调写下一项死刑判决，我认为当然应该给以惩罚，”另一人以同样公事公办的声调答复贝尔拉赫，“如今连写作也成为威胁别人的东西，这么对付他便很正确。”

“你想把我怎么样？”探长问。

艾门贝格微微一笑。“按说这个问题应该首先由我来问：你想把我怎么样？”

“这一点你心里清清楚楚，”探长回答。

“是的，”医生承认，“我很清楚。所以你心里也应该同样清楚，我要把你怎么样。”

艾门贝格站起身，走到墙边，他把背对着探长，朝墙壁注视了片刻。他一定是按了装在某处的按钮或者是拉杆之类，因为那堵画着男男女女舞蹈像的墙壁好像双扇折门似的无声无息地向两边滑开了。墙后出现了一个宽敞的大厅，可以看见一架盛放着外科手术器械的大玻璃柜，金属托盘里装着锃亮的手术刀、剪子、止血塞子、灌满乳白色液体的注射器、许多瓶子，还有一只极薄的红色皮口罩，一切都干干净净，排列得整整齐齐。在这间目前已经扩展的病房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张手术台。就在墙壁滑开的同时，从屋顶上缓缓落下一张沉重而可怕的金属屏障，遮住了窗户。房间里突然亮得耀眼。老人此刻才发现天花板上镜子的缝隙里都装着霓虹灯管，而玻璃柜上方安着一只圆圆的大挂钟，一束蓝色光线正照在亮晶晶的绿色刻度盘上。

“你想不用麻药给我开刀，”老人低声说。

艾门贝格没有回答。

“我是一个病弱的老人，我怕我会痛得叫喊起来，”探长继续往下说，“我不认为你会从我这里找到一个勇敢的牺牲品。”

医生仍然不予回答，反而提了一个问题：“你看见挂钟吗？”

“看见的，”贝尔拉赫说。

“现在是十点半，”对方说，同时对了一下自己臂上的手表。“七点钟我就给你动手术。”

“八个半小时以后。”

“八个半小时以后，”医生肯定说。

“我想，先生，现在我们应该互相谈一谈。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次谈话的，之后我就不再打扰你了。我懂得人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喜欢独自一人的。”

就这样吧。只是请你别给我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他又坐到椅子上，胸脯紧靠着椅子背。

“我想，你干这一套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老人有针对性地讲。

艾门贝格不禁一愣。“我很高兴，”他终于说道，一面连连摇着头，“你居然还没有丧失幽默感。倘若福西奇还活着该多好，——可惜他已被判处死刑而且执行了。我那个小侏儒干得不错。他吃力地翻过湿淋淋的瓦片屋顶，一群猫围着他呜呜直叫，他又从凯斯勒街那座楼房的采光井通风道往下爬，爬进厕所的小窗子后用我那把汽车扳子对准坐在马桶上出神的伟大作家的脑袋猛然一击，致命的一击，对于一个小矮人真不是容易事。我当时坐在汽车里，在犹太人公墓旁边等候这个小猴子，心里确实很紧张，不知道他能否成功。这个不到八十厘米高的小鬼居然成功了，而且干得无声无息，丝毫不露痕迹。两个小时以后他就蹦蹦跳跳回到了树荫下。而你呢，探长先生，就由我本人承担责任。这件事不会很困难的，至于那种肯定会令你痛苦的言语，我们还是免了吧！但是，我的上帝啊，我们应怎么处置我们两人的共同熟人、我们亲爱的老朋友、贝伦广场的萨穆埃尔·洪格尔托贝尔医生呢？”

“你干吗提到他？”老人询问地说。

“是他送你来这里的。”

“我的事和他毫无关系，”探长立即回答。

“他每天来两次电话询问他的老朋友克拉默尔情况如何，还要求和你通话，”艾门贝格断然说，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头。

贝尔拉赫不自觉地朝玻璃柜上的挂钟看了一眼。

“不会错的，现在是十点三刻，”医生说，沉思地看看老人，并没有敌视的神色，“我们还是谈谈洪格尔托贝尔吧。”

“他很关心我，忙于治疗我的病，但是和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毫无关系，”探长固执地坚持说。

“你读过《联邦报》上你那幅照片下所登载的报道文章吗？”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暗暗思忖着艾门贝格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我什么报也没有看过。”

“报道中说你这位知名人士最近业已退休，”艾门贝格说，“然而洪格尔托贝尔却用勃拉齐·克拉默尔的名字把你送到了这所医院里。”

探长毫不授之以隙，他说，自己在洪格尔托贝尔的医院里挂号用的名字就是克拉默尔。

“而且即使他还可以看见我，未见得能够认出我来，这场病已经使我变了样。”

医生笑笑。“你声称得了重病，目的就是住进宋纳斯泰医院吧？”

贝尔拉赫没有回答。

艾门贝格怜悯地看看老人。“我亲爱的探长，”他继续往下说着，略带责备的语气，“在我们这场审讯中你一点也不迁就我。”

“是我审讯你，而不是你审讯我，”探长固执地说。

“你呼吸很困难呢，”艾门贝格关切地指出。

贝尔拉赫不再说话。他听见挂钟的嘀嗒声，老人还是第一次听见钟的响声。他心里想，以后我将永远谛听这种嘀嗒声了。

“难道现在还没有到你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吗？”医生语气友善地问。

“我似乎已经别无出路了，”贝尔拉赫精疲力竭地回答，把双手从脑袋

下抽出来，搁在被子上。“挂钟，没有这架挂钟该多好。”

“挂钟，没有这架挂钟该多好，”医生把老人的话重复了一遍。“我们两人之间何必再绕什么圈子呢？七点钟的时候我就要杀死你。倘若你能不带偏见地看待艾门贝格—贝尔拉赫案件，便能比较轻松地承受现实。我们是两个怀抱不同目的科学家，是一张棋盘前的两名棋手。你先走了一步，现在该我走了。可是我们的棋赛有一个特殊之处：要么一个人输，要么两个人都输。如今你已经输定，我很好奇，想看看我是不是也得输。”

“你要输的，”贝尔拉赫轻声说。

艾门贝格微微一笑。“这很可能。如果我没有预计到这一可能性，我就是一个最差劲的棋手。现在让我们来细细研究研究。你肯定没有多少机会了，七点钟我要拿着刀子来动手术，即使来不成（如果出现什么偶然事故），一年后你也得死于重病。至于我的机会，我会怎么样呢？我承认极其糟糕，你们已经侦查到我的踪迹！”

医生又微微一笑。

贝尔拉赫惊讶地发现，艾门贝格好像在和他开玩笑。他越来越感到医生的行为非常古怪。

“我承认，看到自己像一只苍蝇在你们的网里挣扎，我觉得很有趣，但是看到你同时也落在我的网里，就尤其有趣了。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吧。谁让你追踪我的？”

他自己一个人干的，老探长声明。

艾门贝格摇摇头。“还是谈谈可信的事情吧，”他说，“关于我的罪行——暂且使用这个通俗的措词——人们不会自动出来调查的，就像晴朗的天空里不可能产生出诸如此类的东西。尤其由一位伯尔尼警察局大名鼎鼎的探长来干更不可能，似乎我偷窃了自行车或者给人打了胎。让我们再来看看我这件公案吧——你，先生，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应该知道事实真相，这是失败者的特权。我一向办事谨慎、精细、彻底——就这一点而论，我干自己这一行可算是极干净利索的——可是不论我如何小心谨慎，总还会存在揭发我的证据。在这个偶然事故层出不穷的世界里不可能存在没有罪证的罪案。让我们逐一理理吧：汉斯·贝尔拉赫探长是从哪里着手调查的呢？当然是从《生活》杂志上那幅照片开始的。究竟是什么人如此大胆，敢于在那样的日子里拍摄下这张照片，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存在这么一张照片就够了。够糟糕的了。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事实，有千百万人看见过这幅著名的照片，其中肯定有许多认识我的人，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我认出来，照片上我的脸只露出很少。是谁认出了我呢？要么是某一个曾在斯图霍夫看见过我，后来又在这里认识我的人——这种可能性实在很小，因为我从斯图霍夫带出来的人，统统都掌握在我手中，当然，也可能有意外，我并没有全部掌握从斯图霍夫出来的人；要么是某一个对我三十年前在瑞士生活时期有类似记忆的人。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不幸事件发生在一座山间茅屋里——噢，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事情发生在一个满天晚霞的傍晚，洪格尔托贝尔是五个在场人之一。因而可以假定，是洪格尔托贝尔认出了我。”

“胡说。”老人坚定地反驳说。这种判断毫无道理，除了空空洞洞的投机取巧而外，便一无所有。他预感自己的朋友受到了威胁，是的，甚至可说正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倘若他不能转移艾门贝格对洪格尔托贝尔的嫌疑的话，虽则他并不能确切地推断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必急急忙忙给可怜的老医生下死刑判决。我们首先得掉转头来研究研究有无其他可能揭发我的证据，让我们设法替他开脱开脱吧，”艾门贝格继续往下说着，下巴压在交叉地搁在椅子靠背上的一双胳膊上，“你们调查了内莱。玛尔洛克大夫向我报告说，你们把内莱查出来了，探长先生，我恭喜你，这是惊人的成就。因而我们只好承认，是我本人亲自给内莱右眉上开了一刀留下疤痕，内莱左臂下部的大伤痕迹也是我制造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两人完全一致，让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我让他使用我的名字，并把他送到了智利——他是一个天真朴实的小伙子，从没有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却是无比博大的医学领域里一个惊人的天才。按照我们预先的约定，他回到了祖国——在汉堡港一家漏风倾圮的旅馆客房里，我强迫他吞了一颗氢氰酸胶囊。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C'est ca），我那位漂亮的情妇如果在这里，就会这么说的。内莱是一个君子。他顺从了命运的摆布——我不隐瞒自己这方面也使用了一些粗暴手段——我把他化装成人们最易于想象为极高明的自杀的模样。我们不要再谈这幕发生在妓女和水兵中间的戏剧场景了，那是一个雾蒙蒙的灰暗早晨，在这个一半已成为废墟、臭气熏天的城市里不时凄惨地传来迷航船只沉闷的汽笛声。这段经历可算是一场冒险游戏，使我一直感到有一种深深的苦恼，因为我对这位天才的医学家在圣地亚哥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他在哪里结交了哪些朋友，会不会有什么人突然出现在这里苏黎世，来拜访内莱呢？我们还是得依靠事实。倘若有人掌握了这条线索，会有什么揭发我的情况呢？首先就要提到内莱的虚荣心，他给《刺血针》和《瑞士医学周刊》投寄了许多文章。万一有人偶然想起拿它们和我以往发表的文章在文体风格上作一比较，就会成为一种致命的证据。内莱写作用的完全是道地的柏林话。而这便需要先读过这些文章才行，于是又牵涉到一个医生身上。你瞧，我们的朋友处境不妙。他确实是一个好心人，不爱怀疑别人，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对他很有利。然而，我不得不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有一个刑事专家和他作伴也参与其中，那么我便不能再帮老头子的忙了。”

“我是受警察局的委托来此地的，”探长平静地说，“德国警察局对你有怀疑，委托伯尔尼警察局对你的案件进行调查。你今天不可以给我动手术，因为我的死将会暴露你。你也不能去打扰洪格尔托贝尔。”

“十一点零二分，”医生说。

“我看见了，”贝尔拉赫回答。

“警察局，警察局，”艾门贝格喃喃说道，沉思地望着自己的病人。“当然应该估计到警察局也会对我的生平进行追查，然而我觉得在这里进行不大可能，这种情况只对你才最有利。德国警察局居然会委托伯尔尼警察局在苏黎世搜寻一个罪犯！不，不可能，这情况完全不合逻辑。倘若你没有身患重病，倘若事情恰好和你的生死无关，我也许还会相信：我作为一个医生可以判断你已作过的手术和你的重病并非伪造。报纸上说你已免职，也不可能是假消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可以断定你是一个顽固倔强的老头子，最不愿意认输，当然也不乐意退休。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也即你是单枪匹马，并没有任何人、没有警察局给你撑腰，就来到战场和我较量的，似乎还得加上你的病床，你就是躺在病床上某次和洪格尔托贝尔闲谈时产生这个暧昧不定的怀疑的，毫无任何确凿的证据。也许由于你过分骄傲，除了洪格尔托贝尔外，并未和任何别人商量，而他呢，对这桩事情看来也没有丝毫把握。而你的目的仅仅在于证明，你作为一个重病人也比那些解雇你的人懂得

多得多。凡此种使我判定这种可能性较之警察局决定派遣一名重病人处理这件棘手案件更接近真实，尤其重要的是，迄至目前为止，警察局尚没有找到福西奇死亡案件的正确线索，如果他们已经对我有怀疑，就早该发现线索了。你是单枪匹马，你来和我较量也是单枪匹马，探长。我断定，就连那位道德败坏的作家也并不知道真情。”

“你为什么杀死他？”

“出于谨慎，”医生冷冷回答说，“十一点十分。时间过得真快，先生，时间过得真快。为谨慎起见，连洪格尔托贝尔我也得杀死。”

“你要杀死他？”探长大叫，试图坐直身子。

“躺着吧！”艾门贝格断然命令说，病人只得服从。“今天是星期四，”他说，“我们所有医生下午都休息，是不是。于是我想邀请他下午来看我们，让你和我们都高兴高兴。他会自己驾驶汽车从伯尔尼来这里的。”

“会出什么事情呢？”

“我的小矮人就坐在他的汽车后面，”艾门贝格回答。

“那个侏儒！”探长又大喊。

“是那个侏儒，”医生证实说，“总是那个侏儒。这是我从斯图霍夫带回来的一件有用工具。当时，每逢我动手术，这个可笑的小东西总在我的大腿间钻来钻去，按照海因利希·希姆莱先生的帝国法律，我应该处死这个并无生存价值的小矮子，似乎任何一个体格高大的亚利安人都比他更具生存价值！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我一向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而一个受侮辱的人往往是一件可以信赖的工具。那只小猴子感觉自己应该感谢我的救命之恩，便训练自己学会了许多极有用处的本领。”

挂钟已指到十一点十四分。

探长感到疲乏已极，不时得闭目养神；而每次一张开眼睛，他就看见那只挂钟，永远是那只圆圆的、巨大的、飘浮不定的挂钟。他现在领会到自己已没有获救的机会。艾门贝格业已看透他。他完了，连洪格尔托贝尔也完了。

“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朝寂静的房间轻轻地、几乎近似耳语地诉说着，房间里只有挂钟的嘀嗒声。无休止的嘀嗒声。

“你是想说我个人什么也不相信吧？”艾门贝格询问，声音里没有透露出丝毫挖苦之意。

“我想象不出我的话里还可能有任何其它意义，”躺在床上的老人回答，双手疲软无力地搁在被子上。

“那么你信仰什么呢，探长先生？”医生又问，没有改变他坐在靠背椅上的姿势，好奇而又急切地等待着老人答复。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

墙上的挂钟嘀嗒不停，始终如一，钟面上无情的指针正在不知不觉、又十分明显地朝着它的目标移近。

“你拒绝回答，”艾门贝格断定说，他的声音不再文雅幽默，却变得响亮清晰：“你拒绝回答。我们现代人都不同意回答这个问题：你信仰什么？如此提问未免不合时宜。人们自谦地说，他们不喜欢说大话，至少绝不乐意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作出明确答复，譬如说‘我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而过去，凡是基督徒都这么回答，并且以自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自豪。如今的人们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宁愿保持沉默，好像一个姑娘被人问到一个尴尬问题时那样。人们确实也不清楚自己究竟信仰什么，决不是无可信仰，不是

的，人们确实有所信仰——即使朦朦胧胧，好似一片捉摸不住的云雾，譬如信仰人道、基督教、宽容、正义、社会主义和博爱等，这些玩意儿听起来有点空空洞洞，人们对此也予以承认，然而人们总是在想：问题不在于说什么，最主要的是有行动，至少要生活得规规矩矩，心安理得。人们确实也试图付诸实践，有的人努力奋斗，有的人则随波逐流。而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其目的都是为追求幸福，然而究竟是祸还是福，则像彩票抽签中奖一样，全凭机遇而定，碰得巧就走运，碰得不巧就倒霉。而虚无主义者这样的名词，人们总是掌握在手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摆出伟大的架势、带着更为伟大的信念，把这顶帽子扔到任何一个人预感对自己有所威胁的人物头上去。我了解他们，这些人深信自己正确，认为自己有权说一加一等于三，等于四，或者等于九十九，倘若要求他们回答一加一等于二，反倒变成错误的了。在他们看来，一切明确无误的东西都是顽固不化的，因为只有性格执拗才能达到明确无误。他们丝毫不懂得，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我举的例子也许稍稍有点特别，因为大多数共产党员之成为共产党员和大多数基督徒之成为基督徒一样，全都出于误会——他们丝毫不懂得，这么一个人物，他全心全意信仰革命的必要性，相信唯有这条道路通向美好幸福，通向一个更完善的世界，即或要他跨过上千万人的尸体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人物远远算不上一个虚无主义者，远远比不上任何一个既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任何人，既不相信地狱，也不相信天堂，而只晓得自己有权做买卖的米勒先生或者胡贝尔先生——他们不敢把一种信仰奉为自己行动的信条。于是他们活着就像一盆糊糊里的蛆虫，他们不懂得判断是非，脑子里一片混乱，说不上什么才是美好、正直和真实，倘若这一盆糊糊里还存在诸如此类东西的话。”

“我可没料想一个刽子手居然如此口才出众，”贝尔拉赫说，“我一直认为像你这类人应该是沉默寡言的。”

“妙极了，”艾门贝格笑起来，“看来你又恢复了勇气。真妙极了！在我的实验室里做试验要的是勇敢的人，遗憾的是，我的实物教学课总是以学生的死亡而告终。嗯，好吧，让我们瞧瞧，我有什么样的信念吧，让我们把我的信念放在一架秤上，而在另一面秤盘上放上你的信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两人中谁的信念更为伟大，是虚无主义者呢——你是这么描写我的——还是基督徒。你是以人道的名义，或者一种谁也不知道的理想的名义，到我这里来毁灭我的。我想你不该拒绝我的这种好奇心。”

“我明白，”探长回答，努力遏制着自己的恐惧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恐惧在他心里越来越滋长强大，越来越具有威胁力。“你就是想对人诉说诉说自己的信条。真是稀罕，一个杀人如麻的凶手居然有这一套。”

“现在是十一点二十五分，”艾门贝格说。

“谢谢你提醒我，”老人呻吟着说，由于愤怒和乏力而颤抖不已。

“人啊，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医生笑着说。“我并不因自己有一种信条而感到羞愧，我不沉默，不像你对我似的保持沉默。如同基督徒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一样——其实只是一件东西，是三位一体——我也信仰两件东西，其实也只是一件，是同一件东西，它是一些什么东西，然而也只是我自己而已。我信仰物质，它同时是力量和数量，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整体，而且是可以穿透一切的子弹，像一个儿童游戏的弹子似的到处探索，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球体上，驾驶着它游历遍奇异、危险的空虚空间。我信仰物质（较

之说，‘我信仰上帝’，这句话又是何等陈腐和空虚），它像动物、植物或者煤炭一样可以理解，又像原子一样不可理解，不可测度。它不需要任何上帝，或者其它诸如此类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它独一无二不可理解的神秘性便是它的存在。我相信，作为这种物质、原子、力量、数量、分子一部分的我和你是一样的，而我的存在赋予我权利，去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一切。我只是一个部分，我的存在只是一个瞬间，一个偶然性，就如同在这个无限广大的世界里，生命仅只是它那无可限量的可能性之一而已，和我一样只是偶然性而已——倘若地球距离太阳更近些，不是便没有生命了么——而我存在的意义也仅仅在于能够存在一个瞬间。噢，威力无比的黑夜啊，我因而理解了这一切！世上万物中并无比物质更为神圣之物：人类、动物、植物、月亮、银河，凡是我所经常看见的东西，全都是偶然群集在一起，并没有本质联系，如同水的泡沫和海的波浪并无本质联系一样：一切都无所谓得很，不论事情这样还是那样，事情统统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这些东西消失了，便由另一些来代替，生命在这个星球上熄灭了，就会在广博宇宙的某个地方，在另一个星球上滋生起来：就像头奖总会按照彩票中奖的规律偶然落到某人身上一样。硬把持续性赐与人类是可笑的，因为想要寻找出一个政权体制以便得以在某个国家或者教堂里苟延残喘地多统治几年，永远只是一种持续性的幻想。世界是在一场彩票赌博后所构成，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去追求人类的幸福就是毫无意义的了，除非每张彩票都可获得一匹骏马，而并非大多数人都毫无所得，那还算有点意思，那时候只可能存在另一种渴望，想要成为那名独一无二的、不合理的大奖的赢得者。一个人既相信物质，同时却又相信人道，这简直是胡闹，一个人只能相信物质，相信自己。正义并不存在——物质怎么可能成为正义呢——只有自由不可能收买——看来似乎必须有一种正义存在——而正义绝不能靠恩赐获得——谁有能力恩赐正义呢——事实上人们不得不接受正义。自由是一种犯罪的勇气，因为自由本身便是一种犯罪。”

“我明白，”探长大声叫嚷说，浑身蜷曲，好似一头已经死亡的野兽裹在白色的尸布里，躺卧在一条冷冷清清望不见尽头的马路边缘，“你相信的只是你有迫害人类的权利而已！”

“说得好极了！”医生回答说，使劲鼓着掌，“好极了！你可算得上是一个好学生，你敢于对我据以生活的信条作出结论。好极了！好极了！”（他一面说，一面不断鼓着掌。）“我敢于说出自己的一切，什么也不隐瞒。我致力于使我获得自由的谋杀和迫害。因为我只有杀死另一个人——今天七点钟我便又要杀人了——我只有置身于令人软弱的任何人类法规之外，我便能获得自由，我便能获得纯粹的一瞬间，何等可贵的一瞬间啊！它在强度上和物质同样巨大，同样坚强有力，也同样无法估量，我从那些朝着我张得大大的嘴巴发出的喊叫声中，从那些泪汪汪瞧着我的眼睛所流露的痛苦神情中，从我弯下身子所见到的在手术刀下颤抖不已的、毫无反抗力的白皮肉上，映现在我面前的只是我的胜利和我的自由，并无任何其他东西。”

医生暂停说话，慢慢站起身子，然后坐在手术台旁。

他头上的挂钟指着十一时五十七分，十一时五十九分，十二点钟。

“还有七个钟点，”从病人床上传来几乎听不见的轻声低语。

“给我讲讲你的信仰吧，”艾门贝格说。他的声音重又恢复平静和讲究实际的语气，不再像刚才那么激动和生硬。

贝尔拉赫什么也不回答。

“你依然沉默，”医生忧郁地说，“永远保持沉默。”

病人仍旧不予回答。

“你沉默，你永远保持沉默，”医生断定说，双手撑在手术台上，“我如今已无条件地把一切都押在一张彩票上。我是强大的，因为我什么也不怕，因为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得很，不论我会被揭发，还是不会被揭发。我也已作好准备，把我的一切都押在一张彩票上，好似押在一注钱财上一样。倘若你，探长，能够向我证明，你也具有同样巨大、同样无条件的信念，那么我就向你承认自己的失败。”

老人依然沉默不言。

“你还是说点什么吧，”片刻后艾门贝格继续劝说探长，同时急切而又渴望地望着病人，“你还是给我一个答复吧。你是一个基督徒嘛。你受过洗礼嘛。请你说吧，我确信这种力量，它们一定会超过一个有罪的杀人凶手对于物质的信念，就像太阳的光远远超过冬月的可怜光彩一样，或者呢，这种信念的力量至少和虔信基督和圣子差不多。”

挂钟在墙上嘀嗒不停。

“也许这种信仰过于沉重了，”艾门贝格接着说，由于贝尔拉赫始终一言不发，便走到老人床边，“也许你具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比较普通的信念。你就说吧：我信任正义和人道，它们都是要为人类的正义服务的。出于这种信念，仅仅出于这种信念，我这个身患重病的老人才冒险亲自来到宋纳斯泰医院，并无任何关于个人荣誉的考虑，也绝不曾想到要压倒任何人，胜过任何人。你只要说出来就行，这是如今还能够向我们当代人提出来的唯一合情合理、不算过分的要求，你说说吧，说完你便自由啦。你的信念会让我满意的，我想，只要你肯说，你一定具有和我同样伟大的信仰。”

老人依然沉默。

“你大概不相信我会释放你？”艾门贝格问。

仍然没有回答。

“为了好运气，你也该说嘛，”医生敦促探长，“即使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可以坦白坦白你的信仰嘛。也许只有你的信仰还能够挽救你。也许这已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次不仅救你自己，还可以拯救洪格尔托贝尔的机会。现在还有时间给他挂电话。你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你。我的戏总有一天会演完，我的算计总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为什么我不会输呢？我可以杀死你，我也可以释放你，这当然意味着我的死亡。我已经达到如此境界，我可以摆脱自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似的对待自己。我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毁灭自己。”

他稍稍停顿片刻，紧张地注视着探长。“我将做什么事，其实无所谓得很，”他继续说，“我已经征服了阿基米德点，已经不可能到达更高的境界了，这是人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这也是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上、在这个业已死亡的物质的玄妙崇拜中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它像一具无比巨大的腐烂尸体，永恒不断地制造出新的生命和新的死亡。但是我仍然——这就是我的恶意所在——要把你的自由和一个下流的玩笑，和一个极其简单的条件联系起来：你得像我一样把自己同样巨大的信仰拿出来。拿出来吧！对于善良的信仰在人类心中至少应该和对于罪恶的信仰同样强烈！拿出来吧！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比亲眼目睹我自己进入地狱更让我感到有趣了。”

人们只听见挂钟的嘀嗒声。

“那么你就讲讲事实本身吧，”艾门贝格等待片刻后又继续劝说，“只是出于对圣子的信仰，出于对正义的信仰。”

挂钟，只听见挂钟的嘀嗒声。

“你的信仰，”医生大声尖叫，“把你的信仰拿出来！”

老人躺着，双手紧攥着被子。

“你的信仰，你的信仰！”

艾门贝格的声音好似一种金属的撞击声，好似一阵长号的鸣响，打破了无边无涯的、灰色的苍穹。

老人沉默无语。

于是艾门贝格那张渴望获得回音的脸变得冷酷而淡漠了，只有右眼上的疤痕仍然通红通红。当他疲惫而冷淡地背转身子朝门口走去时，好似突然发作了一阵恶心。房门轻轻关上了，探长周围是一片耀眼的蓝光，房间里只听见那架圆圆的挂钟不停顿的嘀嗒声，好像是老人自己的心脏在跳动。

## 一首儿歌

贝尔拉赫躺卧着，期待死亡光临。时间不停流逝，指针旋转着，互相交叠，互相分离，又互相重叠，又重新分开。半点钟，一点钟，一点零五分，一点四十分，两点钟，两点十分，两点半钟。这个毫无动静的房间是无影蓝光照射下的一个死亡空间，玻璃柜里满列着稀奇古怪的医疗器械，玻璃上隐隐约约映现出贝尔拉赫的面容和双手。一切都纹丝不动，那张雪白的手术台，那幅画着强壮的、凝滞不动马匹的度勒名画，窗前的金属挂帘，椅背还朝着老人的空椅子，除了挂钟机械的嘀嗒声，一切都死寂无生气。三点钟。四点钟。没有喧哗、没有呻吟、没有话语声、没有叫喊声，也没有脚步声传入老人耳中，贝尔拉赫静静躺在金属床上，一动也不动，连呼吸时身子的起伏也几乎难以觉察。世间万物都消失了，没有旋转的地球，没有太阳，没有城市。除去淡绿色的圆圆刻度盘外便一无所有了。盘上的指针移动着，互相变换位置，赶上、重叠，又分开了。四点半，四点三十五分，四点四十七分，五点钟，五点零一分，五点零二分，五点零三分，五点零四分，五点零六分。贝尔拉赫用尽力气从床上坐直身子。他按铃叫人，一次、二次，许多次。他期待着。他也许还能和克莱丽小姐说上几句话。他也许会碰到什么拯救自己的机会。五点半钟了。他使劲翻转身子。于是他跌到地板上。他在床前的红地毯上躺了很长时间，在他上方，在玻璃柜上某处传出挂钟的嘀嗒声，指针旋转不停，五点四十七分，五点四十八分，五点四十九分。于是他慢慢朝房门爬去，他用前臂向前爬行，他来到房门边试图站直身子，打开门锁，但是跌倒了，他躺卧片刻，再试一次，试第三次，试第五次。都失败了。他用手搔扒着房门，因为他已没有气力用拳头敲门。他想，他真像一只老鼠。随后他又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忽儿，最终仍然爬回房间里。他抬起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六十分。“还有五十分钟，”他大声说，清晰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把他自己吓了一跳，“五十分钟。”他想爬回床上，却感到浑身的气力均已耗尽。于是他就只好躺在原地，躺在手术台前，默默期待着。环绕着他的依旧是这个房间，这座玻璃柜，这些刀子，这张床铺，这把椅子，这架挂钟，这架永恒的挂钟，是运行在一幢腐朽的蓝色世界大楼里的烧焦了的太阳，是一具嘀嗒响的神像，是一张没有嘴、没有眼、没有鼻、却会发出响声的脸，脸上有两道互相舒展的皱纹，目前又碰到了一起——六点三十五分，六点三十八分——这两条皱纹好像不愿意相互分离，如今又离开了……六点三十九分，六点四十分，六点四十一分。时间往前推移着，不断往前推移着，带着轻轻的振动以不变的节奏往前走着，唯有时钟本身一动也不动，恰似一块静止的磁铁。六十五分。贝尔拉赫撑起身子，斜靠在手术台旁坐着，一个病得奄奄一息的老人，孤苦无依，束手无策。他已经平静下来。他身后是挂钟，身前是房门，他正瞪视着房门，无计可施，忍气吞声。这个长方形的框框，他必定会穿过它走进房间里来，他等待他来临，他要来杀死他，用那把闪闪发亮的刀子一刀一刀慢慢地、然而像挂钟一样精确地杀死他。他就坐在地上等待着。如今他已不必抬头看钟，时间在他内心流逝不停，嘀嗒声响在他自己心中，他知道自己还有四分钟，三分钟，二分钟：他计算着秒数，心脏跳动一次就是一秒钟，还有一百秒，还有六十秒，还有三十秒。他吧嗒着毫无血色的苍白嘴唇计算着，像一只有生命的钟似地呆呆瞪着房门。钟敲响七点，房门一下子打开了，像一个漆黑的洞穴，像一只张得太大的复仇巨口展开在他

眼前，他隐约看见门框中央站着一个模糊的幽灵似的巨大黑色身躯，老人相信自己看见的决不是艾门贝格。接着从那巨大的黑洞口响起一阵沙哑的、带嘲讽意味的歌声，一支儿歌传进老人耳中：

“小小汉斯，  
单独行走，  
走进大森林。”

歌声像是在吹口哨，一个巨大魁伟的身影填满了整个门框，高大的躯体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色长袍，来者是犹太人格列佛。

“祝你好，长官，”巨人说，关上了房门，“我终于又找到了你，你这位无所畏惧、无可指责的可怜骑士，你就这么单枪匹马开赴战场，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同邪恶进行斗争，还坐在这么一台尸架前，这台尸架极像从前我在但泽附近美丽的斯图霍夫村庄里曾躺卧过的那一台。”他把老人从地上抱起来，老人就像一个孩子似的躺在犹太人怀中，他把病人放到床上躺好。

他看见探长始终一言不发，只是脸色灰白地躺卧不动，便从自己破破烂烂的长袍底下掏出两只杯子和一瓶酒，笑笑说：“顺手拿来的。”

“我没有伏特加酒了，”犹太人说，一面给两只玻璃杯斟满酒，坐到老人床边，“在艾门塔尔某处一座破败的农舍里，在某个阴暗而又堆满积雪的地方，我偷了几瓶灰尘密布的烈性土豆烧酒。味道不错。人们应该允许一个死人如此做的，是不是，长官。像我这么一具尸体——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具靠烧酒支撑的尸体——我在黑夜和浓雾中收取活人提供的贡品，作为重新爬进自己苏维埃人附近坟墓去的途中给养，这是很正常的。来吧，长官，喝一杯！”

他把杯子送到老人唇边，贝尔拉赫喝了一口，心里暗想，又干了违反医院规定的事，可是烧酒让他觉得舒服。

“格列佛，”他喃喃说道，还轻轻抚摸着巨人的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该诅咒的老鼠笼里？”

巨人笑了。“基督徒啊，”他回答说，一双坚定的眼睛在没有睫毛和眉毛，却布满伤疤的脸上闪闪发光（这一忽儿工夫他已经喝下好几杯烧酒），  
“那时你为什么叫我到沙来姆医院去呢？我立即猜到你一定掌握了某种怀疑的材料，也许真的极可能在活着的人中间找出内菜。我连一秒钟也不曾相信，你向我打听内菜只是出于一种心理学上的兴趣，如你在那个痛饮伏特加酒的深夜里向我叙述的。我能眼睁睁看你单枪匹马去斗恶魔，好似古时候的骑士单人匹马大战毒龙那样吗？那个时代业已消逝了，那时候只要眼光锐利些，总可以逮住那些像我们今天与之打交道的罪犯的。你是个笨蛋侦探！时代本身就说明你干得何等荒谬！我一分一秒也不放松地盯着你，昨天夜里我还亲自出现在勇敢的洪格尔托贝尔医生面前。我不得不按部就班逐一向他讲清事实真相，他这才明白过来，简直吓得要命。然后我就从他嘴里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于是我今天出现在此地，要让事情恢复本来面目。你在伯尔尼见了老鼠，我在斯图霍夫见过耗子。这便是世界的划分情况。”

“你怎么来的？”贝尔拉赫低声问。

巨人的脸上泛起一丝狞笑。“并非躲藏在瑞士联邦某辆火车车厢的座位底下，如你所想象的，”他回答说，“而是坐在洪格尔托贝尔的汽车里。”

“他还活着？”老人问，终于又控制住自己，屏住呼吸盯着犹太人。

“过几分钟他就会带你回到大家熟悉的老医院沙来姆去，”犹太人说，一边大口大口猛喝着土豆烧酒，“他现在正坐在宋纳斯泰医院门口的汽车里等着呢。”

“侏儒，”贝尔拉赫脸色苍白，大喊一声，他突然意识到犹太人对这一危险还毫无所知。“那个侏儒！那个侏儒会杀死他的！”

“啊，那个侏儒，”巨人边喝酒边笑笑说，穿着那件千疮百孔的长袍让人感到恐怖。他把右手的手指伸进嘴里发出一声尖厉的哨声，像人们通常呼唤狗儿似的。窗户上的金属帘子被人猛然推了上去，一个小小的黑影动物灵巧地跳入房内，嘴里叽里咕噜发出一种人们听不懂的声音。那东西闪电般地窜到格列佛面前，一蹦就跳入格列佛怀中，一张丑陋无比、老头子般皱巴巴的怪脸紧紧贴在犹太人布满伤疤的胸膛上，一双畸形的小胳膊搂住了巨人光秃秃的巨大的脑袋。

“你来啦，我的小猴子，我的小动物，我的小小的地狱怪兽，”犹太人用一种歌唱般的声音欢迎侏儒来临。“我可怜的弥诺陶洛斯，我的受侮辱的亨齐曼兴，在斯图霍夫那些血淋淋的夜晚，你常常哭泣着、呜咽着睡熟在我的怀抱里，你是我这个苦恼的犹太鬼唯一的伴侣。你是我的小儿子，我的小魔鬼！哭喊吧，我的奇形怪状的阿耳戈斯，奥德赛从他那无穷无尽的浪游中来到了你的身边。噢，我一下子就猜到是你把酩酊大醉的可怜虫福西奇送进另一个世界去的，唯有你能够爬过采光通风道，我的大水蜥，你这一套本领不就是当时在我们那个屠宰城里由那个名叫内莱、或者艾门贝格、或者米诺斯，或者任何其他名字的大恶魔训练成的吗？喂，我的小狗，咬我的手指吧！当我挨着洪格尔托贝尔坐在汽车里的时候，我听见自己身后，汽车后座里有一种好似癞皮猫发出的高兴喵喵声。原来就是我这个可怜的小朋友，长官，我把它从汽车后座拖了出来。如今我们该如何处理这只小动物呢，他可是一个人哪，有人把这个可怜的小人折磨成为一只道地的小野兽，对于这个小小杀人犯，只有我们才认为他是无辜的，他那双凝望着我们的悲哀的棕色眼睛，不是流露出一切生物的苦恼么？”

老人从床上坐直身子看着这鬼怪似的一对儿，望望受尽折磨的犹太人，又望望那个正在巨人膝盖上儿童般手舞足蹈的小侏儒。

“艾门贝格呢？”他问，“艾门贝格怎么样啦？”

巨人的脸立即变得好似一块灰色的史前时期化石，脸上的一道道疤痕好似用一把凿子刻成。他举起刚刚喝完的空酒瓶使劲朝玻璃柜扔去，把柜上的玻璃砸得粉碎，小侏儒吓得老鼠般尖声大叫，猛然一跳，钻进手术台下躲藏起来。

“你为什么还要提起他，长官？”犹太人恨恨地说，转瞬间又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唯有那双可怕眼睛的狭缝里还闪烁出吓人的余光——他慢慢地从长袍底下掏出第二瓶酒，又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活在地狱里老觉得口渴。爱你们的敌人像爱你们自己一般，这就是戈加塔石山上的圣人对我们说的话，他听任别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自己挂在那根半腐朽的悲惨木板

---

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古希腊神话中人身牛首之怪物。——译注

德国民间传说中夜间干活助人的小矮人。——译注

希腊神话中的巨眼神。——译注

上，只在腰间围着一块飘忽不定的破布。为艾门贝格可怜的灵魂祈祷吧，基督徒，唯有勇敢的祈祷还能获得耶和华的欢心。祈祷吧！他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个你所问起的人。我的手艺是血淋淋的，长官，当我不得不干的时候，我没法去考虑神学课堂里学过的东西。我是按照摩西的法规主持公道的，按照我自己上帝的旨意主持公道的，基督徒。我杀死了他，就像当年内莱在汉堡某一家终年潮湿的客房里被杀的情况一模一样。警察局也会同样正确无误地判定为自杀，和当年判断内莱之死时一模一样。我该告诉你什么呢？我的手抓住他的双手，用胳膊卡住他的咽喉，把一颗致命的胶丸塞进他的牙缝，强迫他咽下。亚哈随鲁的嘴是严守缄默的，毫无血色的嘴唇将永远闭得紧紧的。至于我和他之间，一个犹太人和折磨他的人之间发生的事，以及我们两人如何必然根据正义的法规互相交换角色，我成了折磨者，而他成为牺牲品，那么除了我们两人本身外，便只有允许发生上述一切情况的上帝知情了。我们得告别啦，长官。”

巨人站起身来。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贝尔拉赫小声问。

“什么情况也不会出现，”犹太人回答，他抓住老人的肩膀，让他贴近自己，两人的脸互相紧挨着，眼睛瞧着眼睛。“什么事也不会有，没有事，”巨人又一次轻声说，“除去你和洪格尔托贝尔，没有人知道我来过这里。我无声无息影子一般溜进走廊，找过艾门贝格后又来找你，没有任何人知道有我这个人，唯有我拯救过的那些可怜虫，那几个犹太人，那几个基督徒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让我们把艾门贝格的世界埋葬了吧，我们让报界发表祭文去悼念这位死者吧！纳粹分子们愿意有斯图霍夫集中营，百万富翁们愿意有这所医院，其他各式人等愿意要其他各种东西。我们作为个人不可能拯救这个世界，这就像西西福斯推石上山一样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决定世界命运的力量不在我们手中，也不在某一个大人物或者某一个民族手中，甚至也不在威力无比的魔鬼手中，而是在唯有他才能对一切作出判决的上帝手中。我们只能够帮助个别人，却不能挽救全体人，这就是可怜的犹太人格列佛的局限，也是世上一切人的局限。因而我们不必试图去拯救世界，只能予以承受罢了，这便是濒临末日的时代留存给我们的唯一实际的活动。”说完，巨人像父亲对孩子似的小心翼翼把老人放回床上躺好。

“来啊，我的小猴子，”他叫喊着，还吹了一声唢哨。那侏儒迅速往前猛力一蹦，就跳上了犹太人的左肩，嘴里还呜里呜噜哀诉着什么。

“就这么吧，我的小杀人犯，”巨人夸奖他说，“让我们两个人呆在一起吧。我们是一双被人类社会抛弃的人。你是天生就被抛弃，我则由于属于死人之列而被弃。再见吧，长官，我们就要去伟大的俄罗斯平原上作深夜旅行了，再下到这个世界的墓穴去，重新下到这些遭受强者迫害而躲进被人遗忘的洞穴里去是很值得的。”

犹太人再一次向老人挥挥手，随即将双手伸进窗栏栅里，掰开铁条跳了出去。

“再见吧，长官，”他以那种特别的、唱歌似的声调又笑着说了一遍，老人只见到他的肩膀和光秃秃的巨大脑袋，以及他左脸旁边的侏儒那张老头子般的丑脸。这时，一轮几乎全圆的大月亮正照着他巨大脑袋的另半边，猛

一看好似犹太人肩上目前正承担着全世界，包括大地和人类。“再见吧，我的无所畏惧又无可指责的骑士，我的贝尔拉赫，”接着又说，“格列佛又要到大人国和小人国去游历了，又要去别的国家，别的世界，不停顿地、不断地向前周游。再见啦，长官，再见啦。”说到最后一个“再见”时，便已消失了他的踪影。

老人闭上眼睛。和平已降临于他，使他感觉舒适；更令他高兴的是，他清楚知道，正轻轻开启的房门口站着洪格尔托贝尔，正来接他回伯尔尼去。

1951

## 诺言

—

今年三月我应库尔市安德雷斯—达恒顿团体的邀请，给他们作一次关于侦探小说写作技巧的报告。我乘火车抵达时正值夜幕降临，这时，云层低垂，风雪交加，一切都凝结了，冰冻了。会议在商人协会的大厅举行。听众稀稀落落，因为艾米尔·施泰格正同时在中学礼堂讲解歌德晚年创作。不论是我，还是任何别人，全都情绪低落，许多本地人在我讲完之前就离开了会场。我和几个主持人简短谈了片刻，又和两三个中学语文教员谈了几句——他们想必也是情愿听关于歌德晚年的报告的，我还和一位做慈善事业的太太聊了一阵，她是东瑞士家庭雇员协会名誉会长。在拿到报酬和旅费之后，我便回转车站附近的斯泰因卜克旅馆去，打算过夜。连这里也是凄凄凉凉的。除了一份德国《金融日报》和一份陈旧不堪的画报外，再也找不到任何读物。旅馆里寂静得不像人间，不能设想谁还能睡得着，因为害怕永远也醒不来。黑夜里时间似已停滞，阴森可怖。窗外雪已止住，万物都纹丝不动，连路灯也不再摇晃，因为风已停息。路上没有行人，没有动物，一无所有，只有从火车站方向有时传来遥远的喧声。我去到酒吧间，想喝一杯威士忌。除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招待外，那里还有一位先生，我刚刚坐下，他就招呼我了。他是H博士，曾任苏黎世州警察局长，高个子，十分肥胖，打扮很老派，一条金表链横挂在西服背心上，这在今天已属少见。虽然已届高龄，他那鬃毛般的头发仍旧乌黑，上髭也很茂密。他坐在酒吧前的一只高凳上，一边喝红酒，一边抽着雪茄烟，和女招待已直接用名字相称了。他的嗓门很大，动作表情颇为轻快，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同时又吸引我，又令我厌恶。到深夜近三点时，他已喝了五杯乔尼·华克尔了。他邀请我第二天上午搭他的奥佩尔轿车去苏黎世。由于我对库尔附近，总之，对瑞士这一带地区，全然不熟悉，便接受了邀请。H博士是以联邦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身分来格劳宾登出差的，归途为风雪所阻，也因而听了我的报告。他对此未加任何评论，只有一回表示说：“你表达得不够聪明。”

次日早晨我们一起动身。为了想睡着一会儿，我在黎明时分吃了两片安眠药，这时只感到浑身疲软。天迟迟不肯亮，虽然早就是白天了。天空有一处射出亮光。此外就阴霾密布、呆滞而沉重的云块缓缓地移向天边，仍旧大雪纷纷，冬天似乎不乐意离开这个地区。城市为山峦所包围，但是山峦丝毫也不显得崇高威严，倒像是开掘了一座无限巨大的墓穴后形成的一堆堆积土。库尔城呈现出一派冷酷、灰色的景象，这里那里点缀着一座座巨大的政府办公大楼。我几乎不能相信这儿竟是出产名酒的地方。我们本想穿过老市区，但是这辆大汽车迷了路，我们在死胡同和单行马路上绕来绕去，常常需要作艰难的倒车，才能摆脱房屋组成的迷宫。再说，石块路面都结了冰，因此，当城市终于落在我们身后时，我们极为高兴，尽管我对这块古老的主教驻地简直毫无印象。这真像是一次逃亡。我打着瞌睡，感到疲倦和没精打采。朦朦胧胧地感到在低垂的云层下，有个白雪覆盖的山谷从我们身旁闪过。景

---

即佣仆。——译注

一种名牌威士忌。——译注

色似乎也都冻僵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驶入一座规模颇大的村庄，也许是一个小城镇。我们驾驶得十分谨慎，忽然强烈而耀目的太阳光照射着大地上的一切，白雪皑皑的地面开始融解。地面上升起一阵白色的雾气，奇异地铺展在雪白的田野上，它重新遮断了我的目光，使我无法再眺望山谷。一切真像是一场噩梦，真像是施了妖术，似乎我永远也不该认识这片大地、这些山峦似的。

我再度感到疲倦乏力。汽车行驶在铺满碎石的路上发出讨厌的毕剥声，然后又轻快地滑下一座桥梁。我们遇到一个军用运输车队，它们把我们的挡风玻璃弄得那么脏，大概再也擦洗不干净了。H坐在我身边把着方向盘，一边沉思地喃喃自语着，聚精会神地对付着难走的道路。我后悔自己接受邀请，诅咒那该死的威士忌酒和安眠药片。但情况终于渐渐好转了。山谷又重新明显可见，也比较带点人情味了。到处都是田庄，这里那里有一些小规模的工厂，一切都干净而又简朴。路上冰雪都已消融，闪出潮湿的亮光，不过可以肯定汽车能以适宜的速度行驶了。群山缩小了，道路不再狭窄难行。

我们在一座加油站前停下汽车。这座房子立即给我们以一种特别的印象，也许由于它和四周整洁的瑞士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吧。房子很敞陋，到处滴着水，山泉从上面流经这里。房屋一半由石块砌成，另一半是一座木质谷仓，临街那一面的板壁上贴满了广告，显然张贴的历史颇为久远，因为广告交叉重叠地贴了许多层：用新式烟斗不可不用布罗斯牌烟草；请饮加拿大美酒；运动牌薄荷糖；维生素；林特牌牛奶巧克力以及其它等等。侧墙上写着一行大字：比雷里牌轮胎。两只加油泵装在石砌的半幢房子前面，安在铺砌得很糟糕的、粗糙不平的鹅卵石空地上；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一种颓败的印象，尽管这时阳光亮得耀眼，几乎亮得有点邪恶。

“我们下车吧，”前警察局长说。我听从了，并不了解他的意图是什么。我只是乐意换换新鲜空气。

开着的大门旁边有一个老人坐在一条石凳上。他满面胡子，看上去十分肮脏，上身穿一件浅色短外套，全是油垢，下身是一条黑色而斑迹累累的罩裤，从前大概是一套常礼服的裤子。脚上套一双旧便鞋。他痴呆地凝视着前方，而我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他嘴里的酒气，是苦艾酒的气味。石凳周围的石块路面上香烟蒂头扔了一地，飘浮在积雪融化的脏水中。

“你好！”我听到局长有点犹豫不决地对那个人说，“请加足油，要上等货。再把玻璃窗也给擦一擦。”然后转身对我说，“我们进去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在那独一无二的窗口上挂着酒店招牌，一块红色的洋铁皮圆牌。大门上写着名字：“玫瑰园”。我们踏进一条肮脏的走廊，一股烧酒和啤酒臭气迎面而来。警察局长在我前面走，推开一扇木头门，他显然熟悉这个地方。酒吧间里摆设简陋，光线不足，只有几张粗糙的桌子和板凳，墙上张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电影明星照片。奥地利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梯罗尔的股票和物品价格，几乎看不清楚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瘦瘦的妇女。她穿着一件晨衣，一边抽烟，一边洗杯子。

“两杯牛奶咖啡，”警察局长吩咐。

这个妇女倒咖啡的时候，从隔壁房间进来一个衣饰不整的姑娘，我初初一看估计她大概三十岁左右。

“她只有十六岁，”警察局长向我喃喃说。

姑娘过来伺候我们。她穿一条黑裙子，白衬衣的纽扣只扣了一半，胸部

扁平，身上很不干净。她的头发像酒吧后面那个女人一样也是金黄色的，尚未梳理过。

“谢谢，安妮玛丽，”警察局长说，把钱放在桌子上。姑娘没有答话，也不道谢。我们默默无言地喝着。咖啡难喝极了。警察局长点着了一支香烟。奥地利广播电台播送着水位上涨的消息，姑娘溜进了隔壁的黑屋子，我们看见里面有些白色的东西在闪光，肯定是一张没有铺好的床。

“我们走吧。”警察局长提议说。

到外面后，他看了一眼油泵上的数字。老头已给汽车加足了油，也把车窗擦干净了。

“下回一起给吧。”警察局长告别时说，他那困惑的目光又一度落在我的眼里。老人这次也没有答复他，而是重新坐回到长凳上，痴呆而绝望地瞪视着前方。当我们走近奥佩尔牌轿车时，再次转过身来，这时，老人突然握紧了拳头，一边摇晃着拳头，一边低声诉说着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几个字，脸上焕发出一种无法估量的信念。他说的是：“我等着，我等着，他会来的，他会来的。”

后来，当我们驰越凯仑茨山口时，路面又重新结冰了，在我们身下躺着瓦伦湖，闪光，冰冷，怀着敌意。安眠药片所导致的沉重疲乏感又重新发挥作用，我脑子里泛起了一种对于威士忌酒腾云驾雾般滋味的回忆，一种好似在无边无际、毫无意义的梦境中滑行的感觉。这时候，H 博士开口道：说真的，我对侦探小说从来评价不高，很遗憾你竟也从事此项工作。这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你昨天晚上的报告中所讲的东西，无疑是值得一听的；由于政治家们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这种事我最清楚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我是一个国会议员，这你大概是知道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在极度疲倦之下，我听他的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似的，我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般地倾听着）。当政治家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的时候，人们只能指望警察局至少懂得如何维持社会上的秩序。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设想不出有什么比这个稍好一些的希望。令人感到讨厌的是，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骗人的。我还不得不指出这样的情况：小说中所有的罪犯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我看编造这些美丽的故事纯粹是道德上的需要。它们和别的有助于巩固国家的谎言一样有用，就像那句虔诚的格言，说什么恶有恶报，其实人们只须观察一下周围的社会，便可以发现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了。但是即使仅仅出于商业原则，我也愿意不去追究，因为每一个公众，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得到他的英雄人物及其美满结局，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我们警察局和你们创作界都同样具有责任。不过，我对你们小说中的情节实在头痛得很。小说骗人骗得也未免太荒唐，太不要脸了。你们所构思的情节，逻辑性太强，好像在下象棋，这是罪犯，这是受害者，这是同谋犯，这是聪明绝顶的大侦探。侦探只需要知道规则，像照棋谱下一盘棋那样，他就可捕获罪犯，让正义取得胜利了。这种杜撰使我极为愤慨。现实生活中只有部分事物具有逻辑性。当然，恰恰是我们警察人员不得不依据逻辑进行工作，科学地进行工作；但是干扰破坏我们工作的不利因素实在太多了，因而常常仅仅由于职业上的运气和偶然性决定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但在你们的小说中偶然性完全不起作用，倘若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带点偶然性，那也总是命运或上帝的旨意；自古以来，你们作家为了戏剧规律而把真理抛在一边。现在，该让你们的规律见鬼去了。每一件案子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所有必要的因素，而只认识少量的、往往还是次要的因素。偶然性——这个无法估量的、不能比较的东西——的作用实在巨大。我们的规律仅仅建立于可能性，建立于统计学上，而不能建立于因果关系上，它们仅仅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适用于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本来就在我们的预测范围之外。我们的侦查手段还不完善，我们越是想使它更充实一些，就越发感到它不够用。而你们这批耍笔杆子的人却不用为此操心。你们从来也不写那些我们事实上无法破获，只好回避它，让它滑了过去的案件。你们仅仅是写你们控制得住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是十全十美的——哼，谁知道呢？但这样的世界纯粹是个骗局。赶快扔掉这种完美性吧，倘若你们还想真正做出点成绩来，倘若你们还想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接触现实，像一个男子汉应当做的那样。否则你们将一筹莫展，只好去写那种毫无用处的文体练习。不过现在我得言归正传了。

你肯定会到今天早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惊奇。我猜想，首先是对我这一大套话。一个曾经担任苏黎世州警察局长的人理当观点稳健，但是我老

了，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明白，我们的工作很成问题，我们的能力极其有限，我们非常容易犯错误；但是，我知道，即使我们面临犯错误的危险，我们仍然必须行动。

其次，你一定对我在这个破烂简陋的加油站停车加油感到惊讶。我还是马上给你点明算了：那个替我们加油的醉醺醺的老废物以前是我的一个最得力的下属。老天爷知道，我也算是个内行，可是马泰依却是一个天才，比你笔下任何一个虚构的大侦探都更有才能。

当H博士超过一辆壳牌运油汽车后，他慢慢开言道：故事发生在九年以前。马泰依是我的一个探长，确切些说，就是警察局的一个中尉，因为我们州警察局用的是军事编制。他和我一样是法理学家出身。他是巴塞尔人，也在巴塞尔得的博士学位。由于他生性孤僻，最初是一部分和他“公事公办”打过交道的人，后来连我们大家在内，全都背后叫他“死心眼的马泰依”了。他一贯衣着整洁，显不出个人特点，拘谨多礼，落落寡合，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在职务上极其严厉苛刻，不留情面，成绩固然可观，得罪的人却也不少。我始终不知道怎么评价他才好。我想我大概是唯一喜欢他的人——因为我喜欢思想单纯的人，虽然他的缺乏幽默感也常常使我忍受不了。他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结构过于呆板，使他的头脑也因而变得毫无感情了。他是一个重视组织机构的人，他把警察局这个机构运用得就像一把计算尺一样。他没有结过婚，从来不谈自己的私生活，事实上他也没有私生活。除了工作，他不考虑任何别的东西，他虽然成了卓越的犯罪学家，工作起来却完全不动感情。他顽强工作，不知疲倦，但是渐渐地他对业务似乎也感到厌烦了，直至有一天他卷进了一件案子里，这件事突然使他爆发出激情。

那时马泰依博士正处在他一生事业的顶峰。他那个单位的人和他在一些矛盾。当时，州政府正在逐渐考虑我的退休问题，也连带想物色一个合宜的继任者。实际上唯一可供考虑的人选就是马泰依。然而即将宣布的任命遭到了阻挠，这样的阻挠却是不容忽视的。事情不仅由于他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也由于本部门的人员可能表示了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上头也不愿意让人说他们埋没人才。这就说明，为什么约旦王国刚刚要求瑞士联邦政府派遣一个专家去安曼协助整顿那里的警察局，苏黎世立即推荐了马泰依，而伯尔尼也很快同安曼达成了协议。每一个人都宽慰地松了一口气。连他自己也很乐意这次任命，不单是职务上的原因。马泰依当时已五十岁，他想，晒晒太阳上的太阳也许对身体有好处；他期待着启程，准备坐飞机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他大概还考虑到这没准是和瑞士的最后一次告别，因为他透露说，以后要迁移到丹麦和他寡居的姐姐住在一起。他正在卡塞尔纳街州警察局大楼清理办公桌，这时，却来了一个电话。

警察局长又继续讲他的故事。电话里的汇报杂乱无章，马泰依费了很大劲才把事情弄清楚。电话是他的一个老“顾客”从梅根村打来的。梅根村是苏黎世附近一个小村子。打电话的人冯·龚登，是一个小商贩。马泰依对自己留在卡塞尔纳街的最后一个下午还要处理案件实在毫无兴趣，他的飞机票已经订好，三天后即可飞往约旦。可是我正好不在，参加一个警察局长会议去了，最早也得在傍晚时分才能从伯尔尼返回。迫切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无经验的人可能会坏了大事。马泰依让人接通了梅根村警察站的电话。那是四月末的一天，窗外下着倾盆大雨，阿尔卑斯山刮来的风暴正在袭击这座城市，然而却丝毫没有减弱使人窒息的邪恶的燥热。

梅根村是里逊警官接的电话。

“梅根村也在下雨吗？”马泰依首先不高兴地问，虽然答复是可想而知的。他听电话时脸色越来越阴沉。然后他指示说，要不被察觉地盯住那个报信的小贩。

马泰依挂断了电话。

“出了什么事情了？”费勒好奇地问，他正在帮他的上级清理办公室。几年来马泰依收藏的书几乎抵得上一个图书馆，现在都要包装运走。

“梅根村也在下大雨，”探长回答说，“请你立即通知刑警队。”

“谋杀案？”

“该死的大雨，”马泰依咒骂一声代替了答话，毫不顾及费勒是否高兴。

马泰依准备偕同检察官和汉齐少尉驶赴现场。那两人已经在汽车里等得很不耐烦了。马泰依还把冯·龚登的档案翻了一遍。这个人从前判过刑，因为强奸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 四

监视小贩这一命令看来是个错误，因为事先不了解实际情况。梅根村是一个小村子。大部分居民都是农民，也有一些人在下面山谷的工厂里干活，或者在附近的砖瓦厂干活。当然也有一些“城里人”住在这里，有两三个建筑师和一个古典派雕刻家就住在村外，不过他们都不参与村子里的生活。这里人人都互相熟识，大多数人还互相沾亲带故。村子和城市有矛盾，虽然矛盾尚未公开化。原因在于环绕着梅根村的那一大片林子产权归城市所有，这个事实是每一个真正的梅根村人都不肯接受的。这种情况曾经给森林管理局带来许多麻烦。数年前管理局还因而要求在梅根村设立警察站。问题还在于，每逢星期天城里人潮水般拥来霸占了村子，许多人还在夜里聚在公鹿酒店闹事。

考虑到这种情况，村里的警察便必须是个懂行的人；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去应付那些村民。负责巡视这座村子的警察魏格莫勒很快便碰到了这些问题。他自己也出生于农家，常常酗酒，不过总算尚有能力控制他的梅根村村民。当然，他作了那么多的让步，我本来应该出来干涉的。但是我权衡下来，仍然认为他身上的毛病是两害之间的轻者，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人员的缺乏。我不喜欢别人管我的事，因此我也不去搅扰魏格莫勒。然而在他离职休假时，他的代理人却陷入了困境。梅根村村民把这个代理人害得好苦。虽然在属于城市的林区里偷猎和盗窃木料、和城里来的人吵闹这些事由来已久，城里的经济繁荣更使村民们对城市当局的传统的抗拒火焰越烧越旺了。这回遇到麻烦的是里逊警察。他是一个笨拙的小伙子，很容易发脾气，毫无幽默感，不能容忍村民们无穷无尽的讥讽。事实上，他比一般的人又更敏感一些。他害怕面对村民，只要执行完任务，他总是躲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可能既要监视那个小贩又不被察觉了。这位警察一旦在他向来避之唯恐不及的公鹿酒店出现，便等于是宣告他在执行任务了。再说里逊在小贩面前坐下来时又是那样的装模作样，这就使得村民们越发一声不吭好奇地注视着他。

“要咖啡吗？”酒店老板问。

“什么也不要，”警察回答，“我在这里有公事。”

村民们好奇地望着那个小贩。

“他究竟干了什么事？”一个老头子问。

“这不关你的事。”

酒店的餐厅十分低矮，烟雾腾腾，像一个木头搭的洞穴，空气闷热；光线很暗，但是老板没有开灯。村民们坐在一张长桌面前，喝的不是烧酒就是啤酒，倾泻着雨水的银色玻璃窗映现着人们的身影。不知何处传来乒乓球声，另外一个地方又传出一种美国弹球戏的玎玲声和滚动声。

冯·龚登喝的是樱桃酒。他十分恐惧，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右手靠在他那箩筐的弯柄上，等待着审问。看样子他已在这里坐了好几个小时。空气沉闷，一点声音也没有，充满了威胁。玻璃窗越来越明亮，雨势已渐渐减弱，突然间阳光又重新出现了。只有风还在吼叫，摇撼着墙壁。当屋外终于传来汽车声时，冯·龚登才算松了一口气。

“请随我来，”里逊说，一边站起身来。两个人朝外边走去。酒店外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刑警队的大汽车，一辆救护车还在路上，正往这里驶来。村子广场在一片炫目的阳光照射之下。水井边站着两个五六岁光景的

孩子，一个小姑娘和一个男孩，小姑娘抱着一个洋娃娃，小男孩握着一根小小的鞭子。

“请你坐在驾驶员旁边，冯·龚登！”马泰依隔着轿车玻璃窗向外面喊着。小贩立即出了一口长气，好像这才得了安全似地坐了下来。当里逊坐上轿车后，马泰依说道：“好吧，请你带我们去看看你在树林里发现了的东西。”

## 五

他们穿越过潮湿的草地，因为通向森林的小径已经成为一个泥潭，很快他们就来到一具小小的尸体的身边，它躺在灌木林的枯叶当中，几乎就在树林的边缘上。男人们默默站着。大颗大颗的雨点从猛烈晃动的树枝上滴落下来，晶莹明亮，像是一颗颗钻石。检察官扔掉雪茄烟头，困窘地把它踩熄。汉齐不敢瞧尸体。马泰依说：“一个警官是不能扭开头去的，汉齐。”

摄影的人纷纷打开他们的照相机。

“下过这场雨之后，要找到痕迹是很难的了，”马泰依说。

突然，那个男孩和女孩挤到人们中间来了，他们瞪大了眼睛在瞧，小姑娘仍然抱着洋娃娃，男孩仍然拿着他的鞭子。

“把孩子们带走。”

一个警察搀着孩子们的手把他们领回到大路上。两个孩子就呆在那里。

第一批村民出现了。老远就可以认出公鹿酒店的老板，因为他系着一条白围裙。

“封锁现场！”探长命令道。有几个警察充当警卫，站好了岗，别的警察就在现场附近搜寻。这时第一个闪电在天边掠过。

“你认识这个姑娘吗，里逊？”

“不认识，探长先生。”

“你在村子附近见到过她吗？”

“我想是见到过的吧，探长先生。”

“给这个姑娘拍完照片了吗？”

“我们还要拍两张俯视照。”

马泰依等待着。

“有痕迹吗？”

“一点也没有，全是稀泥。”

“纽扣检查过了吗？有指印吗？”

“下了这场暴雨，别指望还会有什么。”

马泰依慢慢地弯下身去仔细地看。“是用剃刀杀的，”他判断道。

他把散了一地的小面饼捡起来，小心地放回到小篮子里。

“是8形面饼。”

一个警官过来报告说，有一个村民要跟他们说话。马泰依站直了身子。检察官朝林子边缘看了看，那儿站着一个白头发的老人，左臂上挂着一把雨伞。汉齐靠在一棵山毛榉树上，脸色苍白。那小贩俯偻着坐在他的货篮上，低声一遍遍地重复道：“我碰巧路过这里，完全是偶然的。”

“把那个人带来。”

那白头发的老人穿过灌木丛走过来，他显然是冻僵了。

“我的天哪，”他喃喃地说道，“我的天哪！”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马泰依说。

“我是小学校长罗根保尔，”那人轻声说道，眼光闪了开去。

“你认识这个姑娘？”

“是莫赛尔家的葛丽特利。”

“她父亲母亲住在哪儿？”

“在莫斯巴赫。”

“离这个村子远吗？”

“十五分钟路程。”

马泰依瞧了瞧被杀害的孩子。只有他一个人敢看。人们都默不作声。

“怎么会出这种事的？”校长问道。

“这是一桩性犯罪行为，”马泰依答道，“这孩子是你们学校的吗？”

“她是克鲁姆小姐班上的。三年级。”

“莫赛尔家还有别的孩子吗？”

“葛丽特利是独女。”

“得有人去告诉她的父母。”

一阵沉默，没有人吭声。

“你去怎么样？”马泰依问那个校长。

罗根保尔沉默了许久。最后他总算磕磕巴巴地回答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个胆小鬼，可是最好别让我干这件事。”他又轻声地补充一句：“这件事我干不了。”

“我明白，”马泰依说，“让牧师去行吗？”

“牧师在城里。”

“好吧，”马泰依平静地说，“你可以走了，罗根保尔先生。”

校长回到路上，那里已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梅根村人。

马泰依把眼光转向汉齐，他仍然靠在那棵山毛榉树上。“请别让我去，探长。”汉齐低声地说。检察官也摇摇头。马泰依又一次瞧了瞧尸体，接着又看看那条撂在树丛上浸透了血和雨水的撕破的小红裙子。

“那只好我去了。”他边说边提起了那篮点心。

## 六

莫斯巴赫是一块沼泽低地，离梅根村不远。马泰依让警车留在村里，徒步走去。他想要有些思考的时间。老远便可望见那所房屋了。马泰依听见背后有脚步声，便停了下来，转过身去。又是那两个小孩，跑得满脸通红。他们准是抄近路走的，否则不可能这么快来到这里。

马泰依继续往前走。那所房子很低矮，有白色的墙壁和黑色的桁木、屋顶是石板盖的。屋后是果园；园子里的泥土黑黝黝的。房子前面有一个男人在劈木柴。马泰依走近时，他抬起头来看着。

“你有什么事吗？”那人问道。

“我是州警察局的马泰依探长，”马泰依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他犹豫地自我介绍了一下，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是莫赛尔先生吗？”

“是的，你有什么事吗？”那人又问。他走了过来，站在马泰依面前，手里还握着斧子。他看上去大约四十岁，很消瘦，额头上尽是深沟般的皱纹，一双灰眼睛打量着探长。一个妇女出现在门口：她穿的也是一条红裙子。马泰依考虑他应该说什么。他一路走来就在考虑，可是到现在仍然不知该怎么说。莫赛尔来解围了。他看见了马泰依手里的那只篮子。

“是葛丽特利出什么事了吗？”他问道，眼睛在马泰依的脸上探索着。

“你派葛丽特利去哪儿了吗？”探长问。

“去弗伦村她奶奶家呀，”农民回答道。弗伦是附近的一个村子。马泰依思索片刻后问道：

“葛丽特利常走这条路吗？”

“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农民回答。接着突然受到一阵恐惧的袭击，他问道：“你干吗要知道这些？你干吗把篮子带回来？”

马泰依把篮子放在莫赛尔方才劈木柴的树墩上。

“有人在梅根村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葛丽特利的尸体，”他说。

莫赛尔没有任何动作。那个穿红裙子的妇女也是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马泰依看见汗从那人白皙的脸庞上流下来，像一条条小溪。他想把眼光掉开，可是那张脸，那一行行的汗慑住了他，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瞪视着站在那里。

“葛丽特利被人杀害了，”马泰依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声音里连一丝同情心都没有。这使他憎恨起自己来了。

“这是不可能的，”莫赛尔悄声说道，“不会有这样的恶人的，”他那只握在斧子把上的拳头颤抖起来。

“这样的恶人是有的，莫赛尔先生，”马泰依说。

那个人木然瞪着他。

“我要去看看我的孩子，”他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探长摇了摇头。“我请你不要这样做，莫赛尔先生。我知道我的话很残酷，不过你现在还是不要去看你的葛丽特利为好。”

莫赛尔凑到马泰依的跟前，这两个人现在是眼睛对着眼睛了。

“为什么不看为好？”他叫嚷道。

探长沉默不语。

有几分钟，莫赛尔掂量着手中斧子的分量，仿佛要用它来劈碎什么；接着他扭过身子朝他的妻子走去，她仍然站在门口，还是一动也不动，依旧一言也不发。马泰依等待着。任何细节也没有逃过他的观察，转瞬间他理会到

他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场面的。莫赛尔把他的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一阵无声的啜泣使莫赛尔突然浑身打颤，他把头埋在妻子的肩膀里，而她则偶然地瞪视着天空。

“明天傍晚你可以去看你的葛丽特利，”探长无可奈何地应允道，“到那时就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光景了——你的孩子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突然，那个妇女开口了。

“杀人犯是谁？”她问话的声音是那樣的平静，那樣的不动感情，马泰依只感到自己一阵发冷。

“我正是找出这个人，莫赛尔太太。”

那个女人瞧着他，眼光是威胁性的、专横的。“你答应我找出这个人来，是吗？”

“我答应你，莫赛尔太太，”探长说，一心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以你灵魂得救的名义吗？”

探长倒抽了一口冷气。“以我灵魂得救的名义，”他终于说。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好，那你走吧，”那个女人命令道，“你已经以你的灵魂得救作担保发过誓了。”

马泰依最后还想说几句话安慰安慰她，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

“我很抱歉，”他轻声说道，接着就转身走开了。他慢慢地顺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在他前面，坐落着梅根村，更远一些便是树林。在他头上，是天空——现在已经是万里无云了。他又看见那两个孩子，蜷缩在路旁。他筋疲力尽地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又小跑着跟在他的后面。接着，突然之间，他听到从他后面的屋子里传来一声像是野兽嗥叫的哭喊声。他加快了自己的步子，他不知道这样号哭的究竟是那个男的，还是那个妇女。

回到梅根村之后，马泰依马上就发现自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那辆刑警队的警车开进了村子在那里等他。犯案的现场与附近一带仔细搜寻过之后，封锁线已经撤了，留下三个便衣警察埋伏在树林里，他们的任务是观察路过的人，也许能发现杀人犯的踪迹。其余的警察该回城了。这时，天上已经没有一丝云彩，像是扫过的一般。但是一阵阵风还在袭击着村子。阿尔卑斯的热风仍然笼罩着这一带的村子和树林。这场雨并没有使人感到松快些；不自然的、令人窒息的湿热使每一个人都恼火、心烦、脾气不好。街灯已经点燃，虽然天还很亮。村民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听说冯·龚登有点牵连，便认为他就是杀人犯；小贩总是行迹可疑的。他们以为他已经被捕，便围拢在刑警队的警车周围。那小贩呆在车里，坐在两个直挺挺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蜷缩着，打着颤。梅根村人越来越逼近大轿车，把脸贴在车玻璃上。警察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刑警队后面那辆警车里坐着检察官，他也给团团围住了。验尸官的小汽车也被包围，他是从苏黎世赶来的。存放着小尸体的白色红十字急救车也同样被围得水泄不通。男人们站在那里，咄咄逼人地沉默着；妇女们都靠墙根站着，她们也同样一言不发。孩子们纷纷爬上了村中泉水池围栏。一种朦胧的、没有计划的愤怒使村民们集合在一起。他们要复仇，要伸张正义。

马泰依想拨开人群到警车上，但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他决定赶快找到一位本地的行政长官，便向周围的人打听。没有人睬他，他只听见一句半句威胁性的话语。马泰依考虑一下，便进入了小酒店。他没有猜错；村长正坐在公鹿酒店里呢。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的小个子，脸色显得不很健康。他一杯接一杯地喝意大利酒，正从低矮的窗户里朝外张望。

“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探长？”他问道，“村民们不好管束。他们觉得警察不起作用，他们想自己来伸张正义。”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葛丽特利是个好孩子。我们都很喜欢她。”

村长的眼睛里噙着泪水。

“那个小贩是无辜的，”马泰依说。

“那么你们干吗要逮捕他？”

“我们没有逮捕他，我们只是让他作证。”

村长用敌意的眼光盯着马泰依。“你这么说只不过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说，“这一套我们都知道。”

“作为地方官员，你首先得保证让我们安全离开。”

村长喝干了他那杯红酒。他只管喝酒，一句话也不说。

“怎么样？”马泰依愠怒地问道。

村长仍然很顽固。

“为这件事，必须把那个小贩吊死，”他猜猜地说。

探长的态度很明确。“要想做到这件事，你还得先动一次武才行呢，村长先生！”

“你难道愿意为保护一个性变态的杀人犯而动武吗？”

“不管他有罪没罪，法律是一定要尊重的。”

村长开始在晦暗的酒店房间里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由于没人伺候，他便自己到柜台那里去斟酒。他喝得很猛，以致大股黑色的液汁都顺着他的衬

衫往下流淌。外面的人群还是默不作声。可是一等司机想发动警车，人群便在车前挤得更紧了。

这时检察官也走进了酒店里。他是费了好大劲儿挤进来的。他的衣服凌乱不堪。村长惊讶得目瞪口呆。一个来调查案情的检察官的出现使他感到不安；像所有的普通平民一样，他总觉得干这个行业的人有点儿阴森森，似乎凛然不可侵犯。

“村长先生，”检察官说，“看来，梅根村的村民有意要搞一次私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叫增援部队。我想这样做秩序总可以恢复了吧。”

“我们还是再去跟村民们谈一谈吧，”马泰依说。

检察官用右手的食指戳戳村长的胸口。

“你最好还是让村民们清醒清醒，”他咆哮道，“否则的话，咱们走着瞧！”

外面，教堂的钟猛烈地撞击起来。从四面八方，都有人来支援梅根村村民。连救火队员也来到了，他们也站在反对警察的一边。能听到少数稀稀拉拉的辱骂声。

“坏蛋！蛀虫！”

警察也作好了准备。他们预料村民会向他们进攻，这些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控制不住。可是和梅根村村民一样，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日常工作是维持正常秩序，打击个别的犯罪分子。现在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他们不熟悉的情况。

人群忽然变得鸦雀无声，他们一动也不动。这时，检察官和村长还有马泰依一起从公鹿酒店里走出来了。旅馆正门外有一个带铁栏杆的宽台阶，三个人就站在这里。

“梅根村的村民们，”村长宣布道，“我请求你们好好听听布克哈特检察官先生阁下的讲话。”

群众中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农民和工人又像刚才那样一言不发、咄咄逼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在第一抹晚霞映照得绚烂夺目的天空底下，在黑压压的人群头上，街灯像苍白的月亮似的发出微弱的光。这些人决心要亲自惩罚他们心目中的杀人犯。在人群组成的浪潮当中，几辆警车挤在一起，像是黑色的巨兽。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想挣脱开去，它们的马达从低声哼哼一直发展到大声吼叫，可是又没精打采地安静下来，最后就关掉了。一点希望也没有。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村中房屋的黑山墙、广场、街上的人群——似乎都被白天发生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仿佛这件谋杀案已经毒化了整个世界。

“同胞们，”检察官轻声地、犹豫不定地开始讲话了——可是在鸦雀无声之中他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梅根村的乡亲们，我们都为这桩可怕的罪行感到震惊。葛丽特利被杀害了。我们还不知道是谁犯下了这个罪行……”

检察官的话讲到这里就被打断了。

“把他交出来！”

人们高举起拳头；有喝倒彩的，有吹口哨的，讲话没法再进行下去了。马泰依呆愣愣地注视着这些群众。

“快，马泰依，”检察官厉声说道，“打电话叫增援部队来。”

“冯·龚登是杀人犯！”一个高个子、骨骼粗大、脸色黧黑、胡子拉碴

的村民大声喊道，“我瞅见他的；山谷里根本没有别的人。”

他是那个在出事地点附近田里干活的农民。

马泰依考虑了一下便站了出来。

“老乡们，”他大声说道，“我是探长马泰依。我们准备把小贩交给你们。”

大家吃了一惊，霎时间一片死样的寂静。

“你疯了吗？”检察官在探长的耳边警告道。

“自古以来，在我们的国家里，罪犯若有罪，便由法庭判决，若是无罪，便由法庭开释，”马泰依接着往下说，“你们现在决定自己来充当法庭。你们有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现在不管；你们自己就把这个权拿过去了。”

马泰依说得很慢，很清晰。村民们专注地倾听着每一个字，权衡着每一个字。既然马泰依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他们也要严肃认真地对待马泰依。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求你们能够做到，不管对哪个法庭，我都是这样要求的，”马泰依接着说，“那就是公正。因为很清楚，我们只能在相信你们是要主持公道的前提下，才能把小贩交给你们。”

“我们就是要主持公道！”有一个人喊道。

“你们的法庭如果是公正的话，就必须做到这一点，那就是，避免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你们必须答应要做到这一点。”

“同意！”砖瓦厂的一个工头喊道。

“那么你们就必须研究一下：你们控告冯·龚登犯了杀人罪，这个控告究竟公道不公道。你们为什么怀疑是他干的呢？”

“这个家伙是个惯犯！”一个农民高声喊道。

“这只能增加冯·龚登可能是杀人犯的嫌疑，”马泰依解释道，“可是这并非证实他真是杀人犯的证据。”

“我看见他在山谷里，”那个黧黑脸、胡子拉碴的人又叫嚷道。

“你走到前面来，”探长要求道。

那个农民迟疑着不出来。

“去呀，海利，”有人喊道，“别做胆小鬼。”

那个农民犹犹豫豫地走了出来。村长和检察官都退到酒店的门厅里去了，因此只剩下马泰依一个人站在台阶上和那个农民讲话。

“你叫我干吗？”那农民问，“我的名字叫海利·本茨。”

人们聚精会神地瞧着这两个人。警察们已经把橡皮警棍重新挂回到腰带上去。他们也是屏息止气，观察着事态的演变。村中的顽童纷纷爬上了救火车上伸出一半的云梯。

“你说你在山谷里看见过冯·龚登，本茨先生，”探长说，“他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

“你那时候在干什么活儿，本茨先生？”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种土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从十点钟开始。我们全家是在地头上吃的午饭。”

“除了小贩以外，你没有看见过别人吗？”

“没有，这我可以发誓，”农民断然说。

“得了，别瞎说了，本茨！”一个工人嚷起来。“我两点钟的时候就在你的土豆地边经过。”

另外两个工人也说话了。他们也是两点钟那会儿骑自行车穿过山谷的。

“我也曾赶着马车穿过山谷，你这个傻瓜，”一个农民大声嚷道，“你这个小气鬼，总是闷着头干活，像一匹马一样，还让你的老婆孩子也都这样，没瞧见他们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吗？一百个光了身子的女人打你面前经过你也不会抬起头来瞧上一眼的。”

爆发了一阵哄然大笑。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山谷里并不是只有小贩一个人了，”马泰依接着说，“现在让我们继续往下调查。有一条通到城里去的路是和树林并行的。有人从这条路走过吗？”

“弗里兹·盖勃，”有人嚷道。

“我走过那条路。”说话的人是那个坐在救火车水泵上的身躯笨重的农民。“赶着我的马车。”

“什么时候？”

“大约两点钟。”

“从大路穿过一条林中小道可以到达出事地点，”探长肯定说，“你看到有人在那儿吗，盖勃先生？”

“谁也没瞧见。”那个农民用低沉的嗓音吼道。

“你也许碰巧见到一辆汽车停在那儿？”

农民吃了一惊。“我好像是见到的，”他游移不定地说道。

“你能肯定吗？”

“反正是有什么东西在那儿的。”

“是不是一辆红色的梅尔西德斯赛车？”

“可能是的。”

“还是一辆灰色的大众牌汽车？”

“这倒也有可能。”

“你的回答太含糊了，”马泰依说。

“哼，我那会儿正坐在马车上打盹呢，”农民承认说，“天这么热，谁都免不了犯困。”

“那我可得提醒你，在大路上赶车是不许睡觉的，”马泰依责备道。

“马儿自己会认路的嘛，”农民反驳说。

每一个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

“你们现在开始明白，如果你们自己想当法官，你们面前还有许多疑难问题呢。”马泰依告诉大家。“这个案子并不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犯下的。仅仅五十米以外，就有一家人在土豆地里干活。如果这些人警觉些，这桩罪行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他们没看见小女孩走过，又没看见走过这条路的其他人。他们恰恰注意到那个小贩，事情就是这样。而盖勃先生呢，他刚好也在他的马车上打瞌睡，不能提供法庭所需要的精确的证词。情况就是这样。你们是否认为这个小贩已被证实是有罪的呢？这个问题你们必须问一问自己。不管怎么说，向警察局报告的是他，这一点是对他有利的。我不知道，你们作为法官准备怎样做，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警察局的人准备怎么做。”

探长停了一会儿。他又是单独面对着梅根村村民了。本茨已经狼狈地缩

回到人群中去了。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每一个嫌疑犯，不管他地位是高是低，都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任何线索，只要有一点点影子，都要加以追究。不仅如此，如果必要，别的国家的警察也可以动员。而你们也明白，你们的法庭并没有多少办法来探求真相，而我们却拥有许多设备可以使用。现在，你们决定该怎么办吧。”

一阵沉默。梅根村的村民在沉思默想。

“你真的愿意把小贩交出来吗？”

“我说过我愿意的，”马泰依回答道，“如果你们坚持要这样做的话。”

梅根村的村民们犹豫不决起来。探长的话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检察官感到不安。在他看来，事情很玄。不过他马上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你们把他带走吧！”一个农民大声吼叫着。

梅根村村民们默默地让出了一条路。

检察官用火点燃一支雪茄烟。“你真是在冒险，马泰依，”他说道，“要是你不得不遵守诺言，那又怎么样？”

“我都是算计好了的，”探长不动声色地说。

“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答应一个你必须兑现的诺言。”检察官说。他划了第二根火柴来点烟，接着向村长道了别，大步向他那不再受到包围的汽车走去。

## 八

马泰依没有上检察官乘的那辆小轿车。他和小贩一起登上了警车。刑警们纷纷给他让座。大警车里很热。他们始终不敢开窗。村民们虽然已经给他们让出空道，却仍然站在车子四周。冯·龚登蜷缩着坐在司机的后面。马泰依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我没有犯罪，”冯·龚登低声保证说。

“当然，”马泰依说。

“没有人相信我，”马·龚登悄悄地说，“连警察也不相信我。”

探长摇了摇头。“这不过是你的想象。”

小贩仍然忧心忡忡。“你也并不相信我，探长。”

警车发动了。刑警们默不作声地坐着。夜幕已经降临。街灯把金色的光线投射在一张张石雕般的脸上。马泰依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对小贩不信任，感觉到对他的怀疑正在滋长。他很替这个人难受。

“我相信你，冯·龚登，”他说，但他感到他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我知道你跟这桩罪行无关。”

城市边上的第一排房屋已经远远在望了。

“我们得带你去见局长，冯·龚登，”马泰依说，“你是我们最最重要的证人。”

“我懂，”小贩喃喃地说，接着又悄悄说道，“你也不相信我。”

“胡说八道！”

小贩非常执拗。“我知道的，”他用他那轻得几乎无法辨清的声音说道，目光瞪视着街上那些像古怪的星辰一般照亮着稳稳向前的车辆的红绿霓虹灯广告。

这就是我乘七点半钟的快车从伯尔尼回到警察局时人们向我报告的事情经过。这个案件是同类案件中的第三起。两年前，有人在施维茨州用剃刀杀死过一个小姑娘，五年前在圣高尔州也发生过一起。这两件案子连罪犯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能够找到。

我派人去把小贩叫来。这个人四十八岁，个子很小，油腻腻的，很不干净，身上有一股气味；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一定是精神抖擞，口若悬河，而现在却呆若木鸡。他的证词起先是挺清楚的。他那时正躺卧在树林边上，脱了鞋子，货篮放在身边的草丛里。他原来打算去梅根村兜售刷子、背带、刀片、鞋带等货品。可是半路上他听邮差说魏格莫勒休假去了，里逊在顶班。情况起了变化，他就在草丛里坐下来考虑该怎么办。他知道我们这位年轻警察总是一阵阵抽风似地想雷厉风行，而且总是严格地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法律。他说，他很了解这些小青年。过不了一会儿他便睡着了。他描述了那个藏在树林的阴影里的、有条公路从中间穿过的小山谷的情景。离他不远有一家子农民在地里干活，有一条狗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他在弗仑村的大熊旅馆吃的那顿午餐显然是相当丰盛的——一大盘伯尔尼杂拌，他用葡萄酒把它们冲下肚去。他讲究吃，也吃得起。虽然他在乡下串来串去，胡子也不刮，邋里邋遢，衣着褴褛，行迹可疑，但是，他说，他的小买卖却还混得不错，甚至于还能攒几个钱。饭后他又喝了不少啤酒，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又吃了两块巧克力。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和一阵阵的凉风终于催得他完全睡着了。可是片刻后，他觉得他听见了一声尖叫，是一个小姑娘的高声尖叫，这个声音把他吵醒了，他在朦胧中往山谷对面看去，他有这样一个印象：地里的那几个农民抬起了头，惊奇地倾听了片刻。接着他们又弯下了身子，那只狗仍然在他们身边兜来兜去。这准是一只鸟在叫，他当时想，也许是一只猫头鹰。——他怎么能肯定呢？这个一半是猜想的解释使他宽了心。他继续打他的盹，可是接着树林里那阵突如其来的死一般的寂静惊醒了他，他开始明白快要变天了。他穿上鞋，拿起篮子，心里觉得很踏实，因为那声神秘的喊叫又回到他脑子里来了。最好还是不要冒与里逊遭遇的危险，他决定干脆不去梅根村了。反正从那里总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他开始往回走，到城里去，他挑了树林里的小路，那是通往火车站的一条近路。他就是这样才见到那个被杀害的小姑娘的尸体的。接着他便飞跑到公鹿酒店，立刻打电话给马泰依；他一点也没跟农民讲这件事，怕人家怀疑他。

这就是他的陈述。我让人把他带走，但是并没有释放他。也许严格地说这是不合法的。检察官没有下命令拘留他，可是我们没有时间管这些繁文缛节了。他的叙述在我听来是真实可信的，可是还需要加以核对——不管怎么说，冯·龚登是有过坐牢的记录。我那时候心情很不好。我觉得这个案子是注定查不清的。不知怎么搞的，一切都不对头；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我只是感觉出来了。我退缩到我称之为“商店”的地方去——那是一间被烟熏黑的小房间，就在我的办公室旁边。我派人到西尔桥附近一家餐馆里去买一瓶教皇新城堡酒来，喝了几杯。我必须承认，房间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书和文件。不过，在原则上——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并

井有条的国家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创造一个乱七八糟的小岛，即使他仅仅是秘密地这样做。

我让人把照片送来，看了真叫人恶心。然后我又研究地图。作案的地点不可能选得更加诡诈了。根据理论来分析，你没法判断到底杀人者是从梅根村来的呢，还是从附近的别的村子来的，或是从城里来的；也无法肯定他是走来的还是坐火车来的。任何解释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马泰依进来了。

“我很抱歉，你在任的最后一天还碰上了这样的倒霉事，”我向他说。

“这是我们的工作嘛，局长。”

“我瞧了这些照片之后，简直想把这份差事扔了，”我答道，一面把照片放回到信封里。

我心烦意乱，我想我没能完全控制住我的感情。马泰依是我手下最好的探长——你看，我是如何看待我们那种并不一定准确、却很合拍的上下级关系的——他在这样的时刻离去简直让我感到太不顺心了。他似乎猜出了我的想法。

“我想你最好把这件案子交给汉齐，”他建议道。

我犹豫不决。如果这个案子不是性谋杀案，我就会这样做了。倘若是别的案子，我们的工作简单得多。我们只需考虑作案人的动机，比方说，是为了金钱呢，还是出于妒忌，接着我们就能确定嫌疑犯。可是这样的方法对于性谋杀案不适用。一个出门办事的人偶尔看见一个女孩或一个男孩；他走出他的汽车——没有证人，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而到晚上，他就会回到洛桑、巴塞尔或者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家中，我们一点点线索都掌握不了。我不是小看汉齐；他是个能干的探员，可是我认为他缺乏经验。

马泰依却不这么认为。

“他在我手下工作已有三年，”他说，“他明白该怎么办。我想不出有谁能更好地接替我的工作。他会和我一样处理这个案子的。再说，我明天还不走呢，”他补充道。

我把汉齐叫来，叫他接管这个案子，并且让士兵特鲁勒当他的助手。他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处理一个案子。

“你去谢谢马泰依吧，”我嘟哝地说，接着便问他伙伴们的情绪怎样。我们现在是什么也决定不下来，既无线索，也无结果。让伙伴们知道我们还在瞎碰瞎闯这可不太妙。

“他们相信我们已经找到罪犯了，”汉齐说。

“是那个小贩吗？”

“对他的怀疑并不是全无根据的。不管怎么说，冯·龚登以前也犯过猥亵罪。”

“那是对一个十四岁的姑娘，”马泰依插嘴道，“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应该对他严加审问，”汉齐建议道。

“晚一晚也不碍事，”我决定说，“我并不认为这个人 and 谋杀案有什么关系。他这个人邪气十足，这一点不假。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本能地不相信。可是这不过是一个主观的反应，先生们，而不是犯罪学上的证据。我们不能凭直觉办案。”

说完我就让两个人离去。我的心情仍然没能好转。

我们把一切能调动的人都派去处理这个案件。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我们到各个加油站去，问有没有见到什么汽车上有血迹；接着，我们又去问洗衣店。然后，我们又核对所有与刑法的某个段落有点纠葛的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在梅根村，我们的人牵了猎犬走遍了树林，他们甚至还带去一个测雷器。他们在每一个灌木丛中彻底搜寻，主要是想找到凶器。他们有条不紊地检查了每一平方米，爬下山涧，在溪水里寻找，他们在林子里搜寻，一直搜寻到梅根村，所找到的每一样东西他们都仔仔细细地捡起来，保存好。

我也去了梅根村，虽然按常规我本人并不参加调查。马泰依看上去也很不安。这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春日，天高气爽，连一丝热风也没有，可是我们的心情仍然颇为阴郁。汉齐在公鹿酒店里设立了总部，在那里盘问一个个农民和工人。马泰依和我去学校访问。我们穿过果园，走一条近路。有些树已经开满了花。从校舍那边，传来了孩子们大声地唱一首歌谣的声音：“拉着我的手，引导我前进。”学校前面的操场上空无一人。我敲了敲教室的门，接着我们两人进去了。

正在唱歌的男女孩子都是六岁到八岁的——这里是最低的三个班级。正在打拍子的老师放下了手，担心地瞧着我们。歌声停止了。

“是克鲁姆小姐吗？”

“是的。”

“你是葛丽特利·莫赛尔的老师吗？”

“你有什么事吗？”

克鲁姆小姐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瘦削的妇女，有一对忧郁的大眼睛。

我走到课室的前面，转身向着孩子们。

“早上好，孩子们！”

孩子们好奇地瞪着我。“早上好，先生，”他们回答道。

“你们方才唱的那支歌真好听。”

“我们是在练习葛丽特利葬礼上要用的赞美诗，”教师解释道。

在教室的沙盘里，有人造了一座鲁宾逊·克罗索的岛屿。墙上，陈列着孩子们的图画。

“葛丽特利是怎样的一个孩子？”我迟迟疑疑地问道。

“我们都非常喜欢她，”老师说。

“她的智力怎么样？”

“她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孩子。”

我又犹豫不决了。“我想问孩子们几个问题。”

“请问吧。”

我走到教室的前面去。大多数的女孩子都非常小，梳着辫子，穿着鲜艳的围裙。

“你们肯定都已经听说葛丽特利·莫赛尔的事了，”我说，“我是警察局派来的，我是局长，相当于军队里的上尉，我的任务就是找到杀死葛丽特利的那个人。我现在不当你们是小孩，而当你们是大人跟你们讲话。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是有毛病的。所有干这种事的人都是有毛病的。因为他们有毛病，

所以他们就让孩子们引诱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伤害她们——到树林里、到地窖里或是别的隐蔽的地方。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咱们这个州里每年都要发生好几起。有时候那些坏人把孩子伤害得太厉害，孩子都活不过来了，葛丽特利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必须把这样的坏人关起来。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活动是太危险了。现在你们要问，干吗不早点把他们关起来，免得他们干坏事，像杀死葛丽特利这样的坏事呢？原因是你还没有办法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坏在内心，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孩子们屏住了呼吸听着。

“因此我要你们帮助我，让我们能找到杀死葛丽特利·莫赛尔的那个人。否则他还会去杀害别的姑娘。”

我一边说一边往前走，现在已经站在孩子们的中间。

“葛丽特利有没有向你们说过，有一个陌生人跟她说过话？”

孩子们沉默不语。

“最近你们有没有觉得葛丽特利有点古怪？”

孩子们也不知道。

“葛丽特利最近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过去她并没有的东西？”

孩子们没有回答。

“谁以前是葛丽特利最要好的朋友？”

“我是，”一个女孩悄声说道。

那是一个小不点儿，有棕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问。

“乌苏拉·弗尔曼。”

“那你是葛丽特利的好朋友咯，乌苏拉？”

“我们俩挨着坐的。”

小姑娘声音真轻，我只得弯下身来听。

“你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正常的事吧？”

“没有。”

“葛丽特利没有跟谁见过面吗？”

“是的，见过的，”小姑娘回答道。

“谁呀？”

“并不是人，”小姑娘说。

这个回答使我吓了一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乌苏拉？”

“她见的是一个巨人，”小姑娘悄悄地说。

“一个巨人？”

“是的。”

“你是说她见的是一个大个儿吗？”

“不，我爸爸是一个大个儿，不过他不是巨人。”

“巨人有多大呢？”我问。

“像一座山，”小姑娘回答，“全身都是黑的。”

“这个巨人送给葛丽特利什么东西了吗？”我问。

“给的，”小姑娘说。

“他给什么啦？”

“小刺猬。”

“刺猬？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乌苏拉？”我问，完全弄糊涂了。

“巨人身上全都是小刺猬，”小姑娘强调地说。

“哎，没这么回事，乌苏拉，”我反驳地说，“巨人不可能全身都是小刺猬的。”

“他是一个有刺猬的巨人。”小姑娘坚持说。

我走回到老师的讲台那边。

“你是对的，”我说，“葛丽特利看来想象力非常丰富，克鲁姆小姐。”

“她是一个富于诗意的孩子，”老师答道，避开了我的眼光。她那悲哀的眼睛看着远处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们真的得加紧练习了。葬礼就在明天。还有许多事儿要做呢。”

她定了一个音。

“拉着我的手，引导我前进。”孩子们重新用尖细的嗓音唱起来。

汉齐把公鹿酒店当作据点，在那里对全体村民进行了有系统的盘问，他也没有搞出什么新的情况来。傍晚时分，我们驱车回苏黎世，和来的时候一样两手空空。没人开口说话。我抽烟抽得太多，当地的红酒也喝得太多了。你是懂得这些有点来历不明的红酒的厉害的。马泰依呢，坐在车后座我的身边，也陷入了沉思。直到我们驱车下山，几乎来到离苏黎世市中心只有五分钟路程的罗曼霍夫时才开口。

“我不认为杀人者是梅根村人，”他说，“干这事的人也就是在圣高尔与施维茨作案的那个人。三桩谋杀案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这个人可能是从苏黎世出发去作案的。”

“非常可能。”我回答说。

“看来是一个自己有汽车的人，也许是一个经常为经商而出差的人。盖勃，那个农民，说他看见过有一辆汽车停在树林里。”

“我今天亲自盘问过盖勃了，”我说，“他承认那时他睡得太熟，根本不可能看见什么。”

我们又重新陷入了沉默。

“我很抱歉，不得不在办理这棘手的案子的中途就离开你们，”马泰依有点犹疑地说，“可是我必须遵守和约旦政府签订的合同。”

“你是明天坐飞机走吗？”我问。

“下午三点钟，”他回答道，“途经雅典。”

“我羡慕你，马泰依，”我说，这是真心实意的话。“我非常愿意在阿拉伯人当中做警察局长，而不愿呆在苏黎世。”

我让车子在乌尔本旅馆前面停下，我都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就住在这儿了，我让他下车，接着便驱车前往皇冠餐厅，我在一幅米罗的画下面用餐。这是我坐惯的一张桌子。我总坐在那儿吃小推车推来的滚烫的热菜。

## 十二

晚上十点钟光景，我再次到卡塞尔纳街总部去看看，我在走廊里经过马泰依以前的办公室时遇上了汉齐。汉齐没在梅根村呆多久；他中午就离开了，这使我感到惊讶。不过既然我已经把这个案子交给他办，再加以吹毛求疵，未免有违我的原则。汉齐是伯尔尼人，雄心勃勃，不过他手下的人倒挺喜欢他。他娶了一个我们苏黎世最殷实的人家的一个姑娘，他从社会党转到了自由党，正前途无量。我只不过是顺便说一句，他现在又和独立党人混在一起了。

“这家伙仍然不肯承认，”他说。

“谁？”我惊愕地问道，脚步停了下来，“谁不肯承认？”

“冯·龚登呗。”

我大吃一惊。“搞疲劳审问吗？”

“整个下午，”汉齐说，“有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彻夜审问。这会儿是特鲁勒在审他。我出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我倒要来看看这件事情，”我回答道，扬起了眉毛，一边跨进马泰依从前的办公室。

那个小贩坐在办公室的一张凳子上。特鲁勒把椅子搬到马泰依的桌旁，他用桌子来支撑自己的左臂。这个中士交叉着二郎腿，脑袋懒洋洋地托在左手里。他在抽烟。费勒在记录证词。汉齐和我在门口站停了，小贩背向着我们，没有看见我们。

“我没有干呀，长官先生，”小贩喃喃地说。

“我也没说是你干的。我只不过说有可能是你干的，”特鲁勒答复说，“我讲得对还是不对，这正是我们要查明的事。我们再打头上开始。你说你在树林边上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是的，长官先生。”

“接着便睡着了？”

“正是这样，长官先生。”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要去梅根村吗？”

“我累了，长官先生。”

“那你干吗要跟邮差打听梅根村警察的事呢？”

“想知道呗，长官先生。”

“你干吗想知道呢？”

“我的执照还没有重新上税。所以我想知道谁在梅根村值勤。”

“那么是谁在值勤呢？”

“我发现在梅根村的是一个替班的警察。这让我感到害怕，长官先生。”

“我也是个替班的，”中士干巴巴地说，“那你也怕我吗？”

“是的，长官先生。”

“你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改变了主意，不去梅根村吗？”

“是的，长官先生。”

“你这个故事倒是讲得蛮好听的，”特鲁勒承认。“可是也许还有另外一种讲法，更加符合真实。”

“我讲的都是真话，长官先生。”

“你不是很有兴趣，要从邮差那里打听附近有没有警察吗？”

小贩疲惫不堪地抬起头来看看特鲁勒。

“你这是什么意思，长官先生？”

“哼，”特鲁勒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想你最感兴趣的就是向邮差核对清楚，罗特凯勒山谷里并没有警察，因为你要等那个小姑娘来，是吗？”

小贩恐惧地瞪视着特鲁勒。“我并不认识这个小姑娘，长官先生，”他绝望地喊道，“即使我认识她，我也不会干这种事，再说山谷里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一家子农民正在地里干活。我不是杀人犯，你得相信我的话！”

“我是相信你的，”特鲁勒安抚他说，“可是我必须核对你的说法——这你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啊。你说你打了个盹以后便走进树林，想回苏黎世，是吗？”

“暴风雨快要来了，”小贩解释道，“所以我想抄近路。”

“于是你就见到了尸体，是吗？”

“是的。”

“你没有碰尸体吗？”

“是的，长官先生。”

特鲁勒停住了。虽然我看不见小贩的脸，我能感觉出他的恐惧。我替他感到难受。可是我也开始相信他是有罪的了，也许是因为我急于要找到罪犯。

“我们把你的衣服收掉，给你穿别的衣服，冯·龚登，你猜是为了什么？”特鲁勒问。

“我可不知道，长官先生。”

“是为了作联苯胺试验。你知道什么是联苯胺试验吗？”

“不知道，长官先生。”小贩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是检查有没有血迹的一种化学试验，”特鲁勒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友好态度解释道，“我们在你的衬衫上发现有血迹，冯·龚登，这是那个小姑娘的血。”

“因为……因为我绊倒在尸体上，长官先生，”冯·龚登说，他吓呆了。“真可怕。”

接着他用双手遮住了自己的脸。

“当然，你不提这件事唯一的理由就是你害怕了，是吗？”

“是的，长官先生。”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相信你讲的都是真话了？”

“不是我杀的，长官先生，”小贩苦苦哀求道，“请你相信我。你去请马泰依探长来。他知道我讲的都是真话。他知道的。”

“马泰依探长再也不管这个案子了，”特鲁勒回答道，“他明天要坐飞机去约旦。”

“去约旦，”冯·龚登喃喃地说，“这我丝毫也不知道。”

他一声不吭，呆呆地瞪着地板。房间里鸦雀无声；你可以听到时钟的嘀嗒声，以及偶尔从街上传来的汽车声。

这时汉齐把审讯工作接过去了。他先关上窗子，然后又作出善意和关怀的表情坐在马泰依的桌子后面。可是他把台灯一扭，使光柱全都落在小贩的脸上。

“你不用担心，冯·龚登先生，”中尉用一种过分客气的语气说道，“我们不是想害你；我们仅仅是想知道真实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向你呼吁，你是我们最重要的证人。你一定要帮助我们。”

“是的，探长先生，”小贩回答道。他似乎又恢复了勇气。

汉齐填装他的烟斗。“你是抽什么的，冯·龚登？”

“抽香烟的，探长先生。”

“给我一支，特鲁勒。”

小贩摇摇头。他低头俯视着地板。光线使他目眩眼花。

“灯光让你不舒服吧？”汉齐和蔼可亲地问道。

“它直射着我的眼睛。”

汉齐把灯罩转了一下。“这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冯·龚登喃喃地说，他的声音似乎很感激。

“告诉我，冯·龚登，你卖的是些什么东西？”汉齐又开始了。“是擦碟布吗？”

“是的，也卖擦碟布。”小贩迟疑不决地说。他不知道这个话题要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还卖什么？”

“鞋带，探长先生。牙刷、牙膏、肥皂、剃须膏。”

“刀片呢？”

“也卖的，探长先生。”

“什么牌的？”

“吉利牌。”

“就这些吗，冯·龚登？”

“大概是吧，探长先生。”

“好。不过我想你忘掉了几样东西。”汉齐一边说，一边端详着他的烟斗。“它不通了，”他自言自语道，接着又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说，“往下说呀，不要担心，把你篮里其它的小玩意儿也都列举出来。我们已经细细翻过你的篮子了。”

小贩没有回答。

“怎么样？”

“菜刀，探长先生，”小贩用低沉、悲哀的声调说。汗珠在他脖颈后部闪烁。汉齐喷出一股又一股的烟，平静而从容不迫——十足是一个友好的、心地善良的好人。

“往下说呀，冯·龚登。除了菜刀还有什么？”

“剃刀。”

“你干吗把这个放在最后说？”

小贩保持缄默。汉齐伸出手去仿佛要把灯光重新射到冯·龚登的脸上，但冯·龚登扭缩了一下，他便漫不经心地把手收了回去。中士的眼光始终一动不动地盯住小贩。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再加上汉齐烟斗里冒出的白烟，房间里空气叫人窒息。我真想打开窗子。可是关窗也是计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小姑娘是用剃刀杀死的，”汉齐随随便便地说道，仿佛这话从他嘴里出来，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小贩蜷缩着身子坐在他的椅子上，一点生气都没有。

“我亲爱的冯·龚登，”汉齐继续说，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隐瞒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杀了人。不过我也知道你也和我一样感到震惊，你的震惊和我们大家全都一样。这件事对于你完全是出于偶然。突然之间，你变得像一头野兽一样；你伤害、杀死了这个小姑娘，其实你并不想这样做，你完全是身不由主。有一种力量比你更加强大。当你清醒过来之后，冯·龚登，你吓坏了。你向梅根村奔去，因为你想投案，可是接着你又失去了勇气，丧失了坦白承认的勇气。你必须重新鼓起勇气来，冯·龚登。我们只是想帮助你。”

汉齐收住了话头。小贩坐在凳子上轻微地摇晃着。他眼看马上要垮了。

“我是你的朋友，冯·龚登，”汉齐断言道，“我们正在给你一次机会——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我累了，”小贩呻吟道。

“我们都累了，”汉齐答道，“特鲁勒中士，给我们拿些咖啡，再拿些啤酒来，也给我们的客人冯·龚登一份。在我们警察局里完全是公平的。”

“我是无罪的，探长，”小贩嘎声地耳语道，“我是无罪的。”

电话铃响了。汉齐拿起话筒，仔细倾听后挂断了电话，微笑起来。

“告诉我，冯·龚登，你昨天中午吃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容不迫地问道。

“伯尔尼肉杂拌。”

“好，还有什么？”

“最后一道菜是干酪。”

“艾曼泰勒的，格律耶尔的？”

“蒂尔西特和戈贡佐拉的，”冯·龚登说，把汗从眼皮上擦掉。

“这年头小贩吃得真不坏呀，”汉齐评论道，“你吃的就是这些吗？”

“是的。”

“要是我，我宁愿仔细再想想，”汉齐告诫他。

“巧克力，”冯·龚登想起来了。

“你瞧，还吃了别的东西，”我们的中尉说道，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

“你是在哪儿吃巧克力的？”

“在树林边上，”小贩说，向汉齐投去一个警惕的、疲倦的眼光。

汉齐把台灯闭掉，只有天花板上的灯在一房间的烟雾中射出微弱的光。

“我刚从验尸官的研究室那里接到报告，冯·龚登，”汉齐得意洋洋地说，“对小姑娘的尸体解剖已经做完了。在她胃里发现有巧克力。”

听到这里时连我也相信小贩是有罪的了。他的供认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向汉齐点了点头，离开了房间。

## 十四

我没有错。第二天早上——那天是星期六——汉齐七点钟打电话给我。小贩承认了。我八点钟到办公室。汉齐仍然在马泰依以前的办公室里。他正坐着从打开的窗子里向外面眺望，倦容满面地转过头来招呼我。地板上到处是啤酒瓶，烟灰缸都满出来了。房间里没有别人。

“他的供词有具体的细节吗？”我问。

“他以后要补充细节的，”汉齐回答道，“重要的是他承认自己杀人了。”

“我希望这次审问进行得很得体，无可指责，”我不满意地嘟哝道。这次审问持续了二十来个钟点。这当然是不合法的；不过在警察局里，我们毕竟不能够太拘泥于法律条文。

“我们并没有用什么不正派的审问方法，局长，”汉齐声明道。

我走进“商店”，让人把小贩带来。他几乎都站不住了，必须让那个带他进来的警察扶住他；可是当我叫他坐的时候，他并没有坐下。

“冯·龚登，”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友好的语调，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听说你已经承认自己杀死了小葛丽特利·莫赛尔。”

“是我杀了那个小姑娘，”小贩喃喃地说，声音低得我几乎都听不清楚。“现在别来打扰我了吧。”

“先去睡上一觉吧，冯·龚登，”我说，“我们以后再继续往下谈。”

他被带出去了。在门口他遇见了马泰依。冯·龚登停住脚步，沉重地呼吸着。他张开嘴，仿佛想说什么话，可是接着又保持了沉默。他仅仅是瞧着马泰依，马泰依微微有点狼狈地给小贩让出了路。

“走吧，”那个警察说道，把冯·龚登带走了。

马泰依走进“商店”，关上了他背后的房门。我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怎么样，马泰依，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可怜虫是不是被审问了二十多个小时？”

“汉齐只不过是模仿你的方法而已，你的审案工作一向很高明。”我回答道，“不过他第一次独立工作倒像是颇为出色，难道你不觉得吗？”

马泰依没有回答。

我让人端两份咖啡和羊角面包来。

我们两人都感到沮丧。热咖啡并没有能提高我们的情绪。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冯·龚登是会翻供的，”马泰依终于说道。

“可能的，”我阴郁地说，“然后我们再重新让他承认。”

“你认为他是有罪的吗？”他问。

“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顶了回去。

马泰依犹豫不决。“是的，也许是有罪的吧，”他毫无信心地回答道。

清晨的亮光从窗子里大股大股地照进来，是一种暗淡的银白色。从西尔奎依传来了街市的喧声，兵士们从营房里列队走了出来。

这时汉齐出现了。他没有敲门就走进房间。

“冯·龚登上吊自杀了，”他郁郁不欢地报告说。

## 十五

牢房在长长的走廊的末端。我们飞跑过去，已经有两个人在那里摆弄冯·龚登了。他躺在地板上。人们扯开了他的衬衣；他那多毛的胸膛已经不动弹了。他的背带还在铁窗架上晃动。

“冯·龚登！”马泰依朝他身边蹲下去。

“没有用了，”一个警察说道，“他已经死了。”

马泰依站起身来。

我重新点燃我那支已经熄灭的雪茄烟，汉齐也拿起了一支香烟。

“我想这就把葛丽特利·莫赛尔的案件告一结束了吧，”我决定说。我们疲惫不堪地穿过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回到办公室去。“我希望你飞往约旦去的旅途上一路愉快，马泰依。”

## 十六

下午将近两点钟，费勒最后一次把公家的汽车开到乌尔本旅馆，好把马泰依送上飞机。可是当皮箱已经放好以后，探长却说他的时间还多，不妨先到离大路不远的梅根村弯一弯，然后再去机场。费勒听从了，他走的是穿过树林的那条路。他们抵达村中广场时正好看见送葬的队伍也来到广场了，这是一长串沉默的人。周围村子里的人，甚至还有从城里赶来的人，都涌进了梅根村来参加葬礼。报纸已经刊登了冯·龚登死亡的消息，人们普遍有一种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的情绪。正义得到伸张了。马泰依走出汽车，他和费勒站在教堂对面的儿童们之间。棺柩放在一辆由两匹马拉的大车上，车子里堆满了白色的玫瑰花。棺柩后面跟着本村的儿童，两个一行，每一对儿童手里都捧着一个花圈，领头的是克鲁姆小姐、校长、牧师和穿白衣服的姑娘们。接着走过来的是葛丽特利·莫赛尔的父亲母亲，两人都是一身黑衣服。母亲停住脚步，凝视着探长。她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她的眼睛里一片茫然。

“你遵守了你的诺言，”她用耳语说道，可是说得那么清晰，每一个字马泰依都听得清清楚楚。“谢谢你。”接着她又继续往前走。她仰着头，非常骄傲的样子，而走在她身边的那位丈夫已经成了一个突然变得非常衰老的垮掉了的人。

探长等队伍里所有的人都走了过去——本地的村长、州政府的代表、农民、工人、家庭主妇、村里的少女们——全都穿着最好的最庄严的服装。寂静笼罩着下午的阳光所照亮的一切，甚至连旁观者也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能听见的只有教堂的洪亮的钟声、马车轮子的碾轧声以及送葬的人们走在村中硬石块路面上的无数脚步声。

“上机场去，”马泰依一面钻进汽车，一面说道。

## 十七

马泰依向费勒道过别，他的护照也已检验通过以后，便在候机室里买了一份《新苏黎世日报》。报上登了一幅冯·龚登的照片，底下注明他就是葛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另外还登了探长的一张照片，并且报道了他最近接受了光荣的委任。明摆着这个人一级级往上爬，前途正无量呢。可是当他臂弯上搭着雨衣走到跑道上去时，他注意到飞机场大楼的平台上满是儿童。这是学校里一个班级的儿童，是老师带着来参观飞机场的。他们中有女孩，也有男孩，都穿了夏季的鲜艳衣服，当他们看到银白色的大飞机起飞或是降落时，都要挥舞小旗或手帕，激动地叫呀喊呀的。探长停住步子，踟蹰了片刻，接着又继续往停靠着的瑞士班机走去。等他走到飞机跟前时，别的乘客都已经进去了。带领乘客上飞机的空中小姐伸出手来接马泰依的飞机票。可是探长再次转过身子。他望着那一大群正在朝即将起飞的飞机快活而羡慕地挥舞手臂的孩子们。

“小姐，”他说，“我不想搭这班飞机了。”接着他回转身来朝候机大楼走去。他在挤满了孩子的平台底下穿过，径直朝出口处走去。

我一直到星期天早上才接见马泰依。我和他见面已经不是在“商店”里，而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过从窗子里看出去也同样是有气派的西尔盖依的街景。墙上挂着古伯勒、摩根泰勒和匈齐格的画——全是有声望的苏黎世画家。我很明显地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事情给搞得一团糟。政治部某一位坚持只说法语的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约旦大使馆已经提出抗议，而联邦委员会又要我们汇报情况，可是我却汇报不出，因为我弄不懂我这位从前的下属的行动是什么意思。

“坐吧，马泰依先生，”我说。我想我那冷冰冰的态度准能使他感到气馁。我们坐了下来。我没抽烟，也并没有露出要抽的迹象。这也肯定使他感到不安。

“联邦政府，”我接着说道，“关于警务专家的事是和约旦王国签订了一项条约的。而你，马泰依博士，也是和约旦签订了合同的。你不去赴任是违反协议的。我们都是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我用不着说得更明白了吧。”

“用不着了。”马泰依说。

“因此，我必须要求你尽快地动身去约旦。”我向他建议道。

“我不想去了，”马泰依说。

“为什么？”

“谋杀小葛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还没有找到呢。”

“你认为那个小贩是无罪的？”

“是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他自己的供词。”

“他一定是吓坏了。这么长时间的审讯、悲观绝望、被人抛弃的感觉，等等。对此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他轻轻地说，“这个小贩那时指望我救他，而我却没有帮助他。我那时正要去约旦。”

情况的确奇特。就在前一天，我们还随便交谈，没有一点儿拘束，可现在，我们直僵僵地坐着，一本正经，两个人都穿着星期天的规规矩矩的衣服。

“我要求你再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来办，局长，”马泰依说。

“这我做不到，”我回答道，“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马泰依博士先生。”

他惊愕地瞪视着我。

“我给开除了吗？”

“是你辞退了你在州警察局的职务，因为你要去约旦赴任，”我平静地解释道，“如果你违反协议，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如果我们重新起用你，那就是我们支持你的行动了。你必须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嗯，我明白了，”马泰依说。

“很抱歉，对这件事我们爱莫能助，”我断然地说。

我们默默地对坐了好一阵子。

“我去机场的路上在梅根村弯了一下，那儿有许多孩子，”马泰依轻声说。

---

瑞士的政治部掌管外交事务。——译注

瑞士的最高行政机构。——译注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多的孩子参加了葬礼。”

“当然啰，”我说。

“在飞机场，又看见了许多儿童。从学校里出来的整整一个班级的孩子。”

“那又怎么样呢？”我困惑地瞧着马泰依。

“假如我的看法是对的，假如葛丽特利·莫赛尔的凶手还在附近活动，别的孩子不是还处于危险中吗？”马泰依问。

“当然啰，”我平静地说。

“如果存在这样的危险，”马泰依进一步坚持地说，“警察当局就有责任保护儿童，防范另一次犯罪行为的发生。”

“那么这就是你不上飞机的原因了，”我缓慢地说，“为了保护孩子们。”

“正是如此。”马泰依回答。

我现在把整个局势看得比较清楚，并且开始理解马泰依了。可是最后我对他说，别的孩子有受害的可能，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如果马泰依的揣测是对的，我们只能希望真正的凶手在某个时候会暴露自己；或者，这是最坏的情况了，凶手再次作案时给我们留下了有用的线索。我说的这些话听起来很挖苦，我承认，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现实才是确实可怕的。警察当局的力量是有限的，也必然是有限的。当然，什么情况都是可能的，我接着说，即使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事，然而我们总是要在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们不能说冯·龚登毫无疑问是有罪的——在犯罪问题上我们是永远也不能这样明确断言的。可是我们能说他可能是有罪的。除非我们挖空心思找出某个捉摸不定的人来，否则这个小贩便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了。他以前犯过罪、定过罪，他身边又带着剃刀和巧克力，衣服上又沾了血迹。再说，我们也查明施维茨和圣高尔也是他经常去做买卖的地方——另外两起谋杀案便发生在这两个州。况且他本人也已承认犯罪，并且自杀身死。现在再来怀疑他有没有犯罪未免太外行了。正常的理性告诉我们，冯·龚登是凶手。当然，正常的人类理性也可能错的——我们只不过是凡人；可是我们不得不冒险。我们必须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再说，很遗憾，葛丽特利·莫赛尔被杀案不是我们亟需处理的唯一的案件。紧急行动队刚被派到谢里伦去，昨天晚上那里发生了四起严重的偷盗案。仅仅由于纯粹技术上的原因，我们就无法不顾人力物力，去重新审查一桩业已结束的案件。我们只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而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我接着又说，孩子们始终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单在苏黎世州，每年就有两百多起性罪行是与儿童有关的。当然我们开导家长，警告儿童，这些我们也都做了，可是我们不能把警察局的罗网编织得那么严密，以致不再有罪案发生呀。罪案总是要发生的，不是因为警察太少，而正是因为有警察存在。那一天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时，那也就是说没有犯罪行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职责——马泰依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我承认——不过我们首要的任务还是不要超出我们的范围，否则我们只能发现自己在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我发表了这篇长篇演说之后便陷入了沉默。外面，教堂的钟开始鸣响了。

“我能够理解你个人的困难处境，”我说，想以此结束我们的谈话。“你现在是进退两难了。”我最后客气地表示说。

“谢谢你，局长，”马泰依回答道，“眼下我想调查一下葛丽特利·莫

赛尔案件，作为个人来调查。”

“我劝你别再翻这本老账了，”我建议说。

“我不打算放弃，”他回答道。

我不让自己心里的恼火显露出来。

“那么我请求你别再拿这件事情来烦扰我们，”我说着，一边站起身来。

“只要你愿意这样，”马泰依说。

我们联手都不握就走开了。

对于马泰依来说，经过他以前的办公室离开空荡荡的警察局大楼，心中的滋味一定是不好受的。办公室门上的姓名牌已经换过了，当他撞见费勒时——费勒连星期天也老爱呆在办公室里——那个人回避开他的眼光，嗓子眼里嘟哝几句便算是打了招呼。马泰依只觉得自己像一个鬼魂。可是最使他感到不方便的还是他再也没有公家的汽车可以随意使用了。他决心尽快地赶到梅根村去，但是要实现这个意图也不太容易。路程并不算远，可是没有汽车，交通就很不方便。他得先坐八路电车，然后换乘公共汽车。在电车里他遇到了特鲁勒，特鲁勒是和他妻子一起去看岳父岳母的。特鲁勒惊愕地瞪视着探长，却没有提什么问题。事实上马泰依不断地遇到熟人——联邦技术学校的一个教师，以及一个画家朋友。对于他们提出的他为什么未能启程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地应付几句。每遇到一个熟人都让他感到狼狈，因为大家已经庆贺过他的“高升”和出国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死后复活的鬼魂。

在梅根村，教堂的钟声已经不响了。农民们穿了星期天的衣服闲站在广场四周，或是成群结伙地逛到公鹿酒店里去。天气比前几天清爽得多；一堆堆的云块从西边朝这里飘浮过来。在莫斯巴赫村，年轻人早已踢起了足球；已经丝毫也看不出几天前在村子附近发生过犯罪事件的痕迹了。一切都显得很轻松愉快。不知什么地方有些人在唱《菩提树》。在一所有木条围墙和大屋顶的宽敞的农舍前面，孩子们在玩捉迷藏游戏。一个孩子大声地数到十，别的孩子就向各处飞跑躲藏。马泰依观看着他们。

“先生。”有一个轻轻的声音在旁边喊他。他转过头来看看。在一堆圆木料和花园围墙之间，站着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女孩。棕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那是乌苏拉·弗尔曼。

“你有什么事吗？”探长问道。

“站在我的前面，”小姑娘悄声说道，“别让他们找到我。”

探长用身子挡在小姑娘的前面。

“乌苏拉……”他说。

“你千万别那么嚷嚷，”小姑娘低声警告他，“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听见你在跟谁说话了。”

“乌苏拉，”探长也轻声轻气地说，“我不相信关于巨人的那些话。”

“你不相信什么？”

“就是说葛丽特利遇到了一个像山一样大的巨人。”

“不过这样的巨人是有的呀。”

“你瞧见过吗？”

“没有。可是葛丽特利见到过的。嘘，别吱声啦。”

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的男孩蹑手蹑脚地拐过屋角走过来。他是那个找人的人。他在探长前面停了一会，接着又偷偷地绕到屋子的另一边去了。小姑娘吃吃地笑了。“他没瞅见我。”

“葛丽特利告诉你的的是一个童话吧？”探长继续悄声问道。

“不，”小姑娘说，“每一个星期那个巨人都等着葛丽特利，还给她刺猓。”

“在什么地方？”

“在罗特凯勒山谷，”乌苏拉回答说，“她还画过一张他的像。所以一

定是有的，而且还有那些小刺猬呢。”

马泰依感到十分惊愕。

“她画了一张巨人的像？”

“那张画就在教室里，”小姑娘说，“你快让我走呀。”还不等他说一句话她就从木料堆和马泰依之间挤了出去，拚命往屋子冲过去，她摸到门框时发出一声欢呼，因为，在那个从屋子后面冲出来的男孩抓住她之前，她到“家”了。

## 二十

我在星期一早上所听到的消息是不寻常和让人心烦的。首先，梅根村的村长打电话来，埋怨马泰依硬闯进小学的教室偷去了被杀死的葛丽特利·莫赛尔的一幅图画；他不希望州警察局还派人到他的村子里来瞎捣乱，在这场大动乱以后，应该让事情平静下来了。事实上，他最后脱口说道，如果马泰依再来，他就要带着狗把马泰依赶出村子去。接着，汉齐进来报告说他跟马泰依吵了一架，使他加倍不安心的是这事发生在皇冠餐厅；他的老上级显然是喝醉了，一口气就喝干整整一瓶窖藏好酒，接着又要了一瓶科涅克白兰地，然后摇摇晃晃地来到汉齐的桌子跟前，指斥他错判了一个案件。汉齐的妻子出身名门，她是既气愤又感到厌恶。

可是事情还不算完。在早上的汇报会之后，费勒告诉我，市警察局里的一个家伙给他通报消息说，人们在许多家酒吧间里看见了马泰依，还说他现在住在雷克斯饭店。而且，这听起来真叫人难以置信，他们还听说马泰依抽上香烟了，而且抽的是市场上最蹩脚的牌子。总之，这个人完全变了；他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在我看来，这整个事情就像是一次即将来临的精神崩溃症。于是我挂电话给一个在精神病问题上经常给我们帮助的精神病医生。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医生告诉我，马泰依自己那天下午就和他预约了一个看病的时间。于是我告诉了他一些有关的情况。

接着我便给约旦大使馆写了一封解释信。我说马泰依病了，希望能宽限两个月，让他康复后再赴安曼就任新职。

那位精神病大夫的私人诊所离城很远，在卢顿村附近。马泰依是坐火车去的，可是从车站到诊所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马泰依很性急，不耐烦等公共汽车，可是过不了多久公共汽车就追上他了，并且走到前面去了，他只好略带气恼地瞧着它驶走。他经过了好几个小村落。孩子们在路旁玩耍，农民们在地里干活。天上阴云密布，呈现出一派银灰色的景象。天气又变冷了；气温骤然向零度降落，幸而在快到零度时又突然煞住了。

马泰依沿着山脚往前走，经过卢顿村之后他拐入一条马路，这条路穿过一块平地通往疗养所。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座有高烟囱的黄色建筑物，这可能是一家凋敝的老工厂。可是过不多久，景致就吸引人些了。医院的主楼仍然被山毛榉和白杨树遮挡住，然后他又注意到了杉树和一棵非常大的红杉树。他终于穿过草地了。马路出现了岔口。马泰依顺着—块标明是“院部”的指示牌所指点的方向走去。在树木和灌木丛之间，有一小片湖水在闪光，不过也许只不过是一团雾罢了。到处都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马泰依除了自己的脚走在砾石路上的碾轧声之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过了一会，他听到了耙石子的声音。一个年轻人在耙砾石路。他慢吞吞地、有节奏地重复着他的动作。马泰依犹豫不决地停住脚步。他不知道该往哪儿拐，因为看不见别的路牌。

“你能告诉我到院部去怎么走吗？”他问那个年轻人。没有回答。年轻人继续匀称地、静静地、机械地使着耙子，仿佛根本没有人和他说话，仿佛旁边根本没有人似的。他的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的动作那么轻巧，与他那强壮的身躯形成奇怪的对照，探长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危险威胁着自己，仿佛这个年轻人会突然抡起耙子来打他似的。他有点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去，来到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又通到另一个更大些的院子，两边都有石柱回廊，就像在修道院里似的；第二个院子的尽头是一所楼房，模样像是乡村别墅。这里也是阒无人迹，虽然什么地方传来一个人的哀号，声音很尖厉，像是有热病的人发出来似的。这声音总是重复着同一个词，一遍又一遍，总也不停止。马泰依再次迟疑地停下了脚步。一种无名的悲哀笼罩住了他，他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这么沮丧过。他握住那扇古老的装饰华丽的大门的把手往下压，可是门不动。他耳边仍然响着那个声音，那无止无休的哀鸣。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中，他顺着石柱回廊往里走。有几个大石花盆里种着红郁金香，另外几个盆子里种着黄郁金香。现在他终于听到脚步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绅士庄严地穿过院子向他走来，脸上是一片茫然的神情，一个女护士给他领着路。

“你好，”探长说，“我想见洛赫尔教授。”

“预约了吗？”女护士问。

“医生在等我呢。”

“请到客厅里等候，”女护士指着一对双扇门说，“会有人来带你的。”然后她继续向前走，胳膊挽着神色痴呆的老绅士，她用钥匙打开了一扇门，两个人便都消失了。不知何处传来的声音还清晰可闻。马泰依走进客厅。这是一间大屋子，摆着古色古香的家具和靠背椅，还有一张巨大的沙发椅，沙发上方挂着一幅装在沉重金框里的男人肖像。他想，一定是医院创建者的肖像。墙上的其它图画都是些热带风光，也许是巴西风景。马泰依揣测画的是里约热内卢的附近地带。他走出双扇门，外面是一个大阳台，石槽里种着巨

大的仙人掌。他再也看不清花园的面貌，因为雾气已越来越浓了。马泰依朦朦胧胧看见一大片宽阔的略有起伏的土地，这里那里竖立着一些纪念碑和墓碑，还有就是一棵多荫的白杨树傲然挺立着。探长逐渐觉得不耐烦。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新染上的不良习惯使他平静下来。他回进房间，坐到沙发上。他面前一张古色古香的圆桌上摆着一些古老的书籍，是古斯塔夫·波尼埃写的《法国、瑞士与比利时植物志大全》。他略加翻阅，全是工笔绘制的花草图样，当然都是很美丽很能安定人的神经的，可是探长觉得没有兴趣。他开始抽第二支烟。最后总算来了一个护士，小个子，戴一副无边眼镜，模样精明能干。

“是马泰依先生吗？”她问。

“是的。”

护士看看四周。“你没有带行李？”

马泰依摇摇头，片刻之间对这个问题感到不能理解。

“我只是想同教授先生讨论几个问题而已，”他回答。

“请随我走，”护士说，领着探长穿过一扇小门。

他踏进了一间很小而且简陋得令他吃惊的房间。一点看不出是一个医学专家的房间。墙上挂着和客厅里类似的画像，还有一些戴无边眼镜、留着胡子的严肃的男人照片，面貌都古里古怪。显然全是前任院长的。写字桌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籍，只有一张旧皮安乐椅上是空的。医生穿着白罩衣坐在一大堆卷宗后面。他又瘦又小，像一只鸟，也戴一副无边眼镜，就和那个护士以及墙上那些大胡子一模一样。无边眼镜在这里像是强制性的必戴之物，也许就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标志，就像修士的光头一样，探长不由自主地猜测着，然后又耸耸肩膀，把这个想法撇开了。

护士离开了房间。洛赫尔站起身来向马泰依问好。

“欢迎，欢迎，”他有点发窘地说，“请不必拘束。这里一切都很简陋。我们全靠私人捐助，经济上困难得很哪。”

马泰依坐到皮椅子上。房间里已经很黑，医生开亮了写字桌上的台灯。

“可以抽烟吗？”马泰依问。

洛赫尔仿佛吃了一惊。“请随便，”他回答说，透过自己灰尘满布的镜片仔细观察着马泰依。“你从前可是不抽烟的啊？”

“从来不抽。”

医生拿起一张纸，开始在上面涂写，显然在作一些记录。马泰依等待着。

“你生于1903年11月11日，是不是？”医生问，一边仍在写着字。

“是的。”

“仍旧住在乌尔本旅馆吗？”

“现在住在雷克斯旅馆了。”

“噢，现在住雷克斯旅馆，在瓦恩堡街。那么你打算一直住客栈啦，我亲爱的马泰依？”

“这使你很吃惊吗？”

医生瞧瞧那张纸。

“先生，”他说，“你在苏黎世居住已有三十年。其他人早已建立了家庭，生儿育女，为了未来而惨淡经营。你难道没有任何私人生活吗？请原谅我问得如此直率。”

“我明白，”马泰依回答，突然明白了一切，包括护士为什么问到他的行李。“局长已经和你谈过了吧？”

医生小心地把钢笔搁在一边。“你这是什么意思，尊敬的探长先生？”

“你受委托来检查我的健康，”马泰依肯定说，掐灭了香烟。“因为州警察局认为我不太正常。”

两个男人沉默地坐着。屋外，雾气朦胧，苍茫的暮色正在阴郁地渗进这间小小的屋子，蠕行在书籍和一堆堆卷宗之间。空气寒冷而带霉味，掺杂着某种药物的气味。

马泰依站起身来走到门边，打开了房门。门口有两个穿白短衫的男人交叉着胳膊站在那里。马泰依重新关上房门。

“这两个看护，是怕我闹事而派来的。”

洛赫尔保持着镇定。

“请听我说，马泰依，”他说，“我现在要以医生的身分和你说话。”

“随你的便，”马泰依回答，又坐下来。

洛赫尔把钢笔重新拿到手里，接着说下去：他听别人向他报告说，马泰依最近一个时期的行为让别人没法认为他是神经正常的，因而不得不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谈明白。马泰依从事着一种艰巨的职业，对于他工作范围内所遇到的人，他不得不硬着心肠对付。因而他也必须面对医生的直言不讳，因为医生的职业也要求医生硬起心肠。心肠硬，性格也坚强。不管怎么样，当他听说马泰依如此突然地放弃约旦的这一个好机会，把这个位置看得一钱不值时，他不得不认为马泰依的行为是古怪的。接下去又是如此偏执地要寻找一个已经找到了的凶手。然后又突然吸起烟来，又变得如此嗜酒——喝完一瓶法国陈酒还要来四次双份的白兰地酒——唉，该死的，把这种种现象加在一起，显然就是人格突然分裂的一种表现，是一种精神病的早期症状。为了马泰依自己的利益，他应该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使人们得以找出他的病理的和心理的病因。因此，医生建议马泰依在卢顿住些日子。

医生说完后就沉默了，蜷缩在他的卷宗后面，又重新写起字来。“你常常发烧吗？”他问。

“不发烧。”

“讲话困难吗？”

“不困难。”

“声音怎么样？”

“什么事儿也没有。”

“会突然冒汗吗？”

马泰依摇摇头。越来越浓的暮色与医生的没完没了的问题消耗着他的耐心。他摸索着找他的烟卷，终于找到了。当他接过大夫递给他的火时，他的手颤抖着，是恼怒引起的颤抖。他的处境太可笑了；他应该预见到这一点并且去找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可是他特别偏爱这个大夫，在警察局总部，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才挑中了他来当医药顾问的。马泰依之喜欢他，是因为别的医生都瞧不起他，把他看作是个怪人，或者是一个幻想家。

“你激动了，”医生断定说，几乎感到很高兴。“要不要叫护士来？如果你现在就愿意去你的病房……”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马泰依答道，“你有科涅克酒吗？”

“我可以给你吃一点镇静药，”大夫建议道，并且站起身来了。

“我不需要镇静药，我要的是科涅克酒，”探长粗暴地答道。

医生准是按了一个看不见的电钮，因为一个男护士出现在门口。

“到我房里去取一瓶科涅克酒和两只杯子来，”大夫命令道，一边搓了搓手——也许是因为冷吧。“请你快一点。”

男护士快步走开了。

“真的，马泰依，”大夫说，“我认为你非常有必要赶紧签字同意在这儿住下。否则，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次典型的精神和肉体的崩溃了。这样的崩溃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是不是？只要作出一定的努力，我们就能避免它。”

马泰依没有回答。医生也陷入了沉默。电话铃响了。洛赫尔拿起来，说：“我现在有事。”窗外差不多已经完全黑了——突然之间，天已经完全漆黑了。

“要不要我打开天花板上的灯？”大夫问，完全是为了找话说。

“不用了。”

马泰依现在恢复了镇定。当那个男护士拿了科涅克酒进来时，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喝干了又倒上一杯。

“洛赫尔，”他说，“能不能请你扔掉这一套‘逻辑推论’和‘抓紧时间’的把戏。你是个大夫。你难道在行医的过程中没有碰到过你解决不了的疑难病症吗？”

洛赫尔惊愕地望着马泰依。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尴尬，他不知道探长问这个问题用意何在。

“我的病例大多数都是难以解决的，”最后他老实地承认，虽然他话刚一出口就感到对一个在他看来是病人的人——即使是马泰依——是不应该这样回答的。

“我早就猜到你们这一行就会是这样的，”马泰依用一种挖苦的语气答复说，这使大夫感到伤心。

“你上这儿来难道就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吗？”

“这也是目的之一。”

“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你到底是怎么的啦？”大夫不安地问道，“你一直是我见到的人里最有理性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马泰依迟疑不决地回答道，“那个被人谋杀的孩子。”

“葛丽特利·莫赛尔？”

“我一时一刻也没法把这个孩子从头脑里撇开。”

“她老在折磨你的神经？”

“你有孩子吗？”马泰依问。

“我和你一样，也没有结婚，”大夫轻轻地说，重新感到不安。

“哦，你也没结过婚。”马泰依皱着眉头沉默下来。“你瞧，洛赫尔，”他解释道，“我敢于面对现实，不在它面前畏缩害怕，像我的接班人汉齐那样——稳重可靠的汉齐！在树叶当中躺着一具被弄得残缺不全的尸体。只有脸没有遭到破坏，那是一张孩子的脸。我凝神仔细瞧了瞧这张脸，一条红裙子扔在树丛里，地上还撒了一些椒盐卷饼。可是真正的恐怖还不在这里。”

马泰依重新又陷入了沉默，好像是感到害怕一样。他是个从不爱讲自己的事的人，现在之所以不得不讲，是因为他需要这个像鸟儿一样的小个子医生帮忙破案，只有这个医生才能帮他的忙，因而他必须用信任来报答对方。

“你有理由感到奇怪，”他终于又继续往下说，他作了很大的努力，简直是在强制自己了。“我为什么多少年来一直住在旅馆里。因为我不愿面对这个世界。我要像一个熟练的老手那样地掌握世界，却不愿意和它一起受苦。我要在它面前保持无动于衷，不失去理智，像一个科学家那样的冷静。因此，我能够面对那具孩子的尸体，可是在她的父母亲面前，我却忽然受不了了；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想从那幢可怕的房屋面前逃走，从痛苦的双亲面前逃走。因此我对他们许下了一个诺言，而这个诺言我又无法兑现，因为我马上要坐飞机去约旦了。——当时，为了不看到他们受苦，要我答应什么都成。这以后，我又让那种习以为常的冷漠控制了我，洛赫尔。可怕的就是这一点。我没有为保护那个小贩而斗争。我听之任之，让事态自然发展。我退缩到我出名的那种无人性里去。‘死心眼的马泰依’，这是那些躲在背后说我的人对我的称呼。我一躲了之，潜回到平静、超然、冷淡、没有人情味里去，我一直用这些做铠甲来保护自己，直到我在飞机场上看见那些孩子们为止。”

大夫把笔记本推到一边去。

“于是我转身又回来了，”马泰依说，“其他的事你都知道了。”

“现在又怎么样呢？”大夫问道。

“现在我来到这里。因为我不相信小贩有罪。我要遵守诺言。我要找到谋杀葛丽特利·莫赛尔的那个人。”

大夫站起身子，走到窗子前面。

一个男护士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

“你们可以回到病房去了，”大夫说，“我这里不再需要你们了。”

马泰依又给自己斟了一杯科涅克酒，他笑着说：“真好，这种雷米·马丁牌的酒。”

大夫仍然站在窗前，望着外面。

“我又怎么能帮你的忙呢？”他无可奈何地问道，“我不是一个犯罪学家。”他转过身来面对马泰依。“你为什么这么坚决地相信凶手不是那个小贩？”

“你看看这个。”

马泰依拿出一张纸，小心翼翼地摊开来。那是一张儿童画。右下角是字体稚拙的署名：“葛丽特利·莫赛尔”。这是一张彩色铅笔画，画的是一个男人。他很高，比周围的杉树还要高，那些杉树画得像一种稀奇古怪的草。这张画完全是儿童的笔法——点、点、撇、捺、圆圈，那张脸就算画好了。这人戴了一顶黑帽子，穿的是黑衣服，他伸出了右手，右手就是一个圆盘形的圆圈，上面有五根线，从手上落下来一些小圆圈，上面画了许多像是星星的光芒似的茸毛。小圆圈向一个矮小的女孩身上落下去，这个女孩比杉树还要小得多。画的顶端，在应该是天空的地方，停靠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旁边是一只长着古怪犄角的奇异的动物。

“这张画是葛丽特利·莫赛尔画的，”马泰依解释道，“是我从教室里拿来的。”

“你认为这说明什么呢？”大夫问，迷惑不解地瞧着这张画。

“刺猬巨人。”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葛丽特利说过树林里有一个巨人给她小刺猬，后来她就画了这样的图画，”马泰依解释说，指着那些小圆圈。

“那么你认为……”

“刺猬巨人很可能就是那个凶手，”马泰依说，“葛丽特利很可能给她的凶手画了一幅画像。”

“真是胡说八道，马泰依，”大夫愤怒地反对说，“这张画纯粹是想象的产物。快别从这里引伸出什么结论来吧。”

“也许是吧，”马泰依回答，“从另外一方面说，这辆汽车画得挺准确的。我看这像是一辆旧型号的美国汽车。巨人的画像也是活龙活现的。”

“巨人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大夫不耐烦地厉声说道，“对不起，请别给我说这些童话了。”

“一个高大、笨重的男人在小女孩眼中很可能就和一个巨人差不多。”

大夫惊奇地看着马泰依。

“你认为凶手是个高大的人！”

“当然啰，这只不过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探长闪烁其词地说道，“如

果我的假设是对的话，那个凶手的确是开了一辆黑色的老式美国汽车来的。”

洛赫尔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他拿起了画，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

“你为什么把这张画拿来给我看？”他拿不定主意地问道。

“假定说，对凶手能掌握的仅有的线索就是这张画，”马泰依解释道，“那么，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抓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可是我就像一个外行对着一张X光照片一样，我看不懂它。我需要你来帮我解释。”

大夫摇了摇头。

“像这样的一张儿童画是不会向你透露凶手的情况的，”他答道，一面把画重新往桌子上面一放。“这顶多能说明作这张画的小姑娘的一些情况。葛丽特利肯定是一个聪明的、机灵的、性格愉快的孩子。孩子们不仅仅画他们所看到的景象，而且也把这景象在他们头脑里引起的感觉也画进去。幻想和现实掺和在一起。因此，这张画里有真实的东西：高大的人、汽车和小姑娘。别的东西看来是一些符号，像那些刺猬啦，长着犄角的动物啦。纯粹是谜。不幸的是葛丽特利把答案都带到坟墓里去了。我是个医生，不是一个会召唤鬼神的巫师。把这张画收走吧！再在这上面动脑子就荒唐可笑啦。”

“这仅仅是你缺乏勇气。”

“我讨厌纯粹是浪费时间的事。”

“你所说的浪费时间也许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传统的、经过考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呢，”马泰依声称道，“你是个科学家，知道什么叫暂定的假设。请考虑一下我的假设，顺着这张画去追捕凶手，也就是这种传统的方法之一呢。你先按我的思路来考虑考虑，我们再来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

洛赫尔细细地打量了探长好一会儿，然后再次看那幅画。

“那个小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长相？”最后，他终于问道。

“一点也不起眼。”

“聪明吗？”

“不算笨，但是不爱动脑子。”

“他是不是曾经因性犯罪被判过刑？”

“他诱奸过一个十四岁的少女。”

“和别的妇女的关系怎么样？”

“嗯……是的……作为一个小贩，他在这一带乡下是声名狼藉的，”马泰依回答道。

洛赫尔开始活跃起来。显然，这个案件激起了他职业上的好奇心。

“这位唐璜竟认了罪，还吊死了自己，这真是可惜，”他说，“否则的话我不会把他仅仅看作是一个性虐狂的。不过，让我们根据你的假设来作些考虑吧。从外表上看，把画里的刺猬巨人说成因为性虐狂而杀人是可以说得通的。他显得高大、魁伟。对儿童犯这种罪的人往往都是简单的、多少有些低能的人，是白痴和性反常者，正如我们医生所临床观察到的，他们身强力壮，喜欢用蛮，同时却性无能，在异性面前有一种自卑心理。”

他停住了话头，仿佛发现了什么问题。

“真怪呀。”他说。

“什么事？”

“作画的日期。”

“怎么啦？”

“作画在谋杀前一个多星期。葛丽特利以前一定见到过谋杀她的那个

人，马泰依，如果你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话。奇怪的是，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把这样的会见用童话的方式予以表现呢？”

“这是儿童的表现方式。”

洛赫尔摇了摇头。“儿童不论做什么事，也都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说，“这可能说明，那个黑黑的大个子男人不许葛丽特利泄露一点点这次神秘的会见的事。可怜的小姑娘服从了，不把事实讲出来，而用童话的方式来表达，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人感到可疑，她的性命也会保住了。你瞧，按照你的假设，整个事件就到了一个残忍的转折点……这个的小姑娘有没有真正被强奸？”他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没有，”马泰依答道。

“残杀的方式是与圣高尔和施维茨那两个地方发生的案件一模一样的吗？”

“完全是一样的。”

“也是用剃刀？”

“是的。”

这时候，大夫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科涅克酒。

“这么说，称之为性谋害就不完全合适了，”他评论道，“应该说这是一次报复。罪犯之所以犯下这些罪行，他的意图是报复女人施加给他的怨仇，不管犯这个罪的是那个小贩呢，还是你想象之中的刺猬巨人。”

“可是小姑娘又不是女人。”

洛赫尔不予理睬继续说下去：“可是对于一个病态的人来说，小姑娘是可以当作一个女人的替身的。这个谋杀者不敢袭击妇女，他就去残害小姑娘。他杀死她们来代替他心目中的那个特定的女人。也正因如此，他寻找的总是同一种类型的小姑娘。我还敢打赌，所有他的牺牲者都是有点相象的。别忘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原始的人。他的低能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形成的，这不重要；这样的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的。他们身上反抗这种冲动的力量是小得异乎寻常的；只要新陈代谢有一点不正常，细胞有一点点退化，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变成一只野兽。”

“他这样报复，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大夫思索了片刻。“可能是性冲突，”他解释道，“也许这个人受到过一个女人的压迫或利用，也许他的妻子很富有，而他却很穷，也许她的社会地位比他高。”

“这些情况对于小贩都不合适，”马泰依评论道。

大夫耸了耸肩膀。

“那么也许有别的情况对他适用。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什么怪事都是会发生的。”

“假设杀人犯不是那个小贩，那么会不会存在继续出现谋杀案的危险呢？”马泰依问。

“圣高尔州那次谋杀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五年以前。”

“施维茨州那次呢？”

“两年以前。”

“你瞧，间隔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大夫指出道，“这可能说明病状加重了。对这样的冲动的抵抗力越来越弱，这个病人可能几个月之内就要再

次杀人，如果有机会，甚至是几个星期之内。”

“在谋杀的间歇期内他的行为是怎样的呢？”

“一开始，他会感到轻松，”大夫有点迟疑不决地表示说，“可是很快，新的仇恨的情绪会逐渐增长，一种新的复仇的欲望想要得到发泄。起先，他仅仅是在有孩子的地方徘徊。在学校门口，比方说，或是公共广场上。接着他会开着汽车兜来兜去，找一个新的对象；等他找到一个小姑娘之后他就会和她交起朋友来，就像以前一样，到头来你就会见到另一次谋杀案了。”

洛赫尔陷入了沉默。

马泰依拿起那张画，把它叠起来，塞进胸前的口袋。他凝视着窗外。外面已经是黑夜了。

“祝我在搜寻刺猬巨人时交好运吧，洛赫尔，”他说。

有好一阵子，大夫目瞪口呆地瞧着他，终于明白过来了。“这么说，对你来说，刺猬巨人不仅仅是一个暂定的假设啦，是不是啊，马泰依？”

“对我来说他是极其真实的。”马泰依承认。“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存在。”

可是他自己刚才谈的一切只不过是猜测呀，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想，完全没有科学的事实根据，大夫喊道，他感到非常恼火，因为自己上当受骗了，没有看出马泰依的用意。他仅仅是指出了千百种不同的可能性之中的一种。用同样的方法，你可以判断你所怀疑的任何一个人是凶手。为什么不可以呢？——不管怎么说，任何一种狂想都是有理由相信的，也是多多少少在逻辑上说得通的。对这一点马泰依知道得很清楚。他，洛赫尔只不过在讨论马泰依的假设时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而已。可是马泰依应该勇于面对现实，放弃自己的假设，也应该有勇气接受明明白白证实小贩有罪的因素。那个小姑娘的画也很可能纯粹是她的想象的产物，也可能画的是她和另一个人的会见，那人却并不是凶手，也根本不可能是那个凶手。

“请让我来冷静地判断你的推论有几分是可靠的吧，好不好？”马泰依回答说，一面把他杯子里的科涅克酒一饮而尽。

大夫没有马上回答，又重新坐回到他那张破旧的写字桌后的位子上去了，周围堆满了书籍和卷宗。他重新又是一家凋敝、没有生气的医院的院长了。他缺少经费、人员和最最必须的设备，为了使这架老牛破车继续走下去耗尽了自己的精力。“马泰依，”最后他终于说道，声音既疲乏又悲痛。“你想做的事是不可能做到的。我现在不想搞什么感伤主义。一个男人总是有他的意志、他的雄心、他的自尊心的，总是不愿把它们丧失掉的。这我也理解，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很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凶手，你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困难的处境之中，这样一个凶手即使真有其人，你也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仅仅因为偶然的原因才没有犯谋杀罪。你装疯卖傻，想以此找到一条线索，这也许是够勇敢的。我很愿意向你的勇敢致敬——极端主义者的态度如今很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可是，如果这个方法最后并不奏效，我怕到头来你的假疯就要变成真疯了。”

“再见吧，洛赫尔大夫，”马泰依说，“谢谢你了。”

洛赫尔把这一次的谈话向我作了汇报。同往常一样，他那手纤秀的德文字，像蛛丝般细巧，仿佛蚀刻出来似的，很难以辨认。我派人把汉齐叫来，他也费了一番功夫才看完信。他评论道：大夫自己也是从站不住脚的假设出发的。我倒不敢这样肯定。我认为他是作了大胆的设想之后又害怕了。他现在想出了反面的论证，这是他以前没想到过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并不掌握小贩的详细交待，没拿到什么可以核实的材料，他仅仅笼统承认是他犯的案。况且，凶器也没有找到。小贩篮子里的剃刀没有一把是有血迹的。这件事也使我感到可疑。虽然，单是这件事并不能在冯·龚登死后证明他无罪；他有嫌疑的许多因素依然存在。不过我还是感到不安。再说，马泰依的行动给我的思想带来的震动超过了我所承认的。我又下令把梅根村附近的树林再搜查一遍，这使检察官老大不高兴；可是我们还是什么成果也没有。凶器没有能找到。汉齐认为，显然是被扔在峡谷底下了。

“哼，”汉齐说，一面从烟盒里拿出一支他那种令人讨厌的喷了香水的烟卷，“这个案子我们是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不是马泰依疯了，就是我们疯了。我们现在就得就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判断。”

我指指我让人搜集来的照片。三个被杀害的小姑娘的模样明显地极为相似。

“这些照片对刺猬巨人的设想又是一个支持。”我说。

“不见得。”汉齐冷酷地说道，“这几个小姑娘正好是小贩想找的那种类型。”接着他笑了。“我真不知道马泰依想干什么。我真不愿意处在他的地位。”

“别贬低他，”我不高兴地嘟哝道，“他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甚至能找到根本不存在的凶手，是吗？局长。”

“也许是吧，”我说，把三张照片放回到卷宗里去。

“我只知道一件事——马泰依是不会放弃的。”我又补充一句说。

我这话算是说对了。第一个消息是市警察局长告诉我的，那是在一次会议散会后。我们之间又有一件权力互相交叉的事要解决。这家伙即将离去时把话题转到马泰依身上来，我琢磨，完全是为了要刺激我。他说人们常看到马泰依在动物园里走来走去，又说马泰依从艾希尔—吴兹广场的一家汽车行里买了一辆旧汽车。过不了几天我又收到另一个消息，它使我目瞪口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在皇冠餐厅。大厅里挤满了人——苏黎世每一个有点身分，而且又有口腹之好的人照例都在那里。殷勤的女招待穿梭来往不停；手推车上冒着热气；从外面街上传来各种车辆的嗡营声。我照旧坐在米罗那幅画的下面，一边喝肝泥丸子汤，一边大有与世无争的感觉，直至一家规模很大的燃料公司的商业代理人走到我跟前来。他二话不说就在我桌旁坐了下来。这个商人已经有点醺醺然，兴致正高，他要了一杯马克酒，嘻嘻哈哈地告诉我，我以前手下的那位中尉改行了。他说马泰依在库尔附近的格劳宾登盘进了一个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因为无利可图，公司正想把它关闭。

起先我不相信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未免太荒唐，简直是野狐禅。

可是那个商人坚持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夸赞马泰依说，这位前探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得跟以前一样出色。加油站正在兴旺起来。马泰依主顾不

少——绝大部分都是以前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只不过打交道的内容不同而已。这个故事准是传了开去，说“死心眼的马泰依”晋升为加油站的管理员了，其结果就是那些“老熟人”纷纷按着喇叭、开着各式各样的车子，从早已过时的老爷汽车直到最昂贵的梅尔西德斯新车，上他的加油站来。马泰依的加油站成了整个东瑞土地下黑社会朝圣的麦加。汽油出售量直线上升；事实上公司还为他新安了一台高级油泵。他们还提出要把老房子拆了，盖一间现代化的建筑给他居住，可是马泰依谢绝了，他也不同意多用一名助手。有时汽车和摩托车排成了长龙，可是并没有人不耐烦。显然，受到州警察局的下台中尉的伺候是一种很大的光荣。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个商业代理人径自走了。等热气腾腾的手推车来到我跟前，我已经毫无胃口。我挑了一点点吃食，又要了啤酒。过后不久，汉齐照例来了，带着他那位时髦太太。他情绪不高，因为这次公民投票不合他的意。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看法是马泰依真的疯了，像他多次断言的那样。他突然又胃口大好，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两块牛排，而他那个闺阁名媛的太太却只是没完没了地叙述着剧场琐事——她认识那里的好几个演员。

几天以后，我正在开会，当然又是参加市警察局的联席会议。会开到一半，电话铃响了，是孤儿院的女院长打来的。老小姐激动万分地告诉我，马泰依去拜访过她了，穿一身整齐的黑衣服——显然是要给人一个严肃的印象——他问能不能从她保护下的女童中（他这样称呼她们）挑选某个女孩子来收作养女。他想要自己挑选一个女孩，其实他早就想领一个养女了，眼下他在格劳宾登管理加油站，有条件这样做了。女院长自然是拒绝了他，有礼貌地提到孤儿院的章程。可是我那位前部下给她留下了一个奇异的印象，使她认为有必要向我报告。说完她就挂上了电话。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发展。我使劲抽我的巴西阿诺斯雪茄烟，一口口地喷出烟来，苦思苦想，要猜透这个谜。

可是，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束缚住了我们卡塞尔纳街总部的人的手脚，而且使我相信，马泰依的行为已经不纯粹是一件让我们感到发窘的事了。我们那时正在处理一个极端可疑的人的问题。他公开的身分是美容师，实际上是个拉皮条的，他在文人聚居的郊外湖滨区有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不管怎么说，他门口的出租汽车和私人汽车是整天不断的。我还没有开始审问，他就提供了一个情况。他得意洋洋地向我们叙述了关于马泰依的消息，一副炫耀的样子。他说马泰依如今在他的加油站跟一个卖过淫的女人同居了，一个名叫海勒的女人。我立即打电话给库尔的警察局，请他们给我接马泰依的加油站所在地的警察站。这事果然是真的，我气得哑口无言。那个美容师趾高气扬地斜靠在我桌前的一把椅子上，一面嚼着口香糖。我认输了，下令让这个拉皮条的滚蛋。他出的牌把我们全镇下去了。

这件事真让人震惊。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汉齐勃然大怒。检察官觉得恶心，而联邦议员也听说了这件事，他提到在公众面前丢丑的问题。海勒以前也当过我们警察局的主顾。她的一个密友——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被谋杀了；我们怀疑海勒知道的内情比她愿意告诉我们的要多。我们干脆把她从苏黎世州驱逐出去，虽然除了她所操的行业之外，我们并不掌握什么真正的罪证。不过官衙里总是有人只按自己的好恶办事的。

我决定出来干预，我要亲自去看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朦朦胧胧地感

觉到，马泰依的古怪行径与葛丽特利·莫赛尔有关，但是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并不明白。我的蒙昧无知使我生气，使我不安。而且，我应该承认，对案件的好奇心也在推动着我。作为一个侦探，我渴望知道事情究竟怎样了。

## 二十四

我独自驾车出发了。这又是一个星期天。回想起来，这个案子的许多关键事件都发生在星期天。到处都在响着教堂的钟声，似乎整个国家都在嗡嗡鸣响。途中，我在施维茨州的某处遇到了一支游行队伍。在大路上，是一辆汽车紧接着另一辆汽车，在收音机里，是一次布道紧接着另一次布道。小晌午时，在每一个村子附近的打靶场里，都是枪声大作，劈劈啪啪，砰砰嘭嘭，哧溜哧溜地响个没完。到处都毫无意义地又吵又闹，没有一块安静土。整个东瑞士似乎都在动乱之中。不知哪个地方在举行车赛，西瑞士的汽车也源源不绝地涌来凑热闹。一家子一家子人，一大帮一大帮人，都坐了汽车出来兜风，等我终于来到那个加油站——就是你方才见到的那个——我已经给这种天晓得地喧哗闹得筋疲力尽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加油站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这样荒凉破败，看起来挺讨人喜欢的，一切都干干净净，窗台上还放着天竺葵。住房也还没有变成小酒店，有一种正派的小市民的气氛。我还注意到，所有的地方，一直延伸到门前的大路上，都有迹象说明这儿住着一个儿童。门前有一个秋千架，板凳上有一所洋娃娃的房子，地上有一辆儿童汽车，还有一匹木马。马泰依刚接待过一位顾客，我跨出我的奥佩尔车时，那人正好发动他的大众汽车急急开走。马泰依身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手里抱着一只洋娃娃。小姑娘梳两条金黄色的发辫，穿着一条红裙子。我只觉得那孩子有点面熟，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一点也不像那个叫海勒的妇女。

“那不是‘红脸梅依尔’吗？”我说，指了指刚开走的大众汽车。“他出狱刚刚才一年。”

“加油吗？”马泰依冷漠地问道。他穿了一条修车工人的蓝布套裤。

“要高级汽油。”

马泰依把油箱加满，又擦亮了前窗玻璃。

“十四个半法郎。”

我给了他十五法郎。“找头留着吧，”当他打算找零钱时我说道，但是我立刻就涨红了脸。“请你原谅，马泰依，我这句话是脱口而出的。”

“没关系，”他回答道，一面把钱放进兜里去。“我也惯了。”

我还是感到很窘，便低下头去再看看那个小姑娘。

“怪可爱的小姑娘，”我说。

马泰依替我打开车门。“祝你一路愉快。”

“得了，”我不高兴地嘟哝道，“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谈一谈。该死的，马泰依，你这种种做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答应过不再拿葛丽特利·莫赛尔案件的事去麻烦你的，局长。我们公平交易，也请你别来干涉我。”他回答道，一面把身子转了过去。

“马泰依，”我说，“我们别闹孩子脾气了。”

他没有回答。一片爆裂声、轰鸣声和呼啸声响了起来，显然左近什么地方也有一个打靶场。时间已将近十一点了。他在照料一辆阿尔法·罗米欧时，我观察着他。

“这个人坐过三年监狱。”那辆汽车开走后，我说道，“我们能不能进去谈谈？这些枪声真烦人。我从来就受不了射击训练。”

他带我进屋去。在门厅里我们遇到了海勒，她正取了土豆从地窖里上来。

她仍然很漂亮，作为一个警官，我感到挺不好意思——有点负疚感。她怀疑地瞧着我们，一时之间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很友好地跟我打了招呼，总的说来，她留给我一个颇为不错的印象。

“孩子是她的？”海勒走进厨房后，我问道。

马泰依点了点头。

“你倒是从哪儿把海勒找出来的？”我问。

“就在附近。她那时在一家砖瓦厂里干活。”

“你为什么让她住在这儿？”

“嗯，”马泰依回答道，“不管怎么说，我需要有个人帮我管家。”

我摇摇头。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我说。

“安妮玛丽，到厨房里去。”马泰依命令那个孩子。

小姑娘走出去了。

房间里没什么布置，但是很干净。我们在靠窗口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外面，射手们在放枪，一阵齐放，接着又是一阵齐放。

“马泰依，”我又问他，“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非常简单，局长，”我的老部下回答说，“我是在钓鱼。”

“你这是什么意思？”

“侦查工作嘛，局长。”

我烦躁不安地点燃了一支雪茄烟。“我不是一个生手，不过我真的不明白。”

“给我一支烟。”

“请抽吧，”我把雪茄烟盒递给他。

马泰依拿来一瓶樱桃酒放在桌上。我们坐在阳光里。窗子半开着，室外，六月的和风吹拂着牻牛儿花，还有那不断的射击声。已近中午时分，汽车来得少了，偶尔驶来一辆就由海勒去照料。

“我猜洛赫尔准是把我跟他谈话的纪要送了一份给你吧？”马泰依细心地点燃了雪茄烟后跟我说道。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弄不清楚。”

“可是我很清楚。”

“怎么清楚法？”我问。

“孩子的那幅画道出了真实的情况。”

“是吗？那你说那些刺猬代表什么？”

“这我还不清楚，”马泰依回答道，“不过我已经琢磨出那只有奇异犄角的动物是什么了。”

“是什么呢？”

“是一头野山羊，”马泰依从容地说。他吸了一口雪茄，使劲地把烟喷在房间里。

“你去动物园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在那里花了好几天工夫，”他答道，“还让孩子们给我画了野山羊。他们画出来的都跟葛丽特利图画里的那头动物一个样儿。”

我有点明白了。“野山羊，也就是本地人所说的 Steinbock，这是格劳宾登的州徽，”我说，“是这个地区的象征。”

马泰依点点头。“汽车牌照上的州徽引起了葛丽特利的注意，因此她画

了一头野山羊。”答案竟是如此的简单。

“我们本应立刻就想到这一点的，”我喃喃地说。

马泰依专心谛视着他的雪茄烟，看着那袅袅上升的青烟，那越来越长的烟灰。

他轻声轻气地说：“我们：你、汉齐和我，所犯的错误就是以为杀人者是以苏黎世作为中心出外作案的。其实他是从格劳宾登来的。我查了一下别的案件发生的地点，它们都处在格劳宾登到苏黎世的路上。”

我细细想了一想全部事实。

“马泰依，这里面可能是有点道理的。”我最后不得不承认说。

“情况还不仅仅如此呢，”他告诉我。

“还有什么？”

“我遇到过几个钓鱼的青年。”

“钓鱼的青年？”

“嗯，说得精确些，是几个钓鱼的男孩。”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明白吗？”他解释道，“我发现了野山羊的原委后，便马上开车到格劳宾登去。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可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样做是很蠢的。格劳宾登州那么大，你对凶手除了他个子很高，开的是一辆黑色的美国旧汽车之外，在其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要能找到他，那真比登天还难。格劳宾登面积是七千平方英里，人口有十三万人，散居在无数小山谷里。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有一天，天气寒冷，我来到恩加丁的英恩河畔，一筹莫展地看着一些男孩在河边玩。我正要转身走开，看到孩子们注意到我。他们似乎有点害怕，颇为紧张地站在那儿。其中的一个拿着一根他自己做的钓鱼竿。‘你们继续钓鱼吧。’我说。孩子们不信任地看着我。‘你是警察局的吗？’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红头发、有雀斑的男孩走上前来问我。‘我模样像吗？’我回答道。‘嗯，我说不上来。’他说。‘我不是警察局的。’我向他解释道。

“接着我看他们把鱼钩甩到河里去。他们一共是五个，都在专心致志地钓鱼。过了一会儿，那个有雀斑的小孩心灰意懒地说：‘它们今天不咬钩。’他爬上河岸向我这儿走来。‘你有香烟吗？’他问。‘我想抽一支！’我说，‘你这么小就抽烟。’‘不过你看上去像是会给我烟抽的人，’那孩子说。‘那我看来只好给你一支啰，’我回答道，便把我那包巴黎女人牌香烟递给他。‘谢谢，’他说，‘火柴我有。’他让烟从鼻孔里喷出来。‘逢到钓鱼白干一场的时候，抽一支烟会让自己觉得好过一些。’他装模作样地说。‘哼，’我说，‘你那些朋友好像耐心比你好好嘛。他们坚持下去，马上就会钓到点什么的。’‘不，他们钓不着的，’男孩说，‘顶多钓到条茴鱼。’‘我琢磨你是想钓到条梭子鱼吧，’我逗他。‘梭子鱼我没有兴趣，’男孩回答道，‘斑鱒鱼才是好东西，不过这得花钱哪。’‘干吗要花钱？’我问。我自己小时候也常到水里去摸鱒鱼。他轻蔑地摇摇头，这都是小毛孩干的事。‘不过你用手去逮过老鱒鱼吗？鱒鱼比梭子鱼强多了，也难钓得多，’男孩说，‘可是钓鱒鱼得要有执照，这得花钱捐呀。’‘哦，原来你没有执照就钓鱼啊，’我笑着说。‘就因为没执照，’那孩子解释道，‘咱们不能上好地方去钓嘛。有执照的人才能上那儿去。’

“‘你说的好地方是什么意思？’我问。‘我看你这人对钓鱼是一窍不

通啊，’孩子评论道。‘我看也是这么回事，’我回答说。我们两人走到河边在堤岸上坐了下来。‘你以为一个人只消把鱼钩往随便哪儿的水里一甩就行了吗？’他说。我有点不明白，便问他这有什么不对头。‘道道地地的外行话，’那雀斑脸说，又从鼻孔里喷出来两股烟，‘要说到钓鱼嘛，你首先得要明白两件事：一是地点，二是钓饵。’我用心地听着他的话。‘比方说吧，’那男孩往下说道，‘你想钓一条斑鲮鱼，一条长足了的老鲮鱼，你得先想想这条鱼喜欢呆在什么地方。自然是一处不受急流冲击的地方，同时又是在急流的附近，这样就会有許多它捕食的小鱼游过。这就是说在下流一块大石头的后面，或者是在桥墩后面，这地方就更棒了。问题在于这样的好地方总是给有执照的钓鱼人占据着。’‘我懂了，必须是在急流给阻住的地方。’我说。‘你总算明白了。’他神气活现地点了点头。‘鱼饵的事又有什么讲究呢？’我问。‘那就要看你想钓的是吃荤的鱼呢，还是像茴鱼、江鳕这些吃素的鱼了。’他答道，‘比方说，钓江鳕得用樱桃。可是像鲮鱼或江鲈这样的吃荤的鱼，你就得用活物来钓。用虫子、蚯蚓或是小鱼儿。’

“‘得用活物。’我沉思地重复着他的话，站起身来。‘拿去，’我说，把剩下的香烟都给了他。‘这是你赚的。我现在明白该怎样钓我的鱼了。首先得找准地方，然后把钓饵准备好。’”

马泰依陷入了沉默，我好久好久也没说话，只是喝着樱桃酒，望着窗外可爱的夏日野景，外面，枪声仍在劈劈啪啪地响着。我重新点燃了我那支业已熄灭的雪茄烟。

“马泰依，”我终于开口了，“现在我明白你说你在钓鱼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加油站是个理想的地方，这条公路就相当于一条河流，是这个意思吗？”

“任何人想从格劳宾登到苏黎世去非走这条路不可，除非他绕大弯去翻越阿尔卑斯山口。”马泰依安静地说。

“那个小姑娘是你的钓饵啰。”我说，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她的名字是安妮玛丽。”马泰依说。

“我现在知道她让我想起谁了，”我肯定说，“那个被杀害的孩子，葛丽特利·莫赛尔。”

我们两人又都陷入了沉思。外面变得更暖和了；山岭在升腾的雾气下闪烁，枪声依旧像炒豆子似的一阵阵爆响。很显然，附近在举行一次射击的盛会。“你这个计划是不是有点铤而走险呢？”沉默了许久之后，我犹豫地问道。

“也许，”他顶了我一句。

“你想等在这儿，直到那个凶手经过此地，见到安妮玛丽，落进你为他设下的陷阱？”

“凶手是一定要经过这儿的。”他答道。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下。“好，”我最后说，“让我们假设你是对的。假设这个凶手的确是存在的，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一行里，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不过，你不认为你的计划太冒险吗？”

“没有别的办法。”他说，把雪茄烟头扔出窗外。“凶手的情况我一点不了解。我不能主动去搜索他。因此我只能为他准备好另一个对象，一个小姑娘，用她来作钓饵。”

“很好，”我说，“可是你这套办法是从钓鱼术那里学来的。不幸的是，这两者不是完全相当的。一个孩子不能像钓饵似的一直就放在路边。不管怎

么说，她得去上学，也有的时候她不愿呆在你那条该死的路上。”

“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马泰依执拗地说。

我摇了摇头。

“我怕你未免有点一厢情愿了，”我说，“你不能就此坐在这里，等某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就算这个凶手会从这儿经过，这也不等于说他一定会来咬你的饵——就用你那个可怕的说法来打比方吧。这样的话你就会一直等，一直等……”

“一个钓鱼的人也是必须等待的。”马泰依固执地说。

我朝窗外瞥了一眼，看见海勒在为奥勃荷尔泽尔的汽车加油。把那些短期的关押全都算上的话，此人总共坐了六年牢。

“海勒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马泰依？”我问。

“不知道，”他答道，“我只告诉她我需要一个人给我管家。”

我心里有点不安。无疑，这个人确实使我感动，他那个不寻常的方法里也是有其精彩之处的。我发现自己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并且希望他能成功，虽然我的动机也许只是要让那个令人讨厌的汉齐丢脸。可是我又的确觉得他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冒的险太大，而获胜的机会又太小。

“马泰依，”我再一次想让他变得理智些，“你还来得及接受约旦的那个职位。再耽误下去，伯尔尼就要派沙弗洛斯去了。”

“让他们派他去好了。”

我还是不死心。“你愿不愿回来跟我们一起干？”

“不愿意。”

“我们暂时让你在总部内部工作，还是原来的薪水待遇。”

“我不去。”

“也可以让你转到市警察局去。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即使光是从经济角度出发。”

“我当加油站老板挣的钱也跟给政府办事挣的差不多，甚至还要多一些呢，”马泰依回答说，“那边又来了一个顾客，海勒太太也该准备午饭了。”

他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因为接着又有一个主顾开着车过来。那是美男子列奥。马泰依伺候完他时，我已钻进了我的汽车。

“马泰依，”我一面发动汽车，一面说道，“对你这人真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吧。”他回答，做了个手势表示前面的路可以走了。他身边站着那个穿红短裙的小姑娘，海勒系着围裙站在门口，再次向我投来一个充满怀疑的目光。我驱车转回苏黎世去了。

## 二十五

他就这样地等待着。执拗地、坚定地、热情地等待着。他伺候主顾，干他的活，老是重复这样的机械动作：加油、检查油量、给水箱加水、擦窗玻璃。那孩子放学回家就呆在他的身边，或是在洋娃娃屋子旁边。她到处又跳又跑，做着白日梦，自言自语，或是坐在秋千架上唱歌，辫子和红裙子在空中飞舞。他等了又等。汽车不断经过——各种颜色、各种牌子的汽车，有旧车也有新车。他等待着。他抄下了所有格劳宾登牌照的车号，从人名录里查清车主的名字，打电话给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打听他们的情况。海勒在村子附近山脚下的一家小工厂里干活，黄昏时分她翻过屋后的小山丘回来，提着食品袋和装满了面包的网兜。到了夜晚，常常能在屋子周围听到脚步声和轻轻的口哨声，可是她不开门。

夏天来到了，热得令人窒息，长得没有止境。空气在闪烁，常常闷热得下起倾盆大雨来。漫长的暑假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机会来到了。如今安妮玛丽老是呆在他的身边，也就是说呆在路上，每一个开车经过的人都可以看见她。他等了又等。他和那个小姑娘一起玩，给她讲童话，把全套格林童话，全套安徒生童话，还有《一千零一夜》都讲了，还讲了自己编出来的故事——总而言之，想尽办法让她留在自己身边，让她呆在路上可以给人看得见，呆在他需要她在的地方。那孩子听故事和童话听得入迷，就呆在他身边。开车的人看到这一老一小都感到惊讶，也有人颇为这幅天伦之乐图感动。他们送给小姑娘巧克力，和她聊天，而马泰依则站在一边窥伺着。这个高大、笨重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个凶手呢？他的汽车也是格劳宾登的牌照，还是这个高个儿的瘦子？这会儿他正弯下腰来跟小姑娘讲话。这个人是谁？迪森底斯一家糖果店的老板，马泰依早就查明了。要检查油量吗，先生？好的，先生。可以加一夸脱。二十三法郎十生丁。祝你一路愉快，先生。他等了又等。安妮玛丽爱他，喜欢和他呆在一起；而他脑子里只想到一件事：那个凶手。他生活中别的都不存在，除却一个信念：那个凶手一定会出现。除了这个希望，这个渴望，别的都不存在，只有这件事能使他满足。他想象着这个人到来时的情景，孔武有力，笨手笨脚，像儿童一样幼稚，既是柔情脉脉，又是杀气腾腾；想象他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加油站，和蔼可亲地笑着，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是个退休的铁路司机或是海关警卫；他又如何逐渐地把孩子诱走，而他自己，马泰依，则轻手轻脚地匍匐着跟这两个人到林子里去；到了关键时刻，他自己怎样跳出来，然后是一场血淋淋的、面对面的恶斗；决赛之后，终于是彻底的松弛，这时凶手躺在他前面，认了输，呜咽着坦白了。想到这里马泰依不得不再告诉自己，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看守这个孩子看得太明目昭彰了；他得给小姑娘更多的自由才能得到收获。这样考虑过之后他就让安妮玛丽离开大路随便上哪儿去，仅仅是偷偷地跟踪着她，根本不去管加油站，听任开车的人怒气冲冲地按响喇叭。在这样的时候，安妮玛丽就会一蹦一跳地到村子里去玩上半个来小时，和农民的孩子一起玩，或是在树林边上玩，不过总是一会儿又回到加油站来。她已经独自呆惯了，有点怕生。别的孩子也不太爱和她玩。

接着，马泰依又会再次改变做法，他会想出新的游戏，新的故事，重新吸引安妮玛丽呆在他身边。他等了又等，百折不挠，从不动摇。而且他也不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海勒早就注意到他对孩子的过分关怀了。她从来

没有相信过马泰依纯粹是出于善意才让自己来给他管家的。她觉察出他有某种隐藏的动机，可是她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有依有靠的，也许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此，因此她也不去多想了。没准她还怀着什么希望呢，谁知道一个可怜的女人会有什么想法呢！总之，过了一段时间，她把马泰依对她孩子的兴趣解释为真正的感情，虽然有时候，她那种根深蒂固的警惕，她那种习惯养成的惨痛的实际精神也会浮上脑海。

“马泰依先生，”有一回她说，“我知道这事我不该问，不过警察局长来是因为我的事吗？”

“噢，不是的。”马泰依答道，“他干吗要为你的事来？”

“村里的人都在议论咱们。”

“这有什么关系呢？”

“马泰依先生，”她又重新开始说，“你之所以呆在这里，是不是和安妮玛丽的什么事情有关系啊？”

“胡说八道，”他笑着说，“我只不过是喜欢这孩子罢了，海勒太太。”

“你对我和安妮玛丽挺好的，”她若有所思地答道，“我希望能知道为什么。”

不久，暑期结束了。秋天来临。乡野变成了一片红色与蓝色，景致都分外清晰，仿佛是在一面巨大的放大镜下似的。马泰依觉得一个绝好的机会溜过去了。可是他还是继续等待着，顽强地、专心致志地等待着。小姑娘走去上学，马泰依在中午和傍晚常常去接她，让她坐自己的汽车回家，他的计划一天比一天地显得没有意义，显得没有希望了。获胜的机会越来越淡薄了。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琢磨，那个凶手准是经常路过他的加油站——也许每天都经过，至少是一个星期一次；可是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仍然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仍然没有掌握任何一点线索，连一点点暗示和迹象都没有。什么都没见到，除了开车的人来来往往，偶尔和小姑娘闲扯几句，讲上几句无伤大雅的、没什么意思的、捉摸不定的话。他们之中谁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呢？也许他不会交好运，因为他过去的职务太出名了；这个排除不掉的因素倒是他一开始时没有计算在内的。

可是他仍然坚持下去，等待着，等待着。他不能再走回头路了，等下去是他唯一的出路，虽则这使他不耐烦，即使他好几次几乎想打点行李离去，逃走，到某个地方去，任何地方都行——甚至于是约旦。虽然他常常怕自己会神经失常，但他仍然坚持下来了。常常有好几小时，好几天，他会变得漠然无动于衷，心如死水，看穿一切，听任事情自己发展，他会坐在加油站门前的板凳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烧酒，呆呆地瞪视空中，烟蒂在他的脚旁积成一个小堆。然后他又再度振作精神。不过越来越多的是他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在痛苦的、荒唐的等待中半醒半睡地度过了许许多多天和许许多多星期。他不知所措，备受折磨，心灰意懒，然而还是满怀希望。直到有一天，那时他傻呆呆地坐着，胡子拉碴，满身是油渍，突然惊醒过来。他蓦地想到，安妮玛丽还没有从学校回来呢。他动身去接她，是走去的。在屋子背后，那条尘土飞扬、没有铺好的乡下土路稍稍有点往上斜，然后又逐渐下降，穿过一片枯干的田地，又进入一片林子，走到林子的边缘，可以看到村子，村子里许多老房子簇拥在一座教堂的周围，它们的烟囱里升起了袅袅的青烟。站在这里，安妮玛丽必然会经过的整条道路都可以收入眼底。可是并没有见到她的影子。马泰依回进树林，心中突然紧张起来。现在他完全清醒了。在矮

小的枫树和灌木林底下，地上覆盖着一层锈黄色、棕红色的树叶。一只啄木鸟在林木幽深处一下接一下地叩击，那儿，高大的枞树挡住了天空，阳光在树干间斜射下来。马泰依离开小路，拨开枝叶，在荆棘和矮树之间搜寻，树枝弹回来抽打着他的脸。他来到一片林中空地，惊愕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他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片空地。在树林的另一边有一条比较宽阔的小路穿过此处；无疑，村民们是走这条路来倒垃圾的，因为空地上有一个垃圾堆成的小山，下面散乱地扔着空罐头、锈铁丝和各种各样的废物——垃圾山下，是一条涓涓流过空地中心的小溪。这时，马泰依看见小姑娘了。她坐在闪着银光的小溪的岸边，她的洋娃娃和书包放在她身边的地上。

“安妮玛丽，”马泰依喊道。

“来了。”小姑娘回答，但是依然一动也不动。

马泰依小心地爬过垃圾小山丘来到孩子的身边。

“你在这儿干什么哪？”他问道。

“在等呢。”

“等谁啊？”

“等魔术师呢。”

小姑娘脑袋里装满了童话。有时候她等仙人，有时候又等魔术师。这简直像是对他的等待的一种讽刺。失望袭过他的全身，他明白了自己行动的徒劳无功，他气馁地知道他只好再等下去，因为除了等待、等待、再等待之外他已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走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他拉住小姑娘的手，和她一起穿过树林。接着他又在板凳上坐下来，瞪视着夜空。暮色降临了，接着是黑夜来到。他已经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他坐在那儿，抽烟，等待，再等待，顽固地、执拗地，有时候也轻轻地自言自语，在恳求他的敌人（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他一动不动，坐在乳白色的月光下，突然之间沉入了睡乡，拂晓时分又冻又僵地醒来，然后爬上床去。

可是第二天安妮玛丽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比往日稍稍早些。马泰依从板凳上站起来走过去接她，她则一蹦一跳地走来，书包甩在背后，一边独自轻轻唱着歌，一边轮流用一只脚跳着。洋娃娃提在手中，娃娃的小脚垂挂到地上。

“今天有作业要做吗？”马泰依问道。

安妮玛丽摇摇头，继续哼唱着“玛丽坐在石头上”。接着她进屋去了。他让她走了。他太没精打采，太心灰意懒，太打不起兴致来为她编造新的童话，并且用新的游戏来吸引她了。

可是海勒回家时却问道：“今天一天安妮玛丽乖不乖？”

“怎么，她上学去了。”马泰依答道。

海勒惊讶地瞧着他。“上学？她今天放假。老师开会去了，反正是有事。”

马泰依变活了。一个星期以来的失望立即烟消云散。他意识到他的希望，他的疯疯癫癫的期待终于接近实现了。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没向海勒问别的话。他也没去盘问那个女孩。可是第二天下午，他开车进入村子，把车子停在一条小路上。他要偷偷地观察那小姑娘。这时快四点钟了。窗子里传出来唱歌声，接着又是叫嚷声；小学生像发疯一样地从学校里冲出来，男孩子们吵架、扔石子，女孩子们互相勾着手臂。可是安妮玛丽不在里面。老师走了出来，表情很冷淡，她严厉地打量着马泰依。从这位女士那里他知道安妮玛丽没有上学；她前天下午也没有来，也没有请假，女教师问安妮玛

丽是不是病了。他向老师表示道歉，因为没有能更早些向她报告，说完便像个疯子似地急忙向树林驶去。他冲过树林来到空地，却什么也没找到。他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皮肤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回到车上，他驱车赶回加油站。他还没有到达，便看见小姑娘在马路边上一蹦一跳地走着。他停住车子。

“进来吧，安妮玛丽。”他和颜悦色地说，打开了车门。

马泰依伸出手去拉她，她爬进了车子。这时他吃了一惊。那小姑娘的手是粘糊糊的。他瞧了瞧自己的手，看见上面有巧克力的痕迹。

“谁给你巧克力啦？”他问道。

“一个女孩子。”安妮玛丽回答。

“学校里的吗？”

安妮玛丽点点头。马泰依没有吭声。他开车回家。安妮玛丽爬下车子，坐在油泵旁边的板凳上。马泰依装作没事似地观察着她。那孩子把什么东西放进嘴里，在咀嚼。他慢慢地走到她跟前。

“给我瞧瞧，”他说，轻轻地打开握紧的小手。在她掌心里是一个带刺的巧克力球，已经咬掉了一半，是人们叫酒心巧克力的那种。

“你还有吗？”马泰依问。

小姑娘摇摇头。

他把手伸到她裙子的口袋里去，拿出她的手绢，打了开来，里面还有两个巧克力球。

安妮玛丽一句话也不说。

马泰依也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全身涌起了一阵强烈的喜悦感。他挨着小姑娘，也在板凳上坐了下来。

“安妮玛丽。”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是颤抖的，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两个带刺的巧克力球。

“是那个魔术师给你的吗？”

小姑娘没有回答。

“是他不让你告诉别人你们俩的事吧？”马泰依问道。

还是没有回答。

“其实你是用不着保守秘密的，”马泰依和颜悦色地说，“他是一个好魔术师，你明天去看他好了。”

那小姑娘马上就变得满面春风，仿佛遇到了什么大喜事似的；她伸出了两只小胳膊，抱住马泰依，简直是喜不自胜。接着她奔跑着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刚到办公室，马泰依就把两个巧克力球往我桌上一放。他是那么激动，连招呼也没给我打。他穿的是他在城里工作时穿的衣服，不过没打领带，没刮胡子。我把雪茄烟盒往他面前一推。他拿起一支点燃了。

“这些巧克力是干什么的？”我问，给他弄糊涂了。

“刺猬。”马泰依回答。

我瞪着他，手里转动着巧克力小圆球。“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他解释道，“凶手给葛丽特利·莫赛尔巧克力球，她把她们说成是刺猬。那张儿童画的谜都破了。”

我笑了。“你怎么能证明就是这样的呢？”

“因为这事又发生在安妮玛丽身上了。”马泰依答道。接着他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我立即就相信了。我让人叫来汉齐、费勒和四个警察，给他们下达了指示，又通知了检察官。接着我们出发了。加油站阒寂无人，海勒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自己到工厂去上班了。

“海勒知道这些事吗？”我问。

马泰依摇了摇头。“她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到林中空地去，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我们分散开来。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马泰依回到他的加油站去，以免引起怀疑。那天凑巧是星期四，孩子们下午没有课。我忽然想到，葛丽特利·莫赛尔也是在星期四被害的。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天气又热又干燥；蜜蜂、马蜂和别的昆虫到处营营地哼叫着，鸟儿啾啾地啼啭着，从远处传来了斧子砍伐的回声。两点钟时，我们听到了林中教堂的钟声。这时，小姑娘出现了。她就在对面毫不费劲地穿过了灌木丛，蹦着跳着，带着洋娃娃跑到小溪边，坐下来凝视着树林。她很紧张，很专心。眼睛里闪着光，显然是在等什么。不过她看不见我们，我们都稳妥地躲在树林和灌木丛中呢。这时候马泰依悄悄地蹇回来了，斜靠在我附近的一棵树干上，和我一样。

“我想他半个小时以内就会来到。”他耳语道。

我点了点头。

一切都是安排得很周密的。我们严密地监视着林中小路与外面的公路会合的地方；我们甚至还带了无线电。我们全都配备有武器。那孩子坐在小溪边上，几乎一动不动，焦虑万分，忧心忡忡，很激动地在等待。她背后是那个垃圾堆，她一会儿晒在太阳光底下，一会儿笼罩在又高又黑的枞树的阴影下面。除了虫子的嗡嗡声和小鸟的啼鸣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倒是那个小姑娘过不了一阵就用她又尖又细的嗓音唱起“玛丽坐在石头上”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是重复那几句歌词。在她坐着的石头四周，生锈的罐子和铁丝散乱地堆成了小山。偶尔，会突然刮来一阵风，通过树林一直刮到林中空地，树叶飞舞起来，窸窣作响，然后又是完全寂静无声。我们等待着。除了这个秋天的中了魔法似的树林以及空地上这个红衣服小姑娘外，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等待着捕获凶手，伸张正义，偿还血债，严惩坏人。

半个小时早就过去——事实上已经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等了又等；现在我们自己也像等待了好多个星期好多个月的马泰依一样了。五点钟了，薄暮悄悄来临，然后是浓浓的暮色，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所有鲜亮的色彩都消失了。小姑娘匆匆地离去。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连汉齐也没说。

“我们明天还来，”我决定说，“我们就在库尔过夜，到斯丹因布克旅馆去住。”

就这样，我们星期五、星期六都在那里等待。严格地说，我是应该去取得格劳宾登警察局的支援的。可是这是我们的事。我不想去向别人作解释，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检察官就打电话给我，从愠怒到抗议到威胁，说这完全是胡闹，然后又勃然大怒，坚持要我们回去。我很坚定，拒绝离开，只同意放一名警察先回去。我们等了又等。我们已经不再操心那女孩，也不操心那个凶手；我们关心的仅仅是马泰依。这个人的观点是一定要得到证实的，他的看法是一定要证明是对的，否则的话，就一定会发生不幸。这是我们共同的感觉，包括汉齐在内，汉齐承认他现在也相信马泰依是对的。星期五夜晚，他坚定地说，这个神秘的杀人犯星期六一定会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了那无可辩驳的证据——刺猬，也亲眼见到了这样的事实：小女孩一次又一次地到这儿来，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同一个地方；她在等某一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就站在我们的隐藏处所，在树木和灌木丛后面，好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着那女孩，瞧着那些锈铁罐头，那些纠结的铁丝，那个垃圾堆，一面一声不响地抽着烟，彼此也不交谈，听着那没完没了的“玛丽坐在石头上”。到了星期天，我们的情况变得困难了。由于一连几天好天气，树林里突然之间来了许多远足的人。有一回还有个人指挥着一帮五花八门的人踏着步子边走边唱，他们吵吵嚷嚷，汗流满面，光穿着衬衣，排成一行行来到了林中空地。树林里响彻着“磨坊主就爱流浪，流浪”的歌声。幸亏我们并没有穿着制服蹲在树丛里。后来又来了一对情侣，他们也不管那女孩在场就不顾廉耻地干了起来。这些事情发生时，那女孩就那么坐着，苦苦地等待着，耐心之好令人不能理解。她已经等待了一连四个下午。我们也是等着等着。那三个警察已经带着无线电设备回到苏黎世去了。剩下的还有四个人：汉齐、费勒再加上马泰依和我。严格地说，我们无法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认真想一想，便会明白我们真正在等的只有三个下午。因为，正如汉齐所指出的，一到星期天，这儿总是人来人往，凶手是不敢露面的。因此我们星期一也等了一个下午。到星期二早上，汉齐也回到苏黎世去了。不管怎么说，卡塞尔纳街的总部总得有人看家呀。不过汉齐离开时他仍然相信我们是会逮住凶犯的。

我们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们潜伏在树丛里，每一个人都单独行动，因为现在我们人太少，形不成一个包围圈了。费勒藏在林中小路附近的一簇树丛后面，他躺在树荫里，在这秋天里的夏日般炎热中打盹，有一回他鼾声如雷，让风一直带到林中空地来了。这一天是星期三。马泰依的岗位是在林中空地对着加油站的那一边；我和他遥遥相对，呆在空地的另一边。我们就这样潜伏着等待，等待那凶手，那刺猬巨人。每逢听到一辆汽车经过大路，我们就惊醒一下，而那个女孩就呆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每天下午她都到空地上来，坐在小溪旁边唱“玛丽坐在石头上”，又执拗又傻，简直令人不能理解。我们开始鄙夷、憎厌起这个孩子来了。当然，有时候她也好

久不来；她抱着洋娃娃在村子附近转悠。可是她又不肯太靠近村子，因为她是在逃学。我们一点不费事就解决了逃学这个问题。我私下里跟老师谈了一次话，这就免去了学校的调查。我小心地把整个情况作了一点暗示，亮出了我的身分，这就取得了对方战战兢兢的同意。

那孩子常常在树林周围绕来绕去，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她。可是她迟早总是回到林中空地来，除了星期四，这一天真使我们失望，她竟总是呆在加油站的附近。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得希望星期五会有所进展。因此现在我得作出决定了。几天来马泰依连一个字也没说过。第二天那孩子又跳跳蹦蹦地出现时，他正在树干后面他的岗位上。小姑娘抱着洋娃娃，穿着红裙子，像几天前那样又在那地方坐了下来。天气仍然非常好，秋高气爽，到处是鲜艳的色彩，让人心情舒畅，让人在寂寞的冬天来临前心中像蜜一样甜。可是检察官连半个小时也不能容忍了。下午将近五点钟时他来了，和汉齐一起驾车来到。他的出现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来到我的面前，从一点钟起我就守在我的岗位上，把脚倒来换去休息。他走过来，瞪瞪那个女孩，气得满脸通红。“玛丽坐在石头上”，尖细的女孩声音飘了过来。只是我这时再也受不了这支歌了，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孩子了，再也不想看到那张豁了牙的难看的嘴，那两根细细的像耗子尾巴似的发辫，那条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红裙子。我这时候只觉得那小姑娘非常可恶、俗气、平庸、愚蠢。为了免得她再唱那支愚蠢无比的“玛丽坐在石头上”，我简直想掐死她，杀掉她，把她撕得粉碎。当时的情况简直要让人发疯。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又是老样子——痴痴呆呆，毫无意义，沉闷不堪——只是枯叶越积越多了，秋风越刮越大了，照射在臭垃圾堆上的日光颜色显得更黄了。这真叫人无法忍受，无法忍受啊——突然检察官大踏步地往前走——就像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似的大踏步往前走，穿过了矮树丛，一直走到那小姑娘的面前，也不顾自己的脚踝都已经埋在垃圾里了。看到他走上前去，我们也都从躲藏的地方跑了出来。这件事反正总要有个收场的时候，还不如马上收场为好。

“你到底在等谁？”检察官向小姑娘咆哮道。小姑娘坐在石头上，抱紧了洋娃娃，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你到底在等谁——回答我呀，听见没有，你这傻丫头！”

这时候我们已全都来到小姑娘身边，团团围拢她。她瞪着我们，充满了恐惧、惊怖和不能理解的神情。

“安妮玛丽，”我说了，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一个星期以前，有人给你巧克力。你记得吗，像刺猬那样的巧克力。是不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送给你那些巧克力的？”

小姑娘没有回答，她仅仅是瞧着我，眼眶里满是泪水。

这时马泰依在小姑娘的面前跪下来，抓住了她的小肩膀。“听我说，安妮玛丽，”他解释道，“你一定得告诉我是谁给你巧克力的。你一定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人是个什么模样。我以前认得一个小姑娘，”他恳切地说，因为现在是孤注一掷了。“那个小姑娘也穿你这样的一条红裙子，她拿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大个儿给她的巧克力，也就是你吃的那种带刺的小圆球。后来这个小姑娘跟大个儿到树林里去，大个儿用一把刀子杀死了小姑娘。”

他陷入了沉默。小姑娘还是不回答。她默不作声地瞪着他，眼睛睁得很大。

“安妮玛丽，”马泰依厉声叫道，“你一定得把事实告诉我。我只不过

想看到你平安无事呀。”

“你是在撒谎，”小姑娘轻声地说，“你是在撒谎。”

这时检察官再次发火了。“你这个蠢丫头，”他大吼道，抓住了孩子的胳膊拼命地摇晃她。“你快说你知道些什么，马上说！”我们大家也都对着她毫无意义地乱嚷，因为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控制；我们也都摇晃那小姑娘，并且开始打她，巴掌像下雨似地落在这个倒在罐头与红叶之间的垃圾堆上的小姑娘身上，我们野蛮地、狂怒地揍她，又是尖叫又是大吼。

小姑娘默默地躺着等我们的火头过去，她似乎躺了许久，其实顶多不过几秒钟。可是接着她突然厉声地尖叫起来，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不似人类，把我们都吓呆了。“你们胡说，胡说，胡说！”我们惊恐之下，放她走了；她的尖叫让我们清醒了过来，使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与羞耻。

“我们是畜生，真是畜生。”我气喘吁吁地说。这时候，那孩子正飞奔着穿过空地往树林边缘跑去。“你们胡说，胡说，胡说！”她又厉声叫嚷起来了，那声音是如此的可怕，我们都以为她已经疯了。可是她径直地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去了——因为，万分不幸的是，海勒太太正巧在这一瞬间出现在空地上。这下子就什么都齐全了。海勒已经打听到了一切，当她经过学校时，老师把什么都跟她说了；我不用问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那苦命的女人站在那儿，紧紧地把啜泣的孩子贴在自己身上，瞪着我们，那目光和小姑娘方才用来看我们的一模一样。更糟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她都认识——费勒、汉齐，还有那个检察官。这局势是既可笑又可悲。我们都窘态毕露，只觉得自己事情做得荒唐。这整件事就像是一出其糟无比的、演砸了的闹剧。“胡说，胡说，胡说！”小姑娘仍旧在不由自主地尖声叫嚷。“胡说，胡说，胡说！”这时，马泰依垂头丧气、不知所措地向娘儿俩面前走去。

“海勒太太，”他彬彬有礼地、实际上是卑躬屈节地说道——这样做其实也是很蠢的，因为现在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让这个案子一了百了，把它一笔勾销，再也不提了，永远也不去说它，把我们的怀疑和问题都永远埋葬，不管那个凶手是不是存在。“海勒太太，我发现有个陌生人送巧克力给安妮玛丽吃。我有理由怀疑这就是几个星期前把一个小孩诱进树林去杀死的那个人。”

他的话说得非常精确，用的是那样一本正经的官腔，我几乎要忍俊不禁了。那个女人很平静，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接着她开口了，也和马泰依一样彬彬有礼，一样打着官腔。“马泰依先生，”她轻声说，“你收留安妮玛丽和我是不是仅仅为了要找到这个人呢？”

“我没有别的办法，海勒太太。”马泰依回答道。

“你是一头猪。”那个女人平静地说，连表情都没有改变。她拉着她孩子的手穿过树林往加油站走去。

我们站在林中空地上，阴影已经变浓，我们的周围都是破罐头和纠结的锈铁丝，我们的脚陷在垃圾和树叶里。一切都完了，整个事情变得毫无意义，荒唐可笑。这是一败涂地，是一次总崩溃。只有马泰依一个人恢复了镇静。他站得笔直，穿着那条擦汽车的蓝工裤，直挺挺的，很有尊严。接着他弯腰鞠了个躬——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向检察官鞠了个躬，而且说：“布克哈特先生，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待，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等待，等待，再等待。假如你能再拨给我六个人和一台无线电设备，这就足够了。”

检察官触了电似地瞪着我的老下属。没有比这一着更能使他手足无措的了。他原打算好好地训我们一顿，可是现在却空咽了几口唾沫。他用手擦了擦脑门，接着蓦地转过身子，和汉齐一起踩着重重的步子穿过树叶堆走开了。他们消失在树丛中。在我作了个手势之后，费勒也离去了。

只剩下了马泰依和我两人。

“你现在听我说，”我叫嚷道，决心要让这个人回到现实世界中来，我很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支持了这个天方夜谭，使得事情无法收拾。“这一次行动失败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等了一个多星期，可是并没有人来。”

马泰依没有回答。他仅仅是环顾了一下四周，全神贯注地盯视着。接着他走到树林边缘，绕着空地走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仍旧站在垃圾堆上，陈年的尘土盖过了我的脚踝。

“那个孩子是在等他。”马泰依说。

我摇摇头。“那孩子到这儿来是要独自呆一会儿，为了坐在溪边，抱着她的洋娃娃做白日梦，唱‘玛丽坐在石头上’。是我们以为这里有什么文章。”

马泰依注意地倾听着我的话。

“安妮玛丽拿到刺猬了。”他固执地说，依然死抱着他的推理。

“有人送过巧克力给安妮玛丽，”我说，“这不假。可是谁都可能送巧克力给小孩子吃的！认为巧克力球就是儿童画里的那些刺猬，这只不过是你的假设，马泰依，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真的就是。”

马泰依又没有答理我的话。他再次在空地上走了一圈，审视了树叶堆得挺厚的一处地方，细细地盯着看了好久，又放弃了，又回到我的身边。

“这是一个杀人的场所，”他说，“你可以感觉出来。我还是要等待下去。”

“这完全是胡闹，”我回答道。突然之间，我心中充满了恐怖、憎厌和疲惫的感觉。我打了个冷战。

“他会到这儿来的。”马泰依说。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对着他大喊大叫：“废话，胡说八道，你疯了！”他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话。“咱们回加油站去吧。”他说。

我很高兴终于能离开这个不吉利的地方。太阳已经低垂，阴影越来越大，宽阔的山谷变成了一片金光灿烂。头上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可是这一切都让我反感。我觉得仿佛自己被放逐到一张特别俗气的明信片上所印的风景里去了。接着我们来到大路上——小汽车川流不息，衣饰华美的人坐在有活动顶盖的汽车里，是荣华富贵在我们身边一掠而过。这一切都荒谬绝伦。我们来到了加油站。费勒在油泵旁边我的汽车里等候我。他已经差不多睡着了。

安妮玛丽坐在秋千上，又在唱“玛丽坐在石头上”，声音仍然尖细然而却带有哭音。有一个男人斜靠在门柱上，显然是砖厂里的一个工人，他穿的是大翻领衬衣，袒露出胸口的浓毛，一根烟卷叼在嘴角边，正在幸灾乐祸地狞笑。马泰依没有理他。他径直走进那个有窗口的、我们曾经在桌旁坐过的房间，我跟了进去。他拿了瓶樱桃酒往桌子上一放，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我没有兴致喝酒，这一切太让我作呕了。哪儿也看不到海勒太太的影子。

“做起来会有困难的——我设想的那个方案，”他表示说，“不过那片空地其实也不算远。也许你觉得我还是在这里加油站上等比较好？”

我没有回答。马泰依踱过来又踱过去，不断喝着酒，没有理会我的沉默。

“倒霉的是海勒和安妮玛丽现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说，“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想办法的。”

从窗外传来汽车声和小孩抽噎地唱“玛丽坐在石头上”的声音。

“我要走了，马泰依，”我说。

他还是喝他的酒，连头也没抬起来看我。

“以后我会在这儿等些时候，再到空地上去等一些时候。”他最后决定说。

“再见了，”我说，于是我离开了房间，来到外面，经过那个汉子和那个女孩，向正从瞌睡中惊醒的费勒招了招手，他把车子开过来，给我打开了车门。

“回苏黎世警察局，”我命令道。

那个前任州警察局局长继续说道：“跟可怜的马泰依直接有关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前任局长和我早已走完了我们的从库尔到苏黎世的路程，如今正坐在他经常提到、经常夸奖的那家皇冠餐厅里，当然还是爱玛在给我们上菜，只是我们头上挂的已经不是米罗的那幅画，而换成古柏勒的了——老头儿的老习惯是怎么也改不掉的。而且我们也已经吃过从手推车里端出来的 Bollito milanese 了；这也是他的老规矩，我又何不客随主便，也吃这个菜呢？时间将近四点了，在喝完咖啡以及诸如此类的饮料以后，局长说他最爱一边喝浓咖啡，一边抽哈瓦那雪茄，然后再来一杯窖藏好酒，他建议再添一份什锦冷盘。另外从纯技术的角度出发，我还应该说明，我当然不想把那位过于健谈的老局长所说的一五一十记下来就算完事，这是一个文学上诚实不诚实的问题，也是尊重不尊重写作技巧的问题。我这样说的时侯，我想到了故事中不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去叙述的部分，不是他亲身经历的部份，而是他按事实发生的实际情况客观叙述的部份——例如马泰依作出诺言的那一段情节。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得跑出来重新组织、设想，虽然我总是尽力地保持事情的原来面貌，我仅仅是运用作家写作的特定规律，把老人提供的素材加以改写。

警察局长继续说道：自然，我后来又去看过马泰依几次，我越来越相信凶手毕竟还是那小贩，其它的事都是马泰依想出来的。因为在以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内，再也没有发生过同种类型的新的谋杀案。嗯，我也不必细说，反正马泰依这人完全堕落了，他成了一个酒鬼，一个白痴。再也无法帮助他，再也无法让他改变。到了晚上，附近那些坏男人在加油站附近吹口哨再也不是白吹的了，偷偷地走来走去再也不是没有收获的了。情况越来越糟，当地的警察甚至去他那里突击检查了好几回。我只得把事情的开始告诉库尔的同事，请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对这样的事情一向比我们开通些。于是一切都按着命运指定的轨道发展下去，其结果，我们今天旅行途中你自己也看到了。情况是够让人沮丧的，特别由于安妮玛丽那孩子变得跟她母亲一样堕落了。也许正是因为有几个救济团体老是不放过她。这孩子被送到正派的人家去收养，可是每次都逃了回来，回到加油站来。两年前海勒又在这儿开设了一家简陋的小客栈。天知道她是怎么把执照弄到手的，反正这更毁了那个姑娘。她帮着照料——不管哪一方面的事她都帮忙。她在教养院里呆了一年，四个月以前刚放出来，可是你别以为这会让小姑娘改邪归正。哼，你自己也亲眼看到了。这方面我们不必再谈了。

不过你心里一定会有些纳闷，我的故事跟我对你演讲的批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又说马泰依是个天才。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你可以反对说，一个异想天开的灵感不一定非得是正确的，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的灵感。这当然也是对的。我甚至都想象得出这个问题在你们作家的头脑里是怎样解决的。你也许很聪明地对自己说，只需让事情获得这样的最后结局：马泰依毕竟还是对的，他抓到了凶手，这一来你就有一部小说或电影的奇妙无

---

这里的“我”指的是“作者”，而不是警察局长。——译注

古柏勒（Gubler），瑞士现代画家。——译注

意大利文，米兰炖肉。——译注

比的情节了。毕竟作家的任务就是在关键处来一个转折，使事情变成透明状态，这样，故事就闪耀着高尚的理想，可以从中作出推论。只消出现一个转变，显示出马泰依成功了，你就不仅可以使我们堕落的侦探变得有趣，事实上还可以让他升高为一个“圣经”式的人物，一个具有伟大的信念和信仰的现代的亚伯拉罕。——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某个人相信罪犯是无辜的因而要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凶手的故事，就可以变成一个有深刻意义的寓言了；那个有罪的小贩在高级的想象力的范畴之内可以成为无罪，那不存在的凶手也会出现，一个可以嘲弄人的信念与理智的事件就此可以变成肯定精神美的例证。事实究竟怎样，这是无关宏旨的，因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显示故事的这种版本也是可以说得通的。我设想，你的思路也无非就是如此，而且我可以预言，我的这个版本是如此有启发性，如此有积极因素，要不了多久就必然会与公众见面，不是以小说的形式就是以电影的形式。你会多少按我所说的那样来叙述整个故事，当然，技巧一定更成熟些，你毕竟是一个专业写故事的人嘛，而且一定是在最后，那凶手才会真的露面。这时节，希望有了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样，这个故事到头来还是可以为我们基督教世界所接受。我还可以设想出另外几种更温情脉脉的版本。比方说，不妨这么写：马泰依一发现巧克力球，知道安妮玛丽有危险后，他再也不忍心继续拿小姑娘来当钓饵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许是出于他新近发展起来的对小女孩的父爱。他先设法使安妮玛丽和她母亲的安全得到保障，然后在空地的小溪边上放了一只大洋娃娃。这时，那个凶手，安妮玛丽的巫师，杀气腾腾地走出树林来到夕阳下，一点点走近那个假女孩。他想到马上就可以大开杀戒，这个色情狂真是喜不自胜。等到发现自己原来落入了一个巧妙的圈套，他气疯了，他同马泰依和警察们进行了一场恶斗。也许在故事结尾时——你务必原谅我也不禁技痒，居然也想编小说了——受伤的探长和孩子之间有一段动人心弦的对话。不长，只不过是几句支离破碎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姑娘一心要从母亲身边逃走，去见她心爱的巫师，以为这样能得到幸福。书的结尾倒是一个机会，可以大写特写净化人的心智的宁静，写父女之间的慈爱，写马泰依的归队，写恐怖之后的诗一样的甜美境界。也许，这无疑是有更可能的，你会编造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情节来。我读过一些你写的东西，你知道吗，虽然坦白地说，我更喜欢的是马克斯·弗里施写的小说。吸引你的正是这个故事的不合逻辑，正是这样的情节：某人相信一个罪犯是无辜的，他要寻找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凶手。我们不是早已很精确地把总的脉络勾勒过了吗？不过我们也不妨这样设想一下：你为了开玩笑，也为了出我们警察的洋相，宁愿选择一个比现实更为残酷的构思。你决定这样写：马泰依真的找到了一个凶手，一个你们笔下的那种小丑般的圣徒，一个心地善良的某个教派的牧师，其实他当然是无辜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害人。正因如此，你那种邪恶的灵感一来，便安排成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他有问题。马泰依真的把这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给杀了；一切证据都严丝合缝，毫无破绽；于是这个快乐的侦探便被人们誉为天才，警察局把他请了回去。这一切都是想象得到的。你瞧，我懂你们的花招。不过你千万不要把我

---

见《圣经·创世记》，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和第一个族长。——译注

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11—），瑞士当代著名作家，和迪伦马特在这里给自己，也是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译注

的唠唠叨叨完全归之于那瓶窖藏好酒的功劳，——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经在喝第二瓶了。你无疑一定也能感到我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没有说呢，我真是够卖关子的，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这上头来。其实我也不必向你隐瞒，不幸的是这个故事有一个结尾，而且能说明一个问题。到现在你一定猜测到这个结局不怎么样，简直上不了小说或电影。它是那么可笑，那么愚蠢和渺不足道，假如真的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这样的结尾是必定不能采用的。可是说句公道话，必须承认这个结尾是完全对马泰依有利的，它能使马泰依的形象显得高大，把他表现为一个天才，一个能发现我们大家都看不到的现实中的某种因素的人。他把这种因素研究得如此深刻，以致都突破了束缚住我们的手脚的理论和假设，并且一直触及到我们一般连碰都不去碰的法则。可是正是这些法则，支配着我们整个世界。当然，他也还只是接近它们而已。不幸的确有这样一个可恶的结尾，有这样一个无法逆料的因素，也不妨说有一种偶然性——随你怎么说都行。这使他的天才、他的计策与行动在事后看来显得荒谬，令人痛心，甚至比警察局里所有的人都认为他错了这件事还要荒谬。世界上最悲惨的，莫过于看到一个天才在某种不可理喻的事上摔了跟头。当发生这样的事时，天才对这件使他摔跤的荒唐事情抱着什么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认输呢，还是不认输。马泰依不认输。他认为他的计算很准确，必定可以和现实相符。因此他否认现实，从而变得一无收获。我的故事快要结束了，结局非常沉闷，因为它的情况是各种你想象得到的“解决办法”中最平庸的一种。哼，有时候事情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有时候真的会出现最坏的情况。作为人，我们必须估计到那样的可能性，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以便能够应付它。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荒谬的事总是要出现的，今天它们已经越来越有力地显示出来了，我们只有谦卑地把这种荒谬性包括到我们的思想体系里去，承认在理智企图诚实地面对现实时，人类的理智不可避免地是有裂隙的，总是有扭曲的时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至于被这种荒谬性所摧毁，而能比较舒服地生存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必须理解，没有这点认识，我们便极有可能陷入极端荒谬的局势之中，会吃荒谬的苦，荒谬真像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似的。或者，我们必须认识到，荒谬是我们有能力避免的一种错误。出于一种执拗的道德原则，我们会试图建立一种完美无缺的理性社会，而这种完美无缺恰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极端无知的标志。对不起，请原谅我在叙述这个美妙的故事时，插进了这样的议论；我知道在逻辑上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你还得允许我这样一个老人对自己的经历讲一讲几点粗浅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很可能是极其不像样的。虽然我是警察局出身，但我还是尽力想做一个人，而不是一头牛。

嗯，就是在去年，当然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接到一位天主教教士打来的电话，必须到州医院去走一遭。这事发生在我退休前不久，是在我办公事的最后几天里，事实上，我的继任者已经在逐渐接管工作了——不是汉齐，尽管他有一位高贵的太太，他还是没有谋到这份差事，这真是谢天谢地——是一位品质很好、办事非常谨慎的人，他既有才能又很宽厚，这都是作为一个警察局长极其需要的品质。电话是打到我家里的。我之所以非去医院不可，是因为一个垂死的女人有些重要的事要告诉我。这种事是常常会有的。那天天气晴朗，可是很冷，是十二月里的一天，一切都光秃秃的，简直可说是满目凄凉。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的城市几乎像一家殡仪馆。在这样的一天去看一个濒死的女人可不是件值得羡慕的事。因此，我在医院的花园里骨灰干燥架周围绕了好几圈，心情坏透了，可是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踩着重重的步子走进了医院大楼。我要看的是住内科单人病房的一位施罗德太太。这个房间俯临花园，房间里到处都是鲜花、玫瑰花和唐菖蒲。窗帘拉起一角，斜斜的阳光躺在地板上。窗前坐着一位魁伟的教士，有一张粗糙的、血色很好的脸和一大把未加修整的灰胡子。床上躺着一位小老太太，满脸皱纹，但是还算秀气，头发稀薄，雪白雪白，举止温文尔雅，显然非常富有，这从她房间的豪华设备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她床边放着一架复杂的器械，不知是治疗什么病的，几根露出在毯子底下的橡皮管和它相通。这架机器得经常让一个护士来检查一下。这个护士过不了一阵就进房间来，静悄悄地、非常认真地检查着，谈话也因此间歇性地被打断了。我想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把周围环境的情况交待清楚。

我和他们打了招呼，作过自我介绍。那老太极端平静地、专心致志地端详着我。她的脸像蜡制的一样，不像是真的，然而又是出奇的生气勃勃。她那双黄色、皱巴巴的手里拿着一本黑皮洒金的小书，显然是一本《圣经》。如果说这个老太太即将死去，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尽管有许多橡皮管通到她所盖的毯子里去，她身上散发出的活力是如此旺盛，如此充沛。那教士仍旧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做了一个既庄严又有些笨拙的手势，让我在一张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请坐，”他说道。当我坐下来时，他那深沉的声音从窗边轰隆隆地鸣响起来，他的身影在光线衬托下，显得特别庞大：“施罗德太太，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跟局长先生说吧。十一点钟我们必须做临终涂油礼了。”

施罗德太太微笑着。她用贵族妇女有魅力的腔调说道：她这么麻烦我感到十分抱歉。虽然她声音很轻，但是却非常清楚，非常活泼。

一点也不麻烦，我撒谎道，相信她马上就要告诉我她打算从遗产中拨出一些钱来接济穷苦的警察，或是这一类的事情了。

老太太接着说，她要告诉我的其实是一桩没什么了不起的、无关紧要的事，这样的事说不定每户人家都有，所以她把它忘了。可是今天，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由于大限将到，她在作最后的总忏悔时提到了这件事，这也是非常偶然的，因为方才她唯一的一个教子的小女儿给她送来了一些花，小姑娘穿了条红裙子，这使她想起这件事。贝克神父听了忏悔后非常激动，说她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她真不明白为什么非如此不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早已过去了，不过如果神父先生认为……

“快说本文吧，施罗德太太，”窗前那个深沉的声音响了起来。“说本文吧。”城里的教堂钟声鸣响了，宣布布道已经结束，低沉的钟声传得很远。

好吧，她试试看吧，那老太太又开始了，她喋喋不休地讲了起来。她已经有很久没给人家讲述故事了——以前她常给艾弥尔讲的，那是她第一个丈夫的儿子，可是后来艾弥尔生肺病死了，这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他如果活到今天，也会跟我一样年纪了，或者不如说跟贝克神父一样年纪了；不过她现在打算想象在她面前的我是她的儿子，贝克神父先生也是。因为艾弥尔死后不久她就生下了马克，可是马克只在世界上活了三天——是早产，他六个月就出世了，霍布尔大夫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还是早点到阴间去的好……那老太太紊乱的思路就这样一团乱麻似地向前滚着。

“快说本文吧，施罗德太太，说本文吧，”那教士用低沉的声音劝告着。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除了偶尔像摩西似地伸出右手去捋一捋他那把乱蓬蓬的灰白胡子，同时喷出了一阵阵大蒜的刺鼻气味。“我们马上就要施行临终涂油礼了。”

这时，她突然变得很骄傲，变得贵族气十足了；她甚至还能鼓足气力把她的小脑袋稍稍抬起一些来，她那双小眼睛也发亮了。她是斯丹齐利家的人，她家，她的祖父就是1847年率领军队向艾希霍兹马特撤退的斯丹齐利上校；她的姐姐嫁给了斯多西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苏黎世的总参谋长，并且和乌利希·维赖将军过从甚密，而将军又是威廉皇帝的挚友，这些情况我无疑都是知道的。

“当然，”我有气无力地说，“自然听说过。”老维赖和威廉皇帝跟我有什么相干？我想。你有什么要求，就赶快说吧，老太婆。但愿我能抽烟就好了，这时候来一支小雪茄倒可以给这里药味很浓的空气带来一些原始森林的气息，也可以压一压大蒜气味。这时那教士又执拗地、无情地用他的男低音说道：“讲你的本文吧，施罗德太太，讲你的本文。”

老太太接着往下说，这时她脸上换了一种嫉妒得近乎诡异的表情，实际上是充满了仇恨的表情。她说，她希望我知道，她的姐姐和斯多西上校是罪魁祸首。她姐姐比她大十岁，现在九十九岁了，丈夫也已死去四十年了。她在苏黎世山有一座别墅，她拥有不少布朗—布伏里公司的股票，还在巴恩霍夫街有许多房地产。这时，从垂死的老太婆嘴里突然冒出来一连串刻薄的，不，一连串让人不堪入耳的恶骂，用语太脏我都不敢在这里照引。与此同时，她坐直了一些，她那白发苍苍的衰老的头充满生气地来回摇晃了几下，好像是臭骂一通后出了气，现在是欣喜若狂了。可是接着她又重新安静下来，因为女护士幸好这时来到她的床边。——好了，好了，施罗德太太，千万不要激动，好好躺下来，安静一点。小老太太听从了。护士走后，她软弱无力地挥了一下手。这些花，她说，都是她姐姐送来的，为的是气她；她姐姐明明知道她不喜欢花，而且不赞成把钱浪费在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上。可是她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她说我一定是以为她们经常吵架，可她们一直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当然正是因为互相憎厌的缘故。所有斯丹齐利家的人都能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虽然他们相互间水火不能相容，而他们的彬彬有礼只不过是刺激对方，要把对方折磨死的一种手段——幸亏折磨不死，否则的话就糟了，他们怎能仍然保持一个讲究礼貌的家族呢？

“别离题了，施罗德太太，”教士又重新提醒说，“临终涂油礼正等着呢。”而我这时又盼望能抽一根我那种粗大的巴西大雪茄，而不是小雪茄了。

那股细语又絮絮叨叨地继续说起来：1895年她嫁给了她的亡夫高尔瑟博士，库尔的一个医生。她姐姐还有她的那位上校居然为这事感到不愉快，认为这门婚事不门当户对，姐姐甚至还直截了当地把她的这种看法明说出来。那位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患流行性感冒死去，姐姐更加不正常了，她事实上为她的军人丈夫设立了祭坛。

“讲本文吧，施罗德太太，讲本文吧，”教士继续催促她，可是一点也没有不耐烦。他似乎顶多对她的思想散漫、杂乱无章感到有点悲哀，而我索性打起盹来了，仅仅是过一小会儿便惊醒一阵。“想想临终涂油礼快要做了，讲本文吧。”我毫无办法；那个小老太太躺在她那张临终的床上没完没了地唠叨着，声音吱吱喳喳的，毯子底下伸出了橡皮管子，她还是说呀说呀，说个没完。从一件事又扯到另一件事上去，就是不说到正题上来。我到目前为止也只能猜测她大概是要对某个热心公益的警察表示感激，然后是宣布捐赠几千法郎，以激怒她那位九十九岁的姐姐。我已经在替一篇表示感激的简短的演说词打腹稿了，一面渴望着抽烟，一面不得不压抑这种不切实际的欲念，我还渴望着本该喝到口的开胃酒，本该吃到嘴的星期天照例在皇冠餐厅和我太太、女儿一起享用的那顿晚餐。

这时老太太叙述得比较的不枝不蔓了，她说：她那位亲爱的高尔瑟大夫过世之后，她又嫁给了亲爱的已经过世的施罗德。他是她家的一个司机兼花匠，大宅里的一切该由男人来做的事，诸如烧锅炉、修百叶窗等等，都由他照料。虽然她姐姐对这门婚事没说什么话，甚至还到库尔来参加了婚礼，老太太拿得准，她姐姐还是为这次婚事感到恼怒的，虽然姐姐隐藏住自己的不快感情没说出来，但这正是为了故意要激怒她。她就是这样成为施罗德太太的。

她叹了一口气。在外面走廊上，护士们唱起圣诞颂歌来了。“嗯，和我第二位亡夫的婚姻是非常和美的，”老太太听了几句圣诞歌之后又接着说道，“虽然对我的先生来说，这个丈夫是不容易当的，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好当。我那去世的阿尔伯特和我结婚时正好二十三岁，他是1900年生的，可我已经五十五岁了。不过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他是个孤儿，你明白吗？他母亲的身世不清楚，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第一个丈夫在阿尔伯特十六岁的时候收留了他。他在学校里书念不下来，你明白吗？写字和看书都不太行。结婚显然是一条最稳妥的出路。要说寡妇的坏话是最容易不过的了，虽然我和阿尔伯特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那种事，即使是结婚以后也没有同过房。两个人年纪这么悬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的财产数目有限，我得精打细算才能把苏黎世和库尔的房地产维持下来。如果让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单独到冷酷的世界上去闯，他又会有什么遭遇呢？像他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会迷失方向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要承担义务的。于是我们便堂堂正正地在一起生活，我得说，我那阿尔伯特是个很体面的男子汉，又高又大，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我没有理由因为他感到不光彩，虽然他除了说‘是的，妈咪，一定的，妈咪’之外，几乎从来不讲别的话。不过他是听话的，酒也喝得不凶，只不过他贪吃，特别是面条。事实上各种淀粉类的东西他都爱吃，还有巧克力。他见了巧克力便没命似的。除此之外，他是个温顺的、

善良的人。一辈子都是这样，比我姐姐四年后嫁的那个汽车夫可要强多了，虽然她的前夫是个上校。那个汽车夫那时候也只有三十岁。”

“讲本文吧，施罗德太太。”那教士的声音从窗口那里飘了过来，丝毫不带感情，却又是毫不妥协的。这时，那个小老太太停歇了一小会儿，也许她毕竟还是有些累了——我仍旧像泥塑木雕似的坐着，还在等待那赏赐给穷苦警察的捐赠。

施罗德太太点了点头。“你瞧，局长先生，”她说道，“到四十年代时，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开始走下坡路了。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啦，准是他脑子里某个地方出了毛病。他变得越来越阴郁和沉默了。他常常呆呆地瞪视着空中，有时候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是照样干他的活儿，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责怪他。不过他也常常一连好几小时骑了摩托车出去逛，也许是那次大战弄昏了他的脑袋，也许是因为军队不肯收留他而觉得不高兴。一个人脑子里究竟怎么想的，又怎么能知道呢？还有，他越来越饕餮了——幸亏我们养得有鸡，还有兔子。接下去，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出了一点情况，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事。第一回发生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她停住不讲了，因为女护士和一个大夫走进房间来了。他们在机器后面忙了一阵，又走到老太太的后面。那大夫是个德国人，头发金黄，就像刚从一本画册里走出来似的，他神情愉快，又很傲慢，正在进行星期天的病房检查——你觉得怎么样，施罗德太太，打起精神来，我们正在取得很好的效果，好极了，好极了，别灰心失望。接着他迈着快步走开了，女护士跟在他后面。那个教士又告诫道：“快讲本文吧，施罗德太太，快讲本文吧，临终涂油礼十一点开始。”这个前景似乎对老人家心理上一点影响也没有。

“每个星期他都要送鸡蛋去给我那位住在苏黎世的姐姐，”老太太又重新开始道，“我那可怜的亡夫阿尔伯特总是把篮子系在他的摩托车的后面，快到天黑才回来，他每次总是大清早就出发，大约五、六点钟，总是穿一身整整齐齐的黑衣服，戴一顶圆顶礼帽。谁看见他都要跟他亲热地打个招呼。他骑着车，穿过库尔，来到乡下，一路上用口哨吹着他最喜欢的那首歌：《我是瑞士好小伙儿，我爱我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是一个炎热的仲夏日子，就在联邦国庆节的后两天。这次等他回到家里都已经过了半夜了。我听见他在浴室里洗呀刷牙呀弄了好久，我走进去一看，见我那亲爱的亡夫身上全是血，衣服上也都是血。‘我的天啊，好阿尔伯特，’我说，‘你出什么事啦？’他只是愣愣地瞧着我，半晌才说：‘一点儿小事，妈咪，我马上就好了，去睡吧，妈咪。’我也就去睡了，虽然我有点纳闷，因为我没看到他身上哪儿有伤。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吃早饭时，他在吃鸡蛋，他每次都要吃四只蛋，还要吃面包和果酱。我看报纸，知道有人在圣高尔州杀死了一个小女孩，用的凶器可能是一把剃刀，我立即记起来昨天晚上他在浴室里洗一把剃刀，虽然他总是在早上剃胡子的。我突然像上帝给了我启示一样醒悟过来，就非常严厉地对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说：‘亲爱的阿尔伯特，正是你杀死了圣高尔州的那个小姑娘，是不是？’他停住吃他的鸡蛋、面包、果酱和泡菜，说：‘是我干的，妈咪，我没法子不干呀，这是上天的指示。’说完了他又接着吃了。我想到他病得这么不正常心里很乱，我也为那个小姑娘难过，我想打电话给齐希勒尔博士——不是那个老大夫，是他的儿子，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夫，也很富有同情心的。可是接着我想到了我的姐姐，她会如此地幸灾乐祸——那不是她生平最得意的一天要到了吗？所以我仅仅是对我亲爱的亡

夫阿尔伯特板着脸，非常严厉地告诉他，这种事以后再也、再也、再也不允许发生了。他说：“是，妈咪。”“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呢？”我问道。“妈咪，”他说，“我骑摩托车去苏黎世经过瓦特威尔时，常常遇见一个穿红裙子有金色发辫的小姑娘。那地方离我走的大路很远，要绕弯路，不过自从我在一个小树林附近见到那小姑娘后，我总忍不住要绕这段弯路——这是天上的一个声音下的命令，妈咪——那声音命令我跟小姑娘一块玩；接着天上的声音又命令我给她巧克力，接下来我又不得不把那女孩杀了，这也是天上的声音说的；妈咪，我干完了便躺在附近树林里的一个灌木丛中，等天黑了才回到你这儿来，妈咪。”“好阿尔伯特，”我说，“你再也别骑摩托车上我姐姐那儿去了，我们以后把鸡蛋邮寄去吧。”“是的，妈咪，”他说，又拿起一片面包，厚厚地抹了一层果酱后便走到院子里去了。现在我真的必须到贝克神父那里去一趟了，我想，让他跟阿尔伯特好好地谈一谈。可是当我从窗子里望出去时，看到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在太阳底下那么忠心耿耿地、安静地干着他的活儿，有点忧郁地在兔笼那儿拾掇什么，是在补兔笼哪。我看到里里外外都这么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就想道：已经出了的事情再也无法挽救了，阿尔伯特是个好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小伙子，而且，同样的事情反正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时候护士又到房间里来了，她检查了机器，重新把管子放放好。床上的小老太太似乎又筋疲力尽了。我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汗珠从我脸上直往下流，我也不去管它。突然之间，我打起冷战来了，想起我方才居然以为老太太要捐钱给警察局，不免觉得分外可笑。还有这么多鲜花，所有这一束束红玫瑰、白玫瑰、火一般的唐菖蒲、紫菀、百日草、石竹花，都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更有满满一大瓶兰花，惹眼得让人觉得十分俗气；还有那窗帘外面的太阳；那教士一动不动的、庞然大物般的身影；那大蒜气味——这一切都那么可笑。我觉得自己很想大发雷霆，逮捕这个老太婆——但是现在再这么做已是毫无意义了。她马上就要接受临终涂油礼了。我坐在那里，穿着我那套星期天的好衣服，严肃，一本正经，却也是无能为力。

“接着往下谈吧，施罗德太太，”教士耐心地劝告道，“接着往下说吧”。于是她便继续说了：“后来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真的好些了。”她用她那平静、温和的语调解释着，真像是在给两个小孩讲童话似的。在这个童话里，丑恶、荒谬的事真的出现了，而且和善良的事一样神奇。“他不再去苏黎世了。可是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又能用我们的汽车了，是我三八年买的那辆别克，我亲爱的亡夫高尔瑟买的那辆实在太过时了，因此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常常开了那辆别克带我出去兜风，有一次我们还到了阿斯考那呢。我就想，既然开车能给他带来那么多乐趣，还是让他再往苏黎世跑跑的好——不管怎么说，在别克汽车里是不会出事的，因为他得集中注意力开车，听不到上天向他说话的声音。于是，他就开始驾车去我姐姐那里，忠心耿耿地运送鸡蛋，真像个乖孩子一样，有时也送一只兔子去。可是很不幸，有一次他又突然半夜之后才回到家中。我径直到汽车房去——我立刻就回想起来，最近这些日子里，他突然不断从糖果盒里取走巧克力球。果然，我发现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在洗汽车的内部，车里面到处都是血。‘你又杀了一个小姑娘吗，阿尔伯特？’我问，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妈咪，’

他说，‘不用担心，不是在圣高尔州，是在施维茨州，上天的声音叫我这样办的。这个小姑娘也穿红裙子，有黄辫子。’我十分不安，我比第一次更加严厉了，我几乎都发火了。足足有一个星期我不让他用汽车，我还想为这事上贝克神父那儿去——我的确是下了决心的。可是我的姐姐一定会喜出望外的，我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于是我把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看得更紧了，因此有两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至他又干了第三回，因为他没法不服从上天的声音。我可怜的亡夫阿尔伯特呀！他心都碎了，他哭呀哭呀，我马上就发现糖盒里的巧克力球又少了。这回是苏黎世州的一个小姑娘，她也是穿红裙子，有黄辫子。母亲居然让女儿穿戴得这么危险，这真是叫人难以置信呀。”

“这小姑娘的名字是葛丽特利·莫赛尔吗？”我问。

“她名叫葛丽特利，另外那两个叫索尼娅和埃维利。”老太太答道，“我把三个人的名字都记住了。可是这时我的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又越来越不安分了，他老是往外跑，我每件事都得跟他说上十遍，我整天都得呵斥他，就像他是一个小孩子似的。在1949年或1950年，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是葛丽特利死后几个月，他又变得坐立不定、烦躁不安了，连鸡埘也肮里肮脏的，母鸡整天咯打咯打叫个不停，因为他没有按时好好地喂它们。他又开始驾了我们的那辆别克往外跑了，半天半天都不回来，虽然他仅仅说：‘我出去转一转。’突然之间我又注意到糖盒里的巧克力球又少了。我就密切注意着他，当他把剃刀像支钢笔那样地插在口袋里，偷偷地走进小客厅时，我就走上前去对他说：‘好阿尔伯特，你又找到一个姑娘了。’‘天上的声音哪，妈咪，’他回答道，“请让我干了这一次吧，上天的命令就是上天的命令，而且她也穿红裙子，有黄发辫。’‘阿尔伯特，’我严厉地说，‘我不答应。那姑娘在哪儿？’‘离这儿不远，在一个加油站上。’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说，‘求求你，求求你，妈咪，让我服从吧。’这一次我真的是非常坚定。‘不行，阿尔伯特，’我说，‘你答应过我的。快去打扫鸡埘，给母鸡喂点吃食。’这时候，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勃然大怒了，我们婚后一直是很和美的，他发火还是第一次，他真的冲着我大叫大嚷：‘我只不过是你的佣人！’——瞧，这个可怜的人儿病得有多重——接着他拿了巧克力球和剃刀便往外跑，跳上别克就开走了。十五分钟之后，人们打电话通知我，他和一辆货车相撞，受伤死去了。贝克神父和警察局的波勒军士都来了——他办事老练极了，我的遗嘱里没忘记留了五千法郎给库尔的警察局，原因就在这里，我也给了苏黎世警察局五千法郎，因为我在弗莱艾街有一些房产，你明白吗；我姐姐带着她那位司机也来了，完全是为了刺激我，他们把我的丧礼都给破坏了。”

我定睛瞪视着这个老太婆。捐款毕竟还是来了，我一直等待着的这笔捐款。这仿佛是一场专门为了嘲弄我而设计出来的非常巧妙的讽刺剧。

可是这时候一位老教授带着他的助手和两个护士进来了，他们让我们出去，我就向施罗德太太道了别。

“再见了，好好保重，”我说，脑袋里空空的，感到很尴尬，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离去。可她却嗤嗤地窃笑起来，老大夫向我投来了古怪的眼光。这个情景让我狼狈得无地自容。我终于离开了老太婆、教士和那一帮人，我一个人来到走廊上，简直是如释重负。

到处都是——一堆堆来探望病人的人，带着一包包礼物和花束，到处都是——

股医院里的药味儿。我逃了出来。出口处很近，我马上就可以进到花园里去了。可是这时候一个高大神气的、穿着一身整齐深色衣服的娃娃脸男人推了一辆轮椅车从走廊那端过来，车里坐着一个满脸皱纹、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她穿着貂皮大衣，抱着一只极大的花束，使人觉得她满怀都是鲜花。也许这就是那个九十九岁的姐姐和她的司机丈夫吧——我又怎么知道呢？我回过头去，提心吊胆地望着，直到他们消失在私人病房那边。接着我简直是开始奔跑了，我冲出楼房，穿过花园，从坐轮椅的病人当中穿过，从正在康复的病人和来访者当中穿过。直到我在皇冠餐厅里坐下来，直到一盘肝泥丸子汤放在我的面前，我才稍稍平静下来。

从皇冠餐厅出来，我驱车直奔库尔。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把太太和小姐带在身边。那天是星期天，我早答应陪她们一起玩的，可我不愿向她们作无法说清楚的解释。我一句话也不说，发疯似地开着车；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把局势扭转过来。当然，不能让我的家人在加油站外面等候太久。在小酒店里面，一帮粗野的家伙在纵酒狂闹；安妮玛丽刚从教养学校放出来。天气虽然很冷，马泰依却穿着修车工的工裤，坐在外面的板凳上，抽着一根方头雪茄烟，散发出一股苦艾酒的气息。我在他身边坐下，简明扼要地把事情告诉了他。可是我完全帮不上忙。他似乎连听话都不会听了。片刻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接着我钻回到我那辆奥佩尔牌汽车，向库尔驶去。太太和小姐已经很不耐烦，她们饿了。

“那不是马泰依吗？”我太太问道。外面的事，她照例是不太清楚的。

“是的。”

“怎么啦？我还以为他上约旦去了呢。”她说。

“他没有去成，亲爱的。”

到了库尔，我们花了好大气力才找到一处停车场。点心店里人山人海，全是苏黎世人，他们到这里来填饱肚子，热得浑身冒汗。还有许多高声喧哗的孩子。但我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一张桌子，要了茶和点心。这时我太太重又把女招待叫了回来。

“请再给我拿半磅巧克力球来，小姐。”她说。

她略微感到有些惊奇，因为我连一只巧克力球都不去碰。天哪，我才不吃呢。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你愿意怎么处理这个故事，就请便吧。爱玛，开帐单来。

## 司 法

—

毫无疑问，我写这份报告，是为了按规矩办事，是出于某种书生气缘故，我要让这份报告存入档案。对于导致一个杀人凶手得以无罪释放，并且又将一个无辜的人置于死地的那些事件，我要迫使自己再一次加以审核。我要再一次仔细回顾我被诓骗的前前后后，我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可能会遗漏的细枝末节。我还要认真探究一下司法工作上也许仍然保留着的种种机会。然而，我写这份报告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有很多时间，至少有两个月。我刚刚从飞机场回来（从机场出来后，我还去过几个酒吧，这就不算了，我眼下的身体状况也是无关紧要的。我现在已酩酊大醉，不过明天我又会清醒过来的）。我到达机场，握着打开了保险的手枪，跳出我那辆大众牌汽车的时候，巨型飞机正载着伊萨克·柯勒荣誉博士离开地面，插入夜空，呼啸着、轰鸣着朝澳大利亚飞去。估计柯勒这个老家伙是知道我的意图的，他在上飞机之前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可算是他的一大绝招了。我没有钱乘飞机去追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无可奈何，只有等待，等他回来，也许要等到6月，或者7月。要么去喝酒，是偶尔去还是经常去，那要由经济情况来决定。再就是伏案疾书，对一个穷极潦倒的律师来说，这是唯一符合身分的工作。不过，在某一点上，柯勒这位州议员完全打错了算盘：他的罪责绝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洗刷掉，不会由于我的等候而减轻，不会由于我的酗酒而一笔勾销，也不会因为我把它写下来而得到宽恕。我通过叙述事情真相把它深深印在心头，我要等到6月，7月，或者随便哪个月他回来的时候（他总归要回来的），到那时不管我是烂醉如泥，还是神志清醒，我都会把我此刻只是出于冲动想要干的事情有意识地付诸行动。我写这份报告不仅仅是要说出我要杀他的理由，而且也作为杀他的准备，一次正义的谋杀的准备。

我现在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又清醒过来了。正义只有通过我杀死他这样的方式才能得到伸张。杀掉他以后，我就去自尽，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倒不是想以此来逃避责任，正相反，只有这样做，我才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虽然法律上说不通，可是道义上却是合乎情理的。我掌握了事实真相，但又拿不出证据。在关键时刻，我缺少见证人。我自杀了，即使没有什么见证人，也容易博得别人的信任。我不像一个为了获得知识，拿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的科学家那样去死，我死，是因为想要了结我的这桩案子。

作案现场：这个作案现场一开始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戏剧大饭店以其洛可可式的建筑外貌，在这座建筑上搞得不伦不类的城市里，堪称屈指可数的著名的建筑之一。饭店有三层，这一点，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多数人只知道有两层。在漫长的上午——在我们的城市里，人人都早起——可以看到一些睡眼惺忪的大学生，也可以看到一些生意人逗留在底层，他们往往过了中午才走。稍晚一些，人们喝完咖啡樱桃酒后，饭店就清静下来了，连女招待的踪影也不见了，直到4点钟左右，才有一些精疲力竭的教师走进店来歇脚，还有一些没精打采的公务人员进来小憩。不消说，晚餐时来的客人最多，晚餐以后，过了晚上10点半钟，接踵而来的，除了一些政界人士、经理、金融界人士以外，还有其他自由职业界的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不过也

有一些大惊小怪的外国人，我们总爱把自己的城市说成是国际都市。在二楼，那就讲究得发臭了。我用发臭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在那两间低矮的四壁赭红的大厅里，像热带一样，热得要命，然而里面的人还忍受得住，女士们穿着晚礼服，先生们常常穿着黑礼服。空气里弥漫着汗臭，香水味，主要的气味还是土豆炒牛肉片以及本城其他独特风味菜肴的气味。人们在外面观赏了首场演出以及成交了大买卖之后，总爱到这里来聚会（他们跟楼下的人是一样的，只是在穿着上要来得讲究罢了），倒不是要来策划什么事情，而是为已经策划好的事情庆祝一番。戏剧大饭店三楼上，更加可观。这里放荡不羁，无所不为的情景，不禁令人为之咋舌。这里，房间既高又明亮，跟价格低廉的饭店里的房间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木头椅子，桌上铺着格子台布，摆满端啤酒的盘子。紧靠楼梯处是个座位空着一半的小型表演场，表演的节目有平平凡凡的魔术和更加平凡的脱衣舞。大厅里，人们在打牌，打台球。这里坐着本市蔬菜水果商、建筑公司老板和百货公司老板，坐着大汽车修理行的老板和拆卸专家，这些人常常一来就呆上好几个钟头，他们下的赌注都十分可观，他们周围簇拥着一些多嘴多舌的旁观者，稀奇古怪而又行迹可疑的人，也有几个妓女守候着，三个或四个，总是坐在临窗的同一张桌旁，饭店睁只眼闭只眼地让她们留在这儿，她们已是这里必不可少的陈设，她们要价也不高。因为真正富有的人是把小钱也看得很重的。

我初次与这位州议员相识时，刚通过国家考试，写完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和律师执照。尽管如此，我还跟上大学时一样，在斯迪西-劳埃平律师事务所当高级听差。这位斯迪西-劳埃平，由于在艾蒂兄弟、罗萨·匹克、道贝巴斯以及阿姆斯特勒的凶杀案中使被告获得开释，由于在特罗格假肢厂和联合国当中进行调解（使特罗格厂方得到了很大好处），已经蜚声海外。我当时要把一份关于一件捉摸不定的案子的鉴定材料送到戏剧大饭店，去交给斯迪西-劳埃平，只有他才热衷于这类案子。在三楼的一张台球桌旁，我找着了这位红极一时的律师。当时他和州议员打台球已经打完了一局。在另一张桌子上，贝诺博士、温特教授也在打着台球。此时，在我写这份报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人，正是后来案件当中的关键性人物，打台球真好比是这桩案子的前奏了。那时外面很冷，时值11月，或者12月——具体日期我想是不难推断的——因为我平常不穿大衣，同时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大众牌汽车停放在离开戏剧大饭店几条马路远的地方，所以我走到这儿时，全身都已经冻僵了。

“年轻人，叫一杯格罗格酒喝喝吧。”州议员招呼我说。他一面仔细地打量我，一面叫招待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听从了他的建议，反正我要等候斯迪西-劳埃平的答复，他已接过鉴定材料，离开台球桌，就着一张桌子翻阅起来。大厅的前面，那些蔬菜商人正在赌钱，窗前有几个幽暗的影子。街上有轨电车车轮那深沉的滚动声，频频传进屋来。州议员还一直在打量我，他显得无所顾忌，不加掩饰。他大概将近七十岁了。在场的人当中，唯独他没有脱去上衣，也没有出汗。我终于作了自我介绍，猜想对方必然是社会名流，可是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

“您跟施佩特上校有亲戚关系吗？”他问我说，他仍然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他或许以为自己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或许以为我已经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施佩特上校何许人也？一个昔日的粗野的农夫，如今一跃而为联邦议员，是个主张搞原子武器的家伙。）

“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回答说。（为了一次说个清楚，在这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生于1930年。母亲叫安娜·施佩特，我对她却没有什么了解，也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我是在一家孤儿院里长大的，回想起那家孤儿院，心里就感到高兴——特别是想到那个与孤儿院毗连的一望无际的森林，心里更感到高兴，孤儿院的院长和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我的青年时代也很幸福。说实在的，有父母也不见得一定就有好处。我的不幸是从与伊萨克·柯勒名誉博士打交道开始的，先前我虽说境况不佳，但也不至于落到绝望的地步。）

“您要作斯迪西-劳埃平的搭档吗？”他问道。

我惊讶地望着他说：“我可没有这样想。”

“他对您很器重呢。”

“他从来没有向我流露过。”

“斯迪西-劳埃平从来是不动声色的。”老人干巴巴地说。

“这是他的错，”我毫不在乎地说，“我想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

“那是很困难的。”

“可能吧。”

老人笑了起来，说：“您还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奇迹的。在我们国家里，要想单枪匹马地混出个名堂来，谈何容易呀。——您会打台球吗？”他接着又突然问道。

我说不会。

“这可是您的一个缺点了，”他说着，又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一对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惊异，看来他说这话是一本正经的，不是在嘲弄。他把我带到第二张台球桌旁，贝诺博士和温特教授正在这里打着台球。这两个人我倒是很熟悉的，温特教授我在大学里就认识了——我注册入学时，他还是校长呢——贝诺博士是我在过夜生活时认识的，我们这个城市夜生活很活跃，当时虽说只许进行到午夜为止，但是并不因此而缺少刺激性。贝诺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他曾经是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优胜者——因此他被人称为奥林匹克海因茨——一度是瑞士全国手枪射击冠军，还一直是个大名鼎鼎的高尔夫球运动员，曾开过一个赚不了钱的绘画馆。现在据说，他主要从事财产的管理工作。

我向他们打了声招呼，他们都点了点头。

“论打台球，温特始终是个新手，”柯勒名誉博士说道。

我听后笑了起来。“那您大概是老手了？”

“那当然，”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打台球是我的嗜好。教授，请您把球棒递给我。这一下您是打不好的。”

阿道夫·温特教授把球棒递给了他。这位教授乃花甲之人，又矮又胖，光亮的秃顶，戴着一副金架无边眼镜，惯于庄重地捋着他那精心护理的络腮胡子，胡子黑色，其间夹杂着几缕白毛，他平素衣着讲究，不免有些保守，他是我们大学里众多夸夸其谈的人文学者之一，是国际笔会会员和乌斯特里基金会委员，著有两卷头的消遣读物《卡尔·施皮特勒与赫希奥德，或瑞士与希腊——比较研究》。（我是学法律的，一向对文学院感到讨厌。）

州议员用白垩粉小心翼翼地将球棒尖端抹了一抹，显得镇定而自若。他

虽然说话不讲情面，但是没有一点傲慢的神气，而是冷静沉着，表明了他的力量和信心。他微微歪了歪头，观察了一下台球桌上的形势，接着果断而快速地打了一下。

我看着那些白色台球滚动起来，互相猛烈碰撞，接着又弹了回来。

“A la bande，就要这样对付贝诺才行，”州议员说着，把球棒还给了温特教授。“明白吗，年轻人？”

“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一面回答，一面转过身去，喝招待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的格罗格酒。

“以后您就会明白的。”柯勒博士笑了起来，说着从墙上拿下一卷报纸，走了出去。

谋杀案情：三年后所发生的事，已经众所周知了，我可以很快地叙述一下（我甚至并不一定要在头脑清醒时才能做这件事）。柯勒博士当时已经放弃了他在州议会里的席位，尽管他所在的那个党仍想提名他当州政府委员（并非如一些外国报纸上所说的要他当联邦委员会委员），他甚至完全退出了政界（律师活动也早就撒手不干了），经管着一个越来越具世界规模的砖瓦托拉斯，同时充任各种各样的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里供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有时一隔几个月也见不着他的人影，直到1955年，在反常得犹如春天的3月的一天，才见到他陪着英国的B大臣在这个城市里抛头露面。这位大臣是以私人身份来到这里，在一家私立医院治疗胃溃疡的。如今，在乘飞机离去的前夕，正坐在柯勒的罗尔斯-劳依士牌汽车里，坐在这位老资格的州议员的身旁，勉强地听着州议员给他介绍这个城市的概况。在这四个星期里，他执意拒绝参观游览，如今却不得不任人摆布，他呵欠连天地瞅着车窗外急闪而过的名胜古迹，瞅着工学院、大学、大教堂、罗马式的教堂（州议员嘴里不停地提示着），河流在温和的空气里晃动着（太阳刚刚落山），码头上挤满了人。大臣打起瞌睡来了，他的嘴上还残留着土豆泥和麦片的味道，这玩意儿他在那家私立医院里吃够了，此时他极其渴望喝杯纯威士忌酒，州议员的声音听起来似乎隔得很远，街上车辆的喧闹声则显得更加遥远；他感到极度的疲倦，也许他意识到自己的溃疡病并非不严重。

“Just a moment，”柯勒博士说着，叫司机弗朗兹在戏剧大饭店门前把车停下，他下了车子，吩咐司机等一分钟，还用伞柄机械地指了指饭店的正面说：“十八世纪的建筑。”B大臣一点反应也没有，仍旧在打着瞌睡，仍旧在做梦。州议员走进饭店，通过转门进入餐厅，服务部主任恭恭敬敬地迎上来招呼他。这时将近7点，座位已经全给占了，人们正在吃晚饭，说话声、咂嘴吃饭声和餐具的碰撞声汇成了一片。这位年老的州议员朝四周环顾了一下，接着径直朝餐厅中间走去，温特教授正坐在那儿的一张小桌旁，品尝着法式牛排，喝着香白丹葡萄酒，州议员掏出手枪，开枪将这位国际笔会会员击倒了，而事前还客客气气地向他问了声好（这一切都是以十分庄重的方式进行的），尔后，柯勒大摇大摆地从呆若木鸡的服务部主任的身边，从那些不知所措、吓破胆了的女招待的身边走过，出了转门，走进温柔的3月

---

法语：借桌边反射作用进行击球的方式。——译注

Rolls-Royce，罗尔斯-劳依士牌汽车，产于英国，当今欧洲最豪华的一种小轿车。——译注

英语：请等一等。——译注

的暮色中，重新登上那辆罗尔斯-劳依士轿车，坐到正在打盹的大臣的身旁。这位大臣什么也没有觉察到，甚至连车子停下他都不知道，如前所述，他一味地打着盹，一味地做着大梦，梦见了威士忌，梦见了政界的风云（苏伊士运河的危机使他魂飞魄散），或者梦到了关于他的溃疡病的某种预感。（上个星期，报纸上报道说他已命赴黄泉，不过寥寥数语，大多数报纸连他的名字都拼错了。）

“去飞机场，弗朗兹，”州议员柯勒博士吩咐道。

逮捕柯勒的一段插曲：叙述这段插曲，我就免不了要幸灾乐祸。当时在离死者几张桌子远的地方，本州警察局局长正跟一位挚友莫克在一起吃饭。莫克是一个雕塑艺术家，他耳朵聋，当时一直陷于沉思之中，对于这个事件的全过程哪怕是在事后都毫不知情。当时他俩正在吃着蔬菜牛肉浓汤，莫克对这道菜感到很满意，而警察局长却抱怨菜不好，他不喜欢这个戏剧大饭店，难得光顾。这道菜一点都不合他的口味，肉汤太凉，炖肉太老，越橘太甜。枪响的时候，这位局长头都没有抬一下，这是可能的，至少人家是这样传说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巧妙地吮吸着一块骨头里的骨髓，但是吸完以后他还是站起身来的，甚至不小心撞倒了一把椅子，不过他作为一个喜欢按规矩办事的人，随即又把椅子扶了起来。他走到温特身边的时候，只见这位教授已经伏在那盘法式牛排上，手里还抓着那只装了葡萄酒的杯子。

“刚才不是柯勒干的吗？”警察局长问着束手无策的服务部主任，这位服务部主任惊魂未定，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他。

“是的。的确如此。”服务部主任喃喃地说。

警察局长若有所思地察看着遇害的日耳曼语文学学者，然后阴郁地看了看看着肉片和四季豆的盘子，目光扫过盛着细嫩生菜、西红柿和小萝卜的碗碟。

“没有救了，”他说。

“是的。的确如此。”

周围的顾客起初如同被魔法镇住了似的，这时才一起跳了起来。厨师以及厨房工作人员也从菜柜后面朝这边呆呆地探望。只有莫克仍旧安安静静地继续在吃着。一个瘦长的人挤到了前面。

“我是医生。”

“您别碰他，”警察局长镇静地命令道，“我们先得给他拍照。”

医生向温特教授俯下身子，不过他还是遵从警察局长的命令，没有碰他。

“真的，”他接着断定说，“死了。”

“是的。”警察局长平静地回答说，“请回到您的桌子上去吧。”

警察局长说完，从桌子上拿起那瓶香白丹葡萄酒。

“这个被没收了，”说着，他把酒瓶递给了服务部主任。

“是的。的确如此。”服务部主任喃喃地说。

警察局长接着就去打电话。

当他回来的时候，检察官耶麦林已经守在尸体边了。这位检察官身穿庄重的深色西装。他打算去音乐厅听交响音乐会，刚刚在这家饭店的二楼法国餐厅吃饭，听到枪响的时候，他正在吃着最后一道点心煎蛋卷。耶麦林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人人都盼着他早日退休。妓女和与她们竞争的对手，小偷和窃贼，不可靠的代理人，破了产的商人，就连司法机关，从警察直到律师，甚至连他的同事，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人人都会说些俏皮话来挖苦他，说“毫

不奇怪，自从有了耶麦林，这个城市比什么时候都糟糕，”“世上没有比司法界更糟糕的了。”等等。这位检察官处在绝望的境地，早已威信扫地，陪审员反对他的判刑建议的事屡见不鲜，法官也是如此，尤其是他还要忍受警察局长的怨气。人们都说，这位警察局长认为这座城市居民中的所谓的犯罪分子是更为可贵的一部分人。然而，耶麦林毕竟是一位气派不凡的司法人员，他也绝非盘盘皆输，他的判刑建议以及答辩都是令人敬畏的，他铁面无私，尽管遭人忌恨，但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体现了老派检察官的那种气质，每逢法官宣布被告无罪时，他就感到痛苦，他对待任何人，不论贫富，都是不公道的，他光棍一条，不受一点诱惑，从来没有碰过女人。从职业上来说，这些都是他的极其不利的方面。他觉得犯罪分子都是不可思议的人，简直都是一些恶魔，见了这些犯罪分子他就勃然大怒，他简直成了一个顽固的、收买不了的道学派的遗老，正如他自己激昂而又怨恨地形容过的那样，他是“宽大无边的司法界泥潭”里的砥柱。现在，他也感到十分愤激，特别是因为被杀的人以及凶手他全认识。

“局长，”他气愤地叫了起来，一只手里依然拿着餐巾，“人家说这场谋杀案是柯勒博士干的！”

“没错，”警察局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可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呀！”

“柯勒一定是疯了，”警察局长一面回答，一面在死者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点起一支他一直抽的巴夏诺牌雪茄烟。检察官用餐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从邻桌拉来一张椅子，也坐了下来，致使这位非凡的死者置身于两个大块头官员的中间，趴在他自己吃的盘子上。他们就这样等待着。饭店里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在吃饭了，大家都呆呆地看着这几个幽灵般的人。只是在一群大学生进来时才乱了起来。这些大学生一面唱着歌，一面占据了饭店的一个角落，他们没有立刻发现这儿发生的情况，还在起劲地继续唱着，后来才尴尬地静了下来。终于，赫伦少尉带领谋杀案侦缉小分队的人赶到了。一个警察拍着照片。一个法医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同来的一个区检察官请求耶麦林谅解他来到现场。这时，只听见他们低声地吩咐着，指挥着。死者被抬了起来，脸上尽是菜卤，络腮胡子里残留着鹅肝和绿色的四季豆，尸体放在担架上，抬到救护车里。艾拉在被允许清扫的时候，她才在打翻的土豆炒肉片里发现了一副金架无边眼镜。接着，那位区检察官便审问第一批证人。

可能的对话，其一：女招待们又活跃起来，顾客慢吞吞地迟疑不决地重新坐了下来，有几个又开始吃起来，首批记者也闻讯赶到了。这时，检察官同警察局长被人领到厨房旁边的储藏室里去谈话。检察官要单独地跟警察局长交谈一下，不愿意有证人在场。检察官认为，一定要组织并举行一次严肃的审判。他们两人站在堆放面包、罐头、油瓶和面粉袋的货架旁边，谈的时间不长，话又很不投机。据警察局长后来向议会所作说明，检察官主张动用大批警察。

“那又何必呢？”警察局长表示异议，“柯勒那样的人犯了罪是不打算逃跑的。我们完全可以不动声色地到他家里去逮捕他嘛。”

---

“耶麦林”在德语中读音近似“糟糕的人”，故有此笑话。——译注

因为没有任何第三者亲耳听到检察官与警察局长的对话，施佩特律师只能根据各种迹象加以推断，因此称之为“可能的对话”。——译注

耶麦林也不甘示弱，“我总可以指望，您能像对待任何别的犯人一样去对待柯勒吧。”

警察局长没有吭声。

“柯勒是本城最有钱和最有名望的人士之一。”耶麦林继续说道，“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是我们神圣的义务（这是耶麦林最爱用的辞令之一），我们要竭力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我们要袒护他。”

“避免不必要的开支才是我们神圣的义务。”警察局长慢条斯理地说。

“不来个全城戒严吗？”

“我不想这样做。”

检察官呆呆地注视着身旁的切面包机。然后说道：“您跟柯勒是好朋友，”语气里倒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冷静地说说而已，“您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客观的态度可能受到影响吗？”

警察局长沉默着，然后从容不迫地说：

“柯勒这桩案子由赫伦少尉来受理。”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场闹剧。

赫伦是个讲究实干的人，他虚荣心重，干起事来很鲁莽。他让电台播送7点半新闻节目以前插播一份州警察局的紧急通报，这么一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不仅所有的警察进入戒备状态，而且全城的居民也被惊动了。警车全速出动了。结果他们在柯勒的别墅里扑了个空（柯勒丧偶，女儿是瑞士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上班去了，女厨师又去看电影了）。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柯勒逃跑了。装有无线电报话机的警车满街搜寻着，边界哨卡和外国警方也接到了有关通报。所有这一切行动，单单从技术上来看，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忽略了警察局长已经料到的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是在寻找一个并不想逃跑的人。因此出现了使他们颓丧的事：刚过8点钟，从飞机场来的消息说，柯勒把一位英国大臣送上飞机后，驾着他的罗尔斯-劳依士牌汽车从容不迫地回城了。深深受到刺痛的是检察官。他，因国家机器的威力强大而感到放心，又因击败了那个可恨的警察局长而感到高兴，他一面捋着修剪过的灰色的小胡子，一面惬意地把身子往后靠去，准备欣赏莫扎特的《后宫的拐骗出走》的序曲。正当乐队指挥蒙德沙因举起指挥棒的时候，那位受到警方动用现代化装备搜捕的柯勒，却偕同本城一位最有钱的、对此事毫不知情的寡妇，从宽敞的音乐厅的中间过道，经过观众席一排排挨得很紧的座位，径直走到前排座位上，只见他镇定自若，跟平常没有两样，表情自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而且就在耶麦林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还跟这位惊慌失措的检察官握了握手。观众骚动起来。有人在窃窃私语，也有人在吃吃嘻笑，一片嘈杂的声音。因为乐队里的人也发现了这一情况，所以演奏的序曲也就乱了分寸，有个吹双簧管的甚至好奇地站了起来。指挥蒙德沙因不得不停了两次又重新开始。检察官被搞得糊里糊涂，以致他不仅在演奏序曲的过程中，而且在接着演奏约翰尼斯·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过程中，都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虽然在钢琴家演奏时终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又不敢打断布拉姆斯的乐曲，因为他对文化事业一向是极为尊重的。他深感痛苦，他恨不得出来干预，但现在为时太晚了，他只好等到场间休息时再说。场间休息时，他采取行动了。他从好奇地簇拥着州议员的人群里挤了出来，朝电话间跑去，可是又不得不跑了回来，向一个管理衣帽间的女人换了点硬币。他打电话给警察局，找到赫伦少尉，于是大批人马飞速赶

来。可是柯勒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在酒吧间里，还请那位寡妇喝香槟酒。而且他又一次走了鸿运，音乐会的下半场竟在警察快要到来之前开始了。耶麦林和赫伦只好在紧闭着的大厅外等候着。里面在演奏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乐，乐曲长得没完没了。检察官心急如焚，拖着沉重的脚步徘徊着。女引座员好几次提醒他，要他保持安静。他简直被看成一个野人。他诅咒整个浪漫派音乐，诅咒布鲁克纳。里面刚刚开始演奏柔板乐章。等到第四乐章终于演奏完毕的时候，场内爆发了掌声——掌声似乎也不愿停止——观众通过挨个儿站着的警察组成的夹道涌向场外，柯勒却没有出来。原来他已经走掉了，是警察局长请他从演员出入口，上了他的汽车，跟他一起上警察局去了。

可能的对话，其二：在警察局，警察局长把柯勒带向自己的办公室。在汽车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讲，现在，警察局长在前，柯勒在后，顺着空荡荡的灯光暗淡的走廊往前走。到了办公室里，警察局长默默地指了指一张舒适的皮沙发，然后插上门闩，脱了上衣。

“请不要拘束，”他说。

“谢谢，我不会感到拘束的，”柯勒一边坐下，一边回答说。

警察局长在两张沙发之间的桌子上放了两只酒杯，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来。“这是温特喝的香白丹酒，”他解释说，给杯子斟上酒，也坐了下来，他独自出神片刻，用手帕仔细地揩了揩头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亲爱的伊萨克，”他终于开口了，“看在老天爷的面上，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开枪杀死那头老蠢驴？”

“你指的是——”柯勒略微迟疑地说道。

“你难道不明白你干了什么事吗？”警察局长打断他的话问道。

柯勒悠然自得地喝着杯子里的酒，没有立即回答，反而带着几分惊异，带着几分讥讽的神色打量着警察局长。

“当然，”他说，“我本人当然明白。”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打死温特呢？”

“噢，原来是这样，”柯勒说道，他好像在回忆什么事，接着又笑了起来，说，“噢，就这么回事。蛮不错。”

“什么事蛮不错？”

“整个事情。”

警察局长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他感到迷惘，感到恼怒。与他相反的是，这个凶手倒很轻松愉快，好几次独自笑了起来，似乎以一种叫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在自得其乐。

“好了，你出于什么动机杀死那位教授的呢？”警察局长再次执拗地问他，紧追不舍，一边又在揩拭脖子里和额头上的汗水。

“没有什么动机，”柯勒供认说。

警察局长惊奇地注视着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又斟上一杯，酒都泼出来了。

“没有动机？”

“没有。”

“这可是太荒唐了，你一定是有动机的，”警察局长不耐烦地大叫起来，“这可太荒唐了！”

“我请求你履行自己的职责，”柯勒说着，小心翼翼地喝干了自己的杯

子里的酒。

“我的职责就是逮捕你，”警察局长说道。

“就是嘛。”

警察局长大失所望，他喜欢把什么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的。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他认为谋杀案都是不幸的案件，对于不幸的案件，他是不作道义上的判决的。但是作为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人，他必须了解谋杀的动机。在他看来，一桩没有动机的谋杀不是有伤风化，而是违反逻辑，因此这种事是不存在的。

“我最好把你送进疯人院去进行观察，”警察局长恼怒地说道，“你说你是无缘无故地杀了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我一点病也没有，”柯勒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要我打个电话给斯迪西-劳埃平吗？”警察局长建议道。

“为什么呢？”

“你需要有个辩护律师呀，我的老天爷。你需要找一个现有的最出色的辩护人，而斯迪西-劳埃平就是最好的一个。”

“我觉得有个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就行了。”

警察局长不再坚持了。他解开衣领，深深地呼吸着。

“你一定是疯了，”他喘着气说，“把手枪交出来吧。”

“什么手枪？”

“你打死那个教授所用的手枪呀。”

“我没有枪，”柯勒说着站起身来。

“伊萨克，”警察局长恳求道，“我希望，你还是免掉我们去搜你的身吧！”

他还想给自己斟酒，可是酒瓶已经空了。

“该死的温特喝得太多了，”警察局长气呼呼地说。

“你还是叫人把我带走吧，”凶手建议说。

“那就随你的便，”警察局长回答说，“只好对你不客气了。”他也站了起来，拉开门门，然后撤了撤电铃。

“把这个人带下去，”他对走进门来的警察说道，“他被捕了。”

事后产生的怀疑：我把这些对话重新搬出来，目的并不是要写一部小说——之所以称这些对话是“可能的”，是因为我当时并不在场。我这么做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需要，把发生过的事尽可能如实地描绘出来而已，这样做其实并不难。司法界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幕后进行活动的，可是，即便是在幕后，那些表面上似乎是一清二楚的职能也变得模模糊糊了，角色互相交换了，或是重新分配了，在公开场合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幕后却进行着对话，腔调完全变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并且收入档案的。有的情报被传出去了，有的被隐瞒了。比方说，警察局长对我总是很坦率，他侃侃而谈，自愿把整个情况讲给我听，甚至常常超越权限，让我查阅一些重要的案卷，他对我真够朋友，现在也是如此。就连斯迪西-劳埃平也对我十分友好，甚至在我早已和他不在同一营垒里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直到现在才转了风向，然而，这可能是出于别的原因吧。因此，上面所写的对话我就不必去虚构了，只需加以拼凑还其本来面目就行了。在最糟的情况下也只要猜想一下就行了。

不，我的“创作”困难是在别的方面。固然我很清楚，我筹划谋杀柯勒

和我自杀，这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充分的证据，叫人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然而，在我落笔写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一种荒唐的希望，要拿出这样的证据来。比如说吧，我要揭开柯勒的手枪怎么会消失的谜。那支行凶的枪一直没有找到。本来这不过是个枝节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审判。凶手是肯定的，当时有足够的证人在场，那就是戏剧大饭店的服务人员，那些顾客。警察局长在审查开始的时候费尽心机要把这支手枪找出来，他不是为了给柯勒提供罪证——这完全没有必要——只是按规矩办事而已，所以说，这是警察局长侦缉工作的一种作风吧。可是，警察局长却没有找到枪，这实在令人不解。柯勒博士从戏剧大饭店到音乐厅所走过的路线，大家都是知道的，每个细节都可以摆得出来。他在开枪打死那位正在吞着法式牛排的教授以后，直接上了自己的罗尔斯-劳依士牌汽车，坐到那位正在梦见威士忌的英国大臣的身边，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到了机场，凶手和大臣离开车子，司机（他还蒙在鼓里）也没有发现什么手枪，就连匆匆赶来迎接他们的瑞士航空公司经理也没有发现。在候机大厅里，他们聊着天，理所当然地欣赏了那座候机大楼，确切地说，欣赏了大楼的内部建筑，然后悠闲地朝飞机走去，柯勒轻轻搀住那位大臣。在隆重告别以后，柯勒随航空公司经理回到大厅，还朝缓缓滑动的飞机回过头去看了一眼，然后到报亭买了《新苏黎士报》和《全国日报》，穿过大厅，仍旧一直和那位经理在一起，但不是去欣赏大厅内部的建筑，而是上了等候着的汽车，从机场开到曹列克尔大街，在那个还毫不知情的寡妇门前揷了两下喇叭，她马上就出来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又从曹列克尔大街直接来到音乐厅。根本没有手枪的影子，寡妇也没有看到什么。手枪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局长叫人对那辆罗尔斯-劳依士汽车进行彻底的搜查，然后搜查柯勒走过的那段路，以及他的那幢别墅，女厨师的房间，自由街上那个司机的住处等等。结果一无所获。警察局长又向柯勒追问几次，甚至对他破口大骂，轮番地提审他，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柯勒能出色地顶住，只是接替审讯的预审法官霍恩努赛病倒了。后来检察署提出抗议，说警方以及预审法官不必过于死板，为手枪的事折腾不值得，继续追查下去也是白白浪费钱财，警察局长和预审法官不得不就此罢休。而失踪的凶器直到后来，在斯迪西-劳埃平经办此案时，才在案中起重要作用。而现在我觉得有希望找到凶器，那当然是另一码事了；找到凶器，这是我冒险行动的难点之一。我虽扮演了伸张正义的角色，但可怜得很，除了书写，我没有别的本事。当我隐隐发现有可能用别的方式入手，以另外一种方式采取行动时，我就丢下我的赫尔麦斯牌小打字机，奔向自己的汽车（又是大众牌汽车），开动起来，飞驰而去。那是在前天早晨，我去找瑞士航空公司的人事处处长。我觉得有了主意，有了一个解开这个谜的极好的办法。我像喝醉了酒似地开着车子，像出现了奇迹似的，我安然无恙，别人也没有出事地到了机场。可是那个人事处处长不愿向我提供情况，连见都不见我。回来的时候，我放慢了车速，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时，有个警察向我嚷道，我是不是要推着我的汽车在城里走。我又一次感到一筹莫展。再次委托私人侦探里恩哈德进行调查吧，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要价太高，而且如今事已如此，他也不感兴趣了，谁愿意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这样，除了找柯勒的女儿海伦娜本人进行调查，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打电话去，回答说她不在家，“进

城去了”。我于是出去碰碰运气，步行去找，心想她不是在饭店里，就是在书店里，结果真的找到她了，我径直向她跑了过去，遗憾的是，她正跟斯迪西-劳埃平坐在一起，在一家咖啡馆前喝意大利咖啡。我是在最后一瞬间才看到他们两个人的，那时，我已站在他们的跟前了。我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我只要找她一个人，同时我又感到愤怒，因为斯迪西-劳埃平和她坐在一起，不过，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他们两个人恐怕早就睡到一块儿了，杀人凶手的千金小姐和搭救她父亲的恩人嘛，这位女的曾经是我的情人，这位男的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

“对不起，柯勒小姐，”我说，“我想跟您谈一谈，跟您单独谈。”

斯迪西-劳埃平递给她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上一支，点上火。

“你要我回避一下吗，海伦娜？”他问道。我恨不得把这个大律师一拳打倒在地。

“不，”她回答说，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只是把烟从嘴上拿下来，“他可以谈他的。”

“好的，”我说着，拖过一张椅子，叫了一杯浓咖啡。

“我尊敬的司法天才，您有什么事呢？”斯迪西-劳埃平随意地问道。

“柯勒小姐，”我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我冒昧向您提个问题。”

“请提吧，”她又抽起烟来。

“您提呀，”斯迪西-劳埃平说。

“您父亲送那位英国大臣上飞机的时候，您当时还是空中小姐吗？”

“当然。”

“您也在那架载着那位大臣回英国去的飞机上？”

她按灭了香烟。

“可能吧，”她说。

“谢谢，柯勒小姐，”我说完，站了起来，打了声招呼，撇下那杯浓咖啡，就走了。我现在知道那支手枪是怎样失踪的了。说来非常简单，也很可笑。那个老东西在罗尔斯-劳依士汽车里，坐在那位大臣身边时，就把手枪塞进大臣的大衣口袋，在飞机上，他的女儿海伦娜又把手枪从大臣的大衣口袋里取了出来。她作为空中小姐，做这种事是轻而易举的。可是我在弄清了这种情况以后，感到空虚，感到疲倦，我踉跄在码头，沿着单调的湖边徘徊，在我的右边，天鹅和帆船轻轻地在湖面荡漾，我漫无目的地踽踽而行。如果我的想法对头——肯定是对头的——，那么海伦娜便是谋杀案的知情人了。跟她父亲一样，她也是有罪的。她背弃了我，她应该知道我的做法是对的，可是，她父亲已经赢了。她父亲胜我一筹。跟海伦娜斗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她已经横下一条心，因为这场斗争已成定局。我不能迫使她去出卖她的父亲。我能在她身上激发哪一点情操呢？理想吗？哪种理想呢？真理吗？她把真理隐瞒了。爱情吗？她已背叛了我。正义感吗？那她会问我：替谁伸张正义呢？替一个当地的学术泰斗吗？骨灰是不会抱怨什么的。替一个软绵绵的不说真话的好色之徒吗？他也火化了。替我？不值得花费力气。正义并不是什么私物。她会问我：正义有什么用呢？是为了我们这个社会吗？那样只

---

这里指的是温特教授。——译注

这里指的是贝诺。——译注

不过增添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罢了，只不过多了一点闲谈的材料罢了，到后天这些就过时了。我经过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是：对海伦娜来说，正义感的价值抵不上她爸爸的重要性。对一个法律家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泄气的。难道还要我把亲爱的上帝拉进来帮忙吗？他肯定是一位和和气气，又默默无闻的先生，他自己要生存都很困难的。而且，他要办的事又何其多呢！（宇宙的直径按照德西特的算法，——算法旧了，也算得太紧了——以厘米为单位：一个1的后面加上二十八个0。）可我现在需要的，是坚持到底，振作精神，将哲理强咽下去，把反对社会、反对柯勒、反对斯迪西-劳埃平的斗争继续下去，同时还要跟海伦娜进行斗争。思想具有虚无主义特征，它使价值观念发生动摇，所以我要抖擞精神，正视现实生活，于是我精神焕发地转过头来走向城里，这时候，湖水、天鹅和帆船都在我的左边了。我从一对对情侣和一些退休老人的身边走过，沐浴在夕阳的余辉里，心情万分舒畅，后来我喝了整整一个晚上的克莱夫纳酒（这酒我实在受不了）。大约1点钟，我和一个虽然声名狼藉但姿色出众的女人潜入她的寓所，这时风化警察施图贝尔正站在公寓门口，记下了地址，彬彬有礼地鞠躬，那姿势想必是含有讽刺意味的，这是叫一个堕落的律师出丑呀。真倒霉。（然而那个女人很大方，她觉得和我在一起很荣幸。她说，我可以下次付钱给她，我怕我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坦白地对她说，下次我也未必付得出，我对她招认说，我只不过是一名律师，她一听，就说要雇我当她的法律顾问。）

风土人情：对此作些说明是免不了的。叙述一件谋杀案，也应同时说明一下周围的环境，全年的平均气温，地震的平均发生率以及人间、气候等。万物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这个一会儿被说成是“国家”，一会儿被说成是“祖国”的企业，建立的时间大约已有二十多代了，这是粗略的计算。地理情况：最初的地质构造主要是石灰岩层、花岗岩层以及磨砾岩层，尔后，又有了第三纪的东西。气候：还算过得去。历史情况：起初还可以，后来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起来，就发生了许多动用武力的事，需要进行拼杀，于是就拼命格斗。攻破骑士领地、修道院和城堡，就像撬开保险柜一样。大肆掠夺，获取战利品，对俘虏是格杀勿论。厮杀前进行祈祷，厮杀后大摆酒宴，纵情狂饮。战争带来不少油水。可是后来遗憾的是又发明了火药。霸权政策遭到越来越大的反抗。使用中古时代的长柄斧和带刺的棍棒厮打受到了限制。肉搏战的战士由远方抓来的人充当。过了不到八代，就发生了那次著名的撤退事件。从那时起，又经历了七代相当野蛮的时期，一方面人们互相残杀，农民受到奴役（人们对自由从来就不是那么认真的），为宗教互相搏斗，另一方面人们大张旗鼓地推行雇佣军制度，谁出的价高，就给谁卖命，保护诸侯，反对平民，保护全欧洲，反对自由。后来，终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那些遭人恨的近卫军在巴黎一起被枪杀，他们勇敢地站在丢失了的阵地上，效忠仁慈上帝的腐朽的制度，而一名贵族军官却在一个阁楼里安然地赋诗：“森林一片斑斓，收割了的田野一片金黄，秋天来到了人间。”过了不久，拿破仑把那些大老爷以及附属国的坛坛罐罐砸了个精光，一个国家遭到了失败也是好事。民主的萌芽，新的思想出现了，有个佩斯塔洛齐，他是个贫穷、衣衫

---

荷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译注

指瑞士联邦。——译注

佩斯塔洛齐（1746—1827），瑞士教育家。——译注

褴褛而且怀着炽热的感情的人，在国内四处奔波，遭到一个又一个不幸。尔后社会风气来了个急剧的转折，面向商业和手工业，而且带有相应的理想。工业开始普遍发展，铁路铺设起来了。虽然资源贫乏，要进口煤炭和矿砂，并进行加工处理，但是到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财富在增多，虽然没有浪费，可是国势也不见起色。节约被树为最崇高的道德，银行建立起来了，开始时步子很慢，借债被看作是丢丑的事。过去士兵是出口商品，现在破产的人可以出国了：因为在我们这儿谁要是破了产，到了大洋彼岸去就有了好机会。样样东西都得要赚钱，而且也能赚钱。甚至连大得无法估量的乱石堆和瓦砾，冰山和峭壁也可以获利，因为自从人们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丽，任何一个蠢才都会觉得，到寂静的山里去是件风雅的事。于是旅游业也发展起来了，这个国家的理想越来越实际了。此外，人们坚决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使得任何可能出现的敌人都会感觉到，不去冒犯反而对自己更为有利。这是一种本身不讲道德的，可是实际上对身体十分有益的生活态度，采取这种生活态度固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伟大，但足以说明此人具有了不起的政治头脑。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国家反而繁荣起来，它在野兽之间耍尽花招，从而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幸免于难。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了。

当前（公元 1957 年）的局势：人民的大部分，生活上几乎都是无忧无虑的，有了保障，有了保险，教堂、学校和医院都以优惠价格供人使用。人死了火葬，必要时也可免费。生活四平八稳，可是那些往事却在动摇我们这座建筑，震撼建筑的基础。多得的人，就怕多失。犹如传说中的骑士在骑马越过博登湖之后的心境一样，人们在安然度过了险境以后，反而从马背上栽了下来。人们迟迟不肯把自己的聪明看成是必要的。他们过去虽然不是英雄，但还是很明智的，现在他们觉得难以忍受了，他们要插进胜利者的行列，关于英勇善战的父辈的传说又风靡起来，这些神话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危险，人们做梦思念着远古的战役，把自己想象成抗战的勇士，总参谋部的人员已经在变戏法召唤尼伯龙根世界的再现了，他们已在梦想原子武器，梦想一旦受到攻击，便出现英勇的毁灭性战斗。据他们说，军队的消亡也就会导致民族的消亡，彻底、干净和最后的消亡，而我们周围被奴役的人民使用胆识和计谋，早就懂得怎样去摆脱这些危险了。然而，可能出现的消亡却是另一个样子，是更为可笑的。人们要去捍卫的土地，却让外国人出钱买去了，经济在外国人的手里繁荣腾飞，自己人不过是在管理而已，并不能进行操纵。瑞士公民组成一个上层社会，而在这个阶层的下面，则是外籍工人：意大利人，希腊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他们挤在常常是高价出租的房子里，他们省吃俭用，埋头苦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人家轻视，常常还是文盲，奴仆，甚至在他们许多主人的眼里，是劣等人，而他们一旦成为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那么总有一天会要求得到他们并不苛求的生存权利，他们会了解到，这个被称之为“国家”而其一半已被外国资本所收买的“企业”，只是靠了他们这些外籍工人才能维持的。人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同时目瞪口呆地看到了这一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参加了大的买卖，这时候它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公众的反应：柯勒的谋杀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影响可想而知：由于我们将政治非政治化了——在这方面我们是面向未来的，也只有有

这方面我们是很现代化的，真正是开拓性的，未来的世界要么就是没落，要么就是瑞士化——人们对政治没有什么期望，不期望出现奇迹，不期望有新的生活，只是过些时候，也许希望有一些更好的马路罢了。即使从生物学观点来看，我们这个国家的行为也是十分令人高兴的，它在生男育女方面是很克制的（我们人不多是我们一大优点，而靠了外籍工人的功劳，我们这个种族得以慢慢改善，这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因此大家对每一个能够打破老框框的做法都是十分感激的，对任何一件变换口味的事都是十分欢迎的，更何况一年一度的行会游行凭那种呆板的庄严形式根本无法取代已经取消的狂欢节。因此，柯勒的行动方式起到了使人精神一爽的作用，人们在非正式场合能够为一些事感到开心，而在正式场合他们对这些事是要表示极其愤慨的。就在温特教授去世的那天晚上，已经到处流传这样的说法：柯勒使温特教授没法再发表下一次的8月1日的演讲，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个新的名誉博士学位。据说这话不是出自市长之口，就是出自一位高级市政官员之口。就连警察遭遇的不幸也几乎没有引起更多的公愤，因为幸灾乐祸的情绪实在太大了，本城的人跟警察的关系紧张得很，我们这个城市早就名不符实了。这个城市一跃成为一个大都会后，它还想保留原有的亲切感和市民勤奋的美德，这些是它过去和现在都自鸣得意的内容，它也想在不具有人性的事物中保持人性，并跟传统连在一起，虽然这些传统早就荡然无存了。城市不管怎样想尽办法总斗不过时间，时间要拿它怎么样就怎么样。因而如今我们既不是我们过去的样子，也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与当前的时代格格不入，我们不愿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人，由于固执，我们从来不把必须要做的事整个做完，而只是做一半，这已是最好的了，就连这样也是迫不得已的。这种困境的表现就是警察职权的增大；因为谁与当前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谁就得受管制。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了，警察无孔不入，要管社会风化，要管交通秩序（这两方面现在都是一塌糊涂）。因此警察不是保护人的象征，而是欺压人的象征了。不谈了。我已喝醉酒了。那个公寓女人刚才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我的办公室现在又在镜子巷的阁楼里了），她需要寻求法律保护。我建议她去买一条狗。这样，她可以带着狗同自己在夜里外出两次（这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建议，耶麦林咬牙切齿地勉强同意了）。

检察官耶麦林：他憎恨州议会议员柯勒，柯勒无所谓的态度叫他实在受不了。他永远不能原谅的是，这个柯勒竟然在音乐厅里同他握手。他是那样地恨柯勒，以至自己要同自己过不去。他的恨和他的正义感之间紧张对立，使他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在考虑着，是不是由于自己有不公正的嫌疑不去经手这个案子，后来他又希望柯勒会拒绝他担任此案的检察官的职务。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去向大法官耶格来纳尔倾吐苦衷。大法官向预审法官试探口气，预审法官又向警察局长试探口气。警察局长只好唉声叹气，叫人把柯勒从区属监狱带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这样谈话可以舒畅一些。柯勒情绪很好，他们喝的白马牌酒味道好极了。警察局长又向他提起斯迪西-劳埃平，说那个由官方指派给他的辩护人是个臭名远扬的草包。柯勒回答说，这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警察局长终于说出了耶麦林的顾虑。柯勒保证说，他认为耶麦林当他的起诉人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他的这个回答传到耶麦林的耳朵里，气得耶麦林哇哇乱叫起来，说要叫州议员柯勒尝点厉害，他要给他判个无期徒刑，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态度使得大法官差点要撤检察官的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害怕耶麦林会气出脑溢血来，耶麦林的健康状况的确不

是顶好。

诉讼情况：诉讼是在高级法院里进行的，共有五位大法官参加，时间虽说已是这场凶杀案发生的一年以后，又是在3月里，可是以我们这里的情况而言，可说是早的了，可以说是再快也没有的了。罪行是在大庭广众中发生的，谁是凶手，这是用不着去证明的。只是关于凶杀的动机还没有弄出眉目来。看起来似乎没有动机。从柯勒嘴里盘问不出任何东西。人们面临着一个不解之谜。即便有关法官对被告进行过细的追问，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线索。凶手与被害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好得无可指摘的，两个人在事业上并没有任何瓜葛，忌妒是绝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任何猜测都是站不住脚的，鉴于这种奇怪的事实，凶杀案只能有两种解释：柯勒不是患了精神病，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怪物，一个纯粹以杀人为乐的凶手。由官方指定的辩护人吕梯就是持第一种观点，检察官耶麦林持第二种观点。看看柯勒的外表，就知道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因为柯勒给人的印象是他完全正常。而柯勒过去的光荣历史又使第二种观点不能自圆其说。能当一位政治家兼经济界领袖，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在品德上是很高尚的。此外，柯勒热心于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的倾向素来受到人们的颂扬。然而，这次诉讼是耶麦林大显身手的一次诉讼。仇恨、耻辱以及别人对他开的玩笑都在激励着这个老资格的司法工作者，他的那股无可抗拒的活力是那些大法官所望尘莫及的。平庸无能的吕梯无计可施。耶麦林形容柯勒是个残暴不仁的家伙，他的这个观点占了上风，使得公众为之愕然。五位大法官认为要来个杀一儆百，连耶格来纳尔也作出了让步。人们又一次竭尽全力来挽救道德的门面。判决书上写道，人民不仅有权要求金融界和政界的头面人物具有在品德上无可非议的生活作风，而且也应该看到这种作风已经得到发扬。这位州议会议员柯勒被判二十年徒刑。这不算是无期徒刑，只是实际上等于终生监禁。

柯勒的态度：这位已经定罪的凶手，他的威严态度引起了每一个人的注意。他走进法庭时，样子完全像是度假休息归来似的。因为预审期间，他主要是在博登湖畔的一家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虽说是处于不很严格的警方控制之下，可是看管他的任务是由跟他很要好的朋友哈贝萨克教授担任的。活动是允许的。打高尔夫球时，提球棒袋的是一名乡村警察。如今柯勒终于来到州法院，他拒绝任何优待，要求“受到跟黎民百姓一样的待遇”，审判一开始，情况就很独特。这位荣誉博士病倒了，患了流行性感冒，体温升到三十九度，然而他拒绝将审判延期，也拒绝坐病人轮椅出庭。他面对五位大法官郑重其事地宣告（记录如此）：“我来到这儿，是让你们凭着良心，按照法律，对我进行宣判。你们都知道我被控的是什么罪行，很好。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判决，我的任务就是服从你们的判决。不管宣判结果如何，我都会认为它是公道的。”判决书念完之后，他感动地表示了谢意，特别强调了他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他也向耶麦林表示感谢。大家听了他讲的那番充满感情的话，与其说是受到感动，倒不如说是感到好玩。人人都有这种印象，司法界在柯勒这桩案子上，算是获得了一个罕见的样品。当他被押下去时，这桩虽然并非已经完全澄清，但也相当明显的事件好像也就宣告结束了。

我当时以及如今的情况：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发生事情的来历的一般情况，很令人失望。我知道，这件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事件，只对当时在场

的人，以及对消息灵通的人才具有吸引力，这件事导致流言四起，引起多多少少有些无聊的笑话，同时让人理所当然地观察到西方国家和民主制度的危机。这是一桩刑事案件，那些法庭记者尽心尽力加以报道，享有世界声誉的地方报纸主编（柯勒的一个朋友）大加评论，它是够几天用的谈话材料，是一件几乎不越出我们这座城市范围的地方奇闻。要不是它背后隐藏着一个计划的话，理应很快被人们遗忘的。我后来在这个计划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真算我倒了霉，尽管我得说我一开始就预感到此事凶多吉少。然而在这里，我得把我在柯勒的官司结束后我自己的情况作一些补充说明。我的境况当时就不是十分令人欣慰的。我设法自立门户，在镜子巷一个乌艾特利虔信教派的会所楼上，开了一个事务所。这是有三扇窗户的倾斜的阁楼间，里面一张写字桌，写字桌前配上几张椅子，墙上贴着《观察家》杂志的彩色画，至于这些画上有些什么东西，我还是不说为好。房间里有一架失灵的电话。房东拆了两个阁楼间的隔墙，堵死了其中一扇门才形成了这样一个隔间。在第三个阁楼间里，住着乌艾特利教派创建人和传教士西蒙·贝格尔，他外貌就像尼克劳斯。我和他合用走廊里的厕所。我的事务所所在的地点非常富有浪漫色彩，毕希纳和列宁都曾在附近住过。从我的房间里可以俯瞰旧城的烟囱和电视机的室外天线，令人赏心悦目，产生亲切感，我有一种在故乡独居斗室的舒适感，同时产生了培育仙人掌的乐趣。然而，这个地点对一个律师来说，可想而知是并不适宜的，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我这个斗室，人家也不容易找。房子里面没有电梯，楼梯既陡，走起来又咯咯作响，走廊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应当补充一下：当时，我这个事务所虽然地点不利，但我还有雄心壮志，总想站稳脚跟，有所前进，当一个守法的公民。今天，我已成了一个堕落的“野妓专家”，这个隔间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住所。虽然房间由于添了一张长沙发，变得异常狭小，可我还是能在里面睡觉，玩女人，居住，甚至也在里面烧饭。夜间，耳边回荡着乌艾特利教徒吟诵赞美诗的声音：“反省反省吧，人和基督徒，拯救你的灵魂吧，拯救其它一切可以拯救的东西。使你变得清清白白。”至少勒基是感到满意的，他是那个有漂亮的身材、干我们当地这种行当的女人的保护人，他正是一半出于好奇心，一半出于买卖上的烦恼，来这儿登门拜访我，同时也来调查情况的。他嘻嘻哈哈地对我说，在这里才能真正松口气了。）当时我几乎没有生意，有点像是失了业一样，除了处理几件商店里的偷窃事件、办理征收款项的事务以及（受司法界委托）办理某个牢狱犯人体育团体的章程而外，我无所事事，不是在码头的绿色长凳上闲坐，就是在高雅咖啡馆里下下棋（对手是来塞尔，我们两人开局总是用西班牙式的下法，大多以和局告终），或者到妇女协会经营的菜馆里吃点东西，味道虽然不怎么样，但也无损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柯勒来信向我提出要求，要我到R地的监狱里去探望他，我就难以拒绝了；我对他的要求捉摸不透，我想象不出这个老东西要在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身上打什么主意，同时我对这个老家伙的名望也畏惧三分，不过我把这些隐隐约约的畏惧感觉统统排除了，也必须排除。我去探望他是正当的事。这是我们职业道德的成果。不勤奋就不会有收获。鸟儿要活就要吃，不吃就要死。因此，我便驱车去了。（当时开的还是大众牌汽车。）

---

瑞士十五世纪的神秘教徒和隐士。——译注

这里指的是某个妓女。——译注

监狱的情况：汽车行驶大约二十分钟，就到达这座监狱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平坦的山谷，这个村子就同城市郊区一样，令人乏味，满眼看到的是钢筋混凝土。几座工厂，远处还有几片树林。再说，不见得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座监狱，四百名犯人还不到全城居民的千分之一呢。然而星期天出城来闲逛的人总应该看到过这个监狱的，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许把它当作是啤酒厂或者是疯人院。走过戒备森严的大门，站在迎面的主楼前，人们几乎会认为，这是一座设计得很蹩脚的红砖教堂或者礼拜堂呢。门房那一张张和善温顺的面孔，真让人觉得好比是在救世军里见到的一样，他们也给人以一种模糊的印象：这儿是教堂。这儿到处充满一种虔诚的宁静的气氛，叫人感到非常舒适，人们到了这阴凉的半明半暗的地方，虽然也许有点压抑，但总不免要打哈欠。司法界的人个个都是懒洋洋的，这也不奇怪，因为象征司法公正的这位女士的两眼是永远蒙住的。另外，这里也有慈善以及给人心灵解救的迹象，一位留着大胡子的教士出现了。他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接着是监狱神父出现了，后来又出现一个戴眼镜的女心理学家，人们感到这里有意在拯救人的灵魂，叫人奋发向上，只是在那条自然很荒凉的走廊的尽头，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世界，然而装着铁栅栏的玻璃门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还有那两个穿便服的男人，他们老老实实，同时板住脸，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门外的长凳上等候着，给人以几分疑虑，叫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的感觉。可是玻璃门一打开，你跨过那道神秘莫测的门槛，深入到最里面，无论你是一个委员会的感到有点尴尬的委员也好，还是由司法部门送来的犯人也好，你都会惊异地体会到，这里是一个规矩极其严格，但也不是不人道的严父般的境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幢宏伟的五层的长廊大楼，从一处俯瞰下去，绝不是阴沉沉的一片，而是从上到下一片亮堂堂的，当然啰，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笼子世界，铁栅栏世界，不过它并不缺少亲切感和个性，因为在这儿你可以通过一扇半开着的牢房小门，看到涂成天蓝色的牢房天花板和一株绿色的室内种的菩提树，你又会发现一些身穿褐色囚衣的笑嘻嘻的感到满意的人影；这里犯人的健康状况极佳。修道院式的有规则的生活方式，较早熄灯安睡，简单的伙食等等，显示了奇妙的效果。图书馆除了有游记和传记，除了有两个教派的修身故事外，还提供尽管不是最新的但却是经典性的书籍。监狱管理部门每周还为犯人放映一场电影，这个星期就放映了电影《神童》。听布道的人次，百分比大大超过围墙外面进教堂做礼拜的人。这儿的生活缓慢而又有规则。犯人得到适度的对待与款待。对犯人的表现进行评分，表现得好就有好处，可以减轻罪过，当然只是对于那些要坐十年牢的，或者只坐很少几年牢的犯人，才是这样，对他们进行教育也是值得的。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人，那些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监狱虽然并无责任使他们改恶从善，但要减轻他们的精神负担，这都体现了这座监狱的骄傲所在，也可说体现了约束与体贴相结合。那些干了坏事叫老百姓心惊胆战的人，看守人员对他们则是敬而远之，他们是犯人中的明星，他们自己也感到是这样。较为一般的犯人，有时会产生忌妒心理，有些人扬言在刑满释放以后，要干得更彻底一些，这些情况也毋庸隐瞒。哪怕我们监狱荣获了奖牌，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呢。不过总的来说，谁不愿规规矩矩呢？从他们的职位上

---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宗旨是劝人改邪归正。——译注

这是指古罗马神话中的司法女神，她双眼蒙住，手持天平。——译注

栽了下来的达官贵人开始重新抱有希望，谋财害命的人钻研起人智学，色情犯注意到精神上的改造，他们糊袋子，编篮子，装订书本，印小册子，连那些政府要员也叫这里的缝纫组给他们定做成套衣服，刚出炉的面包在监狱里弥漫着香气，这里的面包房享誉四方，它出的香肠白面包令人赞不绝口（香肠则是外面提供的）。犯人如劳动勤奋，态度恭顺，就可以得到虎皮鹦鹉、鸽子和收音机。还有夜校可以让犯人去进修。看到这种景象使人不免产生羡慕之心，人们还突然领悟到，这个世界真是不错，可惜并不是我们的世界。

和监狱长的谈话：监狱长蔡勒请我前去，我感到意外。他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令人肃然起敬的会议桌，有电话，有卷宗。墙上钉有表格、贴满字条的布告牌，许许多多的书法横条，因为囚犯当中有许多教师，很可惜这情况在我们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办公室的窗户没有装上铁栅栏，临窗可以看到监狱的围墙以及一些草地，如果这儿不是绝对安静的话，很像是学校的校园。这里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一点声响也没有，跟养老院里一模一样。

监狱长向我打招呼，态度有点冷淡。我们坐了下来。

“施佩特先生，”他开始谈道，“您是应犯人伊萨克·柯勒的请求来探视他的。我批准了这次会面，不过您跟他谈话时，必须有一个看守人员在场。”

“我听斯迪西-劳埃平说，他同柯勒谈话并不需要有证人在场。”

“斯迪西-劳埃平，我们是信任他的，”监狱长针对我的话说道，“我这话，并不是说我们不信任您，而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您。”

“还有一点，施佩特先生，”监狱长接着说，此刻态度和蔼了一些，“在您去跟柯勒谈话以前，我想把我对这个犯人的看法跟您说说。也许这对于您是至关重要的。请您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所看管的这些人为什么关在这儿，我是不管的。这跟我没有关系。我的职责是监禁他们。我要做的就是这事。因此，我也不想对柯勒犯的罪行发表意见，不过，我得向您承认，此人倒有点把我搞糊涂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监狱长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这个人看来非常愉快呢。”

“这不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吗？”我说。

“这怎么说呢，——我不明白，”监狱长说道。

“你们这儿到底是个模范监狱呀，”我说。

“我是尽力去干的，”监狱长叹息着说，“尽管如此，但一个百万富翁十分愉快地坐在牢房里，这种事说起来总是不成体统。”

有一只肥壮的乌鸫在监狱的围墙上走来走去，似乎希望留在这儿，因为那些笼子里被精心喂养的鸟发出的叫声、歌声把它吸引住了。今天天气炎热，似乎夏天又来到人间，远处的树林的上空，浓云密布，教堂塔楼低沉的钟声从村里传来。已经9点钟了。

我点起一支巴黎香烟。监狱长把一只烟灰缸推到我的跟前。

“施佩特先生，”监狱长继续说道，“请您想象一下吧，竟有一个囚犯敢大言不惭地对您说，他认为这座监狱呱呱叫，认为看守人员都很卖力，他在这里过得挺幸福，什么也不需要。真是不可思议！我简直感到恶心。”

“那又为什么呢？”我问道，“难道您手下的看守人员不卖力吗？”

“他们当然是很卖力的，”他说，“可是应该由我而不应由一个囚犯来作出评价。一个人总不会在地狱里兴高采烈吧！”

“那当然，”我承认说。

“我火了，指示他要严格地遵守狱规，我虽然是由司法部门分配来的，要对犯人尽可能的宽容，何况天下也没有一项狱规明文禁止犯人幸福，可是，我在情绪上简直乱了套。施佩特先生，您得理解这一点。柯勒是单独监禁的，这是严厉的惩罚，坐黑牢——是啊，本来这是禁止的——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发现看守人员都喜欢柯勒，甚至简直是尊敬他了。”

“那又怎么办呢？”我问道。

“现在我也随他去了，”监狱长咕哝着说。

“您也同样尊敬他了？”

监狱长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您瞧，施佩特先生，”他说，“如果我在他那间单人牢房里坐一下，听他侃侃而谈——鬼知道，就有一股力量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听他一讲，几乎谁都会再度相信人性，相信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就连我们的神父也被吸引住了。这种情况真像是瘟疫。可是谢天谢地，过后我又恢复了常态，依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相信有什么十足幸福的人，更不相信在监狱里会出现这样的人，尽管我们想把这里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我们到底不是不通人情的人。不过罪犯毕竟是罪犯。因此，我后来又对自己说：柯勒这人可能是个危险的人物，肯定是个危险的人物。您刚从事职业工作，因此要注意不要落入他设下的圈套，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根本不要和他沾边。当然啰，我这不过是建议而已，您毕竟是律师，会自行定夺。人要是不那么摇摆不定就好了。柯勒这个人不是一个圣人，就是一个魔鬼，我认为像我现在所做的那样给您提醒提醒，是我应尽的义务。”

“多谢，监狱长先生，”我说道。

“现在我派人给您把柯勒带来，”监狱长舒了一口气说道。

委托：我是在隔壁房间里跟那个十足幸福的人谈话的。房间里的摆设和样子都跟监狱长办公室里的一模一样。当一个看守把柯勒博士带进来时，我站了起来。这个老家伙穿一身褐色的囚服，看守穿一身黑制服，看起来像一个邮递员。

“请坐呀，施佩特，”柯勒博士说道，他俨然是个主人，豁达而又和蔼。我深受感动，对他表示了谢意，坐了下来。我给他递上一支巴黎烟，他没有要。

“我不抽烟了，”他说道，“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舒服和有用两者结合起来。”

“您觉得在这座监狱特别舒服，是吧，柯勒先生？”我问道。

他惊奇地凝视着我，“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并没有在这儿坐牢啊，”我回答说。

他容光焕发。“这里好得很呀。瞧这儿有多安静！有多清静！以前搞托拉斯，那真是累死人的工作。”

“那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对他的话表示赞同。

“这儿也没有电话要打，”他说，“我身体也变好了，您瞧，”他说着，做了几个下蹲的动作，“一个月以前我还做不到的，”他骄傲地说，“我们这儿还有个体操协会呢。”

“我知道，”我说。

外面，一只肥壮的乌鸫还一直在满怀希望地走来走去，不过，也许这已不是原来的那只乌鸫，而是另外一只了。这位十足幸福的人满心欢喜地打量

着我，“我们早已认识了，”他说道。

“我知道。”

“那是在戏剧大饭店的咖啡厅里。在我一生中，那家大饭店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呢。当时您还看我打台球呢。”

“我对打台球一窍不通。”

“现在还一窍不通吗？”

“还一窍不通，柯勒先生。”

柯勒笑了起来，接着转身对那位看守说：“莫瑟，劳驾您给我们这位年轻朋友递个火好吗？”

那位看守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拿出一只打火机朝我走来。

“当然可以，议员先生，当然可以。”他也面有喜色地说。

看守重新坐了下来。我开始抽起香烟。他俩之间的那种热诚真使我承受不起。我真想打开那扇没装栅栏的大窗子，可是，在监狱里，这大概是行不通的。

“您瞧，施佩特，”柯勒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犯人，如此而已，而莫瑟是看管我的人之一，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他把养蜂的秘诀传授给我，我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养蜂人了，我还向看守布努纳尔——您也应该认识认识他——学习世界语，我和他只用这种语言谈话。您可以亲自体验到这里的好处：处处可以享受到快活，舒适，真诚，大家相处十分融洽。我已成为一个十足幸福的人了。以前什么情况呢？我的天！现在我正潜心研究柏拉图的原著，编结篮子——您需要一个篮子吗，施佩特？”

“很抱歉，不需要。”

“议员先生编出的篮子都是一等的，”看守在一旁自豪地证实道，“是我亲手把编篮子的技术传授给他的，如今他已超过我们了，真的超过了，我一点也不夸张。”

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不需要篮子。”

“遗憾呀，我的的确确想送一个给您呢，”柯勒说道。

“您太客气了。”

“作个纪念嘛。”

“不用了。”

“遗憾呀，太遗憾了。”

我不耐烦了。“我可以知道您把我叫来的原因吗？”我问道。

“当然，”他说道，“我自然要告诉您的。我倒完全忘记您是从外面来的了，忘记您急得很呢。那就言归正传吧，您当时在戏剧大饭店里曾对我说过，您打算独自开业，您也许还回忆得起来吧。”

“我现在已经独自开业了。”

“有人告诉我了。情况怎么样呢？”

“柯勒先生，”我说道，“在这儿说几乎没有什么意思。”

“这么说，情况不佳，”他点了点头，“我料想到了。您的事务所是在镜子巷的一个阁楼里，是吗？这也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

我感到厌烦，于是站起身来，“现在，您要么告诉我找我有何事，柯勒先生，要么我就要走了，”我不客气地说。

这位十足幸福的人也同样站起身来，他一下子变得很有力量，叫人无法抗拒。他的两只秤砣一样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把我推回到沙发椅子上去。

“您别走，”他咄咄逼人、几乎恶狠狠地命令我。

我只得服从。“好吧，”我身子一动也不动。那位看守也静静地坐着。

柯勒重新坐下，“您需要钱，”他明确地说道。

“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我回答说。

“我准备委托您办一件事。”

“我听着。”

“我想请您对我的案子重新做一番调查。”

我吃了一惊，说：“您的意思是，要翻案，柯勒先生？”

他摇了摇头。“如果我力求翻案，那么对我的判刑就不正当了，但是，对我判刑是正当的。我这辈子算完了，案卷已归档了。我知道，监狱长有时把我看成是一个伪君子，还有您，施佩特，大概也是这样看我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魔鬼，我毕竟是一个人，如今落到了这步田地，活着，除了一间牢房，别无它求，死时也别无它求，现在有一张床就够了，以后再要一口棺材吧，做人的目的在于思想，并不在于行动。行动是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做得到的。”

“很好，”我说道，“您所说的，都是些了不起的原则。不过，现在您要我代替您做事，把您的案子重新做一次调查。我这个傻瓜可不可以问问，您是在策划什么阴谋吧？”

“什么阴谋也没有，”柯勒博士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是在思考，我想到这个世界，想到那些人，也许还要想到上帝。为此，我需要材料，否则，我的思想就会空荡荡的。我对您的要求，不过是要您给我的研究以一点点帮助而已，您完全可以把我的这些研究看成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业余爱好。而您，也不是我请求做这类小小辅助工作的唯一的一个人。您认识那位老克努尔佩吗？”

“是那位教授吗？”

“正是他。”

“我还在他那儿学习过呢。”

“您瞧，我说您认识他吧。他现在退休了，为了不使他闲得难过，我也委托他办一件事情，他在致力于一项调查，调查一桩凶杀案的后果。他要查明一个同事死于非命所产生和正在产生的影响。太有意思了。这给他带来莫大的乐趣。这要把事实查清楚，把影响精确地测定出来。至于您的任务，我最亲爱的朋友，则是另外一类的，跟克努尔佩的研究几乎是相反的。”

“怎么回事？”

“我要您在假定我并非凶手的情况下调查我的案子。”

“我不明白。”

“没有别的，您来个假定就得了。”

“可您现在既然是凶手，这个假定就毫无意义了。”我说道。

“只有这样，假定才有意义，”柯勒回答说，“我也不是要您去调查实际情况，这事由那个忠厚的克努尔佩去做，我是要您去研究实际情况背后一切可能性当中的一个。您瞧，亲爱的施佩特，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都是了解的，为此我才坐牢的，并且编结篮子，但是对于可能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这是可以理解的，可能的情况几乎是无限的，而实际情况则是极为有限的，因

为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只有一个会变为事实。事实只不过是可能性的一种特殊情况，因此，可想而知，它也会有其它的表现形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一定要朝事实的反面想一想，以便摸索到可能的因素。”

我笑了起来，说：“这真是一个离奇的思维过程，柯勒先生。”

“在我们这儿，人们就得想出一些道道来才行，”他说，“您瞧，施佩特先生，在夜里，每当我从铁窗的栅栏里看到天上的星星时，就常常思忖，如果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是凶手，那么事实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另外一个人又会是谁呢？这些问题我都想从您那儿得到回答。我要付给您三万瑞士法郎作为酬劳，预支一万五。”

我沉默着。

“怎么样？”他问道。

“这听起来像是魔鬼协定，”我说道。

“我并不不要您的灵魂。”

“不一定吧。”

“您不会承担任何风险。”

“这倒是可能的，不过我看不透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他摇摇头，笑了起来。

“只要我看透就够了。别的您就不必操心。我要求您做的，不过是接受一个建议而已，这个建议绝对不触犯法律，而且这个建议正是我在研究可能性时所必需的。费用自然由我承担。您去跟某一个私人侦探进行联系，最好是跟里恩哈德联系，他要多少钱，就请您付给他多少钱，钱有的是，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重新考虑了这个奇怪的建议，我不喜欢这个建议，总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可又没法去戳穿它。

“您为什么偏偏要找我呢？”我问道。

“因为您对打台球一窍不通，”他不动声色地答道。

这一来，我作出了抉择。

“柯勒先生，”我回答说，“您的委托对我来说太难琢磨了。”

“您去给我的女儿一个回话吧，”柯勒说着，站了起来。

“这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拒绝接受委托，”我说着也同样站了起来。

柯勒安详地看着我，满面春风，幸福乐观。

“您会接受我的委托的，年轻的朋友，”他说，“我比您自己更加了解您：机不可失，而您正需要这个机会。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好吧，莫瑟，我们再去编篮子吧。”

他们两人走了，手挽着手，千真万确。而我也为能离开这个十足幸福的地方而感到高兴。我急忙走了。我决心不同这件事沾边，也不想再见到柯勒。

我后来还是答应了。虽然我在第二天早晨还准备回绝此事，我觉得，我的律师名声遇到了危险，即便我还没有什么名气。柯勒的建议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是闹着玩的，完全有失我的身份，他给我的用愚蠢的方式去挣钱的机会也有损于我的自尊心。当时，我还想清清白白地做人，渴望经办真正的案子，渴望有可能去帮助人家。于是我给柯勒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决定再一次告诉他。我觉得这件事就算了结了。我把信放进信袋，像每天早晨一样，9点整离开那间位于自由街的房间，按以往的习惯，我打算先到高雅咖啡馆，然后到自己的事务所（即镜子巷里的那个阁楼），再晚些时候去逛逛码头。在大

门口，我向房东太太问好，接着走到阳光下，眯起眼睛，朝消费合作社旁边的黄色邮筒望望。我只消走过去几步，非常简单就能解决问题了。生活常常像一个蹩脚的小说家所写的那样，我在这个受到燥热风影响的闷人的、对我们这座城市来说很典型的平凡早晨，如前面所说，在9点至10点之间，接连碰到了（1）老克努尔佩，（2）建筑师弗里德里，（3）私人侦探里恩哈德。

（1）老克努尔佩：我是在邮筒旁碰到他的。我正要把那封回绝柯勒的信投进邮筒，他却抢在我前面了，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小心地一封一封地投进邮筒。这位老人跟平常一样，由妻子陪伴着。卡尔·克努尔佩教授差不多有两米高，瘦骨嶙峋，像是只剩下皮和骨头了，他跟西蒙·贝格尔教士和尼克劳斯·封·弗吕厄一样，但没留胡子，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夏天和冬天都披一件斗篷，头戴法兰西帽。他的妻子跟他一样高，也是那么瘦骨嶙峋，也是那么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她终年也穿着斗篷，头戴巴斯克帽，弄得很多人根本不以为她是他的妻子，而以为是他的孪生兄妹。他们两个人都是社会学家，学术上都颇有造诣。尽管两个人在生活上形影不离，可是在学术上却是死对头，在政治观点上针锋相对。男的是个伟大的自由派，著有《资本主义——精神冒险》（1938年弗朗克出版社出版），女的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笔名摩西·施特海林而闻名，著有《马克思主义的人世间人道主义》（1939年欧罗巴出版社出版），两人都同样受到了政治观点的影响：卡尔·克努尔佩领不到去美国的签证，摩西·施特海林领不到去苏联的签证；他曾经严厉抨击美国的“本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她曾经更为无情地论述了苏联的“小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请注意：曾经。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用“曾经”这两个字，因为在两星期前，施迪采勒尔拆卸公司的一辆卡车把这一对夫妻压死了，男的被埋掉，女的被火化，两人立下的遗嘱给葬礼制造了困难。

“你们好呀，”我打了个招呼，手里依然拿着要寄给柯勒的信。卡尔·克努尔佩教授没有回礼，只是带着疑虑的神色眯起两眼，透过他那满是尘埃的无边眼镜，朝下看了看我，他的妻子（也戴着同样的眼镜）也是一声不吭。

“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我，教授先生，”我有些胆怯地说。

“记得，记得，”克努尔佩回答说，“您不是学法学的吗，还在我的社会学课上鬼混过呢。您看来像是个老学生。考试通过了吗？”

“早就通过了，教授先生。”

“当上律师了？”

“当上了，教授先生。”

“能干，能干。大概是社会民主党人吧，是吗？”

“部分是的，教授先生。”

“是个资本的忠实奴仆了，是吗？”克努尔佩夫人问道。

“部分是的，教授。”

“是有什么心事吧？”卡尔·克努尔佩感觉到这一点，说道。

“是的，教授先生。”

“那就陪我们走走吧，”她说。于是我陪伴着他俩。我们朝着孔雀饭店走去，我还没有把那封信寄掉，一时忘记了，不过呢，也不要紧，反正邮筒多得很。

“怎么回事？”他问道。

“我去探望过伊萨克·柯勒博士，教授先生。是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您到我们那位非常愉快的凶手那儿去过了。哟，也是他叫您去找他的？”

“正是。”

他俩一会儿男的问问，一会儿女的问问。

“他还那么快活吗？”

“快活极了。”

“还那么容光焕发？”

“当然！”

我们路过一个邮筒。我本想停下来把那封回绝信寄掉，无奈克努尔佩夫妇继续往前走，对我的打算一无所知，一味地迈着急促的大步，我得跑步才赶得上他们。

“柯勒对我说，您接受了一项独特的委托，教授先生，”我说道。

“独特？为什么说是独特呢？”

“教授先生！凭良心说：柯勒让人调查他亲手杀人所产生的后果，实在是咄咄怪事。那家伙当时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缘无故地杀了人，然后却又请人做社会学调查，甚至美其名曰要把事实真相彻底摸清楚。”

“会摸清楚的，年轻的朋友，要深入调查。”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鬼名堂！”我大叫起来。

克努尔佩夫妇俩收住脚步。我在喘息。他擦擦他那副无边眼镜，走近我的身边，弄得我不得不抬起头看他，而他不得不低下头来看我。他重新把眼镜戴上，两眼鼓鼓地瞪着我。他的妻子也气愤地瞪眼看着我，她紧靠着她的丈夫，这样也靠近了我。

“要说其中有什么名堂，这个名堂就是科学，年轻的朋友，只是科学而已。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能够运用缜密的方法论对一桩凶杀案的后果进行彻底调查，进行详尽的阐述，这还是第一次！这要归功于我们慷慨的凶手。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啊！各种关系都能暴露出来！亲戚之间的，职业上的，政治上的，金融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关系等等。这也不足为奇。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于在我们这座亲爱的城市里，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依靠一个，一个提拔一个，一人倒台，许多人跟着倒。许多人不就是这样倒台的吗？我目前正在阐述在我们敬爱的母校里所产生的后果。这仅仅是开始。”

“对不起，有辆汽车开过来了。”

我一把将他们两个拉到安全的地方。刚才克努尔佩夫妇由于心情激动，从人行道上走到马路上去了，一辆出租汽车不得不紧急刹车。车里挤满了人。一个戴着插满假花的帽子的老太太，猛地撞在车窗玻璃上，司机朝着窗外大声嚷嚷，态度很粗暴。克努尔佩夫妇俩却无动于衷。

“丝毫没有关系，”他说，“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会不会被汽车压死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有那项任务，只有科学才是举足轻重的。”

可是女教授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要是给压死了，人家会为我感到惋惜的，”她说道。

出租汽车开走了。克努尔佩重新谈起他做的社会学调查。

“凶杀总是凶杀，当然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凶杀是一个现象，跟所有其他的现象一样，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至今，人们都仅限于调查起因、动机、渊源和环境，我现在是投身研究后果。而现在我可以说：这桩凶杀案，对母校是件好事，对整个大学是件好事，可以这么说，有人想自己犯点杀人

罪。唔，当然啰，事情本身是令人惋惜的，这是一种恶劣行为，不过，从温特死后留下的意想不到的空缺里，也透出了新鲜空气，产生了新的思想。太妙了，这位亲爱的上了天堂的温特在世时是一个落伍分子，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是‘令人不快的冬天’，但我不想中伤他，也不想嘲弄他，在这方面产生的一切后果，我只是进行阐述，提供事实，年轻的朋友，就是事实，没有别的了。”

说着，我们到了孔雀饭店附近。

“祝您平安，律师先生，”克努尔佩夫妇俩说着，向我告别，“我要去会见瑞士工学院的某个要人。”他补充说道，“我正在这个学院进行调查，温特对该校校委会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我预感到里面有可以引起轰动的事，会有好戏看呢。”在饭店门口，他俩再次回过头来看看，竖起手指。“要科学地思考，年轻人，要科学地思考。这点您还得学学。尽管您当上了律师也有此必要，亲爱的朋友。”女教授克努尔佩，别名摩西·施特海林说道。

他俩走掉了，而我手里的信还一直没有寄掉。

(2)建筑师弗里德里：后来我到高雅咖啡馆，就坐在这位建筑师的身旁，那封信依然留在衣袋里。在这家高雅咖啡馆，人们可以坐在外面，一直坐着，素来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说不定自古代爬行动物涉入江河的时候起，几百万年以来人们就坐在那儿了。我是在斯迪西-劳埃平那儿见习的时候认识这位弗里德里的，他搞地皮投机交易，有时遇到麻烦，但不管什么事都不能使他却步，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搜刮我们城市地皮的大块头地老虎，因此他能在林荫道上新造起一幢幢商店、公寓和出租房屋，不过这些房屋比以前昂贵，价格和他身上的肥肉相适应。让我们细细地看看他天生的不幸的尊容吧：五十岁的人，身上是一块块偌大的肥肉，成天淌汗，一对眼睛小而有光，像是长错了地方，鼻子小，耳朵也小，其他部分都是老大老大的，他是位白手起家的人，当初是朗格街上的毛孩子（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家老太，亲爱的施佩特，过去是给人家洗衣裳的，我家老头子是喝酒喝死的，在安葬他的时候，我还亲手往他的坟墓里倒了一瓶啤酒呢），后来成了自行车运动的赞助人，要是没有他提供的特别奖金，就不会出现六天行程比赛的景象。在那次比赛中，他端坐在室内运动场的中央，喝了无数圣加勒-雪布利希啤酒，吃了无数维也纳香肠。同时，他还是音乐演出活动的赞助人，正是由于他的赞助，音乐厅的交响乐队和我们的歌剧院才没有下降到一般的水平，他把克来姆佩勒、布鲁诺·瓦尔特，甚至卡拉扬都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当指挥，现在他又提拔了蒙德沙因，从而使我们这座被他用新造和改建的房屋弄得破了相的城市至少增添了几分音乐的魅力。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前面说过，这天早晨又闷又热，这是很熟悉的感觉，在这种令人昏昏沉沉的天气下，人们像瘫痪了一样，又好像中了邪似的，挤坐在一块儿，而我，也贴近弗里德里坐着，他心绪特别好，把一块又一块小白面包往牛奶咖啡里蘸着，吧嗒吧嗒地吃着，咂咂地喝着，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咖啡像条棕色的带子滴在丝领带上和白衬衫上。

他今天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我们那份闻名于世的地方报纸上登了一条讣告，内容是，由于出了一次悲惨的车祸，天主发慈悲，“把我们难忘的

身为丈夫、父亲、儿子、兄弟、叔父、女婿以及姐夫的奥托·艾利希·库格勒召进天国去了。他的一生充满了别人对他的爱。”

“是您的仇人？”我问道。

“是我的朋友。”

我表示了哀悼。

“他大概是飞快地开车到夏姆去，撞在一棵树上了，这个忠厚老实可爱的库格勒啊，”弗里德里说，他容光焕发，咂咂有声地喝着咖啡，蘸着、吃着小白面包，“一命呜呼了。”

“这事叫我感到难受，”我说。

“您要见到他的那辆菲亚特牌汽车那才叫您难受呢，车子撞得成了一堆烂铁皮了。”

“太可怕了。”

“命运嘛！人总是要死的。”

“当然。”我说。

“啊呀，”他说，“您大概不知道，他遭到这种厄运对于鄙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吧？”

我真的不知道。这位大块头“鄙人”睁大眼睛友好地看着我。

“库格勒留下一个寡妇，”他解释说，“一个漂亮的女人。”

我这下明白过来了，“那您是要娶那位漂亮的女人啰？”

建筑师弗里德里摇了摇那堆肥肉，人们自然猜得出那堆肥肉就是他的头，“不对，年轻人，我不要娶这个寡妇，而是要娶她的情夫的妻子。那也是漂亮女人。明白吗？事情很简单：如果那个情夫要娶这个寡妇，他就得先离婚，然后我就把他的妻子娶过来。”

“这真是社会数学了，”我说。

“您算是明白了。”

“不过那您也得离婚呀，”我提请他考虑这一点，并且暗暗地希望我来做这笔交易。

“我已经离婚了，离了一个星期了。这是第五次离婚。”

我的生意又吹了。

咖啡馆招待送来新鲜小白面包。一个班的学生跑过咖啡馆门前的广场，都是女孩子，有几个扎着小辫，有几个已经像少妇了，她们成群地站住了，观赏着电影院门前的剧照。弗里德里在窥视着她们。

“您不就是那个在镜子巷搞了个阁楼间办法律事务所的滑稽律师吗？”他一边问我，一边打量着那些女孩子。

我不得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

“9点30分了，”他看了看时间说着，咧嘴一笑，又向我转过身来，“我是讲礼貌的人，并不想出言冒失，施佩特，可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您今天还没去过您那个事务所吧？”

“猜对了，”我说，“您这强烈的感觉并没有错。我也许在一个小时后，或者在下午到那里去。”

“原来您是这样安排的。也许要到今天下午。”他仔细地端详着我，“亲

爱的施佩特，”他说，“您这个姓倒真是姓对了。我今天从7点到8点50分，一直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奔波，”他谦逊地说道。“我赚的钱有好几百万。好得很嘛，我是靠我盖的房子，做投机生意赚的。这是对的。不过我做了许多工作，还要严守纪律，该死的。我承认，我喝酒喝得多，而且永远不会够。不过，每天早晨我还要振作精神去干活的。”

这个大块头慈父般地把手搁到我的肩上，“亲爱的施佩特，”他温存地继续说道，感情丰富得像他身上的肥肉。咖啡蒸气熏得他两眼发亮，脸上和手上尽是面包屑，“亲爱的施佩特，我要给您斟一杯纯葡萄酒，您创业是非常艰难的，这点您瞒不了我。结果是：您在一个严肃认真的人的眼里没有地位。一个律师，在9点30分还不坐到办公桌后边，这种人是一个正派的商人所瞧不起的。我现在不想过分逼迫您，我看您也不像个懒虫，可是，直到现在，您还没有能下决心拼死拼活地投身到人生激流中去。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就因为您不善交际，缺乏风度，没有发福。大学毕业好是好，可是您凭借好成绩，除了引起那些教书先生的注意外，感动不了任何人。光有一张办公桌是不够的，您在桌后要坐多久就坐多久，但顾客是不会向您游过来的。顾客何必要来呢？当然不来，我的年轻的朋友，您对他们感到失望是没道理的，大众牌汽车和阁楼不仅仅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而且也是精神贫穷的标志，请您不要见怪。我并不反对耿直，并不反对谦让，可是一个律师就一定要出人头地。您首先需要的，是间像样的办公室，您那个鸽子笼是不行的，谁也不肯往那上面爬，人家是要打官司，不是要取得运动的好成绩。总而言之，您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要给您一个好机会。您明晨7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给我带四张一千瑞士法郎面额的钞票，我就替您在帐篷街那儿提供几个像样的房间。”

（接下去，他絮絮叨叨地扯起大规模的地皮投机交易，扯到小白面包的销售情况和享用牛奶咖啡的情况，他的那些话尽是讽刺挖苦，里面含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在我们这儿最严重的诈骗行为只能以合法的手段进行，而且正在这样进行。后来他还说到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节和霍纳格丛书。我站起来时，他还在说，交通混乱不堪，是因为市长步行的缘故。）

（3）私人侦探弗雷狄·里恩哈德：他和我是同一年生。瘦长个子，满头乌发，异乎寻常地沉默寡言。他原是一个独生子，父母离异。上中学时，他涉嫌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她的情夫。人们发现这两人在他妈妈的卧室里，一丝不挂，已被干净利索地杀死，女的躺在床上，情夫——她的精神病医生，从克斯纳赫特来的——倒在床前，犹如床前的一块搭脚毯。警方拘捕里恩哈德时，他正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正在翻译塔西陀斯的文章。只有他有作案可能，只有他在发生谋杀的当夜呆在屋子里，尽管他的供词说，他当时是安安静静地呆在自己摆满经典著作和动物学书籍的小房间里，即阁楼里，但他的处境似乎不妙。另外倒霉的是，他正好满十八岁，以致他没有落到专门处理青少年案件的检察官手中，而是落入非常无情的耶麦林的掌心。在待审拘留期间和后来在刑事陪审法庭上，审讯都是够严厉的，耶麦林使出浑身解数来刁难这个中学生，但里恩哈德表现得极为出色，简直占了上风。那些确凿的证据转眼之间漏洞百出，最后法庭只好将他释放，甚至连对他进行监护的

---

施佩特，在德语里是迟的意思。——译注

古罗马历史学家，曾较详细叙述古日耳曼人的动态。——译注

法律依据都嫌不足。耶麦林暴跳如雷，第一次发作神经崩溃症。后来，他还多次呼吁联邦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但都是白费力气，而里恩哈德却开始对他报复。这位嫌疑犯弄到钱了，而且钱的数目十分可观，他那离异的腰缠万贯的父亲把一切都遗赠给他了，母亲也给他留下巨额资产，金钱顿时从四面八方朝他滚来、流来、飞来，越聚越多，一再翻番，他把遗产一一收藏好。在很短的时间里，祖父祖母，姑妈姨妈以及叔叔伯伯都急急忙忙地，也可以说是你追我赶地相继作古，因此，他们又给他添了那些冒出来的遗产，那时的情况真相是：为了给里恩哈德造福，人都要死绝了。他从暴跳如雷的耶麦林的手里摆脱出来时，还不到二十岁，摇身一变就成为亿万富翁。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与其说他有才智，还不如说他有运气。当然他才智也十分突出，因为他在以后同检察官耶麦林的斗争中就很有章法：他始终呆在耶麦林的身边。耶麦林无论出现在哪里，里恩哈德就会在哪里成为他的拦路虎。他每次读起诉书时，都会看到里恩哈德的脸在某个地方向他狞笑。他若在一家饭店吃饭，里恩哈德就坐在他旁边的桌子上。里恩哈德总是在他的附近。不论耶麦林住在哪里，里恩哈德总是住在毗邻的房子里，如果耶麦林一气之下搬到一所公寓房子去住，里恩哈德就会出其不意地住在他的楼上。耶麦林最后弄得一筹莫展，无计可施。里恩哈德那副样子叫他受不了。他好多次都想朝里恩哈德猛扑过去，大打出手。有一次，他甚至于还买了一支手枪。他从这条街搬到那条街，从一个城区迁到另一个城区，从欣特贝尔格大街迁到迈耶大街，从沃利斯霍芬区转移到施瓦门丁根区，最后，他远离市区，叫人在距韦蒂孔小镇不远的猫尾大街上盖一所小房子，这时，旁边也同样在盖房子。耶麦林感到，此乃不祥之兆。后来那个盖房子的人身份表明了，原来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这才暂时使他定下心来。他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在春天，他只穿着衬衫第一次给刚露土的青草浇水时，里恩哈德又在刚油漆过的花园篱笆外，笑容可掬地朝他挥手致意，那样子像是老相识似的（实际上他俩也算得上是老相识了），自我介绍是他的邻居。那个银行代理人，不过是假相。耶麦林踉踉跄跄地朝房子退去，一直退到房子的走廊前。他第二次发了精神崩溃症，还得了心肌梗塞症，害得医生拿不定主意，不知是把他送到疯人院好还是送到医院好。耶麦林在家卧床不起，动弹不得，面如死灰，奄奄一息。可是他还算是顽强的，尽管形容枯槁，他还挣扎着爬起来。他对里恩哈德，暗地里不能不甘拜下风。这两个人紧挨着住在一片树林的边上，可以看到韦蒂孔小镇。耶麦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要是里恩哈德再搞下一个行动，他也是无法对付的。里恩哈德成了私人侦探，大规模地开展业务。他在塔拉克尔的一幢豪华的办公大楼里租下一些房间，这些房间占了整整一层楼，而且内外相联。坐在时髦的办公桌后面的是几位举足轻重的先生，有几个是老运动员，他们现在已大腹便便，他们叼着香烟，脸上露出满足的神色，头上留着短短的头发。此外还有几个人是里恩哈德花钱收买的昔日的警察。里恩哈德的财力是本城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但使耶麦林恼怒的，并不是里恩哈德的这些活动，因为业务总归是业务，不好去干涉，使他恼怒的是里恩哈德搞来了另外一批人。塔拉克尔那些豪华的房间里经常热闹非凡，里面那些人都是些曾被耶麦林判过罪的人，他们都曾经是囚犯和罪犯，如今摇身一变，都成了专家，派上了用场。他那个“刑事侦探科”向人家索取的报酬十分高，结算费用时大敲竹杠，但成绩还是卓著的，其原因是：那个公开亮出招牌的“里恩哈德私人法律咨询处”，能为遭到怀疑的妻子提供忠诚和无辜的证据，

能为一些要对母亲怀有二心的父亲出谋划策，给私人 and 工业界提供咨询，派人进行监视、跟踪、搜寻，搞秘密协议，为那些辩护人提供反证来破坏耶麦林的某些意图，如此等等。许多案子多亏里恩哈德的这个机构，会意想不到地出现对被告人有利的转机。在塔拉克尔那幢房子里，律师们秘密接触，里恩哈德是个出色的主人，连一些政界的对手也在他那里交换名片。

这是我先要做的一些说明。这天上午我碰到他，是在高雅咖啡馆门前，时间是10点缺几分。弗里德里终于离开了，我也站起身来，要把那封写给柯勒的信寄掉，而我当时也许已不再那样坚决地要寄信了，这时正好里恩哈德冒了出来，说得精确些，他开着车子冒了出来。那是一辆跑车。车子停下了。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我了，他学的也是法律，只学了一学期。他也曾经要我去加入他的那一帮，可是我拒绝了。

“律师，”他坐在那辆跑车的驾驶座上，没有朝我看，“有事找我吗？”

“可能有，”我回答说。

“上车吧，”他邀请我说。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您这车子跑得很快啊，”我说。

“五千，”里恩哈德说道，他的意思是，别人要是出这么多钱，他就愿意把跑车让给他。他的车子多得很，有时，好像他每天用的车子都不相同。

于是我对他谈了我跟柯勒那个老东西会面的情况，里恩哈德开车沿着湖岸走，这是他的老规矩了，重要的生意都是在车子里成交的。“因为这样就没有旁证了，”他有一次解释说。他一边以均匀的速度开着车，开得十分平稳，一边仔细地听我说话。我说完之前，他把车子停了下来。这里是乌提孔城区。车子正好停在一个电话亭前面。

“有利可图，”他说，“要我调查吗？”

我点了点头。“要是我接受了委托，那就要你做调查。”

他走到电话亭里，出来时，他说：“他女儿在家。”

我们便驱车来到瓦因贝格大街，车停在柯勒的别墅前面。

“进去吧，”里恩哈德对我要求道。

我一愣。“我应该接受他的委托吗？”

“当然。”

“太令人捉摸不透了，”我显得有点顾虑。

他点上一支香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委托，会有别人接受的，”他吐出这么长的句子，对他来说简直是在做一篇演说。

我下了车。在大门旁边的铁栅栏上，有一只黄色的邮政信箱，它提醒我寄信的事。那封回绝信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我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可是，我到底为什么要拒绝柯勒的委托呢，为什么要充硬汉呢？我需要钱，就是这么回事。钱是不容易来的，这需要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是个律师，想有所作为，那就得去应酬交际，建筑师弗里德里的话是有道理的，而我也很想有所作为。再说，柯勒委托的任务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坏处，只不过是一个科研项目而已，柯勒委托我做这类古怪的事情，是付得起钱的。

“您要价五千出让这辆跑车？”

“四千，”里恩哈德回答说。

“真慷慨。”

“这取决于那项委托。”

“ 那项委托对您来说并不是非要不可的呀。 ”

“ 好玩嘛。 ”

“ 我要先跟柯勒女儿谈谈， ” 我说。

“ 我在这儿等着， ” 里恩哈德回答说。

要对检察官讲的话：我不能不谈到我和海伦娜的第一次相会，这事实回避不了了。我要无所畏惧而又小心谨慎，并且不绕弯子地谈，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哪怕把私事讲出来，我也在所不惜。我终于这样做了。您读起来一定饶有兴趣，而且会把重要的部分勾划出来。您，一点不错，我指的就是您，约尔欣姆·伏依泽尔检察官先生。随您怎么吃惊吧。为什么我们不能谈私事呢？您是耶麦林的继任，当然会在警察局长之后（不管您怎么做）作为第二个人读到这几行文字，您在看这份报告时，我在九泉之下向您问候，这真叫我开心得要死（看来这死字有双重含义），说老实话：即使您跟已经升天的耶麦林不一样，自命进步，参加每一个心理学大会，您也还是你们这类人中的迂腐派。您喜欢凭据。您为了照章办事，刚才在停尸房参观了我的尸体，您穿着浅色雨衣，彬彬有礼地把帽子拿在手里，一本正经地显出阴郁的神情，我自杀得干净利索，这点您必须承认，就连杀柯勒这件事，我也是干得非常熟练，我们两具尸体并排放着，样子看起来非常庄严。现在还是离开您的“当前”回到我的“当前”里来吧，您的“当前”对我来说是“未来”，而我的“当前”，在您阅读这份报告时则已是“过去”了。时间就是这样交错的。懂了吗？我不相信您会懂。真是气人。我已作了这样的充分准备。

第一，从历史、建筑学、哲学上来探讨：重要的内心生活，要有一个确定的环境。即使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因此我认真地了解了柯勒别墅的有关情况。我甚至还到中央图书馆去查阅了有关资料。据查，这座建筑本是尼可德莫斯·摩尔西过去的府邸，他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家，蓄着摩西式胡子的欧洲人，出身不详，国籍不详。（据有一些人说，他是亚历山大三世和一名澳大利亚女歌唱家的私生子，据另外一些人说，他原来就是布尔格道尔夫的小学教师雅可布·赫洛尔，曾因跟一些孩子淫乱被判过刑。）他办了一个靠一些有钱的寡妇以及爱好文艺的显贵资助的自由学会，和老托尔斯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及年轻的克拉格斯都有通讯联系，策划宇宙革新运动，宣布成立素食主义的世界政府，这个世界政府的公告可惜谁也不去遵循（要是有人遵循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尽管他是个素食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一切乌七八糟的事情全可避免了！），他还出版杂志，其内容一部分带有神秘主义，一部分宣扬色情，他写神话剧，后来改信佛教，再后来卷入无数破产事件和桃色事件的诉讼纠纷，甚至受到通缉，……我们几个同胞，他们是一个电影艺术家小组的成员，他们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见到过他，他在一家酒吧间里当钢琴师。

别墅周围的环境：我这样一个律师，出生于贫寒家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根本没有什么家庭关系，才下了决心要拼死拼活投身到人生激流中去（引用弗里德里的话）。我下了里恩哈德的跑车，走到柯勒博士的家门口，这段路，是能激发我许多遐想的。这条路穿过花园，一景一物都在炫耀主人是富有的。植物显得落落大方，树木显得威严气派，这儿依旧是一派夏天的风光，连燥热风也感觉不到。似乎是富翁同老天取得了默契，可以享受许多优待。

---

在德国南部和瑞士等地，常有从阿尔卑斯山吹来的燥热风，当地人有头痛等不适之感总认为是受其影响。

（对外乡人要说明一下：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燥热风意味着能引起头痛、自杀、通奸、交通事故和暴力行为的一种天气。）石子小路耙得很平，杂草全无。总之，这不是一个现代化的花园，而是一个设计古朴、维护得很好的花园。矮树篱和灌木丛修剪得富有艺术风味，雕像上布满了藓苔。雕刻的裸体神像，留着胡子，臀部和小腿显得富有活力。花园里还有一些静悄悄的池塘，一对神气十足的孔雀。然而这个花园却地处城市中心，这儿的地皮一个平方米的价钱就要用天文数字来计算。在它的周围，有轨电车发出的隆隆声，汽车来来往往的喧闹声，在它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带有金色尖刺的铁栏杆外翻腾，犹如海洋的汹涌的波涛。马达的轰鸣声，电车的铃铛声和汽车的喇叭声汇成一片，可是柯勒的花园里却是一片寂静，似乎那些声波被禁止闯入花园。只能听到几只鸟的鸣叫声。

房屋本身：这座房屋过去确实是十分可怕的，是个建筑上的孽种。它是由那位西方思想家自己设计出来的。至于议员柯勒是怎样把它改建成一个适合居住、富有人情味的地方，那是他许多秘密中的一个。显然他先是叫人拆掉了许多穹顶、塔楼、凸窗、小天使以及十二星座的雕像（尼可德莫斯·摩尔西也从事占星术的研究），最后在这荒乱的地方冒出来一幢周围长有五叶地锦、常青藤、香忍冬和蔷薇的别墅，虽然它还保留着拱顶，然而却更为雅致。别墅既宏伟，又宽敞。我朝那辆跑车最后看了一眼，跑车隐约可见，像一块红斑，我走进这幢别墅，发现它的内部也很讲究。建筑师们一定花了很大的力气，他们把一些墙拆除了，在里面铺上了大幅地毯，还做了其他的工作。一切显得舒适而且朴实。我看到古色古香的家具，这些都是很贵重的制品，墙上挂着印象派画家的名作，后来又看到古代荷兰画家的名作（有一名女佣为我引路）。我在州议员的工作室里等候着。房间很宽敞，被阳光染成了一片金色。我从敞开的双扇门里望去，一眼能够看到花园里的景色，门两边的两扇窗几乎一直落到地板上。房间里铺着精制的镶木地板，摆着一张偌大的写字台，几张矮矮的皮沙发椅，墙上没挂什么画，只是书籍一直堆到齐天花板，全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这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图书室，在那儿的一张台球桌，与这个图书室很不协调，那张台球桌摆在一个宽敞的壁龛里。绿色桌面上还放着三只球，壁龛的内壁上挂着收集的台球棒。许多旧棒上都刻着字。有一根是巴尔扎克用过的，一根是哥德弗里德·凯勒的，另外有一根是迪佛尔将军的，再有一根是俾斯麦的，甚至还有一根据说以前是拿破仑的。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环顾着。我觉得那位老博士无处不在，似乎他每时每刻都会从花园里走进屋来，我似乎听到了他的笑声，似乎他那入神的目光在打量着我。

幻觉：这时发生了一桩怪事，这实在是一件出鬼的事。我一下子感到对这位议员能够理解了。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种认识简直是突然产生的。我猛然猜到他行动的动机了。我是从这些珍贵的家具里，从这些书籍里，从这张台球桌里悟出来的，是从这个房间显示出来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台球游戏之间的关系中看出来的。我深入到这个房间里，看透了它的内部结构。柯勒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玩台球的人而杀人的。他不是一个赌徒。吸引他的不是赌注，吸引他的是游戏本身，是滚动的球，是设法赢上一局的机会。运气对于他，是无所谓的（正因为这样，他能把自己看成是完全快活的人，他甚至

一点也不虚伪)。他只为自己有权选择游戏的环境而感到自豪，他喜欢抓住自己所创造的必要的机会——他的幽默就在这里。当然，这样做也是有一个原因的。也许是极其微小的权欲，是一种不仅拿球来做游戏，而且也拿人来做游戏的癖好，是要与上帝等量齐观的诱惑。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并不重要。身为法律工作者，我必须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不能陷入心理学或者哲学或者神学的泥坑里去。柯勒是用杀掉温特的方式来开始新的一局的，事情就是如此而已。现在事态正按他的既定计划发展着。我不过是他撞动起来的台球其中的一个而已。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合乎逻辑性的。他在法庭上什么动机也没有说，因为这种事是不成体统的。

一般来说，凶手作案都有明显的动机。要么出于饥饿，要么出于爱情。思想方面的动机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也被政治歪曲了。宗教方面的动机几乎没有，而有这方面动机的人就会直接被送进疯人院。议员柯勒却是出于科学方面的动机才作案的。这话似乎显得荒唐，但他毕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动机并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我们一定要领会他的用心才行。他喜欢打台球，本意并不在于游戏本身，而在于他拿这种游戏当作现实的模型，当作一种可能发生的简化了的现实（现实的模型，我使用莫克最喜欢的一个词。莫克是个造型艺术家，他在物理学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很少雕塑作品，他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最近我经常呆在他的工作室里——在我们这儿，午夜以后还能到哪儿去喝酒呢——他耳朵聋了，跟他是很难攀谈的，但他却给了我很多启发）。出于同样的原因，柯勒从事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同样为他提供了“现实的模型”。这些模型已经不够他用了，于是他不得不走上谋杀的道路，来创造一个新的“模型”。他以犯罪来做试验，谋杀仅是一种方法而已。因此他便委托克努尔佩去确证这次谋杀事件的后果；因此他又交给我一项滑稽可笑的委托，去寻找别的“可能的”凶手。现在我置身于他的工作室里，和柯勒研究用的东西单独在一起，这时我才理解了我跟他在监狱里的那次谈话。“需要把事实调查清楚，把影响精确地测定出来”和“我们一定要朝事实的反面想一想，以便摸索到可能的因素”。柯勒实际上已经公开了自己的意图，而我当时却没有理解他那游戏的含义。要是我们认真对待他的游戏，我们就能看出他的动机：他杀人是为了观察，谋杀是为了检验人类社会赖以为基础的那些法规。不过，要是他在法庭上供认出这种动机，那么这就会被人认为是一种借口。对于司法界来说，这种动机太抽象了。不过科学的思想也就是这么回事，抽象正是这种思想的保护物，可这种思想也会突然从它的保护物里钻出来，而且给人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它便无能为力了。随着柯勒的试验而发生类似的事，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精神会导致谋杀。这种说法既不是为柯勒开脱罪责，也不是攻击科学。一次暴力行为的动机越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就越凶残；越是有意识的，就越得不到原谅。它变得没有人性。它是对神明的一种亵渎。就此而言，我当时看得很正确，就这方面来说，我的幻觉得到了证实。这种幻觉保佑了我，叫我不崇拜柯勒，不要把他看作无罪的人。幻觉帮助我去厌恶他。他是凶手，从这时起我一直抱定这种看法。不过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柯勒借助我的帮助继续进行的那一局游戏的危险性。我以为，我参加的不过是一项无害的技术性的工作，是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的。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一局游戏是在一个空房间里玩的，仅仅是按照一个亵渎神明的人的意思去做的。他的游戏是以一次谋杀开头的。我当时为什么看不出它必然会

导致第二次谋杀，而且这第二次谋杀不再是由柯勒来进行，而是通过我们这些司法代表来进行的呢？老家伙在拿司法做游戏呢！

第二，从心理方面来探讨：报告一次重要的会见，不仅要求有一个确定的环境，还要求有相适宜的心情。因此我拼命酗酒，乱搞女人。我先喝了几升苹果酒，这太窝囊了，我知道，这是个价格问题，不过我喝苹果酒只是为了叫自己强打精神。那个姑娘在我身边时，我就改喝白兰地了。不要担心，我的胃好得很呢。另外，那个姑娘并不是吉赛勒（她是个身材漂亮的女人），而是莫尼卡（不是叫玛丽就是叫玛丽安娜，总之她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M），我们玩得十分痛快，后来她唱了许多从德国电影里学来的民歌，我睡着了，再后来，她就同我的现金一起不翼而飞了。这时我改喝梨子酒，并发现她在美景楼附近一家不卖酒的咖啡馆里。我又找到了她，她正跟吉赛勒和吉赛勒的保镖（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勒基）在一起，勒基也证实自己当上她的保镖了。我面对面地质问她，他从中主持公道，调解了财务纠纷，玛莲纳（或者叫莫尼卡，再不然叫玛格达来娜）无可奈何地把钱交了出来。这件事，我们是通情达理地解决的，甚至是大大方方地了结的。女招待没有发现我带着维利阿米纳烧酒进来，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喝起酒来。后来海伦娜来了，完全出人意外地来了，她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她是从一个更坏的世界里来的。自从我看到她跟斯迪西-劳埃平在一起（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两个月前，三个月前，还是半年前的事情呢？），我就不想她了。当然，在一天夜里，快到早晨了，光着身子的吉赛勒像一尊摇摇晃晃的菩萨坐在我身上，这时我虽然想到了她，但是转眼又不想了，的确不想了——当我走过美景楼附近那段被雨淋湿了的马路的时候，只是一闪念想到了她，但这是不算数的，只是天气骤变对我心绪的一种影响而已——而现在，她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她一定是直接到咖啡馆里来找我的。我不得不大笑起来，别人也都笑了。海伦娜不动声色，和蔼可亲，从容不迫，头脑清醒，在保持无可指摘的态度上她是做到家了，这简直叫人拿她没有办法，她一直镇定自若，不动声色，和蔼可亲，从容不迫，头脑清醒，我真恨不得杀死她，害死她，掐死她，强奸她，叫她当婊子，那才是我最高兴的事呢。

“我有话要跟您谈，施佩特先生，”她一面说，一面恳切地凝视着我。

“这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吉赛勒问道。

“是个文雅的姑娘，”我说道，“是个出身名门的闺秀，一个杀人犯的宝贝女儿。”

“那她和谁睡觉呢？”玛丽安娜（或者叫玛格达来娜，再不然叫玛黛来纳）想知道。

“她和一位明星律师同房，”我说，“那人是司法界一切明星中的明星，一位训练有素的浪荡鬼，就是那位万事通的大律师斯迪西-劳埃平，一次同房就是一次司法行动。”

“施佩特先生，”海伦娜说道。

“您请坐，”我答道，“您愿意坐在这位人品高尚的勒基先生的大腿上吗？他是这两位姑娘的保护人，而我三生有幸是他的律师。要么您想要一把椅子坐坐？”

“要椅子，”海伦娜轻声说。

勒基将一把椅子推给她。他客客气气，文质彬彬，的确是个交际场上的能手。他有着黑色的小胡子，橄榄色的脸，棕色的善良的眼睛，他甚至朝她

鞠了一躬，身上的香水味和香烟味散发得很远。海伦娜犹豫地坐下了。“我本想单独跟您谈谈，”她说。

“用不着，”我笑着说，“我们这儿没有秘密，我跟吉赛勒小姐已经睡了几个星期的觉了，和这位诚实的莫尼卡——或者叫她玛丽安娜，鬼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字——是昨天夜里睡的。您瞧瞧吧，够公开的了。您有话就尽管讲吧。”

海伦娜眼里噙着泪水。

“您曾问过我一些事情。”

“不错。”

“那时我和斯迪西-劳埃平先生在一起喝咖啡……”

“我完全明白您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打断她的话说，“只是您用不着在这个恶棍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两个字。”

“我当时并没有领会您问的是什么意思，”她低声地说道。

大家突然沉静下来。吉赛勒从我腿上滑下来，她又是涂脂又是抹粉。我发起火来，将维利阿米纳烧酒一饮而尽，顿时觉得头发发粘，脸上冒汗，两眼烧得发疼，我发现自己没有刮胡子，浑身发臭。这些姑娘突然流露出来的窘态使我非常生气，她们好像羞见海伦娜，好像这儿散发出救世军的气味，我简直想把一切砸个稀巴烂，世界真是颠倒了。海伦娜本该向这些姑娘卑躬屈膝的，我也想叫她卑躬屈膝才对。我一言不发地喝着维利阿米纳酒，越喝越多，直愣愣地盯着面前那张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的文静的面孔。

“海伦娜·柯勒小姐，”我喃喃地说着，站起身来，我感到费力，身子摇摇晃晃，但还是站了起来。“海伦娜·柯勒小姐，我只要向您发表——没错，是发表，这个字眼用得妥当——一项声明，一项原则性的声明。我看见您和您的同房者在一起——静一静，女士们——我看见您，海伦娜·柯勒，和您的同房者斯迪西-劳埃平在一起。是的。当时我问您，在您父亲作案的那天，您在不在当空中小姐，在不在那架载着英国大臣到那个可怜的岛国去的飞机上。对对对，当时您是作了肯定的回答的。那么现在，我可要毫不客气地把要害给您点出来，对，点出来，而且要狠狠地点出来，海伦娜·柯勒，那就是：在那位英国大臣的大衣口袋里有一支手枪。是您把这支手枪拿走的，您作为空中小姐做这种事真是易如反掌，这支手枪原是您那位可敬的爸爸的武器，又是永远找不到的凶器，这些您都是一清二楚的。您就是一名同案犯，海伦娜·柯勒，您不仅是杀人犯的女儿，而且是一个杀人犯。我对您恨之入骨，海伦娜·柯勒，我再不能闻到您的气味，因为您像您卑鄙的父亲一样，身上散发着杀人的气味，而不是像我一样散发着酒与色的气味。应当让您活活地烂掉，我希望您那尊贵的子宫里生癌，因为您如果生出一个小小斯迪西-劳埃平来，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完了，我们这个世界受不了这个怪物的折腾。尽管这个世界充满罪孽，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完了也太可惜，因为世上还有这些绝色的婊子，您是比不上她们的，夫人！她们干的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她们不做杀人的事，她们是我最喜爱的人，请您走开，躺到您那位明星律师的身子下面去吧……”

她走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清楚了。我猜想，我摔倒了，不管怎样，是趴在地上了，可能有一张小桌子也翻倒了，那瓶维利阿米纳酒洒

了出来（那是肯定的）。有位具有哲学家前额、戴着眼镜的顾客提意见了，老板娘慢慢走了过来，她是个真正的鸨母。勒基，就是那个品德高尚的人，把我送到厕所里，我突然对他的小胡子感到讨厌，便动手打他，他过去是业余拳击手，我们两人打得头破血流，我被打倒在小便池里。事情弄得人很不痛快，尤其是因为这事本身有些情节会被人象征性地大肆渲染的，好像一部蹩脚的电影里出现的那种情况一样。警察一下子赶来了，是警官施图贝尔带着两个人来了。他们把我带去拘留了几个钟头。又是审问，又是做笔录等等。

附言：纯粹从技巧上来说，必须明确指出，我叙述第一次遇见海伦娜的情况的尝试是失败了。因为我叙述的却是我最后一次遇见她的情况。因为，以后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酩酊大醉时写材料需要小心下笔。要写短句子，写从句会带来危险，句法容易引起混乱。一定要把结尾部分把握好（我刚才又收到柯勒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次他是从里约热内卢寄来的，他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并说他要从那儿飞到旧金山，然后飞到夏威夷，再飞到萨莫阿，这么说我的时间还是充裕的）。州警察局局长来看我。这次来访至关重要，我很清楚。大概就是因为他来，所以我现在才十分清醒。我还拿不出什么证据，不过我猜想，这位局长已料到我有何打算了。要是真这样，那就糟了。但他把手枪给我留下了，这又说明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演了咖啡馆那不愉快的一幕以后两天，将近10点钟，他出其不意地来了。雪后街上泥泞。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小阁楼里。当时楼下传来那个教派的信徒们的吟唱声：“准备好吧，虔诚的基督徒，世界末日来临了，让你的灵魂得救吧，末日伴随着晴天霹雳来到了。”警察局局长显得有些尴尬。他不大自然地瞟着桌上字写得歪歪斜斜的材料。

“但愿您不至于要当作家吧，”他嘟哝着说。

“为什么不呢，局长先生。要是我有些事情非叙述出来不可呢，”我答道。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威胁。”

“随您怎么理解吧。”

他腋下夹着一个酒瓶，眼睛四下张望着。遗憾得很，长沙发上躺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姑娘，在我回来时，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跟我跑回来了，说不定是勒基赠给我的一件礼物，她按照被人曲解了的职业道德标准（我们国家的工作气氛叫人处处都能感觉到），已经脱光了衣服，躺了下来。我对她全无兴趣，我已在工作了，我已把写的材料拿了回来。

“你把衣服穿上，”他命令道，“不然你要着凉的，再说，我有话要和律师谈。”

他把那个酒瓶放在桌上。

“法国白兰地，”他说，“阿德特牌，好酒呀，这酒是我从瑞士西部一个朋友那儿弄来的。我们一道尝尝吧。请拿两只酒杯来，施佩特。她今天不能再喝了。”

“遵命，警察局长先生，”姑娘说道。

“你回家去吧，下班了。”

“好的，警察局长先生。”

她差不多把衣服都穿上了。警察局长朝她看去，态度很安详。

“晚安！”

“晚安，局长先生。”

姑娘走了。我们听见她急促下楼的声音。

“您认得她吗？”我问道。

“认得，”警察局长回答道。

楼下依然还在吟唱他们那首世界末日的赞美诗合唱曲：“随着一声巨响，太阳爆裂了，地球消失了。谁要拯救灵魂，谁就得经受耶稣基督的教诲。”

警察局长往酒杯里斟了酒。“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

“您有一支手枪吗？”他问道。

否认是没有意思的。我于是把手枪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来。他检查了一下，又还给了我。“您还一直认为柯勒有罪吗？”

“您难道不吗？”

“也许，”他回答道，坐在长沙发上。

“那您为什么放弃了那场赌博呢？”我问他。

他瞅着我。

“您还想赢吗？”

“按我的方式赢。”

他眼光落到那支手枪上。我正在照看着那支手枪。

“那是您的事，”他说着，重新斟上一杯，“怎么样，您喜欢这个阿德特酒吗？”

“太好了。”

“这瓶就留给您喝吧。”

“谢谢。”

现在楼下传来传教的声音，或者是祈祷的声音。“您瞧，施佩特，”警察局长说道，“您的处境有些不妙。我现在倒不是要说那位可敬的勒基先生的坏话，更不想说刚才那个可怜的姑娘的坏话，有嫖妓这样的行为这根本不是他们两个人的错，不过，您当妓女们的律师，到了何种地步，也许是另外一码事。不久监察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您采取行动，您大概不会不清楚吧。他们并不反对一个靠此赚钱的妓女律师，但，大家都反对一个根本不赚钱的妓女律师。等级尊严不可丢啊。”

“那又怎么样呢？”

“您刚才问我，为什么放弃赌博，施佩特，”警察局长继续说道，同时点上一支粗粗的巴黑亚诺斯雪茄，“我在您的面前愿意承认，我也认定老柯勒是有罪的，同时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喜剧，这场喜剧我本来是要防止它出现的。我没有掌握他的什么证据。您在这件事上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我说。

“真的没有？”他再次问道。

我第二次否认了。

“您不信任我？”他问道。

“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

“那好，”他说，“随您便吧。对我来说，柯勒的事情已经了结了，以我的失败告终了。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是这样了结的。遗憾啊，干我这一行的必须要能忍受失败。我想干您这一行的也是如此吧。您应当振作起来，施

佩特，东山再起嘛。”

“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回答说。

楼下的人又唱起：“如果地狱大门砰地合上，地狱之火还在冒烟，那就后悔莫及，喔，你这小小的人儿，世界在崩溃。”

我突然产生一种怀疑，对警察局长说：“有些事情您在瞒住我吧，局长？”

他吸着烟，直愣愣地盯着我，依旧在吸着烟，并站起身来。

“遗憾啊，”他一面回答，一面握握我的手，“祝您平安。也许我从职业关系出发，要传讯您的。”

“再见，警察局长先生，”我说。

爱情的开始：我再一次地搁下笔来。我知道我不能再找什么借口，我必须去谈我与海伦娜初次相会的情形。我得承认，我是爱海伦娜的。还要补充一句，我和她是一见钟情的。我们初次相会就已埋下爱情的种子了。承认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直到现在我才能办到。不过，这种爱情已经无法获得了。因此我不得不再来报道这种爱情，这种爱情连我自己也没有承认它有实现的可能，而且它实际上也实现不了。报道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现在我当然知道，海伦娜并不是我当时所认为的那种人，现在我才看出她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犯有同谋之罪。我当然能理解她。她要包庇她那没有人性的父亲，这是人之常情。要求她背叛她的父亲，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只有她的招供才能把那个议员毁掉。而她永远也不会作出这样的招供的。我毕竟是个法律工作者，不会向她提出这种要求。我必须走我自己的路，她走她的路。不过，我不能否认她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于她不符合，而且从来没有符合过这个印象，这并不是她的过错。我对我用了激烈的言词感到遗憾。我知道自己的行动是幼稚的。我的嫖妓和狂饮也是如此。她完全有权利想要怎样就怎样。我保留了要杀死她父亲的权利。如果我当时在飞机场追上她父亲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死了，我也死了。那事情也就没有问题了，世上的人也就不会再谈这回事了。我活着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向柯勒算帐。这个帐也很简单，开一枪就解决问题了。然而现在我还得等待。这点我没有估计进去，也没有把消耗的脑力估算在内。伸张正义跟等待伸张正义是有点不同的。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狂人。我大量酗酒，这只是我荒唐行为的一种表现而已：我好像为正义而陶醉了。我觉得自己有理，这种感觉害死我了。我不能把老柯勒处死，因此我就把我自己处死。在这种疯狂的情况下，我看见我和海伦娜，我回顾我们初次相会的情景。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幸福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来替代的，即使那种幸福原来只是一种疯狂，而我今日的疯狂实际上却是清醒。我对现实看透了。因此我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忆过去的。我希望忘却，然而，我做不到。一切都是那样清晰地留在记忆里，好像是刚刚发生似的。我还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目光，她的动作，她的服装。我也看到我自己。我们两人都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时间过了还不到一年半，我现在已经老了，老态龙钟了。当时我们彼此都是信任的。其实她该怀疑我，那才自然呢。她当时想必把我看成不过是一个死要钱的律师罢了，但她从一开始就信任我了。当时我完全感觉到这一点，因此我也同样地信任她了。我当时愿意助她一臂之力。尽管我们俩只不过相对坐着，就事论事地谈话，但那情景真是美好啊。现在我当然知道了，事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一切都是假相、梦境、幻想，说得难听点，统统是海伦娜玩弄我而且是当场玩弄我的一种奸计，可是当时，我蒙在鼓里，丝毫也没有感到，还觉得很幸福呢。

“请坐，施佩特先生，”她说。我表示了感谢。她坐到一张很深的皮沙发里。我在她对面坐下来。她也是坐在一张很深的皮沙发里。一切都有些古怪，这个姑娘古怪，她大约二十二岁，棕色头发，笑容可掬，动作洒脱，可又有些腼腆。古怪的还有那许多书，笨重的写字台，远处放着球的台球桌，照射进来的阳光，半掩着的玻璃门后的花园，海伦娜正是通过这扇玻璃门进来的。她是同一位名叫福尔德的上了年纪的男人一起来的，他穿得规规矩矩的，据介绍是柯勒的私人秘书，他默默地、几乎是带着威胁的神情打量着我。然后，他又走了，连招呼也没有打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海伦娜感到难为情，我也如此。我那个关于她父亲的幻觉使我瘫痪，弄得我说不出话来。我很同情她。我明白她对她父亲永远也不会理解，她因为搞不清她父亲那样做的原因而感到痛苦。

“施佩特先生，”她说，“我父亲总是同我谈起您。”

这话使我吃惊。我愕然地望着她，“总是？”

“自从他在戏剧大饭店遇见您以来。”

“他对您说了些什么呢？”我问。

“他很关心您的业务情况，”她回答说。

“当时我还没有开业呀，”我回答说。

“您现在开了。”她确认说。

“当然业务说不上兴隆，”我承认说。

“他把委托您的那件事对我讲了，”海伦娜接下去说。

“我知道，”我回答说。

“您接受吗？”

“我决定接受了。”

“我知道条件是什么，”她说道，“这是一张预支酬金的支票。一万五。另外还有一万作为费用。”

海伦娜递给我支票，我接了过来，折起来。

“您父亲真是慷慨得很，”我说。

“他很重视由您来完成他委托的这件事，”她说。

“我一定尽力而为。”

我把支票放进皮夹。我们默默无语，她也不笑了。我觉得她是在寻找话题。

“施佩特先生，”她终于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很清楚，您所接受的那项任务是很不寻常的。”

“相当不寻常。”

“福尔德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也这样认为。”

“可是这件事非得去办不可，”她坚定地、几乎是迫切地要求道。

“那为什么呢？”我问道。

她带着恳求的神情凝视着我。“施佩特先生，我每个月只允许见爸爸一次。去看他时，他就指示我办一些事情。他的事情都很棘手，但他能掌握全局，这实在令人惊讶。凡是吩咐我去做的，我都去执行。他是父亲，我是女儿。我听他的话，这点您当然能够理解。”

“当然。”

海伦娜的情绪变得激昂起来。她的气愤是真实的。“他的私人秘书和他

的那些律师都想取消他对产业的控制，”她承认道，“他们都说是为了我好。可是我很清楚，父亲并没有患精神病。如今又出现了您所接受的那项委托。这项委托等于给私人秘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他说这个委托毫无意义，可我却能肯定，这个委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即使我弄不懂它的含义，”她轻声地补充道。

“对一个律师来说，柯勒小姐，”我接着她的话说，“您父亲委托我办的事是，在假设您父亲并不是凶手的条件下，调查温特教授被杀案；这项任务，只有在您父亲的确不是凶手的情况下，才具有法律意义。但是，这样的假设是不可能的，因而委托也就毫无意思了。法律上毫无意思，不见得在科学上也毫无意思。”

她惊讶地看着我，“您这话叫我怎么理解呢，施佩特先生？”她问道。

“我在这个房间里朝四周看了看，柯勒小姐。您父亲喜欢打台球，喜欢看那些自然科学书籍……”

“他就喜欢那些。”她肯定地说道。

“就是呀……”

“正因为如此，他是没有能力去杀人的呀，”她打断我的话说道，“他一定是以可怕的方式被迫去干这种事的。”

我没有吭声，我觉得跟开炮一样地把事实一下子都轰出来并不正派。我觉得，她父亲正因为喜欢打台球，喜欢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以才去杀人的，这种深奥而又荒唐的真理我没法给她解释清楚。要是去谈我的幻觉呢，那就是胡闹了，幻觉不是直感的东西，并不是可以证明的事实。

“您父亲为什么被判刑，柯勒小姐，其原因我不了解，”我小心翼翼地讲，“我说的是另外的一些事情，是一些并不能解释他的行为，而是能解释他指望我去办的那项委托的东西。您父亲是要通过这项委托探索可能的因素。据他声称，这是他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一定严格遵循这一点。”

“没人会相信这点的！”海伦娜激动地大叫起来。

我不同意她的说法。

“我要去相信，”我说，“因为我已接受这项委托了。我觉得这是您父亲玩得起的一项游戏。别人喜欢赛马，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觉得您父亲的这项游戏更紧张得多。”

她在考虑。

“我能肯定，”她终于迟疑地说道，“您能把真正的凶手找到，就是那个迫使我爸爸去杀人的人。我相信爸爸。”

她的绝望使我感到难过。我本想帮助帮助她，可又无能为力。

“柯勒小姐，”我回答说，“我要对您坦白地说，我并不相信我能够找到您所说的那个人。道理极其简单，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那样一个人，您父亲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人逼迫的人。”

“您对我的确非常坦白，”她低声说道。

“我希望您能信任我。”

她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我的脸。她脸色阴沉。我回避不了她的目光。

“我信任您，”她后来说道。

“只有在您能放弃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我才能帮助您，”我说，“您父亲是凶手。您只有不朝相反的方向去想，您才可能理解他。您父亲犯罪的原

因只应在他自己身上寻找，而不能在别的什么人身上寻找。您也不要再操心那项委托了，那是我的事情。”

我站起身。她也站起身。

“您为什么接受这项委托呢？”海伦娜问道。

“因为我需要钱，柯勒小姐。请您别把我想象错了。即便您父亲觉得这项委托有科研价值，但对我来说，这项委托只不过是使我的律师业务得以振兴的一种希望罢了，但是它不该使您产生错误的希望。”

“我懂了，”她说道。

“我除了做我现在做的事情以外，别的事情就承担不起了，我必须服从您父亲的意愿才行。不过您一定要知道您应该信任谁。”

“正是您才能帮助我，”海伦娜说着，把手伸了给我，“认识您我真感到高兴。”

在花园外面，里恩哈德还依然坐在他的那辆跑车里等候着，不过此刻是坐在驾驶员旁边的位置上，只见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心不在焉，陷入沉思。

“好了，”我说，“我接受那项委托了。”

“支票也拿了？”他问道。

“也拿了。”

“好极了，”里恩哈德说道。

我在驾驶员位置上坐下。里恩哈德给我递上香烟，又给我点火。我抽着烟，用双手抚摸着驾驶盘，心里惦念着海伦娜，我感到幸福，我憧憬着未来。

“怎么了？”里恩哈德问道。

我依然在思考，还没开动车子。“现在只有一个可能性了，”我回答说，“对我们来说，柯勒现在不再是杀人凶手了。现在我们非得一道来做这场游戏不可了。”

“同意。”

“您再询问一次那些证人，”我继续说道，“查查温特的历史，他有哪些朋友，有哪些敌人。”

“那我们就从贝诺博士身上入手吧，”他回答说。

“就是那个奥林匹克海因茨吗？”我惊异地问道。

“他是温特的朋友，”里恩哈德解释说，“还要搞莫尼卡·施泰曼。”莫尼卡·施泰曼是特罗格假肢工厂的唯一继承人。

“为什么呢？”我问。

“她是贝诺的女朋友。”

“我们最好还是别把她牵扯进去，”我若有所思地说。

“行，”里恩哈德回答说，有点不对劲。

“奇怪啊，”我说。

“奇怪什么？”里恩哈德问道。

“柯勒向我推荐了您。”

“那是偶然的，”里恩哈德说道。

我将车子起动，谨慎地驾驶着。我从没开过跑车。车子行驶到车站大桥上时，里恩哈德问道：“您认识莫尼卡·施泰曼吗，施佩特？”

“我只见过她一面。”

“奇怪，”里恩哈德说道。

在谷田路，我停下车让他下去，接着我便把车开出市区，到某个地方去。我漫无目的地行驶着，窗外一片秋色。在我心目中，海伦娜·柯勒的形象一下子又换成莫尼卡·施泰曼了，我试图不让这第二个形象挤上来，但是没有成功。

调查工作的开始：

我干劲十足地开始了我的美好生活。第二天我就一鼓作气占有了新的办公室和那辆跑车。虽然这辆汽车比我原先想象的要旧些，而且从用旧的程度来看，里恩哈德要的价钱并不见得公道。那间办公室原来是前奥运会击剑优胜者和瑞士手枪射击冠军贝诺博士的办公室。他早就在走下坡路了。这位漂亮的奥林匹克海因茨没有参加谈判。建筑师弗里德里一大早便领我去那儿，对我说，贝诺愿意把办公室让给我，月租两千，定金四千，（这笔钱落到谁的腰包，我不知道）我可以立即搬进去，贝诺的全部家具，连他的女秘书都由我接收过来。这位女秘书是个睡眼朦胧的瑞士内地人，却有一个并非瑞士本土的姓名：伊尔瑟·弗劳依德。她的样子像个法国的酒吧女郎，她不停地把头发染成另外一种颜色，然而她工作倒是异常卖力的。总而言之，这笔交易我看不透其内幕何在。但这套位于帐篷街的附有接待室的办公房很合我的身分。从办公室朝马路上望去，可以看到必不可少的交通阻塞。那张写字台给人以一种信任感。此外，几张沙发也很有派头。朝着后院有一间厨房和一间里屋。我把我原来用的那张长沙发躺椅放在里屋，我没法同我用惯的家具分手。我的业务似乎一下子就兴隆起来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离婚案即将到手；受某个大工业企业家的委托（是柯勒推荐我去的），我就要去一趟加拉加斯；我要去调解遗产纠纷；要去为某个家具商人出庭辩护；还有一些可以赚钱的报税工作。我处在一种过于轻率、过于幸福的情绪之中，因而没有去想那个私人侦探的事。我已经把他的一批人发动起来，要等他们的报告，以便进一步处理柯勒的案件。如果我过问一下的话，那我会对里恩哈德更不信任的。我本来就对他抱有怀疑：这人有背景，有摸不透的企图。他是柯勒推荐给我的，对这项任务过分热心。他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彻底。他把他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勋贝希勒派到戏剧大饭店去。此人在新市场口有一所旧的，但很舒适的房屋。他把阁楼扩建成一个客厅。他把他极为丰富的唱片收藏在这儿。客厅到处装上扬声器。勋贝希勒热爱交响乐。他的理论（他这人满肚子是理论）是：交响乐最不会强迫人去听，人们一面听交响乐，一面可以打哈欠、吃饭、看书、睡觉、谈话等等。音乐本身在交响乐中得到扬弃，宛如天外音乐，人的耳朵是听不见的。音乐厅他认为是野蛮的东西而加以拒绝。他把音乐当做一种宗教崇拜来看待。他声称不是交响乐的音乐只可用来做背景音乐，只能作为“陪衬”，交响乐才是富有人情味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东西。他说，他一面吃蔬菜牛肉浓汤，一面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这才懂得了这首曲子。他建议在听拉姆斯的交响乐时玩字谜游戏，或者吃维也纳肉排时也可以。听布鲁克纳的交响乐时可以打雅斯牌或是扑克牌。然而最好是同时放两首交响乐。据说他就这样搞过。他知道他放音乐会造成喧闹声，因而他在把房子租给另外三家房客时，按照精确计算的办法来征收租金。直接位于他这个客厅下面的那套住房最便宜：房客不需付钱，只要能受得了音乐的响声就行了，一连听几个小时的布鲁克纳，几个小时的马勒，几个小时的肖斯塔柯维奇等等。中间的一层住房租金与一般相同，最下面一层的住房则租金贵得吓人。勋贝希勒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的外表并无特殊之处，相反，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他简直是模范市民的化身。他穿着很讲究，身上总是香喷喷的，从来没有喝醉过。他同周围的人都是友好相处的。至于他的国籍，他说他是列支

敦士登人。对此他常表示，这算不上什么，他说，他承认这点，然而他至少不必感到惭愧，因为列支敦士登对目前的世界局势，相对地说，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它印邮票印得太多以及财政上有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之外。它是最小的国家，花钱却最大手大脚。一个列支敦士登人也不容易害自大狂的毛病，不会因为自己是个列支敦士登人就有什么特殊价值，而在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身上容易看到那些毛病，他们先验地相信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法国人就是高人一等。做一个大国的公民——在列支敦士登人看来，别的国家几乎统统都是大国，就连瑞士也是——心理上就同时产生了对自己相当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有危险害某种比例错觉的毛病。一个国家越大，这种危险也越大。他常常用老鼠做例子来解释这一点：一只老鼠，单独存在时，它还完全把自己看成是老鼠。可是一旦它知道自己同百万只老鼠在一起，它就认为自己是只大象了。他说，最危险的是五千万只老鼠的鼠族（五千万作为大小的级别）。这种鼠族里的老鼠一方面固然只把自己看作是猫，然而另一方面却希望成为大象。这种膨胀过分的自大狂不仅对它们本身很危险，而且对整个老鼠世界都是很危险的。他把“老鼠数目”与由此而形成的自大狂的关系称为“勋贝希勒法则”。问起他的职业来，他就说是作家。这当然令人吃惊，因为他既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也没有写过任何作品。他并不否认这点。他说自己只是个“潜在的作家”。对于他不写作的原因，他总是振振有词的。譬如他有时声称，从事创作是以“对名称的感觉”开始的，这是创作艺术的首要条件，另外就是出于对真实性的热爱而产生的道德条件，这也是同等重要的。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就会明白，譬如像《拉乌尔·勋贝希勒诗集》这样一个书名会仅仅因为联想就变得行不通了，因为在德语里“勋贝希勒”意思与“美丽的小溪”相仿，书里的诗歌必须有如一条美丽的小溪那样潺潺流去。当然，你们也可以反驳说，那就把勋贝希勒这个名字改掉好了。但这么一来，又同热爱真实性这个原则相抵触了。勋贝希勒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欢笑声。他是一个好伙伴，酒店里有许多人都是靠他生活的。酒帐他都是先赊欠，每个月他们给他送一回帐单，钱加起来一定是很可观的。大家也不了解他的收入。他自称得到一笔列支敦士登优厚的国家奖学金，这当然不是事实，有几个人说，他是某些橡胶商的总代理商。他懂得很多，而且具有锐利的、理由始终考虑得很仔细的判断力，这点也不容忽视。（也许他不写作并非仅仅出于好像是懒惰，也许其中还含有一种洞察力，那就是与许多从事创作的人相反，他觉得不创作比创作更好。）然而最著名的却是他和别人搭讪攀谈的本事，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在这项艺术上是不擅长的。而勋贝希勒却把这项艺术掌握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人们流传着有关这方面的轶事，形成了传奇。譬如说，他曾经与人打赌（这是警察局长固执地这么说的），同一个在邻桌上与州政府委员们用午后4点钟茶点的联邦议员搭讪起来，大谈起我国与列支敦士登的关系，以至于这位要人误了他回伯尔尼去的快车。很可能。然而一般而言，联邦议员们是不怎么可信赖的。此外，勋贝希勒被认为是个好人。他当里恩哈德的情报人员，那是谁也梦想不到的。在这事泄露出来之后，众人大为哗然。勋贝希勒离开了我们这座城市，如今带着他的唱片收藏品住在法国南部，此事很令我城同胞遗憾。前不久还有人挥拳威胁我，幸好我当时和勒基在一起。这位怪人，我指的是勋贝希勒，有一天出现在戏剧大饭店，引起众人惊讶，因为他平常是不在那儿露面的。他占了一张桌子，呆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如此情况足

有一星期之久。他同所有的人聊天，跟服务部主任和女招待们交上了朋友。然而过后他又消失了，却重新在他原来常去的小酒店出现，这好像是一段间奏曲。其实呢，勋贝希勒是把主要证人重新审讯了一遍。至于别的调查工作，里恩哈德则使用伏依希亭来做，这人是里恩哈德在他谷田路侦探事务所里雇用的那些声名狼藉分子当中的一个，我当时还不认识他。现在我才认识，是在摩纳哥酒吧认识的。伏依希亭是个靠不住的、令人讨厌的家伙，这点谁也无法否认，连里恩哈德也不否认。警察已经逮捕了伏依希亭好几次（为了吸毒），但后来又收买他为警方搞侦查工作。伏依希亭是个了解他这个行当与环境的坐探。很可能他从前有过好日子，甚至有可能他还上过大学。但他现在靠借贷诈骗维持生活，情况十分可怜。他谈起这个话题时，一面愁眉苦脸地对着他的一杯贝璠酒发愣，一面说（在摩纳哥酒吧），倒霉的事是，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德国人。当德国人在瑞士算不了职业，也许在埃及或是在沙特阿拉伯可以。在瑞士，只有当俄罗斯人算是一种职业。如果他是俄罗斯人，他就不会引起别人反感了，相反地，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就正好有义务成为他现在这种样子：喝得醉醺醺，威信全无。可是在这儿连装做俄罗斯人都不行，因为他的外表就同法国抗战影片中的德国人一样。在这一点上，他说了真话。这在他是一个例外。他的确是这副模样。他对上层与下层社会了如指掌，这点谁也不及他。他对各个酒吧和小酒店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他可以打听到每一个常客的每一件事。然而在里恩哈德把勋贝希勒和伏依希亭调查到的东西送给我之前，我第二次会见了莫尼卡·施泰曼。这事情的出现，当时是我所害怕的还是希望的——我也弄不清了。这种会面（第一次以及第二次都如此）最好是没有发生过。

在中央图书馆进行的研究：为什么不叙述一下施泰曼的家族历史呢？刚刚我收到柯勒新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一张是一个月以前寄到的。这种猫逮耗子的游戏还在继续。他要晚一些时候再去萨莫阿了，他现在从夏威夷到日本去——乘坐豪华客轮。而我在这儿却是面临监察委员会的审查，坐在委员会主席，尤金·劳平格教授的对面。这位著名的刑事法学家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他脸上有击剑伤疤，富有诗意，头顶已经完全秃了。副主席施多斯也在场，他具有运动员的风度，精力充沛，虔诚乐观，自由自在。这两位先生很通情达理。劳平格说，把我从律师协会中开除出去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不这样做，州政府也会提出申请的，那还不如自己先这样做来得聪明些。但是他们感到惋惜，心情沉重，对我是关怀的，对我可说是完全理解的，同情的，根本不想责备我。但是，他说，就男子之间来说，凭良心，我自己也应该承认，正是搞司法工作的人在某些场所需要公开表现出某种生活作风，甚至可以这样说，场所越有问题，作风就越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如今世界嘛，是一个可怕的庸人社会，特别是我们这个宝贝城市，简直叫人没法呆下去。他，劳平格，可以在这儿关门大吉了，他要到南方去了。然而主要的不是生活作风。妓女也是人，甚至是可贵的人，可怜的人，他本人就从她们那儿得到过许多东西：温暖、同情、理解等等，他完全可以当着我的面，当着同事施多斯的面承认这点。当然法律也是允许——用个不好听的词，在街上拉客人的。但这绝对不是要提倡的意思。他说，我是搞法律的，我应该自己认识到，我在这方面给下层社会和半上流社会的人提供的某些建议，正因为是在法

律上是驳不倒的，所以起的破坏作用十分可怕。运用法律的知识掌握在某些圈子的人的手里，是灾难性的。警方简直感到无计可施。监察委员会虽然不做硬性规定，不搞思想方面的暴政，完全是主张自由的，是嘛，我是知道的，但是章程总归是章程，就连不成文的也是如此。后来，在施多斯出去上厕所时，这位老掉牙的大学生社团成员、勇士劳平格还问我，能不能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好让他更好地结识一下某个身材美妙的人（那就是吉赛勒）。而在他出去上厕所时，施多斯，这位从前的优秀体操运动员，也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两个星期之后，我的律师执照给吊销了。这样一来，我就一文不名地一会儿坐在不卖酒的饭店里，一会儿坐在摩纳哥酒吧，我或多或少是靠勒基和吉赛勒的慈悲过日子的。我有的是时间，大量的时间，而这对我来说是最糟糕的事。因此我想，我为什么不把施泰曼的家族史写下来呢？于是我终于坐在中央图书馆——只是，在我带了瓶杜松子酒走进时，人家的态度当然就变得强硬起来了——我何不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呢？要极其准确，我为何不去揭示背景呢？何况没有家族历史与家族故事的背景还叫什么施泰曼一家呢？姓名是不可靠的，施泰曼祖先虽然同许多工业家一样是从北方移居到我国来的，但那是早在1191年光景，当时有个德国南部的公爵忽然想出这么个坏主意，要建立我们今日的联邦首都。这个主意，正如大家知道的，取得了成效，而施泰曼一家就是最早的瑞士人。至于这个家族的创建人雅可布斯·施泰曼，则是那时栖身在绿色河流上方悬崖上一个强盗窝里的一群流浪汉之一（当时从那儿到我们这儿要着实奔走四天的时间）。他是从阿尔萨斯逃出来的罪犯，他以这样的方式保住了自己脑袋免遭斯特拉斯堡的刽子手的刀斧之灾。在新的家乡城市他先是当兵，然后干起了打铁锻造兵器的行当，当了一个粗野的满脸烟袋的伙计。几百年来，这个城市的血腥历史与施泰曼一家结了解之缘。他们是锻造武器的铁匠师傅，在劳朋和圣雅可布等地厮杀使用的本地武器都是他们造的，而且是按照阿德里安·施泰曼（1212—1255）的标准型号。他们甚至获得制造德国南部整个主教管区使用的行刑刀斧和刑具的特许。家业直线上升。在凯斯勒巷的铁匠铺有了响当当的名气。阿德里安的儿子，秃顶贝脱尔德·施泰曼一世（不知是否传说中的贝脱尔德·施瓦茨？）就已经开始生产火器。贝脱尔德的曾孙，雅可布斯三世（1470—1517）就更加出名了。他制造了十分著名的大炮，例如名字叫“四福音书”、“诗篇”、“黄鬼”的大炮等等。从他起，铸造大炮作为家族传统一代代接替下来，尽管他的儿子，贝脱尔德四世，曾经突然中断过一阵。他是再洗礼派教徒，他只制造铁犁。可是他的儿子，雅可布斯四世就又继续铸造大炮了。他还设计了第一颗榴弹。在引爆时，发生意外，自然把他本人和大炮一起炸了个粉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史前史。一目了然，这个家族在那个时期比较正派，政治上成就也不小，出了一个地方议会的议长，出了两个司库，还有一人当上了地方长官。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锻造武器的铁匠铺逐渐发展成一家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家族历史变得大为复杂。做事的动机开始隐蔽了，关系线索看不清楚了。原来只有国家观念和国内联系，如今又增加了国际观念和国外联系。人们在信念方面有所失，然而在组织方面则有所得，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那时有个原施泰曼家族的后裔来到我国东部。这位海因里希·施泰曼（1799—1877）也被看成是原特罗格机器与武器制造厂的创建人。

---

过去大学生社团成员以击剑有伤疤为标志，故有此称。——译注

这家工厂到了他的第一个孙子詹姆士（1869—1909），特别是到了他的第二个孙子加布里埃尔（1871—1949）手里得到蓬勃发展。自然，它已不再叫做特罗格机器与武器制造厂了，而是用了特罗格假肢制造厂的名称。因为在1891年，二十二岁的詹姆士·施泰曼结交了当年已七十一岁高龄的英国女护士翡冷翠·夜莺，受了她的影响，他把武器制造厂改建成假肢制造厂。在他夭折之后，他的弟弟加布里埃尔又将工厂扩大了，生产的品种应有尽有，假肢的品种有：假手、假臂、假脚、假腿等，现在该厂也生产假内肢（人造腰臀、人造关节等等）和人工器官（人工肾、人工肺）供应国际市场。说是国际市场，那一点也不夸张。这是通过坚忍不拔的工作，通过产品的高质量争取来的。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有魄力地充分利用形势，通过无所顾忌地购买所有生产假肢的外国工厂（大都是小企业）取得的。这新的一代施泰曼家族了解我们国家的中立给假肢制造商带来的发展机会，那就是他们有自由同时向交战的各方销售产品，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与战败国，当今的政府军、游击队和叛乱分子。他们的口号是：“施泰曼为受害者服务”，尽管假肢厂的生产如今在吕德维茨的领导下又朝原先的特色接近了，但“假肢”的概念是可以延伸的。一个人在挨到一下打击时，会不由自主地用手抵挡来保护自己，因此一面盾牌也就可以说是一只假手。向人扔的一块石头同样也可以认为那是一只“握紧的假手”，也就是“假拳头”。一旦理解了这种辩证法，假肢厂重新开始生产武器那就不足为怪了，这完全符合假肢的概念：坦克、冲锋枪和大炮都可以看成是“假手”的继续发展。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成就巨大的家族。施泰曼家族的男子汉都是些单纯、粗鲁、直来直去的伙伴，忠贞的丈夫。他们干活辛辛苦苦，花钱往往比较吝啬。他们十分自信地蔑视学问才智，这种态度有时令人觉得新鲜。他们在收集图画方面只限于收藏价值不高的死人岛一类的作品，在体育方面，他们唯独资助足球运动。（这也只是一般的资助而已，特罗格足球队在甲级足球联合会中的困难处境即为明证。）而家族中的妇女们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要么就是大婊子，要么就是大宗教迷，然而二者从来不曾同时出现过。那些当婊子的都是丑八怪，高颧骨，高鼻子，大嘴巴；而那些宗教迷却尽是些美人。至于莫尼卡·施泰曼（没想到她将在柯勒博士的事件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甚至是双重角色）却是在外貌上属于宗教迷这一类，而按照她的生活作风来判断则要划到大婊子一类去。她的双亲（加布里埃尔·施泰曼于1920年娶施特伐妮·吕德维茨为妻）坐飞机去伦敦时失事身亡（说得准确些是失踪，因为她的双亲和那架私人飞机事后都没有被找到），她的兄弟弗里茨在科特达祖尔下海潜水再也没有浮上来，在这些亲人亡故之后，这个在1930年出生的莫尼卡便继承了我们国家最为可观的一笔产业。那家假肢康采恩则由她的舅舅掌管。莫尼卡的生活作风当然要比康采恩更要难管得多。关于这位姑娘流传着最粗野的、也往往是最可笑的谣言，它们越积越多，成了“几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后来又逐渐消失，有人——总是她的舅舅吕德维茨——出来辟谣，可是，正因为这样，谣言却又重新被人们所相信，一直到新的、更大的丑闻压倒了一切从前流传过的谣言为止，就这样，这种游戏周而复始。人们看到这位几百万家产的继承人如此伤风败俗，虽然颇多指责，但暗中不免又有为之骄傲之感，且有羡慕之心（她这家伙干了什么事都没关系），还有感激之意，因为

终于能听到些奇闻可以解闷了。莫尼卡·施泰曼成了一个城市中正式的“达到国际水平的狐狸精”。这个城市的声誉一方面通过市政当局、教会、公共福利社团的拼命努力得以勉强维持；另一方面又被那些向同性恋者卖淫的男娼弄得很糟。我们这个城市由于这种人而国际闻名。人们几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封建古板的两性关系和同性恋猖獗同时并存的双重名声，通过莫尼卡而向一般性恶习方面转化了。这位姑娘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她被我们的市长在他的即席演说和六音步诗中提到以后，更受欢迎了。市长常常喜欢在官方庆典中发表他的即席演说和六音步诗，在文学奖金颁发仪式上也好，或是在某个私人银行的周年纪念活动上也好，他都喜欢这样做。然而我之所以害怕第二次遇见莫尼卡·施泰曼则有某种原因。我是在莫克那儿认识她的。当时我还在斯迪西-劳埃平那儿工作，莫克的工作室在沙夫豪瑟广场附近，冬天取暖时，温度过分地高。铁炉烧得通红，空气中弥漫着烟斗、雪茄和香烟发出的烟雾，这些烟雾简直成了毒气，室内样样都脏得难以想象。一直未完成的雕塑上蒙着永远是湿的布块，雕塑之间放着成堆的书、报、没有拆封的信、葡萄酒、威士忌、速写、照片等等。我是来看莫克给莫尼卡·施泰曼塑造的全身立像的，我很好奇，因为莫克告诉我他要把这尊塑像涂上色彩。这座雕塑放在杂乱无章的工作室的中央，自然主义的手法令人吃惊，但十分逼真，大小与真人一样。据莫克声称它是石膏做的，涂上了肉色，全身一丝不挂，摆成很明显的不正经的姿势。我对这座立像观看了很长时间，惊叹何以莫克也有如此一手。他一向是个用粗线条手法进行暗示的大师；他在露天工作，用不了敲凿几下就能把一块常常有一百来公斤重的大石头雕刻成他所要表达的东西，石头上雕出一只眼睛，一张嘴，也许雕成一个乳房等等，别的他就不需要再雕了，观看的人通过幻想就能把暗示性的雕像一会儿看成是独眼巨人的头，一会儿看成是一只动物，一会儿看成是个女人。在塑造模型时，他也只求塑出最必要的部分，他常说，塑造模型就要像画速写一样。因此他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就越发令人惊讶了。石膏立像仿佛在呼吸，尤其是涂的色彩神妙之极。我朝后退了几步，上下打量，然后又到近旁仔细端详，它的头发和阴毛一定是莫克采用了人的毛发，以求立像更为真假难辨：立像给人的印象一点也不像木偶。它具有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表现力。突然，它动起来了，它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对我不屑一顾地径自走到工作室的后部，寻找着，找到半瓶威士忌酒，然后喝将起来，这立像不是石膏做的。莫克骗了我。原来这是真的莫尼卡·施泰曼。

“您是第四个上当的人，”莫克说，“您脸上露出了一副蠢相，您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的。”

我走了。放在工作室另外一个角落里的那座上了色的石膏立像第二天就给运走了。是莫尼卡的舅舅吕德维茨派人来运走的。吕德维茨掌管特罗格假肢工厂。

莫尼卡·施泰曼之一：我的报告越往下越难写，不仅报道的事情混乱不堪，我扮演的角色也变得含糊不清了，到底是我在采取行动呢，还是人家通过我采取行动呢，或是人家对我采取行动呢，我都说不清。尤其是，我越来越怀疑里恩哈德把莫尼卡·施泰曼牵连到这场游戏中来是不是由于凑巧。我替那个家具商人打官司的运气不佳，他用一张他虚构的罗马专家的证书来证明那些在加格乃克制造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橱柜是真品，还加上了专家的签名，这些弄虚作假的情况我没有看出来，然而耶麦林看出来。但是去加拉

加斯出差的事就在眼前，正在进行准备的时候，秘书伊尔瑟·弗劳依德通报说范特来了，这人也是里恩哈德手下的一员。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胖胖的、抽着布里萨哥烟的范特身上穿着交警制服。他过去曾作为交警服务过二十年。

“您疯了，范特，穿了这样的衣服出来。”我说。

“会有用的，施佩特先生，”他叹了口气说，“会有用的。莫尼卡·施泰曼打电话来。她需要一个律师。”

“为什么？”我问。

“她说她挨揍了。”

“是谁揍她的？”

“贝诺博士。”范特回答说。

“为了什么事？”

“贝诺博士跟别人睡觉，叫莫尼卡给逮住了。”

“那么，应该是莫尼卡揍贝诺呀，事情真是滑稽，不是吗？再说，为什么偏偏要我去管莫尼卡·施泰曼的事呢？”

“里恩哈德不是律师，”范特回答说。

“她在哪儿？”

“当然在贝诺博士那儿。”

“嘿，范特，别绕圈子啦，贝诺在哪儿？”

“是您在绕圈子问我嘛，”范特说，“贝诺在布莱亭格饭店揍莫尼卡·施泰曼。库克斯哈芬亲王也在那儿。”

“就是那个赛车运动员？”

“就是他。”

我打电话给布莱亭格饭店，要找贝诺。饭店经理贝德罗里来接电话，问打电话的是谁。

“施佩特，律师。”

“他又在揍莫尼卡·施泰曼了，”贝德罗里在笑。“您走到窗口去就可以听见了。”

“我是在帐篷街啊。”

“没关系。这声音全城都传遍了，”贝德罗里说。“客人们纷纷逃离我这五星旅馆。”

我的跑车停在施普莱歇街。范特坐到我旁边，我们开车出发了。

“走海基巴赫街，”范特说。

“那绕远道了，”我提醒他。

“我们马上到，没关系。莫尼卡·施泰曼能坚持。”

车子开到克鲁斯街附近一条停车线处，范特下了车。

“您回来时，请经过这儿，”他说。

这时正值10月底。树木都是红色和黄色的。马路上到处都是落叶。我的车子开到时，莫尼卡已经在布莱亭格饭店门口等待了，她身上只穿了一件男式的睡衣，左边的袖子已经没有了。她个子高高的，红头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很美。她浑身冷得发抖。她的左眼发青，被打肿了。嘴巴也给打破了。光膀子上满是抓破的伤痕。她招着手叫我过去，嘴里朝外面的远处吐着

血。贝诺在大门里暴跳如雷，两个行李搬运工拽住了他。他也是浑身伤痕。旅馆的窗户外面挤满了人。莫尼卡周围是些看热闹的人，他们非常好奇，脸上露出狞笑。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在一辆白色的跑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金发男子，显然是库克斯哈芬，一个青年西格弗里德型的人物，看得出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开车。从饭店里走出来的是经理贝德罗里，他个子矮小，动作灵巧，他拿来一件毛皮大衣给莫尼卡·施泰曼披上。这肯定是一件很值钱的毛皮大衣，但我在这方面不在行。“您受凉了，莫尼卡，您受冻了。”

“我恨毛皮大衣，你这可怜虫，”她说把毛皮大衣扔在他的头上。

我在她的身边停下车。“里恩哈德派我来的，”我说。“我姓施佩特，是施佩特律师。”

她费劲地登上我的跑车。

“您给打坏了，”我看到她这副样子，便说道。

她点点头，然后她盯着我望。我本来要开车的，但她的目光把我有点弄糊涂了。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曾经见过面？”她问，说话很吃力。

“没有，”我撒了一个谎，便开动汽车。

“库克斯哈芬追我们来了，”她说。

“让他追好了。”

“他是赛车运动员。”

“而且是甲类赛车运动员。”

“咱们甩不掉他的。”

“那还用说！咱们去哪儿？”

“到里恩哈德那儿去，”她说，“到他家去。”

“库克斯哈芬知道里恩哈德住在哪儿吗？”我问。

“他连里恩哈德这个人也不知道。”

车子开到海基巴赫街停车线时，我按规矩停了车。人行道上站着身穿警察制服的范特。他走到我的跑车跟前，向我要证件看，我递给了他，他核对了一下，客气地点点头，然后去找那个不得不在我车子后面停车的库克斯哈芬。范特现在仔细地审核他的证件。然后，他绕着库克斯哈芬的车子转，慢慢地、不厌其烦地一再核对证件。我在反射镜里看到库克斯哈芬在咒骂。我还看到，他不得不下车，范特掏出一个记事本。这时我就穿过克鲁斯街朝湖边开去，穿过高坡路开到毕勃林街，到阿德利斯山，为了保险起见，又绕了几次弯路，然后穿过猫尾街飞快地向里恩哈德的平房驶去。

我在花园门前停车。近旁停着的一辆夏来牌轿车想必是耶麦林的。我在报上看到，他今天六十大寿，因此，这条平时大概很冷清的街上停了那么多的汽车。他在花园里宴请客人。刚才斯迪西-劳埃平开车来到。莫尼卡·施泰曼穿着那件黑色睡衣跟在我后面一拐一拐地登上陡峭的台阶，嘴里咒骂着。斯迪西-劳埃平已经下了车，朝我们这边望，显然感到十分有趣。耶麦林的脸在矮树篱笆那边冒了出来，显出很不以为然的表情。

“在这儿，”莫尼卡·施泰曼说，递给我一把钥匙。我开了大门，让莫尼卡走进来。穿过大门可以直接进入客厅。那是一间现代化的屋子，家具是旧的。通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一间卧室，里面有一张舒适的床。莫尼卡在

一张长沙发上坐下，瞧着一张挂在旧柜子上方的毕加索的画。“他给我画过像。”

“我知道，”我说。

她很感兴趣地打量着我。“现在我知道，我是在哪儿看到过您了，”她说。“就是在莫克那儿。我装作一座立像给您看的。”

“可能，”我回答道。

“您那时大大地吃了一惊，”她回忆着说，然后问道，“因为您当时一点也不喜欢我的样子，所以您把我忘记了。”

“哪里，哪里，”我说。“我是喜欢的。”

“那么说，您并没有忘记我啰？”她说。

“没有完全忘记，”我承认道。

她笑了。“您能回忆起来，那就好了。”她站起身来，脱下睡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放浪而富刺激性，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身上被贝诺揍得实在够呛。她走到大窗跟前，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耶麦林的家。客人们已经聚集在那儿，他们都朝这边望，耶麦林用望远镜观望，斯迪西-劳埃平立在他旁边挥手打招呼，莫尼卡摆出莫克给她塑像时的那种姿势，斯迪西-劳埃平拍手鼓掌，耶麦林握拳威胁。

“多谢您解救了我，”莫尼卡·施泰曼还一直摆着那个让人观看的姿势，背朝着我。

“这是碰巧，”我回答说。“受里恩哈德之托。”

“我总是在挨揍，”她若有所思地说，“先是贝诺揍我，后来是库克斯哈芬揍我。别的人也一直揍我。”她又转身对着我了。

“这会使先前的人重新跟你和解的，”我说。“现在您的右眼也肿起来了。”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要我去找一块湿毛巾给您？”我问。

“废话，”她说，“不过，您可以在柜子里找到白兰地和酒杯。”

我打开一只旧的恩加丁柜子，找到了她要的东西，给她斟酒。

“您大概常来这儿？”我问。

“有时来。我大概真的成了婊子了，”她强调地说，有点怨恨也有点惊讶，然而却满不在乎。

我笑了，“婊子受到的对待还要好些呢。”

她干了那杯白兰地，然后说：“现在我去洗个热水澡。”

她一拐一拐地走进卧室，不见了。我听见放水的声音，咒骂的声音。之后，她回来了，又要一杯白兰地。

我给她斟酒：“这对您的身体不会有害处吗，莫尼卡？”

“胡说八道，”她回答说，“我身体棒着呢。”于是她又一拐一拐地返身走了。

我走进浴室时，她躺在浴缸里擦肥皂。“身上刺痛得厉害，”她说。

我坐在浴缸边上。她的脸色阴沉下来。

“您知道我现在怎么办吗？”她问，我没有回答，她就接下去说，“洗手不干了，我洗手不干了。”

我毫无反应。

“我不是莫尼卡·施泰曼，”她满不在乎地声明道。我惊讶地瞧着她。

“我不是莫尼卡·施泰曼，”她重复道，然后安详地说，“我只是当莫尼卡·施泰曼的替身，我的父亲是温特教授。”

沉默。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

“您的母亲呢？”我问，话一出口，我马上就知道这个问题提得荒唐。她母亲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她并不在乎。“是个教师，”她回答说，“在艾门塔尔。温特把她遗弃了。他总是遗弃教师。”

她说这话时并不生气。

“我名字叫达芙纳。达芙纳·米勒，”说完，她笑了，“一个人本来不可以叫这样的名字。”

“要是您不是莫尼卡·施泰曼，那么谁是莫尼卡·施泰曼呢？”我给弄糊涂了，于是问道，“有没有这个人哪？”

“您去问吕德维茨吧，”她答道。

随后，她疑心起来。“您这是审问我吗？”她问。

“您要找一位律师的，我是律师。”

“我用得着您时，会告诉您的，”她忽然沉思地说道，变得几乎怀有敌意。

里恩哈德出现了。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的声音。他简直是突然出现在这儿的。他把一支敦希尔牌香烟叼到嘴上。“满意吗，施佩特？”他问。

“我不知道，”我答道。

“满意吗，达芙纳？”他又问。

“马马虎虎，”她答道。

“我给你带来几件衣服，”他说。

“我不是有贝诺的睡衣吗？”她说。

屋外传来救护车的声音。

“耶麦林的心脏病大概又发作了，”里恩哈德毫不同情地说。“我给他送去了六十枝玫瑰花。”

“他看见我裸体了，”她笑着说。

“裸体可是你的家常便饭哪，”他说。

“达芙纳是谁，您究竟怎么知道的，里恩哈德？”我问。

“就这么知道的，碰巧，”他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敦希尔牌香烟点着了。

“我可以把你送到哪儿去呢，米勒小姐？”

“到阿斯柯纳去。”

“我开车送你去。”

“办事卖力，”她称赞说。

“要拿手续费的，”里恩哈德说，“由他出钱，”他指指我，“他已经获得了几份不可估价的情报。”

“我还有一个任务也要委托他去办呢，”达芙纳说。

“什么任务啊？”里恩哈德问。

她眨了眨那只肿得还不至于睁不开的右眼，用左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朱红色的头发。

“我要他去通知真莫尼卡·施泰曼，那个搞同性恋的老处女，我不愿意

再见到她。由一个律师去告诉她，那就正式了。”

里恩哈德笑了。“姑娘，这会闹出一场你想象不到的风波来的。”

“我不在乎，”她说。

里恩哈德的香烟在浴室里的蒸气中燃不起来。他再一次点火。

“施佩特，”他说，“您不要卷进去。这是一个忠告。”

“是您把我拉进来的，”我回答说。

“这话也不假，”里恩哈德说着笑了起来，随后对达芙纳说，“你就洗手甬干了吧。”

“您一下子变成演说家了，”我对里恩哈德说，接着就走了。

晚些时候，我在帐篷街打电话给吕德维茨时，他大发雷霆。我知道得太多了，他瘪了气了。于是，我得以去拜访真的莫尼卡·施泰曼了。

致检察官的第二篇谈话：我写得越多，我的这份报告就显得越不可信。我用作家的手法，大加拼凑，甚至在文学性方面做了努力。我报道了气候情况，在地理方面力求精确，参考了城市地图。这一切都是因为您，检察官约尔欣姆·伏依泽尔先生，（请原谅我这个躺在陈尸房里的死人又在向您说话了）重视文学性，甚至重视诗意，把自己看成是具有文学修养的人，正如您一遇可能的机会和不可想象的机会（甚至在刑事陪法庭上）都喜欢提到的那样，所以，如果我的稿子里不带点文学佐料，它很可能被您扔到角落里去。然而，我的报告即使是文学创作，也带有陈词滥调，我感到遗憾。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廉价小说的作者：在小说里我是个醉心于正义的狂热派，里恩哈德是福尔摩斯，达芙纳·米勒是黄金海岸（我们的城市右湖岸就叫这个名字）的美色林娜。我在莫克那儿把活的达芙纳当做雕塑立像来欣赏，她乳房高耸，姿势很不正经（我在莫克那里时没有说），而那座用涂了色彩的石膏做成的富有性感的荡妇，比起我目前在报告中写的这个姑娘更为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她有没有同里恩哈德睡过觉？——她同谁不睡觉呢？——如果睡过的话，又有几次？这事本身自然是无所谓的。然而，在这错综复杂的世界里，一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其内在的动机与过程对我的报告来说总归是很重要的。如果外部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那么内部的动机即使不能很有把握地猜出来，至少也可以料想到。如果外部的事实不是真的，同人家睡了一次觉没有记载下来，或是报道了一次其实并没有同房的事，那么这就会使人感到含含糊糊捉摸不定。在这里情况也是如此。里恩哈德是怎样了解到假莫尼卡·施泰曼的秘密的？是因为他同她睡了觉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事应该有许多人知道了。她爱他吗？如果爱的话，她就不会告诉他这事。她害怕？很可能，至于贝诺，里恩哈德一开始就怀疑他吗？是因为达芙纳的缘故吗？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有人要把达芙纳之死归罪于我。我那时不该去找真莫尼卡·施泰曼的。但是达芙纳请求我这样做。我当时要寻找一个机会。我接受了柯勒给我的那项任务，也接受了一万五千法郎的预付酬金，尽管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仍然这样相信。因为柯勒博士是杀害温特的凶手，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这也可能是旁人干的，那只不过是一种可能，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在寻找这个可能性的过程中，暴露出某些过去忽视了的事实，那也是假定柯勒不是凶手而引起的。这种假定是因为我寻找可能性而不得不做出来的。再说，我必须

写真实，坚持真实，也就是：什么是真相后面的真相？我面临着猜测，在到处摸索。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夸张？什么是伪装？什么被隐瞒了？我应当怀疑什么？相信什么？在那些事情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有把握的东西，肯定的东西？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相遇的那些人，柯勒、施泰曼、斯迪西-劳埃平、里恩哈德、海伦娜、贝诺等等的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有把握的、肯定的东西？在我们的城市的后面，我们国家的后面究竟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有把握的、肯定的、实际的东西？一切不都是包得紧紧的，解脱不开吗？不都是与那些使世界上其他人处于紧张不安状态的法则与动机毫不相干吗？那些生活、恋爱、大吃大喝、走私、做买卖、苦思冥想、传种接代和扩大组织的人不全是一副土里土气的、中欧式的、乡巴佬的样子？不全是不真实的吗？我们还能描写什么呢？我们还能表现什么呢？我描写这一帮无赖还有一点儿意义吗？还有一点儿重要性吗？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一切事物的后面，在每一个人的背后找到答案，也许答案会在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合乎人情的场合与情况中出其不意地冒了出来，好像突然袭击似的，从一个隐藏的地方跑了出来。这个答案将是对我们的宣判，判决的执行就将是真理。我愿意相信这一点，热诚地、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采取行动，不是为了我在其中过着艰难生活的这个优秀社会，不是为了我周围的那些叫人受不了的行尸走肉，而是为了正义，为了伸张正义；我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我要维护人性的最后一点残余。（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是带有悲怆的、庄严的、崇高的、神圣的严肃性，是要用管风琴来伴奏的。我不去划掉某些字句，也不去修改，修改有什么用？修辞又有什么用？不是要当文学家的野心在引导我行动，而是谋杀的意图在指使我行动。再说：我并没有喝醉，检察官先生，您弄错了，我没有醉，我是清醒的，冷静而清醒，非常清醒。）我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大喝其酒（祝您健康，检察官先生，干杯！），只有去嫖，去写报告，去报告我的思想，去打我的问号，我只有等待，等待，直到真相大白，直到那位铁面无私的执法女神揭开面纱为止。（这话又变得文绉绉起来，真叫人作呕！）这是不能在纸上谈谈的，真相不是公式，不能书写下来，真相不能靠在语言上下功夫来获得，也不能靠文学创作来获得，真相只有在突然惩罚时，在自行主持正义的行动中，才起作用，才能被人预感到它的存在。我一旦站在柯勒博士的面前，正视着他，伸张正义，执行判决，真相也就大白了。那时，在刹那间，在心脏一次跳动的时间内，一种闪电般迅速的不朽的行动，一声枪响，真相在一秒钟内就放出了光芒。这个真相，现在在我思考时是捉摸不住的，它几乎是不存在，它像是一个希奇古怪的、恶劣的童话。在我看来，我去访问真莫尼卡·施泰曼的情景也像这样一个童话：不像是现实，倒像是做梦，不像是真事，倒像是神话传说。

莫尼卡·施泰曼之二：憩园别墅位于我们城市边缘一个十分广阔而且极为荒芜的花园之中，因此，这座别墅长久以来几乎看不见了，只有在冬天，穿过纷乱的老树干，朝着华格纳山岗有时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几堵墙壁和一个尖屋顶。只有很少的人能记起在憩园里曾经招待过客人。真莫尼卡的父亲和祖父现在都已经在楚格湖畔和日内瓦湖畔他们的庄园里宴请客人和举办周年庆祝活动了。他们只是为了工作（他们还表现出自己是工业上的重体力劳动者）才待在我们这城市，进行欢庆活动都是在外地。妇女们如果来我们的城市访问，都是在大饭店里下榻。憩园逐渐成了一个神话传说，特别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之后：一天早上，有三个从德国来的闯入者被打得叫苦连天，

躺在施泰曼的别墅花园门外。警方对此未加评论，因为吕德维茨进行了干预。除了达芙纳（人家以为她是莫尼卡·施泰曼）以外，似乎没有别人住在这屋子里。送货来的人必须把货物放在花园大门旁的一个空汽车房里，送来的食品货物数量相当可观。达芙纳自己不邀请客人来别墅，她在曙光街还有一套公寓房子。我开车去华格纳山岗之前已经喝了两杯酒。天气又一次骤变，湖水看起来像条小溪，对岸显得是如此之近。这时是下午4点钟。我在花园大门外停车，车子一半停放在人行道上。大门没有锁。我走进花园，心里不太踏实，那两杯酒还在起作用。石子路通向上坡，间或有几级木头阶梯，但是一点也不像我所料想的那么陡，我原想，山岗不就意味着陡坡吗？花园没有很好维护，路上杂草也没有割除，喷泉附近长满藓苔，花园里有些部分带有原始森林的景色，处处布置着无数的陶俑，它们不是单个儿点缀地放在那儿，而是成群地、大批地、毫无意义地竖在那儿，它们有着白胡子，红通通的脸，笑眯眯的，傻呵呵的，有些甚至坐在树上，就像鸟一样地停在树枝上。后来又看到大一些的陶俑，样子气呼呼的，甚至是恶狠狠的，其中也有女的，它们比男的大，都是些可怕的大头女陶俑。我感到仿佛自己在受到她们的追逐、包围，我越走越快，一直到拐了一个急转变，绕过一棵巨大的老栎树后突然被截住为止：这时我好像是撞到捕兽机上去了，弄不清撞上了谁，是谁把我转了一个身，这人显然是一个保镖，后来剩下的那段到别墅去的路，我与其说是由他领着，还不如说是被他抱着走完的。在屋子门口站着第二个保镖，块头那么大，好像把门都堵满了似的，他接我过去，把我推进别墅的里面，先是穿过一个前厅，然后穿过一个炉火熊熊的大厅，壁炉里像是在燃烧整整一根大树干，最后到了一个沙龙，也许不如说是一个小客厅。他们让我跌落在一张皮沙发里，我昏昏沉沉地抬眼望去。我的膀子和背脊都在作痛。那两个保镖坐在我对面的笨重的皮沙发上。他们都是秃头，脸像是陶土做的。小眼睛，大颧骨。他们很留意衣着，像是在盛夏一样，他们穿着纯丝的深蓝西服，系着白色丝领带，脚上穿着运动员的鞋子。他们样子像巨人，其实个子长得并不特别高。我对他们点了点头。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我朝四周望望，装上护壁板的墙上挂着和贴着照片，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深褐色的壁板上仿佛蒙上了一层照片的壁毯。一种古怪的惊奇感伴随着我的每一个发现。带着同样的惊奇感，我发现这儿的照片拍的都是同一个人：贝诺。后来我才发现在带有窗栏的窗户对面的一个壁龛里放着莫克的那尊有伤风化的杰作；裸体的假莫尼卡·施泰曼——达芙纳的塑像，只是现在这是一尊铜像了。她用双手托着自己的乳房，像是托着两只砝码。我发现这座立像时，对面的一扇双开门打开了，另外有一个秃头保镖（他比坐在皮沙发上的那两个更魁梧，更显得满身是丝绸）抱进来一个个头像四岁小孩一样高的满脸皱纹、背脊弯曲的人。那瘦小、畸形的身上穿着一件滑稽可笑的、领口开得很低的黑色连衣裙，衣服上有一颗蓝宝石在闪光。

“我是莫尼卡·施泰曼，”这怪物说道。

我站起身来。“我叫施佩特，是律师。”

“原来是这样，是个律师，”这个头很小的东西说道。叫人毛骨悚然的是，这小人儿的声音好像是肚子里的另外一个人说出来的，那是一个妇女的声音。“您找我有什么事？”

抱着这怪物的保镖一动也不动。

“莫尼卡……”

“施泰曼夫人，”这怪物纠正我的话说，随后扯了扯自己的衣服，“人造纤维的，很漂亮，不是吗？”她的声音带有从容而自负的讥讽口吻。

“施泰曼夫人，达芙纳不愿意再回到您这儿来了。”

“这是她叫您转告我的？”怪物问。

“是她叫我转告您的，”我答道。

我猜不出怪物对转告她的话持何态度。

“喝点威士忌好吗？”她问。

“很好。”

怪物几乎没有做什么手势，我背后的双开门便打开了，第四个秃头保镖带来了酒和冰块。

“纯酒？”她问。

“要放冰块的。”

第四个保镖留下来侍候。最先来的那两个也站起身来。

“您觉得我的仆人如何，律师？”怪物问道。那个抱着她的汉子把酒递到她的嘴边。

“令人惊叹，”我说，“我还以为他们是您的保镖呢。”

“令人惊叹，可是笨手笨脚的，”她说道，“乌兹别克人。俄国人在小亚细亚某个地方找到了他们，把他们安插到红军里，后来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因为纳粹的人种学家对于把他们划归为哪个种族没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所以他们保住了性命。我父亲从一家人种研究所把他们买了回来。那时买这样的畜生价钱很便宜。他们只是作为人类无用的剩余物资。对我来说，他们是乌兹别克人，因为我喜欢这个词儿。您见到了那些花园中的陶俑了吗，律师？”

我脸上汗都流下来了。这屋子里温度太高。

“多得像整整一支军队呢，施泰曼夫人。”

“我有时混在女陶俑中，”怪物笑着说，“即使我在活动，也没有人发现我。干杯！”

那个抱着她的乌兹别克人又把酒递到她的嘴边。她喝着酒。

“祝您健康，施泰曼夫人，”我说，也同样喝着酒。

“您坐，施佩特律师，”她吩咐道，我在皮沙发上坐下。那个乌兹别克人站在我前面一动也不动，手臂上抱着怪人。

“达芙纳不愿意再回到我这儿来了，”她说，“我料到她总有一天会不来的。”她的脑袋很大，几乎没有头发，满是皱纹的脸很小，大眼睛里噙着泪水。

我还来不及说什么，那个乌兹别克人就把怪物往我怀里一放，把她的酒杯塞在我那只空着的手里，同另外三个乌兹别克人一起朝着窗户跪了下来，额头触地，硕大的屁股翘得高高的。怪物用手扒在我身上。我双手拿着两只酒杯，感到有点动弹不得。

“他们又在祈祷了，一天五次，在这时，他们大都把我放在一张柜子上，”她说。

随后，怪物命令道：“喝酒。”

我把酒杯递到她的嘴唇边。

“那个奥林匹克海因茨不是个美男子吗？”她突如其来地问道，然后才一口气喝完那杯酒。

“当然是，”我答道，把空酒杯放在我坐的皮沙发旁边的地毯上。我这样做时，怪物差点从我怀里跌了下来。

“废话，”她用低沉的声音说，声音里充满鄙视自己的情绪。“贝诺是一个我爱上了的堕落的、俗不可耐的花花公子。我总是爱上庸俗的男人，因为达芙纳总是爱上庸俗的男人。”

我怀里抱着这个怪物，叫人感到是在抱一具小骷髅。

“我把自己的名字交给达芙纳使用，好让她来过我要过的生活，而她做到了这点。”她确认说，“我要能像她那样，也会同每个男人睡觉的。您同她睡过觉吗？”这怪物忽然干巴巴地问道。

“没有，施泰曼夫人。”

“不要祈祷了！”她命令说。

乌兹别克人都站了起来，原先抱怪物进来的那个人又重新把她抱回手中去。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手里还一直拿着那杯放了冰块的威士忌酒。我已经完成了委托给我的任务，我要告辞了。

“您重新坐下来，律师，”她吩咐道。我服从了。她从乌兹别克人的手中俯视着我。现在她的眼睛里带着威胁的神情。上苍安排给她这样一个矮小而畸形的躯骸，她只能通过她的眼睛，通过说话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给我刀子，”她说。

一个乌兹别克人打开一把小折刀，递给了她。

“到贝诺的相片那儿去，”怪物说。

那个乌兹别克人抱着她走近墙上的照片，她不慌不忙地用小刀割碎这些照片，好像在动外科手术似的，她割碎了在微笑的贝诺博士，割碎了在吃饭的贝诺博士，割碎了思考着的、睡觉的、兴高采烈的、喝酒的贝诺博士，割碎了穿着燕尾服的贝诺博士，割碎了穿着晚礼服、穿着定做的西装、穿着猎装的贝诺博士，割碎了举枪射击的、化妆舞会上装扮成海盗的、穿着游泳衣的、不穿游泳衣的贝诺博士，割碎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中穿了击剑服的贝诺博士、穿睡衣的贝诺博士、在狩猎的贝诺博士。她依次用刀子割过来，我们就给她让地方，我的周围是那几个乌兹别克人，抱这小人儿的那个乌兹别克人围着我们转，屋子里热得要命，地板上开始铺上了一层照相的碎片。等到所有的照片统统割碎以后，我们就坐了下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怪物又被放到我的怀里。我坐在那儿，好似一个抱着怪胎儿的父亲。

“这样做了我心里就好受了，”她不慌不忙地说，“现在我让达芙纳上台吧。我来安排让她恢复她本来的面目。”

她朝我看过来。满布皱纹的脸显得如此苍老，仿佛这怪物是在有人类以前就诞生了似的。

“您代我向老柯勒问好，”她说，“他过去常来看我。在他要贯彻他自己的主张而发起火来时，我就为此而在图书馆里爬来爬去，用书掷他。但他总是能贯彻他自己的主张。就连现在，他也在掌管我公司的生意，在监狱里掌管。我们没有去搞光学和电子产品的生产，而是去搞坦克武器和高射炮、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生产，这是柯勒的功劳。您以为吕德维茨有这样的能力吗？或者竟认为我也有这样的能力吗？您瞧瞧我。”

怪物不作声了。

“我的头脑里只有怪念头，”她后来说。这个畸形人对自己讥讽与蔑视的态度又显露了出来。

“抱我走，”她命令道。

那个乌兹别克人又把她接过去抱在手中。

“再见，施佩特律师，”她说，在她的声音里又出现了那种从容而自负的嘲讽口吻。双开门打开了，乌兹别克人把莫尼卡·施泰曼抱了出去。门又关了。我同那两个领我进来的人留在屋子里，他们走到我坐的皮沙发跟前，其中一个人把我手中的那杯威士忌酒夺了过去，我想站起来，但另外一人按我坐下。这样一来，酒泼了我一脸，里面的冰块已经融化了。他们两人又把我拉了起来，把我抬出客厅，穿过大厅，走出大门，进入花园，从那些花园陶俑旁边经过，打开花园大门，把我扔在我的跑车前面。有一对老年夫妇正在人行道上散步，看看我，又看看那两个随即消失在花园里的乌兹别克人，他们大为惊奇。

“是外籍工人，”我说，我把警察留在我汽车的刮雨刷子上的罚款单子取了下来，罚款是因为我的车子不应该停在一个出口处。

对关于报道的一则报道的报道：我去华格纳山岗后过了三天，在我们著名的地方报纸上登了一则公告，署名是某个名叫艾希斯贝格的国民院议员，他是特罗格假肢工厂的法律顾问。公告内容是：十年来，一个从科特达祖尔寄宿学校进入社会，以其丑闻使我们这个城市为之震惊的女人并非莫尼卡·施泰曼。此人自称是莫尼卡·施泰曼，是因为特罗格假肢工厂的身体严重残废的继承人莫尼卡本人好心同意她这样做的。此人乃是达芙纳·米勒，生于1930年9月9日，她是贝尔尼州尚瑙市的女教师恩乃丝丁·米勒（死于1942年12月2日）与本市大学副教授阿道夫·温特（1955年3月25日被杀害）的私生女。这条与国民院的特色相适应的粗野新闻引起了那位艾希斯贝格故意要引起的轰动。报界，先是小心翼翼地，后来肆无忌惮地把在布莱亭格大饭店大打出手的事件也加以详尽描述。饭店经理贝德罗里宣布说贝诺欠了他三个月的膳宿费用，他原以为莫尼卡·施泰曼最后会付清的，如今那个莫尼卡·施泰曼根本不是真的莫尼卡·施泰曼，而达芙纳也好，贝诺也好，都又不知去向。因为艾希斯贝格暗示过，我去找过真的莫尼卡·施泰曼，所以报界的一帮子人向我扑来，伊尔瑟·弗劳依德像只母狮一样，招架抵挡，有几个记者还冲进了我的办公室，我说了一些含糊糊的、不很明确的话作为搪塞。我让他们去找里恩哈德，不小心提到了库克斯哈芬的名字，这本来是贝德罗里瞒住不说的。这帮家伙就赶到兰斯去找他了，去得太晚了，库克斯哈芬的新赛车在一次行车试验中发生爆炸，这位亲王与汽车一起都化为灰烬。记者们又回到本城，团团围困憩园别墅。华格纳山岗路旁停着长龙似的小汽车车队，可是一辆也不让进入花园，更不用说进入别墅了。有个胆大妄为之徒，夜里配备了一切技术装备，爬墙过去，第二天早上，发现衣服和摄影机全都没有了，他光身躺在花园大门外的烂泥浆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随着公告的出现，秋天也一夜之间突然崩溃了，一次风暴将树木的黄褐颜色扫除殆尽，地上铺满厚厚一层枯叶和枯枝，于是雨天来临，后来又降了雪，后来又下雨，肮脏的烂泥浆盖住了城市。因此，这位记者就是站在这样的烂泥浆里瑟瑟发抖。然而这件丑闻并非仅仅使新闻界活动起来，而且它也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人们在孵育着最最荒唐的谣言而我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听到这些谣言，那是因为我过于忙着去对付我的艰难处境：委托我办事的人开始减少了，到加拉加斯去出差的事吹了，办理那桩有钱可赚的离婚案的事泡汤了，税务局也不信任我了。原来充满希望的新起点一下

子显得毫无希望了，柯勒预付的酬金也花完了，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一样，起跑时使了百米赛跑的劲，而今那条通向开展有利可图的律师业务的道路，在我前面还遥远得看不到边。伊尔瑟·弗劳依德在设法谋求新的职位了。我去找她谈话。

她坐在办公室的接待室里，面前放着打字机，打字机的键盘上放了一面小镜子。她在照镜子涂口红，把嘴唇涂成绯红色。她的头发昨天还是金黄色，今天已经染成黑色，略带一点近似青色的蓝色。时间是6点5分。

“您在暗中刺探我的行动呢，博士先生！”伊尔瑟·弗劳依德抱怨说，她继续在打扮。

“谁叫您那么大声同职业介绍所打电话的呢？”我为自己辩护。

“问问情况总是可以的吧！”她说，已经化完妆了。“不过我是不会撒下您不管的，何况现在我们就会有大量工作要去做了。”

“什么大量工作？”我惊奇地问。

伊尔瑟·弗劳依德起先不回答。她把她那鼓鼓的挎包放在桌子上，漫不经心地将镜子和口红塞进包里去。

“博士先生，”她解释说，“您心地善良，但心肠太好，看起来就不像是当律师的，律师的外表是另一个样子。我了解律师，他们要不是显得十分可以信赖，就是外表犹如艺术家，例如像钢琴家，只是不穿燕尾服罢了。可是您，博士先生……”

“您想要说什么啊？”我忍耐不住地打断她的话。

“我想要说的是，您是一条挣脱了链子的狗，博士先生。您样子不像律师，而偏偏又是律师。您甚至也要把那位无辜的议员从监狱中解放出来。”

“您这么胡说八道是什么意思，伊尔瑟？”我感到惊讶地问道。

“要不然，您接受议员一张一万五千法郎的支票做什么用呢？”

我感到出乎意外。“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我呵责她说。

“我有时总也得给您整理整理办公桌呀，”她反过来顶我说，“您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现在您倒对我凶起来了。”

她擦擦眼睛。“不过您是会成功的。您会把那位好议员救出来的。我就留在您这儿！缠住您不放！我们两人会成功的，博士先生！”

“您相信老柯勒是无辜的？”我感到震惊地问。

伊尔瑟·弗劳依德虽然腰身丰满得可观，但站起来的姿势倒很优雅，她把包挎上肩膀。

“这不是全城都知道的事吗？”她说，“谁是凶手，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我倒想听听了，”我说，突然感到不寒而栗。

“凶手是贝诺博士，”伊尔瑟解答说。“他以前是瑞士手枪射击比赛的冠军。所有的报纸都登过。”

后来我和莫克在戏剧大饭店吃饭。是他邀请我去的，对于这个老吝啬鬼来说，这是件希罕的事。我虽然知道莫克只有在肯定对方要谢绝的情况下才会向人发出邀请，但我还是接受了。据说莫克自从温特被杀以来，总是要在以前温特坐过的那张桌子上用餐，我非常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的确是真的。莫克十分愉快地向我招呼，这叫我感到惊讶。然而我刚刚坐下来，警察局长也坐到我们桌上来。这是我们初次见面，原来我发现他来就是为了结识我，这次会面根本就是他安排的，他是主人，最后也都由他会了钞。莫克不过是个钓饵而已。警察局长叫了菜：猪肝丸子汤、法式牛排配四季豆、一瓶香白

丹酒，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温特，温特虽然喜欢夸夸其谈，令人讨厌，但却是一个很会吃的美食家。看他吃饭，永远是一桩趣事。我也照此办理。莫克从招待推来的小车上选了配土豆泥的红烧牛肉。这餐饭吃得叫人有点不愉快。我们一言不发地吃着，莫克为了吃饭不受干扰而把助听器摘下来放在他的盘子旁边，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后来警察局长叫了一份巧克力烘撰奶油，我向他叙述了我同伊尔瑟·弗劳依德的谈话。

“您不知道，施佩特，您那位宝贝女秘书说得一点不错。谣言是从监狱里传出来的。监狱长和看守人员发誓说，柯勒不可能是凶手。鬼知道那个老骗子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一件胡说八道的事，只要有一些人相信了，别的人也会相信。情况就像山崩一样，相信胡言乱语的人越来越多，像山塌下来一般。首先，那些主管凶杀案件的人，他们自己就相信。可不是嘛，施佩特，这事本来与您无关，但说说也无妨，赫伦少尉人缘不好，如果逮捕柯勒一事证明是错的，那他的一班人都会高兴万分的。至于警察局的其他部门，他们是嫉妒凶杀案侦缉科的，而消防队与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在警察面前则有自卑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山崩就变得不可阻挡了。这也影响到老百姓，我们每出一次洋相，他们都来看笑话，尤其是我，如果出了差错，人们更是幸灾乐祸。而现在凶手摇身一变，成了无辜的羔羊，加上那是一起很得人心的凶杀案，它正中某些人的下怀，那些行会、柯勒周围的一帮子人、联邦院议员、国民院议员、州政府委员、州议员和与此有关的人，所有的总经理、经理、老板和上司，都对耶麦林的强硬作风，对法官们的突然变卦感到恼怒。他们并不反对判刑，但他们指望法院能判以缓期执行的徒刑，或者甚至指望法院因被告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宣布将他释放，这样做也不会使一个政治家成为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如果宣布柯勒无罪，这对许多人来说会是一种安抚，施佩特。”

莫克把盘子从面前推开，把助听器耳机塞进自己的耳朵。

“您从老柯勒那儿接受了一件十分奇怪的委托，现在流传着这样一种荒谬的说法：他是无辜的，而那个浪荡子贝诺是凶手，这么说只是因为他曾是神枪手的缘故，而我们这里人人都自以为是神枪手呢。但是这个傻瓜为什么要躲起来，”警察局长一面说，一面吃他的巧克力烘撰奶油，“我不喜欢这种做法。柯勒的那项委托、说他是无辜的那个谣言以及贝诺的失踪这三件事都是相互关联的。”

“施佩特是上了圈套了，”莫克说，他开始用一支炭笔在桌布上画起来。画的是一只老鼠已经被老鼠夹子夹住了，但还一直在啃夹子上的肥肉。

在帐篷街，里恩哈德坐在我的办公室里。

“您是怎么进来的？”我恼怒地说。

“这不重要，”里恩哈德回答说，点点写字桌上的东西：“那些报告。”

“您也认为柯勒是无辜的？”我狐疑地问。

“不。”

“莫克说，我是上了圈套，”我闷闷不乐地说。

“这要看您怎么做了，”里恩哈德回答说。

报告有一百五十页，写得密密麻麻，用的是电报体。我原希望这是一份以假设为前提的论文，里面有不肯定的推论，可我现在看到的却尽是事实，报告里不写“某个不相识的人”的字样，而是提出了姓名。对报告本身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总的来说，写得是很谨慎的。勋贝希勒做的询问证人的工作：

证人们提供的情况相互矛盾，矛盾之大十分惊人。举例来说：有个女招待声称，柯勒喊了一声“猪猡”，而当时坐在旁边桌子上的某个妇女内衣店的代理人却提供情况说，柯勒说的话是“你好，老朋友。”第三个证人说看见议员还同教授握了手。有人陈述说，柯勒开枪打死温特后，同里恩哈德撞了个满怀。此处加上了一个问号，并有里恩哈德的批注：“本人当时不在该处。”还有别的相互矛盾的陈述，有五十多页。没有一个证人的陈述是客观的，每个证人都倾向于把不自觉的虚构掺杂进自己经历的事件中去。一个人亲眼看到一桩事件在他的外部发生，并加以证实。他以他的方式来觉察它，把它印入自己的记忆，记忆又会将它加以改变，因此，每个人凭记忆复述出来的事件都是各不相同的。材料之所以矛盾百出，是因为勋贝希勒与警方相反，他询问了所有的见证人。见证人越多，证词的矛盾也就越大。五十多页材料里充满了相互矛盾的说法。最后，是时间的差异：这桩事件发生已有一年零九个月。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变成了想象，还会随意推想，自以为是等等。要是再让那些自以为案情发生时也在现场而实际上并不在场的人也来做证词，那就能再增加五十多页的材料。勋贝希勒调查得毕竟是很仔细的。伏依希亭的报告：他的方法最简单。他直接提问，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一向惯于直接提问。他去打听情况时，甚至不会引人注意。他什么都打听，也打听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或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最后，他把那些小材料拼凑起来，费了很大的劲，用无数的填料把它们粘合起来，形成一块拼板。这份材料很成问题地证实了勋贝希勒报告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见证人提供的证词。有几个人硬说，贝诺博士当时也在戏剧大饭店，另一些人说，贝诺博士是在柯勒之前走近温特教授的，又有一些人说，贝诺博士和温特教授就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有一个人甚至说，贝诺博士是紧接着州议员离开饭店的。有个酒吧女郎提供证词说，贝诺在温特被杀之后不久就冲进了酒吧间，高兴得跳起舞来，把酒杯也打碎了，他一边喊叫着“坏蛋死了，坏蛋死了”，一边碰撞每一个人，并且宣布说，现在他要和她结婚了。大家都明白这指的是莫尼卡·施泰曼，他们祝贺他幸福，还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一切都发生在升天酒吧间，它在大教堂附近，像个土匪窝，因为那里的烈性酒很凶，所以有此名称。最近一个时期，常见贝诺到那儿去。这个所谓“最近一个时期”，实际上已经是两年多以前了。贝诺家庭出身很好，受过良好教育，大学学习成绩优异，在体育运动上发了迹，在社交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和莫尼卡·施泰曼订了婚，她是本城最富有的人。后来，贝诺突然堕落了，变样了，人家都回避他了，其原因，普遍的说法是，莫尼卡·施泰曼退了婚约。贝诺曾多次到国外旅行，有谣言说他在赌博。他起初还勉强维持着与名门贵族的接触，后来人家几乎不再邀请他上门了。最后他终于破了产，但仍过着大手大脚的生活。他把自己在过去的光辉日子里保留下来的东西：版画、家具、几箱名贵陈酒统统卖掉了。他卖掉的东西里，有些是不属于他的，例如一些首饰等，这样就引起了两场官司。（我不去详细描述这位奥林匹克海因茨的债务情况了，他的欠债是灾难性的，简直多得出奇，超过两千万法郎。）奇怪的是伏依希亭针对贝诺做的调查，有许多情况也适用于被杀的温特（除了债务之外），比如说吧：他去国外旅行参加国际笔会会议，这个会议其实根本就没有举行过，而他却报道会议开了几个星期；还有关于去赌场的种种谣言。温特每次参加了戏剧大饭店三楼的文人聚餐会后，也要到升天酒吧间去鬼混，他把他那引用个没完的歌德名言也一起带去了。在那里，他和本城的出版商、编辑、

戏剧评论家以及撰写文学家传记的权威们坐在一起，使自己不至于被排除在掌握我们文化大权的圈子之外。这个显赫的圈子虽然也还容忍他挤在其中，但都在取笑他，在他去找了尼德多夫的印度舞伎之后，就把他叫做“玛哈德”。里恩哈德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如果柯勒被排除在凶手之外，那就只有贝诺算得上是可能的凶手了。贝诺曾以为达芙纳是莫尼卡·施泰曼，这样，他和温特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结果达芙纳与贝诺闹翻了，贝诺也因此垮台了。他如果是莫尼卡·施泰曼的未婚夫，他就可以到处赊帐借贷，失去了莫尼卡·施泰曼，那谁也不肯借钱给他了。我听了里恩哈德的这种说法，感到有些怀疑，他的这种解释与事实对不起头来。达芙纳是在挨了贝诺的揍之后才与他断绝关系的，而莫尼卡·施泰曼则是在达芙纳同她绝交后才抛弃贝诺的。温特和吕德维茨原来就知道达芙纳不是莫尼卡·施泰曼。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知道这内情的人。一个人装成另一个人，而使原来的自己化为乌有，这确非一件简单的事，必定还有别的知情人。在官厅里想必也有几个人是知道的。再说，柯勒也知道这事，这是莫尼卡·施泰曼亲自对我说的。也许有许多人都知道过这事。莫克说我陷入了圈套，只有在这一点上能够成立，那就是我，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实际上在煽动别人去相信柯勒是无辜的，尽管我自己并不相信。因为我接受了柯勒的委托，所以我就是在帮助制造谣言。我如果屈从于这样的虚构，说他不是凶手，那我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人是凶手。杀死恺撒的不是勃鲁图斯，那就得是卡西勒斯；不是卡西勒斯，那也许就得是加斯加。说柯勒是无辜的这个谣言也许并非起源于监狱长和看守人员，而是起源于我自己。警察局长怎么知道我接受了柯勒委托的事呢？柯勒给我委托时，看守莫瑟在场。知道的人还有克努尔佩夫妇、海伦娜、柯勒的私人秘书福尔德，肯定还有一些律师，再就是里恩哈德，还有他手下的人。伊尔瑟·弗劳依德知道这件事后，她能守口如瓶吗？说不定柯勒的委托已经成了本城的话题了，虽然我深信他的杀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好奇心，但是通过这项委托，我的调查研究就不是针对柯勒进行的，而是远远地离开了他。这难道就是他那委托的真意所在？我是一次看不透的阴谋的发起者吗？我还要把调查报告提供给我的委托人吗？我现在进退两难了。里恩哈德不久就要向我结算开支费用了。我需要钱，而钱的唯一来源就是柯勒。我只好继续干下去，虽然我有疑虑。有没有别的出路呢？我忽然想起，不妨去找找我从前的上司斯迪西-劳埃平，跟他讨论讨论。起初我还有点犹豫，后来决心还是不去找他，也不交调查报告，管它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再犹豫了。贝诺博士在1956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的那个夜里，那是星期五转到星期六的时候，半夜里来找我。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夜晚决定了他的命运，也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当时正在第三遍细读那份报告，他打开了原来属于他的办公室的门，我坐在原来属于他的那张办公桌旁。他是个高个子，块头很大，有着长长的、蓬松的黑发，头发往后梳着，盖过了他的秃顶。他一拐一拐地走近我的写字桌，那样子像是一个身体过于沉重，以致骨架无力承担的人。他用那双与硕大的身躯对比之下显得几乎十分细小的手在桌面上支撑着自己，盯着我望，台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一半的脸。他已经喝醉了，感到绝望，他那孤苦无助的样子令人同情。我朝后一靠，他的黑西服上尽是油渍，亮光光的。

“贝诺博士，”我说，“您上哪儿去了？新闻界到处在找您。”

“我上哪儿去了，这不关他们的事，”他喘着气。“施佩特，这场官司您就撒手别管了吧。我求求您。”

“什么官司，贝诺博士？”我问。

“您策动来对付我的那场官司，”他声音嘶哑地说道。我摇摇头。“谁也没有策动一场官司来对付您呀，贝诺博士。”我解释说。

“您在撒谎，”他喊道，“您在撒谎！您策动了里恩哈德来对付我，还策动了范特、勋贝希勒、伏依希亭。您也唆使新闻界来搞我。您知道，在我身上是可以找到枪杀温特的动机的。”

“是柯勒打死温特的，”我回答说。

“这点连您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他浑身在发抖。

“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我试图安慰他。

贝诺盯着我看，用一块脏手帕擦额头上的汗，“您会同我打官司的，”他轻声说，“我输定了，我知道，我输定了。”

“可是，贝诺博士，”我说道。

他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口，慢慢地打开了门，没有再理会我就走了。

不在现场的证明：又有人来打扰我了。命运在起作用。这次是勒基来了。陪他来的是一个据他介绍说是“侯爵”的家伙。我已经从自己也曾卷进去并担任了一个角色的灾难性事件中脱身出来，在写报告了，在这情况下，我要向您摊牌：在一个罪犯的世界里，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罪犯。检察官先生，我能肯定您是同意我这说法的。当然，这里还附带着一个保留条件，那就是我把您和您任职所代表的社会都归在这个罪犯世界里，而不仅仅是勒基、侯爵和我。这个长期像人的家伙是从新堡给人赶出来的，连同他的豹牌敞篷轿车。他那张脸笑嘻嘻的，他好像是从柯城来，他的举止像是在兜售香皂。这时是晚上将近10点钟。那是一个星期日（我写这份报告是在1958年7月底，我尽量设法使我的文件井井有条）。外面下着雨，雷声打得震耳欲聋，虽然雨还在下着，然而天气仍很闷热，不见得有所好转。我的屋子楼下震响着赞美诗：“沉落吧，世界，倒入基督的怀抱，愉快地沉落吧！”和“圣灵带着闪电雷鸣降临到我们罪人之中来了。”勒基有点拘谨地拽拽自己的小胡子，我看他有点紧张，眼睛里露出了苦苦思索的神情，那是我过去从未见过的。勒基显然有什么心事。他们两人穿着雨衣，然而雨衣却是干的。

“我们需要一份不在现场的证明，”勒基轻声轻气地说，“给我和侯爵。证明我们在前两个小时是在您这儿。”

侯爵一本正经地微笑着。

“那么两小时以前的时间呢？”我问。

“那个时间我们不在现场是确凿无疑的，”勒基保证说，不怀好意地盯着我望。“我们同吉赛勒和玛德莱纳在摩纳哥酒吧。”

侯爵点头证实。

我想知道他们来我这儿时，是不是没有被人看到。勒基像一向那样，很乐观，“没有人认得出我们，”他声称，“打了伞很起作用。”

我在考虑。“你们的伞在哪儿呢？”我接着问，一边从写字桌前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把文件锁进桌子里去。

“在楼下，我们把伞放在地窖的门背后了。”

“伞是你们的吗？”

“我们找来的。”

“在哪儿找来的？”

“也是在摩纳哥酒吧间。”

“那么就是说，你们在两小时之前带了伞离开的？”

“当时在下雨嘛。”

勒基感到不安，他意识到我对他的回答不感兴趣。他充满希望地从他大衣口袋里拿出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酒，侯爵也变戏法似地掏出一瓶放在写字桌上。

“好，”我点点头，“这样就更富有人情味了。”

于是两人各掏出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放在桌上。

“我们都是呱呱叫的买卖人，”勒基说。

我摇摇头。“我亲爱的勒基，”我表示惋惜地说，“我原则上是不愿意做假证明坐牢的。”

“懂了，”勒基说。

两个人又各掏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我并没有向他们让步。“你们那个雨伞的故事太荒唐了，”我说。

“警察找我们并不是为了雨伞呀，”勒基反驳说，然而看得出，他说这话时不太舒服。

“可是他们会因为雨伞的缘故发现我们的行踪的，”我提醒他们注意。

“懂了，”勒基说。

他们两人又忍痛每人掏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我很惊讶。“你们大概成了百万富翁了吧？”

“人总是会有收入的嘛，”勒基说，“等到我们拿到了剩余的部分，我们就溜之大吉，到国外去。”

“什么剩余部分？”

“酬金的剩余部分，”侯爵解释说。

“什么酬金？”我怀疑地问。

“我们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的酬金，”勒基说得很详细，“我们一到了法国尼斯，我就把吉赛勒和玛德莱纳移交给你。”

“我把我的那些姑娘交给您，”侯爵保证说，“新堡是个很有用的地方。”

我仔细地检查了钞票，看看是不是假的，然后把它们折起来，塞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勒基想要报告详细情况，但我打断了他的话：“我给你们一次头说清楚：我并不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一份不在现场的证明。”

“对不起，”勒基道歉地说。

“把你们的香烟统统掏出来，”我发命令道。

勒基口袋里塞满了香烟：骆驼牌、敦希尔牌、黑白牌、超级王牌、毕卡德里牌等等。一盒盒香烟堆在写字桌上。

“我有个女朋友开香烟铺，”他解释说。

“侯爵先生抽什么烟呢？”

“我很少抽，”他不好意思地结巴着说。

“你身上没带香烟？”

侯爵摇了摇头。

我又在写字桌后面坐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来抽半个小时的烟，”我安排道，“尽量地多，尽量地快。我抽骆驼牌，勒基抽长的超级王，侯爵就来个敦希尔牌的吧。香烟抽到只看得出是什么牌子，然后就按熄，统统扔在同一只烟灰缸里。最后每人带一包拆开的烟走。”

我们拼死拼活地从嘴里喷吐着烟。很快我们抽烟就很在行了，能一次抽四根，然后让香烟自己燃完。屋子外面雷雨交加，我们的楼底下则在吼着赞美诗：“粉碎我们这些阴险的人吧，主啊，粉碎吧，耶稣，我们的财宝，我们将你杀害了，我们蔑视了圣灵。”

“我平时本来不抽烟的，”侯爵呻吟着说。他难受得厉害，变得倒有几分人性了。

半小时之后，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室内的空气污浊到能危及生命的程度，因为我们把窗子关起来了。我们离开了房间，下了楼，撞进了警察的怀里，然而，他们并不是来找我们的，而是来找那些乌艾特利的圣徒。邻居们嫌太吵，提出了抗议，他们不要听赞美诗，宁可入地狱。风化警察，胖子施图贝尔在使劲地敲门，陪他来的两个巡逻警察怀疑地打量着我们，我们三个都是警察熟知的人物。

“可是，施图贝尔，”我说，“您是管风化的警察呀，管不着圣徒们的事。”

“你们还是留神你们自己的圣徒吧！”施图贝尔喃喃地说，一边让我们走了过去。

“婊子律师，”有个巡逻警察在我背后骂道。

“咱们最好马上到警察总局去，”勒基叫苦道。看见警察，他泄了气。侯爵好像吓得要祈祷了。我预感到我参与了一些可疑的事。

“胡说，”我给他俩鼓气，“我们遇见警察，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雨伞……”

“这我以后去处理。”

新鲜空气使我们感到很舒服。雨已经停了。街上很热闹。我们走到尼德多夫街，进了摩纳哥酒吧间。吉赛勒还在那儿，玛德莱纳（我现在知道她的名字了）不在了，但有柯琳纳和宝莱特，她俩是新来的给勒基干活的人，刚从日内瓦运来的，三个人都打扮得很漂亮，与她们的价格相适应。已经有几个嫖客搭上她们了。

“侯爵的脸色发青了！”吉赛勒喊道，并招着手。“你们把他怎么搞的？”

“我们打了两个钟头的扑克，”我解释说，“侯爵不得不跟我们一块儿抽烟。这是惩罚，他想把你从勒基那儿弄走。”

“Jem'en suis pas rendue compte，”宝莱特说。

“买卖是在暗中进行的。”

“Et le résultat？”

“我现在是你的律师了，”我声明说。宝莱特感到惊讶。我转向阿尔封斯。这个酒吧间的男招待是兔唇，他正在柜台后面洗酒杯。我要了威士忌。阿尔封斯在我们面前放了三杯六十五度的酒。我一口气喝完我的一杯，对男招待说：“由那两位先生付钱。”我说完就走出了摩纳哥酒吧间。我离开门口还不到十步路远，就听见有一辆汽车停下来的声音。我看见警察局长带了三个谋杀案侦缉科的侦探走进酒吧间。我溜进最近的一个拐角，进了最近的一家小酒店。后来我运气也不错（我这个倒霉的人至少有了一次运气了）：我一小时后回到家时，施图贝尔和那两个巡逻警察已经不在镜子巷的房子里

---

法语：“我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译注

法语：“那么结果怎样呢？”——译注

了。周围静悄悄的，乌艾特利的教友们想必也都走了，我在地窖的门背后找到了那两把雨伞。我本想拿着伞走下地窖去，把它们藏起来，但我又想出了另外一个主意。我上了楼梯。乌艾特利教派的聚会厅里静悄悄的。门没有锁。不然，我就得用大门的钥匙来打开它了。这儿同许多老房子一样，大门的钥匙可以开所有屋子里的门。

我走进前厅。楼梯口的灯光照进屋子，不怎么亮。靠门有一只放伞的架子，已经有几把伞放在那儿了。我把那两把湿伞也放了进去，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上楼回到我的房间。我开了灯。发现窗户开得大大的。警察局长坐在靠背椅上。

“您这儿烟抽得很多，”他说，望望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是我把窗户打开的。”

“勒基和侯爵来我这儿了，”我解释说。

“侯爵？”

“就是从新堡来的那一个怪物。”

“他叫什么名字？”

“我倒不知道。”

“亨利·楚丕，”警察局长说。“他们什么时候在您这儿的？”

“从7点到9点。”

“他们来的时候有没有下雨？”警察局长问。

“他们来时还没有下雨，”我回答，“就是来躲雨的。您问这个干吗？”

警察局长望望烟灰缸。“您和勒基、侯爵9点多离开您的家时，风化科的施图贝尔看见你们的，您后来上哪儿去了？”

“我？”

“您。”

“到霍克酒吧间去了。我喝了两杯威士忌酒。勒基和侯爵到摩纳哥酒吧间去了。”

“这我知道，”警察局长说。“我在那儿逮捕了他们。可是现在我不得不释放他们了。他们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们是在您这儿抽烟的。抽了有两个钟头之久。”他又去望望烟灰缸。“我得相信您，施佩特。一个看重正义的人是不会给两个凶手做不在现场的证明的。如果那样做就太荒唐了。”

“谁给谋杀了？”我问。

“达芙纳，”警察局长回答。“那个假扮成莫尼卡·施泰曼的姑娘。”

我坐到我的写字桌后面去。

“我知道您是了解内情的，”警察局长说。“您去找过真莫尼卡·施泰曼，她不再支持那个假的了，因此达芙纳·米勒去当娼妓了。她没有同勒基和楚丕挂好钩。现在人们发现她死在自己奔驰牌小轿车里，车子在希尔施广场停车场，时间是将近8点30分的时候。她是7点钟到的，但没有下车。因为雷阵雨下得太大了。唔，现在勒基和楚丕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明，在他们身上也没有搜到凶器，他们的雨衣也是干的。我只好放他们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她真是漂亮得要命的姑娘呀。”他后来说，“您同她睡过觉没有？”

我没有回答。

“这其实也不重要，”警察局长说，点起他的一支雪茄烟，他咳起嗽来。

“您烟抽得太多了，局长。”

“我知道，施佩特，”警察局长回答说。“我们大家都抽烟抽得太多。”

他又去望望烟灰缸。“可我发现您对我相当关心。好，我也要对您关心关心：像您这样一个叫人看不透的人，我还没有遇见过。您难道没有要好的朋友吗？”

“我不喜欢给自己找个冤家，”我回答说。“您是要审问我吗，局长？”

“我只是好奇而已，施佩特，”警察局长支吾过去。“您还不到三十哪。”

“我没有那么多钱在大学多混几年，”我回答说。

“您曾是我们的最年轻的律师，”警察局长说，“现在您不是律师了。”

“监察委员会尽了他们的职责了，”我说。

“我如果能对您有个明确的了解，”警察局长说，“那我就更容易理解您了。可是我没能这样做。我第一次拜访您时，我看得清楚，您是在为正义而斗争。我觉得很惭愧。可现在我看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您做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我还是接受了。”

警察局长站了起来。“我为您感到惋惜，施佩特。我明白，您是卷进一场荒唐的纠纷中去了。您这样一来，自己也变得荒唐了，这大概是无法改变的事。我想，因此您才自暴自弃的。柯勒有没有再写信来？”

“从牙买加来信了，”我回答。

“他走了多久了？”

“一年多了，”我说，“差不多有一年半了。”

“这个人要跑遍整个地球了。”警察局长说，“但也许他真的马上就要回来了。”

后来他就走了。

追记。又过去了三天，我把同达芙纳睡过觉的事，瞒过了警察局长。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他认为这不是重要的事。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把它写下来，但是警察局长说得不错，这一切都变得很荒唐，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最可耻的事也是现实。而我在达芙纳的毁灭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种可耻的事之一，即使她的死是真莫尼卡·施泰曼的报复行动，我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可耻的。那次打架的丑事发生后，几乎有一年之久，达芙纳不知去向。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连里恩哈德也说不知道。她在曙光街的住所空着，房租照付。是谁付的，也无法了解。后来，她又冒出来了，穿得还是和原来一样华丽，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尽管她的追随者已经换了人。她过去挥霍无度所干的事，如今成了她的职业活动。她原来的朋友们撇下她不管了，如今，她开着她的白色奔驰牌小轿车到处转，索取高价，在经济上又恢复了元气。扣除了税款，什么社区税、国家税、国防税、退休保险金、人寿保险金等等之后，也还是很富裕的。能同她睡觉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大加叙述是多余的。不过她有一次在我那儿出现，这事我不想隐瞒：她在夜里将近2点光景，敲我镜子巷住所的门。我从睡觉的躺椅上爬起来，心想，这是勒基。我开了灯，打开了门，进来的却是她。她朝四周望望。窗子半开着，屋子里冰冷（那时是2月中旬），在那庸俗的壁毯上贴着《观察报》的图片，写字桌的椅子上放着我的衣服，椅背上是我的大衣。她穿着一件灰鼠皮大衣（按它的价格来看，一定是真灰鼠皮，说不定那个真莫尼卡·施泰曼现在还一直在为她付帐）。她脱了衣服，把衣服都搭在椅子上，就睡到躺椅上去。我睡到她的身旁。她很美，天气很冷。她待了没有多久。她又穿上了衣服，伸手去拿她那件灰鼠皮大衣，放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提出抗议时，她就用右手使劲地打了我一记耳光。一般这种事情人们是不愿

意讲的，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现在之所以把它写下来，只是因为我的一切希望已经破灭了。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风化科的警察施图贝尔这位朋友来我这里报告消息说，有人在曹立康附近的湖里捞出勒基和侯爵的两具尸体。（出事地点就离施泰曼的别墅不远）。这个快活的施图贝尔又走了，我感到受了污辱，因为他连个问题也没向我提，警察局长至少也可以派个谋杀案侦缉科的人来找我呀。勒基和侯爵转移到国外去的行动不够快。我们的国庆节，1958年8月1日，就这样凄凉地开始了。此外那是一个星期五，达芙纳就在这天要下葬。已经得到法医的准许。就在10点钟。8月1日上午是要上班的，掘墓人也要工作，对一个小国来说，国庆节放假一整天未免嫌太多了，它是知道自己的情况的。我刚刚离开自己的屋子，就听到打雷了，今年夏天的雷雨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似的。我的大众牌汽车正在修理。（我在某处的一个湖上吃过饭后，在荒野的夜空下开着我的跑车。嘿，检察官先生，这车我也要坦白的呀。我把车子连同玛德莱纳——是玛德莱纳吗？——一起撞到了路边的小树丛里去了。勒基去料理这件事的后事，那个姑娘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我只得又开我原来的大众牌车了。就是在那时，我又把车取出来用了。现在我送去修理，本来早就可以取回来的，可是我在修车厂赊不了帐。我实在害怕帐单。）因此我不得不乘有轨电车去参加达芙纳的葬礼。可是，我为什么去开乌艾特利教友会小聚会厅的门，门开了之后，为什么我去拿了我六天前放在那儿的两把雨伞当中的一把，原因已经弄不清了。是出于心不在焉还是出于一种令人不快的幽默，我已经知道了。我拿了伞当手杖使，穿过旧城步行到美景楼那儿，虽然这时不过是上午9点30分左右，但天色暗黑，人人感到紧张，正如每次雷雨到来之前那样，现在即将来临的雷雨很不寻常，因为现在还是上午呢。我急急忙忙像达芙纳的作风，我想。到了美景楼，我坐上有轨电车。在这样的天气去参加葬礼本来就是胡闹，可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登上了超载的电车。太阳偶尔冲出云层，像一只探照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电车开到十字广场，有个男人，胖胖的，身穿黑色西装，个子比较矮，发亮的秃顶，黑胡子保养得很好，白头发，戴了一副金色无边眼镜，登上了电车。我起先不由自主地以为，这是被杀害的温特，他的鬼魂回来参加女儿的葬礼了。这个人跟死者温特酷似，但他却带着一个花圈。在花圈的饰带上写的是什麼，我没有能看出来。公墓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全城的名流都到了，怀旧之心人皆有之，但她的新主顾里却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今天上午人们来到我们这个建造得很漂亮的市立公墓，并非完全是为了达芙纳·米勒。在她的墓旁还要安葬检察官耶麦林，他的逝世也引起了普遍的惋惜，因为世上没有比失去恼恨的对象更令人伤心的事了。幸亏在悲痛的心情中还掺杂有幸灾乐祸的心情。他的结局不无滑稽之处。他每星期都要去芬兰式蒸气浴室洗澡，这次他光着身子走进浴池，一屁股坐到了光着身子的里恩哈德旁边，这一吓，把他给吓昏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这位冷酷无情的人。在同一时间举行葬礼有它的好处，人们可以同时参加两个，我揣测着谁是来参加谁的葬礼的。市长、检察官伏依泽尔和几个被判无罪释放的淫乱分子（他们还要气气躺在坟墓里的死人）是来参加耶麦林的葬礼的，里恩哈德、劳平格、施多斯和斯迪西-劳埃平是两个葬礼都要参加的，弗里德里、吕德维茨、孟德沙因则大概只是来参加达芙纳的葬礼的。每个人都带了一把伞。赛恩神父站在达芙纳墓前，瓦吞维尔神父在耶麦林墓前。两个人都已经做好了开始的准备。我等得很不耐烦，两只脚在交替地支撑着身

体。天上打雷了，然而赛恩神父也好，瓦吞维尔神父也好，都还没有开始祈祷，那个我在电车上遇到的上了年纪的男人把他的花圈放了下来（棺材旁边没有别的花圈），饰带上面写着：献给同父异母的妹妹达芙纳，胡果·温特敬献。这人一定是小学教师温特了。又打雷了，这次是一声霹雳巨响，同时吹来一阵大风。大家都在等啊等的。连旁边墓地上的人也朝我们这边看，人们在等什么我不知道，一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真莫尼卡·施泰曼坐在一辆轮椅上，由一个瘦护士以行军的步伐推着，从公墓大门口来到达芙纳的棺材跟前。这个侏儒浓妆艳抹，头上戴了朱红色的假发（模仿达芙纳的头发），假发使得这个小怪物的头显得更大了。她穿了一条超短裙，看起来像是童装。她戴了一串珍珠项链，这项链一直垂到轮椅上小小的残废的腿上，在她的怀里还抱着一样东西，用黑布包着，一个矮而壮的男人站在她旁边，身穿太短又太紧的黑色西装，那是个十分富有的粗汉，国民院议员艾希斯贝格。他拖着一个花圈，连市长和伏依泽尔，甚至那些掘墓人都离开了耶麦林的墓穴转到达芙纳·米勒这边来了。瓦吞维尔神父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他也恨不得跑过来。这时又有一声雷鸣，一阵大风。

“该死的，”我听见身旁有人骂道。原来这是警察局长。

护士把莫尼卡·施泰曼推到敞开的墓穴口，艾希斯贝格把花圈扔在棺材上面。花圈的饰带上写着：“献给我永远热爱的莫尼卡，您的莫尼卡敬献。”

赛恩神父朝前走了一步，他吓了一跳，因为又是一声炸雷轰响，所有在场的人都靠拢了。我很不乐意地被挤到莫尼卡·施泰曼的紧后面，站在护士和警察局长的中间。警察局长的前面是艾希斯贝格；护士的前面是斯迪西-劳埃平。棺材放进了墓穴。旁边的墓地上没有人去把耶麦林的棺材抬进墓穴去，瓦吞维尔神父还一直在朝我们这边望，赛恩神父胆怯地翻开《圣经》，宣布说要朗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到第十一句，可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念时，莫尼卡·施泰曼就把她捧着的那个东西高高举起，用谁也想不到她会有力气把它扔进墓穴里，使得这个东西在达芙纳的棺材上面轰隆一声地碎裂开来：原来这是莫克塑造的假莫尼卡·施泰曼的青铜色的头像。瓦吞维尔神父赶紧奔跑过来；赛恩神父吓坏了，不知所措，以致他自然而然地说了句：“让我们祈祷吧。”

可这时，开始下起大雨来了，阵风变成了狂风，大家都打开了雨伞。因为我站在莫尼卡·施泰曼的后面，我想给这侏儒遮雨，也去打开我的雨伞，当我把伞柄上的按钮一揿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我的伞面飞了出去，升得高高的，在参加葬礼的人群的头上盘旋，风突然停了，它就掉了下来，像只大黑鸟降落在达芙纳的坟墓中。许多人都忍住了笑，凝视着我手里握着的伞柄：那是一把三刃尖刀。我觉得我握着这把凶器就像是在被害者的墓前站岗守卫似的，而这时，神父在朗读着祷文，接着，掘墓工人开始用铲子工作了，耶麦林的棺材也可以放进墓穴去了，护士推车把莫尼卡·施泰曼送回去，我得让路，我还一直握着“尖刀”站在那儿，别人都已经把伞收起来了：暴雨尊重我们的公墓，没有在这里下多久，而是下到市中心去了，到了晚上，人们还不住地从地窖往外抽水呢。远处则传来几声鞭炮声，人们已经在庆祝了。耀眼的阳光强烈地照射着涌向公墓大门的人群和铲着土的掘墓工人。赛恩神父也在努力设法尽快离去，而瓦吞维尔神父还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市长和伏依泽尔早已走了，只有里恩哈德还站在耶麦林的墓旁看工人填着土。他走过我身边时，哭了。他失去了一个仇人。我又去凝视那把“尖刀”，“刀”

尖是深褐色的，上面的细槽也是深褐色的。

“您的伞用不起来了，施佩特，”我旁边的警察局长说，一面从我手中把这把带有伞柄的“三刃尖刀”接了过去，朝着公墓大门走了。

出卖调查报告：柯勒从广岛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要到新加坡去，这使我定了心。我的报告终于要写到那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了，虽然那件事情是件蠢事，但也不能以“经济困难”作为理由来加以原谅。我把调查报告送交给斯迪西-劳埃平，两天后，他在他那离城很远的住所中的起居室里接见了。用起居室这个名称，未免贬低了这间屋子，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没有住人的大厅还更确切些。这间屋子是正方形的，我估计它的面积约有20×20米大小，三面都是玻璃墙，看不见门，通过一面玻璃墙可以望见一座古老的小城，这座小城还没有通高速公路，只见无穷无尽的汽车排成长队从那儿开过，使黄昏的景色增添了一些活的、神奇的色彩，一串串的车灯像链子般穿过这小城的街道。从另外两面玻璃墙看出去，可看到一些背后有照明的石块，它们大到有几吨重，莫克将它们稍加雕琢，就变成了一些花岗岩的神像，它们在有人类之前就主宰着大地，山脉从低处拔地而起，把各大洲分开。这些巨大的雕像都是用整块石头雕成的，它们的影子投向当时是空的大厅，这儿除了有一架三角大钢琴以外，只有两只皮沙发面对面地放在对角线上，三角大钢琴几乎就放在门口，地点可想而知是很不适宜的。旁边有一座木板楼梯，它通向一个厢楼，那里想必还有好几个不太大的房间。这所房子，当我开着跑车靠近它时，它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层楼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城那边望过来，它是一座平房。我过去的上司就坐在那两张皮沙发当中的一张里，身上裹着一件睡衣，一动也不动，只有一只放在两个沙发之间的立灯照亮着他。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没有动弹。我走到那些被染成各种颜色的、排列得很艺术的大理石石板上，大厅的地板就是用这些石板铺成的。斯迪西-劳埃平一直没有动弹。我在另外那张皮沙发上坐下，一下子就好像埋在皮革的海里了。我发现，在我坐的沙发近旁的地上有一只小篮子，里面放了一瓶红葡萄酒，瓶塞已经打开，一只小的、郁金香形的水晶玻璃杯和一盘坚果。离开约四米远处斯迪西-劳埃平坐的那张沙发跟前也放着同样的东西，只是地上多了一架电话。我打量着斯迪西-劳埃平。他在睡觉。我想起伐尔林给他画的肖像，过去我以为那是夸大，现在才觉察到画家观察这位律师的非凡才能：一座像是雕刻得很粗野的、正方形的农民脑袋，上面盖着一头乱糟糟的、雪白的头发，鼻子像是一块肉瘤，两条很深的沟一直通到像是用凿子凿出来的下巴，一张嘴巴是说不出地倔强，然而又很温柔。我端详着这张脸，仿佛它是一处我很熟悉的，但又很神秘的风景所在，因为我对斯迪西-劳埃平知道得很少，虽然，他当了我的几年上司，可他从来没有和我交谈过一句私人之间的话，这也许就是我为何没有留在他的事务所的缘故。

我等着。突然，他那惊讶的孩子般的眼睛通过一副无边眼镜对我睁得大大地望着。

“您为什么不喝呀，施佩特，”他清醒得很，仿佛他先前并没有在睡觉（也许他的确没有睡），“请您自己斟酒，我也自己斟了。”

我们喝酒，他观察着我，不说话。只是观察着我。

他一面凝视我，一面开始说话。他说，在我们谈到困难之前（他可以想到困难在何处），他先说个人意见，这意见也跟我现在困扰我的那些顾虑有关，我就是因为有困难才跑来找他的——嘿，他这么说也并非完全对，因为

我是开了一辆波尔施牌跑车到这儿来的，他说这可阔气啦。

他自得其乐地笑了，有什么样的事使他如此开心呢？他喝着酒，继续说下去。他以前可曾对我讲过他的生平历史？没有？对，那时也没有这种必要。好，现在就来说说吧：他是一个山地农民的儿子，他们这个家族称呼自己为斯迪西-劳埃平，以免和斯迪西-毕尔林混淆了，那个家族和他的家族有史以来就为了争一块土豆地而斗个不休，那块地非常陡，以至他们每年都要弯腰弓背地爬上去，而且常常是要爬好几次，运气好时，就能从这块土地上收获到够三四次烤着吃的土豆，然而，就是为了这么一点东西，他们打官司、打架、杀人。现在仍是这样。总而言之，年轻的同行（斯迪西-劳埃平这样地叫了我一声），他念完大学就马上回到家乡当律师了。在斯迪西村子里，不光是斯迪西-劳埃平和斯迪西-毕尔林有仇，斯迪西-莫西同斯迪西-席特林也有仇，诸如此类，遍及全村。然而这只是开始时的情形，也就是说，是在村子成立时的情形（如果曾有过成立这样的事的话）。如今，每个斯迪西家庭都同所有别的家庭发生争执。在那样的山窝里，在那尽是家庭纠纷、谋杀、乱伦、伪誓、盗窃、侵吞公款和诽谤的鸟巢中当农民律师，完成了他的见习时期，当地的说法是当师爷。他不是为了让山沟里的人知法守法，而是帮助他们逃避法网。一个农民为了同他的帮工姑娘结婚造了个车祸假相，把老婆杀死了，或是一个农妇用砒霜毒死了丈夫去同长工结婚等等，他们都能逍遥法外，因为他们在农庄里比在监狱里有用，监狱空着要比关满犯人少花费国家的钱。山区乱糟糟的，故乡在沉沦。

他暗自在笑。

“天哪，那段时间可真是妙啊！”他惊叹着说，“后来，我见了鬼，娶了一个麦尔修家的姑娘，搬到我们这个倒霉的城市来了，成了明星律师。天气怎么样？”

“有燥热风。12月这样的天气太暖了，”我回答，“好像春天一样。”

“我们去户外好吗？”

“好，”我回答。

“用‘去’这个字是不对的，”他说，按了一下他坐的皮沙发靠背上的一个按钮，那几面大得要命的玻璃墙就沉到地底下去了，石块后面的探照灯也熄灭了。我们坐在腾空的混凝土天花板的下面，就像在户外一样，只有那只立灯亮着。

他说，这是一项夸张的设计，他一面说，一面朝前看着，他说，他觉得他仿佛是坐在总理府里的元首。可是您又能怎么样呢，施佩特。作为一个明星律师，就不能不请一个荷兰名建筑师给他设计房屋，尽管他宁愿请弗里德里来设计。这是命运的安排，他是个出名的人嘛。而现在，他独自坐在这里，过去，在这个大厅里曾接连不断地宴请宾客，因为，不然的话，小城里的人就会有意见了，弗里德里也有意见，一直到——嘿，这不相干。家具他后来派人搬走了，都是一些现代的玩艺儿。

然后，他一面给自己斟酒，一面说：“我们谈具体的事吧，施佩特。”

我报告了柯勒博士委托的事。

他打断我的陈述，喝着酒说，他对情况是了解的，克努尔佩夫妇也来找过他。关于我接受委托的事是海伦娜告诉他的，就是柯勒的女儿。里恩哈德和他那一伙人的调查他也都仔细地看过。

我谈到我对柯勒的动机的一些想法，谈到海伦娜怀疑她父亲是被迫进行

凶杀，也谈到了我遇见达芙纳的事，以及我去真莫尼卡·施泰曼那里访问和贝诺在我办公室里出现的事。

“年轻人，您运气真不错呀，”斯迪西-劳埃平惊讶地说，又重新给自己斟酒。

“我不懂您这话指的是什么，”我心里不踏实地说。

“当然您是懂的，”斯迪西-劳埃平回答，“不然的话，您也不会来我这儿。我们一起来玩柯勒的这场游戏吧，一旦我们假定他不是凶手，那就很容易找到另一个凶手，这人只能是贝诺，所以他吓得要命，他挥霍了那个假莫尼卡·施泰曼的两千多万瑞士法郎，温特向真莫尼卡·施泰曼说明了真相，订婚的事破裂了，贝诺给毁了，就在戏剧大饭店枪杀了温特。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您的委托人现在需要的，也是您将来需要的说法。”

斯迪西-劳埃平举杯对着台灯的灯光。从小城的方向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响了几分钟，那些车灯都停着不动，估计那些汽车给卡住了。

斯迪西-劳埃平笑了：“这场本世纪最妙的复审官司，偏偏要落到一个像您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手里。”

“我没有接到打复审官司的委托，”我说。

“您接受了那项委托就是引到这条路上去的。”

“是柯勒杀死了温特，”我确认说。

斯迪西-劳埃平感到惊讶。“那又怎样呢？”他说，“您当时在场吗？”

屋子后有条黑影从楼梯上下来，一拐一拐地朝我们走来。走近了我才看出来这是一个神父，他手里提着一只黑手提包。他在离斯迪西-劳埃平约三米远的地方站住了，咳嗽一声，玻璃墙又升起来了，那些花岗岩雕刻的神像的影子投射在又封闭起来的屋子里。年迈的神父，满脸皱纹，脚是畸形的。

“您的夫人已经做了临终涂油礼，”他说。

“行，”斯迪西-劳埃平说。

“我将为她祈祷，”神父保证说。

“为谁？”斯迪西-劳埃平问。

“为您的夫人，”神父明确地说。

“那是您的职业，”斯迪西-劳埃平无所谓地说道，也不朝他看。神父喃喃地说了句话，向门口走去，管家妇在门口给他开门（我也是她给开门进来的）。

“我的妻子快要死了，”斯迪西-劳埃平附带地说了一句，把他杯中的酒干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结结巴巴地说着，站起身来。

“我的上帝，施佩特，您真是拘谨得过分，”斯迪西-劳埃平说，“您就重新坐下来吧！”

我坐了下来，他又给自己斟酒。玻璃墙沉到地下去了，探照灯熄了，我们又是坐在户外了。

斯迪西-劳埃平眼睛发直。

“我的妻子真了不起，她让我免掉守在她身边看她死去的痛苦，”他带着无所谓的声调说道，“反正神父已经去过了，现在医生和一个护士在陪她。我的妻子，施佩特，不仅爱玩爱得要命，富得要命，信天主教信得要命，而且也漂亮得要命。我们这瑞士德语很滑稽吧。她欺骗我欺骗了一辈子。现在陪她的这个医生曾是她最后的一个情夫，可是我理解她。像我这样一个丈夫，

对女人来说是毒药。”

他暗自笑起来了，随后又转换了话题。

他说，我是个傻子，因为我认为柯勒博士有罪。他，斯迪西-劳埃平也这样认为。虽然所有的证人的证词互相矛盾，虽然作案的凶器一直没有找到，虽然缺少动机，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认为他有罪。为什么呢？因为这桩凶杀案是在宾客满堂的餐厅里发生的。在场的人，虽然现在说出来的话互相矛盾，但都看到了一些情况。我们不是绝对了解，但我们是绝对相信的。这情况在法庭调查时就已经叫他感到惊奇。当时既没有问手枪的下落，也没有听取证人的证词，仿佛法官对警察局长的陈述已经感到满足了似的。警察局长固然在案件发生时坐在现场附近，但他并没有提到他是否直接看见凶杀情况。另外，那个辩护律师是个饭桶，而耶麦林却处在最佳竞技状态。我们花费很大力气硬要把我们以为柯勒有罪看成是我们知道柯勒有罪。我们知道的程度实际上赶不上我们以为的程度。一个能干的律师仅仅从这个矛盾出发就能打赢官司使被告获释。不过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好耶麦林一个机会去寻找动机。柯勒把这项有利可图的委托塞给了我，是因为我一点也不会打台球。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听得很仔细——柯勒杀人是为了进行观察，进行谋杀是为了研究社会的法律，他之所以没有说出自己的动机，只是因为他即使说了法庭也不会相信。亲爱的朋友，他说，他对此只能说，这样一种动机太富有文学味了，像是作家虚构出来的。虽然他也相信像柯勒这样的人做出行动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动机的，但这动机是什么呢？

斯迪西-劳埃平在考虑。

“您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接着说，“因为您一点也不会打台球。柯勒打的是 a la bande。”

“a la bande，”我回忆起来了，“柯勒曾经说过这个词，在戏剧大饭店打台球的时候说的。他说，a la bande，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打贝诺。”

“他是怎样打的？”斯迪西-劳埃平问。

“我弄不太清楚，”我在回忆，“柯勒把球往桌子边缘打，球从那儿弹回来击中了贝诺的球。”

斯迪西-劳埃平给自己斟酒。

“柯勒开枪打死了温特，就是为了干掉贝诺。”

“那为什么呢？”我无法理解，问道。

“施佩特，您也太天真了，”斯迪西-劳埃平感到奇怪地说，“莫尼卡·施泰曼不是已经给您提示了吗？柯勒领导着她的公司，主持着业务。到了监狱里他还在领导。他并非只是编编篮子。莫尼卡·施泰曼用得着柯勒，柯勒用得着莫尼卡·施泰曼。吕德维茨是摆摆样子的。但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从呢？柯勒女儿说的话有些也是对的。这是一次为人效劳的谋杀。为什么不是呢？也是一种勒索。莫尼卡·施泰曼拥有万贯家财，两千万法郎是她的两千万法郎，柯勒一定是顺从了莫尼卡·施泰曼的愿望，通过杀死温特来干掉贝诺。也许她根本不用把这愿望说出来，也许他只是猜出了这个愿望。”

“这是一个比现实情况更荒唐的论点，”我说，“莫尼卡·施泰曼爱贝诺，因为达芙纳爱他，并离开了莫尼卡，所以莫尼卡也就不再支持贝诺了。”

“我的论点比现实情况更现实，它通常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他回答说。

“没有人会接受您的论点，”我说。

“没有人会接受真实情况，”他回答说，“法官不会，陪审员不会，甚

至连耶麦林也不会。它站得太高，司法够不着。如果进行复审诉讼，司法当局理解得了的唯一论点是：贝诺是凶手。只有他有明显的动机，尽管他是无辜的。”

“尽管他是无辜的？”我问。

“您不喜欢这句话？”他说道，“说他无辜，也是一个论点。他是唯一有可能把手枪藏起来的人。老弟，您去打这场复审官司吧，过几年您就成了像我一样的大律师了。”

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听筒，又放了下来。

“我的妻子死了，”他说。

“向您表示我的哀悼，”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值一提，”他说。

他又要斟酒，可是酒瓶已经空了。我站起来，为他斟酒，并把我的酒瓶放在他的空瓶旁边。

“我还要开车，”我说。

“我明白，”他说道，“跑车也花了不少钱吧。”

我没有再坐下来。“我不想接受复审诉讼，斯迪西-劳埃平先生，柯勒的这项委托我也不想再承担了，我要销毁调查报告。”我声明说。

他把他的杯子朝着台灯照。

“预付酬金有多少？”他问。

“一万五千，还有一万是开支的费用。”

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带了手提包的男人，显然是医生，他犹豫着，考虑着要不要走到我们这边来，后来管家妇来了，把他请了出去。

“您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偿还这笔钱，那很费劲呢，”斯迪西-劳埃平说，“您一共花了多少钱？”

“三万加上开支的费用，”我回答说。

“我给您四万，您把您调查来的材料移交给我。”

我犹豫不决。

“您要进行复审诉讼？”

他一直还在打量他那只斟着红葡萄酒的杯子。“这是我的事。您到底卖不卖给我？”

“我大概非卖不可了，”我回答说。

他把酒一饮而尽。“您不是非卖不可，您是想卖。”随后他又重新斟满酒，又把酒杯举到灯光前去。

“斯迪西-劳埃平，”我说，觉得自己是和他平等的，“要是打起官司来，我会当贝诺的律师的。”

我走了。我走到一块大石头的影子下时，他还在说：“您并没有在场，这点您要记住，施佩特，您不在场，我也不在场。”

接着他干了杯，又睡着了。

伊萨克·柯勒博士打电报通知我说，他很快就要从新加坡回来了，他还把他所坐的飞机在这里降落的具体时间也对我说了：后天 22 点 15 分。届时我一定要把他打死，然后我再自杀。这样，我用于写完这份报告的时间，只有两夜了。也许是因为我以为他不会回来的缘故吧，我见了他的这封电报真是大吃一惊。我承认，我喝醉了。我今天到霍克酒吧喝了酒。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这家酒吧里，坐在那很长的桌子旁，跟那些和我一样的醉汉混

在一起。如今我靠吉赛勒和其他一些姑娘生活。勒基死了以后，这些姑娘才被人送到这里来，她们并非来自新堡，而是来自日内瓦和伯尔尼。而这里却有许多姑娘搬到日内瓦或者伯尔尼去了，她们真是作了一次大换班。我与此毫不相干。我现在合法的事一点也干不起来，不合法的事也只有一个桩要干：等待后天 22 点 15 分。勒基的位置已被兰花诺尔蒂取代了。据说这位诺尔蒂是从索洛图恩来的，在法兰克福发了迹，人很有派头。他手下的那些姑娘现在胸前都戴着兰花，警察气坏了，然而戴兰花是不能禁止的。有一次，有个巴塞尔的女司法工作者，她参加电视台举办的妇女选举权问题讨论会后，深更半夜回家。她胸前戴着一朵兰花，半夜 1 点钟走在美景楼附近的街上，被警察拘捕了，她身上没有带身份证。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警察局长出来辟谣，结果弄巧成拙，警察以及他们的局长都因此而丢了丑。兰花诺尔蒂不受任何限制，如今他还请来了律师维歇吞。维歇吞是我们最有声望的律师之一。他出于为社会服务的动机，愿意站出来维护那些女人的权利（她们毕竟是缴税的呀），并且主张开设按摩沙龙。兰花诺尔蒂对我暗示说，因为我“生活作风”有问题，对他那个行业已经不适合了，但他也不会抛弃我，他欠了勒基的情分，他已经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就是这样说的）谈好，让我暂时留在霍克酒吧间里。警察局长也不来找我的麻烦了，似乎没人对勒基和侯爵是怎么死的感兴趣，连尚未得到澄清的达芙纳的死也被人遗忘了。这样，我虽然不是妓女把头，也是一个靠妓女养活的人。在霍克酒吧间里喝酒的客人向我要了一些妓女的住址，我把地址告诉他们，并没有向他们要钱，他们（大多是岁数大些的先生）于是替我付了威士忌酒钱，他们这样大方，也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我喝得醉醺醺的，把字写得歪歪斜斜，匆匆忙忙。坦白地说，我看到了柯勒的电报，就先出去狂饮了一顿，不知怎么才回到镜子巷家里的，二十小时后，我又坐在我的写字桌旁了。好在我家里还有一瓶华尔克牌威士忌。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现在竟回忆起一件事，我在霍克酒吧间喝酒的时候，曾有一个从图恩来的牙科医生找我，我曾叫他去摩纳哥酒吧间的吉赛勒——我是从摩纳哥酒吧间回来的，并不是从霍克酒吧间来的，刚才我是怎么写的呢？我写这份报告写得太匆忙，匆忙得无法再回过头去念一遍，也使我不能写上更多的啰唆话。那瓶酒是我赚来的。吉赛勒并不喜欢牙科医生，这位医生的有些事情也实在做得叫吉赛勒讨厌，甚至叫她感到可怕。他喝酒喝到第二瓶时，突然把假牙从嘴里拿出来，他先拿出上面的牙托，接着又拿下面的，这副假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他让我们看那智齿上面镌刻着的他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他把上下两个牙托拿在一只手里，敲得咯咯作响，企图去夹吉赛勒的乳房。坐在我邻桌上的辛德曼见到这番情景，笑得眼泪都掉到肚皮上了。辛德曼正跟新近从奥尔登来的——不是从奥尔登来的，而是从索洛图恩来的，说不定还是从奥尔登来的——玛丽莲坐在一起。牙科医生的假牙掉到桌子底下——不是掉到我们的桌子底下，而是掉到辛德曼的桌子底下——牙科医生趴在地上找他的假牙，这时不但没有人帮他忙，反而有人故意把假牙踢到旁边的桌子下面。这时，辛德曼笑得更加厉害了。最后还是吉赛勒帮助牙科医生找到了他的假牙。大家笑了好长时间，时间自然很晚了，我就是这样才得到那瓶酒的。我对辛德曼很反感，不仅仅由于他那种怪笑声音叫我刺耳，还由于他在审判柯勒时作为原告的代表太不中用。这里我讲的是审判，而不是复审。所有的人原先都以为斯迪西-劳埃平会要求复审，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却向司法厅递交了一份呈文，说柯勒博士从来没有承认过在

戏剧大饭店开枪打死那位日耳曼语文学者阿道夫·温特教授，如果被告否认作案的话，光凭一份目击者的报告显然是不够的，何况目击者也有可能搞错。因此，柯勒这个案件不应该送到高等法院，而应当送到陪审法庭审理才行。他还说有必要采取司法和法律上的一切可行措施，宣布原来的判决无效。斯迪西-劳埃平的这份呈文引起了当局的严重关注，他们翻阅了所有的文件和记录。使司法厅厅长摩西·斯普林凌惊奇的是，审查结果，真的没有发现柯勒认罪记录，原来人们竟把柯勒的一些哲学词令都当作认罪的表示了，于是这位司法厅厅长叫当时主持审判的大法官耶格来纳尔提前退休，对其他四名大法官以及检察官耶麦林发出警告，并发出指示将柯勒的案子送交刑事陪审法庭。这是一个相当草率的举动，然而耶麦林即便躁狂症发作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耶麦林曾向联邦法庭递交了一份呈文，结果被神速地，也可以说当即驳回了，这种惊人的速度，在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办事像蜗牛爬行一样的速度中，的确是绝无仅有的。重新对柯勒的审判于1957年4月举行了。耶麦林毫不示弱，他想再次以原告的身份出庭，然而斯迪西-劳埃平说他对此案抱有成见，拒绝让他出庭。耶麦林像鬼似地拼死拼活地为自己辩护，直到听说斯迪西-劳埃平已经邀请里恩哈德出庭作证，他才宣告罢休。当然，即便是伏依泽尔来办理这事，他也不见得是斯迪西-劳埃平的对手。我写到这里，还没有写到这次审判，没有写到警察局长在审判中所扮演的可悲的角色。这位警察局长在法庭上说，他当时并没有看到柯勒开枪。斯迪西-劳埃平使出了浑身解数（我承认他的确干得非常出色），找来了一些证人，可是这些证人的证词矛盾百出，陪审员尽了最大的克制才没有笑起来，而旁听的人却开心得发出了一阵尖叫声。手枪一直没有找到。斯迪西-劳埃平将这件事大肆渲染，说这个情况居然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忽略过去，这样一来就没有物证，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将柯勒释放的理由。斯迪西-劳埃平说，他在发案时，看到贝诺在戏剧大饭店里，还一再说贝诺不只是瑞士手枪射击冠军，还是手枪的收集者。斯迪西-劳埃平这么一说，人们逐渐对贝诺产生了怀疑。根据里恩哈德的调查，贝诺曾说已把收集的手枪统统卖掉了。他的这番话顿时引起场内一阵窃窃私语。里恩哈德然后又说，贝诺和温特之间不和，应该对贝诺进行盘问。大家于是带着紧张的心情等候贝诺出庭接受讯问。可是贝诺并没有出庭。我找他找了好几天。我决定做他的辩护人，像我当初对斯迪西-劳埃平说过的那样。我需从贝诺那儿了解一些情况，以便对付柯勒。可是，就连升天酒吧间里的人都不知道贝诺在什么地方。伏依希亭猜想，贝诺可能躺在达芙纳家里。达芙纳是个好人，她是不至于背弃自己的旧情人的。有个叫艾米尔的人，他是经销除狐臭香水的代理人，他最近在曙光街达芙纳的家里留下一个月的报酬，他说，他有这样一个印象：在达芙纳的住所里还有一个人。结果贝诺仍然没有找到。有人猜想他已逃之夭夭了。于是人们像当初逮捕柯勒那样，动用了警察，通知其他国家的警察当局协同采取行动。达芙纳这时又出来制造麻烦，要求法院搜查她的住所。第二天早上，伊尔瑟·弗劳依德走进我的帐篷街的办公室时，发现那个放荡的击剑优胜者兼射击冠军吊在枝形吊灯下。窗子打开着。伊尔瑟把门一开，顿时产生了穿堂风，只见贝诺在穿堂风里晃来晃去。贝诺留有一把开这个办公室的钥匙，因而可以进我的办公室，爬到我的写字桌上（这桌子原来也是他的）。这时，我为了找他，却在达芙纳那里。我后来一整天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香水味，这都是那个经销香水的艾米尔……我不大愿意写到这次审判的情况，因为斯迪西-劳埃平如果讯问达

芙纳，我跟达芙纳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就会被兜了出来，而且要当着海伦娜的面兜出来。如果贝诺不先自杀，斯迪西-劳埃平真会这么做的。贝诺被人们视为畏罪自杀，柯勒博士极其光彩地被释放了。当柯勒离开法庭，从我身旁走过时，他突然站住，用他那冷酷的目光把我打量了一番，并且说，现在把他放掉，实在是极其可悲的解决办法。他还说，我陷入了经济困难，天哪，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为什么不去找他，反而把调查报告交给斯迪西-劳埃平呢？他一手导演了这台丑恶的司法戏剧，结果被无罪开释，完全是活见鬼，实在叫人感到难为情。他不得不作为无辜的羔羊站在法庭上的确叫人感到难受，谁愿意做这样一只羔羊呢？他最后说，如果我不把调查报告卖给斯迪西-劳埃平，而交给他，情况会怎样呢？贝诺没有打官司就上吊了。我听了火冒三丈。杀死柯勒是我应尽的职责。如果正义事业不会变成一场闹剧的话，那么总会有人出来伸张正义的。柯勒说完话，推了我一下，好像我是一条癞皮狗，可我站得很稳，没有跌倒在刚好站到我身后的莫克身上。莫克的背心里装着助听器，他只说了一句：好在没有让您摔着。柯勒离开了法庭，接着就在蚂蚁行会会馆里庆祝一番。市长用六音步诗致词，向他表示祝贺。然后，柯勒就乘飞机动身去澳大利亚，我带着手枪赶到机场，但已经为时太晚，这个情况，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半了。现在又到了秋天，总是秋天，天哪，我又喝醉了，我怕人家看不清我写的字。现在是中午 11 点——还有 35 小时 15 分钟——我继续狂饮着，这样喝下去真会引起灾难。太可怕了，要是海伦娜现在还爱我的话，那将宣布我的死刑了，我只能肯定地说，我过去爱她，也许现在还爱她，虽然她正和斯迪西-劳埃平那个老滑头在一起睡觉。最近我看到她跟弗里德里在一起，看到他用手臂搂住她的脖子，好像她早已成为他的财产了。不过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写我们的爱情，同样也没有必要写我以前和教派的传教士贝格尔在楼梯上的那番谈话。在这以前，我又一次到霍克酒吧去过，但是这一次很不顺利，我没有喝到威士忌。那些老主顾正在看电视里的足球赛，由于瑞士队踢得太差，所以他们情绪很坏，连那些平时问我地址的人的情绪也不好。摩纳哥酒吧已经关门了。我身上不名一文，我忘记带钱包了。可我非要喝威士忌不可，于是我拔腿到了戏剧大饭店，那里也没有什么人，招待阿尔弗雷多奇怪地看着我，艾拉和克拉拉也从后面走了出来，我还听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斯迪西-劳埃平坐在詹姆士一直坐的那张桌子旁边。他打了一个手势，邀请我坐到他那儿去。艾拉和克拉拉很不乐意我到他那边去，但是斯迪西-劳埃平毕竟是斯迪西-劳埃平，我终究还是走到他的跟前。他说我应当把裤子扣好，我坐下以后，他又说我这个人真是不妙，太自暴自弃了，他一边说，一边往咖啡里倒了樱桃酒。我心不在焉地说，我要喝一瓶威士忌，我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不喝威士忌就不能活命了。我怕得要命，生怕自己喝不到威士忌，我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反对我喝威士忌以外的酒，比方说，葡萄酒、啤酒、烧酒或是酸苹果酒我都不喝。当地的流氓才会拼命地喝苹果酒，所以他们的肝脏不好，但他们不会得风湿病。我身上还剩下来的一点点人的尊严要求我只喝威士忌。我是为了正义才喝威士忌的，这个正义真把我毁了。这时艾拉往我面前放了一只酒杯。斯迪西-劳埃平干巴巴地说，斯迪西山谷现在需要一名律师，他的接班人席特林在打猎时被当作一只岩羚羊打死了。打死他的人不叫斯迪西-毕尔林，就叫斯迪西-伏依希，或者叫斯迪西-摩西。弗罗蒂根小镇的预审法官把这桩案子归档以后，便不了了之了。事实上也没法

查清那些事实真相。现在空着的律师职位对我倒是挺适合的。我会作为第一个不是斯迪西山谷的人当上山谷里的律师了。至于恢复我的律师执照，则由他去办理。我问他，为什么偏偏向我提这个建议呢？我一边问，一边喝掉了杯里的威士忌。他回答说，他偏偏要我去当那里的律师，还说现在是我该从一切现象里得出结论的时候了，他说，他醉心于从司法鲨鱼的喉咙里救出有罪的人，只要这些罪人有机会逃脱司法鲨鱼的喉咙，他就可以把他们拯救出来。他这样做倒并不是要作弄司法部门。律师终究不是法官。他相信不相信正义，相信不相信由正义演绎出来的法律，这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这毕竟是形而上学，好像在探索数字的本质。他作为一名律师，必须调查一个被司法当局抓住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罪，不管他会不会被司法界看作是罪人。海伦娜向他谈了我所怀疑的事，但我的调查是不及格的，海伦娜当时虽然是空中小姐——天哪，那时人们都以为干空中小姐这一行很不平常呢——但她并不在那位英国大臣乘的那架飞机上，大臣是乘一架英国军用飞机回去的，当然需要一个瑞士空中小姐。海伦娜当时对我提的问题所以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她没有立刻听懂我提的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至于柯勒对我说的那些话，莫克已经向斯迪西-劳埃平报告了，他是不能理解的。柯勒要的是一次新的审判，为了不当无罪的天使他只要声明是他开枪打死了那个笔会老兄弟，并且说出该死的他是怎么把手枪弄不见的就行了。他，斯迪西-劳埃平，感到非常不愉快。他说，他使老家伙获释，那是他当律师的义务，可是现在他认识到，他是放走了一头猛兽，一个独来独往的动物，这种人总是最危险的。柯勒行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他没有说出来的动机。斯迪西-劳埃平说，他原先以为，莫尼卡·施泰曼在利用柯勒，现在，他却觉得是柯勒在利用莫尼卡·施泰曼了。温特、贝诺、达芙纳以及那两个妓女把头，他们都死了，死的人有点太多了。他说，如果我不满意的话，我也可以死，然后突然被人从河里打捞出来。行了，反正我有那瓶酒了。我是怎么走回镜子巷的，我已经弄不明白了——艾拉在斯迪西-劳埃平和我闲扯他的教训时，又端过来一瓶威士忌——我居然还能把他说的话复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现在已经是夜里1点30分，我也许在这段时间里曾打过盹，还要等二十个小时，不，十九个小时，我看错了，现在是夜里2点30分，如果柯勒，柯勒博士……我同西蒙·贝格尔的谈话想必是在楼梯口进行的，当时我取了斯迪西-劳埃平的威士忌酒回到镜子巷。我不听见乌艾特利教友们唱赞美诗大概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们是突然停止的——那时警察局风化科的施图贝尔跑来找我，给我一个并非不明显的暗示说，官方有人推测，妓女有组织地在街上拉客的事同我有关，正说着话，楼下唱着的赞美诗“耶稣基督在你的伤口上”的声音蓦地停住了，接着是一声尖叫，抗议声、哭叫声、各种奇怪的声音响成一片，从楼梯上传来许多只脚下楼的声音，随后，是死一般的沉寂。施图贝尔继续谈他的推测——由于以上原因，当我这时在我的楼下一层的教友聚会厅门前碰到这个传道师时，本应感到惊讶的，我想从他身旁走过去，但他却向我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要不是扑在我身上，他都要摔在地上了。我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时，看到他的脸已晒得焦黑，没有眼睛。我吓得赶紧跑，想上楼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可是贝格尔拽住我不放，他紧紧地抱住了我，叫喊道，为了看见上帝，他盯着太阳望过了。当他看见上帝后，他变得心明眼亮了，在这之间，他是个瞎子，可是现在他的眼亮了，眼亮了。他一面这样大喊大叫，一面把我拽倒在地，结果，我们两人都跌倒在通向我房间的楼梯

上。我不知道他都向我讲了些什么，我醉得太厉害，听不懂了。他说的关于太阳内部的话大概是一派胡言乱语，他说太阳内部是一团漆黑，上帝就隐藏在那漆黑的一团之中，人们只有让太阳把眼睛晒焦了，才有可能辨认出上帝的隐藏处，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发现，上帝作为太阳内部的、完全漆黑的、一个没有尺寸大小的点，怎样深深地往里钻，带着无穷无尽的渴望，吮吸着太阳，把太阳吸进肚子，而自己并不变大，好像是一个无底洞，是深渊的深渊，而太阳里面越来越空，外面越来越大，人们现在还看不出什么，然而，明天夜里 10 点 30 分就到时候了，那时，变成了只是光线的太阳大放光明，以光的速度膨胀起来，烧毁一切，地球将在巨大的阳光下化为蒸气。他大致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他像喝醉了酒似地和我这个醉汉说着这些，我现在醉得更厉害，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教派传道师的事。他那次蒙着头走到他的教徒们跟前，向他们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要求他的信徒们像他一样让太阳把眼睛晒瞎，他把蒙的布从头上扯下来。我那时听到的尖叫声、抗议声、哭叫声、奇怪的喧闹声等种种声音，以及教徒们奔下楼梯跑出去的声音，这些就是对他的回答。我又看了一遍我所写的东西，还有大约三个小时，我就得动身去飞机场了。警察局长在早上 7 点 30 分就来了，或者更早一些，他坐在我的躺椅前，我醒过来时，见到他坐在这儿，大吃一惊，也就是说，我到厕所去呕吐了回来，又要往躺椅上躺下时才发现他的。警察局长问我，要不要他去煮咖啡，他不等我回答，就走到放炉子的壁龛那儿去了。我又睡着了。醒过来时，咖啡已经煮好，我们默不作声地喝着。后来，警察局长问，我知不知道我是属于十分之一的人，我问他这个奇怪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每十个罪犯里，他要放走一个，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不然的话，他就得在达芙纳的墓旁逮捕我了，他同我一样，当过律师，也同我一样毫无成就，他只是偶尔当官方指定的辩护人，后来当上了警察。他是社会党人，他的党内同志帮他在市警察局刑事科找了个当法律顾问的职位，而他们自己私人需要律师时，却做梦也没想到去找他。他后来升了官，最后当上了警察局长，并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成绩，而是人家在政治上搞阴谋诡计，把他也带上去了。在别的司法机关里，情况也是如此，他倒不是说他们贪污腐化，司法部门应该是客观的，毫不考虑社会地位的、丝毫不带偏见的机关，但现实中的情况距离这个要求远得很。他说，据他看来，柯勒一案不像我想的那样悲观。当然，我接受了柯勒的委托，后来又把材料交给斯迪西-劳埃平，让他弄得贝诺上吊，使他打赢了官司，这是我的一个错误。但是，不管柯勒有罪没罪，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是议员柯勒开枪打死了教授温特。他，警察局长，也不怀疑这一点。他现在打量着我，他说，他在考虑，我激烈反对释放柯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释放柯勒，从司法观点上来看，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开释，但也无可指责，因此，也是合理的开释。我激烈反对这事，能做的就只有自己来伸张正义，把柯勒和我自己宣判死刑，并且亲自来执行，拿出我藏在躺椅后面的手枪，用它来将柯勒和我自己一起送进阴曹地府。这种做法，他，警察局长认为，虽然合乎逻辑，但很荒唐，因为，绝对地说，正义总是一种思想，在正义面前，我并不比柯勒好。他说，他只要提醒我回忆一下，我在达芙纳之死的事情上扮演了什么角色就行了。在正义面前，柯勒和我都是凶手。相反，法官担任的职位是值得思索的，他要维护一个如此不完善的机关，也就是司法部门，使它能起作用，使它监督人们按一定的规范办事。一个法官，就个人来说，并不需要公正，就像教皇并不需要虔诚一

样。然而，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想靠自己的拳头来执行公正的话，那世界就变得毫无人性了。这些人没有看到，欺骗行为有时比循规蹈矩更人道，因为世界这部机器不时需要加加油，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加油的作用特别重要。他说，一个信奉正义的狂热分子也应该对自己要求正义，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要由我自己来回答了。您瞧，警察局长，我现在还有能力把我们的谈话——或者不如称为您的演讲，因为我一句话也没说，光是躺在那里，我呕吐得没有一点儿力气，只听您一个人讲——准确地复述出来。您猜出我一开始就决定要干的事，我也不觉得奇怪，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自暴自弃，很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我给勒基和新堡来的侯爵作了不在现场的证明，也许我因此而堕落到现在的地步，连一个像兰花诺尔蒂那样的人都觉得我太寒碜，还比不上他所代表的那些个姑娘体面。我的目的是要用我的方式使自己同柯勒博士一样有罪，可是，那样一来，我做出判决和我自己来执行判决，就是世界上最正义的事了。因为，正义只有在相同的罪人中间才能得到伸张，就像钉上十字架的事一样，那是画在伊森海姆祭坛上的，一个被处以钉十字架刑的巨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一具可怕的尸体，因为他太重，他被钉在上面的十字架的木头都给压弯了，那是基督，他比麻风病人还要可怕，这幅祭坛画像是为麻风病人画的，麻风病人看到那个神钉在十字架上，正义就在他们与这个神之间得到伸张，他们相信麻风病是这个神带给他们的，现在这个神被钉上了十字架，对他们来说，这是正义的。我写的时候很清醒，检察官伏依泽尔先生，我写的时候很清醒，正因为如此，我请求您别去责备警察局长，说他没有没收我的手枪是不对的。警察局长的那番谈话，或者说得更好些，他那篇规规矩矩的讲话，并不是慈父的教诲，他说他放走十分之一的罪犯，谁愿意相信谁就去相信好了，我看他如果能逮住十分之一的罪犯，他也就很高兴了。整个事件是一个挑衅，他事后会很气恼的，恨自己当初在参加葬礼时，在我的伞面飞掉，他从我手中接过那三刃尖刀时，没有逮捕我。但我了解他，他的思想敏捷，他明白他如果那样做，就不仅会重新提出可怜的达芙纳是谁杀害的这样一个问题，也牵涉到两个凶手是谁杀害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就要同莫尼卡·施泰曼发生纠缠了，而谁又愿意去找假肢工业巨头的麻烦呢，这个工业巨头已经准备重新从事军火买卖了。当我在两小时之后，确切地说是两小时十三分钟以后，向柯勒博士开枪时，警察局长就要出来干涉了，虽然这些枪弹没有发生作用，然而，检察官先生，我们俩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警察局长一方面试图用他那感人的讲话来劝阻我，另一方面，如果我开了枪，他会使那些枪弹打不死人。而我早已用真子弹换掉了空包弹，这是您确实没有料到的，警察局长先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又在跟您说话了）我从未详细地叙述过一楼那个旧货商的事，这是为了使您不致去触动他。那个独眼龙是个非凡的人，在他那儿曾经什么都能弄到，我说的是曾经，因为这事现在也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那个旧货商三个星期以前就搬走了，一楼的店铺和二楼的住房都已空空如也，因为乌艾特利的圣徒们的屋子也是静悄悄地空无一人。此外我昨天（或是前天，或是大前天）发现一封我几个月前收到但没有拆开的挂号信，信上说，镜子巷的房子（它是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有倒塌的危险，急待修缮，此事由弗里德里负责，他将改建内部，保留旧的外表，建成一个豪华的公寓，这是他的新业务。因此，我必须在 10 月 1

日以前搬走，因为 10 月 1 日早已过去，我不得不在城里到处流浪，我为了给自己弄到最后一瓶威士忌酒，某个时候，昨天，在戏剧大饭店斯迪西-劳埃平那儿，我弄来了。否则，我就要到独眼龙那儿去找，在他的住所里虽然没有威士忌，总还有一瓶葡萄酒，就像我在他的旧货店里找到过手枪子弹一样，它们放在一个阿尔卑斯山牧羊人的号角里，我把您，警察局长先生，原来装在我手枪里的空包弹倒进号角，换上了真的子弹。柯勒博士和我，死起来将是富有民间音乐风味的了。我的清醒程度越来越可怕了，可怕得仿佛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太阳，而我被迫要像那个发了疯的传道师那样去凝视它。然而，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我开车去机场之前（我开我的大众牌车，车子只修了一半，那就是说，我叫他们别修了。没钱。），警察局长先生，我最后向您说一句：我收回我的怀疑，您事情做得很正派，您是要我有抉择的自由，您不愿伤害我的自尊心。我很抱歉，我做出您不希望我做出的决定。我现在再向您坦白最后一件事：我在这场为伸张正义而进行的赌博中不仅输掉了我自己，也输掉了海伦娜，被我杀死的人的女儿，而这将被我杀死的人又是杀死我的人，因为我杀死了他，我也就不得不杀死我自己。这儿用的是 Futurum exactum（拉丁文：第二将来时态）。我又想起了我在孤儿院时一个老年神父给我上的拉丁文课，上这门课是为了准备进城里的中学。我总是喜欢谈孤儿院的事，甚至对莫克讲这些事，虽然同他谈话很困难。我对他说，有个作家谈起他母亲死了，显然他非常爱他的母亲，我就开始对作家解释孤儿院的优点，并且把家庭形容为培养罪犯的温床，我说，大家老是赞颂个不休的家庭幸福是令人作呕的，看得出这话惹怒了那位作家，莫克这时笑了。我弄不清莫克听到什么和没有听到什么，他又一次不知把助听器放到哪儿去了，我相信他能够从别人的嘴唇动作听懂别人说的话，但他是不承认有这事的（这也是他的一个诡计）。他说，他听到我吹嘘自己是没有父母长大的，他就觉得不舒服，他用他啰里啰唆的方式发挥说（那个作家早已走了），我幸亏成了一个律师，才没有当政治家（但这也并非没有可能），一个喜欢孤儿院的人比一个年幼时同父亲或是同母亲或者同两个人一起纠缠不休的人还要糟糕。他，莫克，恨他的父母犹如恨瘟疫（他就是这么说的），虽然他们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但他恨他们，因为他们生了八个孩子，还要再生他，也不问问那些远远超过通常孩子数的孩子，他或是她同不同意被生出来。他说，生孩子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罪行。他现在每当使劲地敲凿一块石头时，他就假想这块石头就是他的父亲或母亲，他在进行报复，他说，但是碰到我这样喜欢孤儿院的人，他就弄不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不错，他，莫克，有仇恨，他恨那些把他创造出来，生出来，而没有把他扔进垃圾桶的人。他利用敲打石头来发泄这种仇恨，他把石头敲成一个形象，敲成一种形状，因为这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爱这些石头作品，如果它们有感情，又会转过来恨他，就像他恨他父母一样，而他的父母也是爱他的，他是令他父母担心的孩子。他说，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爱与恨的循环。可是，反过来，我这个人不去恨创造自己的人，不去恨自己的存在，却去爱一个把他养大的，把他教育好的单位，并且命中注定地要去对一些非人类的东西，对一种意识形态（尽管只是一个原则）怀有热情，对正义抱有热情。他说，他再往下想，像我这样的人，要去同不符合自己原则的人们打交道，也就是要去同不符合正义原则（有谁能符合呢？）的人们打交道，他一想到这点，就不免吓出一身冷汗。他说，他的恨是生产性的，而我的恨是破坏性的，是

一个凶手的恨。“嘿，施佩特，”他结束他那番叫人几乎无法理解的话说，“我为您惋惜，您实在是大错而特错。”这事之后，我从来没有再踏进过他的工作室。为什么我要谈起这次对话呢？警察局长先生，因为这个最近刚在威尼斯受到颂扬的雕刻家说得一点也不错，我是个人工制造的人，是在一个模范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那是一个按照教育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原则进行工作的实验室。这些专家创造了我们国家的精密钟表，精神病药物、银行和永恒的中立。我成了这个实验单位的典型产品，这个实验单位只缺一样东西：一张台球桌。因此，我是在没有能力看透这个世界的情况下，被投进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事前从来没同这个世界打过交道，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个世界应该是由我在其中长大的孤儿院的秩序支配的。我毫无准备地被推进了这个弱肉强食的人类社会，我毫无准备地忽然面对形成这个世界的那些欲念：贪婪、仇恨、恐惧、诡计、权力。但我也同样束手无策地面对使得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变得具有人情味的那些情感：尊严、分寸、理智，最后还有爱情。我被人类的现实冲走，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急流冲走一样，我为了不让自己堕落而斗争着，结果我却堕落成了一头猛兽。我的堕落是从与斯迪西-劳埃平的那次夜谈开始的，在那次谈话中，我卖掉了调查材料，材料是要用来开脱一个凶手的，凶手的女儿来了：海伦娜到我的帐篷街律师事务所等我，在我那套讲究的三室住所，这是我从贝诺手里接收下来的。现在我才注意到她是在我住所里面而不是在门外等我的。她坐在我的写字桌前面。我现在才注意到她对这个住所很熟悉。可是贝诺……谁能不上他的当呢？就这样她来了，因为她信任我，因为我追求她，她就这样委身于我了，但是，我没有勇气把自己也托付给她，没有勇气相信她因爱我而希望得到我。这样，我们就错过了我们的爱情，我没有对她说，她父亲不是被迫去杀人的（即使那个恶魔似的侏儒希望他这样做），他只是喜欢在这个可怜的星球上扮演上帝的角色；我没有告诉她，我曾出卖过自己两次，一次是卖给她父亲，一次是卖给那位明星律师，他有兴趣玩司法游戏，要玩到结束，像一个象棋大师一样，慷慨地接下一盘由一个初学者开始的残局。这样，我们就睡在一起了，没有交谈，我丝毫没有料到没有语言就没有幸福。也许正因为这样，它只是短暂的幸福，就是我在那天夜里体会到的那种幸福。当时，我预感到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一种无法捉摸的可能性藏在我的身上，而我没有能实现它。因为那夜我是那样幸福，所以我深信我会成为我不能成为的人。第二天早上我们相互凝视时，我们知道，一切都已过去。现在我得去机场了。

出版者加写的后记：我曾异乎寻常地，实际上也是偶然地认识了几个人，事后才领会到，这几个人不仅与前面所叙述的错综复杂的情节有关，而且还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呢。

时间想必是在 1984 年前后，地点是慕尼黑。我是不写日记的，因而我所说的时间都是不太准确的。我估计，那是 5 月下旬的事。当时我以为听到的那段故事是编造的。那是在一个优雅的别墅里，参天大树掩映着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就在这个别墅花园里，摆着几张放有餐具的桌子。女主人很热情。客人中有出版家、新闻记者、影剧界人士，都是一些挑选出来的文化界代表人物。跟平常一样我又把这里的一些人跟别的一些人混淆起来了。其中有个女士，我满以为她是某人，可又吃不准有没有认错了人，结果真的搞错了。接着我把一个男子也搞错了。后来，我使一家剧院的经理吃了一惊，而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因为以前我认得这家剧院的所有的人，如今一个也认不得了。我想，这位经理以为我要塞给他一个剧本，而他呢，也是在想我会塞一个剧本给他。一个演员来去不停地跑动着，如同一个忘了台词的扮李尔王的演员，他伤心地说：“剧院要完蛋了，没有新的剧本。”还有一个演员，由于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他以至于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个老朋友，事实上我们不过是初次相会，所以他感到很诧异。一个女人推着坐了一个白发老人的轮椅走了过来。这个女子穿着入时，端庄秀丽，大约五十岁左右，我认得她，但是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文静地招呼我，用“你”称呼我，叫我马克斯。显然她把我看作是另一个人了。我们一起笑了起来。她马上赔了个不是，我却感到很荣幸。她于是又改口用“您”称呼我。我问她，这位白发老人是谁呢？她回答说，是她的父亲。他岁数一定很大，快一百岁了。身体虚弱，然而精神矍铄。他肤色红润，头发稀而白，短短的胡子维护得既像络腮胡子，又像山羊胡子。他说他跟巴伐利亚总理谈了话，是谈政治方面的事吗？他回答说，是谈论关于设立一个实用科学基金会的事。我说我不懂。他说如今没有用的科学实在是太多了。我懂了。白发老人的女儿始终以为我认识她，其实我并不认识她。女主人跟白发老人聊上了，她跟他一边谈着，一边不停地笑着。白发老人说的话一定很幽默。我坐在两个女人中间，一个是白发老人的女儿，另一个是我在米兰只认识了一天的一个意大利出版家的德籍寡妇。白发老人的女儿——我确实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此刻已经发觉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她就一言不发了。寡妇向我讲起我过去爱过的一个女演员的近况，说她跟一个消防队员私奔了。吃完饭，大家涌到大客厅里。影剧界的人一起围着那位剧院经理，他们对艺术感兴趣。其他的人围着坐轮椅的白发老人，这些人对现实感兴趣。一位艺术评论家向女主人发表一段简短的谢词，把两部分人聚拢到一块儿达几分钟之久。他对艺术懂得太多，以致不得不对现实有所贬低，他对现实懂得太多，又不得不对艺术估价过高。他致完谢词，两部分人又各行其事了。一部分人议论起波托·斯特劳斯，另一部分人议论起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白发老人是怎样评论这个弗·约·斯特劳斯的呢。他认为，这个斯特劳斯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气象学

---

联邦德国戏剧家。——译注

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总理。——译注

家。我问，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历史学家能有长期性的见解，历史学家是玄学家，自恃掌握了人类精神的真谛。而气象学家只是敢于发表短期性的见解，气象学家是科学家，但他并不会认为自己摸清了大气层的奥秘。世界是看不透的，我问他，政治上能做些什么事呢？他回答说，快速地动动外科手术，动过手术再看看有什么影响。我问他，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他当初自愿地出过主意并且不自愿地主持过的一个康采恩，现在落到十分困难的境地。详细情况他认为没有必要描绘出来。经济方面的内在联系要比一个大气层还要来得复杂，预见也更不可靠。白发老人说话很轻松，声音低，而且说得很快，牙齿间偶尔发出咯咯的碰撞声。他说，谋杀一个人，或者指使别人去谋杀一个人，其实只是一件很必要的事。听这一说，大家都呆了，现出尴尬的神色。不过后来大家又活跃起来了。情况仿佛是白发老人要讲一个恋爱故事似的。当然，提到谋杀是不得体的，艺术组的那些人也过来听了。情况有点像是白发老人使用刀子吃了一条鱼似的，但是一个当了国王的人和一個活到年近百岁的人还不能这样做吗。“太讨人喜欢了，”一位女演员低声地对这边的人说道。我不是在电视里，就是在电影里看到过这位女演员，要不然是我自以为看到过她。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总是把一些人的相貌融合成一个相貌，至少有十个人的相貌都是一样的。白发老人让人给自己斟上一杯香槟，咂咂地啜饮起来。长期以来和我要好的一个导演兼演员来了。他祖籍瑞士，是那种丧失田产、习惯跟农奴交往的典型的俄国公爵式人物。他身材魁梧，大腹便便，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衣服故意穿得随随便便。他吻了吻女主人的手，发现这边情绪激动的人，高兴地把我们打量了一番，接着以他特有的暖人心脾的风度说道：“您好呀，州议员先生，您好，海伦娜。”他有礼貌地向我招了招手，接着说道：“我看到议员先生正在讲故事，故事很精彩。”说着给自己倒了一杯香槟，坐了下来。白发老人又往下讲了。他显得很有威望，使得大家深深地钦佩他。至关重要的倒不在于他讲什么，而在于他讲的方式，如果谁想照他那种讲法把他讲的故事重讲一遍，那是万万办不到的。白发老人继续说道，他毫不掩饰他讲了杀人的事，要请女主人加以原谅。他说，有人问他政治上能做些什么事情，政治和经济都受相同的法则，即强权政治的法则的约束。连战争也是如此。特别是经济，它是用别的手段来继续进行战争。正如国家与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一样，康采恩与康采恩之间也会发生战争。而一个康采恩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像是国内战争。不论是在哪里，一个人总是面临一种抉择，要么把别人排挤到权力范围以外，要么把自己排挤在外，这就迫切需要迅速地动一下外科手术，看看这种手术是不是有效，应该承认，在难得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谋杀才能奏效。实际上谋杀都是徒劳的方法。恐怖主义只会使世界结构的表面产生一个皱纹，不过他的那次谋杀是很必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谋杀本身，而在于认识到，只有谋杀才会解决问题。当然，他本来可以叫别人代他去谋杀，因为样样事都可请人代劳的。可是他甘愿自己动手，就像现在虽然年近百岁，还一直自己系鞋带。至于以后他还要谋杀一些人的话，那倒可以由别人去进行。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只帮了我们一次忙，一次也够了。他解决问题也是很快的。白发老人说到这里，微微笑了一下，接着说道，三十多年前，他曾经迫不得已，陪伴一个当时既不讨人喜又很著名的政治家从一家私立医院到机场去。这位著名的政治家住在私立医院里，穿着一件厚厚的冬大衣，精神恍惚地站在床前。由于他推行一种遗产继承法毁了很多该继承遗产的人，因而许

多人到处找他，要把他干掉。他准备进行自卫。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准备把所有前来找他的被他剥夺了继承权的人统统打死。这家医院的一个护士见他拿着手枪，一面狂喊救命，一面扭头往外跑。于是他把枪又插到大衣口袋里。医生带着两名护理人员迅速赶到病房。这位医生在军队里当过上校，行医粗鲁无比。他当时诊断说，这个政治家的头脑里也有病，不过，这种病对他的职业倒没有什么妨碍，他要这个病人注射镇静剂，注射以后送他回家，否则他会死在这里。经过短时间的搏斗，一个护理人员被摔倒在地，而这位政治家呢，他的那件装着手枪的大衣被人扯下，人家往他的屁股——实在对不起，女士们，我不得已用了这个词——上面狠狠打了一针，接着把那件大衣给他重新穿上，将他塞到他那辆罗尔斯-劳依士轿车里。这样，白发老人就和一个持枪而且发了疯的政治家乘车到了城里。其时正值风和日丽的春天的傍晚，暮色苍茫，时间将近7点钟。这个城市的人由于早上起得早，晚饭自然也吃得早。当他和这个独自打着盹的政治家驱车到了莱米大街，看到人们涌进饭店的时候，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怎样才能用世界上最体面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天哪，”那个意大利出版家的德籍寡妇说，“太有意思了。”白发老人继续说道，他一定要消除某个人对康采恩的影响，而这个人经常就在这个时候到一家享有世界声誉的饭店来用餐。白发人说着又喝下第二杯香槟。他说当时他叫司机把车停下，从那个打盹的政治家的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走进那家饭店。他当时估计得非常准确，那个人真的在饭店里，他上前举手一枪，打死了那个人。然后他回到那辆罗尔斯-劳依士汽车里，把手枪放回到政治家的大衣口袋里，驱车把这位尊贵的大臣送到机场，送上一架专机。飞机载着这位生病的大臣，驶向那个岛国，可是几乎没等他到达目的地，那个世界帝国的财政已经一塌糊涂了。艺术组的那一堆人听到这里，发出一阵冷笑。白发老人的女儿却异常镇静。她父亲即使讲他过去领导一个集中营的情况，她也会不动声色，我们也会乐于听的，犹如听一个老人说他怎样投掷炸弹一样。我们都被白发老人讲述时运用的那种轻快而讽刺的语句逗乐了，深深地着迷了，那些语句把大家引到抽象而又不真实的境界里。这时，有个出版家感到困惑不解，他问道：“您后来怎样了呢？”“亲爱的，”白发老人一边回答，一边从一只烟盒里抽出一支很粗的雪茄来（我回忆自己过去抽烟的情景，思忖着他抽的大概是托佩斯雪茄），“老弟，”白发老人说，“出版家忘了两点，一是我们处在什么社会范围内，二是司法界虽然不自觉多于自觉，但它总要符合社会范围的利益，虽然它有时候在特权人物面前也会粗暴地采取措施，可是，它总还是有偏见的。何必多罗唆呢。当时他被逮捕了，被州法院判了刑，可是后来又被刑事陪审法庭无罪释放了，尽管他当时杀人是在大庭广众下干的。是呀，法庭不放他不行，他们实在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证人的供词也都是相互抵触的。作案的那支手枪一直没有找到，谁会看一位大臣的大衣口袋呢。凶杀的动机也没有搞清楚。康采恩的内幕，一个检察官是弄不明白的。事有凑巧，还有一个前瑞士射击冠军在现场。事后警方要传讯他时，他已上吊自尽了。人总会有运气的，当然也可能是他（当时已七十岁）正要开枪的时候，是那个射击冠军先开了枪。事实是人被打死了，趴在法式牛排和四季豆上面，至于到底是谁把他打死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次要的事情。说到这里，白发老人点起那支雪茄。在这之前，他曾一边说一边拿这支雪茄比划着，真像乐队指挥在挥动指挥棒一样。在座的人听到这里，突然大笑起来，有几个还鼓起掌来。一个胖胖的记者打

开一扇窗户，对着夜色笑着说：“这真是个叫人永远听不厌的笑话。”在座的人全认为白发老人没有罪，连我也是这样认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是由于他的魅力？还是由于他的年龄？那位意大利出版家的德籍寡妇开心地说，白发老人讲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女主人说，生活中竟会有这种故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白发老人的女儿却十分冷静而又关切地注视着我，好像想要知道我相信不相信这个故事。白发老人抽着雪茄，并且使出我从来做不到的绝招，从嘴里吐出一个又一个烟圈来。他说，他明白，一个受冤枉的人是不会像真的杀人凶手那样令人讨厌的，所以他才受到人家的称赞，谁都不相信是他杀了人，这个结局是他命中注定了的。“您大概也不相信吧？”他对着我说，因为我写喜剧时总爱把人物大批地送上西天。大家又笑了起来，个个兴高采烈。这时，咖啡端上来了，白兰地也端来了。白发老人说，现在要说的，就该是道德方面的问题了。他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雪茄的烟灰，他并没有把灰弹掉，而是把灰留在雪茄上面。突然，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似乎不再是一个百岁老人，而成了一个没有年纪的人。他说，从道德上来说。重要的是企图，而不是有没有行动。道德的问题就是要替一种行为进行辩解的问题。一个社会总有一般法则，这些法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而那个行为却触犯了法则。辩解是辩证法范围里的事。从辩证法的角度上说，一切都是可以辩解的，当然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辩解的。因此，白发老人认为，一切辩解都是拙劣的，夸张点说，每一种道德都是不道德的。他现在只能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他当初是按一个康采恩的利益办事的，尽管如此，那个康采恩还是破产了，这就使他那桩谋杀失去任何意义。他杀人也好，叫别人杀人也好，统统没有价值了。至于一个人在政治上能达到什么目的，他说，如果能达到什么目的，那也是侥幸而已，而侥幸达到了目的，恰好又与原来的愿望背道而驰。讲完这些话，白发老人请尊敬的女主人原谅，他要告辞，让他女儿海伦娜送他回四季大饭店去。她没有朝我看一眼，推着轮椅走了出去。我觉得白发老人讲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谁会那样杀人呢。但是，这位白发老人当初是个举足轻重而现在仍然是个颇有影响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然的话，斯特劳斯怎么会接见他呢。我认为他是伤天害理的经济界头面人物。如果他讲起交易所里的不法行为，那肯定要比讲一件谋杀案复杂得多，他之所以扯起一件虚构的谋杀案来，是因为他也相信，讲谋杀的事要比讲投机的事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我事后坐上出租汽车顿时把那个故事抛到九霄云外了。我只在想白发老人谈的有关道德方面的辩证法，蓦地，我想到了他的名字：柯勒，伊萨克·柯勒。我记得在一个话剧院的朋友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曾经坐在他的对面。当时他坐在他女儿的身旁。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反正有好多年了吧。那次宴会是庆祝什么事，我已记不清了。在那次宴会上，人们没完没了地闲谈着。柯勒当时神采奕奕，皮肤黝黑，据他女儿说，他周游世界刚回来。

当年夏天，也许是9月初，我的一个名叫斯迪西-摩西的熟人的父亲去世了。大概十五年前，这位斯迪西-摩西曾是我们家的女佣人。此时她对我说，她要把她父亲的那座庄园卖掉。那座庄园我是知道的，很旧了，而且一半的房子都倒塌了。我决定买下它。庄园虽说破旧，然而景色优美，站在那里，放眼便可看到斯迪西科芬小镇所在的斯迪西山谷、弗罗蒂根小镇和阿尔卑斯山。庄园后面，有一个陡峭的悬崖。庄园所在的村庄，虽不在阿尔卑斯山里，但相当偏僻。村庄里房屋破旧，有个小教堂，弗罗蒂根镇上的牧师有时来这

里传教。村上只有一家小旅店。令人惊异的是，现在竟然还有一个没有旅游业的村庄。为了买这座庄园，我要跟被当地人叫作师爷的律师磋商一下。这位师爷在劳恩贝格尔小旅店包个房间，在旅店的餐室里处理事务。他听农民摆情况，有点像是充当乡村法官一类的角色。我来找他时，他正在调解一起斗殴事件。我看到一个农民包扎着头，一边骂着一边向外面走去，要把这位师爷描绘一番，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年纪大概五十岁，也可能年轻得多。他是个十足的酒鬼，专喝外地人叫作奥勃斯特勒的拜齐烧酒。他显得有点驼背，实际上他并不驼背。他性格暴躁，面孔浮肿，但并不显得鄙俗。眼睛呈海蓝色，而且布满了血丝。他这个人诡计多端，常常耽于幻想。他想欺骗我，要价是斯迪西-摩西向我提出的双倍。他絮絮叨叨地跟我扯起斯迪西科芬镇长难说话的事，还说些不成文的法规。他说那座庄园里面闹鬼，过去有个替斯迪西-摩西家干活的农民在里面吊死，后来每个替她家干活的农民都吊死了。在他讲述那些吊死鬼时，在场的农民都入神地听着，而且装出上吊的样子。好像有一根绳子牵动似的，他们一起把右手举过头顶，翻起白眼，伸出舌头。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位师爷并不是要欺骗我而是存心叫我不买那座庄园，他后来倒把斯迪西-摩西骗了。他要把那座庄园低价卖给一个名叫斯迪西-席特林的人。由于他对我说了那些话，更由于当地农民对我抱有敌对情绪，我对那座庄园的兴趣自然也就不大了。他见我动摇了，态度马上和蔼起来。不过他现在喝醉了，但是并不感到难受，相反情绪特别好。虽然他惯于挖苦，但是开口就能逗人发笑。现在他开始讲故事了。那些农民马上向他围拢过来，他们显然听惯他的故事了。他们好像听童话故事一样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他是我们国家最大城市里的大名鼎鼎的律师。用他的话说，他在那里红得发紫了。他挣很多很多钱，同那些大银行和豪门有来往。不过，他最喜欢的当事人还是那些妓女，他声称那些都是“他的妓女”。他讲过许许多多故事，特别喜欢讲关于一个名叫兰花诺尔蒂的妓女把头的故事。我觉得他讲的绝大部分故事都是乱编出来的，不过我听得入迷。

我之所以会听得入迷，并不是因为故事情节吸引人，而是因为故事里包含着对社会的批判。那些批判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并不切合社会现实，全是他编造出来的。他乱七八糟地讲到一桩谋杀案，模仿被告人和五名大法官的样子。农民看了都哈哈大笑。他最后打赢了那场官司。后来他才知道，获释的那个被告其实是个真正的杀人凶手。凶手原是一名州议员，他欺骗了这位律师，也欺骗了那五名大法官。农民听到这里，马上欢呼起来，饮起拜齐烧酒。显然，这故事农民们已经听好多次了，可还是听不厌。他们一再要求这位师爷讲下去，他扭扭捏捏，农民给他斟上拜齐酒。他指了指我，说我不会感兴趣的。农民给我斟一杯酒，我说，不，不，我是感兴趣的。于是，师爷讲到当时他设法让法庭重新审理，可是政府部门，联邦法院都不同意对被告重新判决。议员毕竟是个议员嘛。这位师爷每次提到司法界设置的障碍，遇到任何刁难，都引起农民听众哄堂大笑。一个农民叫道，在标榜自由的瑞士就会出这种怪事。他一边叫着，一边向人又要了一杯拜齐酒。师爷说他后来只好单枪匹马地去干。他等着等着，一直等到那个议员周游世界归来。他从报纸上看到议员归来的具体时间，接着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警察局长。这位警察局长便派人把飞机场封锁起来。可是师爷扮成一名女清洁工，混进进飞机场的清洁队里。他在假造的可以翻开的乳房里藏了一支手枪。通过机场大门的时候，有个警察摸了一下他那假乳房，他顿时大叫起来，说那

个警察要强奸他。警察局长出来向他道歉，并把那个警察关到机场的拘留所里。听到这里，农民们都高兴地拍着大腿。接着，师爷讲到他开枪打死那个议员的经过情形。那是在通往头等机舱的旅客休息室的路上。那位议员一头栽进了垃圾桶。一个农民大叫起来，说这好比退尔 狭路相逢盖斯勒 并干掉他一样了。其他农民也一起狂呼起来，顿时喧声一片。这完全是正义的呼声。师爷表演起他当时被捕的情景。警察局长从他胸前扯下假乳房。他又爬到桌子上，表演向那五名大法官发表辩护演说的情景，他说，大法官们既然释放过被他杀害的那个人，现在就该释放他这个杀人的人。当时他对那些大法官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司法界的人，全是狗屁！”从那以后，他便成为斯迪西山谷里的师爷了。师爷说完以后，跌倒在一把椅子上。一个农民站起身来，他左手拿着半瓶拜齐酒，右手拍拍师爷的肩膀敲了两下，说自己是个地道的斯迪西人，而师爷却是斯迪西山谷里唯一不是斯迪西人的人，尽管如此，师爷总还是个精明强干的瑞士人。说完，他把酒瓶里的酒一饮而尽，趴在桌子上，打起呼来。其他农民唱起了已经废弃了的瑞士国歌，这首国歌第一段结尾是：“赫尔维蒂亚 万岁！你子孙万代，如圣雅各看到的一样，正兴高采烈地迎接挑战。”师爷讲的这个故事，我好像听人讲过，我想把其中的一些细节弄清楚，可是他已烂醉如泥，什么话也说不出。一些农民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另一部分农民唱到第二段歌词的末尾：“阿尔卑斯山不知道保卫你，使你满面惆怅，我们可跟岩石一样，不畏艰险，不怕疼痛，不怕死神。”我实在替师爷感到惋惜，他从一个明星律师，一落千丈，最后成了一个小小的师爷。他杀了人，打赢了官司，可是，那桩谋杀案还是把他毁了。我打消了购买那座庄园的念头，我必须离开此地。在这个斯迪西山谷里，城里人是讨人嫌的。他们从我的汽车上也看得出我是从新堡来的，虽然我和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只是腔调平淡一些，但他们总认为我是外乡人。于是我离开了这个小旅店。“你从晨曦中来，满面红光，你是那么崇高，你是那么美丽！一旦阿尔卑斯山积雪染红，你自由的瑞士，你祈祷吧。崇高的祖国，你有虔诚的心灵，你该预感到上帝的恩德！”歌声在我身后回荡着。他们又唱起了新的国歌。

后来又都遗忘了。我对那个坐轮椅的白发老人，对他的女儿，对那个在斯迪西山谷小店里跟农民混在一起的杀人凶手全不在意了。由于不能买下那座庄园而产生的恼怒，使我把他们一起置于脑后了。我并非心血来潮去买那座庄园的。我是要改变环境。回家后，我开始来个大整顿。我要把四十年写作生涯中积累的垃圾统统清除出去。许多未完成的通讯稿、从未过目但已付了款的帐单、大堆校样、改得一塌糊涂的手稿、未完成的稿子、照片、插图、漫画，摆在一起实在是乱透了。这些东西一半要清理出来，一半要清除掉。我在清理大堆埋没了几十年的稿件和未回复的信件时，不在意地把一份稿子打开来看了一下，原来是关于司法方面的稿子。去他的，扔掉它！我扔的时候，看到这份稿子的第一页上有伊萨克·柯勒博士的名字。我于是把稿

---

都是德国著名传说以及席勒著名戏剧《威廉·退尔》里的主人公。盖斯勒是欺压百姓的总督，退尔是被压迫者的一员。——译注

都是德国著名传说以及席勒著名戏剧《威廉·退尔》里的主人公。盖斯勒是欺压百姓的总督，退尔是被压迫者的一员。——译注

拉丁语瑞士名。——译注

子从塑料袋里取出来，稿子原是一个姓H的博士从苏黎世寄来的。凡是别人寄给我的稿子，我从来是不看的，我自己是搞创作的，对文学不感兴趣。这个H博士是何许人也？我拼命回忆着，噢，我到底还是想起来了。那是1957年在库尔。有一次，我在一家旅馆里，听完一个报告，走进酒吧，想喝一杯威士忌。酒吧间里除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招待外，还有一个男子，我还没来得及坐下，他就过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就是H博士，是前苏黎世警察局局长。他身材高大，样子古板，一根金黄色怀表链子横挂在马甲外面，这种样子现在的人难得看到了。他虽说已经上了年纪，可那蓬乱的头发还是乌黑的，胡子也很密。他坐在酒柜旁边的一张高椅子上，一边喝着红葡萄酒，抽着巴希阿诺斯香烟，一边叫着那位女招待的名字，和她攀谈着。他声音洪亮，一边说着还一边指手划脚，简直没有一点顾忌，我不禁感到惊诧。第二天早晨，他用自己的车子把我带到了苏黎世。我翻阅着这份稿子，稿子里的字都是用打字机打成的。标题的上方，用手写着这样的话：“请随意处理。”我看着看着，从头一直看到末了。撰稿人是一名律师。他不会处理他的素材，他把眼前发生的事插在里头。最重要的内容他放在结尾处叙述，后来忽然没有时间写下去了，草草收了尾。总的来说，这是一部蹩脚的作品。里面的一些场面也叫我感到吃惊，比如那些小标题，那种“企图搞乱秩序”的话，还有那些名字也是如此。现在有谁会叫做尼可德莫斯·摩尔西呢？谁叫达芙纳·米勒？谁叫伊尔瑟·弗劳依德呢？谁还会去布置一大批花园陶俑呢？那位警察局局长不是有一次对我说过，他爱读让·保尔的书吗？我没法问他了，他已于1970年去世了。后来我又读到警察局长夹在稿子里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我刚才参加斯迪西-劳埃平的葬礼回来。在场的只有莫克。我后来和他在戏剧大饭店吃了肝泥丸子汤和法式牛排拌四季豆。饭后我们找莫克的助听器找了很长时间。原来助听器给一位女招待放在托盘里带出餐厅了。至于我们那位狂热追求正义的朋友，他确实成功地混进了机场。他是混在清洁队里进入机场的。他也开了枪，枪响时由于惊吓，一头栽倒在垃圾桶里。幸亏这时有一架四引擎飞机起飞，所以柯勒什么也没发觉。肇事者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他弄错了。其实我已对他楼下的旧货商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那支手枪里的子弹，原来都是精心制成的无弹头的空弹。事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位狂热地追求正义的人，当时他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不想把他交给司法机关。斯迪西-劳埃平（关于此人，请见上文）很同情他，给他找了一个工作。这些事情都过去几年了——您的H博士，前警察局局长。”我打电话到斯迪西科芬小镇，接电话的是劳恩贝格尔旅店店主。我叫他把那个师爷找来接电话，不料他说师爷上个星期已经死掉了。我问店主，师爷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叫什么名字？还不就是叫师爷吗。他葬在哪儿呢？店主回答说，想必是葬在弗罗蒂根。我于是赶到那里。公墓位于庄子外面，四周有石头围墙，门口有道铁门。天气很冷。我在这一年还是第一次感到冬天的威胁。我对公墓有几分亲切感，小时候就在一个公墓里面玩过。我总觉得那个公墓非常奇特。每个死者都有自己的坟墓，有石碑，铁的十字架，基座，柱子，甚至还有天使雕像。在一个名叫克里斯忒里·摩泽尔的坟上就雕着天使。弗罗蒂根的这座公墓可算得上是座时新的公墓了。它是十年前由弗罗蒂根镇公所设立的。十年前死人埋的地方，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座公墓面积不大，因为地皮太贵，它又不能扩大，每个死者只准在这里埋十年，十年后，墓就作为无主墓处理。不过这十年里，死者都得端端正正地躺好，每个死者的墓

要一样，墓前的花要一样，碑要一样，碑文都要一样。这里的死者都按严格的顺序排得整整齐齐，连我要找的死者也不例外。这倒不错，活着的时候，他乱七八糟，死后是规规矩矩的。他是最新来的一个死者，他旁边的墓穴还是空的。他墓前，已经树起了石碑，栽好了花木（紫菀，菊花）。墓碑上写着：

菲里克斯·施佩特，师爷

1930—1984

我回到家里，又把那份稿子看了一遍。它想必是用打字机从原稿上打下来的。尽管它可能被警察局长进行了一番加工，然而它的内容还是极其可靠的。施佩特在斯迪西科芬夸耀自己犯下了一桩谋杀罪，实际上他并没有杀人，而柯勒在慕尼黑却把自己犯下的谋杀罪转嫁给他要铲除的那个人。我叫人把这份稿子拍成照片，又在电话簿里找到伊萨克·柯勒的地址，于是我把照片给他寄去。几天以后，我收到海伦娜·柯勒寄来的一封信。她请我去拜访她，她说她父亲的身体状况使她不便前来看我。我于是打电话给她，答应她的请求。第二天，我走进了柯勒家的别墅。

我跨进柯勒家的花园铁门，朝房子走去，这时我好像觉得那份稿子出现在我的眼前，好像那份稿子在为我作说明。这里一景一物都显示出这家人家非常富裕。10月的花卉姹紫嫣红，树木挺拔壮丽。这儿几乎还和夏天一样，人们在这里感受不到燥热风的困扰。放眼看去，到处是修剪得富有艺术特色的灌木，布满苔藓的雕像，赤裸着健壮下身而又带胡子的圣像，静静的小溪和一对神态庄重的孔雀。总之一切显得静谧而又井井有条。人们只能在这儿听到几只小鸟的叫声。房子又高又大，外墙上布满着五叶地锦、常青藤和玫瑰花，内部显得舒适而又柔和，有古色古香的家具和各种珍贵的工艺品。墙上挂着印象派著名画家和古荷兰画家的绘画。一位年老的女佣引导我在房里走着。最后我在伊萨克·柯勒博士的办公室里等候着主人。这个办公室相当宽敞，被阳光染成一片金色。穿过一扇双开门，人们可以径直走到花园里。门两边的窗户长得几乎一直抵到地板，地板都是用高级镶木拼成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很大的写字台，还放着几张很深的皮沙发。墙上没有绘画，只有书一直堆到房顶，这些书都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著作，显然是一批了不起的藏书。宽敞的壁龛里，放着一张台球桌，桌上放着四只球。年迈的伊萨克·柯勒博士摇着轮椅，穿过敞开着的大门，进来了。他看来比我想象的还要虚弱，脸色更加苍白，简直是个幽灵。他似乎没有看到我，一直向台球桌摇过去，到了台球桌旁，便爬出轮椅，打起台球来，看到这个情景，我不能不感到几分惊奇。海伦娜这时也来了。她具有运动员的气派，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着丝质衬衫，手工织成的罩衣带有红、蓝、黄三个大方块图案。她把手指搁在嘴上，示意我不要作声。我领会她的意思，跟她走到外面。我们穿过一个大客厅，又穿过一道敞开的双开门，最后在一个透明凉篷下的室外平台上坐了下来。这是我在这一年里最后一次坐在室外了。平台上摆着几张旧藤椅和一张石板桌面的铁桌子。平台下的草地上，有一部割草机和最初的几堆树叶。孔雀在这中间。海伦娜说，她正在干园艺活。后花园里，有个小伙子在给花园翻土，他一面翻土，一面吹着口哨。海伦娜说，他们一定要把花园里养的孔雀弄走，因为邻居们抱怨这些孔雀叫得扰人，他们已经抱怨半个世纪了。不过，她父亲倒喜欢养这些孔雀。海伦娜想，父亲之所以要养这些孔雀，只不过是惹邻居们生气罢了。他任凭孔雀大喊大叫。有时警察前来干预，

他也毫不在乎。她说，孔雀叫的声音是人能听到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正是由于这些孔雀的缘故，周围一带房屋和地皮的价格才一落千丈。她父亲把那些房屋和地皮一齐买了下来，邻居也就不敢再有什么抱怨了。海伦娜说完这些话，给我倒了杯茶。我说，她父亲真是一个怪物。她说，真可以这么说。我问她，看过我寄来的稿子吗？她回答说，她浏览了一遍。我说，施佩特过去曾经爱过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施佩特似乎不好意思写出来，她当时也爱施佩特的。海伦娜说，这个好施佩特，他过去爱的唯一的女人还是达芙纳，所以他写到达芙纳才写得最生动。至于爱她海伦娜，那只是施佩特自己的感觉而已。我于是纠正自己的看法，确认施佩特对海伦娜的爱情只不过是他自己的感觉而已。我又说，那个好施佩特已经在十四天前在斯迪西山谷里去世了。“茶凉了。”她听我说到这话，马上说道，并把她的茶杯里的茶倒在铺着黄树叶的草地上，倒在放肆地吹着口哨从这里走过的小伙计的脚旁。

孔雀叫了起来。海伦娜说，平常这个时候它们是不叫的，它们马上会静下来的。可是它们还一个劲地叫着。她说，我们最好还是回到屋里去。于是我们走进屋里，关上双开门，坐到两张圈椅上。两张圈椅当中，放着一张小桌子。她问我，喝白兰地吗，我说，喝。她就倒了一杯白兰地。孔雀在外面继续叫着，声音是那么单调，叫人感到心慌意乱。她说，幸亏她父亲听不到这些鬼东西叫。随后她问我有没有读过关于真莫尼卡·施泰曼的章节。我回答她说我读过，但是对那些事情感到不可思议。她说，她也曾受到莫尼卡·施泰曼的邀请，时间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那时她还不满十八岁。跟本城所有的人一样，她当时也以为达芙纳就是莫尼卡·施泰曼。海伦娜十分欣赏莫尼卡。不过，海伦娜当时对莫尼卡也有忌妒心。她是因为贝诺而吃醋，因为贝诺一直回避她。当时贝诺对哪个女人不勾引呢？尽管当时的人都相信贝诺和莫尼卡会结成一队，也认为他俩结合好极了，但是人们总还认为和贝诺睡一睡，或和莫尼卡睡一睡是件十分时髦的事。而她，海伦娜呢，她是柯勒的女儿，谁都不敢碰她。贝诺自然对她敬而远之。她当时对施泰曼的邀请根本没有什么疑虑，在内心里，她倒希望能在施泰曼那里见到贝诺，她已经热恋着贝诺了。那天，晚饭以后，她一边喝着未加牛奶的咖啡，一边把应邀到施泰曼那里去的事告诉父亲。父亲问她，以前有没有应邀到曙光街去过。他一边问，一边伸手去拿马尔克酒，他在家一直是喝马尔克酒的。她当时对父亲说，她是要到憩园去赴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人被邀到那里去过。她父亲马上回答她说，是的，迄今只有吕德维茨和他去过那里。父亲问她，他可不可以给她提个建议。她执拗地回答说，她什么建议也不想听。父亲说，他劝她不要接受邀请。他说完这话，拿起酒杯，把杯里的马尔克酒一饮而尽，说这就是他给她的建议。然而她全然不听，还是去了。海伦娜继续说道，当时她骑车去华格纳山岗，她把自行车靠在大铁门旁，信手掀了掀门上的电铃。没人开门。她感到有点惊异。后来她才发现，门并没有锁。于是她推开大门，走进花园。可是一到花园里，她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恐惧，她再想回头出去时，门已经开不开了。如果说，她起初吞吞吐吐地讲话，那么从现在起，她已在滔滔不绝地讲了，似乎她所讲的那些事情跟她没有一点关系，而只是关系到别的什么人。根据她所讲的情况，就在那一瞬间，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虎口。在绚丽的霞光映照下，荒芜的花园仿佛像一条火龙在对她露出恶意。她心神不定地走到一条路上，石子在她脚下发出嚓嚓的响声。突然，她看到路旁有个陶俑，接着又看到三个，接着又看到好多个。他们在未割的

草丛里，在夹杂着羽扇豆和还亮草的野菊花里，东张西望。在霞光的映照下，他们一个个显得面颊丰满而红润，但脸上却也露出奸诈的神情，特别引起她注目的是一个陶俑在树上向她奸笑。她感到非常恶心，匆匆忙忙地从这些陶俑身边擦过去。后来她又看到另外一些陶俑，这些陶俑头大，秃顶，不长胡子，是用彩色黏土捏成的。他们的个子比前面那些陶俑高些，差不多跟四岁小孩一样高。她实在不敢靠近他们。后来她发现其中有个陶俑向她眨了眨眼睛，她大惊失色地凝视着他。那个陶俑接着又向她狞笑起来。她只好从这些不知羞耻的陶俑中间跑了出去，一直跑到一片没有陶俑的草地上。这里有个平缓的斜坡，走到斜坡顶上，一眼看到了别墅。她上气不接下气，动也不动地伫立在斜坡上。她又回头看了一下，总以为刚才是看花了眼，像是一场恶梦。不料她又看到那个狞笑的陶俑，正在踉踉跄跄地朝她跑来。她拔腿朝别墅飞奔过去，跑到一个敞开的门里。这时候，她依然听到身后有人迈着小步的脚步声。她接着跑过前厅，进入大厅。现在虽然是在夏天，可是她发现壁炉里劈劈啪啪地烧着木柴。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只听到身后迈着小步的奔跑声。最后她跑到一个小房间里，关起房门，插上门闩。她朝四边看了一下，小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海伦娜继续说道，她当时看到小房间的墙上贴满了贝诺的照片，她扑通一声坐到一张皮沙发上。她突然闻到小房间里有一股异常甜蜜的气味，接着她便失去了知觉。后来，她苏醒过来了，看到四个赤裸着身子的彪形大汉站在她的周围。他们全是秃头，身上散发着橄榄油的气味，跟鱼一样，全身湿淋淋的。她现在已记不全了，反正她进行了反抗，可是有人笑了起来。接着她的两条腿被人拉开来。温特教授出现了。只见他光着身子，挺着大肚子。这时，她看到在温特教授后面，刚才追她的那个陶俑正坐在柜子上面。她这才恍然大悟，那不是个陶俑，而是个女人，这女人是特地坐到柜子上来看人怎么奸污她的。她完全明白了，所有那些肮脏事情都是特地做给这个头发几乎秃光、个子只有一个四岁小孩一样高的女人看的，而且也正是这个女人把她赶到这座房子里，叫那几个人在她身上做出在这个女人身上做不出的事情来的。这个女人总希望男人在她身上做出那种事情来，只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先是温特，接着是贝诺，扑到海伦娜身上，尔后，达芙纳也扑到她身上，这时她唯一的武器就是拼命克制自己的性欲。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她的性欲发作得越厉害，那个矮女人的脸色就越难看。她气得全身打着哆嗦，两只眼睛闪出妒忌的光，她似乎感到非常的不幸，她无法尝到她的走卒按照她的命令强加给海伦娜的那种快感。最后她极其愤恨地大叫一声：“停止！”喊过以后，她哭泣起来。海伦娜被人放开了，矮女人也让人抱了出去。海伦娜孑然一身地留在小房间里。她整了整身上的衣服，来到大厅里。壁炉里依然火光熊熊。她蹒跚地穿过前厅，走过黝黑的花园，最后摸到了大门口。大门没有锁，她于是骑车回家了。

讲完上面那些情况海伦娜沉默了，后来她问我，是不是感到震惊。“没有，”我说，“不过，再给我来点白兰地，那就对了。”于是她给我斟上白兰地，也给她自己斟上。她说当时她回到家里，父亲还在工作呢。他依旧坐在他那张写字台旁。他几乎看也没有朝她看上一眼。可是她还是把一切都对他说了。他听完以后，走到台球桌旁，打起台球来。他一边打着台球，一边问她，还想怎么样。她回答说，报仇。“统统忘掉算了，”父亲对她说道。可她坚持要报仇。他一听这话，就停下玩球，眼睛紧紧地盯住她，说他刚才劝她别去，可她偏偏要去，他当时只好随她去了。他说，他的劝告毕竟不是

命令，她当然可以不听。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也就无足轻重了，因为反正已经发生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一定要摆脱掉，要是耿耿于怀，必然会自讨苦吃，最后还会一败涂地。可是不管他怎么说，她还是要报仇。“我的乖孩子，”父亲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这样叫她。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是劝劝她而已。既然她要报仇，那也很好，就给她报仇吧，这事由他来干。他说着，往球桌上放了四只球。他用球棒击了一下，只是一下。最先是一只台球撞到桌边弹了回来，把另一只台球撞进洞里。父亲说，这一只就是温特。第二只又掉到洞里，这一只是贝诺。接着是达芙纳。当他说了施泰曼的名字后，球桌上就没有球了。海伦娜问道，她呢？她是这根球棒，他答道，他只拿它用一次。海伦娜问道，他怎么处置那几个人呢？“我要叫他们死，”父亲答道。他要叫他们按照他刚才安排的顺序一个一个地死。接着他叫她去睡觉，他还要办公。

海伦娜停了一会儿。这时，我和她喝着第三杯白兰地。从隔壁房间里传来台球的撞击声。海伦娜继续说道，她和父亲的那次谈话，比憩园发生的事情更深刻地留在她的记忆里。那天夜里，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掉灯，在那漫长的黑夜，久久地仰望着天上无情的星星。这些星星连对我们地球不可名状的缥缈境界里有没有生命都漠不关心，哪里还会关心我们这些人的遭遇。想到这里，一丝疑虑掠过她的心头，父亲说不定是希望她去憩园的，父亲也估计到她有那种好奇心理。可是，那个矮女人为什么偏偏选中她呢？矮女人叫人侮辱她究竟是冲着她海伦娜呢，还是冲着她父亲呢？如果冲着她父亲，父亲又为什么起先叫她不要报仇呢？他仅仅是要考虑自己该不该接受这个挑战吗？那么这场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谁跟谁斗呢？她感到不安的是，在父亲经常开玩笑时提到的砖瓦托拉斯的后面，可能还会有更重要的公司。她同时感到不安的是，父亲有时还提到统治未来世界的硅树酯。她问过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知道她父亲为什么要提到硅树酯。难道她父亲和吕德维茨正有一场权力之争吗？难道她遭到的那场横祸，只是施泰曼向她父亲发出的一个信号，说明施泰曼再也不能容忍他的干预了吗？

我思忖着她对我讲的那些情况。有一点，我对她说，我还搞不清楚。她父亲在慕尼黑讲过他犯下的一桩凶杀案，他说那次凶杀案是他出于一种错误的动机犯下的。但他直到戏剧大饭店门口才想到要用那位英国政治家的手枪——不对头，这样说是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海伦娜入神地注视着我。她真是一名绝色女子。她说：是的，她父亲并没有说实话。她和父亲商量过这次凶杀。这点让可怜的施佩特猜着了。她父亲是亲自用手枪把温特打死的，接着他把手枪塞到那位英国大臣的大衣口袋里。在飞机上，她把枪从那个英国大臣的大衣口袋里取了出来，到了伦敦，她把它扔进泰晤士河了。我打断她的话说，那个英国大臣并不是乘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去伦敦的。她说，斯迪西-劳埃平也提出过这种异议，可他哪里知道，她是遵照那位大臣的愿望，作为他的陪同，跟他一起飞去的。正因为她充当那位大臣的陪同，她才多次到那家私立医院去探望他。她说完便沉静下来。我仔细地打量着她，她已老了，我也老了。“施佩特呢？”我问道。她并没有避开我的目光。我对她讲起我跟施佩特会面的情形。她一直入神地听着。接着她平静地说，施佩特误解她了，还说我也会把她误解的。那一夜过去几个星期后，她就和温特，接着又和贝诺发生了关系。为这事，温特和贝诺争吵起来，达芙纳也和贝诺争吵起来，达芙纳和施泰曼的关系破裂了。她另外还跟哪个男人睡过，这都是无关

紧要的。她可以跟所有的男人睡，这就是她给人的最恰当的回答。她说，她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她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合情合理地解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她的行为超出了自己的理智。也许她的那些解释统统是为那天夜里在憩园那种天性在进行辩解。也许她还希望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奸她，人只有被人强奸才会消磨自己的意志，才会感到真正的自由。不过这么说也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她想她只不过是父亲手里的一个工具罢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她当时总是摆脱不了的。父亲在打台球时提到的那几个人，都按事先排好的顺序死掉了。施泰曼是最后死的。这已是两年前的事了。施泰曼按照海伦娜父亲的劝告，忽然搞军火交易，这一来，那个特罗格公司就倒台了。后来有人发现施泰曼死在她那希腊式的孤岛上。她那四个保镖身上被人打了无数的枪眼。施泰曼死了半年才被人家发现，她头朝下栽在一棵橄榄树的树洞里。海伦娜问我读没读过这方面的报道。我回答说：我过去并没有留心过施泰曼这个名字。报纸上刊登施泰曼被打死的消息时，她曾在她父亲的写字台上看到一份电报，电报内容只是一行数字，1171953，这行数字正好是她遭受蹂躏的那个日子：1953年7月11日。然而，到底是不是有人受她父亲的委托把那几个人打死呢？到底是谁呢？执行人的后台是谁呢？后台的后台又是谁呢？施泰曼一死，是不是意味着一场经济斗争结束了呢？这场经济斗争是合理的权力之争呢，还是不合理的斗争呢？世界上到底在搞什么鬼呢？她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我对她说，我也不知道。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谈谈施佩特吧，”我说，“要是您乐意的话。”她说她很乐意。她说当初施佩特接受她父亲的委托的时候，她就希望他能搞清楚。我问她，要他弄清什么情况？她说，让他弄清到底是谁唆使她父亲杀人的，唆使人正是她。我说，这话不太符合逻辑。她说，为什么不符合逻辑呢？本来就是她唆使她父亲去干的。她当时有选择余地的。我说，她起先把罪责统统推到她父亲身上，而现在又推到自己身上，那是怎么回事呢。她回答说，她和她父亲两个人都有责任。我说这简直是发疯。她说她疯了。我吩咐她继续讲下去。她非常镇静他说，在她父亲无罪释放后出去周游世界的时候，施佩特曾把她狠狠辱骂了一顿。这时，施佩特几乎已把情况摸清楚了，于是她跑到警察局局长那里，供出了全部真情。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重复着说，她坦白了，她坦白了一切。我问她，以后怎样呢？她默不作声。后来她说，当时那个警察局长也曾这样问她：“以后怎样呢？”警察局长问过以后，点上一支雪茄，并说，这是过时货了，他说贝诺已经自尽身亡。贝诺一死，人们就无从查考当时到底是谁向温特开枪的，也不可能为那支枪去搜泰晤士河了。他说有些案子就是这种情形：司法部门失去理智，闹出很多笑话来。当时警察局长并没有扣住她，说着就叫她走，同时对她说，他会把她对他讲的那些情况忘掉。我问海伦娜，她父亲为什么从来不提施佩特呢？她回答说，她父亲把他忘记了。我又说，她父亲也绝口不提斯迪西-劳埃平。她说，她父亲一直以为是贝诺，而不是他自己把温特打死的，这一点很奇怪。可是只有她是唯一知道实情的人了，真的凶手还是她父亲。我问她对情况是不是真正了解得很透彻。我总认为，虽然说起来不太令人相信，不过真正的凶手也许还是贝诺。海伦娜摇了摇头，说凶手还是她父亲。她说她当时检查过那支手枪，而且那支手枪也是她从那位英国大臣的大衣口袋里取了出来，在家里给手枪装上子弹的。

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情况，她便带着惊讶的神色看着我，并且问我，

我把那份稿子寄给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仅仅是为了弄清事实吗？她之所以对我讲起那些事，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不会关心别人的事，而只会关心自己的事。我来向她了解那些情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以后书出来，作者只会署我的名字，而不会署施佩特的名字。不过我对她说，稿子到底是出自施佩特还是出自我笔下，这事只有我知道。我宣称，那份稿子是从警察局长那里拿来的。她说她认识那个警察局长，他是个会唠叨的老头，常到她父亲和她这里作客，他每次来，都是瞎扯一气，可能也向我瞎扯过。海伦娜又说，我写小说如果写到她的话，可不能把她描绘成歌德所描绘的那些女子，那些女子令人乏味，叫人恨不得揍她们一顿才好，不过，菲列娜是个例外，在歌德描写的女子当中，菲列娜算是老年歌德唯一想要跟她睡觉的女人。说过这些话，她便呆呆地出神。在花园里干活的那小伙子，这时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从窗外走过。海伦娜问道，我自己能不能找到出去的路？听她这么一问，我马上告辞了。老人依旧在他的工作室里打着台球。A la bande.

1点56分了。我来到我的工作室的门前。当初我建造这间工作室时，我从这儿还能看到远处的湖，可是如今，树挡住了视线。我不得不砍掉几棵。我当时迁到这里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树。不得不砍树，是令人痛心的，因为砍树也是一种谋杀。那棵橡树已经长得又高又大了。我觉得看到这些树木，跟朝天上看不一样。我感到时间的流逝，我自己的时间的流逝。现在我已看到天空里的昴星、毕宿五、五车二了。这几颗都是冬天的星，我一看到这些星，就不禁产生凄凉的感觉。其实现在还是夏天，虽说一年才过去三分之一，可是我似乎又增加一岁。天上，客观的时间在无休止地流逝着，我这个快六十五岁的人的可以计算的时间在流逝。随着树木的生长，我的岁月也在增长。向死亡逼近，这时间已经不可计算，而只能体会了。我朝夜幕下的湖面望去，除了人给它加的东西而外，湖并没有什么变化。地球呢，它感到自己有多大岁数了呢？它的感觉是否客观呢？它有四十五亿年了吗？它在被太阳烧毁以前，还能活七十亿年，是不是因此就自以为还处在壮年时期呢？它是不是感到时间像闪电似地飞逝？它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股急促的凶猛的力量，迅速地抑制不住地把大陆分成几块，把山凸出来，把地层叠起来，把海水漫到陆地上来？我们漫步走过一块坚实的土地会不会实际上是在越过一块摇晃着的土地，它随时都要开裂，把我们吞下去？人类的时代又是怎么一个情形呢？我们已经尽量客观地把人类的时代估算过，同时还把它划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并且正在等着划分一个更新的时代。当然还有更精细的划分方法，如东方人以后来了古希腊人，再后来是恺撒和基督，后面又是宗教信仰的时代，接着文艺复兴运动兴高采烈地宣告宗教改革的来临，接踵而至的是理性的时代，这种理性的时代真是势不可挡，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都只不过是些插曲而已……战后出现四十年的和平，可是这种能称得上是和平的时代又是怎样度过的呢？时间对和平来说是停止不前的吗？如果是这样，和平又怎样和时间打交道呢？时间会从和平手里跑掉吗？时间会像狂风一样从和平的头顶上吹过去吗？像龙卷风一样，把汽车吹得一辆撞一辆，把列车扫离铁轨，把巨型喷气客机喷得撞在山上，把城市吹塌，燃烧殆尽吗？我们这四十年可以计算

的和平时期客观上是怎么过的呢？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在为战争发展军备，而一场真正的战争似乎越来越无法想象，而人们却在考虑着它。为了维护和平，千百万人示威游行，举着横幅标语，唱着流行歌曲，做着祈祷。我们这个和平时期不是早已采用了我们过去曾经称之为战争的形式了吗？世界历史给人类造成了假象，仿佛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也许对地球来说，客观地计算，世界历史只是一段短短的插曲，甚至还没有那么长，只是瞬间发生的事件，用宇宙的观点来看，几乎无法确认，只留下一条难以识辨的抓痕……我很累地回到我的写字桌前。回到我的厮杀战场，进入我创作的人物的圈子中去。但不是进入另外一个现实。创作中的人物的现实有一点与我们的不同，他们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没有。故事里的人物是我编造的，我却没有能力解开他们的谜。我的人物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现实，这就使得他们脱离了我的想象力，也就脱离了我的现实，脱离了我为了创造他们所提供的时代。这样他们也成了我们大家的现实中的一部分，从而成了我们称之为世界历史的那些可能性中的一个可能性。世界历史也是受到我们的种种虚构的情况束缚的。这个故事原先只在我的想象中变成现实，现在一经我写了下来，就离开了我，难道它比世界历史更荒唐吗？难道它比我们在上面建造城市的土地更经受不住地震的威胁吗？上帝呢？如果我们拿他来设想，他的所作所为会与柯勒博士的不同吗？柯勒委托施佩特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凶手，难道施佩特不能拒绝？难道他不是非去找到一个不存在的凶手不可吗？这正像人类当初在吃识别善恶的果实时非得找到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不可，非得找个恶魔来不可。恶魔不正是上帝虚构出来用以为他创造的走上邪路的人作辩解的吗？谁是罪人？是那个委托人呢，还是那个接受委托的人呢？是发布禁令的人呢，还是蔑视禁令的人？是颁布法律的人呢，还是触犯法律的人？是容忍自由的人呢，还是利用自由的人？我们允许别人有自由，自己有自由，我们因这自由而毁灭。我离开我那已经空了的工作室，摆脱了我创造的人物。时间是4点半。我第一次看到天上的猎户星座。它在追捕谁呢？

1985

---

指小说写完了。——译注

指圣经故事中的亚当和夏娃。——译注

